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卷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　　任：王忍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 主 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明*　于　沛　王　正　石　泽

叶　军　叶书宗*　刘　邃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　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　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　一　姚　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　　书：方　琼

编　　务：罗淑娴　闻　静　胡甫强　宗　静

注：*为分卷主编。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第1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姚 海

21521884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 年 12 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目　　录

本卷前言 …………………………………………………… 1－1

卢那察尔斯基关于 1917 年事态的信件

（1917 年 4 月至 1917 年 12 月）

专题说明 …………………………………………………… 1－1

№0171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4 月 3 日） ………………………………… 1－2

№0171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5 月 12 日） ……………………………… 1－5

№0171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5 月 13 日） ……………………………… 1－8

№0171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5 月 18 日） ……………………………… 1－11

№0171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5 月 19 日） ……………………………… 1－12

№0171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5 月 19 日） ……………………………… 1－15

№0172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6 月 2 日） ………………………………… 1－20

№0172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6 月 5 日） ………………………………… 1－21

№0172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15日) ………………………………… 1－24

№0172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16日) ………………………………… 1－25

№0172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19日) ………………………………… 1－26

№0172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20日) ………………………………… 1－28

№0172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28～30日) …………………………… 1－30

№0172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4日) ………………………………… 1－31

№0172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8日) ………………………………… 1－33

№0172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10～11日) …………………………… 1－34

№0173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14日) ………………………………… 1－35

№0173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15日) ………………………………… 1－37

№0173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18日) ………………………………… 1－38

№0173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19日) ………………………………… 1－40

№0173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26日) ………………………………… 1－42

№0173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9月2日) ………………………………… 1－43

№0173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9 月 3 日) …………………………………… 1－44
№0173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9 月 4 日) …………………………………… 1－45
№0173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9 月 5 日) …………………………………… 1－46
№0173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9 月 13 日) …………………………………… 1－47
№0174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9 月 26 日) …………………………………… 1－48
№0174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9 月 28 日) …………………………………… 1－49
№0174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0 月 5 日) …………………………………… 1－50
№0174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0 月 7 日) …………………………………… 1－51
№0174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0 月 8 日) …………………………………… 1－52
№0174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0 月 12 日) ………………………………… 1－53
№0174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0 月 15 日) ………………………………… 1－54
№0174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0 月 18 日) ………………………………… 1－56
№0174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0 月 22 日) ………………………………… 1－57
№0174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0 月 23 日) ………………………………… 1－58

№0175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0月31日) ………………………………… 1－59
№0175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1日) ………………………………… 1－60
№0175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3日) ………………………………… 1－61
№0175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6日) ………………………………… 1－62
№0175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7日) ………………………………… 1－64
№0175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9日) ………………………………… 1－66
№0175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10日) ………………………………… 1－69
№0175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11日) ………………………………… 1－70
№0175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14日) ………………………………… 1－72
№0175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26日) ………………………………… 1－73
№0176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29日) ………………………………… 1－74
№0176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2月1日) ………………………………… 1－76
№0176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2月6日) ………………………………… 1－77
№0176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2月8日) ………………………………… 1－78

瓦尔热涅夫斯基
关于十月革命前农村情况的信件

（1917年3月至8月）

专题说明……………………………………………………… 1－79

№04471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3月6日）…………………… 1－80

№04472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3月13日）…………………… 1－82

№04473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4月5日）…………………… 1－84

№04474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4月27日）…………………… 1－86

№04475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5月4日）…………………… 1－88

№04476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5月15日）…………………… 1－90

№04477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5月22日）…………………… 1－92

№04478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5月26日）…………………… 1－94

№04479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5月29日）…………………… 1－96

№04480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6月7日）…………………… 1－98

№04481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6月16日）…………………… 1－100

№04482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1917年6月26日）…………………… 1－102

№04483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7月1日) …………………………… 1-104
№04484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7月12日) …………………………… 1-106
№04485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8月9日) …………………………… 1-108
№04486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8月6日) …………………………… 1-110

库罗帕特金关于1917年事态的日记

(1917年5月至10月)

专题说明 …………………………………… 1-112
№04042　关于1917年5月至10月事态的库罗帕特金日记
(1917年5月20日至10月23日) ………… 1-113

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传单

(1917年10月至12月)

专题说明 …………………………………… 1-136
№07770　孟什维克关于立宪会议选举投票的传单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 1-137
№07771　著名政论家弗·列维茨基评孟什维克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 1-141
№07772　社会民主党人弗·叶若夫评工人阶级的投票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 1-147
№07773　社会民主党人弗·叶若夫评论自己的投票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 1-154

№07776　社会革命党的选举纲领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 1-160
№07777　关于投票给社会革命党致人民的呼吁书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 1-168
№07782　致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的呼吁书
(1917年10月25日) …… 1-173
№07783　告彼得格勒全体居民书
(不早于1917年10月25日) …… 1-174
№07784　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呼吁书
(不早于1917年10月25日) …… 1-176
№07785　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呼吁书(1917年12月28日) …… 1-178
№07778　致工人和全体公民的传单
(不早于1918年1月5日) …… 1-182
№07774　致全俄罗斯公民书
(不早于1918年1月5日) …… 1-184
№07780　关于刺杀米尔巴赫伯爵事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发动(1918年7月9日) …… 1-188
№07781　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关于斯皮里多诺娃事宜的决定(1919年3月27日) …… 1-191

国内战争时期的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问题

(1918年1月至1920年10月)

专题说明 …… 1-192

№04121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致列宁、波德沃伊斯基的电报
(1918年1月底) …… 1-193
№04123　越飞致列宁的信(1918年3月11日) …… 1-194
№04127　斯大林致列宁、托洛茨基的信
(1918年6月22日) …… 1-196

№04128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电报
(1918年7月11日) ………………………………… 1－198
№04129　斯大林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18年7月17日) ………………………………… 1－201
№04130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1918年8月31日） ……… 1－204
№04131　梅德维杰夫致列宁的信
(1918年9月24日) ………………………………… 1－205
№04132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1918年9月27日） ……… 1－212
№04133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1918年10月3日） ……… 1－213
№04134　斯大林、米宁、伏罗希洛夫致斯维尔德洛夫和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10月5日) ………………………………… 1－216
№04135　伏罗希洛夫致斯大林、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8年10月7日) ………………………………… 1－218
№04136　托洛茨基致斯米尔加、拉舍维奇的电报
(1918年10月8日) ………………………………… 1－220
№04137　拉舍维奇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8年10月9日) ………………………………… 1－221
№04138　托洛茨基致彼尔姆省军事委员会和第3集团军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10月18日) ………………………………… 1－223
№04139　斯米尔加、拉舍维奇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8年10月14日) ………………………………… 1－224
№04141　托洛茨基致拉舍维奇、斯米尔加、列宁、斯维
尔德洛夫的电报（1918年10月23日） ……… 1－226
№04143　瓦采齐斯致列宁的信
(晚于1918年12月24日) ………………………… 1－228
№04144　古谢夫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8年12月26日) ………………………………… 1－233

№04145　斯米尔加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8 年 12 月 26 日）…………………………… 1－237
№04151　皮达可夫给斯大林、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4 日）……………………………… 1－238
№04152　托洛茨基致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的信（1919 年 1 月 7 日）……………… 1－240
№04153　皮达可夫致俄共（布）中央、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20 日）…………………………… 1－243
№04154　梅日劳克致拉科夫斯基、列宁、斯大林的电报
（1919 年 2 月 9 日）……………………………… 1－245
№04157　瓦采齐斯给列宁的信（1919 年 4 月 18 日）…… 1－247
№04162　季诺维也夫给列宁的电报
（不早于 1919 年 5 月 14 日）…………………… 1－253
№04163　瓦采齐斯、阿拉洛夫致列宁的信
（1919 年 5 月 15 日）…………………………… 1－256
№04165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致伏罗希洛夫、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拉科夫斯基的电报
（1919 年 6 月 2 日）……………………………… 1－259
№04166　拉科夫斯基致托洛茨基、列宁、俄共（布）中央的电报（1919 年 6 月 10 日）……………… 1－261
№04168　越飞致托洛茨基、列宁、中央政治局的信
（1919 年 6 月 30 日）…………………………… 1－263
№04170　皮达可夫致斯大林的信
（1919 年 10 月 13 日）…………………………… 1－268
№04171　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19 年 11 月 12 日）……………… 1－269
№04172　越飞致俄共（布）中央和列宁的信
（1919 年 12 月 15 日）…………………………… 1－271

№04175　布琼尼致列宁的信（1920年2月1日）　……… 1－274
№04176　彼得斯、罗蒙诺索夫致列宁、托洛茨基、克拉辛和俄共（布）中央的电报
（1920年2月12日）　…………………………… 1－276
№04177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2月17日）　…………………………… 1－277
№04179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3月21日）　…………………………… 1－278
№04180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3月21日）　…………………………… 1－279
№04203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7月26日）　…………………………… 1－280
№04204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7月28日）　…………………………… 1－281
№04206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29日）　…………………………… 1－282
№04207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1920年7月31日）　…… 1－283
№04209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1920年8月4日）　…… 1－284
№04210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1920年8月12日）　…… 1－286
№04211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年8月30日）　…………………………… 1－287
№04212　伏罗希洛夫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0年9月4日）　……………………………… 1－288
№04214　斯大林致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
（1920年9月23日）　…………………………… 1－291
№04215　古谢夫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0月20日）　…………………………… 1－294
№04216　托洛茨基致加米涅夫、列宁的电报
（1920年10月23日）　…………………………… 1－296

苏俄领导人关于边疆地区苏维埃化的通信

(1917年12月至1921年2月)

专题说明 ………………………………………………… 1－297

№04118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致列宁的信
(1917年12月19日) ………………………… 1－298

№04119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致人民委员会的信
(1917年12月25日) ………………………… 1－305

№04120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
(1917年12月27日) ………………………… 1－309

№04122　斯大林与金吉谢普直通电话谈话记录摘要
(1918年2月5日) ………………………… 1－312

№04124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18年4月22日) ………………………… 1－313

№04125　斯大林致契切林的电报
(不晚于1918年5月4日) ………………… 1－315

№04126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18年5月5日) ………………………… 1－316

№04140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致列宁的信
(1918年10月17日) ………………………… 1－317

№04142　斯大林给安维尔特的信
(不晚于1918年12月17日) ………………… 1－319

№04146　斯大林致米亚斯尼科夫和卡尔马诺维奇的信
(1918年12月29日) ………………………… 1－321

№04147　米亚斯尼科夫致斯大林的电报
(1918年12月31日) ………………………… 1－323

№04148　斯大林给日卢诺维奇和米亚斯尼科夫的电报
(1919年1月1日) ………………………… 1－324

№04149　米亚斯尼科夫致斯大林的电报
(1919年1月1日) ………………………………… 1－325
№04150　斯大林致米亚斯尼科夫的电报
(1919年1月1日) ………………………………… 1－327
№04155　戈普涅尔致契切林和列宁的信
(1919年3月22日) ……………………………… 1－328
№04156　莫罗兹给捷尔任斯基的信
(1919年4月15日) ……………………………… 1－333
№04158　莫罗兹致俄共（布）中央的信
(1919年4月22日) ……………………………… 1－335
№04159　别洛博罗多夫致克列斯京斯基的信
(1919年5月3日) ………………………………… 1－338
№04160　别洛博罗多夫致克列斯京斯基的信
(1919年5月6日) ………………………………… 1－341
№04161　加米涅夫致列宁的电报
(1919年5月10日) ……………………………… 1－343
№04164　托洛茨基致拉科夫斯基、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夫申科的电报
(1919年5月28日) ……………………………… 1－345
№04167　拉科夫斯基给列宁、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9年6月23日) ……………………………… 1－347
№04169　莱因戈尔德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9年7月6日) ………………………………… 1－348
№04173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1月9日) ………………………………… 1－352
№04174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月9日) ………………………………… 1－354
№04181　奥尔忠尼启则致契切林的电报
(1920年4月23日) ……………………………… 1－355

№04182　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致列宁的电报
(1920 年 5 月 4 日) ………………………………… 1－357
№04183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斯大林的电报
(1920 年 5 月 4 日) ………………………………… 1－359
№04184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斯大林的报告
(不早于 1920 年 5 月 4 日) ………………………… 1－360
№04185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和斯大林的电报
(1920 年 5 月 8 日) ………………………………… 1－362
№04186　契切林给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0 年 5 月 11 日) ………………………………… 1－364
№04190　契切林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0 年 6 月 19 日) ………………………………… 1－365
№04191　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 年 6 月 22 日) ………………………………… 1－366
№04193　捷尔任斯基致列宁的信
(1920 年 6 月 26 日) ………………………………… 1－368
№04199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契切林、斯大林的电报
(1920 年 7 月 16 日) ………………………………… 1－370
№04217　柯秀尔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0 年 11 月 13 日) ……………………………… 1－372
№04218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 年 11 月 22 日) ……………………………… 1－374
№04219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斯大林的电报
(1920 年 11 月 29 日) ……………………………… 1－376
№04220　纳扎列江与奥尔忠尼启则通过直通线路谈话记录
(不早于 1920 年 11 月 30 日) ……………………… 1－377
№04221　奥尔忠尼启则通过直通线路向斯大林、列宁、
契切林的报告（1920 年 12 月 4 日） ……………… 1－380

№04222 舍因曼致契切林、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0年12月6日) …………………………… 1－382
№04223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12月8日) …………………………… 1－384
№04224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12月9日) …………………………… 1－385
№04225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12月12日) …………………………… 1－386
№04226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12月15日) …………………………… 1－387
№04227 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致俄共(布)中央的信
(1921年1月2日) …………………………… 1－388
№04229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列别杰夫致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21年1月27日) …………………………… 1－391
№04230 奥尔忠尼启则致俄共(布)中央、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的电报(1921年2月6日) …… 1－393
№04231 斯大林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便函
(1921年2月16日) …………………………… 1－395

苏俄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的通信

(1920年3月至1921年1月)

专题说明 …………………………………………… 1－397
№04178 多列茨基、温什里希特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3月15日) …………………………… 1－398
№04187 奥尔忠尼启则致卡拉汉、列宁、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5月24日) …………………………… 1－399

№04188　托洛茨基致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电报
(1920 年 5 月 26 日) ………………………… 1－401
№04189　拉斯科尔尼科夫致托洛茨基、列宁、契切林的电报
(1920 年 6 月 7 日) ………………………… 1－403
№04192　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 年 6 月 22 日) ………………………… 1－407
№04194　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 年 6 月 28 日) ………………………… 1－409
№04195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列宁、加米涅夫的电报
(1920 年 7 月 3 日) ………………………… 1－411
№04196　契切林致克列斯京斯基的信
(1920 年 7 月 5 日) ………………………… 1－412
№04197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1920 年 7 月 13 日）…… 1－414
№04198　温什里希特致列宁的信
(1920 年 7 月 15 日) ………………………… 1－416
№04200　斯大林致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 年 7 月 22 日) ………………………… 1－418
№04201　斯大林致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的电报
(1920 年 7 月 23 日) ………………………… 1－419
№04202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1920 年 7 月 24 日）…… 1－420
№04205　斯大林致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 年 7 月 29 日) ………………………… 1－422
№04208　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致列宁、托洛茨基、克列斯京斯基、契切林的电报
(1920 年 8 月 3 日) ………………………… 1－423
№04213　卡拉汉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0 年 9 月 9 日) ………………………… 1－424
№04228　卡拉汉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1 年 1 月 26 日) ………………………… 1－427

工会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矛盾

(1920年11月)

专题说明 …………………………………………………… 1－429

№05058 俄共党团关于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李可夫的报告的决议(1920年11月4日) …………………………… 1－430

№05059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11月10日) ………… 1－432

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

(1922年4月至1934年3月)

专题说明 …………………………………………………… 1－433

№07642 斯大林给叶·格·朱加施维里的信(1922年4月16日) ………………………………… 1－434

№07672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8月28日) ………………………………… 1－435

№07673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29年8月29日) ………………………………… 1－436

№07674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29年9月1日) ………………………………… 1－437

№07675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9月2日) ………………………………… 1－438

№07676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29年9月16日) ………………………………… 1－440

№07677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9月16日至22日之间) ……………… 1－441

№07678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29年9月23日) …… 1－444

№07679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29年9月25日) …… 1－445

№07680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9月27日）…… 1－446
№07681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29年9月30日）…… 1－447
№07682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29年10月1日）…… 1－448
№07683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0年6月21日）…… 1－449
№07684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0年7月2日）…… 1－450
№07685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0年9月2日）…… 1－451
№07686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5日）…… 1－452
№07687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0年9月8日）…… 1－453
№07688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12日）…… 1－454
№07689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19日）…… 1－456
№07690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0年9月24日）…… 1－458
№07691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9月30日）…… 1－460
№07692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0年10月6日）…… 1－461
№07693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0年10月8日）…… 1－463
№07694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1年9月9日）…… 1－464
№07695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不晚于1931年9月12日）…… 1－465
№07696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1年9月14日）…… 1－468
№07697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1年9月19日）…… 1－469
№07698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1年9月21日）…… 1－470
№07699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1931年9月26日）…… 1－472
№07700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1931年9月29日）…… 1－473
№07663　斯大林致叶·格·朱加施维里的信
（1934年3月24日）…… 1－474

关于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

（1928年4月至1946年9月）

专题说明 …… 1－475

№07671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8年4月9日）…… 1－476

№07739　德国人审讯战俘雅·约·朱加施维里上尉的记录
(1941年7月18日) …………………………… 1－477
№07745　米纳西扬少校关于雅·约·朱加施维里的证明材料
(1945年3月12日) …………………………… 1－502
№07748　谢罗夫致克鲁格洛夫
(1946年9月16日) …………………………… 1－504

关于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
(1933年9月至1962年3月)

专题说明 ……………………………………………………… 1－509

№07704　斯大林致叶菲莫夫 (1933年9月12日) ……… 1－510
№07706　帕乌凯尔致斯大林 (1933年9月15日) ……… 1－512
№07707　帕乌凯尔致弗拉西克
(1933年9月23日) …………………………… 1－514
№07708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3年10月1日) …………………………… 1－515
№07711　瓦西里·斯大林致帕乌凯尔
(不晚于1934年6月16日) ……………………… 1－516
№07712　瓦西里·斯大林致帕乌凯尔
(1934年6月16日) …………………………… 1－517
№07716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4年9月14日) …………………………… 1－518
№07718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4年9月26日) …………………………… 1－519
№07722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5年9月2日) …………………………… 1－520
№07724　叶菲莫夫致弗拉西克
(1935年9月22日) …………………………… 1－521

№07725　斯大林致马尔特申（1938年6月8日）………1－523
№07726　马凯耶夫致约·维·斯大林
（1938年6月15日）……………………………1－525
№07727　马尔特申致斯大林
（不早于1938年7月5日）……………………1－528
№07728　贝利亚致斯大林（1938年12月8日）………1－530
№07729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8年12月15日）…………………………1－532
№07730　学员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的飞行训练鉴定
（1939年2月17日）……………………………1－533
№07733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9年11月13日）…………………………1－535
№07734　瓦·约·斯大林的毕业鉴定
（1940年3月25日）……………………………1－536
№07735　瓦·约·斯大林的党员鉴定书
（1940年3月29日）……………………………1－539
№07738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41年3月4日）………………………………1－540
№07740　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秘书处关于瓦西里·
斯大林去前线的事宜致联共（布）中央干部
管理部的报告（1941年8月26日）…………1－542
№07742　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对瓦·约·斯大林的健康
状况所做的鉴定（1943年4月4日）………1－543
№07743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1943年5月26日）……………………………1－544
№07746　获苏沃洛夫勋章的第286涅仁斯基红旗歼击航空师
师长近卫军上校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截至
1945年6月的鉴定书
（1945年7月20日）……………………………1－545

№07751　叶戈洛夫致斯大林（1950年12月9日）………　1－548
№07755　对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的审讯记录
（1953年5月9日至11日）…………………………　1－550
№07756　克鲁格洛夫致马林科夫（1953年8月8日）…　1－561
№07757　瓦·约·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53年12月21日）………………………………　1－566
№07758　瓦·约·斯大林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
（1955年2月23日）………………………………　1－567
№07759　瓦·约·斯大林致赫鲁晓夫
（1958年4月10日）………………………………　1－577
№07760　瓦·约·斯大林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1959年1月19日）………………………………　1－580
№07761　谢列平、鲁坚科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0年1月5日）…………………………………　1－589
№07762　伏罗希洛夫与瓦·约·斯大林的谈话记录
（1960年4月9日）…………………………………　1－591
№07763　鲁坚科和谢列平致苏共中央
（1961年4月7日）…………………………………　1－601
№07764　谢米恰斯内致赫鲁晓夫
（1962年3月19日）………………………………　1－603

关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
（1933年10月至1966年11月）

专题说明……………………………………………………　1－604
№07709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3年10月1日）………………………………　1－605
№07713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7月7日）…………………………………　1－606

№07714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7月8日) ………………………………… 1－607
№07715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9月14日) ……………………………… 1－608
№07717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9月25日) ……………………………… 1－609
№07719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10月2日) ……………………………… 1－610
№07720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10月3日) ……………………………… 1－611
№07721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5年6月) ……………………………………… 1－612
№07723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5年9月2日) ………………………………… 1－613
№07736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0年8月5日) ………………………………… 1－614
№07737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0年8月22日) ……………………………… 1－616
№07741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1年9月19日) ……………………………… 1－618
№07744　列奥诺娃致斯大林(1943年6月15日) ……… 1－620
№07747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5年12月1日) ……………………………… 1－621
№07749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7年10月12日) ……………………………… 1－623
№07750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8年11月2日) ……………………………… 1－624
№07752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52年2月10日) ……………………………… 1－625

№07753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52年10月28日) ………………………… 1-627
№07754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娜）致马林科夫
(1953年3月21日) ………………………… 1-628
№07765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柯西金
(1964年11月17日) ………………………… 1-629
№07766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勃列日涅夫
(1966年11月3日) ………………………… 1-631
№07767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1966年11月4日）…… 1-632

斯瓦尼泽关于与斯大林一家相处的日记

(1933年9月至1937年8月)

专题说明 ………………………………………………… 1-633
№07768　阿利卢耶娃致玛·阿·斯瓦尼泽
(1926年1月11日) ………………………… 1-634
№07769　玛丽娅·阿尼西莫夫娜·斯瓦尼译的日记片段
(1933年9月11日至1937年8月7日) ……… 1-636

本卷前言

本卷选编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包括12个专题。

“卢那察尔斯基关于1917年事态的信件”：该专题收录了卢那察尔斯基从1917年3月至11月（公历4月至12月）间给在瑞士的妻子的50封信，这些信件为深入了解1917年俄国社会状况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情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材料。

“瓦尔热涅夫斯基关于十月革命前农村情况的信件”：该专题包括了莫斯科省莫扎尔斯克县的首席贵族、国务会议成员瓦尔热涅夫斯基给莫斯科省首席贵族、国务会议成员谢列梅捷夫伯爵的16封信。这些信件反映了1917年的俄国农村生活以及革命对农民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库罗帕特金关于1917年事态的日记”：曾历任军政要职的库罗帕特金在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解除职务，回到乡间领地居住。这里收录的他在1917年5月20日至10月23日期间的13篇日记，记述了他在俄国社会巨变时期的见闻以及他对当时一系列事件、人物和现象的看法。

“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传单”：该专题包括1917年10月25日前至1919年3月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14份传单，内容主要涉及立宪会议、对十月武装起义的态度、组织救国救革命委员会，以及对刺杀德国大使、社会革命党活动家被捕等事件的反应等。

“国内战争时期的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问题”：该专题收录了1918年1月至1920年10月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部的48份来往电报和信件，其内容涉及对内战各个战场形势的分析、作战方针、干部政策、后勤供应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党内争论。

“苏俄领导人关于边疆地区苏维埃化的通信”：该专题收录了1917年12月至1921年2月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关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顿河、中亚等边疆地区实行苏维埃化的49件来往电报和信件，这些材料具体反映了各地实行苏维埃化的策略、措施、进程和后果。

“苏俄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的通信”：该专题收录了1920年3月至1921年1月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有关对外政策和与周边国家关系的17份来往电报和信件，主要涉及在波斯的军事行动和扶植吉兰共和国、对土耳其和阿富汗的援助和渗透，以及对波兰等西部邻国的政策等。这些文件反映了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行动的方案和措施、干部的选择任用以及具体的执行情况。

“工会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矛盾”：这两份文件对研究苏维埃国家早期政治体制的矛盾有所帮助。

“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这里收集了1929年至1931年间斯大林与妻子阿利卢耶娃的29封来往信件，其内容涉及生活、工作、孩子，以及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此外还收录了斯大林在1922年4月和1934年3月给母亲的2封信，其中都谈到了阿利卢耶娃。

“关于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该专题收录了与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有关的信件和材料，其中包括斯大林给阿利卢耶娃的便函，雅科夫被俘后受审讯的记录、雅科夫在集中营中情况的证明材料和苏联内务部关于雅科夫被俘之后及死亡情况的报告。这些文件反映了斯大林与雅科夫之间的关系，以及雅科夫

的个人命运。

“关于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该专题的35件档案材料始自1933年9月，终于1962年3月，包括斯大林和有关工作人员的信件、瓦西里给父亲的信、瓦西里所在学校和单位对瓦西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以及政治和业务情况的报告和鉴定、斯大林逝世后瓦西里被捕、受审和被判刑的情况、瓦西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赫鲁晓夫的信、瓦西里与伏罗希洛夫的谈话、苏联总检察长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瓦西里问题的处理给苏共中央的报告等。

“关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该专题文件包括斯维特兰娜在1933年至1952年期间给父亲的信、她在父亲去世之后就谢绝给予她的某些特权给马林科夫、柯西金的信、她为护送其丈夫辛格的骨灰回印度而给勃列日涅夫写的请求信，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她前往印度的决定等。

“斯瓦尼泽关于与斯大林一家相处的日记”：玛丽娅·阿尼西莫夫娜·斯瓦尼泽是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哥哥亚·谢·斯瓦尼泽的妻子。自20年代初开始，斯瓦尼泽夫妇与斯大林一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这里收录了两个文件，一是娜·阿利卢耶娃给玛·斯瓦尼泽的信，这封信说明了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二是玛·斯瓦尼泽1933年至1937年期间的日记片断，其中记录了她所目睹的斯大林与孩子、亲戚和苏联高层领导人相处的情况，以及她对这一时期重大事件的经历和感受。

姚　海

1999年8月

【专题说明】

卢那察尔斯基关于 1917 年事态的信件

（1917 年 4 月至 1917 年 12 月）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1895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仅是出色的政论家和演说家，而且是极其博学的学者、文学和戏剧批评家，1917 年 5 月，他随第二批政治侨民从瑞士回到俄国，不久同区联派一起併入布尔什维克党。先后被选入彼得格勒市杜马、彼得格勒省和彼得格勒市的地方自治管理机关。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担任彼得格勒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十月革命后任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从踏上归国路程开始，卢那察尔斯基几乎每天都给留在瑞士的妻子安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卢那察尔斯卡娅（1884～1959）写信，直至她于 1917 年底回国。在信中，卢那察尔斯基真实地反映了他直接参与或亲身经历的那些历史性事件，并表达了自己的感觉和看法，其中不乏迄今鲜为人知的事实和真诚直率的见解。本专题收集了卢那察尔斯基从 1917 年 3 月至 11 月（公历 4 月至 12 月）间给妻子的 50 封信，其内容大致可分成三部分：一、关于第二批政治侨民回国的情况；二、关于 1917 年 5 月至 10 月彼得格勒的局势；三、关于十月武装起义和新政权初期的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乌传衮翻译）

№0171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4月3日）

亲爱的：

我是在夜间1时给你写信。信将在早晨发出，而为了使它早些到达，准备用快件投递。列宁给我留下一个极好的、甚至是高大的印象，尽管也是一种悲剧性的、几乎是阴郁的印象。①

不过，同他真正的谈话还在明天。只是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他太急于要走。而他在只有德国同意而未取得俄国的任何确认的情况下断然离去，我认为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可能对他的未来产生不好的影响。

而孟什维克们（特别是谢姆柯夫斯基）② 非常虚伪，他们几乎要因列宁的"自作主张的、非同志式的、不可容忍的举动"而审判他。

但是，由于列宁不在，我和梁赞诺夫③ 如此激烈地站出来为他辩护，以致最后与其说是在履行列宁受攻击时为他辩护的义务，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在行使解释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从简单的政治合理性的考虑出发，而绝不是从道义出发，不同意他的计划。

① 卢那察尔斯基这里谈的是1917年3月20日（4月2日）在苏黎世举行的党的各个组织的代表会议上列宁给他留下的印象。

② 谢姆柯夫斯基，谢苗·尤利耶维奇（1882～1937），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1917年从国外返回俄国后，进入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③ 梁赞诺夫，达维德·波里索维奇（1870～1938），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从国外返回俄国后，同区联派一起加入俄共（布）。

在我心中还有一种想法：我反正不可能于星期三和列宁一起走，否则我也许会仅仅为了团结而决定与他共命运，而不顾——在我们看来是十分明显的——他的这一举动会招来铺天盖地责难的危险。

详细情况见面时再说。星期三我要去。明天有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谈话，可以说，通过这些谈话将要决定我的命运。

顺便说说，谢姆柯夫斯基告诉我，“从斯堪的那维亚收到的钱是供完全确定的、对党特别有价值的人员回国用的，名单中也有我。”明天我要问清楚，钱是谁给的。如果钱绝对不会对我有所约束，我会心中有数的。如果我得不到向科里亚① 和《年鉴》月刊② 要的1600法郎，特别是如果我们将取道英国走的话（可能性不大），那就非要拿300法郎左右的资助不可。但如果不需要这些钱当然更好。

还收到这样一封给谢姆柯夫斯基的电报：“一份大报——《新生活报》③ ——开始在彼得格勒出版。高尔基、苏汉诺夫④、巴扎罗夫⑤ 请求参加《年鉴》月刊工作的人士撰稿。”

当然，这一点我将在当地作出决定。

可能，我将既为这份报纸也为《真理报》撰稿。在《新生活报》各方面都将比较自由。但是，《真理报》会更接近工人。

---

① 科里亚是卢那察尔斯基的兄弟，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

② 《年鉴》月刊是高尔基于1915年在彼得格勒创办的文学、科学和政治刊物。

③ 《新生活报》是由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和《年鉴》月刊作家创办的一份日报，1917年4月18日（5月1日）在彼得格勒出版。

④ 苏汉诺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2～1940），原姓吉姆梅尔，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曾参加社会革命党，1917年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成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是《新生活报》主编之一。

⑤ 巴扎罗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874～1939），原姓鲁德涅夫，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896年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马克思《资本论》的俄译者之一。

花36个法郎给自己买了一块特别好看的精密手表，保修期5年。

吻你和托托。很累，想睡了。

马尔托夫[①] 总是十分和善可亲，对我尤其如此。很想和这个人保持良好关系。

而列宁是高大的，是一头准备投入决战的忧郁的狮子。

再次吻你两人。晚安。

你的大托托

1917年3月21日（4月3日）于苏黎世

① 马尔托夫·Л.（1873～1923），又名尤利·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1895年参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是孟什维克左翼领导人。

№0171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5月12日）

5月12日

……我以为孟什维克的代表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开的（至少对于贵宾是如此），就去了。但是……人以群分。当我问道，我能否作为一名不发言的客人参加时，尴尬不安的马尔托夫回答我说，昨天许多不相干的人找到他们，这“在我们的人中引起一场风波。”一听这么说，我当即声称，既然会议是不公开的，那我就离开。结果，在我离开之后，他们又突然决定请我留下，并且还跑到附近几家咖啡馆去找我。但是我和梁赞诺夫一起考虑认为，孟什维克同志是确信我已经走远了才决定请我留下的。孟什维克通过了什么样的决议，不清楚。据人们断言，马尔托夫的报告极左。梁赞诺夫认为，近日来马尔托夫正在迅速坚定地向右转。

晚上8时，瑞士社会党为我们饯行。格雷利希[①]和奥·龙格的讲话有些枯燥。普拉廷[②]讲的比较有革命气息，而且令人愉快（有感染力、心平气和而具有内在的激情）。然后，一位青年代表对“亲爱的列宁同志”大唱热情的赞歌。他在讲话结束时说：“请告诉列宁，我们年轻的瑞士社会党人，他所创建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

① 赫尔曼·格雷利希（1842～1925），瑞士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② 弗里德里希·普拉廷（1883～1942），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1917年3月帮助安排列宁和其他政治侨民从瑞士经德国返回俄国。

支持者，将像他教导我们的那样在这里继续斗争。格里姆[①] 请求资产阶级的瑞士政府向革命转达敬意。支持你们不应当是用这样的方式，支持你们——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国际斗争。我们，年轻的瑞士社会党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忘记你们的也是我们的领袖，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列宁。”

布尔什维克、《我们的言论报》派、《前进报》派和听众为此鼓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这篇讲话态度很冷淡。

但是，接着走上讲台的是……别兹拉波特内![②] “现在不是发表喜庆演说的时候，让我们讲出全部真相，”他寓意深长地开始讲话。接着他说明俄国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时孟什维克开始焦躁不安起来。

别兹拉波特内在讲台上像一个地道的法国演说家那样大声喊道：“执行不彻底政策的，甚至有领导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人们，例如齐赫泽[③] 同志!”他刚刚讲到这里，孟什维克的那个角落简直炸开了锅。阿斯特罗夫[④] 不停地喊道：“我们来此地不是为了这个，我们来此地不是为了这个!”[⑤] ……马尔托夫面孔抽搐、声音嘶哑地叫着：“滚开！滚开!”[⑥]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左派向别兹拉波特内鼓掌。听众的好奇心经久不息。我身边一个姑娘张着两只兴奋的眼睛，跳上椅子，喃喃地说：“闹剧！闹剧!”别兹拉波特内声称，

---

① 罗伯特·格里姆（1881～1956），瑞士社会民主党主席。

② 曼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1883～1959），又名别兹拉波特内，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返回俄国后，曾追随区联派。

③ 齐赫泽，尼古拉·谢苗诺维奇（1864～1926），孟什维克领袖之一，曾领导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孟什维克党团，参加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

④ 阿斯特罗夫，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

⑤ 这句话原文是法文。

⑥ 原文是法文。

他不再涉及使一部分同志如此激动的话题，接着用老生常谈的话语结束了讲话……

1917年4月29日（5月12日）于苏黎世

№0171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5月13日）

……第一个热闹场面发生在沙夫豪森，当时我们准备上火车行驶二、三天时间穿越德国。

决定以党派为单位按次序分别安排座位。崩得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分头坐下以后，我们没有位子了。设想一下梁赞诺夫的狂怒吧！如同示威一样，我们像马可在迦太基的废墟中那样坐在地上，提出了种种“要求”。这时，生活斗争中的那些“胜利者”们若无其事地从车厢的窗口里看着我们。

终于把我们分别安顿好了。我们过夜的情况既不舒服又很可笑，像是睡在小旅馆的草垫上。几乎谁都没有睡，我们的样子很滑稽。但我还是睡了大约2个小时。

星期六早晨5时我们驶入德国。那里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当我们得知，我们的列车作为特别快车运行，而且第二天一早4时就可到达萨斯尼茨港并可前去瑞典时，我们十分惊讶。

德国人给我们供应了两次营养汤，不过为此我们慷慨地付了钱。这种汤，还有咖啡（一次），是德国“红十字会”供给的。

在德国，使我们大感惊讶的（我们是星期日经过德国的）是出奇的、几乎使人难以忍受的寂静无人。简直像是一片经过精心治理、建筑很好的荒漠，即使牲畜也是在极其漂亮和广阔的草场上放牧（我们在途中也只看到一次）。

人们（在大的车站上）都显得脸色有些苍白和精神疲惫的样

子，但看不到其他的贫困迹象。

所有人对我们都亲切和蔼，没有丝毫的敌意。相反，更多的是善意的微笑和好奇。我们自己不准许同他们谈话，不过有的地方有人向我们喊叫：“应当签订和约！”在一处地方我们看到三个被俘的俄国士兵，他们在火车上卸煤。认出我们是俄国人之后，他们喊道：“是去斯德哥尔摩吗？是去签订和约吗？”

从星期天到星期一的夜里，我们都睡得很不好。我睡了不到两三个小时，而且是坐着睡的。不过除德国汤以外，还给我们吃了极好的牛肉和乳酪，送来了茶。当得知横穿德国旅行只用30个小时时，我为没有能带你们——我的亲人们——一起走而未免有些懊悔。不过后来的情况相反，我又为此感到庆幸。不久，一个婴儿得了百日咳，另一个得了白喉，又随即转为咽颊炎。一个女孩发烧到38.2度。然而最大的困难在瑞典，我下面还要谈到。我自己则由于无休止的各种会议而精疲力竭，而梁赞诺夫同志总是毫不例外地把自己的“气质”带到会上。他演出了两次相当大的闹剧。

途经德国时和我同坐一间包厢的是：令人愉快的卢泽尔夫妇和十分令人不愉快的罗森夫妇，后者是令人厌烦的崩得派爱国者。从萨斯尼茨我们上了一条不那么颠簸的大轮船。我的自我感觉一直很好。吃晚饭很有胃口。但是有许多人晕船，特别是巴格罗夫。在瑞典等待我们的是一个十分不愉快的意外的消息。这里发生了严重的煤荒：每天只开一趟列车，瑞典政府决定把我们的特别快车分别挂到运货列车上，这样我们到达斯德哥尔摩要第二天即星期三的早晨了。也就是说，从马尔默到斯德哥尔摩的旅程我们要花费几乎相当于横穿整个德国所用时间的两倍。

使我的坏印象达到高峰的是，当我为了发那封我和米·彼·［克

里斯季][1] 给你的长电报时，为了换钱让人骗走了10个法郎。

病人和孩子们可以乘普通列车走，也就是说，可以安静地睡一个晚上，到第二天傍晚就在斯德哥尔摩了。而其他人则要两个晚上在车厢里不能睡觉。一共有33个人希望能享受这个特权，不知道根据什么把米·彼·也列了进去。幸好，令人不快的罗森夫妇也和他一起走了，不然他们又要老"在面前"[2] 晃来晃去。

现在我们像是坐在乌龟上爬行了！不过，周围景色很美。只是我们老是不停地开会，因为我现在，不妨说，进入了列车的统治阶层。

我是在停车时给你写信，看来很快（在到达斯德哥尔摩之前）可以把这封信寄给你。

今天早晨我们十分自在地在自来水笼头下洗漱。

那33人刚刚从一边超车赶过我们！他们从车窗里向我们大声报告了一个可靠的消息，使我们所有人高兴不已：托洛茨基已经在斯德哥尔摩了。

一点蓝颜色也写不出来了，而墨水在大行李里。用铅笔写完，急着去站上投寄……

① 克里斯季，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1875～1956），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流亡瑞士时与卢那察尔斯基住在同一幢房子里。1917年回国后倾向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

② 此处原文为法文。

№0171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5月18日）

……现在是早晨6时。虽然在这里睡觉相当舒服，但我只睡了4个半小时。很激动。可是必须平静下来。我们今天走不走，要到9点钟才能知道。我忙得不可开交。不过，离开斯德哥尔摩时我将设法发一封电报告诉你。

我们的热门话题是联合内阁[①]。大多数人谴责它。

齐美尔瓦尔德协定执行委员会迁到了斯德哥尔摩。我在这里很快和拉狄克相识，我很喜欢他。

没有其他新闻。我现在要急着去张罗一下。特别重要的是，要赶紧从行李中把手稿给梁赞诺夫拿出来……

1917年5月5日（18日）于斯德哥尔摩市

① 指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的联合政府。克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斯科别列夫等人代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加入了政府。

№0171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5月19日）

5月19日

我亲爱的：

火车上很糟，我感谢上帝你们没有来，特别是许许多多政治和道义责任如今都落在我身上，因此我必然根本无法帮助你们。

在令人不堪忍受的车厢内度过两夜时间（本来只须行驶10个小时）以后，我们被送到了斯德哥尔摩一家在我们来到之前被弄得脏乱不堪、满地痰迹、潮湿发霉的小旅店里，连索科洛夫都说，不冒着害眼病的危险是不能用这些枕头睡觉的。在女子部，一位妇女一进入房间就呕吐起来。于是意见纷纷，发生了骚乱。大部分“领袖们”（首先恰恰是孟什维克）坐上汽车各自分头去住大旅馆了。我和柯恩① 把骚乱平息了下来，另一方面又向昧良心的俄罗斯瑞典委员会② 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把27名病人和带小孩子的母亲安置到大旅馆，并给其余人提供床铺和干净的被褥。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就把我拖去开各种政治的和行政事务的会议。瑞典人想用5个车厢把我们送走，而实际上就是7个车厢也不够用。也许要让我们坐货车去，但这样光是到加帕隆迪我们就要坐上4天（本来只

① 柯恩，费利克斯·雅科夫列维奇（1864～1941），1882年参加波兰工人革命运动，1906年起任波兰社会党（左派）中央委员，1907年起侨居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后来到俄国，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书记处成员。

② 即斯德哥尔摩侨民委员会，是为俄国政治侨民经瑞典返回俄国而成立的。

要两天)！我们拼力奋战，甚至以游行示威相威胁。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让步！不过，瑞典的“青年派”[①] 真是可爱。我们一致同意拒绝出席布兰亭的社会爱国党[②] 的宴会。孟什维克试图谁也不得罪，想采取外交手段，借口疲劳也不接受当天晚上“青年派”的邀请。但是我们故意大加张扬地去了整整100人。晚会气氛极好，令人难忘。我以俄国革命者的名义讲了话，拉狄克担任翻译。一位极好的老头——斯德哥尔摩市长林德哈根和其他人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和他们都唱了革命歌曲，并且为俄国革命和未来的世界革命表示相互支持。孟什维克的大人物中只有马尔丁诺夫[③] 出席了那次晚会。当我们得悉，正当我们一致拒绝社会爱国党人邀请并签署马尔托夫起草的决议，表示不能和布兰亭及胡斯曼[④] 一起进行政治表演时，巴·波·阿克雪里罗德[⑤] 竟去了他们那里并参加了他们的主席团，我们真是惊讶极了！很明显，阿克雪里罗德如果不是与孟什维克绝裂，就是正在把孟什维克拉向自己一边。

孟什维克在回俄国去的侨民中很不受欢迎。他们总是想夺得权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小人物”抛到一边，自己“像贵族似地”去住好的旅馆，如豪华级的，等等。我同所有人一起分尝了所有的苦难，睡在短木凳上（其实不是睡），留在小旅店里，吃的也和所有人一样。因此，恰恰是我，还有柯恩，获得了无可争议的威

① 瑞典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1917年3月组成左翼社会民主党。

② 指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党，布兰亭为其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③ 马尔丁诺夫，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1865～1935），曾参加民意党人小组，90年代成为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

④ 胡斯曼（1871～1968），比利时工人党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书记。

⑤ 阿克雪里罗德，巴维尔·波里索维奇（1850～1928），1883年参加创建劳动解放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孟什维克。1917年四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信。人们确实尊重我们、相信我们，如果不是我们，早就发生激烈的冲突了。随着日益接近俄国，我的政治威望也不断提高。这很好。你知道，我说这一切并不是从虚荣心出发。托洛茨基没有等待我们到达，只休息了5个小时，就直驶俄国——好样的！我很疲劳，但为别的事——你们的健康——而十分平静。我疯狂地爱着我亲爱的人们，等待着他们的消息。收到这封信后，发一封电报到彼得格勒给我：大钱币街，18号。寄去几张明信片。吻你，吻你，吻你!!

你的阿·

1917年5月6日（19日）于斯德哥尔摩

№0171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5月19日)

我亲爱的!

现在，我开始给你写一封长信，在每站我都要接着写。

现在我们在布列克车站。早饭吃得很好。这里让我们饱餐一顿。你算算，早晨7时早餐时每人给了一个煎鸡蛋、两个肉饼和两杯咖啡！而且全部免费；由斯德哥尔摩委员会付账。初看起来很奇怪：坐车不花钱，吃饭不花钱！但总得有人付钱吧？钱是由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支付的，他们把钱捐给援助政治犯基金会。为什么呢？因为2月23～27日工人在彼得格勒获得了胜利！这是街上的穷汉们除了自由的巨大福利之外，还为我们赢得了……我们的肉饼。真是笑料。

火车行驶得很好。甚至连首席闹剧师梁赞诺夫也平静下来了，显得宽容安详。可以明显看出同《我们的言论报》派组成的紧密的同盟，同列宁也建立了稍松弛一些的同盟。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左右摇摆，激动不安。巴·波·阿克雪里罗德完全滑向护国派已无疑问，谢姆柯夫斯基也有可能。拉林[1]在俄国取得了有利的地位。下面就是马尔托夫形式上也参加其编辑部的这份报纸的摘录：“所

---

① 拉林，尤里(1882～1932)，原名米哈伊尔·扎尔曼诺维奇·卢里叶，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二月革命后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领导人之一，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有这些谢德曼们[①]、列诺得尔们[②] 和唐恩们[③] 相互之间没有多少差别。”什么差别！

看了所有各期《工人报》[④]。索然无味。是奇怪的、机会主义的。撰稿人名单中什么人都有！从马尔托夫到唐恩和……格沃兹杰夫[⑤]！依我看，最不成体统的是斯柯别列夫[⑥]，现今的部长。

嘿，在俄国会十分有趣！我们就要给社会主义者部长先生们一点厉害瞧瞧了！

火车开动了……

这是MELLANSEL（默兰瑟尔）站

刚刚得知内阁的最后名单。名单之奇特令人吃惊。每一个车厢都在纷纷议论。

我又因护照的事产生误会和不快。另外，我把自己的枕头忘在了斯德哥尔摩，为此我已打电报给格列尔，他在你到斯德哥尔摩时会把它转交给你。喊我去吃饭了。

午餐吃得不好。这里面包极差。有许多琐事和工作要做。

马上要开《前进报》派的会议，然后还要同《我们的言论报》派开大会。

---

① 谢德曼，菲利普（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② 列诺得尔，皮埃尔（1871～1935），法国社会党右翼领导人之一，众议院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③ 唐恩，费多尔·伊里奇（1871～1947），又姓古尔维奇，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④ 1917年3月至12月期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一份孟什维克报纸。

⑤ 格沃兹杰夫，库兹马·安东诺维奇（1883～?），孟什维克，战时是社会沙文主义者，曾任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人团主席，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在临时政府内任劳动部副部长、部长。

⑥ 斯柯别列夫，马特维·伊凡诺维奇（1885～1939），1903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孟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5月至8月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

很想睡觉。还要坐3天火车！不过，不要紧，列车反正在行进。也许可以打半小时盹儿。这是到加帕隆迪之前的最后一个小站。昨天晚上睡了一会儿，又吵了一架。召集了一次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一共有40个人。别兹拉波特内作了一个极端列宁主义精神的带鼓动性的长篇发言，但并不理解《真理报》本身指出的那些任务和困难。格里沙[①] 呼吁所有人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但是未能解释清楚，如何对待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辩论。你知道，季诺维也夫在新内阁成立之前曾号召由工兵代表苏维埃任命的内阁取代旧的内阁，而加米涅夫则倒向斯切克洛夫[②] 的观点（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支持和加以监督，并要求和平）。加米涅夫还指责列宁在同一篇文章中既说"打倒政府"，又说"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取得政权，甚至在资产阶级把政权拱手交给我们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此外，列宁还推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的多数，即现在已经夺得一半政权的孟什维克护国派和劳动派，夺取政权。

列宁如何看待新的联合内阁还不清楚，但格里沙又再次重复那同一个混乱不堪的公式："要打倒这个政府，但现在还不能推翻它！"群众不理解这种模棱两可的口号，5月5日涅瓦大街上毫无益处的枪击[③] 就是由此而来的。我探听布尔什维克的口气。但遗憾的是，他们来的人中没有一个有真知灼见。我的观点是：内阁根本不行，因为：(1) 它是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社会革命党人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城市和农村中市民和农民小商品生

---

① 别连基，格里哥里·雅科夫列维奇（1885～1938），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2年起侨居巴黎，一战期间任布尔什维克巴黎支部书记，1917年5月回国。

② 斯切克洛夫，尤里·米哈伊洛维奇（1873～1941），1893年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布尔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③ 指四月危机期间，俄历4月22日，支持和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群众之间发生的冲突。

产者的代表)；(2) 参加内阁的是一些无法发挥负责作用的人（如果“他们”，即右翼社会主义者，果真决心搞好，那么为什么没有齐赫泽、唐恩、李伯尔[①]? 为什么是愚蠢的斯柯别列夫? 策列铁里[②] 只不过是一名邮政局长，难道再没有别的人了吗?)；(3) 它标志一种阶级和平，即我们所有人都深为痛恨的那种民族的“公民和平”[③]。不能对这样的内阁表示信任。要禁止所有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在内阁各部担任职务。必须对内阁的每一个虚伪的或动摇不定的步骤进行尖锐的批评。要通过这些办法迫使内阁改组，直到出现真正民主的组成状况。丝毫不要有这样一种幻想，似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民主内阁将会是“我们”的了。已经清楚，如果用人的姓名来表示，那这就是齐赫泽、切尔诺夫[④] 的内阁，也即右派市民和农民社会主义者的内阁。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应当迫使这一届内阁沿着最低纲领的道路前进，但自己要置身内阁之外。一旦西欧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对此我不怀疑，问题只在发生的时间），则自己要夺取政权，以便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但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把夺取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权力和它的革命内阁作为火炬来推动西方，因为民主派的真正的多数支持他们。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争取这个多数的杜马，而不能采取革命的措施（在彼得格勒举行武装起义，等等）推翻工人代表苏维埃。在信

① 李伯尔（戈尔德曼），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1880～1937），崩得领导人之一，孟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② 策列铁里，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1882～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和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5月参加临时政府，任邮电部长，七月事变后任内务部长。

③ 原文中这个词用的是德文。

④ 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1873～1952），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5月至8月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

中很难写清楚这一点，而火车又开动了。但对于我而言，这一切十分清楚，而很多很多人看来同意我的观点，梁赞诺夫也毫无疑问。

无法写了。到加帕隆迪再写完寄出。今天晚上还要再发一封信。紧紧地吻我的亲爱的人们，奇妙的孩子，朋友，我的守护神。

向娜·萨·（克里斯蒂）致意。

你的大托托

1917年5月6日（19日）于布列克

№0172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2日）

……昨天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在维堡那边做了一次专题报告，有时间想想问题。确有问题需要考虑。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巨大责任，种种情况说明，这责任还要增加，因为我们的影响在十分明显地增长，而联合内阁的处境日益不妙……

在这里压倒一切的感觉，除了想念你们以外，就是惊恐不安，这是由于自发性的灾害日益逼近。人们的积极性、勇敢精神、准备程度极度提高。成败在此一举，看来2个月之内就要见分晓了。我们的力量（包括我的力量）很强大，但任务也是极为艰巨的……

1917年5月20日（6月2日）于彼得格勒

№0172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5日）

亲爱的：

昨天我又一次深信有“天意”存在，它现在无疑极其关注俄国，以及，正如倍倍尔的用法，关注“我阁下”。

你想想，昨天我本应在红村发言。一位原先自己表示能在那里找一个会场的同志突然来信说，控制局面的护国派不知是有意识地还是被迫地不肯提供任何场所，此外还说，他们挑唆红村守备部队的士兵强烈反对所谓的“失败主义”，因此在红村演说有危险。

当然，我回答这个年轻人说，他不要再给我写信讲这类废话了。如果没有场地，我就在广场上讲，“我不怕”。我如今已经知道，只要有半个小时就连最强烈的护国主义也会烟消云散。我和加米涅夫就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使“火神”这个大工厂（约4000工人）变成布尔什维主义的了，而它本来是孟什维克护国主义的。

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我有了一天空闲时间。这天是圣灵降临节，所有像样的饭店都关了门。我午饭吃得很不好，所以5点钟准备去菲力波夫那里喝一杯可可。突然有人喊我，——是加米涅夫！真是难得的机会。寒暄一番。“今天有空？”“是的。”“那么去苏维埃吧。今天克伦斯基总理发表演说，对左派的‘攻击’进行辩护。”

必须告诉你，梅什卡，苏维埃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它对我没有吸引力。我的计划原是在基层巩固自己的影响。此外，你知道，我尽可能避开议会事务，因为很快文化工作就要忙得不可开交了。直

到现在我甚至都没有去工兵代表苏维埃开会的出入证。

因此，当我表示同意时，甚至还不知道能否进得了会场。但我感觉到一个内在的声音在清楚地命令我：“去吧，要发生什么的，你可以前进一步。”于是，我就去了。

有加米涅夫介绍（他是执行委员会成员），我很容易就进了会场，坐下来听。

我不准备向你描述马林斯克剧场内挤满士兵和工人的华丽大厅、悬挂着大花帷幕的舞台、坐在主席台贵宾席上的主席团和社会主义者部长们。

克伦斯基来了。他年轻气盛，体格匀称，穿着咔叽制服和军靴。一片欢呼声。他用简短的句子声音嘶哑地讲话，真挚坦率，也常常相当狡黠，大部分是说优美高尚的空话。对于我们，批评他的人，他说，“我们该同他面对面斗争，而不要像胆小鬼一样靠散布谣言取胜。”而这时托洛茨基不在，只有一个软弱怕事的加米涅夫。于是我做出决定。我给齐赫泽递去这样一张纸条：“我作为客人出席会议，但也许主席团会认为有可能建议大会听一听我对总理公民的反驳。”恰好这时克伦斯基快结束了，讲话颇有效果。会议决定讨论时每一个发言人讲5分钟。有人喊道：“难道批评我们亲爱的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的人不发言吗？如果他们发言，给他们每人10分钟，因为想知道他们在克伦斯基对他们的指责作了精彩的反驳后有什么想法。”

齐赫泽宣布说：“在座的有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据我所知，他属于对政府进行批评的十分明确的一批人之列。他请求发言。愿意让他发言吗？”“愿意，愿意。”我充分地利用了这10分钟，没有一句空话。我粉碎了克伦斯基的所有论据。虽然未允许我延长发言时间，虽然为我鼓掌的主要是布尔什维克，但整个会场，包括主席团和部长们（特别是策烈铁里）都非常注意地听了我的发言。就算后来在克伦斯基面前倒出几袋从前线寄来的奖章和圣乔治十字勋章，

就算为他安排了剧场一样的欢呼，痕迹还是留下来了。他未能在回答发言中（又是长篇发言!）认真批驳倒哪怕我的一个论点。

在我发言时，他一直眯着眼睛看我，好像在掂量对手。

可怜的人！一个好出头露面又神经质的人，不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看来他会在自己不彻底的立场上跌个粉身碎骨。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和他的依然很显赫的名声都是挡箭牌和最后一道防御阵地。他是帝国主义者最后一件工具。

一些人，其中有休帕克、苏汉诺夫的妻子、加米涅夫、许多布尔什维克代表，为我的发言向我祝贺。这是我在政治上层人士中的第一次讲话，我为之感到满意。

我和以前一样生活得不错。关于《新生活报》的情况仍然不清楚。不过看来我和托洛茨基及梁赞诺夫能够安排好自己出版小册子。这可使我处于相当独立的状态。

你怎么很长时间不写信？明天我给你发一封预付回电费的电报。你写信也太吝啬了。难道竟会发生这样的糟糕事，即你根本没有收到我的信？不可能！那样的话，你一定会打电报来的。

吻克罗－克罗① 一千次。他健康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去维·萨姆那里。代向娜杰日达·萨莫伊洛夫娜（克里斯蒂）致意。不知道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在哪里。我根本看不到他。虽然孟什维克表面上并没有发生分裂，但在护国派和国际主义者之间斗争激烈。

吻我们的克罗－克罗，我们的宝贝。我也吻你，我的无与伦比的幸福之神。

你的托利亚

1917 年 5 月 20 日（6 月 5 日）于彼得格勒

---

① 卢那察尔斯基对儿子阿纳托利的爱称。阿·阿·卢那察尔斯基 1911 年生于巴黎，1943 年在前线牺牲。

№0172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15日）

亲爱的纽罗奇卡：

现在我有了一项新的工作。虽然我还不能确信我是否会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但正积极参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各次预备会议。要是你能知道持孟什维克护国主义观点的群众是怎么一回事就好了。这是一伙顽固不化的丘赫洛马“爱国者”，他们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也没有。

我奉行强硬的路线。和托洛茨基及《真理报》一起，我是最彻底的社会民主主义革命者。我感到自己拥有清醒的头脑、坚不可摧的意志、无限的勇气。这归功于谁呢？归功于你。你是我的灵魂。我禁不住径直告诉伊里奇说，是你制止了我的动摇，从你真正豁达宽宏的能言善辩中我汲取到自己的信念。从你非凡的口中说出的话是如此深刻和不容置疑，就如革命本身的真谛。你对于我是预言家。现在，我全身心都充满了对我们的学说和我们的口号的绝对可靠性的意识。

给你寄去一期《新生活报》，其中刊登有关于我第一次演说（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大会上）的报道。……

1917年6月2日（15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2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16日）

……我被选为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有可能进入主席团。工作已经十分繁忙，而近几天事情还会更多。当然，为此只有高兴。在代表大会上我们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联盟依靠到来的“乡下佬”暂时居于统治地位，而这些“乡下佬”比自己的领袖如李伯尔和唐恩等还要保守和爱国一千倍。不过我们正在逐渐（而且也相当快地）赢得彼得格勒。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同生活结合在一起。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统治者”一点也不值得羡慕。看起来似乎所有人都支持他们，而他们却像煎锅里的鱼那样辗转不安，既怕将来，又怕资产阶级；既怕批评他们的人，又怕支持他们的人。可能很快要发生大事件，其契机是帝国主义梭子鱼和孟什维克虾所组成的临时政府陷入了绝境……

1917年6月3日（16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2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19日）

6月6日，

亲爱的，我心爱的纽塔，首先感谢你5月26日的那封极其美好的信，信我已经收到。你们，我亲爱的人，什么时候我能拥抱你们呢？瞧，我已经热泪盈眶了。要知道，总会拥抱你们的。让我们勇敢一点。

我在代表大会上工作很多。规模宏大而又激动人心的大会已经第三天了。策烈铁里关于总的政策讲得非常庄重而得体，并且尽一切可能有力而系统地维护自己的不可能实现的立场。

列宁在他之后讲了话[①]。他讲得热烈奔放，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但说得太快了，而且出了错误，说“真正革命政府的居第一位和最重要的措施，本应当是逮捕50名最富有的工厂主。”

克伦斯基利用了这一点。和萨拉·伯恩哈特[②]一样，他讲话时摆出各种姿势，运用各种音调。最后，经过一个小时过分做作的发言以后，他勉强走到隔壁房间的沙发旁，就昏了过去。从政治上看，他的讲话是庸俗委琐，空洞无物的。

我在克伦斯基之后发言。许多人认为我的发言是会上最好的。我提出了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议案，现在围绕着它们正集中进行着斗争。社会主义报纸关于我发言的报道，我明天和决议一起寄给

---

① 指列宁于1917年6月4日（17日）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② 伯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

你。在我之后，斯柯别列夫很轻微地反驳了列宁。

昨天主要的发言人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废话篓子切尔诺夫，以及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马尔托夫作了一次精彩的政治演说（虽然嗓门较低，只能传到半场），全力支持我关于国家杜马和苏维埃的决议案。托洛茨基的发言，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是高度辉煌照人的，甚至许多政敌都被吸引住了。

苏汉诺夫把这两天的会议概括为："多数人无限地忠于自己的部长，因此在政治上孟什维克护国派已经事先就赢得了一仗，但在道义上和思想政治上，反对派证明，他们比多数人及其部长们站得更高。"

资产阶级报刊完全堕落了。它们肆无忌惮地撒谎和诽谤。也许我们要对它们诉诸法律。

昨天我还赶上对1500名听众作了一场专题报告，并在《新生活报》参加了编辑委员会会议。我认识了伯努瓦①，他给我留下了极其令人神往的印象。我同他很谈得来。当时还有两个未来派②分子，他们的观点混乱不清却又狂傲自负，于是伯努瓦立即支持我的观点。他们自命为"最最革命者"，而且以一种颇有些自以为是的口气反对我。但他们很快就狼狈不堪了。吉洪诺夫起先彬彬有礼而十分冷淡（在我来到时），后来几乎对我谄媚奉承起来。我正在不断成长。也应当是这样。因为我对工作有所准备，而且真诚地、竭尽全力地工作，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地工作，同时心中记着你。吻吻我的托托，亲爱的，你们的爸爸。

1917年6月6日（19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伯努瓦，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70～1960），俄国画家、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

② 未来派是20世纪初期欧洲艺术中心先锋流派。

№0172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20日）

亲爱的！

昨天的代表大会有些枯燥。我参加了被选入区杜马的同志们的会议。

我本人看来将留在莫斯科区的杜马中。决定不进入自治局，即使多数人要求也不去：怕工作过于繁重。已经十分清楚，即使我的关于成立临时革命议会并选出有全权的执行委员会的提议得不到通过，那么肯定会通过一项建立工兵代表全俄联合会的决定。显然，像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样重要的组织如不能产生出一个强有力的代表团来，它是不可能长久工作下去的，正如同无论如何不能不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250人）合并起来一样。到那时，不管怎么称呼，这就将是临时革命议会。

即使我对同农民苏维埃合并的前景估计有误，进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则是没有疑问的。一共要选出不少于30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总共有750人。每7个半人可以选出3人。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联合党团有21票表决权，那就是说，我们无条件地在全俄苏维埃中应有8个席位（布尔什维克有40个席位）。目前在党团首领的位置上我同托洛茨基是50对50，因此我不进入全俄苏维埃是绝对不可能设想的。哪里还顾得上地方自治机关！但是我以为，我可能被选为区杜马副主席。这不会增加很多工作，但也不是一种称号。

我们党团充实得很快。昨天进入党团的有:阿维洛夫[1]、巴扎罗夫、苏汉诺娃、施米特[2] 和维连斯基[3](他们都是《年鉴月刊》和《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和编委)。我们的人数在增加,威望也在上升。我甚至有些害怕这一点:这一点千万别妨碍了同布尔什维克的合并。

昨天我看到了十分可爱的亚·米·柯伦泰[4]。她年轻了10多岁,变得朴实和和蔼可亲了,但并没有失去过去高贵优雅的风度。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她很受人喜爱,她到处都能获得一流演说家的声誉。她对我极端真挚坦诚,请我向你转达热烈的敬意并希望尽快在这里见到你。柯恩夫妇情绪低落。克里斯蒂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向你致意。这里许多人都无精打采。他们感到失望。他们希望,革命就像糖果那样,而民主制会顺从地跟在他们这些社会主义者后面走。

给托托寄去一张明信片。拥抱他,很想念他。很想念你。看来,不会有饥荒了。彼舍霍诺夫[5] 在安慰人们。

孩子,来吧。

你的托利亚

1917年6月7(20日)于彼得格勒市

---

① 阿维洛夫(季格罗夫),波里斯·瓦里耶维奇(1874~1938),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布尔什维克。《年鉴》月刊和《新生活报》的编委之一。1917年6月加入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联合党团。

② 施米特,奥托·尤里耶维奇(1891~1956),学者,数学、天文学和地球物理学方面的专家,1917年6月加入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联合党团。

③ 维连斯基,伊利亚·谢苗诺维奇(1873~1931),社会民主党人,1900年被捕并被流放,后流亡欧洲。1917年夏回到俄国,加入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联合组织。

④ 柯伦泰,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1872~1952),90年代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倾向于孟什维克,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

⑤ 彼舍霍诺夫,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1867~1933),1903年参加解放同盟;1906年起是人民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粮食部长。

№0172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6月28～30日）

……昨天的会不太有意思。发言的是不重要的人物。不过，当然，可爱的梁赞诺夫发了言，而且必然地引发了一场闹剧。他大喊大叫地维护临阵脱逃者，反对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但是前线回来的人们开始喊叫说，应当更严历地对待逃兵。在梁赞诺夫和士兵之间发生了争吵，而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士兵占全体与会者的一半以上。大吵大闹起来，但一点没有用处。梁赞诺夫的发言把我和托洛茨基发言后开始对我们产生好感的许多半觉悟的士兵又推开了。

给你寄去涉及我的一些剪报。资产阶级报刊在撒谎和诽谤。临时政府要求逮捕列宁、托洛茨基等等。孟什维克十分恼怒。社会革命党人在我们的政敌中表现得最为和善宽厚。

代表大会以来，我很少作专题报告。其间只有过一次。也无法去《新生活报》工作。钱也消耗殆尽了。不过我交了好运：与苏汉诺夫夫妇相识接近。她从某处得到一笔资助出版社的钱，买了我的《关于艺术的对话》，准备加上新的序言再版。不止如此，加林娜·康斯坦丁诺夫娜·苏汉诺娃声称，她要预先订下我提供给她的任何作品。你知道，我也还有其他出版方式……

1917年6月15～17（28～30）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2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4日）

6月21日。

亲爱的梅什卡！

告诉你最新的消息：城里，谢天谢地，似乎略显平静。我被选入杜马（市一级的）。今天很可能要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彼得格勒杜马第一次会议上第一个发言。决定走那条和你，我的缪司女神和埃格丽娅女神，一起拟定的道路：想把政治放在第二位。不能固定地在我们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因为民主派（也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做法是，除了让你在他们身边充当反对派的角色以外，不让你能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起任何作用。而对于反对派而言，只要在决定性的会议上到场就足够了，而这种事次数不会太多。

距离立宪会议还有3～4个月，而预测这么长远是不可能的。把城市文化教育工作同执行委员会下属的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工作结合起来是合适的。当然，《新生活报》的一个部门和系列的小册子丛书也要花费时间，但我反正一天要工作13～14个小时，足可以干好。我真认为，我每天将要花5～6个小时从事市政文化教育工作（特别是校外教育，以及戏剧，还有群众娱乐）。我在各工人街区作的专题报告，效果很好。衡量了所有这一切以后，我决定进入市自治局。可能性很大。按37个代表计算，我们肯定将有2个自治局的席位，而在布尔什维克和联合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盟中，除了

我和梁赞诺夫，并没有强有力的人选。诚然，布尔什维克想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人，并提出了亚·米·（柯伦泰），但即使那样也应是梁赞诺夫退出。

我已经有两天时间极其振奋地想着等待我去做的规模宏大的实际工作，这比毒辣尖刻的政治争吵要引人入胜100万倍。

如果我被通过，我想邀请德·伊·列先科[①] 担任秘书。他的妻子已经来了。她似乎是一个聪明、严肃的人。并不美貌，但却很显眼。现在我去看烟草工人的1100个孩子。他们住在教养院，人们请我去走访，并写写关于他们的事。

紧紧地吻托托，如同我吻你一样。

你的托利亚。

我获准推迟服兵役，到8月1日。

1917年6月21日（7月4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列先科，德米特里·伊里奇（1876～1939），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职业革命家。曾从事党报编辑工作。

№0172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8日)

……代表大会结束了。我有意没有参加要天天开会的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而只是一般成员（共有近300人），只需一周开一次会。我也没有参加任何一个下设的委员会。这也是因为我想切切实实地，作为市自治局的一名成员全身心地投入文化教育工作。我进入自治局的机会很大。这项工作对我十分合适：我喜欢这项工作，这正是我有能力做的事，相对而言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很多，与工人有联系，也得到他们的欢迎，许多进步的文化传播者超前地对我有好感，我本人又是《新生活报》相应部门的编辑，还应社会主义者出版社之约为15本一套的系列读物写一本名为《无产阶级的文化任务》的小册子。要说否定的方面，那就是能够否定一切的整个俄罗斯的破坏状态，它使得一切事情都变得困难了……

1917年6月25日（7月8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2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10～11日）

……我和原先一样过得很好。时代是令人不安的，甚至也许令人可怕，但又是极其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激动人心的。

我做许多工作，而且成绩很大。我从基层开始，所以报上还没提到我，但是我每一次讲话以后（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自我吹嘘），政敌们就狼狈不堪。我至今已讲了6次话，每次都十分成功。每次我都同时收到5～6个参加会议、大会、讲课的邀请函。这样工作2周以后，我毫无疑问将成为在工人中，在我们彼得格勒，最受欢迎的5～6个人之一。这比走我们占1/3的“社会主义”（哼哼）政府的正门不知好多少。

《新生活报》踌躇畏缩，胆小怕事。至今为止我没有一份大报，这很不好，应当在这方面加速事情的进程。巴扎罗夫约我写几篇文章给《年鉴》月刊。第一篇（一本关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德文新书）我日内就要动手。也该开始挣钱了。不算房租(房子是不要我钱的)每天平均要花7～8个卢布。当然,工资用于这些花销是足够的,但要加以安排。

也许，如果《新生活报》继续维持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们将筹办一份大报，一份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报纸，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梁赞诺夫、马尔托夫、马尔丁诺夫、拉林和我组成编辑部。这样最好。我只是怕难以办到，这里一切都拖拖拉拉……

1917年6月27～28日（7月10～11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3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7 月 14 日）

7 月 1 日

亲爱的：

今天要给你发一封电报，说明我一切顺利。

看看我每天的日子是多么充实和多样，就以今天的安排为例：早晨——给你写信，准备专题报告，看报；然后提前吃午饭（我尽可能在 12 点吃午饭，但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午饭吃，餐厅服务员正在罢工）。然后去《新生活报》编辑部参加很快就要出版的左派社会主义者的讽刺性杂志《手推车》的第二次会议。它的编辑是一名未来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布里克。参加文学部的有：未来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马雅柯夫斯基、阿·马·高尔基—彼什科夫、你的仆人、埃米尔·科罗特基、奥利得—奥尔格、巴扎罗夫、列维多夫等。参加艺术部的有：亚·伯努瓦、彼得罗夫—沃德金、阿尔特曼、马雅柯夫斯基（还是那个极有天赋、年青的准巨人，充满热烈的活力，眼看日益上升并日益左倾）、列别捷夫等等。出版商是：吉洪诺夫、格尔热宾。

我的一篇文章《杜勃罗留波夫关于〈汽笛〉的梦》已经交给第一期了。我准备把这份杂志寄给你。

马上，4 时，有一个即将出版的社会民主党联合报纸《星》[1]

① 这份报纸后来未能出版。

的第一次会议。编辑部的人员有：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你的仆人。这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马上可以保证5万～6万份印量，很可能还要多一些。

8时有车子来接我，我要去为彼得格勒军事学校社会主义者士官生联合会组织的社会主义理论讲座上第一堂课——绪论。而晚上从11时起，要去极其可爱、极其和蔼、极其博学而且极其和善的伊·伊·马努欣医生——他正为高尔基治疗——那里喝茶。你看，不坏吧？

再譬如昨天：早晨——写信，看报，事务性会晤，午饭，前往《新生活报》。由于我的文章页码颠倒而引起一阵忙乱。也是在那里，应苏汉诺夫的特殊请求写了一篇关于警察的文章。也是在那里给小册子《意大利和战争》写了一篇序言。这本书最后以总共300卢布（不再付原先《帆》出版社的300卢布）卖给了奥德萨。然后去《年鉴》月刊社，在那里给联合社会民主党人机关报《前进报》口授了2篇文章。从那里又到市杜马。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和杜马的会议直到夜里1点。我在杜马做许多工作。担任副市长的机会在增加。

紧紧地吻你们，我心爱的人。期待电报和信，也迫不及待地用爱心期待你们本人来到。

作为例外——为了试一试——这封信不通过格列尔寄出。收到后打电报来："收到"①。

你的托利亚

1917年7月1日（14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原文中这个词是法文。

№0173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15日)

……这一天没有发生任何事件，但它们在酝酿之中，这是指内阁的局部危机。危机将以何种形式爆发尚不得而知，但是苏汉诺夫期待着所有立宪民主党部长离职。切尔诺夫之类的先生们惊恐万状。而我们说，一切顺利！进攻[①]也可能发生许多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其他方面我一切如常。我的朋友苏汉诺夫夫妇准备到农村去，不过只是加林娜·康斯坦丁诺夫娜马上走，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因俄国局势激化而留下。这是个极优秀的人，而且归根到底是《新生活报》内惟一真正有政治头脑的人。

今天看来要最后决定，我是否担任副市长……

1917年7月2日(15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指俄国军队于1917年6月18日(7月1日)在西南战线发起的进攻。

№0173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18日）

亲爱的：

3～4日是可怕的日子。刚刚给你发了一封电报，以便让你至少知道我活着。当然，你会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从报纸上了解到细节。

我不得不和布尔什维克采取一致行动，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一次尽可能最有分寸的演说，以便尽一切可能维护他们，维护我们共同的口号。但是……他们根本不理睬我的忠告。固然，运动是自发的，但仍然是正确的，符合我们之间已经达成的反对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彼得格勒下层人们可怕处境推动的局部武装发动的协议。事情是3日开始的，当时我在市杜马，那里也正在召开一些重要的会议，他们作出决定不是抵制武装发动，而只是使之尽可能组织得更好。

我努力在这方面予以帮助。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越出了常规。黑色百人团、流氓、奸细、无政府主义者、感到绝望了的人群，在更大的程度上使示威变得荒谬绝伦和混乱不堪。我曾预见到这一点。我曾经在许多群众大会上以及最近在《前进报》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我寄给过你）警告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中的革命派一旦脱离了整个大大落后了的俄罗斯民主派，就会毁灭，而且也必然要把革命毁掉。现在，勇气应表现在开导群众，制止他们过分的强力行动，这种情况在彼得格勒还算比较缓

和，而就全局而言则是毁灭性的。我该怎么办呢？

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口头上表示同意，而在行动上却向自发势力让步。而我随着他们也在让步。也许，3～4 日的可怕经验会迫使人们回头看看。也许，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奔向深渊。当然，所有这一切的主要根源是战争。

我多么需要你！你本可给我出出主意。我极其相信你的本能。你们两人本应是我最神圣的安慰。这封信能到达吗？什么时候能到达？我们还能见面吗？昨天死神曾在彼得堡上空徘徊。

祝福你们，我亲爱的人们。希望你们生活得幸福，相互慰藉。我将经常打电报去，以免你过于挂念。

今天会发生什么？将要整顿彼得格勒的秩序。浪潮已经消退。不知是否会发生新的冲突？

正在下雨。心情沉重。桥都分开了，无法去塔夫利达宫，而且身体和精神都疲惫不堪。

昨天从早上 10 点到夜里 3 点——一直在工作！

愿命运之神怜悯人类和俄罗斯吧。

再一次亲吻和祝福你们两人。

我现在最最热切的愿望就是见到你们。

你们的爸爸

1917 年 7 月 5 日（18 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3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19日）

……从外表看生活正在步入轨道。我被市民选入省的地方自治局，正不断加强自己在报社的工作，又在准备作专题报告和讲课。实际上，从深层次看，局势仍然极端不稳定和危险。反动倾向在不断扩大和加强，政权的危机仍在继续，左翼还没有恢复元气，而且我也不知道它能否很快恢复元气。存在许多十分怕人的预兆。饥荒的预后也极为严峻，将是崩溃。

我毕竟还是幸福的，因为托托避免了这一切。留在瑞士吧，至少也要等到恶浪稍见平息再说。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常常收到大批漫骂和恐吓的信件。不过，真是怪事……在枪杀的威胁面前他反倒有些高兴起来了……

苦闷，现在在这里生活真是苦闷。革命正体验着巨大的幸福，但这是有点可怕而痛苦的幸福……

我很少看到什么人。根本没有时间到熟人家去走走。我们都完全相互隔绝。经过7月4日那一个疯狂的日子以后，不管谁对谁错，我们，国际主义者—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成了某种被遗弃的人。这要延续多久，只有上帝自己知道。最后总要有个什么样的结果。

经过对12个人的诽谤宣传运动，特别是经过指控列宁为间谍

的事件，切尔诺夫事件[①] 已经对我产生不了强烈的印象。诽谤是反动派主要的、目前几乎是惟一的武器。反犹太主义、布尔策夫[②]、阿列克辛斯基[③]、黑色百人团——所有这些都同国家杜马及立宪民主党在一起。多好的一伙！然而，对于愚昧的群众而言，诽谤还是起作用的。而民主派内部分裂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苏维埃在道义上的威望能够保持下来吗？如果能够，那么一切都会逐渐好转。如果不能，强大的反动时期就会来临，尽管不会长久……

1917年7月6日（19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七月事变后，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被资产阶级报刊指责曾在国外发表失败主义文章并参加一份受德国人资助的报纸的工作。为此，切尔诺夫于7月20日（8月2日）宣布退出政府，并表示只有在为他恢复名誉后才会重返政府。7月24日，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宣布，对切尔诺夫的指责是没有依据的。后来，切尔诺夫重新进入克伦斯基政府担任农业部长。

② 布尔策夫，弗拉基米尔·里沃维奇（1862～1936），80年代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曾接近民意党人，后流亡国外，从事收集和出版革命运动文献的工作，揭露了包括阿捷夫在内的不少沙皇政权警察部门的奸细。一战期间是狂热的沙文主义者，回国后持右翼立场。

③ 阿列克辛斯基，格里戈里·阿列克谢耶维奇（1879～1967），曾是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彼得堡工人代表，一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1917年加入普列汉诺夫的统一派。

№0173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7月26日)

……局势仍然是那样。前线的惊人不幸和其他情况在我们这里引发出强烈的反动形势，不过它们也在德国引发出反动形势。这是阴暗的时期。也许我也会被控以“教唆”或类似的罪名而遭逮捕。但这并不重要。我愿意为我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反对武装冒险，但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国际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我任何时候都能为确实做过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但对于我未能做的事则不予负责，否则就违背了我的政治良知。

昨天高尔基邀我去谈谈。去了以后，遇到了……玛丽亚·费多罗夫娜①。她很是殷勤好客。当然，我保持矜持而冷淡。她有些见老，但显得更加美貌。在不幸……或者诸多不幸(因为这些不幸不计其数:狂暴的示威游行、卑劣的恶意诽谤、反动浪潮、多数人弃阵而逃、战线被突破)降临到我们大家头上以后，高尔基变得温和了一些。最近一段时间简直像是《启示录》描写的那样。当然，这些都会过去，会好起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呢?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吗?

近年来我们是多么幸福。但是，历史上的惊人事件和伟大事件只能以苦难作为补偿。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的苦难不会是徒劳无益的。另外，你也和我一样相信，爱和精神是不朽的。只是爱和精神要多一些……

1917年7月13日(26日)于彼得格勒市

---

① 安德列耶娃，玛丽亚·费多罗夫娜(1863～1953)，高尔基的妻子和助手，著名演员，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0173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9月2日）

亲爱的，今天天气极好，心情也愉快了一些。你来不来？既想又怕。吻吻托托。我的心在想念你们。

党推选我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这并不能使我多么得意洋洋。我更感到高兴的是，在我面前又展开了可能是广阔的从事市政活动的前景。我看来将担任议员，但也可能要进入自治局，甚至要担任副市长。

焦急地等待你的电报，尽管事先已心痛地作好了只好与你分离到春天的准备。当然，对于托托来说这样更好些。

你的托利亚

1917年8月20日（9月2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3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9月3日）

……局势混乱而又危险。我们可能前进，也可能后退。作为笑话我告诉你，昨天流传了一张社会主义者的内阁名单，其中你的丈夫依然是国民教育部部长。当然，这是胡说。

不过，担任副市长差不多是肯定的了，那就是说，是彼得格勒的国民教育部长……

亲爱的孩子，根据中央的决定我即将退出《新生活报》[①]，我并不感到惋惜：市政工作以外，剩下搞报纸的时间反正也不多了……

俄罗斯的革命民主派比它的敌人们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当然，战争、饥荒、失业——这一切仍然继续存在和发展，但毕竟一线线亮光似乎正在显现出来……

1917年8月21日（9月3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于8月20日（9月2日）作出决定：由于《新生活报》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所有在《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均应退出。

№0173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9月4日）

……到昨天为止局势稍有好转。给彼得格勒运来了粮食，然后又运来了木柴。杜马选举进行顺利，我们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大大增强。甚至连克伦斯基政权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得以巩固，也是好事。现在，向右转的危险多于向左转的可能。不过昨天发生的巨大的不幸——德国人占领里加——可能再次使局势全面恶化。这件事对整个俄罗斯的生活会有何种影响，还不知道……

1917年8月22日（9月4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3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9月5日）

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当然，它也还会不止一次地发生急剧转变。

最为重大同时也是最为可怕的情况，是德国人的军事胜利。局势极度危险。谁知道，致命的危险会不会很快就要威胁到我亲爱的、奇妙的、革命的彼得格勒？肯定会发生什么！心脏发紧。我只说一点：我要和彼得格勒的工人们在一起，直到最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他们分担一切痛苦，直到最后。

第二个情况是，我们在选举中获得了极其巨大的、远远超出我们期望的胜利。

几乎已经肯定，我将被选为副市长。看来，城市的整个文教事业将要集中在我手中，也就是说，市国民教育部门的大印将由我掌管。……

工人们对我十分信任。发生了我向往和幻想过的事：我真的成了备受欢迎的无产阶级群众的领袖。或许，除了托洛茨基和列宁以外，没有一个名字得到这样的声望和爱戴。不过，成为先进革命活动家的幸福——巨大的幸福——也是苦涩的！……

1917年8月23日（9月5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3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9 月 13 日）

亲爱的！

我们胜利了[①]。胜利表现在一切方面。我们党的整个处境明显好转。革命充满了出人意外之事。这一次的意外之事令人愉快。而我，说真的，本已经准备“与心爱的生命告别”了。回避战斗，我是怎么也不愿意的。

政治形势尚不明确，但向左转是显然的。……

1917 年 8 月 31 日（9 月 13 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指的是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

№0174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9月26日）

……我全力以赴地工作。上一周我在人数众多的群众大会上讲了4次课，现在我的正常听众为4000人。每次我讲课，大厅都是满满的。可以并不吹嘘地说，作为演说家，也许只有托洛茨基一人在受欢迎程度上可以同我相比较。

不过主要的工作是城市的文化教育事业。今天一整天在巡视市内的学校……

要尽快召开会议并使为数众多的教师们安静下来，他们正在因一个布尔什维克成了他们的顶头上司而惊恐不安！

我还在为召开（全市）无产阶级教育团体代表会议作大量工作。我被选入民主会议①，但是，由于引人入胜的市政工作，我未必会特别认真地参加这个议会。

关于我们党获得的无法估量的胜利②，你当然是知道的。我们正在日益向上。而主要的是，我们正在组建一个好的司令部，而且表现得越来越沉着。党正在明显地变成不再批判加入政府的主张了。但这丝毫也不损害它自己真正的严肃的革命性……

1917年9月13日（26日）于彼得格勒市

---

① 为缓和危机、巩固临时政府的地位，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召开全俄民主会议。会议于9月14日至22日（9月27日至10月5日）召开。

② 指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之后，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莫斯科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

№0174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9月28日）

……昨天最主要的事情是，先在中央（我被特邀参加了）、后来又在我们党团内进行的关于我们是否参加由“李伯尔唐恩分子”拼凑的小资产阶级预备议会的争论。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党团内，争论都很激烈。托洛茨基主张抵制预备议会，中央整整有一半人支持他。另一半人则主张利用这个讲坛，在中央维护这个观点的有我，在党团内有李可夫、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不参加可能被群众理解为是对举行发动的一种号召。从这方面看，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孕育着危险。所幸的是，这个意见以78票对50票而被否决。

昨天我根本没有去民主会议，今天也不准备去了。那里的情况已经清楚。“李伯尔唐恩分子”和合作社工作人员大权独揽，我们在其内部的作用相当微弱，但外面有强大的反对派。总的说来，现在尽快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于我们要重要一千倍。而对于我，则回到市政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去十分重要。今天终于又要全天在市内巡视了。

我这一阵子真是累坏了。但今天终于好好睡了一觉，感到头脑清醒而又精力充沛。其实我的疲劳是暂时性的。昨天晚上我几乎要累垮了，但是仍然在4000名听众面前讲了一堂可以说是出色的政治课……

1917年9月15日（28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4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0月5日）

……如果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形势就会与6月份完全不同。可以自豪地说，部分地、甚至很大部分地是由于我们的工作，苏维埃现在就是我们！

但是，有人向我们革命的火焰中投入了各种湿透了的燃料，非苏维埃的东西，于是我们又处于最令人窒息的敌意之中。

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肯定早已读到有关昨天事态的消息，关于“他们”破坏了我们提出的所有妥协办法、关于策烈铁里提出的解决冲突的笨拙办法、关于他在昨天——9月21日（10月4日）——会上再次进行的捏造、关于我们退出会议。所有这一切都令人不快。

当然，我们明显壮大了，而且还在不断壮大。但是，民主派内部的分裂毕竟是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它发出了很可怕的预报……

总之，只有我们内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友谊稍稍缓和了我们呼吸着的令人苦恼的敌意气氛。

不过，也有例外。例如，我按照亚历山德拉剧院演员的要求为他们所作的关于民族戏剧的任务的专题报告获得巨大成功。

令人惋惜的是，最近三天可诅咒的政治又让我完全丢下了我更加喜欢的市政工作。……

1917年9月22日（10月5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4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0月7日）

……关于我被选入“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苏维埃”① 的事，你当然知道了。这是最不重要的事。市政在我的兴趣中占有大得多的地位。

我很生气，印刷厂至今没有把我的几本小册子印出来。现在正在根据中央的委托写关于立宪会议的东西。我进入立宪会议已属必然，具体是代表彼尔姆市。到那时形势将会怎样，以及在立宪会议又将工作多久，我不知道。

开始给你在信中附寄《工人之路报》② 上最精彩的文章。当然，由于时间延误，它们对你只具有历史上的意义，但毕竟……

此外，我们也还准备出版市政府的机关报。这份报纸，由于我将大量参与其中，和《启蒙》月刊我将一并给你寄去……

1917年9月24日（10月7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即预备议会。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机关报，1917年9月3日（16日）至10月26日（11月8日）期间出版。

№0174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0月8日)

……这是令人不安的时期。我确实曾经声称要在一定程度上离开政治，尽管我，毫无疑问，被选入了民主会议，但我不会去。然而，事实上是摆脱不掉政治的。资产阶级正在准备进攻。极左的势力正在迅速壮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又向右摆动了，中间道路也即最可靠的道路看来已经堵塞，可能发生尖锐冲突。那么，什么时间发生呢？不是向这一边，就是向另一边，形势显然要发生剧烈变化。我们在匆忙地进行建设。事情并不坏，尽管力量不大而障碍大得出奇。但主要的是，我们是在火山上进行建设。

幸好，我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第一小提琴手的作用受到广泛的承认，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在整个苏维埃、在杜马、在无产阶级中间，而且甚至在专家中间，都是如此。如果我将活下来，而政治又多少给文化工作某种条件，我一定会在这个领域创造出不少有价值的事物。希望，至少……

1917年9月25日(10月8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4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0月12日)

亲爱的：

又有这么多事情压到我头上，以至只有在自治局全体会议的短暂休息时间里给你写几个字。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要有的话只有一件事，我以俄罗斯工会联合会代表的身份被选入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这是好事，但是没有坏处的好事是没有的：为此我不得不放弃本来我可以第一次听到的斯克里亚宾交响乐的音乐演奏会。事情总是一个接一个，以致用于个人文化生活的时间少到了极点。你看……这不又要让我到市长那里去。今天的信只能写这样的两行，同时寄去一百万个热吻给你和托托。

巴利兹终于走了，马良托维奇（部里的新成员）对我们的“案件”[①] 的性质感到窘困不安。目前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不在的影响很明显。这自然令人懊丧。亚·米·柯伦泰在工作，嘱我向你问候。

吻你。

想让你没有一天不收到信，至少收不到不是由于我的过错。

完全属于你们的　　爸爸 托利亚

9月29日

1917年9月29日（10月12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指的是临时政府指控列宁、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叛国一案。巴利兹是临时政府内务部副部长，马良托维奇是临时政府司法部长。

№0174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0月15日)

我亲爱的、我钟情的梅什卡:

每一封信的开头,我都不得不埋怨工作太多。但我却以此而感到满足。

例如,今天我主持了改善儿童饮食委员会的会议。这个委员会是我筹组的,而且应当说大大地推动了这一桩无比重要的事业。

现在我马上要去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要在那里协助人们最终埋葬关于免费上学的天真幼稚的法令,这个法令实际上是从人民贫乏的口袋中掏出1100万卢布送给生活优裕的中学生的家长们。

然后要到人民文学大学作题为《现代艺术的危险和出路》的专题报告。也就是说,我还来得及什么都做一点。人们对我甚为满意。无产者和士兵听众承认并真正爱戴的,除托洛茨基外,只有我。知识分子则敌视托洛茨基,但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中特别推崇我。总的说来,我的情况还不错。但这又怎么样?俄罗斯的局势很糟糕,始终为它而揪心。我们都将和它一起毁灭……

能经常看到玛·费·(安德烈耶娃)。将要经常和她在一起工作。我是“人民之家”管理委员会主席,而她和莫热韦洛夫是副主席。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回来了,情绪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忧郁和悲观。耻辱的颂扬和卡桑德拉式的预言听起来令人沉痛。

彼尔姆、斯摩棱斯克和其他一些推荐我为候选人的城市要求我能去一下他们那里,但这对于我的根本性工作——市内的文化教育

事业却有重大的影响。

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还能看到你们吗？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把握。我爱你们到发疯的程度，是一种无限悲凉而又极端辉煌的爱。

寄去《工人之路报》上的一篇文章，可以让你评判一下现在，10 月初，我们的计划和情绪。

吻吻托托，我的克罗—克罗。向友人问候。

第二笔 500 卢布寄出了。第三笔要到 11 月（俄历）初才能寄出。

你的大托托

1917 年 10 月 2 日（15 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4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0月18日）

……稍稍离开政治远了一些。但这只是看来如此，因为正好这是一个间歇时间。很快从那边又会传来低沉的隆隆响声，新的震荡的征兆。不过就是政治本身也只不过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最根本的病症是战争造成的破坏。它正在扼杀我们。我时常痛苦地想，我们在表面上的工作全部都要化为泡影，因为，可以说，整个大地正在崩溃之中。

昨天我们这里在市府和总司令之间发生了一场尖锐冲突。这很好。好就好在立宪民主党未能做到在右翼民主派和我们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于是不得不对整个民主派进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取胜。总之一句话：现在还不错，但灾难正在来临，脚下的冰层在断裂……

1917年10月5日（18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4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0月22日)

……事态飞速发展，甚至连我们这些非常靠近形势中心之一的人，对最近期的前景都心中无数。

局势有可能大为激化。

也可能会是这样一种结局，即政府预见到如果继续迟迟不召开立宪会议会导致暴风雨式的强烈抗议，于是竟认真地召开这个会议。但立宪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弄虚作假，因为农民毕竟愚昧无知，会以为这总比政权转入现今很左倾的苏维埃手中更少些祸害。当然，立宪会议将标志着地主政权的崩溃，但可能也就仅此而已。苏维埃政权则将一劳永逸地，而且非常彻底地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本身……

1917年10月9日(22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4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0月23日)

……右面一极对我们的恼怒在极大地增长，他们的追随者也不断增加。

严重的不满情绪也在工人、士兵、农民中间滋长，这一点使我害怕，而且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普加乔夫式的东西很多。这一批灰色的群众，目前还是红褐色的，可能作出严重的残暴行为，而从另一方面说，在一切破坏殆尽的条件下我们未必能多少整顿好国家生活，即使政权转入极左派手中也是一样。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那股把我们党推上掌权地位的绝望的浪潮所冲刷掉。立宪民主党人所采取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方针。

周围有多少大有益处的、文明的工作！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可能性……但是，政治以无比尖锐的形式提出了问题，而我，我的预测，则是犹豫动摇的，而且相当阴暗……

№0175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0 月 31 日）

……忙到了极点，因为正在召开我的代表会议，[①] 这是我的心血结晶，社会主义文化组织的第一块基石……

给你寄去两篇记述代表会议第一天开会情况的最精辟的文章：一篇选自《市自治局通报》，一篇选自《工人之路》

主要工作是在第二天进行的。我在戏剧艺术和文学组工作，另外也去俱乐部组。通过了三项决议。我非常满意。有 400 多人参加了代表会议，其中 200 多人拥有选举人委托权。工人们的发言给人留下异常清新的印象……

粮食状况仍然是危机性的：这是形势中最为令人害怕的一面。

政治方面似乎有些和缓。我们形成了一个类似右翼布尔什维克联盟的东西：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我、梁赞诺夫等。左派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他们有中央，而我们这边是各个工作部门的所有领导人：市政府、工会、工厂委员会、军事方面、苏维埃方面……

1917 年 10 月 18 日（31 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指 1917 年 10 月 16 日（29 日）至 10 月 19 日（11 月 1 日）举行的彼得格勒全市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卢那察尔斯基主持了会议。

№0175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1日）

……会发生什么事呢？局势非常、非常、非常危急。纽罗奇卡，我们坐在火山口上。我写给你的信，当然，是历史性的。无论这封信走得多快，在11月10～23日以前你是收不到的，而到那时将是另一种局面。

不过我的许多愿望眼前已经实现了。

（1）我几乎是人们，特别是群众最最喜爱的演说家和讲课人。

（2）我是副市长，很能胜任崭新的和实际的市政工作中重大而有意义的各种任务。

（3）我领导着庞大的国民教育机关（各个市办人民之家），并管理一个有68人的剧团、许多游乐场、5家剧院等等。马上就要上演高尔斯华绥的《斗争》，可以说，是我导演的，并将由我作首演讲座（正如托尔斯泰曾写过的，如果我们还活着）。

（4）我召开了并正在主持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团体代表会议。难道这一切还不算多？……

1917年10月19日（11月1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5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3日）

……这是一个严酷的时期。看不到丝毫光亮。情绪接近于悲怆的绝望。

躯体是羸弱的。不是指我。我很健康，虽然瘦了许多，又跌伤一次（顺便说起，鼻子差不多已经恢复正常的样子了）。我指的是俄罗斯的身体。它已精疲力竭。饥荒蔓延，濒临崩溃。一切都听天由命。未必会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这一切。也许，左翼民主派要付出英勇的努力（既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是深刻的爱国主义性质的），但是看来肯定要就此毁灭。

然而，谈到精神，那么，当物质基础消失时，精神之火并不会熄灭。

代表会议开得极其成功。给你寄去一些剪报：都是对会议的最精当的反响。明天还要寄一些去。完成了巨大的工作，美妙的前景正在展现出来。

啊，吉索奇卡，我多么愿意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有许多工作领域，我实际上是彼得格勒社会文化界的中心人物。你想想吧，我来这里不到半年，而如今我已是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团体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市自治局分管全部文化教育部门的副市长了。我担任这两个职务都是十分荣耀的。再加上我本人就是全市人民之家管理委员会主席……

1917年10月21日（11月3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5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6日)

……形势紧急。

革命委员会[①] 和总参谋部[②] 都在等待，看谁先动手。

其实，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也好，临时政府也好，都没有很多力量。但是，临时政府完全无法胜任日常的繁重任务：它甚至连纲领也没有。彼得格勒苏维埃则有纲领，而且是惟一正确的纲领。苏维埃有力量夺取政权吗？很可能有。苏维埃有力量拯救俄国和革命吗？看来并没有。但是，某种机会还是有的，而立宪民主党人却一点机会也没有。他们实际上是想让一切都毁灭，而奢望自己能"幸存下来"，并且在革命践踏了自己的子女以后，使已被饥荒制服的殖民地化了的俄罗斯成为英美的附庸。

无所事事——革命和国家都将毁灭。

冒一下险——只有微弱的，可悲的一线希望，但至少尽了责任。

总的说来，我们都重病缠身，几乎濒临死亡，因为俄国处于死亡线上。

---

① 指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为落实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而于10月12日（25日）建立的。

② 此处应是指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

22日有所好转①。由于捷列申柯② 和维尔霍夫斯基③ 的分裂，政府可能开始崩溃。但是，23日维尔霍夫斯基临时去职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迟疑不决，又使极左派陷入孤立境地。

极左派受孤立的程度越小，拯救国家的机会越多。

但是，纽罗奇卡，这类机会很小，我们应当做好最坏的打算……

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10月22日（11月4日），彼得格勒各工厂举行群众集会和会议，要求把全部政权转交苏维埃。

② 捷列申柯，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1886～1956），俄国最大的糖厂主，接近进步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先后担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③ 维尔霍夫斯基，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1886～1941），1917年曾任莫斯科军区司令，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后，晋升为少将，任临时政府军事部长。10月19日、20日曾先后在政府会议、预备议会军事和外交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建议立即主动提出缔结和约的问题。

№01754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7日）

……我这是在25日早晨写信。

夺取政权的斗争已实际展开。甚至可以说，首先转入进攻的是克伦斯基。

24日的情况你从报纸上知道了。所以只向你写出涉及我的事情。

我全天都是在杜马度过的，也就是说，先参加了自治局的会（紧急会议），后来又参加了杜马的会。

我在两处都讲了话。

主要的是在杜马，在那里是公开讲话，是采取政治行动。

从政治上，我当然同布尔什维克态度一致。我很清楚，政权不转到苏维埃手中，就拯救不了俄国。固然，还有一条出路——建立纯粹的民主派联盟，也即列宁——马尔托夫——切尔诺夫——唐恩——维尔霍夫斯基这样一条阵线。但是，为此需要所有方面都表现出足够的善意和政治智慧，而这看来是一种幻想。

于是，在政治上我维护这种主张，同时实际地建议市府采取措施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同流氓、同毁坏粮食和酒精仓库的行为作斗争，组建红十字会，等等。

市长的公开建议和我的意见相似，但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行动证明，在这一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感到自己更接近于立宪民主党，而不是我们。

今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还不清楚。昨天一名破坏分子打死了在涅瓦大街上号召人群散去的市警察局督察。

共和国苏维埃的决议[①] 似乎为相互妥协并产生多少体现和解的结局提供了微弱的希望。

好吧，走着瞧。等待的时间不会长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切都要解决。可以设想三点：

(1) 或者临时政府取得彻底胜利，那样，将会出现缓慢的、不可避免的反动。

(2) 或者彼得格勒苏维埃彻底胜利，那样，就会实行一系列挽救性的革命措施，但是责任极其重大，困难也异常严重。

(3) 或者是第三条路线：没有监督成分的民主政权。在存在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他们参加整个民主派组成的政府的情况下，召开立宪会议的困难很大。但这是较好的出路……

可怕的时期，真是可怕的时期。处于尖刀的顶端。多少苦难，多少辛酸，也许它们要促使我们过早死亡。但是，生活在充满伟大事件的时代毕竟是幸福的，在这个时代，历史不是在懒散朦胧地慢慢踱步，而是像一只飞鸟在没有道路之处展翅翱翔……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于彼得格勒市

① 10月24日（11月6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向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苏维埃（即预备议会）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政府立即向盟国建议举行和平谈判，立即把土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尽快召开立宪会议。预备议会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决议。

№0175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9日)

亲爱的阿纽塔：

你当然从报纸上知道了事变的所有细节。对于我来说，它是出乎意料的。我自然知道夺取苏维埃权力的斗争必将发生，但在召开代表大会前夕就夺取政权，这一点我想谁也不知道。也许，连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转入进攻的决定也是突然作出的，担心纯粹的防御态势会导致毁灭，毁掉整个事业。

从事变竟轻易实现这一方面来说，它也是出乎意外的。连敌人也说："干净利落"。军队没有违犯纪律。但在冬宫还是发生了破坏和冲突（没有发生屠杀），为此承担责任是可怕而沉痛的。有什么办法呢。这样做也许能使和平更快来到。什么也不会比在前线继续进行骇人听闻的"合法"杀戮更坏。

不管怎么说，暂时牺牲极少。

暂时。

我惊恐地想，牺牲会多起来吗？

如果你接到了我前面的信，你就会知道，我一直在清晰地给自己设想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所有令人抑郁的困难。但是，困难比所有的预想超出一千倍。

是的，夺取政权总算轻易完成了，但是保持政权呢！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断然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恼火。市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所有人都是这样，

除了士兵和工人，也许还有某些农民。北方方面军加入了我们一边。罗马尼亚方面军则坚决反对。关于另外两个方面军还没有消息。从莫斯科也没有消息传来。外省消息不多。目前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和疯狂的恼怒。而困难呢？粮食供应任务极为艰巨。到处都是衰败崩溃，并且从各个方面袭来！甚至即使把一切力量集中到一起，俄国可能也无法摆脱这种可怕的境况，而我们必须仅仅依靠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来拯救俄国。

孩子，形势极端危险、极端严重。

再重复一遍——再有几天就会有结果。民主派联盟是一条出路。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表示支持，列宁、托洛茨基反对。支持它的还有《新生活报》、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但护国派是我们的死敌，我想他们如同我们的左翼布尔什维克一样，也不大可能妥协。

纽拉，纽拉，我已经不恳求命运让我看到你们，但是恳求能使我的信到达你们那里！

可爱的，亲爱的，遥远的！

关于钱的问题，一旦发生不幸，你去找科利亚：他那里还有一些属于我们的钱。只要形势稍有好转，我自已将设法寄钱去。

我的肖像，文件（将会存在下去的浮士德手稿①）在列先科那里。

温柔地吻你们，我的亲人们。周围海空一片汹涌。看不到一丝光亮。

对社会主义的义务将会完成。走着瞧吧。

我是国民教育部长，或者按我们的说法，国民教育人民委员。

我什么时候着手工作呢？

---

① 指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浮士德与城市》。

要等到有可能至少进行某种组织工作的时候。

温柔地吻你们，亲爱的人。

你们的爸爸

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56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1 月 10 日）

亲爱的纽罗奇卡：

当然，越是拖延下去，情况越坏。

形势严峻。

昨天形势几乎变得无法忍受。

流传过一个谣言，说我们的士兵在彼得保罗要塞枪毙士官生。

你懂吧？前一天我们废除了死刑。如果政府没有力量从根本上制止自行其是的死刑判决，我就不能留在政府之中。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候离开政府，比和它一起毁灭更加可怕，但是为恐怖行为分担责任我是不干的。

你能理解。你能原谅的。

我将和政府的同事们一起走到底。但是，从事恐怖活动，不如投降。我是不会参加一个搞恐怖活动的政府的。我要离开，等待命运的安排。

值得庆幸的是，关于枪毙士官生的传闻是虚构的。

宁愿接受最大的不幸，不要犯最小的错误。

我们被包围在什么样的敌视之中！

真感到心痛……

吻你们，我心爱的你们。愿你们幸福。

你们的爸爸

10 月 28 日

1917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10 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57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11日）

亲爱的纽罗奇卡：

不知道城里正在发生什么事。笼罩着某种恐慌气氛。

克伦斯基的军队近在咫尺。也许，已经在城里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将会看到的。但是，有可能他们已被击退。

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们掌握了政权，却什么也做不成。

单靠我们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能搞好。

社会主义者是否会参加单一的民主派内阁，我不知道。但是，没有这一条，应当说，除了毁灭，革命没有别的出路。

此外，有一些措施我很不赞同。例如，不仅资产阶级报刊，而且连社会主义者的报刊也遭到长期禁止。诚然，它们曾对我们横加挞伐。但是，即使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为强制措施承担责任总是可怕和沉重的。

目前还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冲突得不到任何支持。但我最怕这种冲突。比死去还怕！为我们的纲领而死，是值得的。但是，作为荒谬行为和强暴行为的罪魁祸首而闻名于世，则是令人恐怖的。

再重复一遍，暂时还不是这样，我们的人的行为无论在哪里都堪称楷模。所有的指责原来都是没有根据的谣传。不过有一些取缔和逮捕的作法似乎是缺乏根据的。至少，这些做法使我很担心。

但是，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仇视啊。天哪，在整个市民中，在所有妥协派社会主义者中，仇视达到了难以估量的程度。

该去斯摩尔尼宫了。

局势如此，每次写完信都不知这是否是最后一封。我很容易会被关进监狱。

主要的还有，担忧怎样寄钱给你。现在一切都在无比的混乱之中。

心情沉重。

不过，我们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就算我们失败，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对生产的监督，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我去了……

吻你们，我的神圣的人们。

再过30～35天，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今天、明天的日子，这些决定性的日子，已经将成为历史的财富。

把你们两人都紧搂抱到我的心间。

你们的爸爸

10月29日

托托，你的爸爸现在是部长！

你高兴吗？

但主要的始终是：我是你的父亲，

而你爱我。

你不是喜欢我吗？不是吗？

给我写几个字，

就像你有一次写得很好的那样。

爱你的爸爸

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58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14日）

亲爱的：

因无法计数的工作和感受而觉得喘不过气来。

寄去几篇文章。

局势有好转。

不过，谈到胜利或者甚至半胜利都嫌太早。

局势依然极其危险和极其严重。

出路（即使有，也面临巨大困难）在于妥协。

很有可能，我将留在社会主义者联合内阁之中。

那样，我就要成为“真正的”部长了。

吻吻托托。

你的，你的，你的。

11月1日

1917年11月1日（14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59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 年 11 月 26 日）

……新的政权，一个真正人民的政权，在犯有种种错误的情况下，能长期坚持下去吗？

这一点取决于一百条原因。但是，很可能是：稍微掺入一些其他成分，主要是农民化一些，增加较多数量的总的看来较温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就能坚持很久。我们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局势异常危险，但革命者不是胆小鬼。正因为如此，才有巨大的可能性。

取得胜利的下层群众的高涨情绪确实非常振奋人心。

昨天我第一次（就我的使命）向人民作了人民委员的总结汇报。共出席 5000 人。多么亲近，多么团结，什么样的欢呼，多少爱心！……

1917 年 11 月 13 日（26 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60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1月29日）

亲爱的纽罗奇卡：

昨天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与农民联合[①] 和签订初步停战协定）当然大大巩固了我们的政权，而且也许今天就会看到结果，但是政权目前还不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财政部门就还在反抗，因此信使一直未能出发。不过明后天他就可以启程，因为毕竟胜利是明显的，包括对于“等待”着它的那些信件也是如此。

希望在“攻占”财政机关以后我们也就能解决侨民的问题，那样，你们，我的珍贵的，心爱的人们，就可以回到热爱你们的爸爸这里来了。

昨天我一下子收到你的两封信：新历10月11日和25日的。这就是说，最后一封走了一个多月。已是多久以前的历史了。例如，你写到加林娜·康斯坦丁诺夫娜[②]。这位大人物现在（也可能是暂时的）完全离开了我们，而我不但没有时间同她见面，而且也没有时间想起她。

其实，她也像马涅奇卡，一切优点她仍然保留着。而她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身体又不好，因此从我方面来说如此远离她是卑劣的，但原因在于可爱的尼·尼·苏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不是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敌对了。事变以后，《新生活报》的立场日益倒退，

① 指工兵代表苏维埃与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合并。

② 尼·苏汉诺夫的妻子。

甚至进行诽谤，所以我不以为有可能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会见，于是和加林娜·康斯坦丁诺夫娜也不见面了，而她又因身体不好而很少出门。我仍然想，当你和她相识以后，会很好待她的。

我没有找到代替苏汉诺夫一家的别的朋友，除非是列先科夫妇，我同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一段时间，性格极好的女布尔什维克M. H. 波克罗夫斯卡娅对我十分友善热情，她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但现在工作极忙，又谈起了恋爱！因此，没有任何熟人来我这里做客，我也几乎有一个月时间谁家也没有去（指私人交往）。相反，我的工作关系十分多，其中不乏令人愉快的人，如捷马·基梅利、亚·尼·别努瓦、雷斯涅尔教授、弗·弗·马雅柯夫斯基、勃里克和其他许多人。

有一段时间我常去高尔基家（当我担任人民之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时，玛·费·安德烈耶娃是副主席）。而现在他们是我们“政权”的凶恶敌人，我因而避开他们。

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荒谬绝伦的故事：要知道我实际上管理着沙皇们的所有宫殿、所有的博物馆，而且如果需要，也要管理所有国家剧院，领导全国的文化工作。一切都在逐渐好转，而我同各部的私人关系非常融洽，许多情况迫使我想，我会巩固自己的地位，变成为一个规范的“部长”。

暂时，忙得不亦乐乎。

明天再接着写，也许有可能把这两封信寄出。

1917年11月16日（29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61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2月1日）

……我正在为安抚知识分子而努力工作。大学生中开始出现逐渐向我们靠拢的涌动潮流。我对教师们的呼吁看来没有得到任何反响，但是对学生的呼吁却获得了强烈而热情的响应。我的第二个公开总结汇报受到热烈的欢迎。

眼前事情在慢慢好转。我们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军事粗人不断在犯大量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让人心痛得皱紧眉头。又有什么办法呢？要知道，就是那一方面，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在疯狂地同我们作斗争。强硬的政权，天啊！是必要的，这一切不得不咽下肚去。仍然不能不想，在文化方面还能够做成功一些好事……

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62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2月6日）

……一切如常。知识分子，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都非常地仇视我们。《新生活报》看来更是如此。甚至巴扎罗夫也竟能（而且也包括对我）进行完全是侮辱性的攻讦。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士兵们仍然热情地支持我们。

但是，之所以有这种支持，是因为我们暂时还未被证明是应付不了令人绝望的局势中的所有困难的。我们能应付吗？

官僚们的抵制严重地妨碍着我们的事业。另外，教育方面总的说十分薄弱。我们的军事当局和司法当局一直在犯右的和左的最令人苦恼的错误，为这些错误承担责任真是心情沉重。

是否能做到以下几点呢？（1）签订和约；（2）整顿生产（这点特别困难和怕人）；（3）改善粮食供应。

另外，还有军队的复员。

立宪会议也可能出现重大困难。

总而言之，局势是相当令人绝望的。

这是一次艰难的登山宗教游行。政权多半仍然具有虚幻的性质……

1917年11月23日（12月6日）于彼得格勒市

№01763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致妻子的信

（1917年12月8日）

……现在阴云正在四散。不过工作真不少！要相信我，并不是由于我什么都想干。我只是在干绝对必须干的事。没有休息的时间。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如果可怕的灾难得以避免，其中也有我的一份作用。右派因我的“辩护”而对我十分恼火！左派也对我的模棱两可而心中有气，最后，双方都意识到，是我们在最紧张的时刻使他们避免犯致命的错误……

1917年11月25日（12月8日）于彼得格勒市

【专题说明】

瓦尔热涅夫斯基关于十月革命前农村情况的信件

（1917 年 3 月至 8 月）

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瓦尔热涅夫斯基是莫斯科省莫扎尔斯克县的首席贵族、国务会议成员。他与同是国务会议成员的莫斯科省首席贵族、宫廷总狩猎官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谢列梅捷夫伯爵是相交数十年的朋友，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信件来往。1917 年二月革命后，瓦尔热涅夫斯基在给谢列梅捷夫的信中详细描述了农村的情况，并表达了他对俄国局势的看法。这些信件从俄国农村生活的层次上反映了二月革命后俄国事态的发展，从一个侧面为认识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具体材料。瓦尔热涅夫斯基与谢列梅捷夫的通信到 1917 年 8 月就终止了。本专题收集了 1917 年 3 月至 8 月期间瓦热涅夫斯基给谢列梅捷夫的 16 封信。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刘明、李利翻译）

№04471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3月6日）

亲爱的、深受尊敬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昨天刚寄信给你，问候你的健康，今天就收到了你3月1日的来信。谢天谢地，你的身体很好，并且还能在精神上承受当前局势的变化，但是在你写信的时候你还不知道3月2日和3日的行动呢。现在，我们回到了戈斯托梅斯尔[①]的时代，而不是1613年的那个在伟大的全俄缙绅会议之前的时代[②]。当时代表俄罗斯土地参加全俄缙绅会议是东正教徒，而如今，为了建立国家制度按照四项原则召集起来的未来大会（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选举是怎样进行的），则将由没有信仰的甚至特别敌视东正教的人组成，而没有东正教也就没有俄罗斯了。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俄罗斯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东方合众国。

暂时我们处在"委员"——这是个丑恶可憎的、连俄国人都不懂是什么意思的词——省委员们和县委员们的控制之下；我们这里被任命为首长的是一位在县里搞卫生工作的医生，拿我们怎么办还

---

① 传说中9世纪上半期诺夫哥罗德的伊尔门斯拉夫人的首领，正是在那时请来了瓦里亚基人并建立了东斯拉夫人的国家。

② 在混乱时期之后，1613年召开缙绅会议，选举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为沙皇，由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

不清楚。但是，总的说来一切事件都正按着1789年大革命的老一套在进行，只不过在电报和电话的帮助下速度快些罢了。由于所有的军队都已叛变，一切在几天之内都结束了，只有极少的例外。全国本来应当是要屈服于实力的，而抵抗却毫无目的而且徒劳无益。时机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切都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前线，军队正在捍卫国家，对付凶恶的德国人，军队不能从那里撤离，它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战胜残暴的敌人。而整个后方则挤满了像在彼得格勒的那种部队，军官几乎全都是预备役准尉，就是说都不是军人，没有任何传统，纪律松懈，有点像罗马的御用军人，或者像1741年后的近卫军人①。而首领们在取得了政权的狂喜中，为了报私仇，正准备充分地向自己的敌人报复，就像国民议会一样，一切都仿佛是代表着“人民主权”。上帝的愤怒大矣，惩罚大矣。我们在精神上要坚定，要向上帝祈祷。

祝你健康。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3月6日

① 1741年政变中上台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女皇为报答拥戴她登上俄国皇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一个连而将其编为享有特权的近卫军。

№04472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3月13日）

亲爱的、深受尊敬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是否活着，是否健康？好几天没有你的消息了，所以有个念头总是令我感到不安，就是我们所经受的一切可能会有害地影响你的健康。愿上帝保佑，让那些已经掌权统治俄罗斯的人能够维护秩序，这比战胜德国人所需的秩序更加必要。狡猾的敌人精心考虑了时机并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俄罗斯前线，他们非常清楚：一支最英勇的军队在后方崩溃的条件下也无法坚持下去。已被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夺取的权力，已经在威胁着临时政府本身，而在乡村居民的愚昧群众中，已经出现了迫在眼前的像1905～1906年那样的浩劫和恐怖的火花。许多事都使人们担心：全面的无政府状态在逼近。新政权没有某种警察形式的实力，而警察却是世界上从英国和法国开始的所有文明国家都认为是必要的。新政权不能够对事业有所帮助，而只是局限于那些演说家劝说人们克制并不使用暴力的讲演，但是靠这种办法是长久不了的，愚昧人群已经胃口大开，于是抢劫的欲望也就几乎不加掩饰了。

只有上帝知道，以后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在精神上坚强起来吧。也许，照上帝的话说，这是一场从创世以来不曾有过而且将来

也不会有的大灾难。

祝你健康。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3月13日

№04473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4月5日）

亲爱的、深受尊敬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你生活得怎样？还有，你想什么时候离开彼得格勒？这里的天气很怪，在寒冷之后，纯粹是夏季才有的那种暖和突然地到来了。例如昨天，完全是6月的天气，荫凉地方是15度，又热又闷。我甚至期待来一场大雷雨（4月1日有过第一次雷雨），可是没有。日子过得很艰难，每天都在等待来自我们邻居的某些贪婪丑恶行为——农民抢夺土地，而且时常出现某些带头人的野蛮和无端的报复行为，群众对此则习惯地默不作声，消极地屈服于少数几个狂暴之徒。在他们之中，那种理智的、能使人缓和并克制膨胀的欲望的成分实在太少。在这方面我倒有些侥幸：有一名从萨拉托夫回家过节的聪明而有理智的士兵代表，使那些冲动的无赖们稍微安静了一些。这些无赖们不知为什么要逮捕我，并强迫我交出土地。星期一，即复活节前夕的傍晚，一群人来到我院子里，表示希望见见我并和我谈谈。我到院子里会见了他们，向他们表示了节日的祝贺，并和他们互吻了三次以示祝贺。之后，他们以非常有礼貌的方式"请求"而不是"要求"我把相当于我一半领地的一块土地"租给"他们作为草场和牧场，同时希望我无论如何不要为此做出什么举动，他们绝对按照现在成立的调解会议定的价格付钱。他们希望只在今年春、夏、秋三季租用。这一切都是在客气而和善的气氛中进

行的。最蛮横分子和他们率领的流氓无赖们都有所克制和彬彬有礼，但是必须看清他们和了解发生的一切，这样就会明白，拒绝这样的“请求”是不可能的，而且必须“吃了亏还要做出高兴的样子”①，同意所有这一切。

我相信，上帝会让我们很快见面的。我总担心你乘火车会受罪的，因为现在取消了卧铺车厢。告诉我你来莫斯科的时间。

祝你健康，事事如意。愿上帝保佑你。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4月5日

① 此处原文为法语。

№04474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4月27日）

亲爱的、深受尊敬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你近况如何，身体好吗？我们非常顺利地到达了罗曼佐沃[①]，而且令人惊讶的是，火车上很空，很好。可是到家里又和农民闹得不愉快：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去乡委员会报到的通知。乡委员会替代了调解会议。按惯例，调解办公室应该有土地所有者的代表参加，而我们这里的调解办公室全是由农民组成的，而且他们审议和决定那些他们感兴趣的村里的事情。例如，从我这里几乎是强制“租赁”的一块150俄亩的土地，他们决定只给我51个卢布的租金！这点钱还不够交土地税。他们从早晨9点到下午3点把我拘留在乡里又闷又热的地方，还好，给了我一把椅子。由于饥饿和闷热，我疲劳极了，晚上很早就躺下休息了，可是农民们又来要土地，而且还要那块已经种上苜蓿的地和一块耕好的准备种燕麦的地!! 真气人。而临时政府还号召多种地，不要留下一点空闲地。我根本无力和他们说话了，便要求他们明天再来。

总的来说，天气较冷，青草的生长和树叶的发芽都推迟了。今天已经是4月27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听见杜鹃和夜莺的叫声。从来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春天和这样的四月末，看来这是上帝的旨

① 瓦尔热涅夫斯基的庄园，在莫斯科省莫扎伊斯克县。

意，我们只能顺从了。

有施利培参加的27日的会议开得如何?

衷心祝你健康，万事如意。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4月27日

别列佐夫斯基说什么?准许穿皮靴了吗[①]?

① 当时谢列梅捷夫的腿受了伤，别列佐夫斯基是给他治疗的医生。

№04475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5月4日）

亲爱的、深受尊敬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离开莫斯科已经是第二周了，可是没有得到你任何消息！4月28日给你寄了一封挂号信，大概你已经收到，可能晚了一点，但这是现在信件常有的事。天气还是很冷，特别是早晨，所以你的库斯科沃[①] 之行应该推迟一点，因为在那儿房间里还会很冷很潮湿，在真正暖和之前，住在那儿对健康是不利的。

知道彼得堡的情况吗？一切都在无政府状态中破灭和呻吟。临时政府本身也开始崩溃。古契科夫[②] 已经不担任部长；科尔尼洛夫[③] 由于芬兰团不听指挥而辞去了军区指挥官的职务；莫斯科的小拿破仑格鲁吉诺夫[④] 也辞职了。前线一片混乱：开小差、和敌人友好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德国人正好利用了这种情况——拍摄地

---

① 谢列梅捷夫伯爵在莫斯科近郊的庄园，1918年起成为博物馆。

② 古契科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1862～1936），十月十七日联盟领导人，曾任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1917年3月至5月任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

③ 科尔尼洛夫，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1870～1918），步兵上将，1917年3月至4月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5月至6月任第8集团军司令和西南方面军司令，7月至8月任俄军总司令。8月末发动叛乱，试图建立军事专政。

④ 格鲁吉诺夫，亚历山大·叶弗格拉福维奇，莫斯科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根据临时政府3月5日的决定，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为临时政府委任的拥有全权的政治委员，负责当地政务。

形、探听军事秘密等等。在不久前我们的军队作战还不错的高加索，我们被迫放弃了穆什，退至季阿鲁河一带。多么耻辱！在这胜利即将到来、敌人已经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如何向盟国交代？用什么来弥补背叛遭受德军蹂躏和洗劫的不幸的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过错？加利奇、乌戈尔罗斯、察里格勒以及海峡等等——再也不能统一俄国领土了！真是耻辱。这样的事，大概还从来没有过。甚至在1612和1613年还保留了一个核心。而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核心？教堂没有人去了。这变化有多快；白发老汉比那些尚未受完教育的、仅仅受到社会主义报纸蛊惑的年轻人表现得还要激进。千百万农民大众一下子变成了只是渴望抢劫的最极端的社会主义分子，他们不管祖国是否沦亡，只要有公社就行。多么令人痛心啊！上帝任意惩罚我们到什么时候呢，是否因为我们的罪孽要让我们下地狱哪?!

写信告诉我你的身体情况。愿上帝保佑你。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5月4日

№04476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5月15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你的信收到了，很感谢你的来信。我已陷入做白日梦的境地，对周围眼前发生的事情，一点也看不到，听不到。生活竟落到如此地步——一切随上帝的便吧！在任何地方，在任何问题上，都看不到光明和欢乐。“农民”，就像卡拉姆津在他的小说中称谓的那样，只是考虑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别人的东西，使这些东西成为自己的。昨天，已是晚上11点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到我这里，不得不给他们一些干木柴。给了5卢布算是付了钱，这是平均价格的十分之一，木材商人要卖70卢布以上。在各种不同的村会上已经发出了呼声，要求将教堂圣像上的金银衣饰拆下来，用比较便宜的器皿更换银质器皿，而所有贵重的物品都应转为“人民”的财产！

很高兴，你现在已穿上真正的皮靴，因此能够来回走动走动。是不是你很快就能到库斯科沃去？寒冷天气一直在持续着，例如，昨天早晨的温度为零下2℃。今天稠李刚开始开花。可怕的冬季严寒看样子要毁坏生长果树的土壤，我很担心苹果树的生存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树液运动和冬眠苏醒的征兆。即便这将在晚些时候发生，那也一样不会有任何苹果能够成熟。

祝你健康和万事如意。愿上帝保佑你。

忠于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5月15日

№04477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5月22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一晃圣灵降临节已过去了，黑暗愈来愈浓了。在前线出现了某种类似静寂无声的休战的停顿状态。德国人将所有的兵力投向西部，拦阻英国人和法国人；意大利人顺利地向海边和的里雅斯特推进，但看来会受到阻拦，因为敌人在战略方面对于我们的千里战线已不再给予任何关注。在国内威胁我们的是全面的破产和贫困！今年被夺去了全部收益，明年将夺去全部财产。上天的愤怒毁坏了俄罗斯国家！它经过一千多年才逐步成长和巩固起来，但在近20年间，被摧毁了。那些曾同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一起建立了旷世奇功的士兵——拿破仑也曾想拥有他们——上哪去了？看看现在吧！只有彻底的崩溃和对可耻的农村公社的幻想——这是符合列宁的口味的。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你的身体怎样？5月15日暖和天气来到了，也许现在你很快就能去库斯科沃了吧。在“加伊”那里有过什么爆炸？“一天的难处就够一天操心的了”。现在简直是不得不一天天地打发日子，不去思考明天。过了一天，谢天谢地，还活着。只是每天都担心会发生某种不幸，这是很折磨人的。仅仅在梦中才能休息一会儿，尽量多睡一点时间。你的睡眠和尿糖怎样？

衷心地祝你健康。原上帝保佑你。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5月22日

№04478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5月26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有好长时间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你过得怎样，你身体还好吗？你去库斯科沃了还是仍住在莫斯科？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担心。我自己感到很不好，神经受到刺激，睡眠也不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周围的一切事情是如此恶劣，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上帝还容忍这些罪过，我们都还活着。

"农民"（卡拉姆津在小说中这样称谓他们）的情绪在逐日地变坏。按现今的说法，势必很快就会发生大规模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而按俄国人的说法，简直就是强盗袭击。昨天，一个大村庄（根本就不在我们乡）的全权代表来到我这里，要求将草场给他们。我的草场因被当地农民强占了几乎一半而留下的已经不多了。但他们说，我这里草场有富余，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只要养两头母牛就足够了，我应该将余下的卖出去，并不再向莫斯科出售牛奶。我对此当然不能同意，于是他们答应请某一位士兵代表来，让他来分析这个案件，并作出决断。这就是说，所有调解会议和土地委员会成为泡影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精神和观念很快深入到我们的地区，不断可以听到："打倒战争"、"让那些从战争中得利的人去打仗"、"我和我的妻子不需要海峡"、"富人们要从俄罗斯运出商品，而让我们去引颈送死"。耳闻目睹国家将因同德国人

单独媾和而全面崩溃和走向灭亡，是非常痛苦的！

上帝保佑你免遭一切灾难。祝你健康。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5月26日

№04479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5月29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刚往莫斯科给你寄出了一封信，就接到了你的来信，说你已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去了。愿上帝保佑你在那里安宁愉快地度过夏天。至于将我们从国务会议中逐出的问题，我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消息，看来，这已是既成事实（这也是令人惊讶的）。刚刚从报纸上读到了关于清除我们的两种方法的设想（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已经给你写了）：1）免去国务会议所有委任的成员，给他们规定最低的退休金。“最低的”是什么意思——不清楚（每年给省长800卢布——哈尔科夫省）；2）根据总的原则将所有委任的国务会议成员作为编外人员予以保留，即在一年之内按编外留用人员领取全薪，一年以后爱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们会遭遇到什么，不知道。如果你有什么消息，希望能告诉我。你在信中对我说，我应该设法争取退休金，可是到哪里，什么时候，向谁去争取呢???谁能保护我们呢?所有现在掌权的人都在设法尽快毁灭我们。夺取土地、抢劫所有收入、地方委员会禁止砍伐森林和拥有牲畜，然后像法国革命在1796年前夕所做的那样，迅速降低纸币的价值，这将不可避免地使我们陷入完全贫困化，使我们注定要饿死。一切随上帝的便吧……。

请写信告诉我，你在6月11日以前是不是会到库斯科沃去?

我很想再次同你会面。乘坐火车旅行是很困难的。暖和的天气终于到了，下了两场好雨。如果上天能再下雨，一定是皆大欢喜。苹果树遭受了很严重的灾害，许多已完全冻死了，大多数都受过冻。樱桃也遭到很重的损害，甚至还冻死了一棵樱桃树。

衷心地祝你健康。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5月29日

解除阿列克谢耶夫[①] 和列奇茨基[②] 的职务是对军队战斗力的严重打击，而鲁兹斯基[③] 因与古契科夫有个人恩怨而被解职！

① 阿列克谢耶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1857～1918）步兵上将，1915年起任大本营参谋长，1917年3月至5月，任俄军总司令。

② 列奇茨基，普拉东·阿列克谢耶维奇（1856～1923），步兵上将，曾任第9集团军军长，1917年3月至5月7日任西南方面军总司令。

③ 鲁兹斯基，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1854～1918）步兵上将，曾任集团军军长、西北方面军军总司令。

№04480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6月7日）

最尊敬的、最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一切愈来愈阴暗，日子愈来愈难过。只盼望上帝发慈悲并以这种期盼来振奋自己的精神。附近农民的仇恨是毫无理由的，也是不理智的。我曾一向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也从未审判过任何人。但现在，没有他们——从孩子到老人——不想干的或大或小的坏事。他们抱着一个愿望，这就是尽快使我破产，取消我经营乳品业的机会，夺走草场和捕捉牲畜，还威胁要抢走柴草。一些日常的小凌辱就不谈了。由教唆者组织的年幼儿童团伙在大白天冲进我的果园，当着我的面毁坏我栽种的树木和灌木，摘下全部上好的丁香，随即扔在那里。找村长说话也没用，反而引起讥笑。现在他们群起反对我的管家，他是一个“免服兵役的人”，完全不适合于服兵役。然而他们却派代表团去找政委，一定要让我的管家去服兵役，并最终得以取消了他完全免服兵役的资格——这本是由于他从小患有慢性病，根据法律和规则确定的——而只是给了他一个月的暂缓期。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我没有这样一位可靠而坚定的人，那么我的整个收成将会陆续被盗走，所有的一切都会失去。在目前这样的紧张工作阶段，找谁来替换他！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那还能用什么人呢？所有这些都使我疲惫不堪，心情压抑。无法向人寻求援助和保护……。请原谅我的诉苦，但悲伤的心情需要得到同情，而这种同

情只能从你那里得到。再次请你原谅。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抽出时间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去看你，因为未来是这样昏暗和充满着各种意外情况。

你身体怎样？睡眠好吗？尿糖多少？好长时间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

衷心祝你一切顺利。上天保佑你免遭任何灾难。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6月7日

№04481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6月16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很感谢你给我来信。谢天谢地，尿糖没有增加，睡眠也很好——这就提供和增强了经受非常难堪处境（我们竟然落到如此地步）的力量。无论是在戈斯托梅斯尔时期或拔都入侵之后，还是在17世纪的动乱时代，罗斯从来没有经历过20世纪的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完全的混乱，在1055年内用艰苦劳动建起的整个国家的崩溃和无政府状态。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竭尽全力在为威廉工作，而政府奉行托尔斯泰主义的“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原则，只是以“信念”在进行斗争！海军舰队涣散了。“乌克兰”分离出去了。关于芬兰人更没有什么好说的，甚至奥洛涅茨省的卡累利阿人也想分离出去！在前线出现了令人恐惧的事情：军队的大部分逃跑了并成为强盗。所有优秀的将官都被撵走，从最有才干的、掌握苏沃洛夫作战方法的开始，如尤登尼奇[①]；列奇茨基、阿列克谢耶夫、鲁兹斯基、海军上将高尔察克[②]，全都被撵走，暂时只留下一个布鲁西

① 尤登尼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62～1933）步兵上将，1915年开始指挥高加索集团军，1917年3月至4月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

② 高尔察克，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1874～1920）海军上将，黑海舰队司令。

洛夫[1]，还不知能否长久？……

关于我们，土地占有者，我还没有谈到。我们注定要当牺牲品，很快所有的东西，父辈和祖辈留给我们的一切，都会被毁掉，被抢光，被剥夺，我们将陷于极端贫困，还有可能被狂怒的人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追随者们杀害，现在他们多数是农民，几乎都是农妇。信念已经淡化，看看教堂里都发生了什么?!……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特殊时期，所有的一切都乱了套，越出了常轨。我感到非常须要与你会晤，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担心，情况（对我来说，它是很严厉很残酷的）不允许我在5日（你的命名日）前抵达米哈伊洛夫斯科耶。这将是很大的损失，但怎么办呢？但我仍然希望在7月份的稍晚些时候能到你那里去，届时面谈吧……。

祝你健康。上帝与你在一起。拥抱你。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6月16日

---

① 布鲁西洛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1853～1926）骑兵上将，1916年任西南方面军司令期间成功实施进攻战役（被称为“布鲁西洛夫突破”），1917年5～7月任俄军总司令。

№04482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6月26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严厉指责了我的悲观主义，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半辈子都生活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我很熟悉他们。我现在每天都看到和听到，俄罗斯人民已变成什么了，周围所有的生活准则怎样遭到破坏以及我们正陷入怎样一种深渊。我每天衷心地祈祷上帝，让俄罗斯生存下去，我相信，上帝出于仁慈心最终不至于毁灭它并将用神秘不解的办法拯救我们——一切随上帝的便吧。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暂且还看不到周围伤口已开始结疤的神圣中心。当然，进攻已经开始，如果这个进攻继续下去并发展成为整个前线的进攻的话，则6月18日和19日的辉煌胜利① 可能成为俄罗斯革命中的转折点。但不知预备队中有无足够“忠实的”部队，以便使它不致像去年在法国发生的那样仅成为一种“短促突击”。谢天谢地取得了胜利，而且胜利很振奋人。但很可惜，胜利不知怎么地没有对我们周围的农民（大多是布尔什维克）起什么作用，没有表现出任何喜悦，他们都在忙于抢劫。

难道你会认为，我没有设法争取去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我多年来一直与你一起在那里共度7月5日，但是今年是一个特殊年，农

① 1917年6月18日（7月1日），俄军西南方面军向奥匈军队发起进攻，并很快突破其防线。

民老爷不给离开家的机会——在我想外出的时候。就在今天，从格拉佐夫斯基乡特罗伊茨村来的一群农民（布尔什维克），塞给我一张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公文，上面允许他们夺走我的全部土地和为自己割掉全部青草——这是罗曼佐夫农民夺走我几乎一半土地后剩下的，还说过一个星期后要“为穷人”从我这里取走母牛和马匹。同时这伙人还大声喊叫，谩骂我，甚至还想捆住我的手，把我关起来，还威胁要把我的妻子投到河里淹死。从罗曼佐夫跑来了一些农妇，开始保护我们。罗曼佐夫的庄稼汉起先保持沉默，但很快就转向吵闹的人群一边去了。好歹他们走了，临走时宣布禁止我继续割我的牧场上的青草，还说过几天他们还要再来。同时，他们宣称，他们除了人民（也就是他们自己和本地士兵工人代表）外不承认任何政权，不承认政治委员和临时政府，认为他们代表“旧制度”。明天早晨我要去莫扎伊斯克向那个士兵代表苏维埃寻求保护。但是能管用吗？当然不能。就是这类所谓“过火行为”阻止我现在去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但我坚定地期待，当繁忙的割草期一过，即7月中旬，15日之后，我一定到你那儿去，必须同你会面，有好多事情要同你谈。希望你能理解我，今年的7月5日我没有在你那里，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祝贺你夫妇俩6月30日过结婚49周年纪念日。愿上帝保佑你们非常健康地迎接50周年纪念日。

拥抱你，你诚挚的朋友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6月26日

№04483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7月1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家庭祝贺你的命名日。愿上帝保佑你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使我感到无法形容难过的是，在已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不能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和你一起过这一天，而且这是发生在度日如年的今年——未来只有上帝知道，而不会受到任何人为预计的影响。为了尽力保护自己的财产免遭彻底抢光，哪怕能暂时保住些什么东西，我现在被迫连续不断地往莫扎伊斯克跑动，拜访乡委会、调解会议和土地委员会。总的来说我们县比较平静，只有邻近的格拉佐夫斯基乡折腾得很厉害，这个乡不知为什么特别起劲地攻击我，虽然我来自博罗季诺乡，也没有大的庄园——布尔什维克先生们对付大庄园主是这样的。

谢天谢地，我们的进攻没有变成短促突击，而是在可敬的领导人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指挥下发展成为沿广大正面的强大进攻，6月27日，即在波尔塔瓦日，俄国军队再次攻克加利奇。这是一件很大的喜事，但最终由于在作战时发生了某些上校拒绝支援已经疲惫的部队的事件而蒙上了阴影：这不是在后方，而是在前线——可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他在乘坐被封闭的列车经过德国时被威廉收买）的宣传力量有多么大。我特别难以理解在近卫掷弹兵团发生的不得不动用武器来镇压的暴动。我的祖父曾指挥这个团，我的父亲

也曾在这个团服过役！这个团一直是个模范团，是从彼得格勒补充来的人员败坏了这个团。

我很盼望在15日后、伊利英日前，在割草繁忙期结束和弄清情况后，用你的汽车，同瓦尼亚一起经过莫斯科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你那里去。像以往那样乘火车旅行，在目前条件下是很糟糕的，对身体也有很坏的影响。拥抱你。上帝保佑你免遭一切灾难。我将等待与你见面，我感到有一种与你见面的强烈愿望。在相互交谈中会保持经受艰难困苦的力量。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7月1日

№04484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7月12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令人恐惧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地打击我们的祖国。由于部队叛变、布尔什维克的说教、纪律被破坏等等，军队完全崩溃了。德国人充分地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的灾难性后果。前面还会出现哪些损失呢？上天昭示：前线被突破，敌人以每天25俄里的极快速度向纵深推进。军官和指挥员死去。6月18日的全部战果和科尔尼洛夫的第8集团军的进攻都化为乌有，所有的牺牲都已白白浪费！这是多么糟糕，多么丢脸！世界上最优秀的部队转变为一群强盗、掠夺者、暴徒，他们从战场上跑回来，专门进攻自己祖国的和平居民。上天的愤怒还在继续惩罚俄罗斯①。而国内的事态是：临时政府瓦解、全部政权转入社会主义者的手中②、小俄罗斯和芬兰分离出去、不等立宪会议召开就宣布共和国成立、不抵制抢劫和掠夺等行为、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没有合法的政权——它是士兵代表苏维埃以未经官方许可的方式夺取的。所有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我们祖国早已无法忍受的严峻形势。

---

① 指德奥从7月6日（19日）开始向俄西南方面军进行反攻，俄军无力抵抗，迅速败退。

② 七月事变后，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于7月7日辞职。7月8日，克伦斯基就任总理。由于立宪民主党人此前已退出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基本上是由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组成的。

我还在盼望到你所在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去……。我想在7月20日到21日的这个夜间去莫斯科，如果可能的话，21日傍晚坐你的车抵达米哈伊洛夫斯科耶。9日我去了卡洛格斯基修道院。强盗们曾去过那里，摧毁了教堂，抢去许多东西——贵重的法衣和圣像、器皿、放法器的柜子、银质灯、一只金灯、二分之一普特的银子。大家都知道，这些强盗都是从监狱中放出来的服苦役的邻近农民。当然，他们都隐藏起来了，并将抢来的东西随身带走。

自从彼得罗夫日① 起，除了7月8日一天，每天都有雨或雷雨，有两天还下了冰雹，幸好，什么也没有损坏。所有的工作都已停下了，干草收割已经延缓，而黑麦很快就要成熟。从昨天开始天气变冷了，但雨未停止。今天，整天下雨，倾盆大雨。

祝你身体健康。期待着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同你见面。

你的诚挚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7月12日

---

① 彼得罗夫日——俄历6月29日。

№04485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8月9日）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一晃已经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得到你的任何消息。你过得怎样？你的身体怎么样？时光流逝，但却没有带来任何令人欣慰的事情。任何地方、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糟糕，我感到，情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形势会落到更惨的境地。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只有上帝自己知道！

从8月1日开始天气非常好，虽然来得晚了一点，却提供了收割庄稼、耕地、播种和继续进行由于7月份阴雨而延误的割草工作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必须立刻去做，而现在缺少人手和马匹，“布尔什维克同志们”又威胁说，如果在8月15日前没有收割完，那么他们就会来收割并归为己有。政权在口头上反复说禁止使用暴力，但事实上暴力却肆意横行。政府由于自己实际上无能为力而逃避责任，不提供任何援助。肆无忌惮和兽性勃发的群众意识到了这一点，直接宣布现在是“他们的时代”，并广泛利用了动乱时期。到处是抢劫和各种各样的残暴行为。米哈伊洛夫斯科耶附近平静吗？前几天，在莫斯科逮捕了一些强盗，他们在波多尔斯克县离莫斯科50俄里的卡卢加公路上进行“剥夺”，并为此目的花2千卢布在夜间租用了一辆汽车。不知道他们算计的是哪个庄园。

在罗马尼亚，形势看来也不很稳定。所有的人都从那里迁出了。而在俄罗斯国家范围内常常会碰到流氓活动。

衷心地祝你健康。上帝保佑你免遭一切灾难。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8月9日

№04486

瓦尔热涅夫斯基致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信

(1917年8月6日)[①]

最尊敬的、亲爱的朋友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莫斯科会议[②]已经开幕了——话很多，非常多，也做了很多，但余下的也不少，能不能从言论转变为实际行动——这是一个必须立即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所有的发言都已刊印发表了，此外报纸必须经过一昼夜才能传到我们这里，而且在节日后的几天根本就不发行，所以我们要到18日傍晚时分才能了解到会议的结束情况。根据会议进程来判断，不能指望富有成效的结果：左边的一半，即现在拥有全部政权的所有社会主义者，不赞同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③]，而马克拉科夫[④]和舒尔金[⑤]观点鲜明的发言又遭到敌视。很明显，“视情况而定”的著名公式在社会主义者的心中仍在发挥效

① 此处日期疑有误。从信中所述内容来看，应是8月12日（俄历）国务会议开幕之后。

② 1917年8月12至15日（公历25至28日）举行的莫斯科国务会议。

③ 卡列金，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1861～1918），骑兵将军，时任顿河哥萨克军队统领和军政府首脑。

④ 马克拉科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1871～1918）曾任内务大臣，1915年开始是国务会议成员。

⑤ 舒尔金，瓦西里·维塔利耶维奇（1878～1976），国家杜马右翼领袖之一，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

力，在马克拉科夫发言过程中响起的“庄稼汉的部长切尔诺夫[①]万岁”的呼声，证实了这一点。

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很不放心，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4个星期了，我一直没有得到你的消息。尿糖怎样？波克罗夫斯基到你那儿去了吗？我从你那儿回来经过莫斯科时碰见他了，他准备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去。

8月份天气是非常好的。多亏上天关照，能顺利收割黑麦、燕麦和剩下的草了。播种顺利结束了，幼苗长得非常好。今年我们这里幸好没有苹果，否则所有的苹果树都会完蛋。在郊区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一群少年匪徒为了偷苹果而锯倒果树！我们这里的菜园都被盗窃一空，黄瓜、豌豆、豆荚、胡萝卜和其他东西都被消灭了。

盼望9月份能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与你见面……

祝你健康。愿上帝保佑你免遭一切灾难。

你诚挚的阿·瓦尔热涅夫斯基

1917年8月6日

① 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1873～1952），社会革命党的创建人之一，时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

【专题说明】

库罗帕特金关于1917年事态的日记

（1917年5月至10月）

阿·尼·库罗帕特金（1848～1925），俄国步兵上将，先后毕业于巴甫洛夫军校和总参军事学院。曾参与1866～1883年间征服中亚的军事行动、1877～1878的俄土战争。1898～1904年任军事大臣。日俄战争期间在中国东北指挥俄军作战，曾任俄国满洲军总司令、俄国远东武装力量总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集团军司令、北方战线司令、土耳其斯坦总督。在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对旧军队将领的清洗中被解除职务，回到他在普斯科夫省霍姆斯克县的舍舒里诺领地居住。本组文件收录了库罗帕特金在1917年5月20日至10月23日期间的13篇日记。这些日记记述了他在俄国历史转折时期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乡村、首都、前线和后方的一些人物、事件和现象的感受和评价。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乌传衮翻译）

№04042

关于 1917 年 5 月至 10 月事态的库罗帕特金日记

（1917 年 5 月 20 日至 10 月 23 日）

彼得格勒 1917 年 5 月 20 日

从克伦斯基巡视过的南方和西南方面的集团军和城市传来的是好消息：人们热烈欢迎他，应允向前推进。但人们都还只是在说，不停地说，可我们的盟友，特别是法国人，正在流血…… 在彼得格勒，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日见恶化。犯罪事件不断增加。酗酒，放纵。甚至如斯柯别列夫[①] 和切尔诺夫[②] 这样的部长们，也开始——照他们的说法——对社会的资产阶级部分采取不妥协的立场。他们中的一个在强迫居民购买“自由公债”[③] 之后又提议为改善财政状况而从所有有钱的人那里弄钱，另一个则鼓吹必须不予任何补偿地没收地主土地以解决农业问题。

当局依然无所事事，或者只是提出要求。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所有的命令、指示都无人执行。无政府主义已经出现。彼得格

① 斯柯别列夫，马特维·伊凡诺维奇（1885～1935），1903 年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孟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5 月至 8 月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

② 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1873～1952），社会革命党的创建人之一，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5 月至 8 月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

③ 临时政府于 1917 年 3 月 26 日（4 月 8 日）决定发行 54 年期的公债。

勒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也不断丧失威信。人们不再听从这些代表们的话。喀琅施塔得根本不服从彼得格勒。

谁也无法拯救那些无辜受难的军官们，他们每天都在遭受各种侮辱。

外省也传来使人不快的消息。对现实的怀疑和对未来的恐惧开始取代民族激情。农村还在屏息观望，不胜苦恼地思索着：是开始分地，把超过切尔诺夫先生们向人民宣布的标准的地主、商人以及农民的一切统统烧掉、毁掉，还是开始惩罚挑唆者，然后到立宪会议提出要求："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但必须保留沙皇"。有一个排的水兵举行示威游行已经第三天了。他们举着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① 的肖像，手持武器，走在大街上。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仍然挤满了城市，电车和街心花园里到处都是。他们很少学习，而学习的地方却没有军官在场。在公布《士兵权利宣言》② 以及雅库博维奇上校为使士兵开始执行敬礼制度一事向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提出请求之后，敬礼的情况未见增加。但在某些场合，水兵也开始敬礼了。

电车上秩序有所好转。昨天，一名士兵站起来给我让座。几天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

5月22日

昨天，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西韦尔斯③ 告诉我说，来自前

---

① 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1898年至1917年在俄军中服役，曾指挥骑兵师、骑兵军，最后任骑兵总监。

② 指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于3月1日（14日）发布的一号命令。它使军队中的士兵委员会合法化，给予士兵公民权利，并使士兵在执行勤务以外的时间里享有与军官平等的权利，废除军阶称呼等。

③ 中将，时任北方战线参谋长。

线的切列宾尼科夫（好像是这个姓）将军，一个由 4 个师编成的军的参谋长，谈到这样一件事：军的士兵委员会决定把第 43 师从作战第一线调出，作为预备队，而由相邻的第 37 师沿战线展开，占领空出的阵地。

当第 43 师正要撤出并充任预备队时，第 37 师的委员会却决定不接替第 43 师的位置。参谋长和军官们花费了两周时间才说服各团同意接防。这个军部署在西南战线南段，在喀尔巴阡山区。每个师至多防守 25 俄里宽的正面。要经过 100 俄里的野战铁路才能到达铁路线，只有那里有一些可以使用各种运输工具的通道。交通十分困难。敌军很弱，但士兵们不愿意进攻。他们已经在敌方地区，这使他们更加坚信可以留在原地不动。

根据其他消息，北方战线有一些部队倾向于转入进攻，但那里各个连的编成只有 80 人。

补充连队还在路上就四处逃散。到达战壕的只有写着“把战争进行到胜利”、“一切为了祖国 ”等鼓动口号的宣传画。

在战壕里，人们看得最多的是《真理报》。伴随着进攻的将是许多人的死亡，报纸劝告他们不要作战，要分田分地、没收资本；鼓动他们进行斗争，但不是同德国人作战，而是同资本家斗争……

彼得格勒情况不好。斯柯别列夫和切尔诺夫在发表愚蠢的言论，挑动阶级仇恨和内讧。他们只是顺便提及必须获得战争胜利，但毫无节制地大肆宣传必须无偿地没收全部土地。

喀琅施塔得分离出去了。它通过决议不承认临时政府，只承认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威胁说，要派出铁甲舰，把尼古拉二世弄到喀琅施塔得去。它还威胁说，要炮轰彼得格勒。本来也可以用饥饿困死彼得格勒，但据说城里有 6 个月的粮食储备。

越来越多的人惊慌失措。据说，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也陷于恐慌，并已大大向右转了。据说，在团队里正在开展工作，准备严

厉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他们积极发动的话。哥萨克正在调往彼得格勒途中。“野蛮师”[①]已经到达。

科诺瓦洛夫[②] 因为无法与斯科别列夫合作共事而离去了。

克伦斯基已经返回。我还不知道，他是否对自己的视察感到满意？高加索第3军因克伦斯基鼓舞部队进攻而授予他二级（士兵级）格奥尔基勋章。让我们拭目以待：是这个优秀的军将会奋勇前进、作出表率，还是克伦斯基的讲话听过就算。

昨天，邮电总监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艾列尔将军来我这里。他说起，他们新的邮电部一片混乱。策列铁里[③] 不干事情，却要求任命第四个部长助理。下级职员不再听话。大家都不好好工作，还一致要求提薪。年度预算增加了6500万卢布，还是不够。提出了种种不可思议的要求，如果予以满足，那么仅仅对邮电部门就要增拨4亿卢布。目前，莫斯科正在召开邮政职员代表大会。（每天）送5次信改为送2次。未曾分检的信件堆积如山。

昨天，捷列申柯[④] 派B.O.科列姆来同我谈论如何在布哈拉实行新体制的问题[⑤]。同他一起工作了2个半小时。总的来说，我的意见是应当在挑选人员和确定活动纲领方面给地方上更大的自由。我建议要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布哈拉的新布哈拉党[⑥] 人数极少，

---

① 由北高加索地区山民组成的骑兵师。

② 科诺瓦洛夫，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1875～1948），俄国最大的纺织厂主，大地主，进步党领袖，第四届国家杜马中“进步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二月革命后曾任第一、二届临时政府工商部长，最后一届临时政府副总理。

③ 策列铁里，伊拉克利·格奥尔基耶维奇（1882～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5月参加临时政府，任邮电部长。

④ 捷列申柯，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1886～1956），俄国最大的糖厂主，接近进步党，二月革命后先后担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

⑤ 指临时政府在布哈拉推行的使其社会制度民主化的运动。

⑥ 指“青年布哈拉人”，这是一个成立于1916年的布哈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

因此不能强制推行居民群众反感的和不理解的新事物。

目前，主要的是不要触及宗教方面的问题。对于涉及宗教的问题，如学校和司法（伊斯兰法典），要特别谨慎。要始终牢记，土耳其斯坦各州的穆斯林羡慕布哈拉的某些制度，如强大的教权（卡兹－卡利扬），监督道德风尚的强有力的政权（拉伊斯），以伊斯兰法典为基础的强有力的审判机构，司法也服从卡兹－卡利扬，从属于它的还有学校。只有随着教育的发展，才能消除群众的愚昧，布哈拉生活中许多过时习俗的影响也才会减弱。

现在就想通过新布哈拉党人的劝诱或倡导来削弱这些习俗，则可能引起混乱和流血。不过布哈拉人在经济方面又羡慕当地的俄罗斯人：缴纳赋税、经营农业和工业。

这正是目前首先应该给予重视的问题，即明确提出使布哈拉居民群众富裕起来、幸福起来的目标 。

现在，布哈拉的28个别伊① 部落，可以说是租给了各个别伊。在从每个居民那里征收了规定的大量钱款和贡礼之后，别伊们还要把所有剩下的东西都征收归己，把人民抢劫一空。所以，我建议首先在各个别伊部落的中心成立部落的（即县一级的）地方自治会议，选出地方自治会议议员，再从他们之中选举地方自治管理机关和主席。这些地方自治会议将不会由城市无产者或工人组成——因为在布哈拉这类人极少，而主要由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组成。最好把征收税赋、编制预算、审查开支、管理道路等事务交给地方自治会议和地方自治管理机关。在布哈拉召集边疆区地方自治会议和边疆区苏维埃或地方自治管理机关的会议。

俄罗斯的派驻代表在各个领域的管理方面都应有顾问。主要是财政、水利、道路交通、行政、司法、国民教育。

---

① 对小封建主的称呼。

5月27日

刚从外交部长捷列申柯那里回来。他请我谈谈对于海峡事务的意见。他首先概括地对我说了以下内容：根据在他之前达成的协议，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要求获得整个色雷斯、两个海峡、亚洲沿岸的一部分和达达尼尔海峡前的岛屿①。英、法两大国表示同意，但把欧洲沿岸的割让地区压缩到米太一线。而我们本可以成为察里格勒地区的占有者的。根据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实施占领要在这个新的领地维持一支30万人的军队。如今，捷列申柯另有一套计划和一番说法。他希望我们的正在不少地方退却的高加索集团军能转入进攻，那样便可以同土耳其单独媾和，从而导致结束战争。土耳其已经精疲力竭。美国人将向它提供财政援助。土耳其将保住自己的领地，但会保证俄国通过海峡的绝对自由，并给予在亚美尼亚的某些权益。对海峡的监督将在当地由一个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没有提到希腊）参加的国际委员会负责。按照捷列申柯的说法，我国政府现在追求的目标是：继续进行战争，与盟国密切配合并转入进攻。在东方问题上，则是在巴尔干和土耳其亚洲部分制止泛日耳曼主义的政策。为此，起先的设想是把土耳其人赶到亚洲，只给他们留下小亚细亚一块不大的土地。现在考虑把土地留给土耳其人，只由相关大国的代表组成一些监督机构来保证海峡的通航自由。我先简要回顾了东方问题的发展过程，然后作了回答。特别详细地说明了海峡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对于俄国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困难所在。提到了亚历山大三世的观点，以及有关通过登陆作战攻占

① 这里指的是俄国对于土耳其在巴尔干和小亚的领土的要求。这一要求由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在1915年3月首次向协约国提出，并在二月革命后由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科夫在4月18日的照会中重申。

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的准备工作。我向他介绍了那时我参加这项工作的情况①，以及 1885 年乔装成牲畜收购商的 A.H. 亚洛佐前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情况。他曾两次遭到逮捕。标记了欧洲一侧沿岸的地形。鲁梅里——费纳尔——基利斯——贝尔格莱德森林，布尤克——捷列以南的诸高地。在亚洲一侧，我标注了从贝伊科斯通向里瓦河口的相应地段。非常重要的阵地。我向捷列申柯证明，必须通过诸如租借或者赎买的办法获得这一带阵地。否则，任何委员会也无法缓和黑海的令人不安的局面，说不定很快又要兵戎相见 。

拥有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阵地，我们也就能够对目前已丧失经济价值的君士坦丁堡施加影响。利用这种影响，我们便能保证自己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航行自由。在这种条件下，也可以把土耳其人留在欧洲一侧。不过我还是表示意见说，对问题的这种解决办法只能实现暂时停战，而俄国须要充分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拥有进入爱琴海的出海口。

对于俄国总的局势，捷列申柯较为乐观。他说，局面大有改善，军队将会发起进攻，土耳其斯坦的情况开始好转，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形势也有望出现向好的方向的转折。他说，经过 3 个月的革命，“所有人都向右转了”，开始认识到“土地和意志”还不是无政府主义，等等。

关于我，他说将吸收我参与工作，但不问职位。

彼得格勒　6 月 17 日

在舍舒里诺村住了两周。居民情绪激动，不过除个别人以外，

① 指俄军总参谋部为制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实施登陆作战的计划而组织的对土耳其黑海沿岸防务的侦察。当时正在总参谋部任职的库罗帕特金少将受命参加了这项工作。

都不赞成骚乱。我只谈我们教区的情况，在那里我得以了解人心所向。讲话的人很多，不过大都是成熟的人。当选的人也讲了话：地方自治管理机关主席茹可夫和民选法官托尔斯托夫。两人都是农艺师。对于无政府状态和缺乏坚强政权的不满情绪在增长。认为过去更好的说法越来越多——人们这样对我说，我自己也常听到。干活好的人，特别是农民，对于他们的劳动成果贬值非常不满。乡粮食委员会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走了他们的粮食。把粮食分给了那些有地不种而挣工资的人，特别是那些在森林里采伐“造纸木料”的人。在那里每人每天可挣到15卢布。此外，在对征收的粮食只付给很低价钱的同时，卖给农民的所有必需品——包括工具、食品、衣服、鞋子——却价格昂贵，而短工们又向他们索取高额报酬——一个人带一匹马每天要8卢布，男劳力3卢布，妇女2卢布。

人们一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希望土地社会化。什么东西都很贵。面粉没有了，麦子也没有了。荞麦要卖到20卢布一普特。已经不能保证居民7月份的粮食了。形势紧急。天气酷热。春播作物开始枯萎。只下了一次雨。我在那里捕过鱼，有几天干6个小时。捕到的鱼达1.5普特。

去了陆军部长助理雅库博维奇处（克伦斯基外出了）。

他告诉我说，前线已经开始实施炮火准备。在他看来，如果示威游行推迟举行，胜利的消息就会到来，而这将会使局势缓和下来。

他承认后方十分混乱。他已决定派一批满员的后备团去补充前线。

根据我的建议，下达了把西伯利亚后备第一团从土耳其斯坦调出的命令。但部队拒绝出发，讨价还价，说要留下来警卫土耳其斯坦。科列姆和达夫列特申将军在6月16日讲了许多涉及亚洲事务

的话。

科列姆说，我们在波斯的部队，即巴拉托夫以及后来的巴甫洛夫的部队，胡作非为，导致了库尔德人的起义。他们殷勤地、示威式地让一名带有 6 个警卫的英国军官通过，还袭击我们的后勤部队。巴甫洛夫行动迟缓不力，使土耳其人有时间调集兵力，以致高加索骑兵第一师在吉阿纳附近强渡失败。又把巴拉托夫派去了。

土耳其斯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之中，在因庄稼颗粒无收而出现饥荒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骚乱。达夫列特申对于土耳其斯坦的事态十分悲观。谢米列奇耶州的局势最为紧急。俄罗斯居民受到休假在家的士兵们的怂恿，对吉尔吉斯人公开表现出不可调和的仇视。

特内什巴耶夫工程师，一位吉尔吉斯爱国者，也是一名理智的活动家，认为惟一的出路是建立两个县治：俄罗斯人的普热瓦利斯基县和吉尔吉斯人的纳雷姆斯基县。我一度也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今天傍晚和儿子从塔夫利达花园出来沿基洛奇纳雅街散步。满街都是闹哄哄的士兵。在我们前面有 3 个士兵在谈论未来的事。其中一个很果断地回答同伴说，不能不带武器就离开军队，而要把枪带上，“就如各连队决定的那样”。“要吓唬吓唬资产者，整一整他们，同他们算清账”。他的同伙们沉默不语。我们绕开了这些坏蛋。他们考虑的不是在前线作战，而是在俄国内部制造流血混乱。

报纸上刊登了第 7 集团军一系列决定性行动中的第一次的情况：第 12 和第 13 西伯利亚步兵师的各团被配备有炮兵的骑兵部队包围了，接着炮兵开火了。在此之后，胆小鬼和叛徒们投降了。报纸还补充说：“不曾流一滴血”。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不能谈论流血。

今天同国家杜马议员曼瑟罗夫一起呆了2个小时。作为曾经在土耳其斯坦任职的人，他想听听我对于土耳其斯坦局势的看法。之后，他自己相当详尽地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与德国相反，俄国并不存在引起阶级斗争的基础。这是因为我们那些脱离俄罗斯而侨居瑞士的搞政治的知识分子感染上了一种认为为了民主原则的胜利必须在广泛意义上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国际主义思想……

曼瑟罗夫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十分悲观。按照他的看法，立宪会议是开不起来的。从目前情况看，将会出现流血，而专政也是可能的。钟摆按革命方式向左摆动的幅度已经达到了最高极限，在其自然运动中将向后划出同样大的弧度。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曼瑟罗夫。他1908～1911年间在撒马尔罕任职。看来是一个大理论家。但能够影响别人。

忘了补充一点，在韦尔内，前谢米列奇耶总督兼哥萨克军统领福尔包姆的遗骸被挖了出来，并在市内被糟蹋了很长时间。人们甚至拒绝在公墓给这个忠实的工作人员一个地方。最后有一个人把他葬在自己的私人花园里了。

正是在这个韦尔内，居住着他的妻子和包括一些幼儿在内的一大家人。他们一直非常和睦亲密和道德高尚地生活在韦尔内，成为所有人的表率。

福尔包姆去世过早，他在对德作战时死于毒气。

今天在电车上我亲眼看到，一个女售票员拒绝一名士兵从站台进入已经挤满的车厢，要他付钱。当士兵粗野地回答说他坐车不付钱时，人们大声呼喊，支持售票员。站台上几个衣着普通的人愤怒地骂这个士兵是流氓，呼叫说当兵的使俄国蒙受耻辱，要这个士兵下车，并用手势威胁他。这个无赖有些胆怯，悻悻地跳下电车。对士兵的愤怒不断增长。

舍舒里诺　7月24日

令人心情沉重的日子。我们在西南战线上的几个集团军，除了英勇牺牲的几支部队以外，表现得十分可耻。

克伦斯基的夸夸其谈无助于制止军队瓦解。军队瓦解的主要罪魁祸首——彼得格勒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陷入窘境并威信扫地。它正在和克伦斯基商议恢复死刑和成立有资产阶级人士参加的政府机构的事。

如果我们在前线战败并签订耻辱的和约，随着被惯坏的士兵回来，俄国将被劫掠一空，血流遍地。必须尽快用强力而不是语言来恢复铁的纪律。有自觉性的士兵（不是指布尔什维克）能够帮助军官们做到这一点。

但是，必须停止破坏高级军队首长的威信。他们正像棋盘上的小卒子一样被人摆布，甚至连曾给俄国带来许多欢快时刻的功勋卓著的布鲁西洛夫① 也被粗暴地撤销了最高总司令的职务。

由于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作战，当前作战局势十分严峻严重。我的全部思想仍然集中在前线，和军队在一起。科尔尼洛夫② 至今为止并没有履行让我去指挥一个军的诺言。就此问题给阿列克谢耶夫③ 的信也未起作用。

昨天得知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最高统帅以后，给他发去一封电

---

① 布鲁西洛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1853～1926），骑兵上将，1916年任西南战线司令期间成功地实施进攻战役（被称为“布鲁西洛夫突破”），1917年5月至7月任俄军总司令。

② 科尔尼洛夫，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1870～1918），1917年3月至4月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5月至6月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和西南战线司令，7月至8月任俄军总司令。8月末发动叛乱，试图建立军事专政，遭到失败。

③ 阿列克谢耶夫，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1857～1918），步兵上将，1915年起任大本营参谋长，1917年3月至5月任俄军总司令。

报，内容是："作战军，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刚刚在村庄看到关于您的任命的消息。衷心表示祝贺。为军队和祖国而感到高兴。我牢记我们在彼得格勒的谈话。我身体健康。相信军队能够恢复原先的威力，相信自由的俄罗斯必将胜利。地址：普斯科夫州，舍舒里诺村，库罗帕特金。"

9月10日

科尔尼洛夫对我的呼声没有作出反应。我写信给亚库博维奇少将，请求任命我为军长，如果有可能，任命为掷弹兵军军长。9月1日，亚库博维奇给我发来回信如下："现将我从大本营收到的电报向您通报：库罗帕特金将军业经最高总司令下令列入军长候选名单。让他指挥掷弹兵军是不可能的，因为已在7月31日任命赫罗斯季茨基少将担任这一职务。亚库博维奇。"

几天以前，亚库博维奇曾向我通报说，克伦斯基表示同意任命我为军长，而在此之前，4、5月间，他还是不同意的。现今俄罗斯上空已是雷电大作。首先，德国人几乎未遭受我方任何抵抗就控制了里加的战略要地。在伊克斯居利面前，叛徒和懦夫不经作战就放弃了难以攻克的阵地。一名被俘的德军士兵说，强渡德维纳河的那个团只有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而我们的部队不是设法堵住突破口，而是放弃了所有的阵地，几乎像逃跑一样可耻地一下子后退50俄里。如果德国人真有实力的话，他们本可以不停顿地直逼彼得格勒和普斯科夫。所幸的是，德国人停了下来。军队开始恢复，最近几天甚至在一些地段转入了进攻。在文登以西受阻。在泽契沃利德附近正进行激烈的战斗。普斯科夫和彼得格勒一片惊慌。在舍舒里诺已经有逃难来的人，他们带来的消息说，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普斯科夫。其他战线上暂时无事。在罗马尼亚前线，我军进行了相当有力的抵抗。德国人从多瑙河下游到奥得萨最近处只有200俄

迂回纳尔瓦阵地。在芬兰登陆。攻占喀琅施塔得。攻占彼得格勒。

第二种计划：把我们和罗马尼亚军队赶出罗马尼亚。同罗马尼亚单独媾和。把它的力量用来对付我们。攻占奥得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攻占克里米亚半岛。在彼列科普巩固阵地。对高加索集团军右翼发起登陆作战。把高加索集团军赶出土耳其。把我们赶出波斯。使波斯以及阿富汗加入同德国的联盟。土耳其斯坦的暴动。使俄罗斯失去这个边区。高加索的暴乱。把高加索从俄国分离出去。如果德国人错过了按第一种计划开始行动的时机，他们必然会按照第二种计划实施作战。

对付这两种计划的主要手段，是整顿我们的军队。我担心的是，克伦斯基所依赖的、维尔霍夫斯基想依赖的手段并不可靠。把保卫革命置于保卫祖国之上，士兵的领导权即士兵专制，苏维埃和委员会的决定性作用，不取消一号命令，只有士兵权利宣言而没有关于其义务的宣言，指挥人员的作用削弱，各级政委对部队首长的监督，后备部队的腐败，不能撤消已经腐败的彼得格勒及其周围地区的卫戍部队，等等。

我认为，150 万美军和 50 万日军的新增兵力参加作战行动，是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这 200 万精锐的生力军应能突破德军的钢铁阵地，并随着所有力量都转入进攻而击溃德军，攻克柏林，推翻德皇，并把德国和奥地利变为共和制国家。

9 月 18 日

8 月份我在霍尔姆时，曾同一个踏实的农民谈过话。他向我抱怨说，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权和士兵们的胡作非为，农村出现了混乱和专横的现象。他几次用“在风俗败坏时”的说法来代替“在革命发生时”。十分形象和准确。

昨天，祖巴列夫的一位居民，一名稳重的士兵，对于赏赐的自

的压力下，他并没有迎合科尔尼洛夫，而后者则试图推翻克伦斯基并自己掌握独裁权力。

护民官克伦斯基对军事一无所知，却担任起最高总司令职务。他任命曾短时间担任过莫斯科军区司令的维尔霍夫斯基[①] 少将为军事部长。这位活动家采取的最初几个步骤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不安。他在一次演说中拙劣地自我吹嘘说，他在3个月时间里就按照革命原则在莫斯科建立起了强大的军队。但实际上，这支“军队”只会勉勉强强地举着红旗走分列式……在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或者执委会上阐述自己的纲领时，维尔霍夫斯基向布尔什维克“讨好”，说他在自己的活动中也将依靠他们。按照他的意见，从阿列克谢耶夫起，所有长官都应撤换，由那些他在任职期间选中的年青人来加以取代，等等……

我们可怜的军队啊！为了使它得到加强并成为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力量，如果吸收40万日本人参与战斗行动是非常好的。关于这一点我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就给雅努什凯维奇[②] 写信谈到过。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将会起到德国人对奥地利人所起的作用。

在俄国军队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德国人可能制订出最大胆的计划，其中主要的就是攻占彼得格勒，并把芬兰甚至瑞典吸引到自己一边。收回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占领的德国人和芬兰人的土地。用自己的海军作战。实施大规模的登陆战役。首先，攻占德文斯克以及德维纳河一线，作为德国未来的边界。攻占雷瓦尔。登陆

① 维尔霍夫斯基，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1886～1941），1918年7月至8月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后，晋升为少将，任临时政府军事部长。

② 雅努什凯维奇，H.H.（1868～?），步兵上将，1914～1915年间任总司令部参谋长。

迂回纳尔瓦阵地。在芬兰登陆。攻占喀琅施塔得。攻占彼得格勒。

第二种计划：把我们和罗马尼亚军队赶出罗马尼亚。同罗马尼亚单独媾和。把它的力量用来对付我们。攻占奥得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攻占克里米亚半岛。在彼列科普巩固阵地。对高加索集团军右翼发起登陆作战。把高加索集团军赶出土耳其。把我们赶出波斯。使波斯以及阿富汗加入同德国的联盟。土耳其斯坦的暴动。使俄罗斯失去这个边区。高加索的暴乱。把高加索从俄国分离出去。如果德国人错过了按第一种计划开始行动的时机，他们必然会按照第二种计划实施作战。

对付这两种计划的主要手段，是整顿我们的军队。我担心的是，克伦斯基所依赖的、维尔霍夫斯基想依赖的手段并不可靠。把保卫革命置于保卫祖国之上，士兵的领导权即士兵专制，苏维埃和委员会的决定性作用，不取消一号命令，只有士兵权利宣言而没有关于其义务的宣言，指挥人员的作用削弱，各级政委对部队首长的监督，后备部队的腐败，不能撤消已经腐败的彼得格勒及其周围地区的卫戍部队，等等。

我认为，150 万美军和 50 万日军的新增兵力参加作战行动，是摆脱目前处境的出路。这 200 万精锐的生力军应能突破德军的钢铁阵地，并随着所有力量都转入进攻而击溃德军，攻克柏林，推翻德皇，并把德国和奥地利变为共和制国家。

9 月 18 日

8 月份我在霍尔姆时，曾同一个踏实的农民谈过话。他向我抱怨说，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权和士兵们的胡作非为，农村出现了混乱和专横的现象。他几次用“在风俗败坏时”的说法来代替“在革命发生时”。十分形象和准确。

昨天，祖巴列夫的一位居民，一名稳重的士兵，对于赏赐的自

由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个在获得自由前就是有良心的人，获得自由后将仍然和原来一样；而一个以前就没有良心的人，现在就会变成强盗。"这也是一个正确的说法。

农村在继续"向右转"，但是这种转变是畸形的。人们说："最好让德国人早点来。毕竟他们一来就会秩序井然。"

县粮食委员会下达指示说，今年收获的粮食（黑麦）要全部征用，只给所有者留下2个月的口粮。目前，乡的粮食委员会并不赞同这项措施。

今天从报上得知，我们的军队连雅各布施塔得的据点也丢弃不顾了。可耻。读这则消息感到心情沉重。没有提到战斗。只受到轻轻一击，就放弃了两年之内不断加固的强大阵地。而为它曾花费了多少劳动啊！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事，我也付出了许多。现在该轮到德维纳地区了。放弃雅各布施塔得地区使德维纳据点的防卫增加了困难。德国人如果从雅各布施塔得地区向纵深突进，就可以通过机动行动（迂回德维纳阵地右翼）迫使我军放弃德维纳阵地的左岸。

要是日本人能尽快地来帮助我们这支如今已腐化败坏、毫无纪律、不知羞耻的军队，那就好了。

新任军事部长维尔霍夫斯基仍然在沽名钓誉，继续大肆炫耀自己在莫斯科的虚妄建树（他想象他能在3个月时间内把后备部队建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

10月2日

地方上的乡土地委员会、乡粮食委员会以及县一级的土地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继续在自己的指示和行动中奉行阶级斗争的政策，即无赖切尔诺夫及其一伙的政策。

在中央，令人欣慰的是与那些决心联合俄罗斯所有文明力量同

外部敌人和内部无政府主义作斗争的明智的民主人士达成了协议。但是，在地方，在彼得格勒以外，这项协议还没有得到贯彻，而在农村仍然是“农夫对老爷”施行暴虐。自革命爆发时开始的旨在破坏私有经济的行动在继续进行。春天剥夺草场时，按干草堆估为每垛6普特，值15戈比！1普特仅值2.5戈比。与此同时，农民在割完草的草场上堆放干草，按每垛5卢布的价格向我们出售我们草场上的干草。付出15戈比，收进5卢布，显然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在我的“库利科沃”草场上，我有约170个草堆或称草垛。但佩斯昌加村的居民——我的邻居们——表示，他们只堆了120垛。我说服了大部分人同意把四分之一的草垛交还给我，但是粮食委员会一名有影响的委员不同意这样做。他把我草场上的很大一部分干草据为己有。到处都是如此。

在卡利京岛村的草场上，另一个新的活动家也把最好的地块划给自己，而且还为划分地主的草场而给自己规定“薪酬”。此人现在好像是进了监狱。

私有经济的破产，这是农业国俄罗斯的毁灭。

今年3月17日的《工商报》第56号上，刊载了以下内容（今年9月20日《新时代》第14878号上也有）：

在俄国欧洲部分的49个省内，1500万登记在册的农户中，仅有11万户是私有经济。1913年的播种面积为：农民——6400万俄亩，私有经济——700万俄亩。私有经济的全部播种面积只占播种总面积的10.7%。但是，1913年私有经济的粮食产量占总产量的28%，他们在市场上销售的粮食占总销售额的34%。1915年私有土地提供了粮食总产量的30%和商品粮的40%。1916年，私有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占粮食总收获量的32%，而在商品粮中占了48%。

在军队采购的粮食中，私有土地提供的份额达到52%。

由此可见，农民经济虽然其土地面积超过私有制农业8倍，却

只能养活自己和一小部分军队，而私有经济却供养了军队的大部分。

具土地委员会要求向贫困户无偿提供枯树和断枝作为木柴，并指示私有林场应按官方规定的价格向农民提供建筑用木材。迄今为止，想要得到一立方木柴的人，也要给主人准备一立方木柴。

在我们的部队在里加和雅各布施塔得附近的耻辱表现之后，我们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沉寂下来。在西线，英国人在伊珀尔附近推进，取得了明显战果，抓了1000名俘虏。在罗马尼亚战线，我军一个团突入敌军防地，带着800名俘虏返回自己的阵地。我以为，在我军纪律松弛、军官特别是指挥人员得不到支持、军官没有权利、而士兵可以在军官面前放肆地躺坐着而不行军礼等等情况下，尽管德国人已经错过了时机，但仍会给我们以强有力的打击。

舍舒里诺村　10月5日

霍尔姆土地委员会谦恭有礼地请求无偿地为附近居民提供枯树和断枝作为木柴。我已经允许我的守林人在20立方内按登记表发给。提出请求的是真正穷困的人。

前几天戈罗季诺村的一个谷仓着了火。晚上我坐小船到了那里。因为没有路，不能开汽车。村子得救了，但谷仓和里面堆放的粮食——1000捆黑麦——付之一炬。我给遭灾的叶戈尔50卢布和林子里的100根原木。

土地部门派人来察看了各个谷仓，登记了尚未过磨的黑麦和燕麦。对储备的马铃薯也作了登记。村子里一共有60人。确认须要拨给全村120普特黑麦，我能够安排的除外。他们工作时是有礼貌的。

10 月 8 日

在报上看到德国人在厄塞尔岛登陆的消息。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海军当局掌握的守备部队力量薄弱。整个里加湾会轻易地落入敌手。所幸的是“侯爵夫人的水塘”的冰封期即将来临，不然彼得格勒可能在今年秋天就会被攻占。

当各阶级有自觉意识的人士都在向右转时，看来工人群众和士兵群众却在向左转。从军队中越来越强烈地发出厌战的声音。同时，还存在粮食供应安排不力、防寒衣靴无法保证的情况。

在我们县的农村，我到处都看到成群的士兵，他们都很健康，但却以各种借口呆在家里。饥荒正在向我们县蔓延。这里历来都是每年缺少 30 万～50 万普特黑麦。如今，由于耕地减少，粮食缺得更多。人们正在为运进粮食而奔忙。多少钱他们都愿意付，但在目前交通运输混乱的情况下不能抱太大希望。由于遍地饥荒，有可能出现最严重的骚乱和凶杀事件。不久以前，在近郊一个村子里对一名屡次犯案的年轻小偷施行了私刑。他遭到枪杀，而向他开第一枪的是他的亲兄弟。

县里的道路糟糕透顶。我就此写信给县政治委员，得到的回答是，已指示县警察局长予以修复。

10 月 11 日

昨天，我在沃洛克村看到了霍尔姆县大地主弗拉基米尔·卢基奇·库舍列夫的境况。

去年有人想出 150 万卢布买他的（一大片）森林。他要价 180 万。今年 10 月，他认为自己成了穷光蛋。森林被禁止出售。税收增加了几倍。以 3800 卢布的租金把村子租了出去，部分种子、草场和土地也租给了佃户。他已经没有一个工人。马车夫、看门人、

木匠、铁匠和机械师连同他们的家眷统统要他养活。每月需要26普特粮食。没有粮食。马匹瘦弱不堪。屋子里没生火。没有木柴。女主人费尔南达·叶夫盖尼耶夫娜（他的妻子）自己去园子里拾枯树枝。到昨天为止没有女仆（侍女）。保姆、女裁缝都一桌吃饭。

库舍列夫自己清扫厕所：使用水泵和密封的桶。

他偷听到农民们对于管理着俄国的现政权的有趣评论。老头们说："新的压制比旧的更坏。"他们还说："没有牧人羊不成群。要尽快有一个牧人。"

他们还谈到由他们自己推选进各种委员会的代表，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给自己捞取好处："让猪坐到桌旁，它就会把脚放到桌上。"

彼得格勒　10月22日

昨天来到彼得格勒。在路上，我邀请了从奥斯塔什科夫守备部队来参加苏维埃会议的两名代表来到分配给我的包房，其中一个是士兵，一个是工人。两个人都有资格乘坐头等车厢，而且似乎是免费的。那个士兵似乎显得很有见识，其实却知之甚少。当他问起我的过去，听说我在几乎50年以前参加过攻占撒马尔罕的作战时，便问我："这是在土耳其战争时期吧？"他随即塞给我一份在奥斯塔什科夫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使用的提纲。相互熟识以后我发现，这个士兵是个和善的小伙子。他对我十分照顾，给我打开水，并表示如果搬运工迟到的话可以帮我提行李，等等。

第二天一早，我突然被隔壁包间的一个军官喊醒。他神情亢奋，带着一股酒气，眼睛含着泪水，请求我提出忠告：他该怎么办。他说，他是装甲汽车分队的队长，手下有300人，其中40个是布尔什维克，指挥很困难。虽然他可以转为预备役，但如果所有人都走了，那么还有谁留下呢？可是，如果他留下来，那么他毫不

怀疑他会向自己的前额开枪。我劝他请假 6 周。因为他说他有钱，我就劝他去克里米亚呆 6 周，不要看报，过一段不问世事的生活，多走路。

在彼得格勒，满街都是不成体统的士兵。敞开制服在街上行走，露出很久没洗的肮脏的身体，脸上能看出一种愚钝的欲望：放心地吃喝，什么事也不做，谁的话也不听。我们的祖国是多么不幸啊！神勇的俄罗斯士兵被变成了无赖、罪犯，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叛徒。

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学无术的克伦斯基。本来应当采取措施加强纪律，而他却做了许多进一步破坏纪律的事情。克伦斯基同极左派眉来眼去，沽名钓誉，怂恿士兵对军官滥施暴虐，听信谗言把军队信赖的称职的指挥人员赶走，作出了对军官特别是军队首长具有侮辱性的任命。被挑选担任首长的不是那些能取得胜利的人，而只是有革命历史的人。少尉和中尉被任命为领导将军的首长。阿列克谢耶夫和所有战线司令、集团军司令的意见被置之不理。克伦斯基不等到他们发表意见，就发布了士兵权利宣言，但他忘记了士兵对祖国、对自己应尽职责以及遵守纪律的义务。后来虽曾发布了许多关于在前线和后方恢复纪律的命令，但这一切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种种卑鄙的事情依然存在而不受惩罚，杀害军官的行为也未受惩罚。颁布了关于死刑的命令，但幻想家克伦斯基在签署这项法令的同时却公开声称，他反对这项法令，而且他将不在任何一份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10 月 23 日

晚上，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西韦尔斯中将在我这里坐了一会。他被任命为国外采购总局局长米赫尔松将军的助手。他对于当前局势和未来前景持悲观的看法，流露出我们自己无法恢复元气的

观点。按照他的说法，到处都对克伦斯基完全失望。

西韦尔斯说，在委员会中讨论过彼得格勒防卫的问题，认为到春天它可能被攻占，而且以为这样会有好处，能够消除谋反的领导中心。

他说起，在部长和副部长们的会议上——但不是在国防委员会上——维尔霍夫斯基宣称，俄罗斯已经不能继续进行战争。

米赫尔松反对他的看法。几个部的代表支特米赫尔松的意见。军事部副部长图马诺夫也表示支持。但是，总参谋长马鲁舍夫斯基支持维尔霍夫斯基。看到多数人反对自己，维尔霍夫斯基匆匆结束讨论，宣布散会。西韦尔斯认为，维尔霍夫斯基是按照克伦斯基的旨意行事的。人们对马鲁舍夫斯基也十分气愤，因为他在两周以前还曾坚持主张必须继续作战，直到达成体面的和平。

关于切列米索夫（或切列米西诺夫），西韦尔斯说，这个人十分可疑。1905年他曾经是一名狂热的顽固派。关于杜鹤宁[①]他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朝向太阳，而不管太阳是在那里。

他认为克伦斯基的结局将很悲惨，并设想克伦斯基将会被死硬的恐怖分子——杀害普列维[②]和其他人的凶手之一萨文科

① 杜鹤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76～1917），中将，1917年9月至11月任总司令部参谋长，11月3日（16日）开始至11月20日（12月3日）为总司令。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于11月9日决定撤消其职务，但他拒绝接受。后被士兵打死。

② 普列维，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1846～1904），1902起任内务大臣和宪兵司令，极端的反动分子，因残酷镇压革命运动而于1904年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

③ 萨文科夫，鲍里斯·维克多罗维奇（1879～1925），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组织过一系列政治暗杀活动。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派驻大本营的政治委员、西南战线政治委员、军事部副部长、彼得格勒军事总督。十月革命后曾组织反苏维埃活动，一度流亡国外。1924年秘密返回苏联，被逮捕判刑，在狱中自杀。

夫[3] ——所杀死。萨文科夫公开宣扬说，有害的人应当迅速而永远地予以消除。克伦斯基最怕的就是萨文科夫。

西韦尔斯对于巴尔钦斯基[1] 的印象较好，认为他是一名始终一贯坚定不移、有明确观点的工作人员。

他不无忧虑地谈到了关于土耳其斯坦的事态。派去的政委科罗夫尼钦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已惊慌失措。他带去了众多的兵力：几个骑兵连、机枪、火炮、一个哥萨克团。但他仍然对付不了哗变的第一团（这是坏蛋布罗伊多[2] 的最初工作）。

骑兵部队转向暴动者一边。他答应发给每名士兵 8 卢布赔偿金，让骑兵连掉头返回。

希望寄托在哥萨克身上。当地居民十分不安，要求维持秩序。可能发生暴乱。

接替我的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切尔克斯将军在一个天主教堂的建筑工地上被一名天主教士发现时，因受伤而处于昏迷状态。简直是无法无天。

接替切尔克斯的科罗夫尼钦科将军不久就被抓了起来，在军人禁闭室中被看守的士兵杀害。他的尸体被扔在那里很长时间，警卫的士兵向每一个想往死者脸上吐唾沫的人收 15 个戈比。在广袤的边远地区，士兵中竟有这样的无赖，偏要对克伦斯基的代表进行如此凌辱。

① 巴尔钦斯基，彼得·伊阿基莫维奇（1875～1929 或 1930），工程师，曾创办煤炭辛迪加，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工商部副部长，8 月底到 9 月中任彼得格勒军事总督的民政副手。10 月 25 日（11 月 27 日）任冬宫警卫队长。

② 可能是指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布罗伊多（1885～1956），当时是孟什维克，在中亚从事革命活动。

【专题说明】

十月革命前后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传单

（1917年10月至12月）

1917年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登上了俄国政治生活的前台，对俄国革命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他们延缓解决当时俄国最迫切的和平和土地问题，最终在决定俄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中遭到了失败。本专题文件收入了十月革命前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部分传单共14件，这些传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开展立宪会议选举宣传，反对十月武装起义，组织救国救革命委员会，抗议解散立宪会议，以及对刺杀德国大使、社会革命党活动家被捕等事件的反应等等。透过这些材料，可以进一步了解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对俄国社会的分析和结论、他们在当时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及其思想根源、他们之间的差异和一致等，也可以从中感觉到当时俄国社会局势的紧张和政治气氛的严峻。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马逸若翻译）

№07770

孟什维克关于立宪会议选举投票的传单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①]

关于立宪会议选举，第15号
不应该投谁的票？

在立宪会议选举中，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将会有一场争斗。当然还会有其他一些党派，不过这些政党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这些政党不过是一些早熟的果实，阳光照一下，小雨淋一阵，就生长起来一个政党了。但只要刮一阵冷风，党就不见了。这是一些过时的党……

立宪民主党将招呼人们加入自己的队伍。在革命之前，这个党曾经反对革命。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这个党是拥护革命的，而现在它又在反对革命。这是因为：这个党是统治阶级的政党。他们需要自由，专制制度曾妨碍他们的发展。但他们对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抱着极其仇视的态度，因为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劳动阶级从压制下解脱出来，从而摆脱对资本家的依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老

① 1917年8月孟什维克各组织的联合代表大会之后出现了这一名称。

对革命说“站住”，而在很多事情上把革命赶向后退。他们需要自由，但这种自由并不是很广泛的。因为只有劳动人民才能利用广泛的自由来摆脱有产者的统治，而那些有产者只要一份有限的自由就可以了，因为他们手里还掌握着私有的土地、资本、生产工具等等的巨大力量。这就是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害怕革命进一步发展并且拼命地想拉革命后退的缘故。

革命之前，立宪民主党主要是有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党，是那些靠资产阶级的餐桌过日子的阶层的政党，因此他们为资产阶级服务并非仅仅是出于恐惧，也是出于良心。革命之后，这个党急剧膨胀，资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资本家和地主在它的队伍中找到了隐蔽所，而这些人在从前更多的是同右翼政党联系在一起的。

立宪民主党人拼命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反对可能增强劳动人民对革命政府影响的一切。

在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追随盟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侵略者），更多考虑的是他们的声明和要求，而不是革命人民的要求。革命人民已经宣布，他们进行战争不是为了侵占别国的土地，奴役别国的人民，而只是为了保卫俄罗斯免遭外敌的侵略。

另外一个将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出头的党是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主要是一个农民政党。这个党的灵魂就是土地。使所有想要耕作土地的人都能如愿这一理想，使它把很多渴望成为土地的主人从而摆脱雇佣劳役的人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但这种理想是靠不住的。首先，对所有渴望耕作土地的人来说，土地是不足的。第二，无法使所有的人平均占有土地，因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已经弄到了相当不错的土地，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同它分离。如果说对付一小撮债台高筑的大地主是容易的，那末又怎样来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私有者呢？绝不可能为了满足那些新的渴望获得土地的人而使这些农民私有者同自己的家产分离。分配土地只能满足很少一

些人，而且，仅靠一点土地也并不会有宽广的前途，牲畜、机器、肥料和建筑物——所有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拿来分配的。结果，农村中的不平等，有财产的人对无财产的人的强制将再次得到巩固，而从社会主义那里得到的只不过是几个烟盒再加几条桌腿而已。社会革命党的根本缺陷在于，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农村实现，但不能同时在工厂和城市中实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所有想弄到一小块土地和房屋的人，所有渴望成为小业主——那怕是不怎么样的小业主，但终究是小业主——的人，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并因此而自以为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圣徒的行列。

工人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小业主的社会主义，它认为，还必须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不应当部分地实行社会主义，尤其是不应当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同时又激起对财产的感情。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分歧。但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也将登台表演，他们也力图把我们落后的俄罗斯驱赶进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想象，只要把资本家好好地治一下，把一百两百人关进监牢，把武器分发给大家，这就万事具备了，社会主义说来就来了。这是有害的、缺乏理智的幻想。在十二月的严寒中可以在温室里栽培出甜瓜来，但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却不能在暖房中发育成长。这里有其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是既逮捕不了，也枪杀不了的。

布尔什维克并不考虑这一点。他们的行事方式是：生活中只有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而所有其他人都是应该摧毁的敌人。他们将出现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但立宪会议本身在他们看来是多余的。照他们的意思，最好立即由苏维埃夺取全部政权，迫使所有不同意这样做的人驯服。而在苏维埃自己也不同意这种做法的时候，他们就在七月间发动了反对苏维埃的武装起义，试图用枪杆子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还不假思索地打算立即结束战争。可是当士兵群众郑重

地接受他们的建议，拒绝进攻并同德国兵友好的时候，德国人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扑来。数以千万计的人牺牲了，他们一方面是死于德国人，另一方面则是死于临阵逃脱的胆小鬼和叛徒。因此，对所有这些政党不应该投赞成票。

如果你们投立宪民主党人的票，就是投有产阶级政党的票、投劳动人民的敌人的票。如果你们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就是投虚幻社会主义政党的票、投小业主政党的票。如果你们投布尔什维克的票，就是投制造内讧的政党的票、投政治冒险者的政党的票、投奴隶造反的政党的票，而不是投公民革命的政党的票。

请你们投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票，投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票！这是一个为全国人民利益而行动的阶级，它不是以造反和动乱、而是以有计划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来争取和平和自由，争取全人类的解放。

斯捷潘·伊凡诺维奇①

① 斯捷潘·伊凡诺维奇·波尔土盖斯（1880～1944），孟什维克，政论家。

№07771

著名政论家弗·列维茨基评孟什维克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立宪会议选举
孟什维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公民们，我们呼吁所有的人——工人、农民、士兵、店员、职员、脑力劳动者和其他劳动者——在立宪会议选举日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候选人的票。

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将比其他政党更好地保护你们的利益，他们将比任何人都更加忠诚地捍卫俄国革命的事业。

我们号召你们投赞成票的孟什维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孟什维克，这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那一部分，他们继续忠于国际社会主义的思想，而不追随列宁及其鼓吹无政府主义策略的布尔什维克朋友。孟什维克，这是那些领导着工兵代表苏维埃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全俄闻名的孟什维克战斗在苏维埃最前列：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齐赫泽、前邮政部长策烈铁里和劳动部长斯科别列夫。孟什维克和所有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坚持阶级的观点。这意味着他们是处处把工人阶级、雇佣劳动者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因

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是支柱、是基础，在此之上将建立未来的光辉王国——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孟什维克在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在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利益。孟什维克认为，我国的革命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事业，尽管工人在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始终走在所有其他阶级的前面，而且比其他阶级都更加坚决地捍卫共同的事业。

根据孟什维克的观点，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任务是：在革命过程中捍卫本阶级利益，为自身争取尽可能多的权利和自由，并为此而组织一个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应力争走在一切革命力量的前列，同其他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阶级和政党联合努力。孟什维克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执行的就是这样的策略。和布尔什维克不同的是，他们在争取建立新的民主制度的斗争中并不竭力去把工人阶级同其他阶级隔离（划分）开来，因为他们知道，既然工人阶级在国内人口中只占少数，这样的划分将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它的失败。

这就是孟什维克之所以支持实现了革命人民意志的第一届临时政府、加入第二届联合的临时政府、现在仍主张全国一切有生力量——即所有准备支持苏维埃革命纲领的力量——联合在政府周围的原因。

孟什维克懂得，从总体上说，工人的利益同全国的利益和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是并不矛盾的。他们反对无组织的工人运动，反对用工人的名义提出可能降低劳动生产率和我国的工业生产的要求。这并非因为他们珍视资本家的利益——布尔什维克是这样说的，而是因为在战争和经济破坏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工业的衰落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有害的影响，而这首先将是对工人本身的沉重打击，而且有可能危及革命的全部成果。

孟什维克反对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夺取国家政权，因为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纯粹的工人革命的时机尚未到来，因为俄国和俄国人民还没有为社会主义作好准备，而为了进行全民的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必须不仅联合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一切力量，而且联合知识分子和组成各种资产阶级政党的中产阶级。孟什维克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希望尽快结束世界性的对人民的大屠杀。但是问题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简单，似乎只要有和平的愿望，就能立即缔结和约。工兵代表苏维埃曾向全世界宣布，俄国人民不愿意靠损害别国人民的利益来取得任何战果（割地），俄国人民不会谋取任何赔款，俄国人民要求的是承认各国人民都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也就是说，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有加入哪个国家、同谁联合或同谁分离的权利。

俄国临时政府也接受了这一和平纲领。但是，无论是盟国政府还是同我们交战国家的政府，至今都不愿承认这个纲领。由于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没有发生革命，政权不是归人民所有，而是归有产阶级所有，而他们所渴望的并不是革命的俄罗斯所建议的体面的和约，而是用武力摧毁自己的敌人，即继续进行战争。

俄国与德国单独媾和无济于事，因为国际战争只有用国际方式、在所有的战线上同时行动才能结束。形势将会怎样呢？如何按照苏维埃提出的纲领实现普遍的国际和平呢？

孟什维克的回答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是单独媾和，不是军队拒绝作战，而是工人阶级的协调一致和一切国家相互关系的民主化。

战争是一些政府和资产阶级（有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发动的，只有人民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束战争。各国人民应该要求自己的政府，希望它们同俄国政府一样，拒绝割地和赔款，而同意被压迫的人民实行民族自决。只有到那时，战争才会最终结束，鲜

血才会不再流淌，将会缔结一项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体面的和约。但战争至今还在进行，德国和奥地利还占领着俄罗斯的土地，他们的军队继续向我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取一切措施进行反击，即组织抵抗、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支援前线正在作战的部队。

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保卫俄国和保卫革命，为了尽快缔结国际和平，革命的俄罗斯是不会放下手中武器的。

孟什维克不是刚刚存在一年两年。从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算起，已经 14 年了。尽管这个党有时候重新联合起来，但在党的内部，两个不同的派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总是斗争不断。

孟什维克始终强调，我们不得不经受的革命将是一场全民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而不是纯粹的工人革命，这场革命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为此，在争取工人阶级利益的斗争中，在保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社会民主党——独立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同其他反对沙皇政府的阶级必须一致行动。所以，孟什维克反对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完全分离开来，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孟什维克也反对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夺取政权）口号。农民的思想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正如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也完全不是始终革命的，甚至经常对工人阶级抱着敌对的情绪。

孟什维克一向认为，最困难的事情不是用武装手段去推翻专制制度，而是把战胜专制制度后获得的自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都相当有组织并且能够打退民主和自由的敌人的一切进攻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做到。这就是为什么孟什维克一向号召工人群众无论如何都首先应该组织起来。而布尔什维克是不重视组织群众的，他们关心的只是激励群众并让自己的小部分人

（工人战斗队）掌握武器，以便进行武装起义。1905 年的革命已经证明了孟什维克策略的正确性。在得到其他阶级支持的工人阶级总罢工的打击下，政府作出了让步，颁布了 10 月 17 日宣言。可是工人阶级和民主派中有组织的力量显然不足，当革命的浪潮低落、人民群众的运动减弱的时候，政府便一步一步地取消了几乎所有已作出的让步，并把那些奋起抗议、保卫自由的人淹没在血泊之中。在 1905 年革命的那些岁月里，孟什维克为了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号召他们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工会。而布尔什维克却反对这样做，他们号召准备武装起义，并首先为此目的把力量聚集和组织起来。孟什维克建议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认为选举能使群众团结起来，并且把自己的力量都集中在选出的代表周围。布尔什维克则号召抵制杜马（不参加选举），历史已经表明，布尔什维克错了，因为国家杜马及其选举是人民运动和反对派（反抗）的支撑点。

当反动派占了上风，开始了斯托雷平和野战军事法庭的统治之后，孟什维克知道，革命停止了，于是号召工人团结在国家杜马中的工人代表周围，利用自由的几个月留下来的一些法规，建立工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以便在暂时的政治静寂时期为未来的斗争积聚和组织力量。对此布尔什维克持轻蔑的态度，他们建立工人战斗队，实行剥夺（袭击银行和私人），攻击警察，还认为他们这是在进行革命事业。而在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妨碍对工人群众的教育，妨碍把他们组织起来。当时，孟什维克指出，工人的主要敌人是政府，工人应该支持其他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与政府的斗争。而布尔什维克却把工人的注意力从与政府的斗争上引开，说什么工人的主要敌人是资产阶级和立宪民主党。

在孟什维克存在的 14 年时间里，他们的策略就是这样的。这一策略也就是世界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所奉行的策略，即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策略，使其组成自觉的、独立的政党的策略。

如果说工人阶级在1917年革命中要比1905年更有组织性，并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了一些卓越领袖的话，那么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孟什维克的工作。

公民们，现在你们知道了，孟什维克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为了什么，又是怎样地在进行斗争的。如果他们的目标就是你们的目标，如果你们认为他们的策略符合你们的利益，如果你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孟什维克比布尔什维克更为正确地理解和保卫革命事业和工人阶级事业，那么，你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投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候选人一票。

弗·列维茨基[①]

① 列维茨基（策捷尔包姆），弗拉基米尔·奥西波维奇，生于1883年，是马尔托夫的兄弟，19世纪90年代末参加革命运动，著名的孟什维克，政论家。

№07772

社会民主党人弗·叶若夫评工人阶级的投票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关于立宪会议选举
工人的选票一张也不投给社会革命党人

从革命的最初几天开始，社会革命党就在工人中间享有很高的声望——很多工人都支持它，很多工人在选举苏维埃以及市和区的杜马时都投它的票。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它是捍卫工人利益的吗？难道工人能够依靠它吗？不！无论社会革命党人怎样自我吹嘘，他们同工人阶级根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至于他们获得的声望，只有用工人的过分轻信和没有弄清社会革命党纲领和诺言的实质来解释。每一个工人首先应该明白，在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下，工人阶级是社会中最受压迫、最为贫困的一个阶级，它的切身利益到处都遭到侵害，它不能指望任何人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人的解放只有依靠工人自己的事业才可能实现。为此，他们必须有一个自己的阶级的政党，在自己的斗争中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是这样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吗？不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样，他们宣称他们的党是一个超阶级的党，保护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保护工

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现在应该问问自己，能够把对工人和农民利益的保护混合在一起吗？

关于这一点，生活——实际的生活，不是那种在小册子和热烈的演说中被粉饰了的生活，而是那种展现在我们大家眼前的生活——说明了什么呢？工人失去了所有财产和生产工具，因此他不剥削任何人，不占有别人的劳动。相反，现代社会的所有阶级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对工人的剥削：工厂主依靠工人的劳动而生活，依靠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房产主靠工人的房租来生活，他们向工人出租住房，用这种方式从自己的房产中获得收入；农民也从工人身上取得收入，他们把自己的粮食、土豆、蔬菜、肉类、牛奶、蛋等运进城市出售。由于农民在出售所有这些产品的时候得到的不仅仅是他在生产这些产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同时还有属于他的财产的利润。不管农民拥有的那块土地多么小，不管他的经营是多么简陋——牲口、农具、房屋，反正这一切都是应该给他带来利润的资本。工人是完整意义上的无产者，农民则是私有者，尽管是小的私有者。例如，当工人希望粮食能便宜些的时候，出售这些粮食的农民则对粮价上涨感到满意，因为这可以改善他的境况。工人关心对劳动的保护，特别是对儿童的劳动保护，关心对工作日时间的限制，关心制定有关机器安装安全装置以防止事故发生的严格制度。经常使用雇农的雇佣劳动的农民小私有者从所有这些措施中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损失，因此他反对这些措施：给农业机器加装安全装置，将增加机器的价格，而且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这会妨碍他购买所需的机器；同样，缩短雇工的工作日、对童工劳动的限制规定等，对农民这个业主来说都是不合算的。

现实生活提供了很多工人和农民利益冲突的例子。这些例子说明，当社会革命党想方设法使工人们相信，好像这个党既是工人的

党，也是农民的党的时候，这是在欺骗工人。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进行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不能既为无产者的利益服务，同时又保护农民私有者的利益。

但是，社会革命党人说，我们保护的不是整个农民阶级的利益，而只是劳动农民的利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事情就改变了吗？劳动农民终究还是私有者，他经营着自己的产业，即便是很微薄的产业，即便是濒临破产边缘的产业。只要这种劳动农民还没有最终破产，只要他心中还想着打开局面，希望租到或是在土地改革时得到几小块土地，弄到第二匹马，事情顺利的话再雇个工人，那么他就不会被吸引到工人一边，而是被吸引到私有小业主、更有实力的农民一边。很显然，他将同这些人一起奉行业主的政策、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正如所表明的那样，通常是与工人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但是，有人会说，要知道在工人中间有不少人只是因为战争的缘故才进了工厂，他们只是暂时抛开了自己农民的事务，对他们来说，社会革命党实在是很亲切的……真是这样吗？是谁被迫离开了农村呢？是最弱的农民，他们勉强地支撑着自己的家业。战争把他们完全打倒了。

一个尝到了城市生活和工厂劳动甜头的农民，他把有固定的工资收入、每天工作八小时、吃得还可以这样一种工人生活同从早到晚的紧张劳动、营养不良、仅可补偿劳动代价的经营所得的农民不得不在其中挣扎的那些条件比较一下，他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个工人而不是农民。如果说他还在思念农村、想重新从事农业的话，这只是因为他听信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社会主义”诺言。

社会革命党人用自己的这些诺言不仅诱惑了一些农民，而且也吸引了不少工人。其实，这些诺言任何时候都不会实现，相信这些诺言的结果只能是痛苦的失望。

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许下了些什么诺言呢？他们在自己的报纸上和小册子里，在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在各种会议上，给农民和工人描绘了怎样的图景呢？他们说，应该宣布所有土地都是社会的财产，把土地从私人占有者——其中也包括农民本身——手中收回来；应该禁止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并以此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任何人，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只要他愿意，他就有权按照劳动定额从全国土地储备中得到他能够自己耕种的那么多土地；在土地不够分配的情况下，则按照粮食供应的定额来划分地块，也就是说，用这样的计算办法使农民和他的一家能够靠它糊口。

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诺言。但是，到了要实现这些诺言的时候，他们却急转身走到一边去了。每一个人都知道，社会革命党人主持农业部的工作已经好几个月了，开始是切尔诺夫①，随后是谢·马斯洛夫②。而在土地总委员会里，大多数委员也都是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土地委员会在农业部长的领导下，已经就土地问题准备好了一个法律草案，将提交立宪会议审议。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法律草案中所提出的完全不是他们在纲领中所写的那些东西，不是他们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所写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他们在号召工人和农民投他们的票时所许诺的东西。

他们许诺要平等使用土地，为的是在农村里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脑满肠肥者和饥寒交迫者。可是在他们的草案中却是这么说的：对于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只有在他们的土地超过按照需要或劳动定额规定一倍以上的情况下，才把他们超出的那部分土地割让

① 切尔诺夫，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1873～1952），社会革命党的创建人之一，二月革命后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5月至8月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

② 马斯洛夫，谢苗·列昂季耶维奇（1873～1938），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

出去。这就是说，不会有什么平均，那些如今掌握着50俄亩甚至更多土地的农民将保留自己的土地。这就是说，可供分配给少地或无地农民的土地已经所剩不多了。

社会革命党人曾许下过诺言：任何一个想要土地的人都有权获得土地，凭自己的力量进行经营。可是现在，不是别的什么人，正是社会革命党人部长谢·马斯洛夫本人证实：这一权利仍停留在纸面上，因为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实现这一权利。原因很清楚：社会革命党人在自己的法律草案中给地主保留了庄园，除此之外还按劳动定额为他们保留了可耕地。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草案——与他们的纲领和诺言相反——允许雇佣劳动，所以这个劳动定额对地主来说是非常大的。因此，跟所有农民群众比较起来，他们得到了加倍的土地。这究竟是为什么！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们在自己的草案里把很多庄园“留给它们真正的主人（也就是地主）支配”，因为在这些庄园里可以进行特别文明的经营，比如种植甜菜，从事畜牧业、农产品、种子的经营。这样，一接触到生活，从社会革命党人所许诺的“社会化”那里剩下的就只有鸡毛蒜皮了。而那些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份土地和“一律平均”的农民或工人，则将因自己的轻信而陷于痛苦的失望之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难道社会革命党人都是些骗子吗？不，不能这样说他们。他们完全不是存心蓄意要欺骗人民，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既想依靠无产者，又想依靠那些破产了的穷苦农民，还想依靠农民中的一部分富裕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当事情已经到了必须实现自己诺言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竭力企图既让狼吃饱、又使羊安好。但难道这是可能的吗？结果是社会革命党人在满足殷实农民的利益时，却不能履行他们多少年来对真正缺少土地的劳动农民所许下的诺言。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一直在说，将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始终在证

明，社会革命党人的诺言是实现不了的，因此工人和农村贫民跟他们走是徒劳无益的。生活证实了我们说的话。在这里任何人都将再次确信，超阶级的政党是不会有的，无论哪个政党，也无论它如何打扮自己，它总是为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当一个党力图照顾的不单单是社会上某一个阶级的要求时，那末它的政策就将不可避免地摇摆不定，结果是无论哪一个阶级的要求也满足不了。这种不幸也发生在社会革命党人身上。这一点不仅反映在土地问题上，也反映在革命期间他们的整个政策上。

在战争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不能奉行确定的路线。他们的知名领袖克伦斯基、勃列什科－勃列什科芙斯卡娅①、阿夫克森齐也夫② 和其他很多人直到现在仍旧不打算坚决为和平而斗争，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德国被粉碎为止。

在国内生活的很多问题上也是这样。工人们需要坚定的、稳固的、明确的政策，而不是看有产阶级脸色行事的政策，不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敷衍联系在一起的政策。立宪会议应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它必须结束战争，创造和平的条件，它应该调整好经济生活，制定基本的法律。

工人在立宪会议中必须有尽可能多的代表，他们应该执行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的阶级政策，不能摇摆不定，有能力打击一切革命的敌人、一切民主的敌人。社会革命党是没有能力奉行这种政策的。如果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就意味着那些不能

① 勃列什科－勃列什科芙斯卡娅，叶卡捷琳娜·康斯坦丁诺芙娜（1884～1934），19世纪70年代就参加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曾多次被沙皇政府逮捕和流放。1919年起侨居国外。

② 阿夫克森齐也夫，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1878～1943），社会革命党领袖之一，二月革命后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克伦斯基的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中任内务部长，后来出任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即预备议会）主席。

勇敢地、始终一贯地解决革命所提出的各种难题的党在立宪会议中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工人群众只能指望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来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工人的选票一张也不要投给社会革命党人！

大家都来一致投票选举（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都来投票选举孟什维克的候选人！

弗·叶若夫[①]

① 即谢尔盖·奥西波维奇·策杰尔包姆（1879～1939），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07773

社会民主党人弗·叶若夫评论自己的投票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我为什么不投布尔什维克的票？

同志们，你们会问，为什么我不想把自己的一票投给布尔什维克党呢？我来详细地解释一下，以便使你们确信，无论是男工或女工，还是工人阶级的拥护者，都不应该帮助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帮助他们进入立宪会议。

你是否知道布尔什维克是怎样一些人？你是否清楚他们在革命前的活动？你是否看到他们现在在干些什么？你是否明白他们给工人和所有劳动者许下了什么诺言？

我回想起了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进行活动的情况。当时他们也像现在一样，用尽各种方法劝导工人，主张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去夺取政权。他们肯定地说，农民阶级将始终跟工人走在一起。只是借助于这样一些劝人相信的话，他们才得以发动了十二月的罢工，把工人阶级推到了注定失败的境地。随后，他们宣布抵制国家杜马，并因此而使杜马从一开始便悬在空中，而尼古拉也得以如此容易地把它解散了。他们还以如下方式减轻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压力：当杜马和政府之间发生激烈斗争的时候，他们

不愿意支持杜马，相反唆使工人群众反对杜马，从而使杜马完全失去了力量。

列宁和他的党就这样使工人阶级在第一次革命中离开了正确的道路。

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仍继续这样行动。当先进的工人确信还不可能立即恢复同专制制度的公开战斗，因而不顾沙皇政权的迫害，着手利用无产阶级保留下来的一些革命成果，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会、工人俱乐部等等组织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把分裂带进了工人运动，指责这些工人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放弃进行革命斗争。

然而正是借助于这些工人组织，工人群众的运动重又开展，罢工运动得到加强，政治罢工的浪潮席卷全俄。布尔什维克也进入了这些合法组织，但他们进入这些组织不是为了加强工人运动，而是为了分裂它，把它分成不同部分。他们把内讧带进了工会，用窝里斗削弱了患病职工补助会，甚至在面临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的时候他们也不停止。就这样，他们在整整十年期间里摧毁了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它的斗争的统一和它的阶级组织的团结。

在当前这场伟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顺从其领导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依然走着那条搞分裂的道路。几乎从革命开始的最初时日起，他们就把纷争内讧和互不信任带进了革命战士的队伍。当我问自己，我们工人-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参加选举立宪会议、我们对立宪会议有什么指望时，当我总结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来的整整半年中做了些什么时，我得出的结论是：在立宪会议中不应有他们这些布尔什维克的位置。

我们对立宪会议有些什么期望呢？我们希望立宪会议能使人民争来的自由更加稳固，在俄罗斯建立起共和国，使无产阶级已经获得的和尚未获得的那些为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权利能够得到

保障。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人阶级凭自己的力量在立宪会议上是无法取得这一切的，因为无产阶级仅占俄国全部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所以，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代表将不是产生于工人，而是产生于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农民民主派。为了使立宪会议能够做到工人阶级对它寄于期望的那些事情，首先就需要整个民主派的统一。

布尔什维克是否促进这种统一呢？不，正好相反，过去他们总是把分裂带进民主派的队伍，现在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将来甚至在立宪会议中他们也是会这样干的。

同志们，你们会说，我是在诽谤布尔什维克，我是在冤枉他们。但请你们回想一下，这几个月里布尔什维克干了些什么，这样，你们就会承认我的讲话是公正的。

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一回到俄罗斯就向全国宣布说，社会民主党已经彻底烂掉了，从今以后应该放弃经过考验的工人阶级策略，而开始用新的方式进行斗争。这种新东西新在哪里呢？在于要把在革命最初的日子走在起义人民前列的、善于引导整个民主派跟着工人阶级走的——正因如此才得以使人民胜利的成果不被罗将科们和米留可夫们利用——那些人宣布为叛徒；在于追求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那时一个不大的少数将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巨大的多数。要是工人试图照着这种意见行动的话，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将处于敌人四面八方的包围之中。今天支持革命的人——他们同工人一起赶走了沙皇，一起捍卫自由的成果——马上就会转入反革命的阵营，力图回到旧制度，或者至少削弱人民已经取得的成果人民的成果。

工人们这次不跟列宁走了。于是布尔什维克变换了战线，他们想出了一个新的战斗的口号：全部政权归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在这里他们再次使工人迷失方向，他们给工人灌输一个错误

的认识，似乎农民始终而且在各方面都是和工人一致的。而我们大家都知道，农民是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反对粮食固定价格的，如果不同时规定工人固定工资，也就是说如果不削减工人工资的话。布尔什维克当然也十分清楚，他们将使工人阶级大失所望。要知道，他们总在试图证明，如果他们参加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一道，这对于革命和对于工人来说都是有害的，而各个农民组织恰恰坚持认为这样一个混合的政府是必要的。

布尔什维克鼓动把政权转到苏维埃手中，导致了令人难望的七月的日子，当时有许多无辜的牺牲者倒下了。但这一发动还有一个更坏的后果，那就是它使得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的广大阶层反对革命和反对工人，从而增强了已经做好攻击准备的革命的敌人的力量。布尔什维克为科尔尼洛夫① 铺平了道路。

各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布尔什维克从来也没有感到对自己的行动应负的责任。他们把自己的口号抛向工人群众之中，激起他们跨出必遭灭亡、注定失败的一步。而当工人们遭受失败的时候，他们却躲到灌木丛里去了，而且还竭力证明，别人对他们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他们所考虑的是另一码事。例如，七月那些日子以后，他们要大家都相信，他们完全没有号召工人和士兵手持武器上街去，他们并未考虑要强迫苏维埃去夺取政权。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人都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些靠不住的领袖，工人是不能依靠他们的，是不能信赖他们的。

同志们，请回想一下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态度吧。他们要求尽快实现和平的喊声比谁都高，可是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上了

---

① 科尔尼洛夫，拉夫尔·格奥尔基耶维奇（1870～1918），1917年3月至4月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5月至6月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和西南战线司令，7月至8月任俄军总司令。8月末发动叛乱，试图建立军事专政，遭到失败。

前线，来到因战争而疲惫不堪的战士跟前，立即开始劝导他们，说什么德国士兵也不愿意打仗，因此只要向他们表示同情友好就行了，就能使战争自然而然地结束。你们知道，战争是怎样结束的……同情友好只是使我们部队的情况更加糟糕。我们的士兵对和平的临近如此深信不疑，以至于认为任何的军事行动都是一种犯罪行为。可是德国的将军们却毫不费力地使我们遭受了新的失败，夺去了我们的又一些土地。当然，这只是拖延了战争，只是危害了革命，因为这使心怀不满的人在数量上增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所干的不仅是这些。他们把多少士兵推到了破坏纪律、拒绝执行首长命令的地步，又有多少士兵因此被送上了法庭，被判枪决和服苦役！

可是，当苏维埃真正开始着手为和平而斗争的时候，当它开始着手召开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大会①，希望以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来结束由一些政府挑起的这场战争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在干些什么呢？他们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同时宣称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叛徒。这意味着他们把分裂带进了工人国际，正如他们总是把分裂带进我国工人运动一样。

一个觉悟的工人能否投票赞成这样的党呢？当然不能。同志们，我相信，你们是会照我的样子，与布尔什维克断绝关系的。

你们是会这样做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在谋求成功的时候，总是迎合左的情绪，“反正就是那样，就是些工人、士兵或者农民”，从来也不试图打开他们的眼界，使他们面对真实情况，而是相反，许诺要给一座座金山，支持各种明显不能实现的要求，从而使群众必定面临不可避免的失望，并且经常使他们遭受残酷的失败。比如

① 1917年4月，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倡议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社会主义国际代表会议，但会议未能开成。

说，布尔什维克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说的——社会主义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他们又支持并自己提出了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这种监督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一个阶级——企业主——丧失了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并且这对国家政权并无好处（这是可能的），而有利于另外一个阶级——工人。任何人都清楚，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并没有使布尔什维克感到不安，他们继续在蒙蔽工人。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事情：一些不太觉悟的工人听信了他们的话，赶走了工厂主和管理人员，尝试着自己处理事务。结果怎样呢？厂主关掉了工厂，而工人都被解雇，没有了工作。

同志们，难道你们真的要跟这样一些领袖走吗？难道你们真的愿意相信他们会在立宪会议上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吗？

不，不会这样的！

工人的选票一张也不要投给布尔什维克，不要投给这些迎合群众情绪、不负责任的领袖们，他们每天都在改变自己的政策，他们没有勇气去坚定真诚地捍卫自己的立场！

同志们！我要投票赞成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投票赞成以孟什维克为首的（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我们大家都了解他们，工人阶级同他们一起曾遭受过失败，也取得过胜利。他们没有出卖过我们，没有欺骗过我们，没有奉承过我们，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孟什维克领导着工人群众和整个民主运动，我们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他们。让我们一起前进吧！让我们来投票选举孟什维克吧！

弗·叶若夫

№07776

社会革命党的选举纲领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土地和自由”

在斗争中获得自己的权利！

社会革命党的选举纲领
“和平、土地和自由”
劳动人民投票赞成三号名单

社会革命党是“土地和自由社”①、“民意党”② 等政党的继承者，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它致力于一劳永逸地消灭贫困、苦难、竞争、把社会划分成阶级——穷人和富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世界。要消灭一切当代的罪恶，必须消灭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要实现：

1）每个人都有在发展的意义上的生存权，即充分满足一切健

---

① “土地和自由社”是19世纪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组织，1876年成立于彼得堡，1878年起使用此名，其主要活动家有纳坦松、米哈伊洛夫、普列汉诺夫等人。

② 1879年，“土地和自由社”内部的分歧加剧，并最终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两个组织。民意党的纲领是推翻专制制度、召开立宪会议、争取民主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它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政治恐怖活动。领导机构为执行委员会，其成员有热里亚波夫、米哈伊洛夫、佩罗芙斯卡娅等人。

康的精神和物质的需求；

2）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劳动人民的全社会的财产；

3）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分配；

4）全社会的劳动是为了全社会的福利。

社会革命党有别于社会民主党，它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政党，它号召俄罗斯的工人和劳动农民为彻底消灭剥削、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奋斗。与此同时，党认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联合为国际社会主义联盟（国际组织）的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党就是这个国际组织的一员。

正如社会革命党经常指出的那样，俄国的革命具有社会的性质，因此它给自己提出的目标不仅仅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国。除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改善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之外，俄国革命还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主要的目标，那就是为了全人类的理想和真理，为了公平的真理，为了劳动的王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社会革命党人从来不像各个派别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希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所考虑和寄予希望的是通过与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地方和中央的自治机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的帮助下，通过逐步实现生产工具社会化，为直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无论是工厂无产阶级，还是劳动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而斗争，同时要想方设法阻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农民变成雇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将会发生）。

社会革命党不想隐瞒并且宣布，只有在现代的可怕的世界性大屠杀终止的时候，一切可能有助于劳动人民的改善才能真正成为现实。这种大屠杀产生于资产阶级的意愿，其全部重负都落到了劳动人民的肩上，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闻所未闻的灾难，加剧了经济的崩溃和物价的飞涨，最终难免毁灭革命及其用鲜血换来的成果，毁

灭我们的一切希望。

正因如此，无论是在立宪会议上，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社会革命党都将把同沙文主义倾向作斗争、尽快实现全民的和平、恢复第二国际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社会革命党将为俄罗斯争得光荣的和平、对俄罗斯的利益没有损失的和平。它拒绝同敌国单独媾和，因为这样的和平只会给国家带来新的压迫、经济破坏和新的战争。

社会革命党将为世界人民争得和平，为所有人——不分战胜者和战败者——争得正义的和平，为所有交战国劳动人民的利益争得和平。

社会革命党懂得，现代世界战争是由全世界资本家的联盟造成的，只有全世界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才能永久地预防任何战争。为此目的，党将竭尽全力争取由各国人民大会来缔结和约。

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将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其主要目的有二：

1）直接改善劳动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使他们现在就能过上与人的生存相称的生活；2）逐步向社会主义的王国过渡。以此为目的，社会革命党将在立宪会议上捍卫全体人民的意愿，也就是说，在国家制度方面，要使全国人民自己参与管理。

社会革命党意识到，甚至在一些共和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共和国）里也是由一个中心借助于官僚的帮助在管理着一切，人民政权的原则遭到破坏。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实现人民政权，社会革命党将要求建立边区和州的自治机关，由它解决所有地方事务，要使地方和城市自治机关在国家管理中有更大的影响，而不是由官僚们从彼得格勒管理国家。

社会革命党将为居住在俄罗斯的各族人民争取建立符合他们愿望和利益的自主的民族和政治机构的权利。只有俄罗斯各自由民族

的自由联盟（民主的联邦共和国）——它将是由全民选举的代表进行管理的——才能保证所有的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创造迅速摆脱现时破坏的可能性，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和财富。

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将力争制定明确的法律，以保障人民的公民自由（包括出版、结社、言论的自由等等），人身和住宅的不受侵犯，免费的、民主的和独立的法庭，不分性别和民族所有人权利一律平等，用民兵代替常备军。为了建立完全的人民政权，社会革命党将坚持实行：

1）关于全民公决的法律（全体居民的民意测验）——如果不经投票方式征询全国人民的意向，如果大多数人民投票表示不赞成，那末任何重要的法律都不能生效；

2）给予人民立法动议（发起）权，人民（一小批人）有权向中央和地方的自治机关直接提出法律草案以及各种要求。

社会革命党懂得，愚昧无知是反革命的同盟者，必须有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必须理智地使用各种自由和民主法制；只有在搞好经济福利，群众受到教育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党才能为全体人民捍卫整个世界，并力争尽快使人民精神的复兴。

社会革命党把在立宪会议上捍卫俄罗斯新的国家制度以及旨在使其经济繁荣的种种措施视为自己的责任。它同时认为，只有精神上自由的、有高度文化的人民才能按照自己的规划来改造国家。因此党将要求郑重宣布良心的完全自由，信仰的自由，消灭束缚人民良心、扭曲其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所有枷锁。在这方面，党认为主要的措施是宣布宗教是个人的事情，以及实行政教分离。在国民教育方面，党将争取做到普遍的免费的义务初等教育，开办大家都能受益的学校以进行手工业、工艺、技术知识和农业方面的教学，使中等和高等学校对所有的人——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子弟——都平等

地开放，以及建立人民之家、人民大学、星期日讲习班、以及业余成人学校等教育机构。

同造成全面破坏、全面毁灭的战争一样，经济的混乱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也阻碍了革命的进程，也危害了国家，铅一般沉重的负担也落到了劳动人民的肩上。劳动人民只有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才能享受到自由和光明，而国家遭到全面破坏首先对此产生了阻碍作用，因此，社会革命党把必须与经济破坏作坚决斗争作为最主要的任务之一。

在这方面，社会革命党将坚持执行一系列措施：1）同铁路、工业、农业的混乱现象作斗争，2）正确地分配粮食和商品，3）同物价飞涨作斗争。

为此目的，社会革命党将坚决主张对（首先是）工业产品和农产品规定一个最低的和公正的价格，限制资本家（企业主和商人）的利润（固定价格），对工业中一些最重要的部门由国家实行专营，依靠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合作社的帮助对生产和商业进行彻底的普遍的监督，以便预防投机和那些意在危害劳动人民的资本家的花招。为了同投机和怠工现象作斗争，党将没收暗中破坏的那些业主的企业。

党同时也将坚持采取措施，用对富有阶级课税的办法来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所有这些措施应能巩固人民和国家的经济，使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和创造新的生活，因为经济崩溃是贫困和饥饿的必然根源。在自己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同经济破坏的斗争中，社会革命党预见到：所有改善劳动人民和国家经济状况的措施是不可能很快奏效的，如果被战争削弱的俄罗斯不关心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的话。因此，社会革命党将为争取普遍的经济和平而斗争，因为一个战争债务在身、各方面都落后的俄罗斯，将在战后被外国资本家所征服。

因此党将执行这样一项政策，即希望所有交战国家的人民不仅签订一个政治和约，同时缔结一个经济和约，也就是建立一个共同和平合作、保卫自己利益并同国际资本家作斗争的联盟。只有这样的联盟才能及时防止资本家争夺市场和发动新的战争，并给每个国家和人民提供自由发展的可能。

但如果不特别重视在土地、工业、工人和税收政策方面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的话，所有上述措施在争取劳动人民经济福利方面仍是很不够的。

社会革命党认为，从前的整个税收制度的沉重负担只是落到了劳动群众的肩上，尤其是主要落到了被剥削者的肩上。直到如今，国家作为资本家的联盟、统治阶级的联盟，都在利用税收制度作为剥削的方法。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为了改善劳动人民的状况，在人民政权制度下是不应存在这种税收制度的。社会革命党将要求废除一切间接税——奢侈品除外，要求规定统一的累进所得税，并完全废除对劳动使用土地的某种租金。进一步的财政政策将体现剥夺资本家的收入并用于劳动人民这个精神。为了同资本主义作斗争，为了改善劳动人民的状况，党要求把所有土地交给全体人民。

所谓土地社会化，是既保证农业发展、又保证工业发展，巩固国家经济实力的一项根本措施，对工人和农民来说也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俄罗斯，这一措施是党首先提出的，而且只有它始终坚持这一措施并为之而奋斗。

土地社会化，这是土地和农民摆脱地主、商人和富农的政权的第二次解放；土地应该不交赎金而交给人民经营，并根据劳动平等的原则，归那些用自己的双手在土地上劳动的人所利用，无论是采用村社的、合作社的还是个体的形式。所有地下资源、森林和水源都应归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管理。土地私有制应予废除，土地不应成为商品。党认为，只有在土地社会化的条件下，

一个庄稼人的劳动才能为其自身的生存提供保证。在农业合作社自由发展的情况下，在科学对农业具有广泛帮助的情况下，自由的土地将成为巨大的人民财富的源泉；而且也只有在土地社会化的条件下，我国的工业才能有广阔的发展，而工人则可免遭失业和工资降低之苦。

为了改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方面的状况，党将尽快地贯彻一系列法令，以保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利益以及其义务，例如：以法律规定在目前条件下工作日不超过八小时；以法律规定最低工资数；在失业现象增加的时期——在复员期间这种现象将会特别严重——成立职业介绍所和社会劳动组织；颁布法律以保障工人阶级斗争的自由；组织对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保护；检查机关的民主化等等。

社会革命党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将坚决主张对所有劳动人民——既包括工人，也包括农民——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保险，并由资本家来负担费用。对工人而言，首先是失业保险、重伤残废保险和死亡、疾病保险等等。对农民来说，是歉收、牲畜因疫病传染而大批死亡、干旱、雹灾、死亡、疾病等保险。国家保险的种类将用对资本家征收特别税的办法来予以增补；保险工作由劳动人民自己来实行。在这方面的政策将破坏资本主义，而发展国家的生产力。但社会革命党在自己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不想到此停步。此外，党还将巩固我国工业的发展，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整和发展我国的工业。社会革命党将保护合作社的权益，全力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从自己的基本原则出发，将走对各类工厂、制粉厂等等实行社会化的道路，首先是对最必需的物品以及农用工具和机器的生产实行国家专营。这一措施将不仅使我们接近我们的理想，也将通过使居民中贫困阶层获得价廉物美的商品的办

法，来显著地改善他们的境况。

帮助战争的受害者

为了能够着手实行国家革新计划这一规模巨大的工作，党依然认为，这一工作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尽早取得和平，因为和平将给国家带来安定；但是对国家来说，立即产生了对那些残废者、战争的受害者、数以千计的孤儿和失去亲人的家庭给予最大关切和照顾的义务。党将把采取一切措施以期减轻战争造成的不幸和苦难视为自己神圣的义务。

首先，党有责任在立宪会议中坚持实现自己的国务工作计划。党没有迷误并且懂得，面临的工作是大量而又艰难的。它相信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的智慧与首创精神的力量，而劳动人民将以自己的创造和有组织的斗争来支持党的事业。党相信，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自己的“土地和自由！”的口号才能成为生活的财富。为了这一口号，党已经领导劳动人民进行了数十年的斗争。

选民同志们，工人、农民和士兵们！大家都去投票选举立宪会议代表吧！

投票赞成“土地和自由”的党吧！

投票赞成劳动农民和工人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吧！投三号名单的赞成票吧！

“土地、自由与和平”万岁！

国际万岁！

№07777

关于投票给社会革命党致人民的呼吁书

（不晚于1917年10月25日）

在斗争中获得自己的权利！

社会革命党
请你们别投孟什维克的票

工人和农民同志们，士兵和水兵同志们！

现在俄罗斯有好几个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些党都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党。其中最大的是两个党：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后者本身又分为两个部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由于在一个国家里存在着几个相互争斗的社会主义政党，引发了极大的灾难。劳动人民理应是团结一致的，他们理应有一个政党是他们利益的表达者。

但是直到今天，这些政党仍不能联合起来，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些区别。要知道，全俄立宪会议的选举日期渐渐临近了。各社会主义政党将在选举中分别发表意见。每一个劳动者都得在作出决定之前多加考虑，他应该把自己的一票投给哪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社会革命党始终坚决主张，在俄罗斯只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坚持这一主张是因为它从未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制造什

么区别，而是始终致力于他们的团结，把他们组建成一支统一而又强大的劳动人民力量，以此来反对他们的敌人——地主和资本家。

但是，在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之间，首要的区别在于，社会民主党人一直反对工人和农民在一面劳动的旗帜之下联合成一支统一的劳动大军。

社会民主党人考虑的是，只有那些现在没有任何财产的人才会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即在地球上实现这样的制度：当一部分人对于工厂、土地、铁路和其他财产的所有权被废除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将转归全体人民使用和管理）。照他们的看法，只有工人才是这样的人，而农民已经有土地这份“财产”了。社会民主党人力图使人相信，农民是不愿意与这份财产分离的，而那些资本家和地主则是一些大资产阶级。

按照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只有在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而转到工人等级的时候，在他们成为雇农或到城里去找工作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在俄罗斯必须立即解决土地这个大问题。必须决定如何着手处理土地问题。甚至连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也同意，必须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并且是不付任何赎金的。

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什么时候夺取土地呢？众所周知，社会革命党人主张必须废除一切私有制，把土地归全体劳动农民平均地、不可分割地拥有。对此，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会同意吗？不，他们知道；这样的办法将妨碍农民的无地化，而农民的无地化正是孟什维克所希望的，就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

在平均拥有土地的条件下，每个农民都可以跟其他农民同样地得到一块足以糊口的土地，农民不可能出卖这块土地，因为土地私有制以及土地的买卖都将被永远废除。农民也不会出租土地，因为

每个农民所拥有的仅仅是他本人亲自劳动耕种的那一块土地。当然，农民可以在任何时候放弃这块土地，离此而去。但是，如果土地能够完全养活他本人和他的家庭的话，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所有这一切孟什维克是清楚的，因此他们竟想出了一种在他们看来无疑将导致农民丧失土地的制度。孟什维克坚信，如果在农村里创造一些便于大的农业经济生长的条件，那未这种大的农业经济将永远胜过并“破坏”小的劳动农民经济。这对劳动农民将是不利的，因为结果是农民什么也没有剩下，他们要么出卖自己的土地，要么把土地出租，而自己则出去当雇工。照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用这样的办法，农民丧失土地的情况必将发生，而农民一旦成为工人，便将自然地成为社会主义者。根据所有这些想法，孟什维克坚决反对平均使用土地。他们认为，在夺取地主的土地之后，便把土地交给省或州的特别委员会管理。这些委员会应该把土地出租给个人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和资本家将能租到比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农民多好多倍的土地。结果是出现土地占有极不均衡的现象。

而在这种不均衡的情况下，大农业将有可能繁荣起来！由此我们将会看到，农民将失去土地，在市场上又无力同大农场竞争。当农民失去土地的时候，他大概就已是社会主义者了——孟什维克正是这样想的。社会革命党人一向从根本上不同意这些想法。他们经常胡说什么现在农民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农民首先应该失去土地。作为“私有者”的劳动农民是怎样一些人呢？他们是多好的“资产者”呀，他们常常过着比城里的工人更加贫困可怜的生活！农民和工人一样，受到地主、资本家、批发商人和所有资产阶级的压迫。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他们都是劳动人民，都被沉重的劳动所奴役。他们的愿望是共同的，他们的需要和利益也应该是共同的。

孟什维克说什么农民不愿意跟自己的“财产”——不够糊口的一小块土地——分开。这话说得对吗？是的，当然，对一个农民来说，这一小块土地是珍贵的，因为他是用自己的汗水来浇灌它的，因为这一小块土地是他生存的惟一来源。难道不正是农民自己过去和现在经常想的那样，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应该是任何人的财产。农民们说：“土地只应该归那些在土地上劳动的人来使用。”劳动农民为什么要害怕社会主义呢？

与孟什维克相反，社会革命党打算在当前正在进行的伟大俄国革命期间，实行一项极其重要的改革，它即使不能在农村中建立社会主义，也无论如何是向社会主义跨出了第一步。这项改革就是废除土地私有制，并将所有土地转为全体人民的财产。改革将严格地按照劳动农民本身的需要、利益和理解进行。农民说：“土地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属于任何人！”它也应该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并且应该归那些在土地上劳动的人使用。

被称之为土地社会化的这一改革是伟大的，它使俄国的革命具有了特别亮丽的色彩。我国的革命因此而成为一次伟大的革命，它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是一次政治革命，而同时也是一次社会革命。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间存在着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意见分歧。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我国的革命就其应该完成的那些任务而言，是一次社会革命。孟什维维克则认为革命是一次政治革命，而且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孟什维克认为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纯粹是资产阶级革命，并使自己的策略完全适合于这一观点。例如，无论如何他们都坚定不移地主张同资产阶级妥协。

同样，在政治策略的其他一些问题上，他们也有意识地持最温和的立场，生怕把资产阶级“吓跑”并脱离革命。但越来越清楚的是，必须发展革命、巩固人民所取得的成果，而这在各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这就是为什么劳动人民不应该投票

赞成孟什维克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无论工人、农民还是士兵，都应该来投票赞成这样一个政党，这个党在自己的土地纲领和工作纲领中，在它给正在进行的革命所提出的那些任务中，勇敢地同资产阶级旧世界斗争，使俄国劳动人民日益接近光辉的未来。这个党就是社会革命党！

№07782

致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军队委员会的呼吁书

（1917年10月25日）

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
致各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各军队委员会

同志们！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是在彼得格勒的街道上已经流洒了同胞的鲜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而引起的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召开的。社会革命党党团、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国际主义者）和人民社会主义党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参加代表大会，并退出了代表大会。

有鉴于此，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未开成，正在进行的大会只能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局部会议。

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这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是不合法的，地方苏维埃和所有军队委员会没有义务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号召苏维埃和军队组织为保卫革命而团结在它的周围。

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在条件具备时召开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

彼得格勒

№07783

告彼得格勒全体居民书

（不早于1917年10月25日）

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①]

致彼得格勒全体居民！

忠于祖国和革命的部队正在向彼得格勒开进，这些部队是应俄罗斯民主派各中央领导机关的召唤前来保卫自由和秩序的。军队把自己的部队从前线派来不是为了进行国内战争，而是为了制止由布尔什维克丧失理智的、罪恶的发动造成的民主派队伍的内讧。

够了，不要再动摇了！够了，不要再戏弄俄罗斯和革命了！让俄罗斯土地的全权主人——全民的立宪会议——来解决我们的一切党派争论吧。但愿谁也不敢借助武力、用起义的方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对于自由的国家来说，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和布尔什维主义是同样危险的。

前线结束了科尔尼洛夫的冒险行为，如今它正在又一次拯救革命。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们，你们要顺应前线的意志。不要迫

---

① 1917年10月25日后，立即由彼得格勒市杜马、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预备议会和其他机构的代表组成了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旨在组织社会力量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委员会由阿夫克森齐耶夫主持。

使军队用它同祖国的敌人谈话的那种语言来同你们交谈。逮捕那些叛徒！是他们使你们误入歧途，指使你们反对军队，以谄媚和谎言实现了自己夺取政权的计划。如果你们现在表示你们不是同叛徒、而是同祖国的保卫者站在一起，那么还为时不晚。

彼得格勒的公民们，请不要惊慌。随着前线作战部队的到来，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得到保证。你们再不用害怕无政府状态和反革命。

根据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授权

马列夫斯基、格尔施泰因、费恩

北方战线政委　沃伊廷斯基

№07784

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呼吁书

（不早于1917年10月25日）

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

呼　吁　书

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确认：

1. 布尔什维克背着拥有全权的民主机关和各个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组织，采用军事阴谋的方式夺取了政权；

2. 这种强制性的变革把国家引向彻底崩溃，并且已经成了血腥内讧、同胞残杀和野蛮破坏的根源，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对此应承担全部责任；

3. 布尔什维克们同时还取消了公民自由（集会、罢工、出版和言论的自由，以及人身的不受侵犯）；

4. 他们制造了这样的条件，使得立宪会议选举不能在规定的日期正确地进行；

5. 布尔什维克在和平的口号下所发动的起义，无论对保卫国家和还是对签订和约都造成了极大困难；

6. 布尔什维克对受尽苦难的群众许下了诱人的诺言，但他们以自己的全部行动造成了这样的条件：不仅这些诺言无法兑现，而且城市居民受到了饥饿和失业的威胁，全国处于彻底崩溃的境地。

可以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只有在全体公民自由承认而不是用强制的军事政变的条件下，一个政府才有可能建立起来；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企图把革命成果据为已有，并对公民使用暴力，那末这个政府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是不可能被承认为是合法的；只有能够团结最广泛民主阶层的绝对民主的政府，才能得到国家的承认。

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把恢复革命秩序和建立有继承性的、有学识的民主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它坚信，这个政权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承认：在其组成中没有上述那些灾难的责任者。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向所有的城市、地方自治机关、农民、工人、军队和其他革命民主组织呼吁：

1. 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并同它作斗争；

2. 建立地方性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它们应该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协助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完成其任务。为此目的，各地委员会彼此之间，以及同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之间，应该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

№07785

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呼吁书

（1917 年 12 月 28 日）

致所有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陆军和海军各委员会、团结在各苏维埃和委员会周围的所有组织、退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党团成员

工人和士兵同志们！我们向你们——珍视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紧急呼吁！你们要知道，背叛的打击正威胁着革命的国家、立宪会议和苏维埃事业。你们的职责要求你们奋起保卫它们。在十月代表大会①上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18］1 月 8 日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目的在于中断立宪会议。

同志们！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1917 年］10 月底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立宪会议竞选运动）召开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党被其领导部门引向冒险主义的方向，走上了并非是阶级组织特有的从事阴谋活动的道路，在彼得格勒制造了政变并夺取了政权。某些支持这一立场的团体显然竭力在代表大会的组成方面玩弄花招，使召

① 指 10 月 25 日召开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出现了混乱。应出席的军队代表大多缺席（仅有两个军的代表到会）、全国各地苏维埃派出的代表也只到了很少的一部分（900 名中只有将近 120 名）。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自然不能承认这样的代表大会有权来解决苏维埃政策方面的种种问题。

尽管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有相当数量的代表（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劳动派，人民社会主义党等党团）相继表示抗议，甚至退出代表大会，但大会仍然选举产生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新的组成人员。要把这个机构看做是国家所有苏维埃的领导中心，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代表大会上留下来的那部分代表使大会成了只是由一小批布尔什维克以及附和他们的为数不多的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会议。

于是，由这次会议所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仅仅能够得到这些集团的代表的承认。这个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使苏维埃的组织工作出现空前的混乱。它以恬不知耻的手法对付那些猝不及防的人们，对付那些被事先摆弄好的、怯懦的地方苏维埃，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它以拙劣的疯狂冒险的政策使工人阶级和军队上当受骗。在已经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这个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企图控制整个苏维埃俄罗斯。它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因为人们对那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代表的团体的政策的信心尚未完全丧失。但是，国内很大一部分苏维埃同苏维埃的某些党团——它们是由最忠诚、最有经验的工作者组成的——一样，继续坚持统一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全国工人群众的阶级组织，领导他们的思想政治生活，深化革命的政治和社会主义的成果，以联合为苏维埃的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直接施加压力，完成他们所面临的各项任务。特别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组织生产和粮食供应的问题，以及

争取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

可以预料，夺取了政权的冒险主义团体的政策将遭到彻底的失败。和平不可能通过与盟国决裂而与主要帝国主义强国集团勾结的途径来实现。

那些主要大国注意到，人民委员会的政策导致了俄国军队的瓦解和生产的混乱（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失业）并在国内引起了一场内战，［俄国］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人民政权，于是就极其厚颜无耻地试图夺取其西部的一系列地区（波兰、立陶宛、库尔兰），并且在新的经济的方面——如果说不是在政治方面的话——奴役我们整个国家。

粮食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尖锐性。组织得很好的有关机构部门遭到粗暴干涉，全国性的内战彻底破坏了对急需粮食地区的供应工作。北方和军队面临饥饿。工业正在消亡。许多工厂已经停产。由于人民委员会目光短浅的政策，许多工人成为失业者而被抛上街头。暴力正威胁着全体人民的自由。当初，篡权者在立即召开立宪会议的旗号之下实现了十月政变，而在选举已经进行之后，他们又企图用逮捕立宪会议成员和驱散立宪会议的办法掌握政权。

全部居民，首先是全体工人阶级和军队，应该拿起武器，保卫以立宪会议为代表的人民政权，因为立宪会议有义务使人民得到和平，并通过立法的途径来巩固工人阶级所取得的革命成果。

同志们，在向你们通告这些情况的同时，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号召你们立即同它进行直接的联系。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十月份的代表大会是没有被授权的，并决定着手准备召开新的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

最近，在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人民委员会与立宪会议的最高权力进行的斗争中，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干预由

那些冒险家人为制造的苏维埃与立宪会议的冲突。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苏维埃的自决，端正它的政治路线，并以此划清立宪会议和苏维埃的职能。

同志们！之所以决定在1月8日召开代表大会，是想造成苏维埃同立宪会议的冲突并以此破坏后者。

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出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决定于1月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由所有苏维埃、军队和海军的委员会以及团结在他们周围、站在保卫立宪会议立场上的所有组织的党团参加的非常会议。必须讨论如下一些问题：

1. 立宪会议的权力。

2. 为普遍的民主的和平和重建国际而斗争。

3. 苏维埃政策的近期任务。

同志们！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非常会议上，你们应该保证所有工人和士兵的组织具有选派代表的充分权利。你们应该在各地建立巩固的据点。将会有一场斗争。

为了革命，必须投入全部智慧和全部精力。

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07778

致工人和全体公民的传单

（不早于1918年1月5日）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劳动人民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的传单

致工人和全体公民

［1918年］1月5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人民委员会的武装力量向举行拥护立宪会议的和平游行队伍射击。工人因拥护立宪会议而遭到布尔什维克杀害，而正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25日以他们能够召开立宪会议为理由夺取了政权。

当继续拖延召开立宪会议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他们便用自己的军队包围了塔夫利达宫所在的那个地区。他们的武装人员挤满了塔夫利达宫，在拐角处朝着走向塔夫利达宫的和平游行示威的人群开枪射击，用武力驱散了立宪会议。沙皇专制式的黑暗时代开始了。街上的和平游行被禁止。和平游行队伍在没有得到警告的情况下就遭到了猛烈的射击。公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被剥夺了。

工人的旗帜被撕毁、被烧掉了。所谓的“主谋者”和领导人被逮捕了。就同专制制度时期那样，执政者在干下卑鄙勾当后的第二

天，便对自己的受害者造摇中伤。他们断言，无论是在彼得格勒还是在莫斯科，是游行示威者朝塔夫利达宫的警卫队开枪并投掷炸弹。这是蓄意的撒谎。游行的人群非但没有开过一枪，也没有扔过一块石头、一个雪球。没有做任何可能成为士兵和赤卫队员使用武器借口的事情。然而他们还是开枪了，显而易见，上面就是这样命令的。

在准备驱散全民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同时，人民委员会决意用冷酷策划好的枪击手无寸铁的人群这种办法，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拥护立宪会议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的鲜血染红了彼得格勒的街道，而苏维埃政权明天就会证明，它是依照工人阶级的意志行事的。1905 年 1 月 9 日，尼古拉·罗曼诺夫和特列波夫枪杀过要求召开立宪会议的工人。今天，当劳动人民经过了十二年斗争之后，立宪会议已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为立宪会议而遭到自称是工人阶级代表的那些人的枪杀。

工人、农民和全体公民同志们，在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在指向你们的枪口面前，你们不会后退。为争取彻底的人民政权，反对一党专制和暴力，你们不会放弃斗争。

只有全民选举的立宪会议才能胜任安排好俄罗斯土地的事情，才能恢复俄罗斯的统一、结束国内战争、签订和约、巩固人民拥有土地和自由成果的权利、防止已经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饥饿的威胁。

向那些暴徒们抗议，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保卫俄国革命伟大成果——立宪会议——的公民的鲜血。向那些新的专制者指明，无论鲜血怎样流淌，他们也无法摧毁人民的意志！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和暴力，都要力争把全部政权转交全民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万岁！全民立宪会议万岁！打倒罪恶的国内战争！

№07774

致全俄罗斯公民书

（不早于1918年1月5日）

（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联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致全俄罗斯的公民们

立宪会议被以武力驱散了。在人民获悉立宪会议在自己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会议上所做的事情之前，立宪会议就被解散了。甚至早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打算作出解散立宪会议的决定之前，立宪会议就已经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随后便关闭了塔夫利达宫，不让任何一位立宪会议成员进入。只是在这之后，才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关于解散的命令。因为自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没有任何“苏维埃政权”，有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委员会的政权，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武装队伍的政权。

在那次惟一的能够举行立宪会议的大会上，曾试图着手解决民主俄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难题。它以土地法令把所有地主的、教堂的和修道院的土地都归于农民。

它以关于和平的决议确认了俄国前线所存在的暂时停战的情况，同时作了新的尝试，以俄罗斯全体人民和俄罗斯所有民族的名义呼吁盟国参加和平谈判。究竟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要解散这样一个由社会主义者构成压倒多数、反映人民基本愿望的立宪会议呢？

这只是因为它不愿在枪口之下不加讨论就批准“人民委员会”在两个月内颁布的所有自相矛盾的、荒谬的、在很多方面对国家有害的法令。这只是因为它不愿意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首领组成的那个小团体是全体人民的政权：在立宪会议选举时，在投票的选民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投了这个小团体的票。人民的少数的代表赶走了人民的多数的代表。他们是用警卫队的刺刀来驱赶的，是用向和平的工人队伍——1月5日他们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拥护立宪会议的游行——射击来驱赶的。

随着立宪会议的被解散，一场根据列宁和托洛茨基定的调子演出的闹剧结束了。10月25日，他们推翻了临时政府，指责它不愿召开立宪会议，而且保证说他们将在预定日期召开立宪会议。11月12日① 之后，由于大多数农民在选举中没有投布尔什维克的票，他们便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法令，使那些选出的代表不符合他们心愿的地方的苏维埃有权暂时停止选举②。地方苏维埃没有利用这一权利，“人民委员会”便在预定立宪会议开幕的日期，11月28日，宣布延期，直到出席会议的代表不少于400人的时候再

① 苏维埃政权确定的进行立宪会议选举的日期。

② 原文如此。1917年11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赋予地方苏维埃召回已选出的代表并组织改选的权利。参阅《俄国立宪会议·1918年·速记记录和文件》，第56～57页，莫斯科，1991。

召开[①]。这一天——1月5日，终于到来了。这一天还没有结束，全俄立宪会议就被解散了[②]。

同志们，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揭露那些声称是来建立人民政权的人的伪善吗？正义的事业是不需要欺骗和伪装的。

立宪会议被解散使得结束国内战争的希望破灭了，使得结束内讧、无政府状态、破坏状态、饥饿和笼罩全国的其他种种灾难的希望破灭了。我们越来越走近深渊。除了工人阶级，谁也无法把俄罗斯从最近的不幸中拯救出来。工人阶级在把俄罗斯从沙皇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始终走在人民的前列。因此，在重建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事业中，工人阶级应该再次站在人民的前列。惟有立宪会议才能制止革命的衰落，惟有立宪会议才能使俄国革命复兴。

所有社会主义政党在立宪会议中都有代表，都有与其力量和数量相应的席位；所有劳动阶级在立宪会议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俄罗斯所有的省、所有的民族在其中也都有代表。因此，立宪会议能够恢复工人、农民和整个革命民主派的统一，它能够代表这样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担负起和平事业，能胜任粮食供应、工业调整、土

① 人民委员会是在11月26日通过“关于立宪会议开幕”的决议的。决议规定，立宪会议只有在代表人数不少于一半时方能开幕。而在预定开会的11月28日，才到了172名代表。立宪会议不能如期举行。28日，一些人民自由党人进行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并进入预定会场塔夫利达宫，遭到镇压。当天，人民委员会通过“逮捕反革命内战首领”的法令，逮捕了一些人民自由党活动家，其中包括当选的立宪会议代表，人民自由党事实上被取缔。同时决定，立宪会议延至1918年1月5日开幕。12月23日，政府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战时状态，忠于布尔什维克的部队被调入首都。

② 1918年1月5日，在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和平示威，被武力驱散。在立宪会议上，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等拒绝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即拒绝按照人民委员会的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并自行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先后退出会议。到1月6日凌晨4时，坚持留在会场的立宪会议代表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

地利用等事业，能顺利解决民族问题。

在你们面前有两条道路。或者是信任只会依靠武力、只会依靠镇压各社会主义政党来进行管理的那个党，从而进一步加剧饥饿和破坏，导致俄罗斯内部彼此敌对的战争，导致赤手空拳地重开对德战争；或者是迫使布尔什维克党放弃专制和恐怖，承认立宪会议，承认大多数人的权利，同意和大多数人一起为所有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复兴俄罗斯，以整个革命民主派的共同努力争取巩固的、可以接受的和平。第一条道路是通过国内战争而走向反革命。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协商来拯救革命。请你们选择吧！

全民的立宪会议万岁！

打倒国内战争！打倒专横和暴力！打倒恐怖！

立即的、普遍的和平万岁！国际万岁！

民主共和国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07780

关于刺杀米尔巴赫伯爵事件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发动

（1918年7月9日）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刺杀米尔巴赫伯爵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发动[①]

社会革命党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形式是俄罗斯合法的国家政权，因此它从来也不承认由苏维埃政权以国家的名义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党在指出布列斯特条约对俄罗斯、对其目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的同时，始终号召废除这一条约并继续对德国作战。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宣布，它认为俄国与德国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因此我们不能承认根据苏维埃政权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出任驻俄罗斯全权公使的米尔巴赫伯爵。对我们来说，米

① 1918年7月6日，发生了所谓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事件。两名持契卡证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德国大使馆，炸死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同一天，在契卡中工作的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武装发动，要求废除同德国的和约，并扣押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近年来，一些俄罗斯学者指出，这次事件并不是有组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层没有倡导也没有支持这一行动。一小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很快就被平息，同时，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成员被拘留。随后，大会决定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除出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

尔巴赫伯爵不过是这个敌对国家的一名代表而已，这个国家强行入侵俄罗斯共和国的国境，因此我们应继续同这个国家进行顽强不屈的斗争。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坚决反对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进行的刺杀米尔巴赫伯爵一事。我们认为，不能用这样的办法解决国际问题，尤其是解决战争问题。在未经征询人民的意愿，未经他们亲自决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以杀害另一国家代表的赤裸裸事实把国家和人民强制卷入战争的。不负责任的一小撮人或者甚至是个别政党，是不能代表整个国家解决全国性问题的。因此，从政治观点看，我们对刺杀米尔巴赫是持强烈否定态度的。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是与根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刺杀米尔巴赫伯爵一事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苏维埃政权、它的存在及其政策，越来越紧密地与德国政府的政策连结在一起了。只有在布列斯特和约有效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才能存在。而按照这一和约，我们的国家就得听任德国蹂躏。正因如此，支持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存在下去符合德国政府的利益。刺杀米尔巴赫伯爵这个与苏维埃政权打交道的德国代表，不仅是对德国的打击，也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打击，并使苏维埃政权面临布列斯特和约被破坏的致命危险。随着米尔巴赫的被刺杀，事件发展的逻辑必然促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迫起而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一发动很快便被平定了，但它已经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它使至今团结一致的苏维埃队伍产生了分裂，它破坏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使苏维埃代表大会（就其组成而言实际上已被做了手脚）变成了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大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发动暴露了苏维埃政权本身的虚幻。在宣布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受法律保护之后，苏维埃政权就不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从形式上到实际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苏

维埃政权的发动对于苏维埃政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是由十月革命期间站在承认苏维埃政权立场上的、它的那些忠实战友所给予的打击。他们的发动具有无组织的、偶然的性质，只是国内对苏维埃政权不满情绪的局部表现。

尽管社会革命党自己也在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但是它不能赞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我们不能接受那种密谋、侥幸的政变以及无组织的发动的方式。我们同脱离了苏维埃政权并对其抱有敌对情绪的人民群众一起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冒险、鲁莽和侥幸发动的方式不是我们的方式。推翻苏维埃政权只有在人民群众参与这一斗争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最近几天所发生的所有事件告诉我们：这一时刻正在临近，我们正朝着人民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安排自己国家命运的方向前进。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发动与这一以复兴国家和保卫我国革命的成果为目的的人民运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失败只是充分地揭露了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的真实内幕。而他们的胜利则有可能以他们自己的专政而著名。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国家生活都是不会改变的。

因此，俄国的劳动群众和我们的党，应该超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发动而继续自己重建民主俄国的工作。

№07781

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关于斯皮里多诺娃事宜的决定

（1919年3月27日）

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国际主义者）

关于斯皮里多诺娃① 的情况

鉴于斯皮里多诺娃同志的健康遇到了无可置疑的危险——这是由于对她可能继续采取没有任何保障的“疗养”制度的缘故，从2月14～15日到3月9日，她曾处于这种“疗养”制度之下；鉴于斯皮多诺娃同志的生命是党的需要，也是她从事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作的需要，左派社会革命党（国际主义者）中央决定组织斯皮里多诺娃同志逃亡，并已将此决定送达她那里②。

至于那些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宣布为人质、目前被关押在布蒂尔卡以及全俄各地监狱中的其他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员同志的生命问题，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警告全俄肃反委员会，它要对被关押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国际主义者）每一个党员的生命负完全责任。

① 斯皮里多诺娃，玛利亚·亚历山大罗夫娜（1884～1941），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该党左翼的积极组织者，11月左派社会革命党成立后，任该党中央委员。她坚决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参与了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② 斯皮里多诺娃在1919年2月遭到逮捕，同年4月2日逃脱。1920年10月，她再一次被捕，经克拉拉·蔡特金向列宁请求，于1921年获释。后脱离政治活动。

【专题说明】

国内战争时期的
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问题

（1918年1月至1920年10月）

国内战争年代，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军事问题居于首要位置，但党的领导层在有关军事领导和军事路线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分歧，而且经常表现为尖锐的派别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本专题文件收入了内战期间领导层内部的48件来往电报和信件，其内容涉及对内战各个战场形势的分析、作战方针、干部政策、后勤供应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党内斗争。这些文件所包含的材料反映了日后在苏联政治中具有至关重大影响的党内派别和集团的形成及其初期活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私人关系的特点及其对决策过程的影响，以及作为当时党和国家权力体系中最主要因素的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毛子成、王红翻译）

№04121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致
列宁、波德沃伊斯基的电报

（1918 年 1 月底）

急件，优先

抄送人民委员波德沃伊斯基

发自哈尔科夫

人民委员会，列宁

我最坚决地抗议宣布全面复员[①]。既然你们赋予我责任，那我就要求你们电报声明复员不涉及在乌克兰战线上作战的军队。我所有的炮兵和骑兵都将完结。你们的命令没有对某些特定战线的炮兵和骑兵预作说明，对此我坚决抗议。让那帮不懂事理的军事委员们滚开！不要毁了事业。形势还可以挽救。现在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使我丧失了军队。

人民委员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

① 在俄国军队事实上已经崩溃、大量军人逃亡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于 1918 年 1 月开始部分复员军队。差不多同时，列宁签署了关于建立工农红军和设立军事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全俄组建工农红军委员会的法令。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中担任苏俄代表团团长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于 1918 年 1 月 28 日以苏俄政府的名义声明，苏维埃俄罗斯不签署和约，也不再进行战争，并将解散军队。最高总司令克雷连科于 1918 年 1 月 29 日向作战部队下达了关于解散军队的命令。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就是在这一情况下给列宁发这份电报的。就在 1 月 29 日当天，列宁要求克雷连科以一切办法取消有关全面复员所有战线的军队的命令。一天之后，列宁又要求军队的所有政治委员和邦奇－布鲁耶维奇，扣压托洛茨基和克雷连科签发的一切关于解散军队的电报。（《列宁全集》（俄文版）第 50 卷，第 364 页。）

№04123

越飞[①] 致列宁的信

（1918年3月11日）

1918年3月11日17点10分收到 便函，人民委员会，列宁，莫斯科 昨天在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部分委员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我提出的关于任命托洛茨基为总军事人民委员的建议。还应该征求其他中央委员的意见。托洛茨基同意接受这个职务。昨天在托洛茨基主持下，这里建立了彼得格勒公社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今天的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事，反对托洛茨基、我、布拉贡拉沃夫[②] 的多数派决定自己承担彼得格勒的防卫——对外防卫和对内防卫，并干预军事专家在军事战略和军事技术方面的决定。我们坚持政治委员应被授予最广泛的权力，包括对将军就地枪决的权力——在其叛变的情况下，但无权干涉军事专家作出的带有战略和军事技术性质的决定。在这一建议遭到拒绝后，我们三人声明退出会议。很清楚，如果这里的多数派通过的决议得到实施，那么不仅在彼得堡，而且在全俄范围内，组织新的军队和恢复战斗力的工作将会夭折，因为任

---

① 越飞，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1883～1927），19世纪90年代末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是孟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入区联派不久与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进入中央委员会。第一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是布列斯特和谈的苏俄代表团主要成员，随后为俄罗斯联邦驻柏林全权代表。20年代上半期先后任驻中国全权代表和驻奥地利全权代表。

② 布拉贡拉沃夫，格奥尔基·伊凡诺维奇（1895～1937），十月革命后任彼得保罗要塞政治委员，1918年为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

何一个诚实的和有自尊心的军事专家都不会在这种条件下工作。惟一的挽救办法是立即任命托洛茨基为总军事人民委员，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至于必须同这些孩子式的谵妄狂想打交道。我再重复一遍，托洛茨基本人也同意，必须立即通过人民委员会对他进行正式任命，并公布这一任命。必须在明天以电报或无线电形式使各地都知道这个任命，否则，目前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军事专家就会跑光。根据我得到的最新消息，这一任命的政治意义是不可估量的，特别在英国和法国更是如此。我坚持主张立即采纳这个方案。请尽快回答斯摩尔尼宫[①]。

越　飞

① 1918年3月14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关于任命托洛茨基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并同时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04127

斯大林致列宁、托洛茨基的信

（1918年6月22日）

1918年6月22日，列宁同志！托洛茨基同志！

我写简单些，时间太少，忙得团团转。

1）粮食事务正走上轨道，如果多运来一些印花布和小面额纸币（不要大于500卢布），事情就会更好①。

2）在外部战线，以及特别是在内部战线，战争情况都明显恶化。专家都是些死气沉沉、脱离实际、完全不适于国内战争的人。与此同时，哥萨克并没有睡觉，他们一遇机会便会同奥伦堡的哥萨克联合起来，将中央地区与南方产粮区隔断。我不想为自己谋取任何军事职务，但军区司令部硬把我拉进他们那一摊事。我感到不这样也不行，没别的办法。现在我认为，如果我拥有直接的正式的干预和任命的授权，诸如任命部队和司令部的政委、出席军区司令部会议以及在南方代表中央军事权力机构，将会对工作有利。你们自己想想，前些天专家科瓦列夫斯基被某一位“政委”逮捕了，而斯涅吉廖夫只是由于上了前线才幸免于逮捕。还有，泽金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是诚实可靠的，但另一位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挥霍公款的人，等等，等等。必须立即纠正所有这些毛病，但谁“应该”来干这件事呢？中央一下子不可能弄清情况，而这里又没有中央的全权（军事）代表。你们是否知道，彼得罗夫和他的

① 斯大林是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5月29日的决议，到察里津领导南方的粮食征集工作的。

整个司令部不知为何去了莫斯科，而他的“集团军”因此而完全瓦解并为哥萨克开放了道路。你们是否知道，我们所宣布的对哥萨克人的动员同我们自己开了个恶毒的玩笑，我们武装了数千哥萨克人，他们从我们的司令部得到了火炮和弹药，然后就离开了我们，现在正用我们的炮弹打我们的部队①。你们是否知道，所谓顿河共和国② 的一些部队（顺便说一下，其中哥萨克人总共只占 2%～3%）企图夺取察里津的火炮，然后轰掉当地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所有这些问题都只能在当地解决。

3）在罗斯托夫前线已开始同德国人进行谈判③。

4）我收到了你们发来的密电，但没有给我密码。请原谅，这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

5）为什么不向我通报有关的事情？

斯大林

① 1918 年 5～6 月间，根据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先后在顿河、库班、西伯利亚和奥伦堡等哥萨克区实施动员，组建红军哥萨克部队。

② 顿河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 1918 年 3 月，其辖地为原哥萨克顿河军辖区，属于俄罗斯联邦，首都是顿河罗斯托夫。1918 年 5 月，被德国军队和哥萨克白军占领。9 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决定撤消顿河苏维埃共和国。

③ 指同德军的停战谈判。

№04128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和列宁的电报

（1918年7月11日）

托洛茨基，抄送列宁

由于时间紧，我简单地写几点。

1. 我们和你们，大家都犯了错误：宣布对哥萨克进行单独动员。1）同克拉斯诺夫[①] 相比，我们晚了；2）我们这里没有一个能够将哥萨克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周围的革命的哥萨克核心，（“顿河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神话。由于那些“外来人”[②] 和为数不多的仍然支持我们的哥萨克的坚持，这个“政府”昨天宣布解散了。）这件事本身说明，我们所宣布的对哥萨克的动员有利于克拉斯诺夫，因为被动员的哥萨克得到枪炮以后就成千上万地转到克拉斯诺夫一边去了（他们正在主要以这种方式组建克拉斯诺夫“集团军”）。

2. 了解这件事的人一致认为，我们在顿河州的支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所谓的“外来人”。在他们没有从哥萨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特殊阶层的情况下，也只能进行“普遍”动员了。只有这样才能把哥萨克作为军事力量加以利用。莫斯科的“哥萨克委员会”[③] 脱离生活，不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

3. 哥萨克单独动员对我们造成的损害不仅是在顿河州，而且

---

① 克拉斯诺夫，彼得·尼古拉耶维奇（1869～1947），俄国将军，1917年8月曾参与科尔尼洛夫叛乱，十月革命后曾指挥克伦斯基调往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1918～1919年领导顿河哥萨克白军，失败后逃亡国外。

② 指居住在哥萨克土地上的非哥萨克人。

③ 管理各哥萨克地区的机关，1918年5月底成立。

也在库班－捷列克州。哥萨克人得到武器后就听命于旧哥萨克军的军官们，就进行局部的发动，开始在整个北高加索破坏铁路。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认为，向他们提供支持的不仅有克拉斯诺夫的、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的间谍。

4．由于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完全不能适应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条件，使事情复杂化了。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的“专家”在心理上不能同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战争，而且在于他们作为“司令部”工作人员只会“图上作业”、制定改编计划等，而对作战行动、供应事务、对军事指挥员的监督等绝对是漠不关心的，总的来说，感到自己是局外人，是客人。军事委员也不能填补漏洞。泽金不大聪明，掌握情况差，随波逐流。阿尼西莫夫觉悟较高并很机灵，但他单枪匹马。而军事指挥员及其助理们对工作是如此冷漠，以至于在季霍列茨克交通线中断两天之后，他们——斯涅萨列夫和泽金——还打算去巴库（尽管没人邀请他们去那里），只是由于我的抗议（我指责他们逃跑）才迫使他们推迟了行期。而且我不能不指出，他们虽然留在了察里津，但并不努力采取措施恢复中断的交通线，直至今天。

5．所有这一切，以及南方（我管辖的范围）的粮食问题成了军事问题这一事实，迫使我不得不干涉司令部的工作。我已不想多说，由于北高加索军区的各司令部在供给事务上明显的敷衍塞责，各条战线和各地段司令部的代表团要求我进行干预。我向司令部派去了三位同志（根据当地人们的建议），按我的要求，其中一人被任命为军事监察处主任（鲁希莫维奇），其余两位为助理（瓦季姆、巴尔霍缅科）。这三位同志发现了一系列不能允许的疏漏，找到了几门大口径火炮和几辆装甲汽车，泽金曾否认有这类武器，而前线由于没有这些武器已经吃了两三个星期的苦。找到的火炮被投入使用了。后来发现了一种通病：我们有许多指挥员，但司令部不善于（或不愿意）使他们服从统

一指挥。如果不是这种毛病的话，道路是不会中断的。当卡尔宁① 前线与补给点的联系被切断，北方与产粮区的联系被切断时，我认为自己无权对这种情况袖手旁观。我将纠正地方上的这些和许多其他毛病，我正在采取（和将要采取）一系列措施，直至撤掉那些毁坏事业的官员和指挥员，尽管存在着形式上的困难，但必要时我将摧毁它们。与此同时，很清楚，我本人要对所有上级机关承担责任。

6. 察里津正在变成弹药、武器装备和军事行动等等的基地。这里不需要像斯涅萨列夫这样的萎靡不振的军事指挥员。你们那里有没有其他人选？军事委员应该是军事工作的灵魂，是领导军事专家的灵魂，但在察里津却相反。（请给阿尼西莫夫派一位比泽金强的同志。）

7. 特里丰诺夫“屈服了”，成了忠顺的人，但作为军事委员不适合。我们派他到你们那里当催办军事物资的代表，他看来适合干这项工作。阿夫托诺莫夫同法国人交好，一般认为他听任哥萨克匪帮破坏铁路。各级司令部的大门不知为什么都向法国代表团成员敞开，而且，根据同志们的证明，我们库班人反对德国人的冒险行为是由法国人和相信他们的没头脑的人一手造成的。我声明，如果他们（法国人）落入我的手心，我决不放过他们。

8. 为什么不用在察里津无所事事的海军驱逐舰去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人② 呢？

人民委员　斯大林

察里津

1918 年 7 月 11 日

---

① 卡尔宁，奥斯卡尔·尤里耶维奇（1895～1920），1911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师政委、旅长，在前线阵亡。

② 1918 年 5 月底，准备遣返的由约 5 万名捷克斯洛伐克战俘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发动叛乱，祸及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

№04129

斯大林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18年7月17日）

收到了你的信，谢尔戈，以及卡尔宁的问候。我的时间很少，因为我要直接转入工作。

1．第一个问题。铁路交通中断，一方面，俄罗斯与惟一的产粮区处于完全被隔绝的状态，这使得饥荒不可避免（请注意，通往基兹利亚尔和彼得罗夫斯克的道路也中断了）；另一方面，罗斯托夫前线与供给中心的交通也中断了，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条战线的崩溃。如果交通不能迅速恢复，北方的饥饿暴动和失去北高加索也将是必然的。我们这里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即恢复交通线，我想，你们那里要尽快找到可能的力量从南面实施突击（去济莫夫尼基的道路已被切断）。在任何情况下，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突击是绝对必要的①。赶快行动，为时还不晚。

2．你们那里有大功率电台，你们最好能同察里津建立正常联系，察里津有接收电台。您为什么不利用这一途径呢？空中航线无疑很方便，但驾驶员很调皮，不会尽心执行任务，何况对他们并不是能够始终相信的。

3．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莫斯科和穆拉维约夫在萨马拉附

① 1918年7月下旬，由于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顿河军对察里津的进攻，察里津与北高加索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在捷列克，哥萨克白军也取得进展，建立了捷列克边疆区临时人民政府。格罗兹尼和基兹利亚尔也相继陷落。当时奥尔忠尼启则作为驻俄罗斯南方的特别政治委员在捷列克州负责镇压捷列克哥萨克的暴动。

近的冒险行为[①]，您想必知道。在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想把俄罗斯推入战争，打死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凶手被枪毙了[②]。由于此事，德国人要求派一个营来莫斯科保卫大使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坚决拒绝了德国人的要求，并声明，俄罗斯将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直至战争来坚持拒绝。列宁认为，德国人将会让步。同时，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建议卡尔宁要格外保持警惕并做好充分战斗准备，以应付不测事件。穆拉维约夫想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冒险行为，企图向捷克斯洛伐克人开放战线，把军队调往莫斯科和彼得堡。穆拉维约夫的企图未能得逞，他被枪毙了[③]。

4. 请收集一些有关粮食装运数量的情况，第一，正在运输中的，第二，在各征集点上的，立即告知。

5. 你们那里同德国人的谈判进展如何？库班州和捷列克州的政治形势如何？

---

① 直到1918年春天，左派社会革命党一直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1918年2月到3月，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发生了严重分歧。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认为这是对俄国的背叛。和约被批准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政府，两党联合执政的局面就此结束。随后，布尔什维克在农村采取的政策使它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强烈地抗议征粮队对农村的讨伐行动，反对征收农民的粮食。在7月初开幕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强烈反对粮食垄断政策，谴责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的作为，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背叛了农民。7月6日，两名持契卡证件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入德国大使馆，炸死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同一天，在契卡中工作的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武装发动，要求废除同德国的和约，并扣押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这次事件并不是有组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没有倡导也没有支持这一行动。一小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很快就被平息，同时，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成员被拘留。随后，大会决定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除出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7月10日，东方战线司令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穆拉维约夫宣布自己为对德作战军队总司令向东线部队下达了向伏尔加河并进一步向西开进的命令。次日，人民委员会宣布穆拉维约夫为叛徒。

② 刺杀米尔巴赫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并没有被枪毙。

③ 1918年7月11日，穆拉维约夫以武力拒捕，被当场击毙。

6．给您寄去密码。

人民委员　斯大林

又及，传闻卡尔宁将要离职。我们都坚决请求他在这严峻时刻不要离开岗位。

№04130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

（1918年8月31日）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们确确实实知道，沃罗涅什的形势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不稳定，如果不是没有希望的话。同时，沃罗涅什和沃罗涅什前线对整个南方战线来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米宁①、伏罗希洛夫决定派一个由信得过的人组成的小组去沃罗涅什工作，以便清洗沃罗涅什和沃罗涅什前线的反革命分子。我请求为他们提供一封您亲笔签名的信件，使我们派往沃罗涅什去的同志能够直接进入最重要的岗位。请答应我们的请求，我请求您！

紧紧握手，您的斯大林

1918年8月31日

① 米宁，谢尔盖·康斯坦丁诺维奇（1882～1962），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任察里津苏维埃和党委会主席，内战时期相继担任北高加索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第一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04131

梅德维杰夫[①]致列宁的信

（1918年9月24日）

我们亲爱的列宁同志！

今天，我以极其高兴的心情从9月19日以后的报纸上了解到，您又重新开始工作了！您所受的伤再也不会以可能失去您来威胁我们了！您自我感觉很好吗！最近的情况使我有权给您写这封信。

整整一个月之前，您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完全应该地责备我没有很好地履行对党和同志的责任，没有告诉您我们这里武装斗争前线的工作状况[②]。有一种情况可作为我为自己辩解的理由，那就是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没有在任何与我在这里应该履行的直接义务无关的事情上花费一分钟。这些义务是如此之多，以致我无论怎么努力也抽不出一点时间再去履行您所指出的那些义务，我无力做到这一点。

现在，使我们极为高兴的是，您又一次和我们在一起了。我暂时把自己的直接义务放在一边，以便向您哪怕是简短地报告一下我们这里发生的和存在的情况。

我于8月初来到捷克斯洛伐克战线[③]。在同第1集团军政委见

① С.П. 梅德维杰夫，时任东方战线第一集团军政治委员。

② 列宁在听说梅德维杰夫对前线的一系列问题有看法，但又不愿给自己写信的情况之后，于1918年8月21日给梅德维杰夫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政治委员可以而且应该反映情况，希望梅德维杰夫一定要经常写信或用电报告诉他一切情况。（《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0卷，第163～164页。）

③ 指苏维埃政权同发动叛乱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斗争的前线。

面和交谈以后，我接受了奔萨师政委这一职务，并立即去那里上任。该师正沿维亚兹马－塞兹兰铁路线直接向塞兹兰开进。原来的师政委以及师司令部人员的最初一番话就使我确信不疑，我们这里是一些武装人员的团伙，而不是巩固的部队。没有什么别的考虑，我要在大家帮助下战胜这伙帝国主义雇佣军。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我们的第一项任务——采取一切措施把这群经常不守纪律的武装人员改造成作战部队。这伙人对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白卫军的斗争造成的危害简直是难以描述的。他们接近某个村庄后就占领它，他们中某些人的无组织性和放荡行为引起全体居民的极大愤慨。任何一个独立的居民及其房屋都被他们视为白卫军的窝点，遭到他们公开的和暗中的抢掠。他们肆意夺走马匹、饲料、食品，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同时进行抢劫、酗酒。这是一个方面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本应是进行军事行动的。另一种情况也同样令人厌恶。这些武装团伙没有任何关于纪律和作战时服从指挥人员的概念，而指挥人员本身也显得软弱无力，意志不坚强，被少数卑贱下流分子吓唬住了，结果不是指挥员指挥部队，而是他的部队想把他往哪推就往哪推。甚至最坚定和最果断的指挥员有时也想干脆逃跑，免得自找苦吃。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没有供给机构——或者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机构也是绝对软弱无力和缺乏经验的——的情况下，在运输工具配备很差、武器弹药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每一分钟都存在着无可挽回地毁掉整个斗争事业的危险。当我看到列车车厢里的部队状况时，我也经常感觉到这种恐惧。如果有一些下流分子在某个地方挑起某种事端的话，安置在车厢里的这些部队是不会留在距挑衅地点100俄里的地方的。

在这种条件下，为了达到我们这里现在已达到的这种情况，我们曾付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我将按次序告诉您，列宁同志。

和我同时一起派往前线的有40名来自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同

志，我被授权从中为自己挑选必要数量的同志作助手。他们被选出来了，同我一起到了奔萨师。他们听了关于部队状况的令人痛心的介绍后，答应绝对执行我的一切指示，战胜我们所听到的那些恶行。

他们一共6人，每个团去两人，一个被任命为政委，一个担任副政委。我竭力向他们每个人说明，在团里要干什么和怎么干。他们很快都去任职了。

我们在一些部队看到的那种情况，我已在上面写过了。应该战胜它们。在整整一个月中，我们几乎日以继夜地工作，几乎睡不了觉，有时连饭都吃不上，采取一切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说服教育，散发材料，以惩罚威胁，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枪毙。对抢劫行为、肆意侵占居民财产、结成团伙、贩卖酒精、酗酒等行为都要进行惩罚，直至枪决。把这些武装分子变成作战部队只是任务的一半，我们能够比较轻松地完成它。我们还面临着清除部队里的居心不良的人、卑鄙龌龊的人、以恐怖手段吓唬部队甚至怂恿挑衅的人的任务。现在我们已经得到来自部队健康力量的响应和帮助。尽管部队在内部建设方面十分薄弱，但仍有许多完全自觉的准备为我们的共同斗争事业贡献自己生命的人们。现在须要做的并不太多，仅仅是最无情地清除那些卑鄙无耻、自私自利、只知道为自己的人，使部队的健康力量表现出来。一句话，这是我们的又一半任务，我们能够很快完成它。但完成真正的任务要困难得多，极其困难。我们在这里仍然显得很弱。我们的红军部队是在各个地区以各种方式组建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志愿人员。在组建这些部队的地区，他们担任过并不复杂的警卫任务。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因此，同他们一起进行军事作业很困难。他们只能进行游击式的袭击，但只要一遇到正规军队而不是游击队的火力，就会完全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就会在哪怕不多几个有经验的敌人面前仓皇逃

窜。要在与敌人直接接触时消除这种软弱性，简直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部队中有精干的、坚定的和在军事方面有经验的指挥人员的话，我们就会很快使部队服从军事秩序，使其成为遵守纪律、装备整齐的军事单位，使其行动符合军事规律。但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指挥人员。我们有一些诚实的旧军官。他们知道，为了使我们的斗争成为军事斗争，须要做些什么。但根据他们的性质，我们没有让他们去做。他们中的有些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但被军事方面的以及经常是思想道德方面的恶劣分子吓唬住了。我们亲爱的列宁同志，这就是我们直到最近进展迟缓的原因。我们不代表我们这支曾在前线的部队，不代表这支军事力量。我们现在还很弱小。我们没有经验丰富的指挥领导。我们的供给部门实在太弱。它们不知道从哪里和怎样准备好必需的一切以满足军队的要求。而如果不能满足军队最基本的需要——它只要求这一点，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就寸步难行，就不能稳步前进。为了克服无数的这类障碍——为了把我们的部队搞得多少接近我们所希望的样子，我们每走一步都要遇到这些障碍——我们不得不没白天没黑夜的干。整天有事，一会儿要对部队施加影响，了解和消除其管理和日常事务中的混乱现象，一会儿又要同部队中尚未根绝的散漫现象作斗争，一会儿还不得不干预一下军事领导的问题。黑夜降临，又有新的工作。在夜暗中，缺乏军事经验和经常出现的张皇失措，对整个斗争事业是极大的威胁。如果某个单位不会自我保卫，一遭到袭击就放弃阵地，那时剩下的人就倒霉了。要离开刚刚化了很大力气好不容易占领的地方。要相信警戒。①

然而，不管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多么困难，多么严重，它已经比彼得堡、莫斯科的数百名同志来部队前好了一百倍。所有这些同志

---

① 此处意思不通顺，俄文版在此作了记号，表示存在着语法或修辞上的问题。

虽说在管理部队和机关工作方面经验不多，但他们在建设军队的能力上多少有些进步。他们的到来也要求我们恰当地分配和领导他们的工作。应该从各个中心向这里选派一些曾在旧军队里当过集团军委员会委员或在其他一些较小部队里任过职的我们的同志。根据切身经验——在旧军队里，从连的委员会委员到有 60 万人[①] 的庞大集团军的委员会主席我都当过——我知道，这样会使作战军队的组织、领导工作有明显的进步，因为这些同志懂得——也许不全面，但是懂得——在旧军队里是如何建设各级管理、指挥和供给机关的。他们能够帮助在我们红军中建立这样的机关。随着红军中这些机关的建立，我们就接近事业的胜利了。我们亲爱的列宁同志，旧军队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和我们在一起的，我很了解这一点。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明确意识到这是他们的惟一出路。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在我们红军队伍中，很多人是自觉地跟我们走的。因为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保障，这就是我们坚信我们将战胜一切敌人。我们所必须做的只是要善于领导。但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做不好这一点。在我们中央里还没有认识到，为了我们事业的胜利，应该给作战部队派来的不是那种旧的词义上的宣传鼓动者，即那种到处开会、除了讲话就是讲话的人。我们需要的是组织者，是大公无私的工作人员，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谋求职位，而是为了无私地完成他们在这里担负的工作和职责。经常出现某种并非无关紧要的现象，即派来的人是搞宣传鼓动的，但来了以后却让他占据某个岗位，履行团或其他分队的经济部门主任的职务。

现在我们这里没有那种不必要干的事情，没有为了宣传才干的事情，干事情只是为了完成它。部队前进了一步。现在需要帮助恢复地方管理机构——地方苏维埃。我们帮助它们就是更好地帮助我

① 原文如此。

们自己。只要有了地方苏维埃的协助，我们就能够为部队搞到我们的供给机关所无法搞到的一切。只要有了同当地居民的这种相互关系，我们就能在克服导致我们军事力量薄弱的各种困难时得到他们最积极的帮助。

我们在占领新的地区时，发现当地有地主的大农场，庄稼已经收割完毕，粮食垛放在地里，正在腐烂，无人收拾。农民不敢去收拾，怕碰上白卫军。当地的苏维埃组织遭到破坏，我们这些集团军政治委员不得不去抓粮食收割问题。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人，需要不是只在嘴上搞宣传的人，应该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不是“能否对目前时局发表演说”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否知道旧军队的军事和管理的制度是什么样的，是否知道那些我们红军建设所需要的新形式，甚至是否知道军队建设本身所包含的项目的名称，以及他是否肯下功夫去了解苏维埃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如果能够这样，那我们事业的进展将比现在这些日子好得多。但首先需要的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旧军队集团军委员会工作过的我们的同志。在我们这里，对较小单位的整顿走在对集团军指挥、管理和供给中心的整顿的前面。

现在我们有许多力量，比敌人多得多！但我们有一个困难，就是战线指挥机构还指挥不了集团军。这些集团军不服从它的命令。它们各行其是，其原因是它们还没有感觉到战线指挥机构对自己的压力。由于战线指挥机构的组织较弱，它不能把那些集团军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集团军与其编成内的各个师的关系也是这样。但即便是这些师，它们在与团的关系上也是弱的。

没有集团军的坚强有效的指挥、管理和供给机构，我们就还得被迫长期进行没有理想结果的斗争。我们每走一步都经受着这样的考验。是的，我们每天都在朝更有组织性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组织即便不是整个集团军、也有其三分之二的部队参加的

战役行动了。这比以前已经好得多了。我们还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因为部队正在振作起来。要让各支部队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

现在我们忙于准备攻占塞兹兰的战役。它就在东面。拿下塞兹兰就将为我们彻底打开通往萨马拉、乌法、奥伦堡和更远地方的道路。这可能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事。可能会有退却，因为退却在战争中比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常见。但我们将学会战胜敌人，今天学不会，明天学，明天学不会，后天学，但最后将取得胜利。

我们亲爱的列宁同志！

从您重新归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力量就增加了10倍。这种力量将随着您的伤势好转而日益增强。在我们听到您完全康复的时刻，就是我们充满新的力量并战胜敌人的时刻。请接受我们的祝愿，尽快为我们增加这种新的力量吧。

第一集团军政治委员　　梅德维杰夫

1918年9月24日

№04132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

（1918年9月27日）

您好，亲爱的伊里奇！

时间少（成天忙于前线事务），我直接写问题。

事情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察里津仓库里的所有储备品都已用尽，而莫斯科两个星期以来没有运来任何东西。一点东西（哪怕是一颗子弹、一发炮弹）也没运来。这是某种犯罪性的掉以轻心，简直就是叛变行为。如果这样拖下去，我们无疑将输掉南方的这场战争！

您的斯大林①

1918年9月27日

① 在写这封信的当天，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报，对南方战线失利的原因作了申述，提出了扭转局势的措施，特别提到了弹药装备不足的问题。

№04133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

（1918年10月3日）

伊里奇同志！

首先向您问好，然后请允许我向您通报一些有关我们战线的问题和托洛茨基的几个命令。所附的这个文件可以使您了解南方战线工作人员同托洛茨基之间的令人极其烦恼的冲突。问题在于，一般说来托洛茨基不大喊大叫指手画脚是不行的。在布列斯特，他以自己漫无节制的“左”的姿态打击事业。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问题上，他也早在5月份就以自己那种大喊大叫的外交姿态损害了事业[①]。现在，他又在纪律问题上以其固有的装腔作势进行新的打击，更何况托洛茨基强调这种纪律实际上是由于前线的一些杰出活动家识破了“无党派”反革命分子阵营中的军事专家的阴谋诡计、不让他们毁掉战线（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谓的不干涉作战事务）。

总的来说问题在于，托洛茨基不用假嗓子就唱不了歌，不大喊大叫装腔作势就不会行动。而如果这没有危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的话，我对此是不会有任何反对的。

因此，我请求及时地——还为时不晚——遏制一下托洛茨基，让他守规矩，否则我担心，如果托洛茨基继续发布那些狂妄的命令，把整个战线的工作交给那些完全靠不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军事专家手中，将造成军队和指挥人员之间的不和，彻底断送南方战

① 1918年5月，在进行关于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遣返回国的谈判期间，托洛茨基曾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军人在不可能继续推进的情况下作为和平居民留在俄国。

线。我们新的军队正在建设之中，因为新型的革命的指挥员同新型的士兵在一起成长。把显然是叛徒的瑟京或切尔纳温之流强加于他们，意味着毁灭整个战线。

我已经不想说，昨天刚刚入党的托洛茨基竟然拼命地教我学习党的纪律，但他显然忘记了，党的纪律不是反映在形式上的命令之中，党的纪律首先反映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之中。

我不是吵闹和丑剧的爱好者。但我感觉到，如果现在不给托洛茨基戴上一个笼头，他就将用他那种"左的"和"红色的"纪律毁掉我们的整个军队，而真正守纪律的同志是憎恶这种纪律的。因此，现在应该——还为时不晚——制止托洛茨基，让他遵守秩序。①

握手。您的斯大林

察里津，1918年10月3日

① 在向列宁发出这封信的当天，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还向莫斯科发了两封电报。给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总司令的电报中说："10月3日我们收到了托洛茨基发来的对我们来说不可理解的电报命令：'我命令斯大林立即根据政治委员不干涉作战事务的原则组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司令部设在科兹洛夫。如24小时内不执行这个命令，我将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这个命令不可理解，因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早在9月17日就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了，并从9月20日起就在行使其职能。请读一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吧……"另一封专给列宁的电报的内容是："我们收到了托洛茨基的电报命令，命令的副本和我们对命令的答复想必您已经收到。我们认为，这个命令是一个对南方战线没有任何概念的人写的，它威胁要把南方战线和南方的革命的全部事务都交给瑟京将军（巴维尔·巴甫洛维奇·瑟京曾是旧军队的将军，十月革命后转到苏维埃政权一边，曾任南方战线司令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行政部部长、俄罗斯联邦驻格鲁吉亚军事代表等职，后来从事军事教育工作）。瑟京不仅是一个前线不需要的人，而且是一个不能信任的人，因此是个有害的人。为了一个不可靠的将军而毁掉战线，我们当然不会同意。托洛茨基可以用有关纪律的词句掩护自己，但谁都懂得，托洛茨基不是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托洛茨基的命令也不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他的命令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某种意义，即如果它们是根据对兵力的考虑和对情况的了解作出的话。把战线交到一个不能信赖的人手中，就像托洛茨基所作的那

（续注）样，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纪律、对革命和前线利益的最基本概念的践踏。因此，我们作为党员坚决声明，我们认为执行托洛茨基的命令就是犯罪，而托洛茨基的威胁是卑鄙的。必须在党的中央委员会讨论托洛茨基蔑视最杰出的党员、讨好军事专家中的叛徒、损害前线和革命利益的行为的问题。要提出不允许托洛茨基一个人单独发布命令的问题，这些命令完全不考虑时间和地点条件，使前线受到崩溃的威胁。要重新审议来自无党派反革命分子阵营的军事专家问题。我们建议党中央委员会在最近的会议上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在有特殊需要时，我们将向会议派出自己的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党员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在察里津前线·文件集》，斯大林格勒，1941 年，第 64～65 页。转引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通信》，莫斯科，1996，第 53 页。）

№04134

斯大林、米宁、伏罗希洛夫致斯维尔德洛夫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10月5日）

抄送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

托洛茨基的谈话[①] 非常简短，故意侮辱，逻辑内容无法理解，

① 191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从坦波夫给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发去一封电报："……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察里津前线尽管兵力充足，但情况很糟。伏罗希洛夫能够指挥一个团，不能指挥5万人的集团军。但我还是把他留下担任察里津第10集团军司令员，条件是服从南方战线司令员瑟京的指挥。直至今天，察里津甚至连作战情况报告都不发给科兹洛夫（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我已责成他们每天两次报告作战和侦察情况，如果明天还不执行，我就把伏罗希洛夫和米宁送上法庭，并将此情况通报全军。既然斯大林和米宁留在察里津，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制度，他们只能行使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权利。我们不能承认他们的集体指挥，对所有作战行动的责任都应直接由伏罗希洛夫个人承担。对进攻来说，离秋季道路泥泞时期只剩下很短的时间了，到那时这里无论步兵还是骑兵都无法通行。如果不能使察里津的行动协调，任何重大行动都是不可能的。没有时间来进行外交谈判。察里津要么服从，要么离开。我们所有集团军都有成绩，只有南方、尤其是察里津集团军除外，在那里我们有非常强大的优势兵力，但在上层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在24小时内就可以解决，条件是得到你们坚定的和果断的支持；无论如何，这是我为自己找到的惟一办法……"（《托洛茨基档案》第一卷，伦敦－巴黎，1964，134～136）。1918年10月5日，托洛茨基收到总司令瓦采齐斯的电报："必须停止执行斯大林的118号战斗命令。我向南方战线司令瑟京下达了指示。斯大林的行动将破坏我的所有计划……"（同上，140页）。收到这封电报后，托洛茨基通过直通线路同斯大林、米宁和伏罗希洛夫进行了谈话。斯大林在信中所指的就是这次谈话。

托洛茨基自己中断了谈话，紧接着瑟京和梅霍诺申[1]就开始不用密码发秘密命令，只是在我们抗议之后才开始用密码发剩下的内容。我们无保留地承认集中和服从是必要的，但在托洛茨基讲话之后和他的命令造成混乱之后，我们现在完全困惑不解，因为，即使我们方面愿意，无论什么样的服从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实现不了的。正因如此，所有问题应推迟到斯大林抵达莫斯科后解决。此外，拖延供给将对前线产生致命的影响。657 号电报收到了，每昼夜正常地发一次通报。现在将发两次。斯大林今天出发[2]。

斯大林　米宁　伏罗希洛夫

① 梅霍诺申，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1889～1938），十月革命时期为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7 年 12 月被任命为副军事人民委员，1918 年起先后任全俄工农红军建军委员会委员，东方战线、南方战线和里海－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1918 年 10 月 5 日的决议，斯大林被召往莫斯科。

№04135

伏罗希洛夫致斯大林、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8年10月7日）

阿尔扎马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①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科兹洛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②　中央执行委员会，斯大林

我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9月17日任命的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南方战线司令员助理。迄今为止，我没有收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撤消对我的任命的命令。与此同时，最近几天收到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签发的电报中有关于建立新的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在这些电报中我被称为第10集团司令员。我认为只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对我来说才是合法的，我请求作出解释，是不是撤消了我和斯大林同志、米宁同志的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在得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之前，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执行托洛茨基个人的命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声明，最近几天一个接一个撤职命令造成的无休止的混乱，对前线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正在造成可悲的后

① 当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阿尔扎马斯。

② 当时托洛茨基在科兹洛夫的南方战线司令部。伏罗希洛夫发这份电报时显然还不知道托洛茨基于1918年10月4日给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也不了解中央委员会没有支持斯大林的意见，而是通过了补充梅霍诺申、列格兰和奥库洛夫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决议。

果。如果不立即消除类似现象和得不到弹药，对其后果我将不承担责任。

伏罗希洛夫

1918年10月7日

№04136

托洛茨基致斯米尔加①、拉舍维奇② 的电报

（1918年10月8日）

发自科兹洛夫
彼尔姆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

我建议立即根据你们的判断通报第3集团军行动完全失利的主要原因。其他集团军的经验证明，如果司令员和政委不好，那就不会有胜利。我建议每周用电报对集团军内部状况以及司令员和政委作一次简要评论。很清楚，对第3集团军须要进行激进的改革。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10月8日

① 斯米尔加，伊凡·捷尼索维奇（1892～1938），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人民委员会派驻芬兰全权代表，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东方战线、西南战线和其他一些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拉舍维奇，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先后任第3集团军司令员，东方战线和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04137

拉舍维奇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8年10月9日)

科兹洛夫

1918年［10月9日］9时30分核准

发自第3集团军司令部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我们战线失利的原因很多。只有在个人报告中才能全面阐述各种原因。我认为许多原因是不可能用电报来讲述的。我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线拉得过长，从北方的切尔登到南方的萨拉布尔。沿战线没有铁路，这使我们不可能通过调动兵力挡住攻击和进行机动作战。此外，完全没有预备队，地方新编部队距各自的老家太近，因此不能打仗，差点为白军服务了，因为大部分被动员的人来自富农。我们请求换成在其他省动员的部队，但没有结果。三个月中不间断的战斗使部队失去了优秀的乌拉尔无产者。我深信，我们司令部的内部工作要比其他集团军好，不应该在这里找失败的原因。大部分师政委表现很突出，我可以给您说出几个名字来：扎鲁茨基、佐夫、巴卡耶夫，他们会向您讲述许多事情。文化教育工作和党的工作安排妥当，绝大部分指挥人员是很有才华的。我同意，不好的指挥员和政委往往是失败的原因。这样的话，托洛茨基同志，必须为我们作出相应的结论。斯米尔加在前线，等他回来后向您补充报告他自己的意见。惟一的激进改革就是把已经疲惫不堪的部队换一

换班，那怕休息两个星期也好。在改编和整顿秩序之后，我们这里将完全是一支有战斗力的英雄军队。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拉舍维奇

№04138

托洛茨基致彼尔姆省军事委员会和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10月18日）

发往两个地方：彼尔姆省军事委员会
抄送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大约两周前，彼尔姆师的一些军官逃跑了。我要求编制注明那些逃跑军官家庭住址的登记表，以便立即逮捕其家庭成员①。但我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我还以同样的方式要求报告，那些容许指挥人员叛变的师、团政委是否已被枪毙，也没有得到回答。我要求立即对上述诸点作出解释。18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① 在此之前不久，托洛茨基建议释放被关押的没有严重罪行的旧军官，条件是他们在红军里服役。这些旧军官预先得到警告，如果叛变或逃跑，就将逮捕其家庭成员。

№04139

斯米尔加、拉舍维奇致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8年10月14日）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尊敬的同志们：

请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了解一下我们收到的托洛茨基的电报和我们的报告。

尽管我们不掩饰个人动机，但我们完全把一切个人动机抛在一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几封电报对我们来说是出人意外的、令人不快的。为了有利于事业，我们认为必须向党中央委员会作以下声明：

对我们来说非常明显的是，中央不知道乌拉尔作战的真实情况。从我们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关于乌拉尔的问题的议论好像是个能毫无目的地装下很多部队的无底洞，这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一伙外行人的废话。所有指定给我们的后备部队都运送到了伏尔加河沿岸战线。

在新的部队到达之前不能要求我们进行有效的积极的作战行动。我们所有的团没有一个是当过预备队的。有些部队已经5个月没有离开过阵地。很明显，这些部队疲惫不堪，无力实施进攻。

现在谈谈政委问题。我们坚决抗议托洛茨基对待诸如枪毙这样的问题所持的极端轻率的态度。他在得知某个团逃跑了几个军官

后，就要求枪毙这个团和师的政委。按照电报的准确意思，除了枪毙其他政委外，我们还应枪毙巴卡耶夫和扎卢茨基。我们当然不能干这种事。为什么只是要枪毙这几位政委呢？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师发生过叛变事件。应该枪毙的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一半的人，因为它任命的第 3 集团军司令员鲍戈斯洛夫斯基不接受指挥职务而逃跑了。这些电报的结果只能是破坏托洛茨基同志和政委们的威信。

我们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强制动员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建立地区性部队。被动员的农民不会在自己家乡所在的省、县里作战。这是很明白的事。任何恐怖手段都不能纠正军事政策上的这个错误。最后，我们不能不向中央委员会说明，我们认为，能够评价我们的工作只有中央委员会，而不是某些个人，尽管他们形式上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中央委员会委员　斯米尔加、拉舍维奇

1918 年 10 月 14 日

附上报告和两份电报。

№04141

托洛茨基致拉舍维奇、斯米尔加、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

（1918年10月23日）

彼尔姆

莫斯科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舍维奇、斯米尔加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

你们仅仅是为了矫情做作而把我关于坏政委的话用到了自己头上[①]。大家都知道，你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不可能有比拉舍维奇和斯米尔加更好的政委了。归根到底，在团里或一般较小的单位里，政委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总司令认为，你们撤退过了头了。我认为必须在前线建立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团和其他单位的政委要确认自己在任何条件下无权退却。必须为指挥人员建立这样的制度。在我发电报之前，你们坚决不通报任何关于第3集团军采取极端消极战术的原因。我对军官叛变的问题的解释是：政委在我们这里是对指挥人员进行监督的第一号人物。如果指挥员逃跑了，政委有责任，在战斗状况下他对此要用脑袋负责。无论这是巴卡耶夫还是其他什么人，对我来说都一样，他应该了解自己的指挥人员，并

① 这里是指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10月14日给中央委员会写信一事。参阅本专题文件№04139。

应对其进行监督。如果存在某种能够减轻罪责的情况的话，应该报告这些情况。此外，从彼尔姆师逃走的军官跑得无影无踪，这简直成了理所当然的了。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10 月 23 日

№04143

瓦采齐斯[①] 致列宁的信

（晚于1918年12月24日）

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②]

您在电报中指出的集体投敌的情况发生在南方战线第9集团军。当时差不多整个第11师投降敌人，约1万人，携带35门火炮。为此我已经向南方战线司令员作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必须调查并报告这一灾难发生原因。这个报告现在已经送到我这里。从报告内容中可以看出，南方战线司令员，确切地说是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第9集团军，对这一近期罕见的事件的解释是，第11师完全没有战斗力；他们指出必须查明该师是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组建的。这一事件将提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会议进行讨论。

就我自己这方面而言，我只能指出的是，如果第9集团军司令员以及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早就知道这个师没有战斗力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强迫它去战斗。应该把这个师留在巴拉绍夫作为预备队，当时我派该师去巴拉绍夫是为了对其进行严格的战斗训练，即进行深入的政治工作，逐步使该师部队适应战斗环境并养成

① 瓦采齐斯，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1873～1938），原为俄国旧军官，十月革命后在苏俄武装部队中工作，曾任步兵军军长、红军副总司令、东线司令员，1918年9月至1919年7月任总司令。1922年开始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任教。

② 1918年12月23日，列宁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给瓦采齐斯发电报询问有关一些红军部队在巴拉绍夫地区携带25～30门火炮投敌的原因，并要求报告对此事的处理。瓦采齐斯此信是对列宁的答复。

战斗纪律。我认为这是战线各级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位的职责。指责下诺夫戈罗德省军事委员会给前线派去了一个没有战斗力的师，是无论如何不应该的，因为这个师是8月开始组建的。我曾亲自监督下诺夫戈罗德省军事委员会组建该师的工作，两次来到下诺夫戈罗德。下诺夫戈罗德省军事委员会在较短时间内动员了6个团，收集了火炮，其中包括重炮，以及马匹，同时还开展了政治工作，建立了自觉的纪律和群众的服从。训练大纲完成的速度确实太快，但除此之外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此外，这个师还全建制地完成了野战机动训练。下诺夫戈罗德军事委员会的克拉耶夫同志、科甘同志和总参谋部的柳布什京当时都在工作，竭尽全力地工作，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8月。他们要组建一个师，要加强下诺夫戈罗德，同时还要与不能按时供应人们粮食、以饥饿折磨军马的粮食委员会作斗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于10月14日在下诺夫戈罗德视察了该师，并在命令中反映了这次视察的结果。是的，视察仅仅是检查了队列合练，因为上次到下诺夫戈罗德时我就了解了机动训练的部分，当时我组织了该师的野外机动训练。视察中，我祝愿人们出征顺利，部队精神奋发。因此，该师给我的印象是，它是一支出色组织起来的大部队，除我所组建的拉脱维亚步兵师外，当时共和国还没有这样的部队。在省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当时就指出了第11师生活方面令人忧虑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同把该师派往前线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情况是：省军事委员会在视察之后向我和当时同我在一起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柯博泽夫同志报告说，第11师的许多被派往前线的红军战士家庭处于极端的困境中。这个师差不多全是由工人组成的。许多人的家庭毫无生存手段。当时下诺夫戈罗德的粮食极端困难。至于社会保障委员会，当时下诺夫戈罗德还没有这样的组织。省军事委员会报告说，许多许多上战场的红军战士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必须去战斗，但没有给他们任何紧

急救济，这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处于随时可能饿死的状态中。为了帮助省军事委员会，我和柯博泽夫同志决定拨给省军事委员会100万卢布用于救助上战场的红军战士的家庭。从上述全部情况您可以看出，这个师的组建、训练、政治教育都是极为认真的，还尽一切可能使上战场的红军战士平静地与其家庭离别。采取这些措施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南方战线当时完全没有任何预备队，而哥萨克人威胁要切断与萨拉托夫的交通。根据我在以往战争中的经验，我可以证明，大量人员投降的原因有两种：第一种原因是精神方面的，第二种原因是战斗中出现的灾难性局面造成的。

如果该师在某次战斗过程中一下子全都投降了，那就是说整个师被一下子投入战斗。如果这一点符合实际情况的话，那就必须查明，首先必须注意的是，该师是在防御情况下还是在进攻情况下投降的，敌方有多少兵力，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是步兵还是骑兵。此外，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第11下诺夫戈罗德师覆灭的那个地区的草原特点。

至于我们在彼尔姆市附近的作战行动，我已经命令彼尔姆无论如何不能失守。由于第3集团军特别是其左翼出现了不稳定情况，所以我于12月……命令从亚罗斯拉夫军区调第7师的1个旅到彼尔姆以支援第3集团军。此外，为了使敌人不能从叶卡捷林堡方向调兵支援其正在进攻彼尔姆的部队，我已命令东方战线司令于12月……向乌法方向，进而向车里雅宾斯克－叶卡捷林堡正面方向转入坚决的进攻，也就是说，对正在从叶卡捷林堡方面向彼尔姆行动的敌军的后方实施进攻。现在，在第3集团军的右翼顶不住敌人突击的情况下，我已指示东方战线司令，要他必须派整个第2集团军去支援第3集团军。必要时我将命令从伏尔加军区组建的一些团调部分兵力，在最短时间内为其提供武器装备。伊热夫斯克工厂有1万多支步枪，被紧急运往第3集团军，满足其所需要的数量。这些

枪支的发运因下述误会而耽误了时间。12月初，东方战线司令员向我报告，他有一张中央供应部[1] 提供2万支步枪的单据，但炮兵局[2] 因仓库里缺货而没有向战线提供。这件事正好是在伊热夫斯克工厂的那件事之后。我命令东方战线司令员注意伊热夫斯克工厂，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帮助下在那里建立应有的秩序，使工人能够开始紧张的工作，必要时供给工人粮食，以使他们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工作。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被允许利用伊热夫斯克工厂两周时间，即到12月17日为止，这两周内生产的所有枪支都用于装备东方战线的预备部队，以抵补中央供应部开的枪支单据。这项命令是我在阿尔扎马斯亲自给东方战线司令员下达的，当时我把他召到了那里。但在该厂开始正常生产之后，东方战线从该工厂只得到2000支步枪，军队供应特别委员会主席克拉辛同志禁止再为东方战线提供枪支，他没有向我通报就撤消了我的命令。只是在阿尔扎马斯的会议上，克拉辛同志才告诉我此事。我当即向克拉辛同志指出，这样做可能对彼尔姆前线造成巨大的不幸。克拉辛同志当时在事实面前仅仅解释说，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他立即向伊热夫斯克工厂政委西姆科夫下一道命令，继续根据我的命令向东方战线提供枪支。由于这些枝节，我们耽误了7～8天时间。

这里我应该指出，由于我们的战略任务的扩大以及武器、粮食储备的缺乏，前线的情况有时要求我亲自干预以避免官僚主义的拖延，譬如向突然发生灾难的前线地段部队运送武器装备，以及向紧急从一条战线调派到另一条战线的部队供应粮食，等等。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要求处理得对事业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如果军队供应特别委员会主席有必要根据伊热夫

①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成立于1918年6月1日。

② 当时隶属于中央供应部。

斯克工厂的理由取消我的命令的话，他也应该通知我，或者就这样做的理由征求我的意见。此外，还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是军需方面的问题。我命令紧随从东方战线调往西方战线的几个拉脱维亚团之后发运5车厢面粉和5车厢饲料。但特别委员会主席克拉辛同志找到了取消我的命令的可能性，面粉在莫斯科被卸下车，全部被挪作他用。几个拉脱维亚团出发去普斯科夫了，但却没能带上自己的粮食。为了摆脱这一灾难，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在莫斯科烤制面包，再将面包运到普斯科夫分发到各团。可以想像，在严寒的冬天，面包在车厢里放上好些天后再送到阵地上时将是什么样子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没有得到克拉辛同志取消我的命令的通知，我收到的仅仅是他给中央供应部的电报副本，电报中说，某些人，其中包括总司令，擅自制作粮食和饲料发运单据，电报最后还威胁说要告到人民委员会去。在这两件事情中都反映出对总司令和红军特供部长的作用的不理解。我对这类事情的亲自干预都是由特殊的环境引起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具有官僚主义色彩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我的命令的我的部属中有些人有责任将相关的情况报告中央供应机关，但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后者在什么都不告诉我的情况下就取消我的命令。

至于奥伦堡方向上的推进，正在进行之中，但遗憾的是速度不理想。其原因是，由于缺少武器无法而不能以新的预备队去加强奥伦堡方向上的行动。

除此之外，我们在彼尔姆附近的形势突然出现不稳定使得东方战线最近的注意力完全投向彼尔姆。目前我手中没有能够投入战斗的战略预备队。而且，所有可能的力量现在都被调往南方战线了。

总司令　瓦采齐斯

№04144

古谢夫[①]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8年12月26日）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18年12月26日

尊敬的同志们：

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注意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的完全不正确的指挥系统。我强调是“系统”，以免别人认为我是准备批评某些人。

在组织现代军队的指挥时，坚定地和毫不动摇地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上级指挥部门对下级指挥部门的关系只限于布置战略任务（战役任务、战役指令），而完全不干涉这些任务的执行。这条原则是如此不可动摇，就连沙皇的军队在最近的这场战争中也是严格遵守的。任何人，也许除了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都不会想到要反对这条原则。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军事指挥的这一常识没有异议，但它系统地破坏这条原则。

事实上，怎么不是这样呢？怎么能说诸如“派某团、某师、某炮连去南方战线”这类不断传到［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共

① 古谢夫，谢尔盖·伊凡诺维奇（1874～1933），1896年参加俄国工人运动的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曾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1918～1920年先后担任第5集团军、第2集团军、东方战线、东南战线和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没有破坏军事常识、没有干涉作战问题呢？对于将一个战线的部队调给另一个战线这样的问题不能表示任何反对，因为这是由军事局势引起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对被削弱的战线的战略任务作相应的改变，但没有这样做，恰恰相反，还给被削弱的战线下达了新的积极进攻的任务）。绝对不能允许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替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各集团军来决定哪些部队应该调走。

这正是对各集团军和战线内部事务的干涉，对军事行动过程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在（第一次）进攻乌法的时候，从第1集团军中抽走了因扎[①]师。众所周知，第5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的这次进攻是以什么样的悲剧告终的。而在当时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调走另一个师而不破坏战役计划、不影响已经开始的战役。

第3集团军由于一些爱沙尼亚部队和拉脱维亚部队被调出所属师、团而遭到削弱。不止一次地出现这种情况，即由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坚持“火速给南方战线调一个团”之类的要求，已经开始的战役因此而处于半停顿状态或进展缓慢。而处于战斗状态中的这个团距铁路很远，一会儿要把它调走，一会儿要求它向铁路线开进，至少折腾一周时间。其实，如果我们不以绝对要求去束缚那个团或那个师的话，那个团第二天就能坐在火车车厢里了。

为了更明确地指出这个指挥系统造成了什么样的混乱，它是怎样破坏战役计划并中断已经开始的战役的，它使高级指挥人员神经紧张焦躁不安到了何等程度（所有集团军都发出“救命，有人抢劫”的叫声），我列举一些数据。

最近两个月从东方战线调出的部队是：3个师，10个团，3个支

① 俄罗斯城市。

队，现在还在调动6个团和2个支队。总计从东方战线的所有（请注意这一点）集团军中调走了24支独立的部队，还得加上8个炮兵连。

总人数是多少呢？总共35000人，而1个师的正常编制数为33000人。在我们被命令调出和组建1个师（或3个独立旅，或9个独立团）时，要我们不是在两个月内、而是在两个星期内完成，并且不能有为难的表现，不能因绝望而破坏组织性，不能暴露重要方向，不能破坏战役，不能出现混乱现象（强行调走32个单位必然导致混乱）。32个单位——这就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32次干涉各集团军的内部事务。战役任务在"24小时内"的经常变化也没少给战线和各集团军的工作带来失调、无序和混乱。我可以举两个有凭有据的例子。

第2集团军10天内收到了5个内容不同且互相矛盾的作战指令（这还是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阿尔扎马斯的时候，当时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还没有成立）。

不久前东方战线5天内收到了3个指令：1）主要方向——奥伦堡；2）主要方向——叶卡捷林堡；3）支援第3集团军。

不能像指挥1个团那样去指挥集团军。各个连的任务可以两天变一次，而各战线的任务则应"三思而后行"，没有极端必要（如其他战线出现了灾难性局面，或为了决定性胜利）就不应该改变。

在第2集团军遇到的情况中特别明显地暴露出，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里建立的不是协调作战任务的系统，而是作战歇斯底里的系统。真是既可耻又可恨！

没有什么可说的，军队的这种歇斯底里"痉挛"是多么有害。这一系统造成的后果是现成的，这就是彼尔姆[①]。

如果乌法战役不是因调走因扎师（我重复一下，可以调走其他

① 指的是1918年底东方战线第3集团军遭受惨重失败，彼尔姆失守。

师）而遭破坏的话，如果第2集团军在攻克伊热夫斯克后不是因得不到指示而原地踏步10天的话，乌法早就在我们手中了，而第2集团军也已经越过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在12月15～20日之前就已经兵临库齐诺车站了。白军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始其进攻彼尔姆的战役，或者至少也会被迫停止进攻。第3集团军就不会被击溃，莫托维里欣斯基工厂也可能得救了。因为尽管调走了35000人，但东方战线还有足够的兵力。灾难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系统造成的后果。

说到这个系统的“好处”时必须补充一点，即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一贯不回答东方战线的询问。我可以有根据地证明，没有一次询问是得到答复的。

这种情况再也不能容忍了。东方战线的灾难就是第一次严厉警告。俄共中央应该通过自己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员会的代表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取消这样的指挥系统。

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古谢夫

又及，此信写于得到关于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特里布纳尔因不执行调动某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队的命令而被交付审判的消息之前。这个最近的事实是对上述内容的证实，在特里布纳尔身上可以看到东方战线完全被破坏的情景。

№04145

斯米尔加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8 年 12 月 26 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已向你们反映过关于指挥不正常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古谢夫对上级指挥机构的看法。由于彼尔姆的陷落，大本营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尖锐化到了危险的程度。瓦采齐斯以不执行命令罪把我们交付法庭审判。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我请求不要对加米涅夫进行惩罚。

需要直接见面。

我将通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召回我。

斯米尔加

12 月 26 日

№04151

皮达可夫[①] 给斯大林、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

（1919年1月4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发自库尔斯克，1月4日22点25分

人民委员会，斯大林；抄送列宁，抄送斯维尔德洛夫[②]

托洛茨基给瓦采齐斯发去电报，他反对任命伏罗希洛夫[③]。瓦采齐斯表示，他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任命伏罗希洛夫，但收到托洛茨基的电报后须要消除误会，必须尽快任命伏罗希洛夫。瓦采齐斯没有提出任何其他候选人。我们向托洛茨基提出报告，陈述此事并请

---

① 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1890～1937），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布尔什维克党基辅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曾在乌克兰担任领导工作。1920年起从事经济工作和苏维埃工作。

② 斯维尔德洛夫，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1885～1919），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在1917年4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1917年11月8日（21日）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③ 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之后，苏俄人民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立即在乌克兰开展积极的军事行动，推行乌克兰苏维埃化的政策。1918年11月28日，在苏贾成立了由皮达可夫主持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临时工农政府(1919年1月底迁至哈尔科夫并改名为人民委员会)。为了清除乌克兰境内的德奥军队和乌克兰执政内阁的军事组织，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19年1月4日决定组建乌克兰战线。斯大林建议任命伏罗希洛夫担任乌克兰战线司令员，托洛茨基反对。皮达可夫起先赞成对伏罗希洛夫的任命，很快又转向支持托洛茨基的意见。

求不要阻碍对伏罗希洛夫的任命，得到的答复是："决定将通知野战司令部"。我们认为，第一，没有我们参加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第二，问题已经解决，托洛茨基不能重新决定，应根据这个意思下达必要的指示；就我们这方面来说，将自行公布对伏罗希洛夫的任命。

皮达可夫

№04152

托洛茨基致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的信

（1919年1月7日）

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乌克兰军队[①]
革命军事委员会安东诺夫同志
莫斯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莫斯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

斯维尔德洛夫同志通知我，乌克兰政府，或者说是它的部分成员，就我拒绝同意任命伏罗希洛夫同志为乌克兰战线司令一事提出了抗议。很遗憾，即便是在这一抗议之后，我仍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批准对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任命。组建乌克兰战线对我们来说是为了同彼得留拉[②] 分子的斗争，达到这个目标我认为有一些游击队和游击战略完全够了，但事情还在于为了准备在乌克兰境内对英、法军队采取可能的重大军事行动，需要有精通军事的内行参加的有计划的系统的工作。

由于任命格拉戈列夫为乌克兰军队司令员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适合的，我同意任命另一个人（例如安东诺夫同志），条件是他的工作能够与由经验丰富的严肃的专家组成的总司令部很好配合，并

① 乌克兰苏维埃军队是根据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1918年11月30日的法令建立的，由安东诺夫－奥夫申科任司令员，自1919年1月4日起编入乌克兰战线。

② 彼得留拉，西蒙·瓦西里耶维奇（1879～1926），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1917年的中央拉达和1918年的执政内阁的组织者之一，1919年2月开始是执政内阁的首脑，1920年流亡国外。

对总司令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负责。这样的工作，以及对于由科学设置的组织构成的军事的理解，伏罗希洛夫同志都是否定的。鉴于有可能同真正的敌人发生冲突，我们显然不会在乌克兰领土上重复察里津的试验。因此，伏罗希洛夫同志这个候选人完全应该排除。

如果乌克兰政府拒绝把安东诺夫同志作为候选人（尽管扎东斯基同志 1 月 1 日在库尔斯克向我表示，似乎皮达可夫同志去莫斯科正是为了就任命安东诺夫同志为司令员一事进行协商），那我们还可以就能够同格拉戈列夫配合工作和执行中央指示的其他候选人进行协商。

如果乌克兰政府像伏罗希洛夫那样不同意我们的军事政策，那就不仅会产生困难，而且还会使共同的工作成为不可能。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们大概未必认为我们现在向伏罗希洛夫的观点看齐是可能的。军事部门执行的政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中央委员会完全能够讨论各方面的问题。你们建议调军事部工作的鲁希莫维奇① 同志和司令员候选人伏罗希洛夫同志都是绝对否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策的。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战线和政府一致对我提出的要求是绝对不会有结果的。战线的一致和指挥部的

① 鲁希莫维奇，莫伊塞·里沃维奇（1889～1939），1913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时期任哈尔科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致是可以存在的，但必须按全党和全苏维埃的路线行事。[①]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19年1月7日

① 托洛茨基1919年1月10日在给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中再次表示："我坚决声明，决不能允许导致察里津军队彻底瓦解的察里津路线在乌克兰存在。惟一的办法是任命波德沃伊斯基为军事委员，安东诺夫为司令员，格拉戈列夫为参谋长。后两人由我们任命。但仍须保护中央委员会的威信，因为如果它在乌克兰人中间的威信垮了，就缺少负责的有威信的领导人来号召斗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鲁希莫维奇的路线意味着整个事业的毁灭……"。1月11日，托洛茨基给列宁的电报中虽然作出妥协，但仍然坚持："我认为斯大林对察里津派别的包庇是最危险的隐患，比任何军事专家的叛变和出卖还要坏……。鲁希莫维奇是换了名字的伏罗希洛夫……鲁希莫维奇不是一个人，他们抱成一团，把不学无术作为原则……。宁可任命阿尔乔姆，也不要任命伏罗希洛夫和鲁希莫维奇……"(俄罗斯现代历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09，文件12，第72～73页；《托洛茨基档案》第1卷，247～250页。转引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通信》，莫斯科，1996，第78～79页。)

№04153

皮达可夫致俄共（布）中央、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20 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共中央

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斯大林

最近几天我多次想通过直通线路与你们商谈，但未能做到。我已让通讯员通过各种途径电告你们这里出现的混乱状况。我利用契切林同志召我回来的机会再一次报告一些事实，你们自己应该对此作出判断。第一，阿尔乔姆集团发展到了直接同作战军队斗争的地步；第二，同指挥部门的斗争达到了我这里的人要求公布关于任命鲁希莫维奇为总司令、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① 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决议的地步，尽管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书面命令严格禁止这样做。我拒绝了，我认为政府无权撤销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政府的多数人以此为借口，甚至未报俄共中央批准，就将我免职。多数作出决定，但有三人持反对意见，三人中的阿韦

① 梅日劳克，瓦列里·伊凡诺维奇（1893～1938），1907 年参加革命运动，1917 年二月革命后曾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7 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时是布尔什维克哈尔科夫委员会的成员。1918～1920 年曾担任乌克兰副财政人民委员、一些集团军和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等职。

林[①]就任命阿尔乔姆为主席的非法行为提出了抗议。然后他们在报纸上公布了关于任命鲁希莫维奇为总司令——甚至不是普通的司令、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政府决议，还说决议是由政府主席皮达可夫签发的，虽然我没有签发过这样的决议，而且我认为不能签发这种非法决议，因为军事上的分立主义是犯罪行为。但是，他们非但不公布我关于自己没有签发决议的驳斥，还到处散发由伏罗希洛夫、鲁希莫维奇和梅日劳克签署的关于开始履行其职责的1号命令，其中宣称，关于任命他们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鲁希莫维奇担任总司令的政府决议是由政府主席皮达可夫本人签署的。我立即散发了由我、扎东斯基和哈尔科夫集团军群司令签署的通令电报，并附有我对关于我签署了决议的说法的驳斥，以及指挥部依旧不变的通知。阿尔乔姆分子的这种肆意破坏组织的行为给军队造成极大的混乱，因为他们的1号命令传到了军队，而我们也不得不广泛地对这一命令进行纠正。你们明白，这种由目前政府的多数反对中央的分立主义越权行为不可能不对军队造成破坏，多数中的两名［政府］委员——梅日劳克和马吉多夫——甚至还未经俄共（布）中央批准，我认为通报这一点是必要的。我要向革命法庭控告盗用我的签名的犯罪者。我们坚持提出下述观点：如果俄共中央不存在，那我们就应该独立地采取行动。

皮达可夫

① 阿韦林，瓦西里·库兹米奇（1884～1945），1917～1918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成员。

№04154

梅日劳克致拉科夫斯基[①]、列宁、斯大林的电报[②]

（1919 年 2 月 9 日）

2 月 9 日，急件

发自哈尔科夫

1919 年 2 月 9 日核准

波尔·塔瓦，按住地送人民委员会主席拉科夫斯基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列宁和斯大林

前线的情况急剧恶化。斯拉维扬斯克遭到直接攻击。正在后方组织有战斗力的军队以代替被击溃了的部队，须要采取果断措施。应该让伏罗希洛夫和鲁希莫维奇回来做军事工作。我认为任命伏罗希洛夫为乌克兰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绝对必要的。首先要由托洛茨基提出建议，才能为伏罗希洛夫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可能性。如果左派需要补偿，我们同意让他们需要的人进入革命军事委员会。应把军需部转由鲁希莫维奇主持，因为皮达可夫同志不在，他

① 拉科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耶维奇（1873～1941），19 世纪 90 年代起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法国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苏维埃工作。

② 1919 年 1 月中下旬，中央研究调整了乌克兰的军政领导职务，安东诺夫－奥夫申科为乌克兰战线司令员，拉科夫斯基为乌克兰政府主席并授权他把伏罗希洛夫和鲁希莫维奇彻底调离军事工作岗位，波德沃伊斯基任乌克兰政府军事人民委员，梅日劳克任副军事人民委员。

也不管这个部门，里面一片混乱。为时还不算晚，我重复一遍，必须采取紧急果断的措施。我们的工作与斯卡奇科[1]同志保持着全面的接触。

请尽快回答，以便明天向政府提出这一问题。

军事人民委员　梅日劳克

① 第2乌克兰集团军司令员。

№04157

瓦采齐斯给列宁的信

（1919年4月18日）

致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①

作战指挥人员不够用。尽管共和国有不少军校并补充了大量的指挥人员，但前线经常的不间断的战斗造成指挥人员的大量损失。指挥人员伤亡比例很大，比红军战士伤亡大两倍。这是由于我们完全偏重于一条原则，在所有部队中都奉行一条原则，那就是希望把战斗进行到胜利为止。但我们却放弃了珍惜指挥人员的原则。相反，由于业已形成的对指挥人员在战斗中作用的错误观点，即指挥人员处处都应该在战士队伍的前列，经常是在最前面，因此他们也是最先牺牲的。这对战斗结局特别不利，因为部队在战斗刚开始时就失去了指挥人员，最后就没人指挥了，部队的战斗力也就很弱。

各级司令部都缺少受过军事科学训练的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我们这里总参谋部编制职务缺员70％多，而前线的人员缺额达到了82％。这样，在各级司令部中，要求具有军事科学素养和专业知识的繁重工作都由现有的15～35％的工作人员承担，并因此而造成总参谋部人员工作负担过重，特别是在前线，这种过重负担使他们

① 1919年春季，红军在东方战线屡遭失利，中央要求总指挥部分析原因并作出正式报告。1919年4月中旬，红军总司令瓦采齐斯在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各战线状况的同时，给列宁写了这封信。信中较多地涉及了有关对待旧军事专家的态度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曾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军事反对派对使用旧军事专家持否定态度，尽管大会最后肯定了中央关于利用军事专家、建设正规军队的路线，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极度疲劳，在这些最好的工作人员中患病的比例很高。我可以证明，作为作战指挥者，总参谋部人员认真地、诚实地在高层次上做自己的工作，比他们在旧帝国军队服役时要付出多得多的精力。总参谋部的这些人员干着如此繁重的工作，但却任劳任怨，甚至放弃了一切个人利益。特别严重的过度疲劳使这些人精神紧张，对于任何对待他们的不恰当和不公正都极为敏感。对总参谋部人员的不知分寸的做法来自于被派去监督他们的那些政治委员，而对这些政委的选择并没有始终给予应有的注意。遗憾的是，在政委中间很少遇见有知识的、能够理解自己所监督的人们的情绪和他们那个阶层的人。监督往往就是令人厌恶的跟踪盯梢。这样的政委在实际工作和专门工作中是大祸害，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政委太多了。

总的来说，对待这些总参谋部工作人员的不公正态度和对他们的不信任，对司令部工作人员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令人极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那些在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发言者的讲话中，仍然对总参谋部工作人员使用着侮辱性的词句。四面八方传来一片咒骂声，指责他们是出卖灵魂的人，是反革命，是怠工者。其实我可以证明，总参谋部的旧军官如今在为苏维埃共和国服役，他们不应该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正如我上面所说的那样，总参谋部人员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完全是忠实的。我甚至不能想象，在为苏维埃政权服役的总参谋部人员中，希望在俄罗斯重新看到君主制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如人们经常指责他们的那样。一般都认为，俄国的总参谋部是最自由主义的，总是欢迎各种进步并表现出左倾。总参谋部早在旧制度下就被怀疑有革命形迹。毫无疑问，总参谋部的军官当中有坚定的君主主义者，他们不同情革命，但这些人早就站到我们的敌人那边去了，对他们的指责无论如何不能落在那些现在忠心耿耿为我们服务的总参谋部工作人员身上。

对总参谋部的做法是很不公正和侮辱性的。如果我开诚布公地

说，派去监督司令部某个部门活动的每个政委心里都藏着把总参谋部的某个人当作反革命和叛徒抓起来的愿望，结果不是进行监督，而是令人厌恶的跟踪盯梢的话，我将是正确的。为什么政治委员们养成了这样的嗜好呢？真是咄咄怪事，因为旧制度下的宪兵就有这种毛病，他们职务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破获了多少反对专制制度的阴谋。

最近特别使大家不安的是，总参谋部军官捷奥多里突然被不明不白地逮捕了。大家都知道，捷奥多里是一个在极其重要的岗位上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忠实的工作人员。捷奥多里是根据凯德罗夫[①]同志的命令被逮捕的，尽管对捷奥多里提出的指控全都站不住脚，但他还是继续被监禁着，这里起作用的是凯德罗夫同志的个人制度。

就我本人这方面而言，我可以说，捷奥多里无疑为我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1918年的夏天，当时国内到处发生叛乱，由作战部发布命令镇压了这些叛乱，捷奥多里当时就是作战部的军事指导员。当我们必须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作斗争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非常熟悉这个时期，我知道得很清楚，捷奥多里作为作战部的军事指导员有多么大的功绩。当时作战部的部长是阿拉洛夫[②]同志。

领导当时军事机关的最高军事委员会[③] 完全不适应紧张而实

① 这里可能是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凯德罗夫，他在十月革命后曾担任军事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等军事领导职务，1919年3月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部务委员。

② 阿拉洛夫，谢苗·伊凡诺维奇（1880～1969），1902年开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曾任第3集团军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1918～1920年间先后任莫斯科军区作战部长、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长、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及几个集团军和西南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③ 最高军事委员会是存在于1918年3月到1918年9月的苏俄武装力量战略领导机构。

践性很强的工作，该委员会的全部职责都由作战部履行，而捷奥多里当时在作战部工作。我可以证明，捷奥多里也为我们在伏尔加河的成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由于他的激情和忠诚，我们才得以在那里组建了所需要的预备队，派遣和监督其调动，提供生活保障，在驻地保持军事纪律。他是当时领导组建工作并将部队派往东方战线的机关的干部，这些功绩都不应该忘记。

捷奥多里被认为是总参谋部最有才干的人员之一，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他的突然被捕使整个总参谋部感到大为吃惊。最近几天的情况更加强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对捷奥多里提不出任何指责，实际上他没有可指责的地方。最近有一种流言，说凯德罗夫的助手艾伊杜克表示，没有指控捷奥多里的依据，但依据总是可以找到的。

最近又逮捕了谢利瓦切夫同志，他是计划中的东方战线司令。我早在战前就知道谢利瓦切夫，他从来不是君主主义者，相反，在君主制度下他是受迫害的。

把上述两人的被捕联系起来，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中央内部惊慌失措，不信任红军总参谋部，在预先抓人质，看来，捷奥多里和谢利瓦切夫都成了人质。收到了大量了解捷奥多里的同志对逮捕捷奥多里的抗议，他们认为捷奥多里从学校学习时期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都是诚实和忠于事业的。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希望在最短期限内重新研究逮捕捷奥多里的原因，既然对他的一切指控都站不住脚，我请求释放他，以便他能够继续服役。

至于凯德罗夫同志，他不遵循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命令就擅自下令逮捕捷奥多里，我请求调查凯德罗夫的行为并追究他的责任，如果是他一人应对逮捕事件负责的话。我是根据凯德罗夫对第6集团军极不称职的指挥才知道他的。在这期间，他完全非法

地、没有任何权利地下令逮捕第2集团军司令员布洛欣和第2集团军司令部全体人员，他还在电报中补充说，如果需要，就统统枪毙。第2集团军没有向凯德罗夫屈服。凯德罗夫因这一行为被免去了第6集团军司令员职务。他以其非法的和不加任何思考的逮捕完全破坏了第2集团军的指挥机关，其后果是第2集团军崩溃了。这件事正好发生在困难的日子里，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占领了喀山并向共和国中心地带推进。如果当时凯德罗夫对待诸如逮捕、枪毙等极为重要的问题就如此草率的话，那么他在这一事件中，在捷奥多里案件中的做法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不久前，在东方战线司令部逮捕了总参谋部工作人员赫鲁廖夫，革命法庭判决他5年监禁，但对一个罪犯却只是申斥一下就敷衍过去了。

在乌拉尔军区司令部，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就逮捕了所有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

4月1日，在第1集团军司令部，根据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卡尔宁同志的个人决定，不经侦讯和审判就将无线电报局局长助理文登巴乌姆枪毙了。

所有这一切都又一次证明，直到今天，在对待总参谋部人员以及对待一般专家的问题上，政治工作人员中间存在着一种个人制度。

最后，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报告，对现在为苏维埃政权服役的总参谋部人员的态度经常是不公正的和侮辱性的，他们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这样做也无助于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而当前是特别需要他们的，因为各条战线上的斗争都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在每一位专家都没有被同他工作的岗位和他对苏维埃政权的贡献联系起来，而随时可能仅仅因为个人关系而遭受逮捕的情况下，工作是不可能平静地开展的。在工作要求人们做出特别努力的情况下，不能保证他们不遭无理逮捕的服役条件只能带来危害。只有在每个专家都得到

人身不可侵犯的保证和心理不受政治气氛压制的情况下，他们在军队指挥和建设方面的工作才能有效和稳定地进行。

我还要提请注意的是东方战线的暂时失利造成的后果。许多人陷入精神恐慌，结果造成了对事业危害极大的神经质的紧张情绪。这事虽说发生在政委们中间，但毫无疑问也传给了司令部工作人员。

我视察东方战线期间得到的印象是，在东方战线工作的总参谋部人员精神上很受压抑。这里须要规定某种界限，为了彻底战胜我们的强大敌人，无论什么人都不允许对总参谋部的人员随便怀疑和侮辱。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不断的挑剔、个人的为所欲为将使我们最优秀的司令部工作人员绝望，可能发生我们布列斯特代表团曾发生的那种事，即逐步升级的要求导致极端的绝望。

我感到极为不安的是，在那些领导最重要司令部工作人员的人身上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在近期内不通过并实行某些能让他们平静下来的措施的话。

为了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必须保证所有在红军服役的总参谋部人员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只有在提出具体指控并经其直接首长同意的情况下才允许捕人。

此外，我认为必须重新审理被错误判刑的总参谋部人员赫鲁廖夫的案子，追究不经法院审讯和调查就将文登巴乌姆枪毙的卡尔宁同志的个人责任，因为这样的肆意妄为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威信。

共和国所有武装力量总司令

总参谋部　　瓦采齐斯

1919年4月18日

谢尔普霍夫

№04162

季诺维也夫给列宁的电报

（不早于1919年5月14日）

优先以便函形式发出，直通线路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急件

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

我们回答您的询问[①]：第一，对某些工厂和市郊进行疏散的命令不是由我们，而是由最高军事权力机构通过西方战线签发的。命令是5月2日收到的，编号是02768/2102。防御委员会对这一步骤持怀疑态度，但没有进行干涉，因为它不希望引起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发生的军方对地方政权的非难。中央供应部的代表发出了不恰当的指示，在工厂中引起了混乱。防御委员会采取了维护秩序的措施。如果您能帮助我们制止这种疏散，我们将非常高兴。第二，没有任何人下达关于凿沉船只的命令，也没有凿沉任何船只。只有一个还是在一年前同阿尔特法特尔[②] 一起制定的计划，那个计划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在最后一刻，实施这一计划。第三，在排除了一

---

① 1919年4月底，芬兰白军占领了彼得格勒以北约100公里处的小城奥洛涅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于1919年5月2日决定建立彼得格勒防御委员会，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进入战争状态。随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实行局部疏散。此事未经国防委员会同意。1919年5月13日，国防委员会决定停止彼得格勒的疏散。次日，列宁向彼得格勒防御委员会询问了有关情况。

② 阿尔特法特尔，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1883～1919），俄国旧军队海军少将，十月革命后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曾参加布列斯特和谈，1918年4月起任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0月出任苏俄第一任海军司令员。

些类型的情况之后，受过应征前普及军事训练的工人被动员的人数达8000人。截至5月12日12时，准确的数字为8375人，加上干部，共9985人。他们编成3个团，将于5月15日按军事指挥部布置的任务出发前往各阵地，用于防御需要。这一动员是根据瓦采齐斯5月2日签发的第2036号命令和全俄总司令部的第234号命令进行的。所有重要的企业，尤其是那些为国防服务的企业，都在继续工作。男人的工作由妇女来顶替。所有工作都是与负责军队供应的克拉辛的代表苏达科夫充分协商进行的。通过各种协会和党组织动员了约3000人。其中600个最优秀者根据托洛茨基的要求于昨天夜间12点迅速前往基辅，1000人编入了步兵连，其他人的使用也大致如此。按年龄进行的义务动员提供了2000人。各种类型的被动员人员的使用是根据全俄总司令部、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进行的。第四，到目前为止，只给一家1886年的电力公司任命了特别委员①。我于5月9日给李可夫② 写了一封内容详细的信，请到他那里去的特别代表带给他。我在信中论证了目前采取这一步骤的必要性。在那里的管理委员会里，大多数人是过去的股东，遗憾的是，克拉辛对这伙人太信任了。他们中间为首的是乌利曼等人，曾多次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近来，他们的懒散和怠工竟然达到了两周内每天以电站停工相威胁的地步。

而彼得格勒很多事情都取决于这个电站。工会委员会特别坚持要给那家1886年的公司任命特别委员。派去的委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共产党员，去后立即扭转了那里的局面。第五，当然没

---

① 国内战争时期，实行了派遣特别委员到重要企业监督其管理的制度。

② 李可夫，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1881～1938），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先后任内务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19年党的八大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列宁逝世后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有对公民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征召。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对受过应征前普及军事训练者的动员是根据莫斯科和谢尔普霍夫的直接命令进行的。而其他的动员，除了上面谈到的以外，都是没有的。我们对问题本身感到惊讶。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补充如下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假装蒙受冤屈的怠工者和失去了这样那样的非法特权的人去莫斯科告状，并在那里找到了过分姑息的倾听者。一些被赶出彼得格勒的头号嫌疑分子却在莫斯科的粮食人民委员部得到了高级职务的任命，等等。这种怪事成了彼得格勒工人街谈巷议的话柄，对事业的危害极大。现在我们在彼得格勒的工作十分艰难，因而我们不得不声明：如果您不全面支持防御委员会，如果您对人们因利害关系而散布的歪曲真相的消息多少有点相信的话，那我们这些同志就无法继续工作了。

№04163

瓦采齐斯、阿拉洛夫致列宁的信

（1919年5月15日）

副本

秘密

1919年5月15日，谢尔普霍夫市

俄罗斯联邦国防委员会主席

说明：西方战线参谋长的02769/2103、2698/об号电报通报了关于在彼得格勒布雷并炸毁里捷伊内桥、奥赫坚斯基桥和铁路连接桥，以及破坏部分能分开的桥梁——尼古拉耶夫斯基桥、德沃尔佐维桥、特罗伊茨基桥的命令。

现在已对下列桥梁完成了布雷：萨姆索尼耶夫斯基桥、格列纳捷尔斯基桥、斯特罗戈诺夫斯基桥和叶拉金斯基桥。

此外，陆海军主管部门在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军区的所有物资储备仓库，为国防进行生产或有能力从事这种生产的工厂和工场，以及所有铁路交通设施，均按设想做好了炸毁的准备。从军事观点看，炸毁彼得格勒市内的一些桥梁如里捷伊内桥、奥赫坚斯基桥和木结构的萨姆索尼耶夫斯基桥、格列纳捷尔斯基桥、斯特罗戈诺夫斯基桥和叶拉金斯基桥是不适当的，可能对军队战斗行动的展开造成不利影响。

退却军队为保持其战斗力也有可能撤出城市。

战斗失利后的军队经过这么大的城市撤退时，纪律往往混乱，

可能很快成为成群结队的抢掠者，也比较容易被敌人消灭。

为迟滞敌军而破坏大城市内的桥梁不一定能够长时间地达到这一目的，但无疑会给城市居民造成无谓的灾难，会使大量的平民百姓惊慌失措和丧生。

恢复彼得格勒市内这样的用于公共交通的桥梁将是很快的，对敌人来说交通中断甚至用不了几昼夜，他们可以使用完全无法消灭的渡河器材。

破坏彼得格勒铁路桥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可能会带来好处，那就是爆炸是适时进行的，能够确保撤退部队在紧急情况下撤至涅瓦河右岸。

要通过这座桥梁运送机动部队、被疏散的物资以及撤退部队，因此，在最后一个红军战士通过之前这座桥必须能够使用。

这座桥应该炸掉，但爆破必须延迟到所有积极斗争的希望都已丧失的时候。至于炸毁几乎所有重要的工厂和工场，这项任务实际上不能完成，还可能成为导致部队脱离当前这场斗争的诱因，因此应该放弃。必须只是……消除工厂的危害性……[①]，只需要疏散最重要的机械设备，以便将来彼得格勒光复后迅速组织工厂的生产。

苏维埃部队破坏彼得格勒无疑会影响全国的情绪。

相反，在可能采取积极行动的情况下，哪怕保存下来的财产只有不大的一部分，也会带来好处，正如在西方战线地区内现在已经被证实的那样。

应该承认，最适当的措施是有计划地加紧疏散军事上有价值的物资。意见：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必须：

1）指示西方战线司令员，只对横跨涅瓦河的一座铁路桥、芬兰铁路自白岛至彼得格勒沿线的几座桥梁布雷，爆破只能根据集团

① 原文如此。

军司令员的特别命令进行。

2）撤消对其余不符合军事需要的彼得格勒市内的桥梁、工厂、设施的布雷。

3）采取一切措施刻不容缓地和有计划地从彼得格勒地区疏散有军事价值的物资并从工厂运出机床及其配件，以防在敌军占领的情况下为敌所用。①

附：两份电报副本，一份第156号秘密情报副本，一份1英寸2俄里的地图。

签名：

共和国所有武装力量总司令

瓦采齐斯

军事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阿拉洛夫

① 瓦采齐斯和阿拉洛夫的意见受到重视。国防委员会很快作出决定，不在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地区宣布和实行全面疏散，但要立即组织专门委员会负责运出重要物资。

№04165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致伏罗希洛夫、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拉科夫斯基的电报

（1919年6月2日）

绝密

发自基辅，6月2日

哈尔科夫，伏罗希洛夫

莫斯科，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拉科夫斯基

我原来不知道，伏罗希洛夫的第30号电报不仅只是按乌克兰的一些地址发出的。在了解情况后，我不得不回答你们。伏罗希洛夫是内地前线某一地段的指挥员，在这一地段上起初遭到了很大的失败，而在并非由他指挥的其他地段上的胜利扭转了那一地段的局势。这些胜利是在切尔卡塞、博勃林斯卡亚以及首先是在叶里萨维特格勒附近取得的。他把同格里戈里耶夫叛军作斗争的一切胜利都归于自己一个人，这只是一场大误会。其次，他的指挥部关于在亚历山德里亚粉碎格里戈里耶夫军队的报告是假的。他对我们军队的尖锐指责太过分了。格里戈里耶夫叛乱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但部队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尽管它所处的条件非常糟糕，鞋袜被服不足，政治训练不够，还远远没有成型。第1师和第2师没有一个团倒向格里戈里耶夫，第5师只有1个骑兵连和1个步兵营加入其部队，第2集团军部队中也只有数百人倒戈。而格里戈里耶夫师的2个团同我们站到了一起。伏罗希洛夫的观点——无论是对他本人的

战果，还是对我们部队的表现——都是无耻的夸大的。

1919年6月2日10时45分

乌克兰红军司令员　　安东诺夫

№04166

拉科夫斯基致托洛茨基、列宁、俄共（布）中央的电报

（1919 年 6 月 10 日）

秘密

发自基辅，乌克兰人民委员会

沃罗涅什，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住地，
抄送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
抄送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党中央委员会

谢苗诺夫已到达并正在接收安东诺夫的工作①。与政治局所作的指示不同的是，第 14 集团军将不再直接隶属于瓦采齐斯，而隶属于西方战线司令部。我们不知道这个重新决定的动机。乌克兰政治局坚持，如果没有重要的设想，应遵循俄共的决定。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选择任命一位地方党的工作者进入第 14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当前的局势，在已任命的两位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都不熟悉当地生活的情况下，第

① 1919 年 6 月 1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建立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经济联盟的决议。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联合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的武装力量的法令。据此，俄罗斯联邦革命军事委员会于 1919 年 6 月 4 日发布命令，取消乌克兰战线，其部队转属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第 1 和第 3 乌克兰集团军并入第 12 集团军，由谢苗诺夫指挥。

14集团军会与政治工作分离[①]。乌克兰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萨维茨基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向我递交了抗议，说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有关的中央执行委员会[②]同意之前就实施了联合。我回答他们，在相应的机构彻底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这项措施具有临时的业务的性质。

1919年6月10日

拉科夫斯基

① 当时已被任命为该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是伏罗希洛夫和梅日劳克。

② 指有关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04168

越飞致托洛茨基、列宁、中央政治局的信

（1919年6月30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抄送列宁、俄共中央政治局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昨天您同拉科夫斯基同志的谈话——我只补充了几句——仍有许多不明白之处。

看来，对这里的情况您还没有看得很清楚。您回答说，我们的建议是恢复旧秩序，破坏中央的决议。完全不是这样。中央决定，在军事（和其他）方面乌克兰服从俄罗斯。这就是说，今后要给波德沃伊斯基的空洞计划和乌克兰政府对待加里西亚和罗马尼亚的犯罪性的轻率想法规定一个界限①，今后乌克兰军事人民委员部只能根据莫斯科给它下达的命令行事。我欢迎这一点。但如果军区直接隶属于战线，而军事人民委员部仍然保留，那么将会发生混乱。谁来进行动员？谁来组织到时候必然要组织的后勤部队？最后，由于

① 1919年4月，曾发生了有关乌克兰苏维埃军队向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推进的问题。1919年4月21～22日，由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遭到协约国武装进攻，列宁在回答瓦采齐斯关于在何种程度上有必要占领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的询问时说："为了与苏维埃匈牙利的联系，向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的部分地区推进是必要的，这一任务应该迅速地坚决地完成。而在这一任务的范围之外，对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的任何占领都是不必要的"。（《列宁全集》（俄文版）-第50卷，第385～386页）。1919年4月18日，由于科洛梅亚地区的加里西亚农民起义反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政权，乌克兰政府曾提出要帮助起义者。

战线要求我们这样做，而军事人民委员部要求我们那样做，我们这些政治家究竟应该协助谁？要不然撤销军事人民委员部，只是为了不失体面而把军区军事委员会的某一人称为军事人民委员？或者是这样：由战线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军事人民委员部下达命令，军事人民委员部对命令执行情况负责，而我们知道它接受了这样的任务，我们应该帮助完成这些任务。

集团军的问题也是如此。第14集团军拆散了自己的部队，它们同第12集团军的部队混合在一起。谢苗诺夫通报说，在波尔塔瓦地区有三个政权：1）波尔塔瓦防御委员会，2）第14集团军的部队，3）第12集团军的部队；为了建立秩序，需要任命叶戈罗夫为司令员，由他来统管。参谋长科斯佳耶夫对他说，他应该就此问题与南方战线和第14集团军协商。而与南方战线已有两天没联系了，时间又不等人。伏罗希洛夫惊慌失措地号叫着要求给他提供子弹，我们竭尽全力给了他一些。但第三天我们发现，在克列缅楚克存有2 000万发子弹，而当时伏罗希洛夫却声称，叶卡捷林诺斯拉夫是由于没有子弹才失守的。第14集团军应该供应南方战线，但它同南方战线没有联系。因此，我们建议第14集团军归属第12集团军。是的，这事是昨天才根据有关该集团军的命令办理的。我们还建议对谢苗诺夫予以政治上的保护。要知道，第12、13、14集团军组建后，他们的游击习气并没有改变；相反，恕我直言，任命伏罗希洛夫为司令员、皮达可夫和布勃诺夫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您这是重复安东诺夫的错误，使得同游击主义的斗争更加困难。谢苗诺夫说，人们不听他的，我们也常收到他的部属的这类电报：“我过去不服从这些将军，将来也不会服从”。我们收到惊慌失措的电报，说在哈尔科夫城外所有旧军官都转向了邓尼金方面。在红军战士中出现了混乱，他们已经在推广某种木头子弹，说这是沙皇的将军们强迫他们这样作战。这是在干什么？当年也是在这样的

情景下，我们在斯莫尔尼宫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它以自己的权威庇护了一批不受欢迎的军人。您记得吧，我自己就在十月期间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持工作，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我们不干涉军事，仅仅是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已，就这样在军人中造成了信任的气氛。我们现在建议在这里实行的也是当年的那种办法。我建议由国防委员会提供这样的保护，其主席团现在由拉科夫斯基、泽瓦尔多夫斯基和我组成。但谢苗诺夫害怕目标太大，要求由某一个人担任。当时我们就向拉科夫斯基提出了这个建议。我强调说，谢苗诺夫认为没有这样的保护他是无法工作的。还有，经常发生的暴动要求不仅在其出现时对其进行镇压，而且还必须监视其苗头。谢苗诺夫认为，军队无力胜任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建议将这种问题交军区处理，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我们则承担义务协助军区做这方面的工作。

最后，工人的动员。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提供至少 2 万工人，而且电报中要我亲自对这件事负责。在这之后，我几乎像打仗一样全力以赴做这件事。我亲自到了奥德萨，在那里的三个星期中每天工作 20 个小时，结果动员了不是 2 万人，而是 3 万人。此外我们还尽一切可能派去了一些人。我得以从奥德萨军区调出了至少 35 000 人。您通报说，南方战线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每列军列上都有我们从奥德萨军区派出的以执行委员会委员为首的共产党员小组，工人们自己设置了岗哨并抓住了临阵脱逃者。如果第 14 集团军截留了来自其驻防地区的兵员，那么我们甚至一无所知，而第 14 集团军是隶属于南方战线的。汽车的事也是这样。您通报说，运到那里的汽车都没有电机，一般都是没用的，但您的接收人在这里接收时都是完好无损的，这是有接收文件的。如果在路上被盗，那不是我们的错。

当然，问题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在于怎样做得更好。为此，

我们建议：

1. 或者撤销军事人民委员部，好让我们知道，军事人民委员部不能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所有任务我们都将从西方战线接受。

或者作出规定，让西方战线和南方战线把任务交给军事人民委员部，而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协助它工作。我认为，第二种方案更好。既然为了不失体面而要保留军事人民委员部这个岗位，那么它总得过问点什么。

2. 既然任命了泽瓦尔多夫斯基，那么波德沃伊斯基就应该完全离开，因为他虽然去了奥德萨，但他不可能不发号施令，结果就会出现双重权力。

3. 鉴于同第14集团军处于失去联络的状态，应该使其隶属于第12集团军，那怕是暂时的也好。

4. 必须为第1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政治保护，否则，这里的游击作风不会服从谢苗诺夫。

建立政治保护的可行办法是，或者承认（当然是形式上的）国防委员会在作战方面也是最高机关，就是说，谢苗诺夫的命令由国防委员会签发；或者建立拉科夫斯基主持的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是说，谢苗诺夫的命令由拉科夫斯基签发。我认为第一个办法较好，因为很明显，如果国防委员会行使这一职能，而且又是我们三个人，那么我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干涉，我们就只是签上自己的名字。

5.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也接受中央和各战线（尽管有国防委员会）下达的所有任务，尽力给予协助和促进。例如，要是我们了解到执行任务的梯队在某个地方受阻的话，我们会护送他们，或者再想一些办法，总会采取一些措施的。

6. 应该立即撤掉伏罗希洛夫，而且不能用游击队员来接替他。

7. 我写的只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这里的人们坚持要我去莫斯

科，但我不想在这样的紧张时刻离开，因而才给您写这封信，希望您同意我所建议的当前情况下的惟一出路。

紧紧握手

阿·越飞

基辅　1919年6月30日

№04170

皮达可夫致斯大林的信

（1919年10月13日）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朱加什维里－斯大林同志

发自诺沃亚车站，1919年10月13日

最尊敬的阁下

我冒昧地最谦恭而又最坚决地请求您把谢尔戈还给我们。我们俩人共同工作了一些日子，这使我更加坚信，谢尔戈应该在第13集团军。

叶戈尔卡·皮达可夫

№04171

谢列布里亚科夫[①]、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19 年 11 月 12 日）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声　　明

在大本营（共和国小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南方战线之间已经形成完全不正常的关系，这种关系目前一方面表现在总司令[②]和古谢夫对南方战线司令员[③]的直接敌视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南方战线的需求完全漠不关心上。鉴于此种情况，我们认为有责任声明，必须或者撤换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或者撤销大本营，如果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就撤销古谢夫的职务，根据我们

①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1888～1937），1905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党的莫斯科区域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② 1919 年 7 月开始，共和国所有武装力量总司令是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1881～1936）。加米涅夫是十月革命后转向苏维埃政权的旧军队上校，1918 年 9 月出任东方战线司令员。

③ 当时南方战线司令员是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1883～1939）。他是俄国旧军队的中校，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1918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历任第 9 集团军、第 10 集团军、南方战线和西南战线司令员。

了解的情况，古谢夫是反对南方战线的罪魁祸首。①

中央委员，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列·谢列布里亚科夫
斯大林
1919年11月12日于谢尔普霍夫市

① 1919年11月初，南方战线因部队军事行动失利而受到批评。南方战线领导人斯大林、叶戈罗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并认为失利的原因在于部队建制不全、兵力不足，要求给南方战线增调部队。

№04172

越飞致俄共（布）中央和列宁的信

（1919年12月15日）

秘密

俄共中央

抄送列宁

尊敬的同志们

关于我们的不成文的制度，所有中央苏维埃和党的机关的选举都是按照实际上由俄共中央提出的名单进行的。

最近一年来（大致是从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以来），任何名单中都没有我。我自俄共建立之时起，一直是被选入党的各届中央委员会的，因此，当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时，在广大党员中就有了许多传言（许多同志亲自对我说起过），说中央不满意我在柏林的工作[①]，所以没有把我列入中央委员会名单。有些中央委员在交谈中解释说，由于我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所以把我忘了。但我之所以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央不准我离开维尔诺的结果。

但现在公布的新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中仍然没有我的名字，尽管我从克伦斯基时代起就是历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

① 越飞自1918年4月起担任苏俄驻德国全权代表。根据俄共（布）世界革命的战略，他在任上积极参与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准备，并因此而于革命爆发前几天被驱逐出德国。

员。这种情况已经不能以遗忘来解释，因为我是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致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也同样不能以决定成立由地方代表、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代表组成的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来解释，因为：第一，在彼得格勒的代表中，几乎所有上一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都重新当选了；第二，来自莫斯科的同志中也有许多人重新当选了，他们至少是同我一样地属于工人阶级，但他们与省里的联系要少得多，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莫斯科。

如果对此需要补充的话,那么中央组织局派我到彼得格勒组建工人社会主义监察机关时,看来就非常不愿意把我作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任命到这个甚至并不重要的岗位上去,而出于纯粹的实际需要这也是必要的。后来,虽然任命了我,但并没有经过人民委员会,结果是直至我去尤里耶夫[①] 之前,我在形式上还不是部务委员。如果注意到这一切的话,那么造成这种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这样对待我。

对这种态度的另一种解释是，既然最近一届中央委员会在总体上或在某些方面对我的工作不满意，那就完全不可能考虑到我。

而另一方面，自我从西伯利亚返回时起，在整个革命时期，我完成过一系列特别重要和（我敢证明）最为艰巨的工作。我不能继续工作，我没有信心说，我们党的以及还有我们政权的最高机关对我的工作是完全、绝对和充分满意的。

那种关于经常委托我做最重要的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排除对我的工作不满意的可能性的假设无疑是空洞的，因为从我进入中央的时候起，我就清楚地知道，最后的那位（我不想指出姓名）就经常竭力否定某些同志的工作，但同时还要把他们留下来做那项工作，并且一直留到现在。

① 1918年12月，越飞被任命为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进行和平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他因此前往尤里耶夫。

我以为我可以肯定地说，布列斯特之后那个时期我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执行的，现在，我在工人社会主义监察领域工作一年多了，无论是写文章，作演讲，还是在实践中，我完成了并正在完成大量的独创性的工作。为了在将来能够有效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我在主观上必须确信中央完全满意我过去和现在的工作。

目前我没有这样的信心，相反，存在着强烈的有充分根据的恰恰相反的印象。

我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工作了将近20年，其中差不多10年是在党的中央机关，我认为自己有权以最坚决的形式要求中央——首先是要求我们公认的整个工作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回答，如何解释上述对我的态度，中央是否不满意我的工作，如果是这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认为有必要补充的是,从名单中排除就好像是一种回答。据说,已经决定部务委员不再选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能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我和对我将来的整个工作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又及，这个问题在当前条件下具有现实的和非常直接的意义，因为授权我进行和平谈判并签署停战协定及和平条约的委任书上写的是发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如果我真的将不再是这样的身份，那么委任书就失去效力，爱沙尼亚人和我们的其他敌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也在这样阅读我们的报纸。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请求将我召回，并由其他的同志来替代我。[1]

1919年12月15日

尤里耶夫

① 在收到越飞提出的上述申诉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克列斯京斯基给越飞写信，解释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方法，并指出他仍和以前一样受到中央的充分政治信任。

№04175

布琼尼[1] 致列宁的信

（1920年2月1日）

顿河罗斯托夫，巴加耶夫斯卡亚镇
1920年2月1日

深深尊敬的领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请原谅我给您写这封信打扰您。我非常想亲眼看到您，并在您——贫苦农民和工人的伟大领袖——面前鞠躬致敬。但战线[2]的工作和邓尼金匪军妨碍我这样做。我应该向您——列宁同志报告，骑兵集团军目前经历着艰难时期。我的骑兵部队还从来没有遭受过白军现在这样的打击。它遭到打击的原因是，战线司令员把骑兵集团军置于全军覆灭的境地。我羞于对您说这件事。我爱骑兵集团军，我更爱革命，而革命还很需要骑兵集团军。战线司令员绍林[3] 开始时将骑兵集团军集中在顿河沼泽地，迫使它强渡顿河。敌人利用这一点，差一点将其全部消灭。当我要求革命军事委员

---

① 布琼尼，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883～1973），1919年人党，1919～1921年间先后指挥骑兵师、骑兵军、骑兵第一集团军。

② 指当时布琼尼所在的高加索战线。该战线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邓尼金在北高加索的部队，于1920年1月在东南战线的基础上建立的。

③ 绍林，瓦西里·伊凡诺维奇（1870～1938），原为俄国旧军队军官，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内战期间曾在东方战线和南方战线任集团军司令员和部队集群司令员，东南战线和高加索战线司令员，分管西伯利亚军队的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助理。

会[1] 改变骑兵集团军的方向时，绍林同志决定让我负责步兵集团军，他调来了第 8 集团军的 2 个步兵师，而将骑兵集团军孤军投向敌人，使其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在我指挥期间还没有过这样惨痛的现象。绍林刚一得到对我所负责的骑兵集团军的指挥权就出现了不祥之兆。早在 1919 年 10 月 26 日，当时我隶属于绍林[2] 同志，他给我下达的任务对我们有害而对敌人有利。当时我给他发电报说了这个意见，他好像还抱怨了一通，并且记住了。现在，这一切反映在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上。我刚刚又接到了一项任务，今天就要粉碎敌人，再向前推进 60 俄里，而根据命令友邻集团军却原地不动，这样就使敌人有可能从前线调走自己的一些部队去对付骑兵集团军。这显然是犯罪行为。我请您对此予以注意，保护红色骑兵集团军和其他集团军不至于无谓地毁灭于这种犯罪性的指挥[3]。

紧紧握您的手

致同志的敬意

第 1 骑兵集团军司令员　布琼尼

---

① 指第 1 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② 当时第 1 骑兵集团军编入南方战线作战，绍林是战线司令员。

③ 高加索战线成立后，布琼尼和时任第 1 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伏罗希洛夫等人立即就向战线司令员绍林发难，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结果绍林仅当了 8 天的高加索战线司令员就调任总司令助理。绍林调离后，他的助手、原参谋长阿法纳西耶夫临时代理战线司令员职务。最后，图哈切夫斯基于 1920 年 2 月初被任命为该战线司令员，与此同时，奥尔忠尼启则被任命为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04176

彼得斯[1]、罗蒙诺索夫致列宁、托洛茨基、克拉辛和俄共（布）中央的电报

（1920年2月12日）

发自罗斯托夫，便函
1920年2月12日8时45分
密码
莫斯科

列宁、托洛茨基、俄共中央和克拉辛

必须立即结束第8集团军和骑兵集团军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面临发展成武装对抗的危险。布琼尼集团军日益腐化：已查明的抢劫、酗酒，司令部里留有形迹可疑的妇女，听说还有打死一些觉悟最高的同志的事件。布琼尼不再同别人吵架了。他们在铁路上的胡作非为完全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断抢劫燃料、机车、特快列车的车厢，不断窃取缴获的物资。每支部队后面跟着一串满载妇女和抢来的物资的火车车厢。据米罗诺夫同志说，这样的车厢一个师约有120节。

彼得斯　罗蒙诺索夫

① 彼得斯，雅可夫·克里斯托夫罗维奇（1886～1938），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副主席，革命法庭庭长。

№04177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2月17日）

1920年2月17日20时，米列罗沃车站

我们昨天才抵达米列罗沃，途中行程9昼夜。布琼尼绝对服从地执行了关于将其部队从罗斯托夫地区调往大克尼亚热斯卡亚地区的命令。进攻时，稍微向右偏离了一点规定的进攻路线，他解释说，为了得到饲料必须这样做。我和图哈切夫斯基认为，腐化以至丧失战斗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酗酒和抢劫是他们的老毛病。我和斯米尔加准备晚上去前线，待回来后再详细报告。一个月来，由于我们的无所作为，敌人大大加强了。目前我们的数个集团军都在进攻。右翼（第8和第9集团军的地段）失利，布琼尼的第10集团军主攻地段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明天和后天是关键性的两天。第8、第9集团军严重混乱，部分是由于集团军司令员不善指挥，部分是由于绍林所犯的组织错误所致，他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各师及时进行补充。两个集团军司令员将换人。在高加索战线地段上宣布了动员。杜缅科① 将被撤销军长职务。整个指挥上的不力可以说是由战线司令部与集团军的隔绝状态造成的，我希望今后不再是这样。

奥尔忠尼启则

① 杜缅科，鲍里斯·莫克耶维奇（1888～1920），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曾任顿河游击队指挥员，骑兵旅长、师长和军长。1920年2月，杜缅科被诬杀害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枪决，并于当年5月11日执行。

№04179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3月21日）

哈尔科夫，用直通线路

斯大林[①]

我向图哈切夫斯基询问下述情况：

等你们攻占诺沃罗西斯克和格罗兹尼之后，准备从你们那里调走3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只有随着航线的开通才能给你们补充。请回答，你们是否认为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施夺取和坚守巴库的战役[②]？请注意格鲁吉亚支援阿塞拜疆的可能性。

3月21日

我再对此作点补充：最好同格鲁吉亚达成交易，答应它完全不受侵犯以及石油。我认为从高加索战线调4个师而不是6个师给西方战线，是可能的。

告知你们的想法。

莫斯科，3月21日

① 此时斯大林负责监督加强高加索战线的事务。

② 此时高加索战线部队正在准备对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采取军事行动以实现其苏维埃化。按照计划，首先要夺取巴库油田。

№04180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 年 3 月 21 日）

莫斯科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密电已收到。高加索战线的兵力不少于 25 个步兵师和 10 个骑兵师，我认为，可以根据您的建议调走 6 个师去对付波兰军队。留下的兵力将能够勇敢地守住巴库油田。格鲁吉亚并不危险，如果允许其中立的话。

斯大林

№04203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的电报[①]

（1920年7月26日）

抄送俄共中央

哈尔科夫7月26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弗兰格尔战线目前失利的原因是，从北方新调的几个师未能按时抵达，它们在8月10日以前不能集结。弗兰格尔看来了解这几个师的调动情况并竭力赶在我们前面。莫斯科没有对克里米亚前线予以应有的注意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依我看，成立特别克里米亚革命军事委员会没什么用处。全部问题在于上述情况，而不在于为克里米亚组织特别革命军事委员会。后者依我看是多余的[②]。

在弗兰格尔企图抢在我们前边和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奥列霍沃甚至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失守是可以预料的。现在，弗兰格尔的突击已经开始，我们的失利大概还会持续一个短时期。我再重复一遍，问题在这里，而不在于成立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所以我认为您的建议是多余的。

斯大林

---

① 由于红军在弗兰格尔方向上遭受失利，托洛茨基建议将西南战线的克里米亚地段划分出来，成立独立的南方战线。斯大林反对这个建议。最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0年8月2日作出了划分战线的决定。

② 划线部分是斯大林从电报稿中划掉的内容。

№04204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7月28日）

托洛茨基

关于全部消灭弗兰格尔指挥人员的命令，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总攻开始之时颁布并传达。

斯大林

№04206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29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只发列宁

哈尔科夫，7月29日

在整个克里米亚战线，激烈的战斗在继续。奥列霍沃和邻近的车站几经易手。弗兰格尔展开全线进攻的同时，还企图破坏我们准备发起的进攻或至少挑动我们进行过早的和准备不足的进攻。弗兰格尔可能获得局部胜利和我们可能丧失某些地点不可能具有重大意义，但要求我们有坚强的意志和沉着冷静。因此，我们在实施积极防御的同时，决心继续顽强地集结有生力量以准备主要突击。弗兰格尔在向我们猛扑和冲击之后，最终将消耗自己的力量并面临我们有生力量的打击。请通报我有关同波兰停战的计划。布琼尼报告说，由于骑兵部队疲劳过度，看来在30日以前不能攻克利沃夫[1]。

斯大林

① 但当天斯大林和叶戈罗夫给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发报，认为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不可能如期完成攻克利沃夫的任务的回答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并再次命令占领利沃夫。

№04207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

（1920 年 7 月 31 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只发列宁

哈尔科夫，7 月 31 日

我已通报过，总司令要到我们前线来①。今天他来电说，由于西方战线的形势，他已取消了这次出行。我觉得，他是害怕了，被弗兰格尔的行动吓破了胆，不想把自己与我们对弗兰格尔的战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看来，他不相信这些战役会成功，尽管他取消了这次出行，但很清楚，这种联系是存在的。弗兰格尔继续全线疯狂进攻，被格鲁吉亚扣留的邓尼金部队② 也已在弗兰格尔指挥下同我们在前线交战。在奥列霍沃地区，经过激烈战斗后，我们损失了 6 门火炮；在别尔江斯克地区敌人在向前推进，占领了上托克马克，击毁了我们的一列装甲列车。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集中兵力和开始突击之前还会继续失利。而我们的兵力虽然在集结，但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进行得很慢，主要原因是，总司令想起来要调动兵力时已经晚了，尽管我曾多次提醒过他。今天晚上我要同战线司令员一起去前线。

斯大林

① 指西南战线的克里米亚地段。

② 这里指的是格鲁吉亚根据 1920 年 5 月 7 日与苏俄签订的条约扣留的格鲁吉亚境内的邓尼金部队。

№04209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8月4日）

莫斯科，只发列宁，急件

洛佐瓦亚，8月4日

我通报有关克里米亚前线的下述情报以便您了解形势：第一，在7月30日前，敌军在前线和最近的后方共有步兵36000人、骑兵14000人，其中投入战斗的有步兵18000人、骑兵8000人；我方前线和最近的后方有步兵40000人、骑兵6000人，其中投入战斗的只有步兵10000人和骑兵5000人（其余的正在到达和集结中）。这就是我们当前失利的原因。这样，敌军的直接预备队有骑兵6000人，步兵18000人，我军的直接预备队有骑兵1000人，步兵3万人。很明显，如果从后备兵力来说我们的步兵还算好的话，那骑兵可就差多了，因为敌军骑兵是我们的两倍多。第二，刚刚收到您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划分战线，而是加强克里米亚地段，在不破坏西南战线机关的情况下把西部地区所有集团军完整地转隶西方战线。我已在给克列斯京斯基的电报中阐明了自己的想法。我没有副手，中央可在两周内给我找一位。总司令从克里米亚战役一开始就使人为难，因为他（不光是他一人）对弗兰格尔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总是拖延履行自己的许诺，结果等于是让弗兰格尔为所欲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要把它们写出来是一件很无聊的工作。至于我们的外交，我保持沉默，最好见面时再谈。第三，您

想必已经知道，我们攻克了科维尔、卢茨克和布加奇。

第四，刚刚向我转达了您关于中央全会期待了解有关战线前景的询问。我不知道，您本人还需要我的意见是为了什么，所以我无法转告您所要求的结论，而只能限于通报一些纯粹的不加任何说明的事实：布琼尼的迟滞是暂时的，敌人向布琼尼投入了利沃夫、卢茨克、加里西亚集群以救援利沃夫。布琼尼坚信，他将粉碎敌人(他已经抓了大量俘虏)，但显然还要晚些时候才能拿下利沃夫。一句话，布琼尼的不顺利并不意味着发生了有利于敌方的转折。至于弗兰格尔，我们现在尽管由于上面所阐述的原因而力量薄弱，但仍然制约着敌人，最晚在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将投入3万新锐步兵，根据一切情况来看，这将造成我们的优势，将弗兰格尔赶出其阵地。我们的情况会一天天地好起来，因为迟到的部队将抵达。当然，战争就是赌博，估计到一切是不可能的，但还是能够作一般的预测，弗兰格尔的机会必定要丧失。各战线总的前景我看是这样的：波兰精疲力竭，需要喘息，因此我们应该提出一些使资产阶级波兰无法恢复元气的条件；弗兰格尔在最近几天内就会被击退，而如果总司令给我们调来骑兵的话，弗兰格尔将在秋季开始之前被完全消灭。

斯大林

№04210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8月12日）

列宁收

第一，我想向您也向我自己祝贺胜利，但应该承认，我不相信加米涅夫转达的劳合·乔治的声明[①]。

第二，我们现在对弗兰格尔的突击不可能是毁灭性的，因为，由于大本营指挥不力，北方几个师向克里米亚前线的调动很慢，间隔时间很长，我们被迫将其一部分一部分地投入战斗而不等其余部队到达，例如，志愿兵旅至今还未完全到达，原因是野战司令部不知为什么规定每天只运送一个梯队，而该旅共有23个梯队。我的印象是，总司令和他那类人对战胜弗兰格尔的组织工作进行怠工，至少，他们对于战胜弗兰格尔的愿望与他们在同波兰的战争中无疑表现出的胜利愿望相比，还不到十分之一。此外，总司令还拒绝调派骑兵。因此，我们现在对弗兰格尔的突击不应该被认为是决定性的。

斯大林

① 指劳合·乔治表示将建议波兰接受苏俄的停战条件一事。

№04211

斯大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年8月30日）

中央政治局

我建议中央组成三人委员会（通过国防委员会）调查我们在西方战线的7月进攻和8月退却的条件[①]。给委员会两周的期限。委员会主席（如果中央没有最合适的人选的话）我建议由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担任。

约·斯大林

① 在1920年夏天的俄波战争中，红军虽曾一度打到华沙城下，但最后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红军的进入没有引起工人革命，而是激起了波兰人的爱国感情。8月中旬，波兰军队转入反攻，于月底将苏俄军队击退到波兰边境，红军遭受严重失利，后来签订的和约使苏俄失去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04212

伏罗希洛夫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0年9月4日)

博戈罗季茨(格鲁别若夫附近)

您好，亲爱的朋友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

首先，衷心感谢您至今仍记着我们光荣的集团军，它正不顾一切困难，打击波兰地主。我们多次想给您写信并派出代表团，但同罪恶黑暗的波兰的不间断且残酷的战斗始终在干扰我们。

我的上述表示完全出自内心。我们期待波兰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和革命，但得到的却是沙文主义和对“俄罗斯人”的刻骨仇恨。当然，如果我们成功地到达罗兹—彼得罗科夫—多姆布罗斯克地区的话，情况会出现急剧的变化，但目前事情很不妙。我诚实地证明，我们集团军履行了和正在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我们消灭了大量波兰人。光俘虏就抓了近2万人。砍杀和消灭的共有2万多人。在对待俘虏上，我们是大量消灭这些地主，这可能会使您感到吃惊，但其实不足为奇，因为这些“地主”打起仗来非常凶残，给我们造成巨大损失。战士们对波兰人的痛恨往往因为他们的顽抗而达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弟兄们就无情地砍杀。我们在波兰白匪战线上的损失也很大。我们几乎损失了所有的指挥员人员和军事委员，以及将近1万名战士、差不多数量的马。无论从哪里也弄不到补充。集团军所面临的任务依然很艰巨。您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的损失这么大，不是说骑兵集团军是以坚不可摧而闻名的吗？是的，亲爱的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那是在顿河和库班。而在

这里，到处是沼泽、森林、河流和山脉，道路被完全破坏，铁丝网层层密布，骑兵完全无法行动。只有我们的集团军，它具有钢铁般的忍耐力和难以想象的适应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仅能够打仗，而且还能够打胜仗，强渡难以通过的河流，攻占筑垒的要塞和城市。我们在这里一出现，波兰白军就命令其骑兵无论如何不要同我们交战，并迫使我们与其步兵作战，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打步兵近战”。确实，在3个月的不间断战斗中，波兰地主只有一次倾向于同我们进行骑兵战斗，在布罗迪（8月2～3日），他们想碰碰运气，向我们投入了3个骑兵团，但他们的企图失败了。尽管我们的部队疲惫不堪，但波兰骑兵顷刻间就被我们彻底消灭了。波兰步兵打仗很顽强，也很灵活。这是因为，这些组织得极好的部队由很年轻的农村青年组成，还有很多资产者和专家出身的可靠指挥人员。波兰人向我们投诚的情况极少极少。

在这3个月期间，集团军进行了几十次大的交战，波兰地主军队企图消灭我们的集团军。在整个西方战线上，我们集团军是一块最强大的磁石，吸引了敌人的大量兵力。骑兵集团军损失惨重，但其战斗精神和杀敌愿望一如既往，只是体力上的消耗可能损害其勇士气魄。

很糟糕，谢尔戈，中央很少知道我们集团军，对它为苏维埃政权和革命建立的不可估量的功绩评价非常不够。集团军和以往一样着装很差，经常挨饿。我一分钟也不会忘记，您答应过给我们集团军提供毡斗篷。亲爱的同志，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的话，那您就给了集团军真正的恩惠，也为共和国立下不可估量的功勋，因为集团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会因此而有极大的提高。如果中央能供应我们哪怕是帆布雨衣的话，那也非常好了。我不能打扰您、打断您的直接的最重要的工作，但您自己也知道，中央无力完成这个任务，而如果没有这些，我预料我们会丧失集团军的，因为连续下雨已经好多

天了，战士们每天要在倾盆大雨中骑马行军15～17个小时或更长。所有这一切在急速恶化。因在北部地段取得了一些胜利而受到鼓舞的波兰地主当然是不会让我们休息的，他们现在正全力以赴消灭他们如此仇恨并为之分出大量兵力的我们集团军。我不怀疑，如果您有能力做这件事的话，您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工农共和国如此需要的集团军。如果弄不到大量斗篷，那么请您尽力而为，有点什么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匕首尚未收到，但我们知道，以您为首的巴库无产阶级对我们非常关心，这使我们感动得流泪。我们永远记着您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和同志，最富有同情心和最忠诚的革命者，您能够对我们革命战斗生活中一切弊病作出最敏感的反应，对我们所经历的时局的复杂、重要和严峻作最细致的理解。

以我整个无产阶级的心灵祝您顺利和幸福。向您的夫人转达我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拥抱您，紧握您的手。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您的克·伏罗希洛夫

№04214

斯大林致第九次党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①

(1920 年 9 月 23 日)

① 斯大林给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主席团写信，是因为他对俄波战争中俄军失利原因的看法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存在重大差异，并对他们在发言中提到的问题十分敏感。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对苏俄在与波兰的战争中遭到惨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总结。列宁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谈及波兰问题时说："现在到哪里去找错误呢？可能是政治错误，也可能是战略错误……很明显，我们根据不正确的判断作出了决定……。中央感到极为不安的是，我们犯了错误，遭到了失败。但我们不准备任命委员会去纠正这种错误。我们应该解决当前政策的问题。"（俄罗斯现代历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44，目录 1，第 27～28、31 页）。斯大林在发言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当时我们面临一些事实。第一是寇松的照会……，第二……是不断高涨的英国和德国的革命运动……，第三个事实是我们的部队在西南和西方战线上的推进。总之，各个方面都为我们展示了良好的前景，如果我们接受寇松的建议，那我们就是冒险，使波兰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能够喘过气来……。毫无疑问，中央首先应该做的是检查我们各条战线的状况。中央提出了询问，在 8 月中旬收到了我们将在 8 月 16 日攻占华沙的电报。这个来自主管负责人员的通报又增加了一个砝码，使得中央主张继续进攻作战的意见占了上风……。我要声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采纳另一种政策，我们的中央就不是革命的中央。……中央任何别的政策都是不现实的。因此，我想，中央的逻辑是绝对正确的"。（《俄共（布）第 9 次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72 年，第 60～61 页）。列宁在总结发言中认为斯大林说得过头了，并为军事领导作了辩护。（俄罗斯现代历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 44，目录 1，文件 2，第 131 页。转引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通信》，莫斯科，1996，161 页。）托洛茨基在结束关于军事状况的报告时也对斯大林的意见提出了批评："我们收到的关于敌人全面瓦解、一片混乱、试图加强军队但无任何结果一类的情报够多的了，如果说有什么人使中央陷于困境的话，还不如说是在我们接近华沙的那个时期的党的和政治方面的情报……。我要问，当时你们是否知道波兰军队的有生力量没有被粉碎？同志们，我可以说，我曾经比许多其他同志有更悲观的情绪，因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即在波兰白军的军事力量被粉碎或没有被粉碎的问题上，我考虑得比别的同志多。因此，我同斯大林同志交谈过，我说不应该满足于各种各样的关于波军兵力已被粉碎的通报，因为波军的兵力并未被粉碎，因为与我们的胜利相比，我们抓的俘虏太少，缴获的物资也太少"。斯大林同志说："不，您错了，按照我们胜利的规模，我们抓的俘虏比所预料的少，这是因为波兰士兵怕投降当俘虏，他们在森林里到处逃窜。在波兰开小差是普遍现象，它正在瓦解波兰，这也是我们胜利的主要原因"。我应该说什么呢？斯大林同志使我和中央上了当。斯大林同志是两个对白色波兰作战的战线之一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同志犯了错误并将这种错误带到了中央，这种错误也同样成了中央确定政策的基本依据。斯大林同志现在说是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使中央上了当。我说，中央对此是有评价的。斯大林同志对事情的看法是，认为我们的路线在思想上是正确的，而指挥部骗了我们。但他说过，将如期占领华沙。这是不对的。如果说当时中央确定这样的政策是因为那些谈论占领华沙时间的同志骗了我们，那么中央就是最轻率的机关，因为他们那里的情报，我们这里也有。"（《俄共（布）第 9 次代表会议记录》莫斯科，1972 年，第 76～77 页。转引自《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通信》莫斯科，1996，161～162 页。）

斯大林同志的声明

托洛茨基同志和列宁同志昨天讲话中的一些地方可能向参加会议的同志提供了怀疑我不正确地转达了事实的依据。为了真理，我要作如下声明：

1）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我戴着粉红色眼镜描述我们战线状况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我是当初嘲笑“向华沙进军”这类老生常谈的口号并在报刊上公开提醒同志们不要夸大战绩、不要对波兰军队估计不足的惟一的一个中央委员。只要读一下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就够了。

2）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我打算攻占利沃夫但未能实现的说法与事实相矛盾。8月中旬，我们部队接近利沃夫，距利沃夫8俄里，部队确实可能攻占利沃夫，但结果没有，原因是最高指挥机关有意放弃攻占利沃夫，在我们的部队距利沃夫只有8俄里的时刻，指挥部却将布琼尼从利沃夫地区调往西方战线去救援该战线。这难道是斯大林的打算？

3）列宁同志关于我偏爱西方战线、在战略上误导中央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谁也无法否认，中央有指挥部关于8月16日攻占华沙的电报。问题不在于华沙未能在8月16日攻克，这是小事，问题在于西方战线显然陷入了因战士疲劳而后勤跟不上所导致的灾难，指挥部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它也没有发现。如果当时指挥部预先向中央通报真实情况的话，中央无疑会及时放弃进攻作战，就像它现在所做的那样。至于未能在8月16日攻克华沙，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小事，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它使我们10万人和200门火炮被波军俘获。这已是指挥部的严重过失，不能轻易放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中央任命一个委员会查明灾难的原因以

保证我们免遭新的打击。看来，列宁同志爱惜的是指挥部，但我想，应该爱惜的是事业，而不是指挥部。

9 月 23 日　斯大林

№04215

古谢夫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0月20日）

莫斯科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同志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收到来自地方的一些报告，反映第1骑兵集团军过路部队[①] 胡作非为的情况，他们对当地政权采取恐怖威胁手段，抢劫，破坏，非法征用财物，等等。我引用克列缅丘克省后勤主任10月15日电报中的一些话作为证明：经过切尔卡斯克县的第1骑兵集团军第2师、第4师的部队，对当地政权采取恐怖手段，抢劫和枪杀居民，甚至包括在红军部队中服役的军人的家人，赶走所有牲畜，强行征用马匹，连农民的最后一匹马也要带走。他们喊着“打死犹太人和共产党员”的口号在村庄里横冲直撞，有些人被打死，很多人被打伤，其中有许多是苏维埃工作人员。红军战士、苏维埃工作人员、乡军事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贫农委员会成员的家庭遭到彻底的抢劫，一个个被打得半死。也有杀害和枪毙犹太人苏维埃工作人员的事实。权力机关工作人员和居民惊恐万状，四处逃窜，躲在森林里和野地里。这种横行霸道的后果已经反映出来，那些原来拥护苏维埃政权、拒绝参加匪帮活

① 1920年10月，第1骑兵集团军从西南战线调往南方战线。

动的村庄如今也极端仇恨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为调查此事，切尔卡斯克县后勤主任任命了一个由军事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工农监察机关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10 月 20 日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古谢夫

№04216

托洛茨基致加米涅夫、列宁的电报

（1920年10月23日）

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同志

抄送列宁同志

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违反你们的意愿，不可饶恕地任性和拖拉①。如果可能的话，您去那里狠狠地压压他们。要想避免可能损害事业的进一步严重冲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迫使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懂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容忍目无组织闹独立性的行动。

10月23日

托洛茨基

① 指的是第1骑兵集团军不执行南方战线司令员伏龙芝关于各部队在指定地段集结待命、准备进攻命令，没有到达指定位置。

【专题说明】

苏俄领导人关于边疆地区苏维埃化的通信

（1917 年 12 月至 1921 年 2 月）

1917 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很多民族边区纷纷宣布独立或自治，俄罗斯帝国事实上已经瓦解。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一方面通过承认原俄罗斯帝国境内一些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地位以及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内实行民族自治等形式来体现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另一方面则尽其所能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苏维埃化。内战期间，苏维埃政权力图以形式上的联邦制方式重新联合原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其军事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和增强之后，红军的直接干预与当地共产党从内部起事相结合成为苏维埃化的主要模式。本专题收入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关于边疆地区苏维埃化的 49 件来往电报和信件，其内容涉及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高加索、顿河、中亚等地实行苏维埃化的策略、措施、进程等，从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在边疆地区造成的后果。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毛子成、王红翻译）

№04118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①] 致列宁的信

（1917年12月19日）

不见报

绝密

有副本

读后最好销毁

人民委员会，列宁同志（亲启）[②]

12月8日我到莫斯科后弄清了情况：莫斯科军区派出对卡列金作战的兵力总共只有一支300人的队伍，而它能够提供的部队可达三万人，主要来自北方一些地区，南方的一些驻军由于放假、退役、乌克兰化而军心涣散。莫斯科炮兵多，但其物质方面几乎处于

①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884～1938），1901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流亡国外期间曾加入孟什维克，1917年6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指挥攻打冬宫，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进入人民委员会，任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内战期间先后指挥南俄和乌克兰的苏俄军队。

② 1917年11月7日，乌克兰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组成政府后开始解除乌克兰境内的苏维埃部队和赤卫队的武装。1917年12月4日（17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对乌克兰人民宣言，承认乌克兰独立，同意它分离或与苏维埃俄国建立联邦关系；同时通过的还有对乌克兰拉达的最后通牒。12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派遣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前往乌克兰，组织和领导同拉达的斗争。与此同时，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进入哈尔科夫，并于12月11日（24日）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布全面接管乌克兰的政权。此信是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到乌克兰之后给列宁的第一个报告。

令人绝望的状况。我离开莫斯科时得到最好的承诺，12 月 9 日军区司令穆拉洛夫[①] 答应立即着手组建一些部队派往沃罗涅什、库比扬斯克和哈尔科夫。前往库尔斯克途中看到我们的革命政权正处在脱颖而出的过程中。驻扎在那里的一支我们的部队在整顿秩序，他们携带着 8 门火炮。但在当地“革命委员会”同意下，乌克兰人占领了车站，想把炮运走。我让这支部队夺取了不知为何来到此地的一个英国使团的装甲汽车，并授予它全权保卫火车站。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一支“正在痊愈的伤兵队”（1000 人）要进驻库尔斯克，穆拉洛夫为这支部队运来了 1000 支步枪。这支部队看来是完全不中用的。在别尔戈罗德，革命司令部的代表答应，从总人数为 8000～10000 人的波兰革命团（穆拉洛夫为武装该团而从莫斯科运来了步枪、机枪和子弹）派来 3000 人。在哈尔科夫弄清了情况，当地驻军派出对卡列金作战的兵力不超过 650 人（500 人来自第 30 团，150 人来自第 252 团）。其余还有：备用车辆 3 辆（装甲汽车），城市警卫队 300 人，实际上没有部队（民兵已解散，只剩 50 人），工兵团是分散的，预备炮兵营没人，火炮破旧不堪。第 28 团乌克兰化了，改为第 2 乌克兰团（300 名士兵，40 挺机枪，427 个军官）。奇吉林团也是这样，其人数也相同。这两个团违犯莫斯科的命令，拥护乌克兰中央拉达，但不怎么坚决。“中立的”“自由哥萨克”——第 19 装甲营的 300 白军和一些车辆，在我们抵达之前已被西韦尔斯[②] 的部队（有 4～5 辆完好的装甲汽车和 6～7 辆已

① 穆拉洛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1877～1937），1903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革命司令部的成员，后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1919～1920 年任东线及一些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结束后相继担任莫斯科军区、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② 西韦尔斯，鲁道夫·费迪南多维奇（1892～1918），1917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参加者，国内战争的英雄，在作战中阵亡。

损坏的装甲汽车）俘虏。赤卫队（在莫斯科时我们被告知，它有一万人）实际上有3500人，其中经过训练的不超过1500人。我们在西韦尔斯部队的兵力为1300名步兵，200名骑兵，6门火炮；而霍夫林部队有一列装甲列车（有2门火炮），300名士气低落的“应征者”。我们的全部兵力有：哈尔科夫的1500名赤卫队员，各部队总共1800名战士，将近30挺机枪，6门火炮，1列装甲列车，约6辆装甲汽车。地方苏维埃是一潭死水，革命委员会毫无用处，赤卫队司令部里是一些上层人物和首长过分的自尊心。其余单位的士气。地方布尔什维克是一些只会发牢骚的人。阿尔乔姆[①]把发牢骚当成原则。周围，在巴拉克列亚，有1个乌克兰化的团，将近1万人；在楚古耶夫，有一所完好的士官学校。库比扬斯克有海达马克[②]的两个团；在洛佐瓦亚、巴甫洛格勒也有海达马克。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叶卡捷林诺斯拉夫[③]掌握在拉达手中（最近不稳定；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苏维埃遭到破坏）。在奥博扬，有一个动摇不定的重炮营（6门炮）；在苏梅有一个12英寸重炮营（6门炮），但没有炮弹，从莫斯科给他们的指挥部发运了3500支步枪，但它已经差不多乌克兰化了。人们把我们看成是强盗和土匪，而地方布尔什维克却沉默不语。看到这种情况，我立即派穆拉维约夫去莫斯科组建部队并采取一切措施制止对他们的任意调遣。在哈尔科夫没有政权，这种情况导致一些普通居民把我们当成法院来告状，在部队里进行审判，搞得他们招架不住。粮食供给完全未作安排。根本

---

① 阿尔乔姆，费多尔·安德列耶维奇（1883～1921），原姓谢尔盖耶夫，1917年在哈尔科夫领导武装起义，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任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顿涅茨克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先后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矿业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② 这一历史名词起先指18世纪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反抗波兰地主的人民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十月革命后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

③ 乌克兰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旧称。

就没有指挥部。不得不派随行人员四出开展组织工作。形势要求立即采取措施。西韦尔斯的部队对第2乌克兰团实行民主化，部分军官四散奔逃，有些人被捕，已经选举了领导。收到了关于拉达军队和一列装甲列车向波尔塔瓦运动以及一列军车向哈尔科夫开进的情报。计划是这样的：在波尔塔瓦方向上构筑防御阵地；夺取洛佐瓦亚、西涅利尼科沃枢纽站（联系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从而阻止从东而来的敌方军列通过，并保证通往顿涅茨矿区的道路（从洛佐瓦亚绕道巴拉克列亚的不太可靠的道路）；（波兰团）从哈尔科夫和别尔戈罗德采取行动夺取库比扬斯克；立即着手武装矿区工人（在我的司令部成立与顿涅茨矿区、顿涅茨州的联系处）。我把部分兵力在顿涅茨矿区集结后，挤走了哥萨克匪帮，他们逃跑到了尼基托夫卡以南100俄里处，而我军则兵分数路，向东运动对付卡列金，同时向东进攻，从沃罗涅什实施主要打击（卡列金主力部署在沃罗涅什－罗斯托夫铁路沿线），从察里津西面（通知了那里的米宁，我第5高加索哥萨克师派往那里）和从南面，从高加索（电报通知斯塔夫罗波尔转告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莫伊谢耶夫答应从沃罗涅什向斯塔夫罗波尔派出兵力）。我指示占领了哈尔科夫最重要的枢纽站柳波京。在这里解除了乌克兰人和哥萨克梯队的武装，俘获了许多乌克兰军官连同其武器，同时以哈尔科夫人的力量——（第30团、500名赤卫队员）和一列装甲列车——占领了哥萨克梯队必经的洛佐瓦亚。道路恢复通行，占领车站时几乎没有进行战斗。但第二天，海达马克以突然的进攻击退了我军（第30团脱逃），重新占领了车站。这支部队的赤卫队派来代表团，带着“最后通牒”，要求发给服装和增派援兵。代表团因其最后通牒而羞愧地走了，赤卫队随后转入进攻，差不多攻占了洛佐瓦亚。这时来了奥尔洛夫炮兵连（4门炮），但显得很弱，马行走不稳，连长有病，人们手忙脚乱。特维尔的一支部队也到了，有500人。波

兰团8000人17日放下了武器，号召进行抵抗的团长战死了。楚古耶夫军校于16日傍晚被解除武装（是在机枪射击4次并经城市代表团劝说之后解除武装的）。但“特维尔人”以不满对他们的调遣为借口而擅自放弃了楚古耶夫，并破坏了向库比扬斯克开进的承诺，而那里的海达马克在听说“布尔什维克”来了之后正在逃跑。18日，“特维尔部队”被解除武装，返回特维尔，只有表示已作好充分战斗准备的机枪队200人留下了。在楚古耶夫出现了几个骑兵侦察班（看上去来自巴拉克列亚）。霍夫林因其部队很弱（1个炮兵排早些时候被派往西韦尔斯部队）而回哈尔科夫了。西韦尔斯率其部队18日傍晚前攻克了巴拉克列亚，那里的乌克兰团投降后被解除了武装。现在正向洛佐瓦亚派遣援军以继续向斯拉维扬斯克运动（与尼基托夫卡和其他几个地方的赤卫队会合，那里赤卫队人数达2000人），并向西涅利尼科沃运动（给叶卡捷林诺斯拉夫人和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革命军事指挥部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发去了如何行动的指示，并向叶卡捷林诺斯拉夫派去了教官）。我们应以联合行动占领西涅利尼科沃。经洛佐瓦亚给工人运去了1万支步枪和6挺机枪，西韦尔斯部队也有大约这么多的武器。我们这里储备的武器也有这么多，还有5倍的武器在最后加工中。傍晚前将向库比扬斯克开进（在同沃罗涅什联络的同时，已命令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向库比扬斯克派出一支部队进行联络），莫斯科来的一些部队也要开往那里。海达马克破坏了道路，西韦尔斯的突破十分艰难。兹米耶夫那里有西韦尔斯的两个梯队，人们迷恋于伏特加，喝过了头。兹米耶夫没有怎么行动，对他们开了一阵枪（仓库很快被我们炸了）。300人带着与其行为相应的评语被打发回去了，被留下的只有10人。霍夫林的部队彻底垮了（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走运，派哪里哪里不要）。大本营给我们派来了第19步兵团和第27维林斯基团。在布良斯克，不得不解除维林斯基团的武装，因为这个团到处要流

氓。第 19 步兵团在奥廖尔，我们向它发出最后通牒，要它交出进行挑衅的军官。（这两个团均来自受到表扬的北方战线。）莫斯科军区提供的兵力不超过 12000 人，而不是原来计划的 3 万人，来自前线的不是 7 个团，而是一群败类，对他们的组织整顿花了 10 天时间。今天我期待着彼得格勒部队（答应派出 5000 名赤卫队员）和来自莫斯科的炮兵队的到来。我在哈尔科夫的总兵力（19 日 2 点钟之前）是：步兵 2000 人；2 个炮兵连，每连 4 门炮；从奥廖尔还来一个炮连，另一个炮连要求返回，我没有放行。在别尔戈罗德有步兵 750 人；在巴拉克列亚有步兵 750 人，骑兵 200 人，火炮 6 门；在柳波京有 250 人；在洛佐瓦亚有 1300 人，一列装甲列车，3 门火炮。现在我们占领了巴甫洛格勒，海达马克投降了，向顿河方向运动的哥萨克梯队也被解除了武装。在沃罗涅什的兵力达 4000 人，配备 6 门火炮的炮连 2 个，还有 80 挺机枪。属于莫斯科军区的兵力 2500 人，2 个炮连，还有不知从哪里弄到的 20 架飞机；在布良斯克正在制造 1 列装甲列车。

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重要通报，我们占领了斯拉维扬斯克。与尼基托夫卡（赤卫队）的联络已经建立。正在分发武器。新的消息不断传来。我们在敌对阶层中行动，我敢说，如果北方战线能够尽其责任，那怕给我们 4 个战斗团（其中要有 2 个拉脱维亚团），彼得堡给我们所答应的 5000 人的话，那么两个星期——不会更长——过后，我们就会结果了卡列金。谢尔盖·巴金斯基[①] 同志将给您写信谈有关乌克兰的情况。第二名信使将带去补充情况和我对矿工的呼吁书。我没有收到您寄的钱，从应急经费中用了，快用完了。现在我这里只有 3 万卢布。粮食和被服已安排妥当。请督促那些希望战斗的我们的同志们，忠于事业的人们，把钱寄来。再有

① 即基洛夫。

5000人，我们就能够轻松地拿下波尔塔瓦和罗斯托夫。绝对必须拿下波尔塔瓦，但没有力量。我们这么呆着是很大胆的，要不是我了解敌人的精神状况的话，那我就会朝自己的前额开枪，为采取如此大胆的行动承担罪责。穆拉维约夫① 的表现无愧于莫斯科对他的赞扬。在他抵达之前那里还没有开始组建部队。三天内他就组织和发展了4000人的部队，组建了1个炮兵连，此外还有3个轻炮连、2个重炮连、1个工兵连正在组建中，一支数千人的部队正在形成之中（奥吉谢伊特别热情地开始了工作）。应该全面压一压莫斯科军区。

问题在于波泽尔恩②、穆拉洛夫和彼得格勒的赤卫队。

仅供小范围内了解。

这封信要么销毁、要么亲自秘密保存，一点消息都不能向报刊透露。

安东诺夫

1917年12月19日于哈尔科夫市

① 此处应是指米哈伊尔·阿尔杰米耶维奇·穆拉维约夫（1880～1918），原为俄国旧军队军官，十月革命后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进攻彼得格勒时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城防司令。1917年末1918年初指挥部队同乌克兰中央拉达和卡列金作战。1918年7月任东方战线司令时，发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被击毙。

② 波泽尔恩，鲍里斯·巴甫洛维奇（1882～1939），1902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1918～1919年间任彼得格勒军区政治委员，后任西线、东线和第五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04119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致人民委员会的信

（1917年12月25日）

1917年12月25日

19日当天，正如我在第一封信中向您通报的那样，我在哈尔科夫有步兵2000人，装备4门火炮的炮兵连2个。占领了别尔戈罗德——750人，巴拉克列亚（900人，6门火炮），柳波京——250人，洛佐瓦亚——1300人，一列装甲列车，火炮3门，巴甫洛格勒，斯拉维扬斯克。在沃罗涅什、彼得罗夫，有4000人，2个炮兵连，80挺机枪。19日，还从洛佐瓦亚派来250人和一列装甲列车，在步兵部队协助下，西涅利尼科沃的海达马克被击溃，车站被我军占领。萨布林的部队（来自莫斯科的团）前出至库比扬斯克，莫斯科的梯队从别尔戈罗德前往那里与其会合，在那里解散叛变的波兰团的工作已经结束（不顾各种各样的代表团和莫斯科军区司令穆拉洛夫的抗议）。未进行战斗就占领了库比扬斯克，海达马克四处逃窜或者投降。但萨布林的部队内部也出现分裂——酗酒、抢劫，设立军事法庭，200人擅自回莫斯科去了，开始时逃跑的有1000人。萨布林部队从库比扬斯克向拉达科沃运动，他有1500名步兵，奥尔洛夫炮兵连1个，4门火炮。同时，从芬兰调来的第423团被派去增援西韦尔斯，他在巴拉克列亚和伊久姆解除了1个乌克兰化的团的武装。西韦尔斯率领这些兵力（步兵2000人、骑兵400人、40挺机枪、6门火炮）进驻尼基托夫卡，并成为所有当地部队（2000名赤卫队员）的司令员。武装工人的工作进行得还

算顺利。现在通过工人组织分发的武器约有步枪25000支，机枪20～30挺（西韦尔斯缴获了多少，准确情况还不知道）。萨布林因平息他那里的反叛而迟到，至今还未占领拉达科沃，与西韦尔斯没有联系上。

沃罗涅什部队（司令员是前上校彼得罗夫）根据我们的指示废除了同哥萨克签署的停战协定，占领了切尔特科沃，并准备待萨布林到达拉达科沃后，就向米列罗沃施加压力。一听说我们的部队正在逼近，尤佐沃的工人便立即投入了同哥萨克的游击战，但他们没有炮兵，无法击退敌人，其行动暂时处于半停顿状态。西韦尔斯部队被迫不顾总的计划，在未完成最后部署之前立即去支援尼基托夫卡（尤佐夫卡）的工人。根据刚刚得到的消息，萨布林已占领拉达科沃并已前出至捷巴利采沃，在这里与西韦尔斯联系上了，西韦尔斯部队已占领亚西诺瓦塔亚，正在同来自穆什凯托夫的哥萨克进行战斗。在戈尔洛夫卡解除了两个哥萨克梯队的武装。在基托夫卡缴获了2车厢炸药。我现在就派有4门火炮的奥尔洛夫第二炮兵连（我们已对这个炮兵连进行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改造）和布良斯克"无产者支队"（它原有350人，现在剩下190人，其余的跑了或者病了，日子不好过）去支援西韦尔斯。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方向做的工作很少。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就像哈尔科夫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差劲，他们控制着工人的激情（在布良斯克，将近7000名武装的工人）同海达马克（总共1000人）作斗争。

我同来自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一个代表团（两个布良斯克人、三个去过彼得堡的人，都是粮食委员）商定，准备进攻叶卡捷林诺斯拉夫，我们方面必须有一列装甲列车参加。但我们的装甲列车都像参加喜庆活动一样到各处去了。我要求从当地一个炮兵营调一些炮手，他们都躲在由妥协派分子控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里。看来，必须逮捕这个反革命的委员会。甚至当地州委会也提出，应由这个

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谴责对我所领导的工作所持的这种态度。新的兵力到来的速度极为缓慢，我手头只剩下了约500名莫斯科赤卫队员，其余的都派出去了。我从库尔斯克要了几辆英国装甲汽车来这里，我礼貌地告诉英国人，这些装甲汽车在不再被需要以及不再有落人反革命手中的危险之后将还给他们。已有10辆装甲汽车在这里，但没有机枪。我们将立即对其进行装备，使其运转起来。在洛佐瓦亚，我们缴获了4门哥萨克的火炮，但没有炮手。我在戈梅里订做的1000支手枪、约200挺机枪、2000支火枪现在已经运来，它们将送往矿区。在塞瓦斯托波尔已开始组建新的部队。可以直接派往卡列金那里去做客的力量很少。察里津很弱，无力行动。季霍列茨卡亚和高加索毫无声息，第二近卫军不知为何滞留在日梅林卡。在大本营，在莫吉廖夫，仍然很消极。现在我无法催促他们。我与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团结一致，一起工作(但那里因力量不足而缺乏生气)。我通过自己的同事今天开始正式组建第一“红色哥萨克”团（是沃罗夫和尼基特尼钦科在做这项工作)。由于从这里指挥作战很困难，我准备近日内与司令部一起迁往尼基托夫卡。但我必须保障通信联络。高级邮电职员的怠工很严重。如果能得到您的批准的话，我将宣布整个地区处于战争状态。我无法同当地的地方组织搞好必需的关系。州委会和哈尔科夫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要求，我在政治领域的活动只能在他们事先知道并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我拒绝了后一项条件。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没有它的同意我不能向部队和赤卫队下达命令。我只同意预先通知该委员会。关于征用程序问题，同他们达成了协议，通过他们进行。但他们拒绝为我们提供最必需的东西。哈尔科夫许多工厂的工人来找我，他们已有6个星期没有拿到工资了。我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要求，请它为工人们想点办法。我请该委员会在24小时内作出答复（这是在12月22日)，但至今没有回答。在这种情况下，

我“召集”最著名的资本家开会，派赤卫队员把他们找来。会议开得很僵。在不可能向工人支付那100万卢布的情况下，我邀请客人们到我的二等车厢去坐坐。100万卢布还是没有。资本家坐着，我把他们带到了矿上。杜马提出了抗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在抗议。“布尔什维克”在埋怨，他们指责我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搞联合，但他们自己却与立宪民主党人搞联合。5个工厂的工人、中央苏维埃和革命委员会表示欢迎中央苏维埃政权。我建议不要放了那些资本家。100万卢布会弄到的。

№04120

斯大林致列宁的信

（1917年12月27日）

12月27日晚上5点

列宁同志！

请您务必速来彼得堡一趟，28日中午一定得在斯莫尔尼宫[①]。因为：

1）我收到了拉达的回答[②]，回答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总的来说是相当妥协的（需要我们的答复）；

2）今天卡列金部队的代表来我这里，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即在何种条件下我们（人民委员会）能够停止军事行动和停止派遣讨

---

① 当时列宁在芬兰疗养。

② 人民委员会1917年12月4日向乌克兰中央拉达发出最后通牒后不久，派出了以普罗相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往乌克兰与拉达代表谈判。12月19日，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关于基辅谈判情况的报告，通过了由普罗相提出的关于同拉达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并于次日将条件发给了拉达。

伐卡列金的远征军（需要我们的回答）。①

① 斯大林接见该代表团时，在回答其提出的顿河的战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你们对卡列金定什么罪等问题时说，“卡列金组织反革命力量……，不准装运粮食和煤炭，这是对国家经济生活的破坏，也就是对革命的最沉重打击”。代表团成员科雷乔夫指出，卡列金当选为哥萨克军长官，“不是由资本家和剥削者选出来的，而恰恰是由劳动哥萨克选出来的”，对他宣战就等于向劳动哥萨克宣战。斯大林说：“我们竭力向劳动哥萨克解释，卡列金将把他们带往何处。但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对朋友反复劝说，而他们却不理解……。因此我们不能不打卡列金，劳动哥萨克也连带受了影响。”科雷乔夫指出，讨伐队的进攻和对边疆地区的破坏使得所有哥萨克人团结在卡列金周围。斯大林表示他同意这种看法，但他补充说，“我们不可能等到哥萨克人对一切都理解的时候……”。哥萨克人还提请斯大林注意，苏维埃政权的大部分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要哥萨克人改变立场，需要有关于卡列金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真实有效的情报和确切的事实。斯大林承认了“以往的错误”并号召“面向现在和将来”。科雷乔夫对斯大林说：“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州里召开边疆区立宪会议，在完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政权，那时你们能否停止同我们的战争？”斯大林回答说：“当然。”一位哥萨克代表进一步明确地问：“如果这个政权不承认人民委员会的权力呢？”斯大林说：“我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用暴力对付人民的敌人。如果劳动人民的意志将得到明确的反映，那当然……”。对科雷乔夫提出的“这是否意味着将停止反对哥萨克的斗争，甚至州里的居民可以合法地建立自己的有卡列金参加的政府”的问题，斯大林没有正面回答。他指出：“在芬兰，政府成员中有无产阶级的代表，也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我们还是认为，承认芬兰享有自决权是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就让我们以这种观点对待顿河边疆区吧。但另一方面，芬兰有严格规定了的国境线，而你们的边界在哪里？要知道现在是不可能保持作为旧俄国行政划界基础的省和州原来的边界的。实在难以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立宪会议问题时，谢苗诺夫代表问：“如果立宪会议不承认关于和平、土地和银行国有化的法令，你们将采取什么行动？”

斯大林回答：“解散立宪会议，进行新的选举。”

科雷乔夫问：“在有立宪会议的情况下还保留人民委员会吗？”

斯大林说：“当然。”

科雷乔夫问：“立宪会议与人民委员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斯大林回答：“国家的真正主人不是立宪会议，而是人民。立宪会议仅仅是仆人。”

科雷乔夫说：“那好，我希望人民委员会也成为仆人。所以我要问，这两个仆人中谁是长辈，谁是晚辈？”斯大林说：“我们以革命的途径直接从人民那里得到政权，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了我们，我们无权回避掌权并把保护人民利益及其命运的权力转交给其他人。”

科雷乔夫代表又谈到了必须停止内战的问题。斯大林模棱两可地回答说，苏维埃俄罗斯只可能同劳动哥萨克协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卡列金政府协商。对哥萨克人提出的关于在没有莫斯科讨伐队的前提下由哥萨克人以自己的力量维持边疆秩序的建议，斯大林坚定地声明：“你们，先生们，不代表任何力量，因而，你们关于在顿河肃清反革命巢穴的诺言的履行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召回派往顿河的军队并停止已经开始的这场斗争。我惟一能够答应的是，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人民无谓流血。而已经向顿河派去、将来还要派去的部队是为了进行威慑，为了宣传我们的思想”。（参阅《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通信》，莫斯科，1996，34～35页。）

3）我与普罗相[①] 和他的亚美尼亚人举行了会议，决定颁布一个总的法令（须要您签署）[②]。

请您来一趟吧，然后再回去。

对杜托夫的进攻正在进行中。杜托夫撤退时炸毁了桥梁。对拉达的进攻（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从西面实施）进展很顺利（有捷尔－阿卢丘尼扬茨[③] 的报告）。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通报说，关于谈判地点问题看来我们能够拿下来[④]。

握您的手，等您明天回来。

我们颁布了关于电报员劳动义务制的法令，其中包括一系列惩罚的威胁（预料可能发生与立宪会议有关的电报员罢工），坚决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斯大林

① 普罗相，普罗什·彼尔切维奇（1883～1918），社会革命党人，曾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到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成立后，任该党中央委员。1917年12月进入人民委员会，任邮电人民委员。1918年3月因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而退出政府。

② 人民委员会在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通过的关于“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法令，其中谈到支持被占领的俄罗斯领土“土耳其亚美尼亚”的亚美尼亚人享有直至完全独立的自决权。（《苏维埃政权法令》第1卷，莫斯科，1957，第298～299页。）

③ 捷尔－阿卢丘尼扬茨，穆克尔季奇·卡拉彼托维奇（1894～1961），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时期曾担任多种军事指挥职务。

④ 在苏俄与四国同盟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举行的关于缔结和约的条件的谈判中，苏俄建议将和平谈判地点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移至斯德哥尔摩，遭到拒绝。

№04122

斯大林与金吉谢普[①]
直通电话谈话记录摘要

（1918年2月5日）

斯大林向您通报：我们已经知道了，人民委员施泰因贝格[②]昨天通过直通线路同塔林谈了话，建议减轻对贵族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惩罚。

我通知您，人民委员会赞成爱沙尼亚执行委员会对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坚决政策。关于建立集中营的想法很好，建议靠东设置……[③]

① 金吉谢普，维克多·埃杜阿尔多维奇（1888～1922），俄国和爱沙尼亚革命活动家，爱沙尼亚共产党的组织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② 施泰因贝格，伊萨克·扎哈罗维奇，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曾加入苏维埃政府，任司法人民委员。

③ 爱沙尼亚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实现了自治。1917年末，爱沙尼亚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权。而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在苏维埃俄国和德国的双重压力下，于1918年初宣布了爱沙尼亚的独立。到1918年11月底，共产党人在纳尔瓦宣告成立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爱沙尼亚民族主义力量和白卫军队推翻了爱沙尼亚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并最终获得了苏维埃俄国的承认。

№04124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18年4月22日）

发自顿河罗斯托夫
克里姆林宫
1918年4月22日

斯大林同志

今天我们这里同左派先生们① 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一场搏斗。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最高统帅安东诺夫命令各部队在进入顿河州后立即解除武装并将武器交苏维埃政权掌握，正式建议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离开塔甘罗格。选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往塔甘罗格执行取消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务。②

今天布勃诺夫在我们这里，我们同他狠狠地吵了一架。尽管在新切尔卡斯克地区的几乎所有村镇都进行着最激烈的内战，但我们这里一般说来还没有什么情况。必须赶快给我们运来大量子弹和炮弹，务必尽快做到，因为不能排除德国人占领切尔特科沃的可能性，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就会切断我们与北方的联系。

你是否知道，德国军队已进入了刻赤海峡，安东诺夫战线的形

① 指左派布尔什维克。

② 1917年底，苏俄红军经过激烈巷战攻占基辅，在那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几个星期之后，1918年2月，乌克兰中央拉达同德、匈、奥、土、保等签订和约。随后，乌克兰军队同德国军队一起，迫使红军退出乌克兰，推翻了基辅的苏维埃政权。

势很严峻。今天安东诺夫转告说，托洛茨基召他速回莫斯科。但现在安东诺夫不能前往莫斯科。请你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召他回去[①]。

穆拉维约夫给叶戈罗夫发来电报，请叶戈罗夫去他那里当助手，但叶戈罗夫被安东诺夫逮捕了。

请告知详情，速回答，我在机旁等着。

奥尔忠尼启则

①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夫抵达莫斯科后作了关于乌克兰形势的报告，具体说明了将乌克兰苏维埃军队撤至大俄罗斯并在形式上解除其武装的计划。（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国内战争笔记》，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第2卷，第245、250页。）

№04125

斯大林致契切林的电报

（不晚于1918年5月4日）

安东诺夫为寻求本人及其部队的出路，建议授权靠近前线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组织国境警卫队。越过边境的安东诺夫部队应打出白旗，解除武装。他同时声明，如果这一点得到执行，他将正式辞去自己的职权，并将其转交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好像没有这个机构。换句话说，就是为了使德国人失去入侵俄罗斯联邦的借口，而停止乌克兰内部的战争①。我们这里大家都认为，必须尊重安东诺夫的请求。上述命令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下达。首先以无线电报发给沃罗涅什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罗斯托夫，以及塞瓦斯托波尔。我们认为，这样的命令将加快停战的实现，有利于我们进行谈判的准备工作。有一则很有意思的报道，原来决定对利戈夫② 以南的科列涅沃的进攻没有进行。我们的部队稍微撤了一点③。人们相信，撤退并非是无秩序的，很快就会被制止。

---

① 1918年5月4日，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向人民委员会提出：根据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协议的要求，苏维埃军队要撤离乌克兰并被解除武装，所以他请求解除自己担任的南方各共和国最高总司令的职权。当日，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对乌克兰各部队和顿涅茨克工人共和国下达了关于将武器交给俄罗斯联邦军事当局的命令。

② 俄罗斯城市，库尔斯克以西约100公里处，靠近乌克兰边界。

③ 5月4日，抵达科列涅沃的乌克兰和德国的代表同俄罗斯联邦（库尔斯克战线）签订了停战协定并进行了关于确定边界的谈判。

№04126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18年5月5日)

立即发出

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

发自哈尔科夫，便函，1918年5月5日核准

斯大林

你们为什么沉默，为什么没有详细通报情况。怎样对待乌克兰，什么样的边界，我们的态度如何？克雷连科[①] 要求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斯克雷普尼克[②] 在请求安东诺夫。请告诉我们，作为我们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让乌克兰秘书处[③] 自行其是，事业将是毫无指望的。请不要将我们置于这种境地，告诉我们干什么和怎么干。

奥尔忠尼启则

---

① 克雷连科，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1885～1938），苏俄初期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战期间曾在军队服役，积极参与十月革命，进入人民委员会，负责陆海军事务，不久任最高总司令。1918年起在司法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② 斯克雷普尼克，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1872～1933），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后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担任领导职务。

③ 乌克兰秘书处（人民秘书处），1917年12月成立的第一个乌克兰苏维埃政府。

№04140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致列宁的信

（1918年10月17日）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

鉴于我们在顿河上实施坚决的进攻，我认为重新提出帮助建立哥萨克苏维埃政权是必要的①。所附哥萨克军事会议主席团的报告，在我看来，包含着一系列无可争议的原则。

无可争议的是，只有在我们所说的劳动哥萨克的协助下，哥萨克反革命势力才能被摧毁。但现在还没有这种协助的积极形式。顺便说一下，由于察里津同志们的不妥协政策②，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协助。这些同志不隐瞒，他们认为，为了巩固顿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现在必须坚决地推行非哥萨克化的政策。这种态度使哥萨克群众与他们——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疏远，使哥萨克团结组成为克拉斯诺夫的部队。

斯大林对我说，察里津四万红军战士中哥萨克人还不到1 500人。但许多哥萨克人极不愿意同我们作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哥萨克中的这部分动摇分子就会同我们在一起。

我们的政策应考虑到哥萨克生活习俗的特殊性，首先要力争从内部瓦解克拉斯诺夫，其方法是在哥萨克内部建立一个中心，它应

---

① 1918年3月下旬成立的的顿河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只存在到当年5月8日，因为其大部分地区已被德军和哥萨克白军占领。1918年9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了撤消该共和国的决定。

② 当时在察里津的斯大林对哥萨克持绝对否定的的立场。

能够把受到风潮影响的无产阶级化的哥萨克阶层聚集在自己周围。

例如，我们在高加索的奥塞梯实行的正是这种灵活的政策，它考虑到当地的一些特点，给我们带来了理想的结果。

召集“劳动哥萨克 ”代表大会将会是加速哥萨克分化的一个因素，将对我们有利。由此可能会产生推动形成某种自发性思潮的力量，这种思潮当前能够把哥萨克下层发动起来，而我们还完全没有利用它。

我建议授权一个顿河地区当地工作人员小组负责执行“劳动哥萨克”代表大会的思想。

代表大会可产生一个代表哥萨克意志的临时执行机构，它将在我们部队的支持下组建顿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顿河的阶级斗争尽管受到特殊风俗习惯各种残余的掩盖，但终究是在迅速发展。那种认为在根除这些残余之前我们不得不把哥萨克作为一个严密的群体加以接受的想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我们在哥萨克人中间会有可靠的盟友。

他们曾经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对波德乔尔科夫[①] 同志记忆犹新，他们是存在的，向他们伸出手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吧。

1918年10月17日

忠于您的安东诺夫

① 波德乔尔科夫，费多尔·格里戈里耶维奇（1886～1918），顿河哥萨克，国内战争的英雄，曾任顿河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18年被白军杀害。

№04142

斯大林给安维尔特[①] 的信

（不晚于1918年12月17日）

安维尔特同志！

请原谅，没有时间详细写。我只写最重要的。

1）您应该知道，从我们方面来说，保证完全支持您。如果您什么时候对此感到可疑的话，那就太不应该了。

2）我们在关于爱斯特兰独立的法令[②] 中有点回避军事和铁路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与战略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在整个波罗的海应该是一个战略。我们考虑了所有只会对您有利的因素。当然，如果政府没有一位自己的司令员的话，形式上是不太妥当，但您什么时候都是能够任命一位军事委员的（看来，您也就是爱斯特兰军事力量的领导人），但要记住的是，这种任命不应该破坏所有被占领州的战略上的统一。

3）要求《罗斯塔》[③] 的报道不要说是“我们的军队占领了这里、那里”，而要说“爱斯特兰苏维埃政府的军队解放了这里、那里”。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将责令这里的《罗斯塔》只能按指示他们的方式报道。

---

① 安维尔特，扬·扬诺维奇（1884～1932），俄国和爱沙尼亚革命家，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了爱沙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18～1919年为爱斯特兰劳动公社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军事人民委员。

② 1918年11月29日，在爱沙尼亚境内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爱斯特兰劳动公社，首都是纳尔瓦。1918年底，人民委员会承认其独立。

③ 俄罗斯通讯社，存在于1918～1935年。

4）舍费尔同志将负责人民委员会与您之间的联系。请您安排好，以便使您对人民委员会的呼吁等等都能转交给他。我将照样为您提供信息材料。

5）看来，17日将出现两个新的苏维埃政府，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①。

握手

向佩钦曼同志、金吉谢普同志问好。

请告知你们的苏维埃开会的日期。

斯大林

① 拉脱维亚东部在十月革命初期就曾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年拉脱维亚被德国军队占领。德国战败后，拉脱维亚苏维埃共和国于1918年12月17日宣告成立，存在到1919年8月。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在1918年12月到1919年1月间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8年12月15日。从1919年2月到8月，它是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组成部分。

№04146

斯大林致米亚斯尼科夫[1] 和卡尔马诺维奇的信

（1918 年 12 月 29 日）

1918 年 12 月 29 日

米亚斯尼科夫、卡尔马诺维奇同志

今天，白俄罗斯人将出发去斯摩棱斯克[2]。他们带着宣言。党中央和列宁请你们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他们。他们或许暂时还缺少经验，但他们准备将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宣告政府成立应在明斯克进行。请通过直通线路告知宣布的日期，否则可能出现不妥。白俄罗斯人同意了你们已知道的附有两条保留意见的协议：1. 鉴于还有一人——弗谢沃洛德·法利斯基——将进入政府并担任外交部长职务，所以主席不再兼任部长职务；2. 任命白俄罗斯人担任政府部长的副手（不要求正式宣布）：济勃科——财政

① 米亚斯尼科夫，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1886～1925），1906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期间是白俄罗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之一，1919 年为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同时也是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921 年调任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② 在白俄罗斯各地，1917 年 10 月到 11 月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18 年 2 月到 11 月，白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被德国军队占领。由于白俄罗斯民族主义组织“白俄罗斯拉达”的活动，1918 年 3 月成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宣布白俄罗斯脱离俄国。红军解放白俄罗斯后，拉达政府逃亡境外。1918 年 12 月底，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从德国军队手中解放出来的西北州境内建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决议。1918 年 12 月 27 日，在莫斯科成立了白俄罗斯苏维埃政府，两天后，其主席日卢诺维奇与其他政府成员离开莫斯科去白俄罗斯。1919 年 1 月 1 日，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其独立得到苏维埃俄国的承认。

部长莱因戈尔德的副手，盖佐夫——比凯利的副手，齐巴克——罗森塔尔的副手，涅采茨基——萨维茨基的副手，德罗科－德罗贡——军事部长的副职，政府事务总管（非政府成员）——彼得·克雷什。党中央同意上述保留意见，并坚决要求你们不要多谈就同意他们（不能浪费时间）。最近几天，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要宣布取消西部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宣布众所周知的西部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领土问题的决定无效。这很清楚，所有资产和通信均处于白俄罗斯政府的管辖之下。

受党中央委托，斯大林

12月29日

№04147

米亚斯尼科夫致斯大林的电报

（1918 年 12 月 31 日）

米亚斯尼科夫同志致斯大林同志

1918 年 12 月 31 日

我刚刚收到政府成员名单和附有日卢诺维奇保留意见的协议。日卢诺维奇声明说，他和同他一起来的同志们是在从政府名单中排除军事、供应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三名成员的条件下同意那个协议的，还有一个条件是政府成员独立于党的中央局。我没有看到宣言①，他们没拿出来，说是因为问题还是与我们在莫斯科讨论的结果一样②。我竭力坚持要尽快开始工作，但看来这些同志对此还有自己的特殊想法。我认为，必须命令他们，或者让我们提供相应的白俄罗斯人名单，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人。我预见到，正是由于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肯定会出现一定的摩擦。中央局整天高度集中，等待您的指示，以便最终能着手工作。等您尽快回答。

米亚斯尼科夫

① 指的是宣告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的宣言。

② 米亚斯尼科夫也参加了 1918 年 12 月下旬在莫斯科进行的有关成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讨论，但先行回到了斯摩棱斯克。

№04148

斯大林给日卢诺维奇和米亚斯尼科夫的电报

(1919年1月1日)

斯摩棱斯克

发自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致日卢诺维奇，抄送米亚斯尼科夫

我认为日卢诺维奇关于排除3名成员的建议是无组织行为，是同党的决定根本矛盾的。日卢诺维奇集团的任何特殊决定都是不能存在的。成员名单——一共17人——是最终决定。我要求日卢诺维奇及其集团明确地回答一个问题——他是否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受党中央委托，斯大林

№04149

米亚斯尼科夫致斯大林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1 日）

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

很遗憾，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来到这里的同志们还未着手工作就立即向党闹独立性。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央局与他们在莫斯科代表会议上选出的中心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要求承认他们的中心并使其享有与中央局平等的权利①。中央局作为刚刚结束的共和国党代表大会产生的机关② 不同意这一要求，因为在代表大会上所有白俄罗斯的组织无一例外地都有代表，而且，代表大会还把一些白俄罗斯人如日卢诺维奇、拉贡等选入了中央局。这些同志声明，我们知道同你们达成的协议有 6 点，但这 6 点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有一种情况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新闻，即他们有义务服从作为共和国党的中心、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拥有全权的中央局。据此，上面提到的两位同志要退出中央局并拒绝公布宣言。应该指出，中央局本身的表现是完全公正的，地方的同志们赞成中央提出的理由，并相信由人数众多的代表大会制定新原则是适当的。虽然来自地方的代表——不管是非白俄罗斯人还是白俄罗斯人——都不同情他们，虽然中央局为欢迎这些同志的到来做了一切准备，但他

① 这里的“中心”指的是 1918 年春天建立的俄共（布）白俄罗斯小组。当时白俄罗斯被德国占领，该小组由在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团体的左翼成员组成。

② 1918 年 12 月末，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局，并明确其为共和国党的最高机关。

们不知为什么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孤立状态，召开自己的会议，把自己同我们对立起来，并提出了一系列最后通牒。时间不等人。在党的代表大会宣布召开后，应该由政府立即就有关自己的事发表声明。如果我们想执行同您在莫斯科达成的全部协议的话，惟一的途径是中央委员会要求来到这里的同志服从它的决定并在此基础上同我们携手工作。日卢诺维奇从他自己那方面考虑也准备给您写报告。

米亚斯尼科夫

№04150

斯大林致米亚斯尼科夫的电报

（1919 年 1 月 1 日）

发自莫斯科

发往西部州苏维埃执行委会

米亚斯尼科夫同志

我这才知道，不打不相识，今后应该记住，政府应与中央委员会保持直接联系并服从它。您请日卢诺维奇今天就给我发报[①]。

斯大林

① 在斯大林直接干预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宣言于当日（1919 年 1 月 1 日）发表。

№04155

戈普涅尔[1] 致契切林和列宁的信

（1919年3月22日）

戈普涅尔的第五次报告

叶卡捷林诺斯拉夫，1919年3月22日

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同志

抄送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

我在哈尔科夫逗留期间出席的乌克兰政府的一次会议上，赫梅尔尼茨基[2] 和伏罗希洛夫以及应邀前来参加政府会议的革命法庭庭长描述了全乌克兰肃反委员会令人痛心的工作情况。这一问题提出的原因是革命法庭决定提请政府为因一系列职务犯罪而被法庭判处死刑的两名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减刑。除了死刑，法庭不能对被告采取别的惩治办法。但审判两名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法庭成员都十分清楚，这两个人不应该被判处死刑，因为他们是肃反委员会里笼罩着的极端犯罪气氛的受害者。这些很不重要的角色却能够隐瞒相当数量的公款，而只是被说成少量贪污、少量受贿，因为当时在这个机关里工作的都是些“代人受过者”，所有人都从头到脚与刑事犯罪和流氓行为有牵连，都是肆意妄为和毫无责任心的坏蛋。

---

① 戈普涅尔，达维德·尤里耶维奇（1884～1925），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从事苏维埃工作。

② 赫梅尔尼茨基，亚历山大·伊萨科维奇（1889～1919），十月革命后曾任布尔什维克奥德萨省委书记、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法律顾问、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乌克兰司法人民委员等职。

在没有考虑问题实质的情况下，政府对法庭的请求自然感到满意，因为政府不能在所有这类情况下变成审判机关，而是相反，它完全有理由相信革命法庭的同情心。伏罗希洛夫正是提出了这样的一条建议。政府大多数成员原则上不反对伏罗希洛夫的建议，并认为顺便听取司法人民委员和革命法庭主席关于肃反委员会内部规章制度的介绍是非常及时的。就在这里，呈现在会议面前的是令人愤怒的这个正式官方机构的专政情景，以及它完全无视所有的法律和政府的命令的情景。

长时间以来，司法人民委员赫梅尔尼茨基徒劳地想从肃反委员会了解有关根据肃反委员会的决议被监禁和被枪毙者的情况。赫梅尔尼茨基在施加了最大压力、无数次没有结果的索要材料、甚至对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进行威胁之后，才得到了阅读被捕者案件材料的机会。结果发现，50％多已被拘押监禁的人员的案件卷宗里，只有逮捕令。但无论赫梅尔尼茨基采取什么方法，甚至连肃反委员会领导人自己，都无法确定绝大多数被监禁者当初被捕的原因。肃反委员会牢牢控制着落入其手中的所有人，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将有关的案件转交给法庭，而事后由肃反委员会提供的有关被枪毙者的材料远远不是全部。而且，肃反委员会强烈地抵制哪怕是一点点想从监狱中放人的企图，虽然它对那些人提不出任何指控。它对大多数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提得出指控，它已迷失于自己的侦缉人员的肆意妄为和毫无根据的逮捕的密网之中。只有克维林[①] 一人陈述了无情消灭那些被揭露犯有刑事罪的政府侦缉人员的必要性，反对给那些被判有罪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减刑。政府的所有其他成员都同

① 克维林，埃曼努尔·约诺维奇（1888～1937），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是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19年先后任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

意赫梅尔尼茨基和伏罗希洛夫以及法庭庭长的论据，认为造成肃反委员会里专横、暴力和犯罪气氛的责任应由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人以及间接地由整个政府分担。表决时赞成用多年社会劳动代替死刑。

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些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的人以肃反委员会、城市警卫队、刑侦民警局和其他机关的名义随意搜查、捕人、使用假币、索贿、再用这些贿赂进行敲诈，把行贿者关进监狱，为的是最终让那些怕死的人以十倍、二十倍的贿赂来换取释放。领导肃反委员会的是老资格的党的工作者瓦利亚夫卡，这是个固执、笨拙和残酷无情的人。他性格暴躁，非常自信，缺乏冷静，从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只顾自己讲话，准确地说是大喊大叫。他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就是不讲原则，沉湎于自己的无所不能，只是渴望“消灭”别人。我两次受到他的接待并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成天呵斥别人，但不能解释人们找他有什么目的以及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

昨天枪毙了两名由肃反委员会关押的被捕者，但在这之前报纸上早有报道说对他们的判决已经执行了。拉科夫斯基还在哈尔科夫时，以及最近在这里，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向我讲述了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捕人情况，特别是随着《纳巴特报》被查封而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逮捕的情况。拉科夫斯基向瓦利亚卡指出，不能允许毫无道理的逮捕，同时还表示，如果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刑事犯罪行为或过激行动或对抗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如果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与匪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只是思想活动者的话，就应该释放他们。此外，被捕者中间共有15名无政府主义者，其中一部分人为《纳巴特》报工作并散发了《纳巴特》报，其他人是因试图同被捕者见面而被拘留的，而会见是得到执行委员会和党委会允许的。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向被捕者送食物而被逮捕的，而传递的食物中没有发现任何应受指责的东西。

我和瓦利亚夫卡一起访问了省监狱并同一位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详细的交谈。此人是我本人非常熟悉的、也是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十分了解的卡巴斯。卡巴斯和他的一些同志在盖特曼和彼得留拉时代的地下工作中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他们是积极的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者，对哪怕很小的匪徒行为的表现也进行过毫不留情的斗争，当时被匪帮以所谓“叛变罪”判处死刑。我们的谈话当着瓦利亚夫卡的面进行，因为瓦利亚夫卡不愿意让我同卡巴斯单独在一起。我对他进行了例行的审讯，仔细地询问所有能够说明被捕者与匪帮哪怕有一点关系或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冒险分子支持的可能细节。卡巴斯滔滔不绝地回答，在场的瓦利亚夫卡也说不出什么反对意见。卡巴斯始终为马赫诺“老爸”和其他人签署的古利亚伊波列代表大会的决议感到激动，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各州苏维埃和起义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而大会决议本身就是最温和的苏维埃反对派的样板作品，完全不像孟什维克怀有敌意的文章。它对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策都表示赞同，只是反对委派的委员—统治者，反对“同帝国主义者妥协”。但是，即便这个决议也同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被捕者没有任何关系。整个事情都是《纳巴特》报第 11 期引起的，现给您寄上这份《纳巴特》报。

在瓦利亚夫卡的办公室，在我、马希茨基和里维诺夫在场的情况下，瓦利亚卡在回答我提出的有关被捕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时说，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被打死了①，捷尔任斯基被逮捕了②，因此，他，瓦利亚夫卡，要把所有被监禁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统统枪毙。他当然不能对这种荒谬

① 斯维尔德洛夫是在 1919 年 3 月从乌克兰回到莫斯科后生病的，并于 3 月 16 日病故。

② 捷尔任斯基曾在 1918 年 7 月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期间，被暴动者扣押。

的传闻作任何解释。省司法委员和共产党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几乎所有委员都说，应该对瓦利亚夫卡的个人统治采取措施，但直到现在，无论是他们的要求，或是我的规劝，还是拉科夫斯基的干预，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的街道上，我们去年撤退时朝我们背后开枪的孟什维克积极分子自由自在地来往，而奋不顾身的革命者却继续在监狱里受苦，处于瓦利亚夫卡的完全不受控制的管辖之下。今天在乌共（布）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又提出了有关肃反委员会及其主席的活动问题。

3月23日

昨天，乌共（布）委员会在闭幕会议上研究了肃反委员会的活动问题。委员会在听取了一系列申诉后，决定释放因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特别努力而被捕的所有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朋友。对肃反委员会主席工作的不满情绪看来还会产生其他后果。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重演了在其他被再次占领的州里出现过的悲剧：居民们曾经隆重欢迎我们的部队，渴望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给他们带来有利的变化，但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肃反委员会的积极活动。这种活动显然引起了居民的失望，他们曾经饱受苦难，又满怀希望。这种活动也助长了在当地一些工厂里有相当大影响的反革命势力和孟什维克的声势。我断定，地方肃反委员会根本没有为同反革命作斗争和查明奸细作出什么贡献。我在对一些被再次占领的州进行巡视期间，非常突然地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匆忙在这些地方建立的肃反委员会完全无力同反革命作斗争，它自己可能也不愿意进行这种斗争，而成了反革命的促进因素和前哨阵地。

戈普涅尔

№04156

莫罗兹给捷尔任斯基的信

（1919年4月15日）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同志

由于一系列原因，由于反革命势力的问题，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局势极不平静。

反苏维埃宣传在完全公开地进行。

波兰白军的间谍渗入红军并在破坏它。

由于形形色色的奸商和商店老板的公开的投机活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是天天涨，而是时时在涨。

匪帮活动和公开抢劫在明斯克省、维尔诺省和其他一些省里是常有的现象。必须以铁腕根除上述恶行。就像我们这里这样，肃反委员会便可以是这样的铁腕。然而，立陶宛－白俄罗斯政府[①]以微弱多数决定，在其境内不仅要取消县一级的、而且还包括省的肃反委员会。

政府所属权力机构如明斯克革命军事委员会、明斯克党委会受命执行立陶宛－白俄罗斯政府的决议，撤销了省和县的肃反委员会，但同时认为这个决议是不正确的，肃反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被以非正式途径授予侦查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决议在最高级别上是不正常的，违犯了苏维埃机关总的组织布局。

① 1919年2月21日，在维尔诺宣告成立了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归该共和国的有明斯克省、维尔诺省，以及科夫诺省、格罗德诺省、苏瓦乌基省的一部分。

据此，为了同整个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反革命进行必要的斗争，为了统一建设实现这一目标的、由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的机关，我建议指示白俄罗斯和立陶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问题上，它们应该遵照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指示行动，并与其省和县的中心保持全面联系和协调一致。

我认为，由此而产生的“独立性”并没有害处，因为同反革命的斗争要求有集中的和严整的机构。

莫罗兹

№04158

莫罗兹致俄共（布）中央的信

（1919年4月22日）

寄俄共中央

我巡视了西部州即现在的大俄罗斯[①]和立陶宛的一些城市和市镇。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中央报告，为了保卫和巩固十月革命成果，必须采取一系列当前形势迫切要求的措施。

这些措施涉及的是预先防止反革命方面的问题。

当前，整个西部边疆区浸透着反犹主义的毒素。当你到斯摩棱斯克省、明斯克省、莫吉廖夫省、维切布斯克省去走一走，你会感到简直透不过气来。在火车车厢里、车站上、食堂里、集市上、俱乐部里，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到处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毁灭俄罗斯，如果不是犹太人，苏维埃政权还可以"，等等。这一切都很明白，一方面，这是敌视无产者的阶级长期实行反犹主义的结果，另一方面，是这些阶级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最后赌注，最后一点，"苏维埃"反犹主义是因犹太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条件而孳生的。由于一系列原因，这些最新事态没有引起无产阶级的特别注意，因而许多人，甚至那些对犹太人友好的人们，往往把犹太人同"资产阶级"、"老板"或"投机"这类概念联系在一起。一句话，我们的敌人正利用这一切来唆使农村和城市中那些不觉悟的人们去反对苏

① 1919年4月，白俄罗斯部分还没有被波兰和德国占领的地区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

维埃政权。

最近发生在戈梅里、列奇察、鲍里索夫等城市的事件① 就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首先是“打击犹太人”，然后是“拯救俄罗斯”。

同样的情况在乌克兰也发生了。

怎样打掉那些有意识的蹂躏者手中的反犹主义武器呢?

首先，很显然，是鼓动和宣传。应该说，在这方面几乎什么都还没有做。必须出版一些通俗小册子，举行坐谈会，在城市里，剧院还可以上演一些反映犹太人生活的剧目，以及其他能够揭示整个犹太人生活、尤其是他们的贫困情景的节目。

第二，鉴于种族歧视造成的惊恐不安，可在过去作为“犹太人居住区”的城市里，正式解除犹太人担任的重要的“委员”职务，用内地省份来的同志代替了他们，而把犹太同志调到较少受反犹主义影响的内地省份去工作。

第三，必须把犹太人共产党员作为真正的士兵输送去红军部队。至今为止，红军中还没有作为普通士兵的犹太共产党员。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其所在边疆地区的优秀工作者，是各级苏维埃机关的职员。目前，完全可以用非共产党员、非犹太人去代替他们。

对犹太共产党员的动员应该由当地的党委会承担，向党委会解释清楚这样做的必要性。

第四，与犹太人的经济生活和反犹主义的产生有关。

我并不想扩大革命对犹太人经济基础的影响，我想指出的是，最近一个时期，犹太人中有许多人失去了阶级性，被迫做小的投机

① 指1919年3月在这些城市发生的蹂躏犹太人的暴行。

生意、“背小口袋的买卖”[1] 等等，以此谋生，就像苏维埃反犹主义指出的那样。

在这方面必须帮助现存的犹太人委员会[2] 和其他机构，使犹太劳动群众殖民化，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必须分给他们土地，把他们组织成农业公社。这不是乌托邦，而是现实的需要。

应该想方设法鼓励吸收犹太人到工厂去工作、到铁路去当扳道工、乘务员等。就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这项工作将由犹太人委员会主持进行。

我希望，这个报告不至招来对我的某种指责。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我本人就是犹太人，过去和现在一直在犹太无产者中间工作，我同他们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本不想写关于上面所叙述的一切，但对革命的忠诚促使我这样做[3]。

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　莫罗兹

---

① 国内战争时期背着小口袋把粮食从农村弄到城市去贩卖的投机行为。

② 犹太人委员会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成立于1917年11月。

③ 1919年4～5月间，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分别研究了同反犹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认为有必要加强宣传工作，在红军中组建犹太人部队，吸引犹太群众从事农业，派遣干部时注意当地居民的民族成分等。

№04159

别洛博罗多夫[①] 致克列斯京斯基[②] 的信

（1919 年 5 月 3 日）

西南铁路洛格车站，1919 年 5 月 3 日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执行我的基本任务——尽快平定维申斯卡亚的冒险行为——看来要拖很长时间[③]。我在密码电报中扼要指出了平息暴动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我认为在这里不便详细谈论，因为信也可能丢掉。奥廖尔肃反委员会的援助——我们一直在期待——原来是吹牛：答应给 400 人，进车厢的却是 141 人，到这里的只有 45 人！

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令人愤怒，真是少见！我们向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司令部报告了这一情况。

我出来已有 11 天了，但仅仅到了 1 个部队集群的司令部，原

---

① 别洛博罗多夫，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维奇（1891～1938），1907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 年起任乌拉尔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 为劳动国防委员会驻南方战线全权代表、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 年任高加索劳动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② 克列斯京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3～1938），1903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布尔什维克，1917 年革命期间在乌拉尔工作，1918～1921 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1921 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③ 1919 年早春，红军攻占了顿河大部分地区，随即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非哥萨克化”政策，结果引发了从维申斯卡亚镇开始的大规模暴动。参加暴动的约有 3 万人，基本上都是哥萨克中农。一些红军官兵也转向暴动者一边。南方战线派出了正规步兵和骑兵部队镇压暴动。4 月下旬，中央决定在对哥萨克人采取镇压措施的同时，组织俄罗斯中部向哥萨克地区移民，并武装邻近地区的农民同哥萨克斗争。5 月初，当时在南方战线工作的别洛博罗多夫被任命为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由国防委员会授权平定顿河哥萨克的暴动。

因是火车实在太慢。在抵达“波沃里诺”之前速度还可忍受，往后就每昼夜只走60～100俄里。道路遭到破坏，而铁路员工“同志们”用尽办法消极怠工。

最后，中央军事交通管理局是如此可爱，它不给我提供车厢，我只得坐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个小队得到的车厢里，结果，无论工作，还是同群众交谈，都完全无法进行。

总起来应该说，无论是顿河局①，还是中央的人民委员部，其工作都不怎么样。顿河局派来的“政委们”都呆在哥萨克村镇上，等待民政管理局② 的指示和命令。至于中央各人民委员部的代表，我不知道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我怀疑他们都呆在科兹洛夫！

米亚斯尼科夫同志建议派人到远征部队中间去做政治工作。那里在这方面特别薄弱。第9集团军出版的《红军战士》报不适合红军战士阅读，写的是“高深的”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而且文体很笨拙，那里工作人员也很少。

如果能找到二三十个工人共产党员并将他们直接派到远征部队，为其提供相当数量的《贫农报》（这份报纸在这里的效果要强得多），那就好了。对远征部队必须予以最大的重视，原因是：第一，由于敌人进行的假苏维埃宣传，红军战士思想混乱，对共产党员的不满开始在群众中露头；第二，共产党员到前线将向红军战士表明，他们（共产党员）并不是只会在哥萨克村镇“搞政治”。我提倡这样做是因为，我在昨天晚上得到的报纸上——这是我离开莫斯科后得到的惟一一张报纸——看到，彼得格勒动员了数千人派往顿河地区。或许您能设法安排此事？这里需要的就是具有坚强性格

① 俄共（布）顿河局是1918年9月成立的，其任务是领导顿巴斯、顿河、库班、北高加索等白军后方地区的地下工作和游击队活动。

② 1919年初，在红军解放顿河州的部分地区之后，成立了民政管理局，目的是恢复这些地区的苏维埃机构和党的机构。

和刚毅精神的人们。对这次行动来说，这样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的。

由于在这里的几天中了解了情况，我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尽管有些同志，其中包括索科里尼科夫①同志，对问题的看法似乎有些不同。虽然我没有同他交谈，但我能感觉到。

总起来应该说，需要什么样的人，这里还没有最后作出决断——各个方面还在以非常俄罗斯式的温厚态度进行争论呢。

穆拉奇科夫斯基来这里是很必要的，他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做到该做的一切。如果他能把波贝列夫兄弟也带来（如果第3集团军前线情况许可的话），那么在开始阶段也就够了。

就写到这里，天黑了，没有蜡烛。

亚·别洛博罗多夫向您致意。

又及，刚接到通知说，路上出事故了，恐怕不能很快到达察里津了。

---

① 索科里尼科夫，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1888～1939），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俄共（布）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曾参加布列斯特和谈，1918年12月起任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04160

别洛博罗多夫致克列斯京斯基的信

（1919 年 5 月 6 日）

伊拉夫里亚车站，1919 年 5 月 6 日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我们在这个该死的车站上呆了整整三昼夜，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继续走。

我很想对我 5 月 3 日写的那封信补充许多内容，但去莫斯科的邮政车马上就要走了，我得快点写。

我们同顿河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竟然是借助革命法庭进行的，我认为这是极为幼稚可笑的，是犯罪性的轻率。革命法庭审判（!）了被我们抓住的投敌分子和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被枪毙，一部分被送去强制劳动（想想看，这就是惩罚），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被释放，被和和气气地放走了。

这种幼稚可笑的行为应该结束，越快越好。必须组织肃反委员会，尽快结束法庭的连篇空话。

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不是对被抓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审判，而是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对顿河地区来说，必须以上述精神作出权威的决定。我以最坚决的形式坚持这一点。此外，还应向这里派出比捷尔任斯基同志派来的斯米尔诺夫更高职务的同志。

暂时到此。

顺致敬意

别洛博罗多夫

№04161

加米涅夫[①] 致列宁的电报

（1919年5月10日）

加米涅夫发自叶卡捷林诺斯拉夫

我收到了您用我的密码发来的电报，一切都将完成。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兹纳缅卡、基辅之间的道路被格里戈里耶夫[②] 匪军切断。我从基辅得到的消息和通报提供了格里戈里耶夫整个暴动的情况。来自皮亚季哈特基的消息说，17个梯队正在向叶卡捷林诺斯拉夫进发。格里戈里耶夫昨天推迟同我在兹纳缅卡见面，今天拒绝交谈。他企图与马赫诺联系上。侦察正在进行。有些消息还在证实中。我在亲自会晤马赫诺、访问古利亚伊波列之后认为——可能对情况估计过高——马赫诺现在还未定下支持格里戈里耶夫的决心。在那里，进行发动的基础是完全具备的，马赫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煤，大概将来也不会生产，虽然他个人对我发誓忠诚不渝[③]。

① 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他此时是国防委员会派往南方战线的全权代表。

② 格里戈里耶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94～1919），曾是俄国旧军队的上尉，二月革命后曾追随乌克兰中央拉达，后来支持斯科罗帕斯基，1918年底又投靠马赫诺。1919年初由于红军在乌克兰取得进展，他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被任命为师长。5月，格里戈里耶夫率部两万人在乌克兰南部发动叛乱，其口号是“政权归没有共产党人的乌克兰人民的苏维埃”，“乌克兰属于乌克兰人”，“粮食自由买卖”等。叛乱部队一度占领了切尔卡塞、乌曼、克列缅丘克、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叶里萨维特格勒、赫尔松、尼古拉耶夫等城市。失败后逃往马赫诺的司令部，不久被击毙。

③ 马赫诺曾与红军签订过临时性的协议。

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巴赫穆特、马里乌波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对工人的动员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没有钱，没有武器。我现在就去基辅，一定要把军队和武器带到这里来。给梅日劳克和第2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了具体的指示。从托洛茨基那里还没有得到什么，我们一定得见面。让他到达后向克里姆林宫询问我的住地。

№04164

托洛茨基致拉科夫斯基、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夫申科的电报

（1919年5月28日）

用直通线路
基辅

人民委员会主席拉科夫斯基，军事人民委员波德沃伊斯基，战线司令员安东诺夫

1．可以在其他战线上使用格里戈里耶夫部队的俘虏，只是都要预先通过法庭。在镇压主谋者之后，法庭可对一般俘虏判处枪毙，缓期执行，给两个月时间以观后效。被判缓刑者应佩带某种识别标志。

2．是否须要派波贡斯基旅去后方清剿？

3．尼古拉耶夫的子弹工厂状况如何？是否给该厂派去了足以担负重任的组织者，是谁？请记住，子弹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4．我认为，现在必须立即在乌克兰所有报刊上开始反马赫诺的运动，公布古利亚伊波列决议和马赫诺及其同谋者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行动。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消灭马赫诺匪帮①。

5．收缴居民手中的武器是当前应在乌克兰完成的头等重要的

① 1919年5月，马赫诺旅被邓尼金军队击溃后，逃往古利亚伊波列。

任务①。根据我们的经验，从下述几个方面来着手完成这项任务是可能的：1）宣布6月份一个月内收缴步枪、机枪和各种武器。从7月1日起，持有未交出的枪支者将受到无情的惩罚，关于这一点应广为通告；2）交出一支步枪或指出他人持有未交枪支者，发给大额现金奖励；3）需要组织一些收缴枪支特别支队，通过侦察机构预先查明格里戈里耶夫分子隐藏枪支的地方，进行系统搜查；4）同时利用报刊、标语和群众大会展开广泛的宣传。

5月28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① 在马赫诺和格里戈里耶夫的部队中，大多是武装的当地农民，他们在失利时便消失在农村中，而其首领们则带着人数不多的小分队逃避追捕，并在新的地点集合部队。

№04167

拉科夫斯基给列宁、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9年6月23日）

发自基辅，人民委员会，6月23日

军事电报，急件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奥斯特罗戈日斯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住处。

在星期六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共产党人、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孟什维克、主张独立的共产党人[1]、崩得分子[2] 一致通过了关于撤销乌克兰战线的决议。决议是以如下形式结束的："从今以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乌克兰战线与其他所有苏维埃共和国的战线联合在一起了。"

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拉科夫斯基

① 指独立于俄共（布）的乌克兰共产党。

② 即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联盟，1897年在维尔诺（今维尔纽斯）成立，曾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个组织。

№04169

莱因戈尔德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9年7月6日）

摘要报告

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我们在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政策”问题。

我们南方战线的困难局面[①]是我们对顿河哥萨克执行的没有远见的政策导致的必然后果。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从十月的日子开始，我们哥萨克政策的一般特点就是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一开始我们向哥萨克调情，给他们自治和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甚至还同意建立了顿河共和国，成立哥萨克军人会议，发布了关于优待哥萨克的法令。后来，由于红军向罗斯托夫和诺沃切尔卡斯克的顺利推进，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就向哥萨克进行挑衅，开始大规模地从肉体上消灭哥萨克。这叫做非哥萨克化，我们希望以此整顿顿河地区，使顿河地区即便不是苏维埃地区，也要顺从和听命于苏维埃政权。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即顿河地区还远非在我们手中，顿河地区的任何一个苏维埃机构都没有实力，没有足够强大的军队的情况下，就觉得自己能够对付哥萨克人，能够镇压大规模的风潮和激烈

---

① 1919年5月，红军在俄国南方战场上连遭失败，先后放弃了顿河地区、顿巴斯、哈尔科夫、别尔戈罗德、巴拉绍夫和察里津，形势十分危急。

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爱好自由的哥萨克对非哥萨克化不可避免地会采取的行动。无疑，我们对待哥萨克的原则观点，即把哥萨克视为与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思想异己的成分，是正确的。

哥萨克，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迟或早是要被消灭的，就是肉体上的消灭。但现在需要很有分寸，非常谨慎，想方设法争取哥萨克的好感。一分钟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是在同尚武的人民打交道，他们的每个镇子都是武装的营垒，每个村子都是要塞。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大规模消灭的政策必然导致我们永远也对付不了顿河，即便我们能够战胜，那也要经过长期流血和顽强斗争。维申斯卡亚起义的经验证明，哥萨克特别敏感于对他们执行的政策，一旦起火，就是暴动的大火，顷刻之间就席卷成千上万的哥萨克人。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落在他们头上的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处理哥萨克问题的提纲和指示[①] ——由于当地苏维埃机构令人愤怒的混乱引起的——更能促进起义的成功了。哥萨克军官手里的这些提纲成了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的绝好材料，这个政权显然急于消灭哥萨克。起义者的力量和绝望的顽强就来自这里，我们战胜不了他们，而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同进攻的哥萨克军队联合起来。这就是那些最先开辟了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最先转到我们一边的维申斯卡亚人干的。很清楚，是我们自己将他们推开并将其扔到了邓尼金的怀抱。今后我们应该避免这种事情。

我们的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民族问题上和少数民族制度方面一向表现得非常谨慎和敏感，有时甚至过了头。出于国际主义性质和国内的考虑，即在苏维埃范围内尽快消除任何民族偏见和谬误，

---

① 1919年1月24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签发了中央关于哥萨克问题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对富裕哥萨克实行大规模恐怖，把他们统统消灭；对所有直接或间接参加反苏维埃政权活动的普通哥萨克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6期，第177～178页。）

我们建立了一些民族共和国。但在对待哥萨克的态度上，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却不能将这种路线坚持到底，尽管正是在这里，在哥萨克的风俗习惯中，在他们以往的历史中，存在着独立、特殊和自主的国家生活的基础。对他们的这种风俗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习惯，对他们等级上的独特性，不能通过斗争，也不能仅仅以消灭的方法去战胜。必须制定一整套能确保我们的安全、避免武装暴动、防止反革命败类激怒哥萨克的阴谋的措施。到一定的时候，哥萨克人也会用自己的双手消除一切古旧的哥萨克风俗习惯。没有必要谈论哥萨克贫农问题，因为哥萨克人几乎都很富裕，由富农和中农组成。中农是北方哥萨克区的主要居民，其特点是很同情苏维埃政权，如果对他们执行谨慎的政策，毫无疑问，可以将其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至少也会使他们保持中立。富裕的富农分子居住在南方一些区，明显反对革命。北方的哥萨克占有的份地比较少，而南方的哥萨克所占的份地很多。因此，在相应的土地政策的基础上，可以在顿河哥萨克中制造分化，使其分为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

第二，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工作求得解决，尤其是在青年哥萨克中，他们与那些守旧的反革命的老哥萨克相比，在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方面要好得多。

最后，必须及时以人民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哥萨克人发出呼吁，肯定以前有关顿河区自治或甚至独立的法令，在其不久的将来加入顿河州的情况下，及时建立由所谓“苏维埃哥萨克”和顿河移民组成的顿河苏维埃政府。这一行动的意义将是巨大的，因为它将通过有别于当地哥萨克的外来人——实际上是革命委员会的人——来彻底摧毁所有心怀不满者的任何基础。我们所犯的一个大错误是，在统治顿河6个月的时间里，曾经存在的革命委员会没有给哥萨克带来一个正确的苏维埃政权。否则，我们赢得的会比输掉的多。

只有在顿河苏维埃政府的招牌下，我们才能在顿河对哥萨克反革命势力实行红色恐怖，以武器、言论和土地移民政策来采取行动。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我们将更快地以较小的损失实现顿河的“苏维埃化”。

1919 年 7 月 6 日

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　莱因戈尔德

№04173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1月9日）

1920年1月9日核准

用直通线路，立即发给斯大林本人

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斯大林

收到了马赫诺内容广泛的电报，说明他拒绝服从指挥部、拒绝向波兰战线开进的理由①。

第一，请告知您所了解的马赫诺军队的情况，其战斗编成、火力配置和补充来源。

第二，您是否认为立即进行包围并从军事上完全消灭马赫诺是可能的。

第三，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立即开展最广泛的谴责马赫诺的运动，揭露其拒绝执行命令、拒绝防守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免遭波兰地主袭击的罪行，将其作为一般的强盗和临阵脱逃者予以痛斥。

第四，与此同时，让一些绝对可靠的群众装扮成无政府主义者，将其派往马赫诺炮兵基地，解除那里的武装，或许是可行的。

① 根据中央指示，第14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0年1月8日命令马赫诺的所有部队立即在指定地域集结待命，准备同波兰军队作战。马赫诺及其指挥官们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并就此事给托洛茨基发了电报。

由于马赫诺部队几乎完全没有采取警戒措施，摧毁其弹药储备看来也是可能的。

托洛茨基

№04174

斯大林致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月9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亲自转交

托洛茨基

第一，据未经证实的情报，马赫诺的军队不超过1000骑兵和2000步兵①。第二，对马赫诺的包围在几天前已经开始，将于9日完成。为了得到更多不利于马赫诺的材料，以便瓦解其已经发生分歧的同伙，颁布了关于对付波兰军队的命令②。乌克兰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正在落实您关于开展广泛运动的建议③。

斯大林

① 这些数字明显低估了马赫诺的实力。第二天，斯大林在给托洛茨基的电报中明确了马赫诺部队的人数：在赫尔松地区、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地区、波尔塔瓦地区总共约有步兵和骑兵2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当初红军处境困难时投奔马赫诺而现在又想回来的前红军战士。（参阅《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通信》，莫斯科，1996，114页。）

② 参阅上一文件及注释。

③ 1920年1月9日，乌克兰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马赫诺及其同伙为临阵脱逃者和叛徒，所有对其给予支持和掩护的人也都将被无情消灭。

№04181

奥尔忠尼启则致契切林的电报

（1920年4月23日）

顿河罗斯托夫

1920年4月23日

我从彼得罗夫斯克来这里后，今天才收到您的电报。总的来说，我们已经在这里执行政策，但它要以足够的感化力来加强。我个人认为您对阿塞拜疆的回答是完全适当的。只是请您再拖延一段时间①。今天您将收到回答您的密电。当前巴库的形势是这样的：伊季哈德党人②、社会党人和其他党的代表离开了政府，这样乌苏别斯科夫政府就仅由穆萨瓦特党人③组成了。土耳其民族运动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要求阿塞拜疆允许苏俄军队过境到达土耳其边境以防英国进攻。不排除我们不流血地进入巴库并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可能性。巴库非常非常需要纳里马诺夫④，恳请您明天把

---

① 1919年秋到1920年初，苏维埃政府多次建议阿塞拜疆政府和格鲁吉亚政府就采取联合作战行动对付邓尼金军队的问题达成协议，但屡遭拒绝。1920年春，随着苏维埃俄国在北高加索站稳了脚跟，对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实行苏维埃化的压力也明显增强。在此情况下，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政府转而迫切希望尽快同苏俄签约，而苏俄则不急于进行谈判。

② 即伊斯兰统一党，成立于1917年9月，是阿塞拜疆泛伊斯兰政党。

③ 即平等党，1911年成立于巴库，其纲领是争取穆斯林团结，促进穆斯林国家的独立。是1918～1920年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主要执政党。

④ 纳里马诺夫，纳里曼·克尔巴拉伊·纳贾弗（1871～1925），作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任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塞拜疆人民委员会主席。

他派到我们这里来。明天晚上我又要去彼得罗夫斯克。

奥尔忠尼启则

№04182

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5月4日）

莫斯科

列宁

4月26日，我们的部队越过阿塞拜疆边界，得知阿塞拜疆共产党人委员会[①] 要求政府于4月28日午夜将权力转交给共产党人委员会。[当时我们的装甲列车在哈奇马索]。政府召开短暂会议之后将政权转交给了共产党人，他们成立了阿塞拜疆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巴库革命军事委员会，其组成全是穆斯林。宣布成立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第一个行动是呼吁俄罗斯给予武装援助，建议结成军事同盟。我军的推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政权转交共产党人两天后，我们的装甲列车开进巴库，有一个步兵营。第二天，我们的骑兵和集团军司令部也抵达巴库。阿塞拜疆军队全部转到我们一边。土耳其士兵和军官对巴库的革命也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其部队消除了政府从巴库出逃的可能性。居民们——特别是穆斯林和工人——的热情简直无法描述，可以与彼得堡的十月事件相比，惟一的差别可能是这里没有任何冲突。到处秩序井然。油田和商船队一点也没有触动。石油产品储备超过3亿普特，月开采量2000万普特。先向阿斯特拉罕发运150万普特。运

① 即1920年2月12日由俄共（布）巴库组织和地方共产党组织联合而建立的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隶属于俄共（布）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

出数额由阿斯特拉罕决定。“五一”的巴库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景象。数万工人和几乎所有居民都上了街，我们的军队受到热烈欢迎。晚上举行了盛大的、有组织的工人集会。向我们表达了对苏维埃俄罗斯及其军队的敬意。向阿塞拜疆陆海军委员和一位率领土耳其士兵在政变时期阻止阿塞拜疆政府外逃的土耳其共产党员颁发了红旗勋章，以第11集团军的名义给巴库工人授了旗，这些活动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向亚美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停止在阿塞拜疆境内的军事行动的那次会议令人欢欣鼓舞。代表苏维埃俄罗斯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引起了激情的爆发。组织工作暂时还未开始，正在组建政权。政治和军事方面是有保障的，我们不仅在阿塞拜疆，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都能够胜任。组织经济的问题极为严峻，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必须立即派些人来，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巩固。格鲁吉亚也将在最近的将来发生像阿塞拜疆一样的事情。不要同格鲁吉亚进行任何谈判。您向阿塞拜疆表示祝贺并给予一般形式的承认是必要的。我们将同苏维埃俄罗斯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联合。经验要求，我们应该获得人民委员会的授权，为了整个高加索以及更多。请通过广播或派人来为我们授权，要快。上述权力不要授予纳里马诺夫。

奥尔忠尼启则　基洛夫

№04183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斯大林的电报

（1920 年 5 月 4 日）

机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巴库，1920 年 5 月 4 日

列宁，斯大林

再次答复①：事态正在展开，我们希望不晚于 12 日能在梯弗利斯，为此已作好一切准备。将会进行得很出色。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将会引起对起义者的可怕屠杀。

奥尔忠尼启则

① 苏俄红军进入阿塞拜疆之后，奥尔忠尼启则主张立即解决格鲁吉亚的问题，他在 1920 年 5 月 3 日已经向列宁和斯大林表示，希望不晚于 15 日就能在梯弗利斯。

№04184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斯大林的报告

（不早于1920年5月4日）

请转斯大林。请政治监察员来。请政治监察员立即来。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请求。

在整个谈话时间内，请您始终守在机旁。请将便函转给斯大林和列宁。非常清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指示我们都在准确地执行[①]，当然，没有必要重复这些。没有一个红军战士踏上格鲁吉亚领土，也没有一个阿塞拜疆士兵进入格鲁吉亚领土。相反，格鲁吉亚部队在我们的部队进入巴库的同一天，赶走了波伊里附近的阿塞拜疆边境警卫队，占领了以前由阿塞拜疆人控制的横跨库拉河的桥梁，要求穆斯林村庄希赫里立即投降，否则将对其进行炮击。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你们怎么会相信格格奇科里的胡说[②]。我再重复一遍，从今天起，不会有一个红军战士接近格鲁吉亚边界。我们始终认为挽救濒临灭亡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是个无法补救的错误，但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们的所有命令我们都将非常准确地和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格鲁吉亚的情绪无疑是对我们有利的，在杜舍茨季县、拉戈德希、阿布哈兹和几乎整个库塔伊斯省的车站、地区，都是这样。只要我们的部队一抵达边界，这里的起义就不可避免。此

---

① 由于俄波战争和西方舆论界对高加索事件的关注，布尔什维克领导倾向于同格鲁吉亚签订临时和平协议，要求奥尔忠尼启则把部队撤离格鲁吉亚边境地区并放弃对格鲁吉亚的进攻。

② 格格奇科里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代表，曾多次通过广播通报红军在高加索的行动。

外，我们对待格鲁吉亚的态度对穆斯林产生了极为否定的印象，何况前穆萨瓦特政府① 还准备同我们在某种优惠条件的基础上签订和约。我认为，如果国际形势迫使我们演戏的话，那么至少必须要求他们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孟什维克② 将会走这条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出路。如果同我们接近的边防部队开始起义的话，我们怎么办？是支持他们，还是让他们听天由命呢？你们在阿塞拜疆问题上保持沉默，对此该如何解释？这里在急切地等待莫斯科说些什么。我认为，从你们方面必须共同表示祝贺。奥尔忠尼启则。如何对待亚美尼亚？奥尔忠尼启则。政治监察员在机旁。说完了。便函指定只给斯大林。

转莫斯科，斯大林。

您是否收到了我和基洛夫给列宁的很长的报告。如果您收到了的话，授权的问题如何处理？一切都将得到执行，但请注意，如果你们同亚美尼亚签订和约的话，对穆斯林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不会越过边界，只是请你们拖延签约。会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基督徒征服了阿塞拜疆，而把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放在一边。我们这儿一切都准备好了：9 日能够越过边界，11 或 12 日就可以在梯弗利斯了。但毫无办法。请注意，你们既然下达了命令，就没有必要重复，我会执行的，哪怕这些命令并不符合我的观点③。祝贺电我没有收到，必须通过战线重新发出，给我一份副本，这样他们就一定会收到。谢尔戈握你们的手，请转告叶努基泽，我从他派来的车上摔了下来，摔伤了脚。

奥尔忠尼启则

① 指被推翻的阿塞拜疆政府。

② 指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

③ 1920 年 5 月 7 日，俄罗斯联邦同格鲁吉亚在莫斯科签订了和平条约，格鲁吉亚承诺驱逐其境内的白军，并使共产党享有合法地位。基洛夫被任命为苏俄驻格鲁吉亚的政治代表。

№04185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和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5月8日)

我认为最好的人选是基洛夫同志，第二个人选是穆迪瓦尼。监察委员会主席——卡夫塔拉泽。监察委员会委员——杜姆巴泽和秦查泽①。列宁的电报给人造成了深刻的印象②。今天，阿塞拜疆军队在作战上、行政上和组织上都隶属于我们指挥部了。国民经济委员会严重缺乏工作人员。我刚刚通过直通线路收到从弗拉迪高加索发来的边疆区委书记纳扎列江③ 的信的摘要。“5月2日，一些不愿上前线的士兵出于愤怒，企图夺取梯弗利斯的权利，但未成功。我方一人被打死，二人受伤，三人被捕。省督苏拉克维里泽将军于昨天夜间将他们都枪毙了。指挥行动的桑德罗·马哈拉泽被救了出来。政府于今天实施特别戒严。现在工作极为困难，但群众和部分部队的情绪日益高涨。面临着政变。在巴统，英军指挥部正在作出让步。占压倒多数的巴统工人支持我们。4月30日，利亚霍夫将军被三位青年打死。古别利因此而被捕。但由于工人的要求，英军指挥部释放了他，5月1日，一辆英国小汽车将他直接从监狱送到群众大会上，第二天他就到了我们这里。

请将此情况通知中央。阿布哈兹的发动将在5月10日之前。

---

① 这里谈的是格鲁吉亚共产党（布）领导机构的建立的问题。

② 指1920年5月5日列宁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给阿塞拜疆苏维埃政府发去的贺电。

③ 纳扎列江，阿马亚克·马尔卡罗维奇（1889～1937），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书记。

经北斯瓦涅季亚到哥里县。这将彻底分散政府的力量。米哈·茨哈卡亚在库塔伊斯又一次被捕。所有梯弗利斯的犯人都转运到了库塔伊斯。5月1日，我们的演讲者吸引了广大群众，4辆用我们的口号和标语牌装饰起来的载重汽车开进戈洛温斯基，特种部队和警察向他们发起攻击，55人被打得半死，并遭逮捕。官方消息说枪毙了12个共产党人。随着在巴库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在整个亚美尼亚，群众都充满了胜利和喜悦的心情。在埃里温和亚历山德罗波尔，所有达什纳克党的房屋都被捣毁。该党领袖像被撕碎和焚烧”。[①]

奥尔忠尼启则

① 奥尔忠尼启则在这里通报的大都是已经过时的一周以前的情况，其目的显然是想继续尽力影响列宁，促其得出有必要加快格鲁吉亚苏维埃化进程的结论。

№04186

契切林给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0年5月11日）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我们的政策是世界性的政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高加索。在您的所有通报中，您绝对地忽视了我们的世界利益。您以地方利益为出发点的行动可能极大地危害我们的世界关系。对于英国，我们不应操之过急，我们与格鲁吉亚的和约将在英国产生巨大的效果，给邱吉尔集团的政策造成困难，而这将提高我们在全世界的威望。在当前时刻这种掩护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您无论如何要约束同志们，不要进行将对我们造成极大的危害的冒险。关于这样或那样的峡谷的问题应在基本的和世界性的问题面前让步。但完全不是要把您所列举的峡谷让给格鲁吉亚。您错了。边界是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同高加索战线联系之后确定的。这里的格鲁吉亚人证明，扎卡塔雷地区是属于格鲁吉亚的。但由于您的抗议，我们施加了压力，不让格鲁吉亚军队进入该地区。对一切有争议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掌握在我们手中，您应该从您那个方面减轻一点我们的任务，不要冒险①。

1920年5月11日　契切林

① 俄共（布）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试图利用阿塞拜塞和格鲁吉亚在扎卡塔雷地区的归属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作为对格鲁吉亚动武并实现格鲁吉亚苏维埃化的借口。

№04190

契切林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0 年 6 月 19 日）

1920 年 6 月 19 日

用直通线路立即发顿河罗斯托夫并立即由罗斯托夫政治监察员亲自负责转发巴库或弗拉迪高加索，然后按所在地送达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和平政策以及与资产阶级格鲁吉亚、达什纳克党的亚美尼亚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妥协，是党中央根据总的政策构想确定的，应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请约束一下与这一政策背道而驰的同志们的行动。我们在第比利斯的代表基洛夫和在埃里温的代表列格兰将执行政策，反对当地政府的欺诈行为，保护共产党人。我们不应该武装奥塞梯人，相反，应该控制他们，使其免受镇压。如果扎卡塔雷地区形成了反革命中心，这就是违犯条约[①]。基洛夫会消灭它的，但我们不应该向那里派遣新的部队。卡拉巴赫、赞格祖尔、舒沙、纳希切万、朱利法既不应归亚美尼亚，也不应归阿塞拜疆，而应在俄罗斯占领当局控制之下，并建立地方苏维埃，因为别的解决办法会损害我们的和平政策，这一政策是总的局势所要求的。我们对您抱有期望。为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政策，我们派一名代表去巴库。

1920 年 6 月 19 日　契切林

---

① 指 1920 年 5 月的苏俄－格鲁吉亚条约。

№04191

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年6月22日）

1920年6月22日

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巴库同志们的不守纪律和他们的行动与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之间不能允许的矛盾迫使我们采取措施制止他们，这就是从这里任命一位有威望的、与高加索的活动家没有关系的同志，作为人民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派往巴库。中央委员会决定执行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资产阶级政府妥协的路线，我们通过外交途径拔掉了那里的协约国立足点，否定了亚美尼亚的苏维埃化，认为把我们的很多力量转到这一方向是不合时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巴库的同志们却以自己的行动破坏妥协，拒绝根据中央要求同亚美尼亚签订协议，而是促成起义[①]。他们坚持要把已经决定由我们的部队占领的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并入阿塞拜疆。如果这些地区并入阿塞拜疆的话，将导致完全不可能同亚美尼亚达成协议。巴库同志们的这种战斗政策在根本上违背了中央已经确定的路线。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避免对中央路线的破坏，这就是派出一位有威望的中央代表，他将经常地控制地方的同志们。最好任命索科里尼科夫同志为我们派驻巴库的

① 1920年5月上旬，在俄共（布）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的支持下，亚美尼亚共产党人在亚历山德罗波尔、埃里温等地发动了起义，5月10日，宣布亚美尼亚为苏维埃共和国。但亚美尼亚政府很快就镇压了起义。

代表。如果这一点不可能做到的话，那么除了扎尔金德同志外，我们看不出有别的人选①。

同时，我们应加快实施我们在土耳其的计划。事情像我们现在这样缓慢和拖延是不行的。如果错过了时机，对我们的任何希望都将丧失。由于研究土耳其斯坦问题，埃利亚瓦② 同志被留在这里了。应该尽快了结这一问题。埃利亚瓦同志应该立即去土耳其。准备运往那里的东西一定要运去。主要的是，让埃利亚瓦同志立即在那里开展政治活动。

外交人民委员　格·契切林

① 后来并未向巴库派出中央代表。

② 埃利亚瓦，沙尔瓦·祖拉波维奇（1883～1937），1904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担任沃洛格达省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工商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时任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东方战线和土耳其斯坦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04193

捷尔任斯基[①] 致列宁的信

（1920年6月26日）

1920年6月26日
哈尔科夫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急于回答您，中央指示的哪怕一个字我都不能服从[②]。我不是在别墅，但我在加紧进行水疗。医生检查发现的只是神经系统过度疲劳，其他一切完全正常，包括肺部。我尽心医治，希望能再工作。

这里的内部情况总的来说是向上的。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如果中央不断地加以督促并派来工作人员，乌克兰很快就会成为诚实的苏维埃国家[③]。在农村，人们已被匪帮搞得疲惫不堪，渴望强有力的政权。我们派往省里的每一个诚实的工作人员都找到了立足点，工作已见成效。只是这样的工作人员太少了。当地的共产党员有点

---

① 捷尔任斯基，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1877～1926），1895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者之一，1906年开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被派往乌克兰领导剿匪工作，5月到7月任南方战线后勤部长，在此期间因病接受治疗。

② 中央指示捷尔任斯基再作一个疗程的治疗。

③ 1919年初，苏俄红军又进入了乌克兰，在原哈尔科夫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二个乌克兰苏维埃政权，宣告拥有主权的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不够成熟，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我没有看见地道的俄罗斯的东西，也没有听见抱怨声。在我的专业工作领域，收获是很大的。可以说，乌克兰的所有中等知识分子都是彼得留拉分子。斗争中最大的障碍是缺少乌克兰族肃反人员。对付马赫诺我不走运。要是有骑兵的话，可以立即收拾他。但我没有骑兵。只是到现在，我正在把勉强求得的几个骑兵连组成一个骑兵团，打算过一周后把这个团投入行动。

我希望中央作出决定，我应该在这里逗留多久。我在这里，加快了肃反委员会工作的速度。我觉得今后还必须常来。但莫斯科的克谢诺丰托夫① 同志以及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全国劳动义务制委员会的其他一些人抱怨说，我在乌克兰躲的时间太长了，因此而影响了他们那里的工作。我自己很难决定。我想在这里再住两周左右，然后回莫斯科一周，然后再返回这里。我等待中央的决定。

敬礼！

费·捷尔任斯基

① 克谢诺丰托夫，伊凡·克谢诺丰托维奇（1884～1926），1903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9～1920 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法庭庭长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法庭副庭长。

№04199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契切林、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7月16日）

经政治监察员用直通线路告知送达时间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巴库，1920年7月16日

列宁、契切林、斯大林

我认为，绝对必须等到应契切林同志的邀请而去他那里的阿塞拜疆代表抵达之后再同亚美尼亚签订和约①。

没有阿塞拜疆的参加而同亚美尼亚签订和约，会引起这里的同志们极度不安。

在纳希切万地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之间的械斗将是不可避免。避免这种情况的惟一办法是，我们进入并占领纳希切万地区。我们只是试探着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侦察，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却说我们在这一地区的力量不足。

政治形势不允许在纳希切万地区出现械斗，但如果我们不干涉，械斗是必然的。我想，可以继续旨在侦察的活动。今天我要同契切林联系，如果他不同意，我们将撤回侦察，但我要重复说一

① 当时，俄罗斯联邦与亚美尼亚之间正在进行谈判，涉及有关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边界局势问题。阿塞拜疆代表起先没有参加谈判，因为阿塞拜疆同俄共（布）高加索局领导人一样，主张以强力手段解决边界问题，并以此推动该地区的苏维埃化。

遍，侦察是必要的。

第3集团军粮食供应特别委员会的埃里斯托夫同志不会同革命军事委员处理好关系。他对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师机关的要求是这样回答的：他根据指挥员的权力签发命令和提出建议……

№04217

柯秀尔[①] 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0年11月13日）

11月13日

格罗兹尼市

报　　告

通报将哥萨克强制迁出叶尔莫洛夫斯克、阿坎－尤尔特、萨马申斯克、米哈伊洛夫斯克和卡里诺夫斯克等镇的工作情况（截至11月13日22时前）。[②]。

1）叶尔莫洛夫斯克镇：居民已被全部清除，收集粮食的工作即将结束。

2）阿坎－尤尔特镇：已迁出1600人，剩下待迁的的1661人。

3）萨马申斯克镇：迁出1018人，剩下待迁有1900人。

4）米哈伊洛夫斯克镇：迁出600人，待迁的有2200人。

5）卡里诺夫斯克镇：全部居民已迁完，并转交捷列克州农业

① 柯秀尔，约瑟夫·维根切维奇（1893～1937），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时期曾在北高加索工作。

② 1920年10月初，许多捷列克哥萨克镇发生暴动。俄共（布）高加索局于10月中旬决定，把上述镇子所有18～50岁的男人装进列车，押送到北方强制从事重劳动；老人、妇女和儿童强制迁往别的田庄和北方村镇居住；马、牛、羊和其他牲畜以及适合于军事目的的物资转交红军支配；把哥萨克的土地交给贫困的无地山民以吸引其转向苏维埃政权。这一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同。

局派来的接收者。

此外，已有 154 车皮的粮食从叶尔莫洛夫斯克、阿坎－尤尔特、萨马申斯克和米哈伊洛夫斯克这几个镇运往格罗兹尼集团军粮食供应特别委员会。

收集和运出粮食的工作还须持续将近 10 天。

在三个尚未完成迁徙的镇中，已被强制迁出的是仇视我们的白色－绿色哥萨克和最近参加暴动的哥萨克家庭，还未迁出的居民中有一部分对苏维埃政权持同情态度，如别的地方迁来的人以及红军战士、苏维埃职员和共产党员的家庭。

正如在以前的报告中已指出的那样，迁徙工作进展缓慢的原因是，提供列车的情况不好，一昼夜只给一次车。

目前，为迁出居民还需 306 个车厢。

高加索劳动集团军司令员　柯秀尔

№04218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11月22日）

斯大林

电台一清早就接收不到，受到莫斯科－塔什干通讯的干扰。

从卡西扬、别克扎江、努里查尼扬这几个词开始，我通报如下：由于土耳其军队向亚历山德罗波尔的进攻①，达什纳克党人放弃了城市，留在市内的我们的同志从监狱里放出了被捕的同志，组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散发了号召书。谢普赫（达什纳克党人）支队知道此事后，回来又占领了亚历山德罗波尔。手中没有军事力量的革命委员会打着红旗去欢迎20俄里以外的凯末尔的人。

基本上没有军队。达什纳克党人承认，他们关于布尔什维克－凯末尔结成同盟的宣传导致了这样的情绪：不同凯末尔打仗，因为凯末尔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所有党派中都出现了分裂。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公开在报刊上赞成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边境上有很多亚美尼亚部队，甚至还有军官，他们问应该怎么办。在土耳其占领区没有冲突。维尼泽洛斯辞职了，接替他的是古纳里斯②。在雅

① 根据（1920）塞佛尔和平条约，部分土耳其领土并入亚美尼亚。1920年10月30日，进攻亚美尼亚的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卡尔斯，开始向亚历山德罗波尔、埃里温进军。亚美尼亚向西方大国求援不果，于是请求苏维埃俄国在它与土耳其之间斡旋。11月13日，苏俄通知亚美尼亚方面，它同意派姆迪瓦尼进行斡旋。

② 指当时希腊政府首脑的更迭。古纳里斯是反对希土战争的人民党领袖之一。

典，共产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我们大家在想，已经不能再推迟了，我们将等到早上。[1]

① 这里指的是把苏俄军队开进亚美尼亚。

№04219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11月29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巴库，1920年11月29日14时30分

列宁、斯大林

我刚刚收到中央的决议[①]。前往哈萨克地区开展工作的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收到了很多卡拉万－萨拉伊、季里让地区农民的议决书，其中指出，没有政权，军队跑了，要求革命委员会来。革命委员会夜间单独越过边境，继续向季里让前进，在那里将可能宣布成立苏维埃亚美尼亚。根据中央委员会决议，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担心他们已经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权。[②]我想，一切都将很顺利，不会有特别的困难。[③]

奥尔忠尼启则

---

① 1920年11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要求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土耳其和波斯采取最大限度的和解政策以避免战争，不能提出针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波斯的征服任务，主要任务应该是保卫阿塞拜疆和控制整个里海。决定奥尔忠尼启则留在巴库负责对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的政治领导，责成斯大林负责同契切林、奥尔忠尼启则协商对与高加索接壤的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8期，第161页。）

② 奥尔忠尼启则实际上掌握了以强力推行亚美尼亚苏维埃化的计划的主动权。在组成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之后，高加索战线第11集团军的“亚美尼亚团”被派往亚美尼亚。11月29日当天，奥尔忠尼启则得知该团已夺取卡拉万—萨拉伊的消息后，要求有关人员立即与部分达什纳克党人进行谈判，后者以吸收他们加入革命委员会为条件，同意实现亚美尼亚的苏维埃化。同一天，奥尔忠尼启则在同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特里丰诺夫谈话时，要求在正式的情况通报中不涉及“亚美尼亚团”的情况。

③ 这句话是奥尔忠尼启则从电报稿中划掉的。

№04220

纳扎列江与奥尔忠尼启则通过直通线路谈话记录

（不早于1920年11月30日）

顿河罗斯托夫

纳扎列江同志在机旁。你好，谢尔戈。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你那里了解一些最新消息。列宁今天读了你的电报。以高加索局的名义给你发去了转交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的贺电。

巴库

你好。我们今天还没有同革命委员会联系，希望过一会儿联系上。今天夜间总的形势是这样的：卡拉万－萨拉伊和季里让地区的农民起义了，革命委员会今天应该是在季里让或者再靠前一些。直至现在，整个事态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开过一枪。在埃里温目前是德罗政府①，看来——按列格兰② 的说法——他似乎不反对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但不知为什么老在拖延。我想，德罗在欺骗列格兰。今天在巴库举行了隆重的苏维埃会议，纳里马诺夫宣读了阿塞拜疆政府的宣言③，指出在苏维埃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再不会有边界问题；从现在起，赞格祖尔和纳希切万是苏维埃亚美尼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享有自决权；阿塞拜疆的财富——石油和煤油——是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共同财产。会议气氛很热烈。同时还举行了同样形式的红军战士和工人的集

① 即由那部分准备与布尔什维克有条件合作的达什纳克党人所组织的政府。

② 时任俄罗斯联邦驻亚美尼亚全权代表。

③ 阿塞拜疆政府就亚美尼亚成立苏维埃政权而发表的宣言。

会。明天，第二批同志将出发，他们将带去煤油和布匹等物品。报纸上会对这一切作详细报道的。

顿河罗斯托夫

好！阿塞拜疆人。我们将在报刊上欢呼。我准备明天召开一个亚美尼亚共产党员的小型会议，我将建议立即对所有在苏维埃建设方面有经验的亚美尼亚族共产党员进行登记，并开始分批派去供你使用。必要时我们将宣布动员。现在我就同基洛夫通话，把你的通报转告给他。他正在机旁，抱怨对正在抵达的部队和当地驻军的粮食供应状况差到了极点，他们那里现在正举行粮食会议。粮食委员在随时可能被逮捕的威胁下工作，粮食机关在加劲努力。但基洛夫认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他要求与别连基和弗鲁姆金[①]谈谈，请他们作出关于对斯维亚托克列斯托夫区的供应以及采办工作的指示。弗鲁姆金现在在莫斯科，过一周才能回来。基洛夫通报说，车臣不平静，他要打听一下伏龙芝的情况，你知道些什么吗？我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你提供了这些消息。

巴库

动员亚美尼亚族共产党员的事情应该尽快进行。此外，你想不想去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②]？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想去。已经同斯塔夫罗波尔人和库班人商量好了，我们一起走。再没有问题了，祝一切如意，问候别洛博罗多夫。

顿河罗斯托夫

我很想出席代表大会。要知道，我三年来没有参加过一次代表大会。你猜中了，彼得林科在这里，我转告他，让斯塔夫罗波尔人

① 弗鲁姆金，莫伊塞·伊里奇（1878～193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战期间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

② 指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1920年12月22日至29日在莫斯科举行。

推举你当代表，他们乐意这样做。我与库班人谈好了有关自己的事。不巧的是，别洛博罗多夫一定得去，他是伊里奇点名要去的人。总之，谁也不会留在罗斯托夫。如果斯塔索娃来的话[①]，无论怎样都比较容易。我们将设法一起去参加代表大会。暂时没什么了，再见。

巴库

我将有巴库和集团军发的代表证，这样就不要斯塔夫罗波尔的代表证了。

祝一切都好，再见。

---

① 斯塔索娃，叶列娜·德米特里耶夫娜（1873～1966），俄国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917年2月到1920年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20年在彼得格勒担任党的领导工作。1920年11月27日，根据高加索局的请求，中央政治局决定把斯塔索娃调到顿河罗斯托夫工作。

№04221

奥尔忠尼启则通过直通线路向斯大林、列宁、契切林的报告

（1920年12月4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你好，娜佳[①]，请立即向斯大林、列宁、契切林转达以下内容：

亚美尼亚的事态进展顺利，无任何麻烦。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今天应抵达埃里温。埃里温居民热烈欢迎苏维埃政权宣告成立[②]。整个军队接受了政变。列格兰坚持要让德罗和捷尔捷利扬参加革命委员会。土耳其人极不信任亚美尼亚共产党人。德罗和捷尔捷利扬参加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要等卡西扬[③] 抵达埃里温后才能决定。可能会拒绝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决定。我们占领了卡拉克里斯[④]。哈季索夫2日同土耳其人签订了和平条约，立即将该条约副本转呈你们[⑤]。从姆迪瓦尼的通报——也将立即转报你们——中，我感到很

---

① 指值班通信员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

② 1920年11月29日，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成立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宣言。

③ 卡西扬（捷尔－卡斯帕良），萨尔基斯·伊凡诺维奇·（1876～1938），1905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南高加索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出任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④ 亚美尼亚城市。

⑤ 1920年12月2日，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政府与土耳其在亚历山德罗波尔签订了和平条约。

清楚，土耳其人在向巴统运动[①]。昨天阿尔希巴伊在我这里，他被吓得惊慌失措，我对他进行了安慰，尽管他未必会相信我。必须把莫斯科的亚美尼亚族共产党员全都派回来。你们要立即把捷尔－加布里埃良[②]派来。梯弗利斯报刊报道说，君士坦丁堡同安卡拉的谈判失败了[③]，存在着安卡拉的共产党合法化的征兆。

奥尔忠尼启则

---

① 苏俄对土耳其控制巴统的企图十分关注。契切林在1920年12月10日在给俄罗斯联邦驻格鲁吉亚全权代表舍因曼的电报中指出，“巴统转入土耳其人之手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应放弃我们对凯末尔实行友好政策的路线，但也要控制他们，使其不要对我们采取不能容忍的行动。”（《苏联外交政策文件集》第3卷，第374页）。

② 捷尔－加布里埃良，萨克·米尔佐耶维奇（1886～1937），1902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在巴库领导苏维埃运动，后来在莫斯科能源部门工作。

③ 指的是伊斯坦布尔苏丹政府与安卡拉的凯末尔革命政府之间的谈判。奥尔忠尼启则仍把伊斯坦布尔称为君士坦丁堡。

№04222

舍因曼[1] 致契切林、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0年12月6日）

莫斯科

抄送斯大林同志

巴库，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发自梯弗利斯，1920年12月6日

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同志

由于亚美尼亚的苏维埃化，格鲁吉亚政府或与协约国发生冲突，或陷入混乱。

不管情况如何，格鲁吉亚政府对我们的态度在急剧变化。

我的一位最好的工作人员被捕已经好多天了。契切林得知此事后建议逮捕他们驻莫斯科的马哈拉泽[2] 的工作人员。我同意了。但后来的情况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昨天晚上又逮捕了当地一些共产党报纸的工作人员和秘书。昨天夜里，格鲁吉亚警察包围了列格兰的列车，列车是因道路毁坏而不能继续去埃里温，停在半路上。列车至今仍被扣押，禁止出入车厢，也不准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来回走动。

我认为，必须立即以某种理由暂时停止向格鲁吉亚运送石油产

① 时任俄罗斯联邦驻格鲁吉亚全权代表。

② 当时格鲁吉亚政府驻莫斯科的全权代表Г. 马哈拉泽。

品。

第二，在埃里温，以住宅监禁的形式拘留格鲁吉亚使馆成员。

第三，逮捕格鲁吉亚驻巴库使馆的一些人员。

在向契切林通报上述情况时，我建议他以我方要求的形式提出最后通牒：第一，立即将整个弗兰格尔舰队转交给我们。

第二，立即恢复同亚美尼亚的铁路和公路交通。

第三，立即释放以行政方式逮捕的共产党人。

第四，无条件停止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此外，由苏维埃亚美尼亚方面发出的最后通牒应要求格鲁吉亚立即放弃对鲍尔恰林县中立地区的占领，并从阿尔达坎撤走格鲁吉亚军队。

契切林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的结论，请告知我结果。扎卡塔雷地区的战役进行得如何？请证实是否收到此件。

舍因曼

№04223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12月8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巴库，1920年12月8日

斯大林

格鲁吉亚人不允许给亚美尼亚的货物过境，最近几天特别蛮横无礼。依我看，格鲁吉亚问题总的来说应在最近时期解决，而且将要求投入更多的力量，付出更大的牺牲。能否预测一下。

谢尔戈

№04224

奥尔忠尼启则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0 年 12 月 9 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

部队在格鲁吉亚边境上的集结将在明天完成。在这种状况下无法控制部队。要么我们把部队向后撤，要么向前推进，可以具体地斟酌一下。在后一种情况下，我认为好办。就看您和伊里奇的意见如何。我重复说一遍，反正土耳其人正在将我们拖入这一事件①。

谢尔戈

① 当时，格鲁吉亚与土耳其之间在边境地区处于军事对抗状态中。

№04225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12月12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巴库，1920年12月12日

列宁、斯大林

毫无疑问，格鲁吉亚在协约国帮助下，正在挑动当地山民暴动：他们向山区投放金币、布匹、部队和大量格鲁吉亚军官和当地山民出身的军官。这样一来，达吉斯坦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复杂化了[①]。格鲁吉亚人正在拉戈杰赫地区部署部队，而达吉斯坦的反革命势力正是从这里得到供应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外高加索地区煽起暴动。看来，这一切都是基于下述考虑，即我们这方面对暴动的镇压将会引起穆斯林愤怒的反应，会吓跑凯末尔。应该指出，对甘贾暴动[②]的镇压被安纳托利亚[③]很好地利用了，在大国民议会上还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格鲁吉亚本身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不须特别用力就可以了结它：在鲍尔恰林县、阿布哈兹、阿扎尔和杜舍季县发动起义[④]。再一次向你们通报这些情况并请指示。

奥尔忠尼启则

---

① 1920年9月，在达吉斯坦山区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穆斯林暴动，原因主要是对于苏维埃政权实行的粮食征集制的不满。到1921年春天，参加暴动的人数达到一万人左右。1921年5月，苏维埃政权动用正规野战部队镇压了暴动。

② 1920年3月，在阿塞拜疆城市甘贾发生了穆斯林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③ 当时处于凯末尔控制之下的土耳其亚洲部分，这里指的是凯末尔政府。

④ 指的是准备在这些地方发动反对格鲁吉亚政府的起义。

№04226

奥尔忠尼启则致列宁的电报

（1920 年 12 月 15 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巴库，1920 年 12 月 15 日

列宁

由斯塔索娃、纳里马诺夫、姆迪瓦尼、奥尔忠尼启则组成的高加索局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埃利亚瓦、列格兰、斯塔尔克、杜姆巴泽、奥库扎瓦、第 11 集团军司令员格克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米哈伊洛夫，会议一致决定在黎明时越过格鲁吉亚边界。一切都已准备就绪。①

奥尔忠尼启则

① 高加索局会议的这一决定未获中央同意。1920 年 12 月 17 日，中央全会确认应在高加索奉行和平政策，要求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军事部门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实现。

№04227

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致俄共（布）中央的信

（1921年1月2日）

机密

俄共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

扼要报告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实现孟什维克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是必要的。

第一，在阿塞拜疆实现苏维埃化之后，我们就指出了对格鲁吉亚——高加索反革命的基地——实现苏维埃化的必要性。高加索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格鲁吉亚政府向克里米亚派去了所有撤退到格鲁吉亚的邓尼金军队，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所有暴动都是在格鲁吉亚直接参与下发生的，如今达吉斯坦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暴动也是在格鲁吉亚间谍机构指挥下进行的，起义者的司令部设在拉戈杰赫（在格鲁吉亚境内，西格纳赫斯克县）。在北高加索发现的所有反革命阴谋都被揭露与格鲁吉亚有联系。为了坚决保障我们的北高加索（粮食和石油），必须使格鲁吉亚苏维埃化。

第二，格鲁吉亚政府千方百计支持和组织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叛乱的目的是，企图以此引开我们对它的注意，这些行动不无结果。经常在穆斯林面前向我们挑衅，竭力破坏我们的部队镇压暴动的行动，例如镇压甘贾暴动时就是这样。在此之后，由于格鲁吉亚报刊的拼命宣传，安卡拉对我们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

第三，如果没有苏维埃化的格鲁吉亚，苏维埃亚美尼亚实际上处在土耳其的比我们大得多的影响之下，因为通往亚美尼亚的铁路经过格鲁吉亚（从纳弗特卢格站开始）。目前格鲁吉亚甚至不准向亚美尼亚运送粮食。

第四，在当前的形势下，土耳其人能够很容易地在马基诺－纳希切万地区建立自己的缓冲地带，他们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特殊的汗国，它将控制通往塔夫利兹的铁路，从而切断我们与波斯的交通，孤立亚美尼亚。

第五，外高加索的现状迫使我们必须在阿塞拜疆保持相当强的军事力量，这对当地居民来说是极大负担，对部队也没有好处。这种局面将转变为危险的形式，使阿塞拜疆本身的情况复杂化。

第六，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以及我们对巴统的占领，将会铲除协约国在南方反对我们的最后一个基地。

第七，现在必须使格鲁吉亚苏维埃化还在于，协约国还来不及整顿弗兰格尔军队的残余，它暂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我们对抗。

第八，格鲁吉亚事态的整个进程证明，不应将希望寄托在格鲁吉亚内部的决定性爆炸上。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格鲁吉亚是不可能实现苏维埃化的。

第九，我们干涉格鲁吉亚内部事务的借口是有的。为此不需要公开进攻格鲁吉亚。可以在阿布哈兹、阿扎尔、鲍尔恰林县发起运动，这些地区有这样的基础。在这方面，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也都会帮助我们。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作为解放者进入陷于无政府主义、濒临崩溃的格鲁吉亚。

最后必须再一次强调指出，没有整个外高加索地区的苏维埃化，我们在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到自己是稳固的。如果说现在库班和捷列克比较平静的话，那么这只是哥萨克还没有来得及从我们对其进行的坚决打击中恢复过来。而格鲁吉亚政

府为了帮助哥萨克和山民反对我们做了能做的一切。

俄共中央高加索局已不止一次地作出了关于必须实现格鲁吉亚苏维埃化的一致决定。[①]

俄共中央高加索局委员　　奥尔忠尼启则

基洛夫

莫斯科　1921年1月2日

① 尽管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又一次陈述了很多理由，但俄共（布）中央仍未同意高加索局所提出的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建议。

№04229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列别杰夫[①]致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②]

（1921年1月27日）

机密

用直通线路

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

1. 如果苏维埃共和国违反自己的意愿被迫对格鲁吉亚的挑衅性政策给予军事回击的话，你们是否认为，为了进行这次战役以及考虑到占领其领土等等，你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兵力和兵器？

2. 在对土耳其和格鲁吉亚同时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的上述问题。

3. 你们是否认为军队的思想状况能够保障胜利？

4. 在认真注意到运输现状的情况下，你们对中央有何要求？尤其是在占领格鲁吉亚的情况下，你们对供应军队和阿塞拜疆、亚

---

① 列别杰夫，巴维尔·巴甫洛维奇（1872～1933），苏俄军事领导人，1918～1919年全俄总参谋部主任，1919年任东方战线参谋长，1919～1924年间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

② 这份电报是根据政治局1921年1月26日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决议而发出的。政治局决议的主要内容是：授权外交人民委员部拖延与格鲁吉亚的决裂，系统地收集格鲁吉亚破坏条约的准确材料，同时更坚决地要求它放行运往亚美尼亚的货物；询问高加索战线，现有的军事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准备好立即或近期与格鲁吉亚的战争；指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高加索战线研究有关使格鲁吉亚停止向达吉斯坦和车臣暴动分子提供援助的措施等。（参阅《布尔什维克领导层通信》，莫斯科，1996，178页。）

美尼亚、格鲁吉亚的苏维埃机关的粮食运输方面有何要求？

5．我们的外交部门也将同时以和平施加压力的方式促使格鲁吉亚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①，特别是不以反对我们为目的而对其他高加索民族进行干涉。建议你们也讨论并制定那些我们的外交部门能够向格鲁吉亚政府提出的不支持达吉斯坦和车臣等地的暴动的要求。同时必须提出对上述要求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组织形式（如委员会等）。

6．要求你们在最短时间内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作出结论。

1921年1月27日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总司令　加米涅夫

野战司令部参谋长　列别杰夫

① 此处是指1920年5月7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和平条约的有关内容。

№04230

奥尔忠尼启则致俄共（布）中央、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的电报

（1921 年 2 月 6 日）

抄送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

1921 年 2 月 6 日

俄共（布）中央

再一次向你们通报情况。随着春天的到来，高加索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重，严重到我开始怀疑我们能不能守住巴库的程度。集结了大量军队，准确地说是些能吃的人，沉重的负担落在居民身上。由于采购肉类，居民真正是在呻吟，他们诅咒一切的一切——苏维埃政权、红军、俄罗斯人。沉重的运输义务使农民无法种地，我们所有关于地主土地等等的议论全都是空话，农民无力耕种的不仅是地主的土地，还有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

军队的数量不仅不应该减少，而且相反，还必须扩大，因为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的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工作到春天将会产生相应的结果。格鲁吉亚完全变成了世界反革命势力在近东的司令部。这里管事的是法国人（参阅舍因曼的信），管事的是英国人，管事的是安卡拉政府的代表卡济姆－别伊。向山区投入了数百万金钱，在同我们接壤的边境地带组织了强盗式的匪帮，经常袭击我们的边防哨所，发生过破坏哨所的事件，有关情况都已通过舍因曼正式向格鲁吉亚政府通报。但就在齐切林的最近照会——其中考虑不周地

提出了三天期限——之后，格鲁吉亚仍然蛮横无礼，根本不理睬他。现在，可怜的舍因曼呆在梯弗利斯，没有任何人同他谈话，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互发最后通牒式的照会，结果仍然是蒙受耻辱。我不明白，是什么样的高级政策要求这样的。舍因曼呆在梯弗利斯，完全有理由坚持召回他，必须这样做。俄罗斯的威信跌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们竟然通过一个叫凯季的特别支队队长来同我们的全权代表谈话。

你们会说，请提供事实。事实将会随着春天太阳的第一道光线提供给格鲁吉亚人的。

我认为再一次强调正在向巴库地区逼近的致命危险是绝对必要的，预防这种危险的惟一办法就是立即集中足够的力量实现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

№04231

斯大林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便函

（1921年2月16日）

巴库，便函

致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从你的通报中，很遗憾，我们没有完整地得到［……］，我们得出结论，亚美尼亚政府在同格鲁吉亚进行战争，保护起义者①。希望从您那里得到对此事的准确说明以通告欧洲，以及您对由于格鲁吉亚内部的起义而成立的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说明②。然后报告我们，阿塞拜疆政府是否也在为保护起义者或其他什么人而进行战争，关于格鲁吉亚人以残暴手段对付萨洛格雷－索古特胡拉赫镇和其他地区鞑靼起义者的说法是否真实。还请告知我们，你们是否采取了措施，要求俄罗斯集团军司令员、师长、旅长禁止谈论关于我们要向格鲁吉亚进军和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方面展开军事行动的问题，而要具体和明确地说明用当地部队保护起义者。最后，必须由您向巴库报界宣布关于与［……］联系中断，并通过罗斯托夫通报［……］日。该［……］什么也别派出，

---

① 1921年2月11日至12日夜间，在格鲁吉亚军队占领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之间部分有争议的地区，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对格鲁吉亚的武装起义，起义得到了苏俄红军第11集团军的支持。

② 1921年2月中旬，格鲁吉亚东部地区爆发起义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于2月16日向列宁呼吁给予军事援助。俄共（布）中央开始考虑全面干预格鲁吉亚局势直至占领梯弗利斯的问题。

别忘记安巴泽[①]，那里也在起义，第9集团军就在附近。如果您能通过让步使格鲁吉亚的左派孟什维克对您有好感，就像在亚美尼亚对待达什纳克党人那样，可以答应让步，如大赦等等。

斯大林

① 格鲁吉亚黑海沿岸地区。

【专题说明】

苏俄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的通信

（1920 年 3 月至 1921 年 1 月）

内战期间，随着采取大规模措施实现边疆地区的苏维埃化、重新统一 1917 年瓦解的旧俄国的过程，很自然地引起了苏维埃俄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更广泛的对外政策问题。在世界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为加强与资本主义大国对抗的地位，苏维埃政权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扩张势力，甚至将苏维埃化的进程推向境外，而对于暂时力不能及的国家和地区，则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本专题收入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有关对外政策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来往电报和信件共 17 份文件，主要涉及在波斯的军事行动及扶植吉兰共和国、对土耳其和阿富汗的援助和渗透，以及对波兰等西部邻国的政策等。这些文件中包含的材料反映了政策和策略的制定、行动的方案和措施、干部的选择任用以及具体的执行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毛子成、王红翻译）

№04178

多列茨基、温什里希特[1] 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3月15日）

绝密

1920年3月15日5时50分核准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抄送机要室主任

斯摩棱斯克，1920年3月14日

列宁

我通报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2月开始对和平谈判的正式意见：“波兰不会签订和约。毕苏斯基[2] 正在欺骗所有的人。波兰的资产阶级上层与协约国一起，不顾社会－爱国者的要求，正在准备3月或4月的进攻。1月份，铁路运输停了两周，尽管宣布的原因是为了节约燃料，但实际上是用于从法国运来技术装备、汽车、火炮、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

俄共中央波兰局委员　多列茨基

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温什里希特

① 温什里希特，约瑟夫·斯坦尼斯拉沃维奇（1879～1938），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期间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军事人民委员，1919年起先后任第16集团军、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供给部长，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1～1923年间曾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

② 当时的波兰国家元首。

№04187

奥尔忠尼启则致卡拉汉、列宁、斯大林的电报

（1920年5月24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抄送列宁和斯大林

卡拉汉

亚美尼亚是可以引爆的，但就像我曾指出的那样，这将遇到很大的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我不认为，达什纳克党人[①] 会为了土耳其而同意我们的部队和武器装备通过[②]。在任何情况下，你们所建议的向亚美尼亚公开提出让我们过境到土耳其边界的要求，都会在亚美尼亚群众中引起不满。只要我们占领纳希切万－奥尔杜巴德－朱法利[③]，马上就会反映出来。今天收到凯末尔巴沙的信，他请求援助并建议结成同盟。我们也给凯末尔回了信。通过我们的亚美尼亚同志建议在我们主持下解决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在土属亚美尼亚方面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如果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亚美尼亚将为土耳其提供自由往来的可能性。在亚美尼亚边境上没有任何正规的土耳其部队，只有一个司令部及其周围的武装的当地居民。我再一次提请您注意，格鲁吉亚人收容穆萨瓦特政府在梯弗利斯避

① 亚美尼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成立于1890年，1918年5月～11月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的执政党。

②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向俄罗斯联邦呼吁，请求建立外交关系和提供军事援助。

③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有争议的地区。

难，让他们在那里活动。必须要求凯末尔公开反对在这里领导挑衅活动的努里－巴夏[①]。他躲起来了。过一个钟头，我和拉斯科尔尼科夫一同去恩泽利。

1920 年 5 月 24 日　10 时　巴库

① 曾是土耳其驻高加索部队的司令，1920 年 5 月参与领导了穆萨瓦特党人在阿塞拜疆发动的反苏维埃暴乱。

№04188

托洛茨基致拉斯科尔尼科夫[1] 的电报

（1920 年 5 月 26 日）

舰队司令拉斯科尔尼科夫

现通报对波斯政策的基本指示[2]：“第一，不要在俄国旗帜下进行任何军事干涉，不要组织任何俄国远征军，尽量设法强调我们的不干涉政策并直接援引莫斯科要求从恩泽利港[3] 撤走俄国部队和红旗舰队的说法，以免怀疑我们企图占领。第二，以派遣教官、志愿人员和提供经费等形式尽量帮助库楚克汗和波斯人民解放运动，把我们现在占领的地区交给库楚克汗。第三，如果库楚克汗为了进一步斗争的胜利需要我们的军用船只帮助，就让它们挂阿塞拜疆共和国的旗帜，并以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名义援助库楚克汗。第四，在波斯秘密帮助并保留广泛的苏维埃组织。第五，我们必须让英国统治集团知道，我们在波斯、在整个东方都没有什么打算，而

---

① 拉斯科尔尼科夫，费多尔·费多罗维奇（1892～1939），1910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战期间曾在海军服役，1917 年二月革命后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副海军人民委员，伏尔加－里海区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1920 年 5～6 月，拉斯科尔尼科夫作为伏尔加－里海区舰队司令参加了在伊朗境内的军事行动。

② 在苏俄直接支持下，1920 年 5 月 18 日在伊朗北部阿塞拜疆人地区成立了库楚克汗的革命政府，该政府请求同俄罗斯联邦政府和苏维埃阿塞拜疆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缔结军事条约。中央政治局在 5 月下旬讨论东方政策时研究了波斯问题，赞同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支持东方人民解放运动的政策，责成拉斯科尔尼科夫负责有关援助库楚克汗的事务，并提出了处理波斯问题的原则和方式。托洛茨基的电报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

③ 伊朗港口城市。

准备为我们的不干涉政策提供真正的保证”。收到本电报后立即通报有关人员。

5月26日，托洛茨基

№04189

拉斯科尔尼科夫致托洛茨基、列宁、契切林的电报

（1920年6月7日）

核准日期：1920年6月6日

莫斯科，通过政治监察员，由他个人负责紧急发出

托洛茨基同志，抄送列宁、契切林

我刚刚从拉什特[1] 回来。6月4日到5日的夜间，在拉什特组成了波斯临时革命政府[2]，其成员如下：临时革命政府、参议会主席和军事委员——米尔扎·库楚克同志，财政委员——米尔扎·马哈默德·阿里－巴扎尔，商业委员——米尔扎·阿布尔·卡祖姆·列扎·扎杰，司法委员——马哈默德·阿加，邮电委员——纳斯鲁拉，人民教育委员——哈吉·马哈默德·焦法尔，国民经济和农业委员——米尔扎·马哈默德·阿里罕·胡米。临时革命政府的所有成员都是米尔扎·库楚克同志的老战友、第一次波斯革命[3] 的参加者。与临时革命政府同时组成的还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其成员是：叶赫萨胡拉……萨姆赫·穆扎费特·扎杰。选举我们俄罗斯共产党员科扎诺夫和阿布科夫同志为波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其他两位成员。尽管

① 伊朗城市。

② 这一政府最早宣布成立是在1920年5月18日，但其正式组成是在吉兰州的首府拉什特从英国占领下解放之后。

③ 即1905～1911年的伊朗民族解放革命。

米尔扎·库楚克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强烈要求我们的同志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但我声明，他们将提供最充分的协助，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则暂不参加。请你们指示，科扎诺夫和阿布科夫两同志可否参加波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不论参加或不参加，对他们的政治准备程度我都可以绝对担保。如果你们允许科扎诺夫和阿布科夫两人参加波斯革命军事委员会，那就得完全转入波斯服役，并在形式上断绝与苏维埃俄罗斯的关系。波斯临时革命政府——我出席了它的会议——告诉我，它把根据列宁同志的原则实行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米尔扎·库楚克同志认为当前最好只提一个口号："打倒英国佬"。占领德黑兰后，在最初时期支持汗的必要性将被充分使用，他已宣布把土地交给人民。波斯临时革命政府向我表示，由于他们缺乏国务活动的经验，希望我们经常给他们以指示，并以派专家到波斯工作的方式给予帮助。他们首先需要的是有关苏维埃建设方面的专家和税收专家。请告诉我，是否可以期待从中央派来相应的专家和各种指导人员，或者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今天，6月6日，临时革命政府在对波斯人民的庄严宣言中宣布了自己的存在。我们立即就得到了这个宣言，现转呈你们。与此同时，米尔扎·库楚克同志还给列宁写了一份秘密的照会。拉什特的所有居民不分阶级以空前的热情欢迎米尔扎·库楚克。米尔扎·库楚克在群众集会上向成千上万群众宣布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结成同盟，并在暴风雨般的群众欢呼声中吻了我们的代表以作为这个同盟的标志。根据你们的指示，我解散了远征军。作为对米尔扎·库楚克同志的坚决请求作出的让步，区舰队第一登陆队和海军骑兵营作为志愿人员进驻拉什特市，他们作为波斯军役人员，由波斯革命政府发给薪金和提供给养。鉴于恩泽利的政治军事形势稳定，我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已撤离恩泽利回巴库。英国军队也在匆忙撤离。他们通过自己庞大的谍报网了解到米尔扎·库楚克的部队正在准备进攻拉什特之后，

未经战斗就放弃了拉什特。他们烧毁了无法从拉什特运走的被服装备和部分粮食。现在有消息说，英国军队正在加紧从卡兹文撤离，而且不是向德黑兰，而是向巴格达撤。印度部队[①] 坚决反对同布尔什维克打仗。逃到恩泽利我们这里和米尔扎·库楚克同志那里的印度逃兵总共有 20 人，我们特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给予了很多的关照。印度逃兵说，我们的第一次枪声就是印度兵开始杀掉英国军官的信号。英军司令部知道印度部队不可靠，所以在撤退时派出装甲车跟着印度部队。德黑兰出版的政府官方机关报苏古勃·戴乌勒《伊朗》报登满了欢迎与俄国苏维埃政府友好的文章。据该报消息，波斯国王在长时间的国外旅行后于 6 月 3 日回到德黑兰。波斯哥萨克师[②] 参谋长康德拉季耶夫大尉来找我，并以该师师长斯塔罗谢利斯基的名义声明，波斯哥萨克师的俄国指挥人员将服从俄国政府的命令。因为现在的俄国政府是苏维埃政府，他来我这里是自我介绍并想得到进一步的指示。我向他解释了当前形势，并建议师长留在那边，运用自己的影响保障临时革命政府顺利地和不流血地进入德黑兰。此外，我绝对禁止接收前志愿军[③] 军官到该师服役。康德拉季耶夫现在已带着上述情况回德黑兰。波斯哥萨克师共有 8000～9000 人，实际上是德黑兰手中掌握的惟一的现实力量。留在拉什特的 1500 名波斯哥萨克人由俄国军官布拉采利指挥，他们表示忠于米尔扎·库楚克同志。在我们逗留拉什特期间，不怎么可靠的宪兵企图于夜间逃出该市，但遭到阻止。除教官和志愿队外，我

① 英国占领军中的印度部队。

② 由沙皇俄国军方支持建立的波斯政府精锐部队。

③ 志愿军是国内战争时期活动于俄国南方的反苏维埃武装力量，最初由旧军官、士官生、哥萨克、大学生等志愿组成，后来则依靠进行动员来补充，其规模由 1918 年的 4000 人发展到 1919 年的 40000 人，1919 年底到 1920 年初被苏俄红军击溃。

们还将1个山炮连和1个通信营也转交米尔扎·库楚克支配。这两天，将从巴库派来装甲车、飞机并运来步枪和机枪。在支持米尔扎·库楚克的同时，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组建波斯共产党－阿达列特党的支部[①]。这项工作因缺少波斯籍工作人员而开展不力。同我们一起来恩泽利的有两位波斯共产党人，即杰瓦特·扎杰和阿加耶夫两位同志，是从巴库阶级斗争学校出来的。但由于他们不知分寸，一个被派往巴库，一个被留下，处于阿布科夫同志的监视下。阿达列特党并不是很有名望，就连米尔扎·库楚克这样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同志都不是该党的成员，更不要说全体居民了。米尔扎·库楚克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革命者，无疑值得信任。我认为，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应寄托在他的身上。

拉斯科尔尼科夫

1920年6月6日

① 1917年成立于巴库的伊朗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阿达列特”的波斯语意思是“正义”。1920年6月，在恩泽利举行的“阿达列特”党代表大会将该党改名为伊朗共产党。

№04192

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 年 6 月 22 日）

1920 年 6 月 22 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从来到这里的一些加里西亚共产党人通报的消息中产生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我们是否有可能将东加里西亚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纳入我们扩大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是在欧洲仅次于巴库的最重要的石油产地。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资本家在那里为拥有石油而相互斗争。如果我们强大到能够向这么远的地方扩展我们的实力，我们将向英国提出条件。如果相反的话，说得过分一点，我们只能使英国人狂怒，驱逐克拉辛，等等。这纯粹是个实力问题。一年前我们没有去那里，因为我们的后方有邓尼金。现在情况变了。但这要由熟悉我们全部力量的机关来作出决定。

按加里西亚共产党人的话说，东加里西亚已经根除了民族主义幻想，实现苏维埃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波兰人在后方的起义也会使得力量更加强大。但只有在我们决心以某种方式扩大我们在那里的势力范围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去促进这样的起义，促进加里西亚的苏维埃化。

加里西亚的共产党人断言，东加里西亚希望加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只是等待我们一声召唤。采取某种形式的怀疑态度在任何时候都是适当的。看来，立即以吞并加里西亚的口气说话是不谨慎的。不能保证，我们这样做不会疏远某些人士。最好还是走慢一

点。对于在加里西亚执行苏维埃政策，组织那里的起义，把加里西亚部队集中到加里西亚战线，以及为将来同乌克兰合并作准备来说，成立加里西亚革命委员会是适宜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拟由加里西亚共产党员担任。他们还要就这一计划的细节同拉科夫斯基同志讨论。但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决定我们能否把我们的行动范围扩大到这么远的地方①。

外交人民委员　格奥尔基·契切林

①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研究这一问题后，决定接受契切林提出的建议，即奉行保持加里西亚独立的谨慎政策。

№04194

契切林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0年6月28日）

1920年6月28日

俄共中央政治局

根据政治局决议，决定向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政府提供武器和黄金援助，同时任命埃利亚瓦同志担任驻土耳其大使。

根据中央的另一项决议，决定为阿富汗提供黄金和军事装备援助。对波斯，决定提供军事装备援助并派出教官（科扎诺夫和阿布科夫）。所有这些决议（以及其他决议）都表明，我们的东方政策确定：为了反对协约国，如果不是直接提供武装力量援助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要提供武器和金钱的援助。

在中央的这些决议的基础上，我们作了相应的声明和承诺，这些声明和承诺必须兑现。

我们向阿富汗许诺已经有半年多了，继续拖延兑现就意味着破坏我们在阿富汗的整个政策。必须立即给阿富汗发去已经答应给的军事装备（其清单当时就由政治局批准了），如果我们不想失去阿富汗、不想把它从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变成敌视我们的国家的话，就必须兑现上述承诺。

答应给土耳其的武器援助必须立即提供，因为答应之后又拖延将会使穆斯塔法·凯末尔政府把我们看成是说空话的人和骗子。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土耳其可能会被击败。此外，即便从我们的资源薄弱这点来看，这种援助的范围也并不是很大的，而它在实际上

和道义上有着巨大的意义。

但是，尽管政治局通过了决议，我们不能得到武器。

今天决定的政策，过一天就不执行自己的决定了。今天答应援助，明天又不给援助。这使我们名声扫地，破坏了我们的崇高威望和对东方的影响（我们对此深有感触）。

我们对东方工作中的矛盾在其他方面也经常遇到。

总参军事学院东方部为东方培训工作人员。我们请军事部门和中央委员会给我们23个人以便派往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印度和远东。我们为此事忙碌了三周之后，我们的23个人选差不多全部被派往西方面军，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懂得东方国家的语言，其中一半以上是穆斯林。当时，正好有一个培训班都是俄罗斯族总参人员，他们没有学过东方语言，但没有把他们派往西方战线。这是对抗我们东方政策的独特形式。我们请求中央委员会从总参谋部工作人员中调一些懂得土耳其语、波斯语和印度语的人供我们支配。否则我们无法派代表团去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等国。而这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意味着波斯共和国的失败、土耳其革命斗争的可能失败以及放弃我们在印度的工作。

我们提请注意，我们所请求的与准备为西方战线所做的比较，只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这种微不足道的事在东方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巨大成果。我们认为，我们在东方的成就在总体上是与在西方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是具有某些意义的，为此应该投入一些军事装备和极少量的有生力量。

外交人民委员　格·契切林

№04195

托洛茨基致斯大林、列宁、加米涅夫的电报

（1920 年 7 月 3 日）

用直通线路

斯大林收，抄送列宁、抄送总司令

下流胚劳合·乔治又谈到了克里米亚弗兰格尔巢穴的不可侵犯性。非常明显，摆脱当前状态的惟一办法是实施毁灭性的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停顿地紧追弗兰格尔，突入克里米亚，并以猛烈的炮火向克里米亚沿岸地区扩张。在英国人试图轰炸城市的情况下，必须击沉英国船只，哪怕一艘也好。全部任务在于准备和保障我军不间断地猛攻到塞瓦斯托波尔。现在，波兰战线情况很好，我们能够在不削弱波兰战线的情况下，及时集中注意力和兵力实施对付弗兰格尔的战役。请告知您的想法。

1920 年 7 月 3 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04196

契切林致克列斯京斯基的信

（1920年7月5日）

克列斯京斯基同志　备份

1920年7月5日

尊敬的同志

将我驻波斯代表机构问题紧急提交党的中央委员会是极端必要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指出，领导波斯苏维埃运动的是绝对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生活经验的人们。他们那里迫切需要的是有政治经验、能够给他们以必要指示的同志。米尔扎·库楚克本人是习惯于游击生活的人，他的世界观不够开阔，但他非常希望并且准备接受比较有经验的同志——特别是代表苏维埃俄罗斯的同志——的建议。他非常准确地执行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对他说的一切。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离开后，在波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起这种作用。那里甚至没有真正的政治专家。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建议向米尔扎·库楚克派去斯大林同志曾在一些场合热情推荐的穆季瓦尼[1] 同志作为我们的代表。姆季瓦尼同志不具备世界政治视野，他是一位高加索的活动家，但他对近东非常了解，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认为，

① 穆季瓦尼，波利卡尔普·古尔格诺维奇（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战时期先后任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部主任，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委员。

他能够出色地发挥上述作用。我们建议派勃罗伊多[1]同志当他的专家或顾问。布罗依多的解释表明，我们对他的指责应该是针对那个土耳其委员会本身的。他的个人素质还不到可以授予他不受监督的重要责任的程度，但如果姆季瓦尼同志将在波斯的话，在他的手下，勃罗伊多同志出色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得到最有利的发挥。

此外，在我国境内应该有一个专门人员主管向波斯苏维埃运动提供非官方援助的工作。我们的部队和舰队正式撤离波斯后，我们不可能对波斯苏维埃运动提供任何官方援助。但可以派遣志愿人员以私人身份去那里，以私人贸易方式运去武器，而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在对待波斯苏维埃运动方面也是自由的。应该确定一位能够采取上述非官方行动和能够给阿塞拜疆志愿人员下达指示的人物。我们在里海的海军部队首长不可能是这样的人选。共和国海军司令已向总司令写了报告，要在给我们驻里海海军部队首长的指示中排除相关的内容。这样，为执行上述任务，应该有一位特别的人选，里海舰队将不隶属于他，但既然涉及到对波斯的政策问题，那么他仍应能够给里海舰队下达指示。共和国海军司令经与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协商，推荐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担任这个角色。确实，目前在高加索再没有更加合适的人选了。上述各点都必须立即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决定。[2]

致共产主义敬礼

契切林

---

① 勃罗伊多，格里戈里·伊萨科维奇（1885～1956），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前是孟什维克，1919年任东方战线第一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土耳其斯坦外事局的领导工作。

② 不久，库楚克汗直接向列宁请求派遣穆季瓦尼到他那里担任总政治委员，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同意了这一请求。契切林关于由奥尔忠尼启则负责援助吉兰共和国事务的建议也被中央接受。

№04197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13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列宁

波兰军队正在彻底崩溃，波军失去了通信联络和指挥，波军的命令经常到不了地方，而是落在我们的手里。一句话，波军一片混乱，短时间内无法很快恢复。看来，寇松非常了解这一情况，他现在正竭力以建议媾和的形式挽救波兰人①。这种情况也可以用来解释有关弗兰格尔的建议。因为随着波兰的失败，弗兰格尔将失去其意义，英国人也会失去克里米亚。您说得完全正确，他们是想从我们手中夺走胜利。我建议：第一，在关于波兰的复照中不要给予肯定的回答，总的意思要强调俄罗斯是爱好和平的，并且说明，如果波兰真的想要和平，它可以直接向俄罗斯提出。这样可以赢得时间。第二，关于弗兰格尔，首先要强调，寇松在弗兰格尔和苏维埃政府之间的调停，如果已经进行，也不能证明是有效的，其次要指出，克里米亚还没有脱离俄罗斯，**而弗兰格尔是俄国将军，俄罗斯自己能够同他达成这样或那样的解决办法，就如同俄罗斯独立处理**

① 英国外交大臣冠松于1920年7月11日向苏维埃政府发出照会，要求红军停止向由协约国最高委员会1919年12月确定的波兰东部边界线那一侧的进攻。波兰由于战场上的形势对其不利而承认了这条边界线。这条边界线随后被称为“寇松线”。

其一般内部事务那样[①]，俄罗斯将独立解决所有内部问题，其中包括克里米亚问题。我想，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像现在——在波兰失败的时刻——这样软弱，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正因如此，我们表现得越强硬，对俄罗斯和国际革命来说就越好。请告知政治局的决定。[②]

① 划线部分是斯大林用笔从电报稿中划掉的内容。

② 1920 年 7 月 16 日，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拒绝英国在俄罗斯联邦和波兰之间进行调停的建议，红军部队继续向波兰境内进攻。次日，向寇松发出了相应的照会。

№04198

温什里希特[①] 致列宁的信

（1920 年 7 月 15 日）

1920 年 7 月 15 日

列宁同志（亲启）

答复您的来信：1）我们以最庄严的形式向波兰工人和农民声明，我们不侵犯波兰种族边界的完整性，准备承认这条边界，如果这样做符合劳动群众的愿望的话，甚至可以承认协约国确定的更靠东一些的边界线。2）只要我们的军事资源允许，我们要把战争继续到波兰白军被彻底粉碎和资产阶级政府下台。3）红军继续进攻到协约国指定的边界。如果在此之前我们不能同协约国达成保证较长喘息时间的协议，或者波兰劳动群众的起义没有发生，我们继续向波兰境内进攻，武装波兰工人和雇农，建立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庄严宣布消灭地主所有制和实现工厂国有化。我们在波兰的继续存在取决于波兰工人和农民的意愿。4）我们认为，随着我们的军队向波兰边界推进，近期内波兰的苏维埃变革是完全可能的，波兰西部一些省（波兹南）的抵抗可能因德国的变革[②] 而被摧毁。波兰起义的时间很难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波兰境内的

① 温什里希特当时任西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立陶宛－白俄罗斯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② 这里显然是期待发生新的德国革命。随着红军在俄波战争中的进展，俄共（布）领导层又燃起了对世界革命的希望，认为红军进入波兰对欧洲革命的重新兴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将首先激起波兰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影响到其他国家。

行动与波兰共产党的协调一致。

致共产主义敬礼

温什里布特

完全同意回信。

多列茨基

C. 布德凯维奇

B.E. 布德凯维奇

№04200

斯大林致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年7月22日）

哈尔科夫，7月22日

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伏罗希洛夫

第一，西方战线的推进正在顺利地进行，波军第一道防线——涅曼—沙拉一线——已在斯洛尼姆[①] 地区被突破，如果波军无法将我们阻止在第二道防线——布格—那雷夫一线，那么波军肯定要退至第三道防线——维斯瓦—桑河。现在，西方战线部队比西南战线部队距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近一些。根据这一情况，您的集团军可以放弃布列斯特方向而转向偏南一点。

第二，您应该是知道的，我们拒绝英国的调停——它曾建议我们同波兰停战，同时表示同意进行谈判，如果波兰不经中间人自己向俄国提出的话。您知道，如果波兰自己向我们提出停战，我们就不能拒绝。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抓紧使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

第三，我们正在为您准备增援部队，授权西南战线在顿河、库班、北高加索动员志愿人员，由该战线首先设法加强您的集团军。

斯大林

① 白俄罗斯城市。

№04201

斯大林致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的电报

（1920 年 7 月 23 日）

亲自译出，哈尔科夫，7 月 23 日

第 1 骑兵集团军，伏罗希洛夫、布琼尼

收到了波兰关于不经英国调停进行停战谈判的建议，要求在 7 月 30 日以前给予答复。你们当然明白，我们不得不同意。因此，要求你们以最快速度向利沃夫方向进攻，必须尽力在 30 日以前最大限度地夺取能够夺取的地区。我们关于利沃夫的最新命令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党中央请你们再加一把劲，可能是最后的努力，然后休息。

斯大林

№04202

斯大林致列宁的电报

（1920年7月24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只送列宁

哈尔科夫，7月24日

第一，布琼尼战线的情况很好。看来，敌人的目的是疲惫布琼尼部队，他们化整为零，每次出现新的部队，都像苍蝇一样缠扰布琼尼。这种情况使我们的部队推进有点慢。昨天我们命令布琼尼突破防线，于7月30日前占领利沃夫，这次战役可能获得成功。第二，在克里米亚战线，我们正在准备进攻，这次进攻开始的时间大概不会早于8月5～10日。如果敌人不能抢在我们之前的话，这次战役肯定会取得胜利。我们正在采取保证措施。第三，作为对您371号便函的回答，谈谈我的意见。现在，我们有共产国际、被战胜的波兰以及多少还说得过去的红军，而另一方面，协约国得到喘息的机会，这有利于波兰改组和重新武装其军队、组建骑兵，然后再进行突击。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前景下，不去鼓励意大利的革命就太不应该了。应该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同协约国直接斗争的地带，因而转弯抹角的政策已经失去了其意义，现在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执行进攻政策（不要同莽撞的政策混为一谈），如果我们想在外交上保持我们不久前所赢得的那种主动权的话。因此，应该把在意大利以及像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应该予以粉碎）这样的还不怎么强的国家组织起义的问题提到共产国际的议事日程上。德国

有 30 万流氓无产者，如果让他们实际上存在于自然状态的话，他们当然不会去改变、也改变不了现状。简单一点说，应该利用现在帝国主义还来不及修理其散了架的破战车的机会——它还是能够在某个时期来修理这辆车的，它现在还没有转入坚决的进攻——起锚，开航。第四，电话交谈不行，因为有人窃听、干扰。有关前线的状况我将每天向您简要通报。

斯大林

№04205

斯大林致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的电报

（1920年7月29日）

第1骑兵集团军

布琼尼、伏罗希洛夫

我们成功地争取到，停战条件将由我们在8月4日转交给波兰人，而不是7月30日。就是说，你们还掌握有4天时间。此外，在接到战线正式命令之前，你们可以痛打波兰人而别管期限。我完全正式地向你们通报所有这些情况。就这样，你们攻打利沃夫吧，现在你们有时间。

斯大林

№04208

俄共（布）中央高加索局致列宁、托洛茨基、克列斯京斯基、契切林的电报

（1920年8月3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0年8月3日

列宁、托洛茨基、克列斯京斯基、契切林

中央决定，在实现亚美尼亚苏维化的同时，必须通过亚美尼亚与土耳其革命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在得知这一决定后，高加索局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与土耳其建立联系的途径不应该是通过亚美尼亚，而应该是通过格鲁吉亚。就以下诸点考虑，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比较理想：

1）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化将使捷列克和库班的反革命分子丧失基地，断绝弗兰格尔从格鲁吉亚得到的帮助；2）与土耳其的联系可通过黑海沿岸近海航线——它对敌方船只是不开放的——来建立；3）被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亚美尼亚也失去了英国和美国的任何援助，它应该投降，把政权交给亚美尼亚共产党人，这本身也为土耳其开辟了第二条道路；4）根据战线司令员的意见，根据军事战略构想，格鲁吉亚比亚美尼亚更容易被征服。如果夺取亚美尼亚，部队铺得太开，侧翼又有与我们敌对的格鲁吉亚，不能排除来自这一方面打击的可能性。

高加索局

№04213

卡拉汉[①]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0年9月9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波斯最近的事态[②]：吉兰的“苏维埃”政府垮台，撤离拉什特，面临被波斯－英国武装力量赶出波斯的威胁。波斯人的情绪是冷漠和敌对的。这些情况提出了有关我们近期对波斯政策的一般性问题。吉兰的局势可以这样描述：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和不当，吉兰省（恩泽利和拉什特）的革命事业受到极大的名誉损害。革命政权没有能够巩固民众（首先是农民）对它的好感；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作为外国人）参加波斯革命，就好像在被他们占领的国家里那样逞威作福，很快就激起全体居民反对我们；对英国人的敌视态度有所削弱，商业界甚至转向了英国人。

现在失去波斯并将其交给英国人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无论在国际关系方面（是我们软弱的标志），还是特别对于英国来说，都是这样。这也意味着，在东方我们是并不可怕的，因为我们什么事也干不成，遇到一个小小的失利就会坚决退却。

从波斯得到的一些报告，特别是埃利亚瓦同志的报告表明，我

① 卡拉汉，列夫·米哈伊洛维奇（1889～1937），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成员兼秘书、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作为苏俄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布列斯特和谈，1918～1920年间为副外交人民委员。

② 1920年7月吉兰共和国内部政局变动，库楚克汗退出政府并离开拉什特。在苏俄顾问影响下，新成立的埃斯哈诺雷汗政府推行左倾政策，如征用小土地所有者、商人、手工业者的财产，进行反古兰经和反宗教界的宣传等等。

们波斯政策的可能路线是：

1）以 8000～10000 人的远征军来加强在恩泽利的兵力，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完全占领德黑兰，推翻国王政府，也足够用于下一步的斗争和完全把英国赶出波斯。在德黑兰组建非共产主义的，但属苏维埃式的政府，吸收民族－民主人士参加。这个政府的政策寄希望于农民，同时也（暂时）不触及商业资本的利益。为实现这一计划，埃利亚瓦同志作好了准备，并拥有必需的大量工作人员。

2）在军事上保住恩泽利的情况下，我们将离开波斯。我们将同德黑兰的国王政府建立关系（我们一直没有中断同这个政府的关系，最近几天还有信函往来），向德黑兰派出我们的外交代表机构，并与国王政府签订目的在于宣传鼓动的友好条约（放弃沙皇时代的条约、合同、特权，归还被掠夺的土地和财产）。

国王政府的大使已来我国，现在他正在来莫斯科的途中，在土耳其斯坦。看来，他的任务是以受惊的国王政府的名义处理好与我们的友好关系。我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一方面组织和办理对民族－民主主义反英组织的物质援助，另一方面以同样的方式帮助共产党人，作好预期是相当长时期内的工作。

中央委员会应该作出决定，两条道路中应该走哪一条。政治上现在需要的是第一条路线，因为它可以立即奏效，给英国以打击。在英国政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一打击可对劳合·乔治和寇松的情绪产生最为有益的影响，并将证明，我们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和直接的危险，我们把自己在东方的侵略直接同英国对我们的政策联系起来：以打击回答打击。

问题的解决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军事资源。此外不应孤立地看待我们进入波斯，在一定程度上这将是波兰－弗兰格尔战线的继续，如果我们从那里能够得到什么的话，那是因为在波斯的成功将确定英国对波兰和自己的盟国施加压力的程度，并因此而改善我们在波

兰战线上的处境。

在中央委员会赞同第一条道路的情况下，必须建立一个由共产国际、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共中央的代表参加的委员会，以便制定行动计划，拟订给埃利亚瓦的相应的指示[①]。

列·卡拉汉

① 1920年9月20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所建议的第二条路线，即同波斯国王政府谈判，确保控制恩泽利以对付英国人。（《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3期，第164页。）

№04228

卡拉汉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21年1月26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1920年8月，我们曾派知名的青年土耳其党活动家泽马尔－巴夏（原土耳其政府部长和土耳其驻叙利亚军队司令）去阿富汗，此行目的是侦察，此外还有争取阿富汗埃米尔的信任，从他那里获得重要军事职务的任务。①

现在，阿富汗埃米尔授权泽马尔－巴夏改组和指挥位于印度边境的西部军队。泽马尔给我写信说，在向阿富汗政府提供军事装备的条件下，改组军队是可能的。所以，我们有可能派一批红军军事专家去泽马尔的军队占据重要的军事职位。

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这样做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我们的同志可渗透到阿富汗军队中去，另一方面，在英属印度当面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并处于我们一定影响下的军队。建议作出决定，向阿富汗提供装备援助，并为阿富汗军队派出我们的军事专家组。

现在通报关于泽马尔－巴夏的鉴定。泽马尔－巴夏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未沾染上泛伊斯兰主义，是强烈的“复仇者”，英国的仇敌。他在君士坦丁堡被英国人缺席判处死刑。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对这些情况进行了验证。他属于这样一类英

---

① 根据1919年的拉瓦尔品第条约，英国被迫提前承认阿富汗独立。1920年3月，阿富汗政府建议英国确认两国平等关系，遭到英国拒绝。在这一背景下，苏俄加强了对阿富汗的工作。

国人[①]，他们准备为反对凯末尔和任何与英国和好的民族主义政府而斗争[②]。如果上述建议被采纳的话，必须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近期内就决定的执行问题进行协商。

副外交人民委员　列·卡拉汉

1月26日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应为土耳其人。

② 1920年底～1921年初，凯末尔政府多次试图与英国妥协，就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这一态度引起了苏俄的强烈反应。

【专题说明】

工会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矛盾

（1920 年 11 月）

这两份档案反映的是工会中共产党党团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对研究苏维埃国家早期政治体制的矛盾是有帮助的。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赵洪翻译）

№05058

俄共党团关于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李可夫的报告的决议

（1920年11月4日）

听了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济政策和活动的报告，俄罗斯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认为：

1．迄今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活动由于个别进入其组成的机关（总管理局、中心以及其他等等）极度孤立而且又没有协调它们的工作而导致瘫痪。在解决一系列问题时的高度集中、对地方组织的创举不信任和不容许、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个别部门缺乏来自其主席团的领导以及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与它们地方组织之间薄弱的联系是实现统一的经济计划极为严重的实际障碍。

2．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不力的主要原因是它脱离工会组织，而且可以开始清楚地看到国民经济委员会整整一系列领导人和组织故意不理会工会的倾向。

为了克服这方面的问题，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一方面加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总管理局以及中心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还应加强与相应的工会、联合会等机构之间的联系。

经济机构经常性的报告制度，把一些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提交工会组织讨论对恢复工人群众和经济机关之间的信任是绝对必要的。

3．经济机构和工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应当表现在建立管理工业机构的事情上，工人们对与自己阶级格格不入的东西不信任只有在

工会的帮助下仔细地挑选必要的领导人和这些领导人要向工会机关组织，特别要向广大工人群众经常汇报的条件下才可能消除。在挑选人员方面产生的重大误解应当在工会联合会之间协调。

4. 工会必须积极参加经济计划的制订和个别工业部门生产规划的拟订，因为没有集体的工作和没有劳动群众的热情，任何组织都无力制订经济计划。每个工会和工会间联合会应当检查中央制订的计划与他们服务的企业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关于生产计划的制订应当通告企业的工人们。

5. 为避免某些专门组建的机关在组织劳动和调派劳动力方面的并行重复现象，逐渐将它们的职能转给工会组织应当认为是合理的。必须把加强自己在组织劳动领域活动的任务交给生产工会为总管理局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职能转入他们手中作实际上的准备。

6. 为了加强自己和经济机构的联系并给它们选派领导，工会应当建立专门机构选派干部参加管理工业的事务，这个机构还有一个目的在于指导经济组织中工会代表的任务。因此，在工会机构中建立实现上述目的的经济部门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

与此同时代表大会认为，解决上述任务要求生产工会特别的努力，加强和形成它们的机构，正确贯彻中央和其他高级机关的指示，详细研究地方相应工会机构的需要。

№05059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20年11月10日）

根据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在工会的直接参与下组成。现在正在工作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是由国民经济委员会根据托姆斯基同志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名义支持的名单选举出来的。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根据党关于经济机构与工会相互关系的决议来组织安排自己的工作。工会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共产党议员团就李可夫同志的报告作出了一个决议，决议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脱离工会组织，似乎，已经可以开始清楚地看到国民经济委员会整整一系列领导人和组织故意不理会工会的倾向。在共产党议员团作出这样一个决议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必须申明，目前的主席团组成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了，因此请求中央委员会解除主席团的职务。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尤其必须走的一步是，因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除了一位同志，都赞成这一决议，而在讨论中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方法都完全明确地持否定的态度。

А.И.李可夫、А.洛莫夫、В.诺京、В.米柳京、В.楚巴尔、波格丹诺夫、瑟罗莫洛托夫、埃伊斯蒙特、谢列达。

【专题说明】

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

（1922年4月至1934年3月）

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1901～1932）出生于巴库，其父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是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人革命家。阿利卢耶夫一家后来迁居彼得堡。1919年，阿利卢耶娃与斯大林结婚。她曾先后在列宁的秘书处和《真理报》所属的《革命与文化》杂志编辑部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工业学院学习。1932年11月9日自杀身亡。本专题文件收集了斯大林给母亲的2封信和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在1929年至1931年期间的29封来往信件。斯大林给母亲的信都涉及阿利卢耶娃。而斯大林在索契休假时与阿利耶娃的通信内容除了生活、工作、孩子之外，还涉及一些政治问题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付谦、刘明翻译）

№07642

斯大林给叶·格·朱加施维里[1] 的信

（1922年4月16日）

我的妈妈！

愿您健康，不要把忧愁放在心上。

要知道有人说："活着的时候，我要让自己的紫罗兰花高兴，如果我死了，墓地的小虫子们将因此而快活。"

这位妇女就是我的妻子。我尽力使她不受委屈。

你的索索

1922年4月16日

① 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朱加施维里（1860～1937），斯大林的母亲，出生在格鲁吉亚的哥里，20年代开始在梯弗利斯居住。

№07672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8月28日）

亲爱的约瑟夫：

你的身体怎样？是否完全恢复了？在索契是否感觉更好一些？我走以后一直有点担心。一定给我写信。我回来的路上一切顺利，正好预期到达。星期一即9月2日，我们进行数学笔试，9月4日是自然地理，9月6日是俄语①。应该向你承认，我有点紧张。考完试后一直到9月16日我都非常空闲。现在是这么说，以后有什么变化还不知道。总之，暂时我还不能定什么计划，因为目前一切都“似乎”是这样。等一切都知道得很准确时，我再给你写信。你也给我出个主意，怎样利用这段时间。莫斯科很冷，天气变化无常——冷空气加雨。暂时我还谁也没有见到，哪儿也没去。听说高尔基好像去了索契，大概能到你那儿，很遗憾我不在那里——非常喜欢听他讲话。事情一结束我就给你写信告诉你结果。我也恳求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热烈、紧紧地吻你，就像你吻别我一样。

你的娜嘉

1929年8月28日

另：瓦夏8月28日开学

① 指的是工业学院的入学考试。1929年7～8月，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在索契度假。8月末，阿利卢耶娃为参加工业学院入学考试而先回到莫斯科。

№07673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8月29日）

塔奇卡！

8月28日按下列地址给你寄了一封信："克里姆林宫，娜·谢·阿利卢耶娃收"。寄的是航空件。是否收到？一路是否顺利，你的工业学院的事情进展如何，有什么新闻，——写信告之。

我已经进行两次浴疗了。我想做十次。天气很好。我现在刚刚开始感觉到纳尔奇克与索契之间的巨大差异，索契更有利。

我想会恢复得很好。

给我写写孩子们的事儿。

吻你。

你的约瑟夫

1929年8月29日

№07674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 年 9 月 1 日）

你好，塔奇卡！

你的来信收到了。我的两封信你是否已收到？原来，在纳尔奇克我的肺有点发炎了。尽管现在感觉比在纳尔奇克好多了，但还是觉得呼吸困难，总咳嗽。真是见鬼了……

如果你能有 6～7 天空闲时间，就直接到索契来。考试准备得怎样了？

吻我的塔奇卡。

约·斯大林

1929 年 9 月 1 日

№07675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9月2日)

你好，约瑟夫！

你8月29日的信已经收到，另外一封8月28日的大概还在路上。你在索契感觉更好，非常为你高兴。当然，如果你自己能更注意一些，在那里你会恢复的。你问我工业学院的事情进展得怎样了。现在我可以说：非常好。因为今天我们已进行了数学笔试，我考得很成功，但还是有点不顺利：早上应该9点之前到工业学院，我当然是8点半就出发了，可是电车坏了，我又等公共汽车，但没有车。为了不迟到，我只好乘出租车，可走了一百俄丈左右就停下了，出租车也出了毛病，真是令我哭笑不得。最后终于到了工业学院，但我还是等了两个小时才开始考试。你问有什么新闻？说实话我什么也不知道，直到现在我哪儿也没去，只是星期天去了一次祖巴洛沃，那儿一切都正常。林子里的小道已开辟出来了，珠鸡都活着。由于缺雨，蘑菇很少，因此也没给你采多少。斯维特兰娜一见到我就问，我爸爸怎么没回来。

昨天米高扬[①]来电话询问你的身体情况和我的事情进展如何，并说他将到你那儿去。顺便应该和你说一下，莫斯科到处都在排队购买牛奶和肉，这种情景让人很不愉快。主要的是，这本来可以通过正确的组织方式来改善的。

①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1895～1978），时任苏联国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开学的具体日期还不清楚，因此关于这一点也没什么好写的。明天是星期二，同例行邮件一起将这封信给你寄去。我本想今天的邮班你可能给我寄点什么，非常盼望。但很遗憾，火车到达和出发的时间总是赶不到一块儿。今天是9月2日，伏罗希洛夫[①]从纳尔奇克返回来了，打来了电话并说他在巴克桑度过假期的最后一段时间，他非常满意；他离开的那天，谢尔戈[②]和鲁祖塔克[③]正好也到了巴克桑。谢尔戈是悄悄去那儿的并打算在那里呆几天。总之，我们不要再去纳尔奇克了，而直接到巴克桑。对了，他还去了小卡巴尔达，对那儿的印象非常不好，说那里像撒哈拉大沙漠，热得人们连打猎的兴趣都没了。我光顾唠叨了，忘了你不喜欢长信。给我写点什么，也好使我不这么寂寞。收到你的信我特别高兴。等我的事情一有结果，立即给你写信。现在让我热烈地吻你。再见。

你的娜嘉

1929年9月2日于克里姆林宫

你瞧，这次考试费佳[④]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他的头脑真是绝顶的聪明，他还像从前那样，给我讲解得特别好，我们一起复习了三天，差不多都没动地方。我很同情他。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

① 伏罗希洛夫·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1881～1969），时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② 谢尔戈，即奥尔忠尼启则，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1886～1937），时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③ 鲁祖塔克，扬·厄内斯托维奇（1887～1938），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交通人民委员。

④ 费佳，即阿利卢耶娃的患有精神病的兄弟费多尔。

№07676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9月16日）

塔奇卡！

你的事情进展如何？旅途是否顺利？

也许我的第一封信（丢失的那封）被你母亲在克里姆林宫收到了。如果收到别人的信并拆开看了，那真是不懂事。

我已经恢复一些了。

吻你。

你的约瑟夫

1929年9月16日

№07677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9月16日至22日之间）

你好，约瑟夫！

你的短信已收到了。得知你的事情很顺利，我很高兴。我这里目前一切都很好，除了今天的事令我非常不愉快以外。现在让我来给你说说这件事。今天我去《真理报》下面的单位办理注销证，自然是科瓦廖夫[①]向我讲了自己的不愉快的事。话题是关于列宁格勒事件的[②]。你当然是知道这件事的，就是关于《真理报》事先没有同中央商量就刊登了这份材料，尽管这份材料波波夫[③]和雅罗斯拉夫斯基[④]都看过了，而且他们谁也不认为应该向《真理报》的党支部指明必须同中央（也就是同莫洛托夫[⑤]）商量。而现在麻烦事出来了，所有的罪责都落到了科瓦廖夫身上，他本人同编辑委员会商量了这个问题。前几天他们都被叫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到场的还有莫洛托夫同志、克鲁明[⑥]（他不喜欢科瓦廖夫，因为他知

① 科瓦廖夫，时任《真理报》党支部书记，编委会成员和党的生活部主任。

② 1929年9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组要求开展自我批评、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文章，其中提到了列宁格勒一些因受到批判而自杀的党员的名字。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央领导机关的关注。

③ 波波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90/1891～1938），时任《真理报》编委。

④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梅里扬·米哈伊洛维奇（1878～1943），时任《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⑤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1890～1986），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⑥ 克鲁明，加拉尔德·伊凡诺维奇（1894～1943），时任《真理报》编辑。

道科瓦廖夫在《真理报》的威信很高，而他自己却没有威信)、雅罗斯拉夫斯基和科瓦廖夫同志。谢尔戈主持了会议。科瓦廖夫向我讲述了会议的进行情况。克鲁明编造说，仿佛科瓦廖夫没有把这份材料给编辑委员会看等等；莫洛托夫说，《真理报》的党支部不执行中央的路线，在自我批评方面总是偏离党的路线。科瓦廖夫发言解释这件事情，但是谢尔戈没有让他把话说完，他像往常一样用拳头击桌子并叫喊说，《真理报》的科瓦廖夫分子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监察委员会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和这种情绪。科瓦廖夫对我说，总之，从对他的解释的这种答复中他明白了，这是克鲁明捣的鬼。无论是谢尔戈，还是莫洛托夫绝对都不知道，按机构的原则应该由谁来领导《真理报》的这项工作，自然也不清楚克鲁明将一切都归功于自己。除此，科瓦廖夫还对我说，他和波波夫合作得很好。而与波波夫相反，克鲁明的私欲非常强烈，正是这一点导致其不满的情绪。在编辑委员会会议上克利尼茨基[①] 宣称，科瓦廖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等等。总之，科瓦廖夫是犯了错误，这样的错误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波夫都犯了，但并不等于说，可以使用这种口气和说法。你别怪我，我确实很同情科瓦廖夫，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而编辑委员会却根据克鲁明的建议突然免去他的党的生活部主任职务，并认为他是不坚定的共产党员。这简直是太荒唐了。而一般来说只有把他派到这里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门才能解除他的职务，而不是克鲁明。很可惜你不在莫斯科。我私下劝他去找莫洛托夫并坚持原则性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认为需要免除他的职务，也不能用“党性不坚定”、科瓦廖夫事件、季诺维也夫分子等等作为理由。跟这样的同志不应该采用这种谈话方式。总之他现

① 克里尼茨基，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1894～1937），时任工农检查副人民委员。

在也认为，他确实应该离开，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进行工作的。

总之，我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切是这么的不愉快。他的样子很沮丧。是的，在谢尔戈的委员会里，克鲁明扬言：他没有组织能力，没有任何威信等等。这纯粹是胡扯。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干预这一类事情，但我觉得，对于这样明显不合理的事你应该管管。

我一切都好。已开始学习了。出乎意料的是在第一个学年就有政治经济学，这是所有学科中最令我担心的学科，但也没什么需要特别费力的。是的，在工业学院还有一个阿利卢耶夫，已经弄清楚了是我的一个西伯利亚亲戚。

孩子们身体都很好。关于信的事你错怪我妈妈了。事情是这样的：信一直未收到是因为他们寄了挂号信，写的名字是奥·叶·阿（利卢耶娃）收，把我的名字弄混了，而在莫斯科甚至没有奥·叶，在梯弗利斯也没有过。这就是邮局所作的官僚主义的答复，而信还是没有。我已看过她的住处收到的所有信件。非常非常可惜，信丢了，而你甚至没有对我说信里写了什么。别生气，我又写了这么多，可是这样的好同志好工作人员真让人气恼。

再见，热烈地、紧紧地吻你。给我回信。

还有，真理报的这一切问题政治局将于 9 月 26 日（星期四）予以解决。

约瑟夫，如果可以请给我寄 50 卢布来，我们工业学院 9 月 15 日才发工资，而我现在一个戈比也没有了。如果你能寄钱来就好了。

娜　嘉

1929 年 9 月 16 日至 22 日之间

№07678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9月23日）

塔奇卡！

你的关于科瓦廖夫一事的来信已收到了。对这件事我了解得很少，但我想你是对的。如果科瓦廖夫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么编委会，也就是事件的当事方，就更有错误了。看来他们是想让科瓦廖夫当“替罪羊”。如果还不晚的话，我将做能做的一切①。

我这里的天气总是变化不定。

紧紧地吻我的塔奇卡，非常热烈地。

你的约瑟夫

1929年9月23日

---

① 斯大林在收到阿利卢耶娃信的当天晚上就给莫洛托夫发电报，建议把科瓦廖夫的事情放一放，并认为让科瓦廖夫当替罪羊是不对的。此后，他又就《真理报》9月1日发表文章的事同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交换了电报和信件，除了指示加强中央对报纸的监督外，还指出把责任推到科瓦廖夫身上的做法是“没有意义的、不正确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改正错误的方法”。

№07679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年9月25日）

塔奇卡！

忘了给你寄钱了。不等例行的信使了，让离开这里的同志把钱顺便给你带去（120卢布）。

吻你。

你的约瑟夫

1929年9月25日

№07680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9月27日）

亲爱的约瑟夫！

非常高兴，在科瓦廖夫这件事上你对我表示的信任。如果不能用什么方法弥补这个错误将很遗憾。你在最近给我的两封信中都没说你的身体情况，以及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在我非常非常寂寞，你恢复得怎样了，快点回来吧，一定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身体情况。我目前一切还顺利，学习也很认真。暂时还不累，但我还是11点钟就上床了。冬天大概要难熬一些。可以说，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很好，大家相处很和睦。学习成绩按下列方式确定：富农，中农，贫农。大家每天都说笑、争吵。一句话，我被列入了右派。总之，快点回来。只有我们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孩子们都很健康。很可惜，最近天气令你不快。莫斯科比较晴朗，但是很冷。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的身体怎样。吻你，热烈地，紧紧地。

快点回来。

你的娜嘉

1929年9月27日

№07681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9 年 9 月 30 日）

塔奇卡！

信已收到。钱是否已转交给你？我们这儿的天气已经变好了。我打算一星期后回去。

你的约瑟夫 热烈地吻你

1929 年 9 月 30 日

№07682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29年10月1日）

亲爱的约瑟夫，你好！

信和钱都收到了。谢谢。大概现在你很快——也就是在最近两天就回来了，只是很遗憾，你马上又要有一大堆的事情，这一点是很显然的。把军大衣给你寄去，因为你离开南方后很容易感冒。星期日（9月29日）有邮班，我等你的信。我这儿目前一切都好。

一切情况等你回来后再说。

最近谢尔戈和伏罗希洛夫来过，除此而外再没有其他人来了。谢尔戈说，已经给你写信讲述了一切情况，并说，大家都在等你回来。好了，快点回来吧，尽管我也愿意让你再休息休息，但是反正时间再长一点也不会有多大作用了。

热烈地吻你。给我写信，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回来，否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来接你。吻你。

你的娜嘉

1929年10月1日

№07683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年6月21日）

塔奇卡！

给我写信，随便写点儿什么。一定写信并寄外交人民委员会托夫斯图赫收（转中央）[①]。一路是否顺利，有什么见闻，是否去了医生那里，医生对你的身体情况有什么说法等等——写信告诉我。

代表大会将在26日召开[②]。我们这里一切事情进展顺利。

我非常孤独，塔奇卡，一个人在家里，仿佛与世隔绝。因忙于工作，没能到郊外去。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明后天想去郊外看看孩子们。

好了，再见。别耽搁太久，快点儿回来。

吻你

你的约瑟夫

1930年6月21日

---

① 1930年6月到8月，阿利卢耶娃去了卡尔斯巴德，后来又到了柏林她的哥哥巴维尔处。斯大林在信中请她通过外交邮件方式寄信，收信人托夫斯图赫时任联共（布）中央机要局局长。

② 指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

№07684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年7月2日）

塔奇卡！

三封信都收到了，因为工作特别忙没能立即回信。现在我终于空闲下来了。代表大会将于10～12日结束。我等你，别误了归期。如果身体状况需要，可稍微延长几天。

我有时也去郊外。孩子们身体都很好。我不太喜欢那位女家庭教师。她总是在别墅的四周走来走去，并让瓦西卡和托米克[①] 从早到晚玩耍。我毫不怀疑，瓦西卡和她在一起什么也学不到。难怪瓦西卡跟她学习德语成绩总是跟不上。真是个奇怪的女人。

这段时间我有点疲劳，着实瘦了很多。我想休息几天，然后再恢复正常的工作。

好了，再见。

吻你。

你的约瑟夫

1930年7月2日

---

① 托米克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著名活动家阿尔乔姆（费多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盖耶夫，1883～1921）的儿子。阿尔乔姆于1921年因公殉职。

№07685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 年 9 月 2 日）

塔奇卡！

旅途是否顺利？事情进展如何？有什么好消息？写信告诉我一切，我的小塔奇卡。

我的健康状况好些了。

你的约瑟夫 热烈地吻你

1930 年 9 月 2 日

№07686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年9月5日）

约瑟夫，你好！

给你寄去你要找的书，很遗憾不是全部，因为英语教科书我没能找到。我模糊地记起，这本书好像是放在索契的小房间的桌子上的那一堆书里。如果索契没有，那我就不记得放在什么地方了。真是倒霉。

你的信已经收到了。我今天是第一天上课。我已经递交了转到化学系的申请书，并被批准了，只是倒霉的是：化学老师还没凑齐，招聘工作要到10月1日前才能结束，这样暂时我还得在原班学习。很多课我都没学，现在不得不快点赶上。很高兴你感觉身体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你的牙怎么样了？一定要治好。我已经给基洛夫[1]打电话了，他现在不在列宁格勒，我真不知道，他给我打电话时，我怎么跟他说，因为我觉得这种“委托”不是很妥当的。

祝你一切都好。

吻你，娜嘉

1930年9月5日

---

①　基洛夫，谢尔盖·米罗诺维奇（1886～1934），时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中央委员会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

№07687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 年 9 月 8 日）

塔奇卡！

信已收到，书也收到了。缅什科夫斯基的英语自学课本我这儿没有（按照罗捷塔尔的方法编写的）。你再仔细找找然后给我寄来。

我的牙已经开始进行治疗了，拔掉一颗坏牙，两侧的牙也钻了，总之，正全力以赴地进行治疗。医生打算在 9 月底结束治疗工作。

我哪儿也没去，也不打算去哪里。我感觉好多了。正在恢复健康。

给你寄一些柠檬，这是你身体需要的。

瓦西卡学习怎样了？还有萨丹卡？

吻你，非常、非常热烈地。

你的约瑟夫

1930 年 9 月 8 日

№07688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年9月12日）

约瑟夫，你好！

信已收到，谢谢你的柠檬，自然，这对身体很有益处。我们生活得还不坏，现在已经完全开始过冬了——昨天夜里温度是摄氏7度，今天早晨所有的房顶都结了一层白霜。你能晒太阳并且已经开始治疗牙齿，这很好。最近莫斯科很喧闹、嘈杂，一片混乱，不过会逐渐好转的。公众（在电车里和其他一些公共场所）的情绪还可以——大家只是悄悄议论着，不是很厉害。在莫斯科我们大家都被“采别林”号飞艇的到来吸引住了，场面确实值得关注。整个莫斯科都在观看这艘美妙的飞艇。根据诗人捷米扬的说法大家都在抱怨贡献太少，我们捐了一天的工资①。我看了新上演的歌剧《阿尔马斯》，马克沙科娃非常出色地表演了列兹金卡舞（亚美尼亚舞蹈），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这么美妙的表演了。我想，你也是非常喜欢舞蹈和歌剧的。

我怎么找也没有找到你的那本教科书，我给你寄去另一种版本的。不要生气，哪儿也找不到。祖勃洛沃已准备供暖，一切正常，大概很快就会就绪了。“采别林”号到达那天，瓦夏是骑着自行车从克里姆林宫穿过全城一直到机场的，干得还不坏，但自然是很疲

① 1930年9月10日，以德国飞艇设计家采别林伯爵的名字命名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艇在莫斯科进行了飞行表演。9月12日《真理报》工作人员倡议为建造苏联的《真理报》号飞艇捐款。倡议信中提到了诗人捷米扬·别德内依。

劳了。

你没有到处走，是很明智的，因为这在各方面都是有风险的。

吻你。

娜　嘉

1930 年 9 月 12 日

№07689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年9月19日）

约瑟夫，你好！

身体怎么样了？听来的同志（乌哈诺夫[①] 同志，还有另外一位同志）讲你气色不太好，自我感觉也不好。而我知道的却是你正在恢复健康（这是从你的信中得知的）。由于这种情况我受到了莫洛托夫夫妇的责怪，说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下等等。当然，这是符合情理的。我向他们解释说我离开是由于忙于功课，而实质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今年的这个夏天我没有感觉到你愿意我推迟离开的日期，而是相反。去年夏天这一点非常明显，而今年却不是这样。带着这样的心情留下当然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这已完全改变了我留下来的意义和益处。因此我认为，我是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责怪的，但是在他们的概念中当然是这样的。

最近我去了莫洛托夫家，听听他的建议，获得一些消息。这很好，要不我只知道报刊上的那些东西。总之，高兴的事很少。关于你回来的事，阿维尔[②] 对同志们说，你要到10月底才能回来。我没见到阿维尔，难道你真的要在那里呆那么久吗？

---

① 乌哈诺夫，康斯坦丁·瓦西里耶维奇（1891～1937），时任莫斯科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② 叶努基泽，阿维尔·萨夫罗维奇（1877～1937），阿利卢耶娃的教父，时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秘书。

请回信。如果你不是很满意我的这封信，那也只能随你便了。祝一切都好。吻你。

娜　嘉

1930 年 9 月 19 日

№07690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年9月24日）

塔奇卡！

你的邮件已收到了。给你寄一些从我们的树上摘的桃子。

我身体很健康，自我感觉也特别好。可能，乌哈诺夫见到我的那一天，正好是沙皮罗一下子给我钻了8颗牙，8颗呀！可能当时我的情绪不太好。但是这件事情与我认为的健康已经基本上恢复了这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至于谈到对我的关心，有人责怪你什么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莫洛托夫夫妇就是这种人。你代表我对莫洛托夫夫妇说：他们错怪了你，在这方面对你不公平。关于你认为我不愿意让你留在索契的这种想法，那么你对我的责怪也是不公平的，就像莫洛托夫夫妇责怪你一样不公平。是这样的，塔奇卡。

我当然不是到10月底才回去，而是早很多，在10月中旬，就像我在索契对你说的那样。为了保密，我通过波斯克列贝舍夫[①]散布消息说我10月底返回。看来，阿维尔是这种消息的“牺牲品”。只是不想让你打电话问这件事。我回去的日期只有塔奇卡、莫洛托夫，大概还有谢尔戈知道。

好了，祝你一切愉快。

---

① 波斯克列贝舍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1891～1966），1923～1953年间任斯大林的秘书。

吻你，热烈地。

你的约瑟夫

1930 年 9 月 24 日

孩子们的身体都好吧？

№07691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年9月30日）

约瑟夫，你好！

再一次从这句话开头——信已经收到了。你在南方的阳光下感觉很好，我非常高兴。莫斯科现在也不错，天气已经变好了，有时森林里甚至还像秋天。日子过得很快。目前大家身体都很好。钻8颗牙，你真是好样的。我也在和我的喉咙作斗争，斯维尔热夫斯基教授给我做了手术，割掉了四块肉，不得不躺了四天，而现在我可以说，我已经结束了“休整”状态。我感觉很好，在躺着的这几天甚至有点发胖了。

桃子太棒了！难道这真是从那颗树上摘下来的？它们简直太美了！现在你，尽管完全不情愿，但还是很快就要回到莫斯科了，我们等待你，但是不着急，你尽量休息好。

致敬。吻你。

卡冈诺维奇① 对住宅非常满意，已经接受了。总之对你的关心非常感动。我刚刚从突击队员代表会议上回来，卡冈诺维奇在大会上讲了话，还有雅罗斯拉夫斯基也讲了，讲得真不错。接着是卡尔明——戈洛瓦诺夫手下的人，讲得也很出色。

娜·阿

1930年9月30日

① 卡冈诺维奇，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1893～1991），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

№07692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0 年 10 月 6 日）

最近没有你的任何消息，不知什么缘故。我向德文斯基[①] 查问过了，他说，已经很久没有邮件了。大概是旅行太使你着迷了，或者就是懒得写信。

莫斯科已经刮起了暴风雪。现在还没有停止。总之，天气非常冷，非常可怕。可怜的莫斯科人冷得够呛，因为莫斯科供暖局下过命令，10 月 15 日之前不准供暖。生病的人多得不得了。我们上课时都穿着大衣，否则就冻得总是打哆嗦。我的事情大体上进展得还不坏。我的身体也很好。总之，“周游世界”的旅行造成的疲倦已经过去，而忙忙碌碌的事情也起了明显改善的作用。

从一位年青有趣的妇女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你的事，她是在加里宁[②] 家的午宴上见到你的，她说你的气色非常好，而且非常快活，和大家有说有笑。听到这些我非常高兴。

好了，不要因为这封愚蠢的信而生气，但是，我也不知道是否值得给你往索契写这些枯燥的事情。很遗憾，莫斯科的生活中就是充满了这些乏味的事情。好好恢复身体。祝一切都好。

---

① Б.А. 德文斯基，斯大林的一名助手。

② 加里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1875～1946），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吻你。

娜　嘉

1930年10月6日于莫斯科

祖勃洛沃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目前已非常舒适了。

№07693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0 年 10 月 8 日）

塔奇卡！

你的来信已收到了。

不知道为什么你最近开始夸奖起我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好，还是不好呢？

很遗憾，我这里也没有任何新闻。我生活得不错，还期待着更好一些。我们这儿天气又变坏了，真是可恶！应该回莫斯科。

你在信中暗示我的什么旅行，告诉你，我什么地方（真的是任何地方！）也没去，也不想去。

吻你，非常热烈地。

你的约瑟夫

1930 年 10 月 8 日

№07694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1年9月9日）

你好，塔奇卡！

一路是否顺利，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孩子们都好吗？萨丹卡好吗？

齐娜[1]来了（基洛夫的妻子没来）。她在泽济诺夫卡逗留了几天——并认为，这里要比普扎诺夫卡好。还好，——非常愉快。

我们这里一切还是按老样子进行：击木游戏，打地球，然后还是击木游戏和类似的这些游戏。莫洛托夫已经来我这里两次了，而他的妻子好像去了什么地方。

暂时就这些。

吻你

约瑟夫

1931年9月9日

① 奥尔忠尼启则的妻子齐娜伊达·加夫里洛夫娜。

№07695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不晚于 1931 年 9 月 12 日）

你好，约瑟夫！

我一路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很冷，也许是我刚刚离开南方才会有这种感觉的，但是，确实是很凉。

莫斯科更美丽了，可是有些地方仍然像一位企图用香粉来掩盖自己脸上斑点的妇女一样，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更是如此。下过雨后，墙上的涂料就随着雨水一道一道地流了下来。总之，要想给莫斯科一个令人满意的外表，目前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些措施和条件，还应在技术上作进一步的改进。

回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堆事情，同我们在去索契的几十俄里路上所遇到的事情一样，令人不愉快。是的，事情少了一些，但只是略少了一些。我已经给基洛夫打了电话，他已决定 9 月 12 日去你处，但是，对于交通工具只是勉强同意①。关于格洛特一事② 他会向你讲述全部情况的。莫斯科的街道状况已经好些了，有些地方甚至很好。从特维尔大街到红场这条路上景色特别美。教堂虽然拆得很慢，但已失去了往日的“神气”③。

克里姆林宫里面很干净，但车库的院子特别乱，那里什么也没

① 基洛夫希望乘坐飞机到索契去。对此，斯大林在电报稿上作了如下批示：“我没有权力也不会允许任何人乘坐飞机。恳请坐火车来。”

② 坦克设计师，这里指的是他去德国的事。

③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31 年 7 月 13 日作出决定，为建造苏维埃宫而拆掉莫斯科市内的救世主基督教堂。

收拾，甚至连修理汽车留下的垃圾都没清除。这一点我觉得不太好。总之，你可能已厌倦了我唠叨的这些琐事。在班里，大家对我能百分之百遵守纪律特别满意，应该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各种新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不能迟到了，而不仅仅是由于为了这个百分之百。

是的，关于《消息报》刊登的那起恶性事件①，现在已经查明：凶杀完全是为了抢劫，因为这位老师身上当时带着钱，是用于给数学教研室买教具的。谁是凶手，还有其他的细节现在还不清楚。这件事发生后，教师们心情都特别沉痛，虽然这是学院的一位新教师。教师们工作热情都很高，尽管无论是学员还是教师对伙食问题都有点意见，大家都厌倦了排队和一系列没有安排妥当的事情，主要是最普通的制服问题。商店里物价很高，因此造成商品大量积压。

你不要为我这么详细地说这些而生气。我真的希望能从人们的生活中清除这些缺陷，使大家都感到生活的美好，并更加努力地工作。

给你寄去你要的电工技术方面的书。增补版的书我已经订购了，但是今天还没收到。下一次邮班你会收到的。还有，德文读物——我把我们家里的都寄去，成人教科书也通过下一次例行邮班寄给你。

一定要好好休息，最好是什么事也不要做。

谢尔戈打电话来了，说你无论是在信中，还是电报中都批评了他。看来，他很苦恼。我向他转达了你的问候。

孩子们都很健康，都在莫斯科。

---

① 《消息报》于1930年8月30日和9月4日报道了一起凶杀案，被害人是工业学院数学教研室的副教授。

祝你一切、一切都好。

吻你

娜 佳

不晚于1931年9月12日

№07696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1年9月14日）

你好，塔奇卡！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学会了写这么详细的信，这很好。从你信中看出，莫斯科的外貌开始变好了。终于是这样了！

电工学方面的书《中等技术工作手册》收到了。塔奇卡，请再给我寄一本关于黑色冶金学方面的《中等技术工作手册》。一定给我寄来（你到我的图书室看看——在那里找找）。

索契没有任何新闻。莫洛托夫一家都走了。听说，加里宁打算到索契来。目前这里的天气还不错，甚至很好，只是有点寂寞。

你生活得怎样？让萨丹卡给我写点什么。还有瓦西卡也是。

继续向我提供“情报”。

吻你。

你的约瑟夫

1931年9月14日

附言：我的身体正在恢复。很慢，但是正在恢复。

№07697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1年9月19日）

你好，塔奇卡！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

目前我们这里的天气很好。昨天夜里（12点钟）我和基洛夫一起测量了一下普扎诺夫卡低处和高处的温度，我现在住在高处。得出结果是低处和高处温差是列氏3度，这对新别墅很有利：也就是当低处温度（夜间12点）是列氏14度时，高处是列氏17度多。这就是说，我们这里现在高处的温度就好像在加格拉赫和苏呼米一样。

到海里洗了一次海水澡（只有一次！）。非常好！以后还想去。

和基洛夫一起过得很愉快。

暂时就这些。

热烈地吻你。

你的约瑟夫

1931年9月19日

№07698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1年9月21日）

你好，约瑟夫！

给你寄去“家庭书信”。斯维特兰娜的信带了译文，因为你未必能完全看明白她所写的重要事情。除此而外还给你寄去杰尼[①]的书和他的信，我理解这封信是去国外治病的请求，当然，关于这一点他在信里什么也没写，但是，我觉得我的理解是正确的。我认为，是可以答应他的，不过你更清楚怎样答复他。已经收到了在机场拍的照片的相册，一起给你寄去，非常有意思。几乎什么新闻也没有。去看了一场芭蕾“巴雅洁尔卡”，谢苗诺娃虽然精神不太好，但仍然完成了很多新动作。我每天晚上不得不做很多功课。莫斯科的情况是这样：正在加紧进行卢比扬卡广场的工作——拆除了中心喷泉，按直线铺设电车轨道，并因此而免去了一个大圆圈。莫斯科宾馆附近的街道还没修完，四周都堆满了东西。我想，在你回来之前这一切都会完成的。三四天以前车库的院子已经开始收拾了。我想，阿维尔能比我更详细地向你讲述这一切的，这样，我就没有什么新闻可补充的了。

给你寄去《黑色冶金学》。因为没有好的评论人，所以，新出版的书中也选不出什么很有趣的可给你寄去的。天气总是很潮湿，哪儿也不想去。只是在回来的那天去了一次祖勃洛沃，以后再也没

① 杰尼，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1893～1946），原姓杰尼索夫，苏联画家，政治宣传画的奠基人之一，曾创作《协约国》（1919年）。

去。9月23日准备去试试浴室，那儿已经弄好了。外表上看很不错，我再去看看蒸气足不足，然后再写信告诉你。

好好休息。基洛夫去你那里了吗？谢尔戈对我说，他想去索契住十来天，但我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决定的。暂时就这些。吻你。

娜　嘉

1931年9月21日

已经写完了这封信，才收到你的来信。基洛夫已经去你那儿了。你那里很暖和，这非常好。去海里洗澡可要多加小心，因为毕竟现在水温已经降低了。你没有什么新的委托，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

娜　嘉

1931年9月21日

你好，爸爸，快点回家来。吻你。萨丹卡

№07699

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1年9月26日）

你好，约瑟夫！

莫斯科没完没了地在下雨。天气很潮湿，令人感到很不舒适。很多人患了流行性感冒。自然，孩子们也得了流感和咽喉炎，我也很担心生病，因此总是穿得很厚。郊外也是这样，所以也没有去。索契大概很舒适，这非常非常好。

我们这里一切还是按老样子进行——白天在外面忙，晚上回到家里也是如此。明天我想去看一场《广告》，这将在艺术剧院的小舞台演出，据说非常可笑，而我也真的很想笑笑。

最近，雅科夫列夫寄来了我们在索契的照片，也挺可笑的，特别是莫洛托夫更可笑。寄给你，只是一定要把它们带回来。这些天你没有要我做什么，因此也没有什么可给你寄的。等到下一次例行的邮班时，如果你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你寄去一本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论斯大林和列宁》（这是一个叛逃分子写的），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寄去，因为德温斯基还没有弄回来，我也只是在自由报上读到的，报上说这是关于你的最有趣的资料。感兴趣吗？因此，我请德温斯基快点弄到这本书。

暂时还没有什么新闻。这两天谢尔戈打来了电话，说患了胸膜炎，躺了好几天。

一定好好休息。吻你。

娜　嘉

1931年9月26日

№07700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31 年 9 月 29 日）

你好，塔奇卡！

照片（击木游戏）已经收到了。非常可笑，也很有意思。再给你寄回去（在我这里会丢的）。

上次没有给你写信，——这一回弥补一下过失。

冶金方面的书已经收到了。还有瓦夏和萨丹卡的信都收到了。代我亲亲他们——他们都是好孩子。

我很快就会回家了。因此，你可以不写信了。

从 9 月 25 日开始索契的天气一下子就变坏了。

就像当地人说的那样，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风暴。暴风雨已经刮两天了，风声像疯狂的野兽在怒吼一样。我们的别墅前有 18 棵很大的柞树都被连根刮倒了，而在山上（在普扎诺夫卡）的别墅门前有 3 颗巨大的柞树也被连根刮倒了。9 月 28 日地面温度已降到列氏 4 度。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还是不得不把炉子生起来。

好了，暂时就写到此吧，再见。

热烈地吻你。

约瑟夫

1931 年 9 月 29 日

№07663

斯大林致叶·格·朱加施维里的信

（1934年3月24日）

您好，我的妈妈！

您的来信收到了。果酱、丘奇赫拉[①]、无花果也收到了。孩子们非常高兴并向您表达谢意和敬意。

知道您身体很好，精神愉快，我非常高兴。

我身体很好，不要挂念我。我能承受自己的一切。不知道您是否需要钱，或者是没有了。

给您寄去500卢布以备需要。同时寄去几张照片——我的和孩子们的。

祝您健康，我的妈妈！

不要失去朝气！

吻您。

1934年3月24日

孩子们向您致敬。娜嘉去世后，我的个人生活自然很沉重。但是，没关系，勇敢的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坚强的。

① 一种格鲁吉亚甜食，用葡萄汁、核桃、面粉等制成香肠形。

【专题说明】

关于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

（1928 年 4 月至 1946 年 9 月）

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1908～1943）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所生的儿子。雅科夫毕业于工农红军炮兵学院。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作为第 14 师炮兵团的上尉连长上了前线。1941 年 7 月 16 日被俘，1943 年末死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本专题文件收集了与雅科夫有关的信件和档案，其中包括斯大林给阿利卢耶娃的便函、雅科夫被俘后受审讯的记录、雅科夫在集中营中情况的证明材料和苏联内务部关于雅科夫被俘之后及死亡情况的报告。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付谦、刘明翻译）

№07671

斯大林致阿利卢耶娃

（1928年4月9日）

代我转告雅沙，说他的行为像一个小流氓，一个骗子，我和这种人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点。随他的便吧，喜欢在哪儿就在哪儿，愿意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①]。

约·斯大林

1928年4月9日

① 雅科夫因与父亲关系紧张而试图自杀，事后他去了列宁格勒，住在阿利卢耶娃的父母家里。斯大林的这张便条显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07739

德国人审讯战俘雅·约·朱加施维里上尉的记录

（1941 年 7 月 18 日）

译自德文

第三摩托化步兵连军事通讯员

对战俘雅·约·朱加施维里上尉的审讯是在第四集团军空军司令员处进行的。1941 年 7 月 18 日大尉军官列乌施莱和少校戈尔特尔斯主持了审讯。用密码通过无线电台发出。

请问您的名字？

雅科夫。

您的姓？

朱加施维里。

您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的亲属吗？

我是他的大儿子。

您会讲德语吗？

我曾经学习过德语，大约在 10 年以前。遇到熟悉的单词，还能想起一些。

您以前来过德国吗？

没有，曾经答应过我，但没有结果，所以我也就没来过。

曾经打算什么时候来呢？

我想学院毕业以后来。

在苏军里您是什么军衔，您在什么部队服役？

上尉军衔。我在第14榴弹炮团服役，该团是配属给第14坦克师的，即第14师炮兵团。

那您是怎么到我们这里的？

其实不是我，而是这个师的剩余部分。7月7日我们被打散了，这个师的剩余部分被包围在利亚斯诺沃地区。

您是自愿到我们这里来的，还是在战斗中被抓获的？

不是自愿的，我是被迫的。

您是一个人还是和同志们一起被俘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很遗憾，你们的包围引起了慌乱，我们的人四处逃散。要知道，我们被包围了，大家都向四处跑去，而这时我正在师长那里。

您是师指挥员？

不，我是炮兵连长，但在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被包围时，我正在师长那里，在指挥部里。我急忙向自己同志的方向跑去，这时，一群红军战士叫住了我，他们想突围出去。他们请求我指挥他们进攻你们的部队。我这样做了，但红军战士们仍然惊慌失措，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不知道我的炮兵战士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没有见到。如果你们对此感兴趣，我可以讲得更详细些。今天是几号？（今天是18号）。是的，今天是18号。也就是说，前天的夜里，在利亚斯诺沃地区附近，距利亚斯诺沃11～12公里处，我们是在这一天的早晨被包围的，我们还同你们进行了战斗。

我们的士兵对您怎样？

嗯，只是扒下了我的皮靴，总的来说，我说，不坏。同时，我可以说，我们的人对你们的俘虏也不坏，我本人就是一名见证人，我甚至可以说，就连对你们的空降兵也不坏，因为你们自己也清楚，这些空降兵是干什么的，实际上他们是“破坏者”。

为什么您说“甚至对空降兵呢”？

我说甚至对空降兵，为什么？因为你们自己也知道，空降兵是

一些什么人。因为我……

那为什么对待空降兵就应该另外对待呢？

因为，这里人们对我讲过，你们这里都说，我们杀害人，折磨人等等。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根据您的说法难道他们不是士兵？

要知道，他们当然是士兵，但是他们的战斗方式和性质有些不同，是非常阴险的。

他[①] 是不是认为德国空降兵就是用这种方式作战的？

什么样的呢？（怎样地？还有谁？）

德国士兵从飞机上空降下来，并像步兵一样战斗，同突击部队一起冲锋。

并不总是这样的，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

难道俄国空降兵以别的方式作战？

让我们直说吧。根据我的看法，和你们一样，我们也赋予空降兵别的一些意义，我看是这样的。

但完全不是这样！

也可能是这样。但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同志们对我说，有些他们认识的炮兵是从反坦克部队来的，但穿着我们部队的制服。

难道他认为，我们的空降兵穿着便衣从飞机上降落下来，就像英国政府在一次报道中说的那样？

你们的空降兵穿着我们红军战士和警察的制服被我们抓住了，这是事实，是无可否认的。

这就是说，这个故事和英国人说的一样？

---

① 俄译文如此。德军审讯者一人用“您”称呼，表明是直接使用俄语；另一人用“他”称呼，表明使用德语并通过翻译，人称所指仍是雅科夫。以下同此。

不，这是事实。

那他本人是不是在某个时候亲眼看到了穿着便服或者是外国军队的制服空降下来的伞兵？

这是居民们对我说的。要知道，我不想争辩，斗争就是斗争，在斗争中一切手段都是好的。我们抓住了一名妇女，一名妇女被抓住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是从你们那里来的，还是我们的人，但她是敌人，在她那里找到了一瓶带有鼠疫杆菌的东西。

这是德国女人吗？

不，她是俄罗斯人。

他确信这一点？

我只确信，她，这名妇女被我们逮捕了，但她是谁——我不知道，我也没问，她不是德国人，而是俄罗斯人，但她的任务是要向水井里投毒。

这是别人对他讲的，而他本人并没有亲眼看见。

我本人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告诉我这件事情的人们是可以信赖的。

这是些什么人？

讲这些事情的是一些居民，还有和我在一起的同志。后来，又在电车上抓到了一名从你们那里来的妇女，她穿着警察制服买车票，正因为这一点她暴露了自己。我们的警察是从来不买电车票的。或者还有这样的例子：抓住了一个人，他带着有4个小方形的领章，而我们已经不带4个的了，只带3个的。

这事发生在哪儿？

在斯摩棱斯克。这是我的同志们告诉我的。

他是否知道，在荷兰以及在其他的一些战役中我们使用了空降兵。他是否认为，这也是一些穿着外国制服的德国士兵？

您知道吗，现在是俄苏战争[①]……是的，我很清楚，苏联报刊非常客观地报道了德国与其敌国之间的军事行动……比如，关于你们的空降兵的作战行动，我们的报刊这样写到：英国人指控德国人，说他们在其他国家的领土上活动时穿着荷兰军服或其他非德国士兵的制服。这是我们的报刊根据英国人的报道写的，但同时又指出，德国人未必需要这样。我自己也看了报纸，我了解这一点。

有一个问题！您本人在战斗中也同德国军队接触过，了解德国士兵是怎样作战的。要知道，如果战争是通过正常方式进行的，就不可能发生您所说的我们的空降兵采取这种不正确行动的情况。

是的，正是这样。我都同意。要知道，我本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空降兵是新的兵种，就比如炮兵、骑兵等等，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兵种，他们的任务是从后方实施突击。这个兵种在后方作战，因此会在居民和军队中引起相应的反应，认为他们是间谍分子。

在俄罗斯也采取了这种方法？

如果某个人被认为能够干什么，那么他也应该对自己的行动方式进行评价。

我们对于你们采取的行动，正如你们对我们的一样。在斯摩棱斯克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应该是清楚的：当你们的空军轰炸了斯摩棱斯克后，我们的消防队员去灭火，而你们的空降兵向消防队员开火。我认为，俄罗斯的空降兵也会这样行动的，这就是战争。

我们在俄罗斯还没有使用空降兵。而你们却已使用了有名的200000空降兵中的一些人，大概在你们部队里也有这些空降兵吧？

在东线我们几乎不使用空降兵。

这怎么能同参加战斗的200000空降兵联系起来呢？

---

① 俄译文如此。

200000？你们问我，就是说，我们苏联所拥有的 200000 数量的空降兵的情况怎样？这一点我无法回答，从 6 月 22 日起我同莫斯科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因为我去了部队，到我的第 14 坦克师去了。从那时起我就与莫斯科中断了任何联系，因此我不知道，空降兵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采取了什么行动。我能说的只是：我不知道。如果他们存在，如果确实有这些空降兵，那他们会参加作战，这是他们的任务。你们自己也了解这一点。

据说你们那里有这样的说法：由于害怕当俘虏，红军战士最好在被俘前开枪自杀。

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坦率地表达：如果我的红军战士后退，如果我看见我的师后退，我自己也会开枪的，因为后退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士兵会离开他？

不，这不是我的士兵，这是步兵。

他是否知道，根据国际法规定，对待被俘的穿民服的士兵与对待穿军服的士兵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他穿了民服呢？

我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想逃到自己人那里去，而如果你们怀疑我打算进行间谍活动的话，那么至少我应该懂德语。

他是否知道有这样的命令，其中要求士兵在面临被俘的危险时，应该用老百姓的服装来保护自己？

您要明白，我知道的只是，受到包围后四处逃散的人们都开始换衣服，我也说服自己这样做了。

您都参加过哪些战役？

6 号，7 号，6 号的傍晚，第 14 坦克师在距维捷布斯克大约 30 公里处，也就是说，第 14 坦克师，第 18 坦克师和第一摩托机械化师，即整个第七军。

他是哪一年参军的？

我是 1938 年参加红军的，曾经在炮兵学院学习。

那么现在他是基干人员？

是的，是的，是的。

他第一次参加的是什么战斗？

我已经忘记这个地名了，这是在距维捷布斯克25～30公里处，当时我身上没有带地图，一般来说我们都不带地图。我们没有地图。

军官也没有地图？

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是这样混乱，这样无序，就像我们走的队列一样，我们那里的组织工作总是混乱的。

这一点应该怎样理解呢？

这一点应该这样理解：所有部队，包括我的部队——它被认为是好的……就是说，你们问，应该怎样理解组织性差？我所在的那个师被认为是一支好的部队，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好战斗准备，除了炮兵以外。因为换防工作进行得不好，一片混乱，也没有任何协调人员，什么也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你们摧毁了部队的装甲汽车。

这种情况对指挥官们产生了什么影响？

他们一点都不中用（为什么?），因为他们躲在军营里，这就是一切，就这样整整3年。行军也不超过30公里，而且一年只进行1～2次。

集团军和独立的兵种部队装备怎样？

以我的观点看，部队的装备很好，只是他们不善于使用这些装备。对，就是这样。你们只是摧毁了我们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如果把一个军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组织起来，并能像你们的军队一样很有条理地进行作战，那么就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了。

增援部队是怎样行动的？

我坦率地对你们说——整个师都作为增援部队投入了战斗。

那么这个师是在什么时候初次同德国军队交锋的?

是在5号，6号和7号。6号进行了战斗侦察，这次侦察对于我们非常有价值，总之，7号的战斗你们是应该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空军进行了干预，并且击溃了我们。

这个师是什么时候被打散的?

是7号被击溃的，你们的空军击溃了这个师。我还勉强活着，就此而言我是应该特别感谢你们的空军的。

这个师受到重创了吗?

我们损失了70%的坦克，70%或者60%，约60%到70%。

这个师总共有多少辆坦克?

要知道，这个师还没有完全装备好，旧坦克还没有更新……但是已经有一些新坦克了。

大约有多少辆坦克?

我们计算过，大约有250辆坦克，准确的数字我不能对你们讲。我知道组织方法，但准确的我不能讲。有200多辆，250～300辆，大约是这样。

是什么原因使部队的战斗力很差呢?

由于德国的俯冲轰炸机，由于我们指挥部的不明智的行动，愚蠢的行动……可以说，就像白痴……把部队置于炮火之下，直接把部队派到炮火之下。

谁负责指挥战斗？是团长、更高级的指挥员还是政治委员？在红军中是有政治委员的。

当然，第一负责人是指挥员，而不是政治委员，不是政治委员，不，不，指挥员是第一负责人。直到去年或前年为止，指挥员和政治委员还是权力平等的，但是后来得出结论，应该只有一个掌权的人，而不是两个，应该是一个，因为两个权力平等的人会互相激怒，互相干涉，因此，指挥员被认为是掌权的人，而政治委员是

他的助手。应该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

现在已经人所共知，正是最近这些天里发生了变化，政治委员们又重新拥有了被增强的权力，这些权力是他们在革命时期就已拥有的。

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这一切以后，在政治方面以及主要在军事方面的发展以后……。你们说，似乎是不久以前，政治委员和指挥员的权力又平等了。这是不真实的，依我的看法，这不是真的。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也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在军事方面，大多数政治委员自然应该服从指挥员，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作战时政治委员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干扰指挥员。

但是，根据最新的报道，最近政治委员又都被撤销了…（反驳：不是被撤销了，早些时候，即两年以前，就削弱了他们的权力）。

不，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完全可能，因为您在前线，最近几天发生了什么变化，您一点也不知道。要知道是您自己说的，指挥人员是无用的，可能什么消息都到不了你们那里。也可能这是推测？总之，为什么在军队里要有政治委员呢？他们有什么样的任务？

提高士气……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

但是，士兵、指挥员、军官是怎样看待这一点呢？

要知道，如果政治委员聪明地进行工作，那么大家都会喜欢他并尊重他。但是，当他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向士兵们施加压力时，很明显他会表现得很形式主义，比如说，在会议上。这样的话，士兵就会处处——也可能在内心里——不尊重他。

您是否知道这种情况：部队拒绝接受政治委员？

暂时我还不知道这一点。

那么，他可能有兴趣知道，在我们这里，在战俘营里，士兵对

政治委员持尖锐的否定态度，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政治委员们置于保护之下，使他们免遭自己士兵的杀害。

你们知道吗？一切都取决于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红军战士。如果我们说的是刚刚应征入伍的新兵，那么他们几乎全都是没有知识的人。

（但是，这里也涉及军官和高级指挥员们。）政治委员在部队里有什么权力？

就是说，指的是在军营里对待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态度。政治委员是指挥员在政治方面的左右手，您也知道，这里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之中也有特别不坚定的人……通常……在军人队伍中最不可靠的人就是富裕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应该孤立这些人。

为什么要对他们进行监督呢？难道红军队伍里那些比富农的儿子更了解时代的农民对红军和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持否定的态度？在什么原则基础上他们拒绝接受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或者指挥人员呢？

因为他们出卖灵魂，不可靠。

首先是那些人出卖灵魂，犹太人？

哪儿好就往哪儿奔。

也可能在红军中服役的农民的儿子们认为，他们能够从其他的国家形式中，例如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得到更大的利益？

什么是农民，农民是什么样的？

这里说的是以前的富农。

富农，以前的富裕农民。

难道他们对现存的国家制度不满意？

当然，他们不满意。

他们为什么对现存制度不满呢？

因为……请问，你们了解党的历史吗？了解俄国的历史吗？总

之：富农曾经是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保卫者。

难道他不认为，富农在过去俄罗斯帝国时期捍卫的是自己的私有制，就如德国农民现在捍卫自己的私有制一样，这只是因为，他还是个私有者，要知道在我们德国存在着私有制，而在俄罗斯私有制已经被取缔。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你们忘记了——他本人是一回事，而他的孩子们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受到另一种精神的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承认这样的父母。

他是不是认为，同以前相比，苏联最近这些年给工人和农民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工人农民居住的新区，没有看到任何拥有很好车间的工厂。这里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原始，在德国，甚至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时期也不曾有过这种情况。

去问问他们，沙皇制度下是什么样的，去问问他们吧，他们会答复你们的。

是的，但是在这么多年里是可以做得比已经做的更多些的。只要与德国在较短的时间里所做的一切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在［德国］那里还有什么没为工人做呢？无论在哪方面。我们的同胞的生活简直不能同以前相比。

好吧，我回答你们：在俄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俄国几乎不依赖于任何人，任何人都不依赖。俄国有自己的一切，很可能，做成这一切的代价是造成不满情绪，是依靠农民们，依靠工人们，完全可能有一部分居民心怀不满。

但是，没有为工人做任何事情。要知道平常都是这样讲的：农民和工人的军队。

是的，但是你们要知道，对于他们来说有了独立性。独立性就

意味着自己的工业，自己的工业。而自己的工业就是一切，一切。这就是为他们所做的，因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有了一部分成果，而不能令人满意的是，我们这里的一切都做得很仓促，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磨洋工，我们也缺乏时间实现这样的目标，即在做这一切时让人民能够自己确定应该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人民知道把钱花在什么地方，花在建设上。

但是我在25年前，即世界大战时期，也到过这些地方。那时，这些地方看起来比较富裕。25年以后，房屋都倒塌了。我所知道的村庄，即25年前我经过的地方——当时我还是一名士兵——现在已经衰落了，并且已经变得很贫困了。这一点该怎样解释呢?

你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贫穷的国家，这里的农民生活得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富裕，比方说，乌克兰，北高加索，西伯利亚。那里很好，有最好的土地。当你们得以彻底地摧毁我们时，请注意这些农民们，去问问他们，他们是否满意。好吧，你们是想让我回答你们。俄国在1914年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拉入了战争，这场战争是如此地削弱了俄国，使我们完全遭到了破坏。

无法准确地谈论20年的建设。没有自己的干部，没有技术知识分子、教授、教师。要在10年的时间里建立自己的工业和培养自己的干部。难道这是富裕的知识分子吗?这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啊!我所说的是中层知识分子。教师和高级工程师——这是一回事，而中等的指挥人员和工程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在俄国的人数很少。非常少!要在10年时间里创造这一切!俄国曾经没有任何知识分子，任何的!

既然他是军官工程师，他是不是也把自己列入知识分子当中呢?

是的，我把自己列入知识分子当中。

现在提一个军事方面的问题。现在，当您已经了解德国士兵

后，您是否仍然认为，你们还有机会以红军的力量进行可以改变战争进程的抵抗？

你们知道，我这里没有任何资料，这样我就不能说是否存在某种先决条件。反正我个人认为，斗争还会有的。我这里没有资料说明苏联政府是否有可能继续进行斗争，或者，最低限度，改变已经形成的局势。我没有资料，但我仍然认为，斗争还会有的。

他本人刚刚说过，他的师被认为是最好的师之一，可是仅仅在几天之内就被彻底摧毁了。这一点应该促使他思考，他应该明白，即便是将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当我今年了解这个师的时候，其他人也是这样说的。我是在不久以前了解这个师的。坦率地说，我不这样认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认为呢？为什么？只是因为我对你们讲过，我不喜欢我的部队所在的那个军的指挥人员吗？我不喜欢他们是由于他们行动的愚蠢令人难以置信，令人不能容忍。再没有比他们更愚蠢的了！

是的，但是应该推测出，在其他的军里情况不会更好，将来也不可能更好，因此，今后的战争进程是不会改变的。

关于这一点我不能说，我也不了解这一点，并非所有的将军都是一样的。

他是否知道，我们的军队目前在什么地方？不是指在这个地区，而是在北方和南方，他是否知道，我们已经占领了基辅。如果我们很快就开进莫斯科，他认为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行政机关和政府将从那里逃跑，到那时莫斯科的居民们将会怎样呢？

我知道，你们已经离莫斯科不远了。

他刚刚亲口说，他知道我们已经在莫斯科附近了，已经准备占领莫斯科了。他应该想象得到，当莫斯科转到我们手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

好吧，让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不能想象这种情况。

他认为这是可能的吗？

请允许我向你们提一个相反的问题？如果你们陷入孤立状态，那会怎么样呢？

他是否知道这些战时事态？

要知道，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目前我没有任何资料。至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我要说，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你们的突击部队被包围并被歼灭。这样的事情是有过的。

这么说吧，从22日起我就与首都失去了任何联系。我所知道的事情都是从熟人那里听来的。

他是否知道，英国已同红色政府缔结了同盟？他是否认为，英国将会帮助红色政府呢？

要知道，无线电广播已经报道了，我们是从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我没有其他的消息，无线电广播了苏联同英国缔结同盟的事。我只是听了广播才知道苏联同英国结盟。你们问我，英国是否能给予援助。我不知道。依我看，目前英国不会给任何人以任何援助的。

他是否知道，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都已对苏宣战了？

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无足轻重的（笑）。最主要的——这是德国。

他是否知道，甚至连法国也同苏维埃俄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这一点已经广播了，我是听了无线电广播才知道的。

（挑衅性的问题）对于日本参战的问题他有什么看法？

我能说的只是，将会更糟，更多的我还没法说……

他已经知道了，全世界、整个欧洲都反对俄国，他是否仍然期望战争会出现转机呢？

我可以坦率地说出我所想的。我不想考虑这一点，一想到这些就感到不愉快。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当然是不愉快的，但还

必须得考虑它。你们说整个欧洲，如果没有德国的话，整个欧洲是一文不值的。匈牙利、芬兰等等，能有什么意义呢？这算什么国家呢？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最主要的——这是德国。

他是否知道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对待犹太人的立场，他是否知道目前的红色政府主要是由犹太人组成的？他是否认为，俄国人民在某个时候会表明反犹太人立场？

一切都是胡说、废话，他们没有任何影响。而我，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自己就可以告诉你们，俄国人民对犹太人向来是仇视的。

为什么在我们经过的那些城市和村庄里，人们都仇恨政治委员和犹太人。人们经常说，犹太人是我们红色俄国的不幸。

我应该怎样答复你们呢？关于政治委员我稍后再讲，关于犹太人我能对你们说的只是，他们不会工作。犹太人和茨冈人一样，他们不想工作。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主要的事情就是做买卖。一些生活在我们这里的犹太人甚至说，在德国生活要更好一些，因为那里允许做买卖。让他们打我们吧，但他们会允许我们做买卖。我们这里不允许做买卖，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学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工作。但是，他们不想工作，他们不会工作，他们或者是做买卖，或者是想成为工程师，但是不想当工人、技术员或者农民，因此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他是否知道德国已经把犹太人从商业、科学、艺术、医疗和那些他们曾占主导地位的地方赶走了呢？

是的，我知道这一点，我知道，知道。还有一个事实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是否听说，在苏联有一个比罗比詹犹太州。在满洲国和苏联之间的边界上有一个犹太人自治州，在那里一个犹太人也没剩下，留下的只有俄罗斯人。犹太人不会工作，他们也不愿意工作。

您是否知道，您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也是犹太人？要知道，卡冈

诺维奇也是犹太人？

没有这么回事。她是俄罗斯人。是的，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是的。我父亲的妻子？这完全是谣言，是你们那里散布的谣言。完全不是这样的。从来都不是。不，不，没有这么回事！没有这么回事。你们在那里说什么呢？生活中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事！他的第一个妻子是格鲁吉亚人，第二个妻子是俄罗斯人。就是这样！

难道他的第二个妻子不姓卡冈诺维奇？

不，不！这完全是谣言。全是胡说八道。

现在他父亲和谁结婚了？

谁？不，他…他的妻子死于1934年[①]。阿利卢耶娃，她是俄罗斯人，真正的俄罗斯人，是从顿巴斯来的俄罗斯人。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要知道他已经是62岁的人了，他结过婚，现在根本没有再婚。

战争爆发前他同他的父亲保持联系吗？他是否还有兄弟姐妹？

［现在］没有任何联系，我是6月22日离开的。通常，22日以前我们经常见面。

他是他惟一的儿子？

不，我是他的大儿子。

他有兄弟吗？

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他的弟弟是干什么的？他也是当兵的吗？

我不知道，他应该是参加空军了，他愿意参军，但是现在我不知道。他参军了没有——准确的情况我不知道！

他多大年龄了？

他很年轻，20周岁，21虚岁！

---

① 原文如此。阿利卢耶娃死于1932年。

对于以下问题他有什么看法：号召居民首先是红色政治委员们把他们要撤离的所有地方烧光，烧掉一切储备。这将导致饥荒，这将是落在苏维埃俄罗斯居民身上的最可怕的灾难。

要知道，我不是苏联，准确地说，我只是苏联的一名公民，因此，我什么都不能说。可能你们对我个人的看法很感兴趣。在拿破仑进入俄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他认为这样做对吗？

(持续的停顿)。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谈这一点呢？因为我们是敌人，不是吗？为什么要掩盖呢？既然我们是敌人，那么就应该斗争，而在斗争中所有手段都是好的。我们不是谈论过空降兵吗？是的。例如，空降兵在后方作战，你们的和我们的。比方说，你们的在我们这里作战。看，敌人就是敌人，这就是一切！没什么可掩盖的。掩盖这一点是可笑的。

但是这种手段首先是反对人民的。

当然，我不否认这一点。

他是否认为，政府将对莫斯科采取的行动，正是在拿破仑时期所做的那样？

我没法说，我对事情不了解，不知道这一点。

他是否认为，这些措施能够阻碍德国人的推进？

我确实不了解这一点，我无法对此说什么。

如果红色政府放火烧了莫斯科和工业企业，他是否认为这是正确的呢？

我认为在斗争中任何手段都是好的，在斗争中一切手段都是好的！斗争就是斗争，我是这样认为的。

是的，但这难道不是自我毁灭吗？

凭什么你们就能占领莫斯科呢？凭什么你们有把握一定能占领

莫斯科呢？你们太自信了！

莫斯科的居民，妇女、男人、儿童，总之，所有的人，都被号召参加战斗，这将付出巨大的牺牲。他对此怎么看？

关于这种情况我只是从你们这里听到的，只是今天才听到的。第一次听到！你们想说的是民兵吧？整个莫斯科的？我对你们说吧。从我们事实上被击溃之时起已经过去6～7天了，16日我们同你们进行了最后一场战斗，我们师的剩余部队参加了这次战斗。这样，我大约从10号到16号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只是传闻，议论和类似的东西。我不知道！

他是否知道，无线电转播了他父亲的讲话？

头一次听说。还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听到过！

您是否知道成立了一些妇女营，其中有一个营在芬兰前线被我们俘虏了。他想过没有，他们是真的要保卫莫斯科，还是宣布它为不设防的城市？

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我已经同事态失去了联系，我完全没有什么可说的。

6月22日，同父亲分别时，他对您最后说了什么？

去吧，去战斗！

他是否知道，我们得到了一封信，信中谈到，如果预计的这个秋天的柏林之游不能实现的话，朋友们就打算在这个夏天重新相聚？

1941年6月11日（读信，并自言自语：见鬼！）。

请允许我简要地将这封信的内容向没有读过它的人转达一下。这是一封两个俄罗斯军官的通信，在信里有这样的句子：我正在通过预备役少尉的考试，并想在秋天回家，但这看来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能实现：如果这个秋天将不会在柏林漫步。签字：维克多，41年11月6日。

对于这封信他能说些什么呢？

我想说，你们是说，从这封信里似乎可以看出，情况是这样的：苏联想在德国进攻之前宣布战争。难道不是吗，应该这样理解这封信！

这样说是否有根据呢？实际上是不是有这种打算呢？

不，我不这样认为。

如果说红色政府是所谓的爱好和平的政府，那么它为什么还要这样武装自己呢？德国是被迫武装自己的，因为其他的国家也都已经进行了武装，德国须要保卫自己的国家。苏联政府说自己是工人和农民的天堂！如果他们充满了热爱和平的情绪，并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不感兴趣，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武装呢？也可能苏联认为，它是被迫进行防御的，有某个国家要进攻它？

是这样的。(长时间的停顿)。我只能说我所想的。我所阐述的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德国可能进攻苏联，很显然存在着这样的预测，而为了预防德国的进攻，是须要做好准备的。

在苏联的所有标志上，都有一个画着镰刀和斧头的地球，这难道不是很显眼吗？他在什么时候见过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制作过带有万字符（德国纳粹党党徽）标记的地球呢？万字符和民族主义——这是仅仅属于德国的概念并且应该只对德国有效。为什么苏联总是绘制带有镰刀和斧头的地球呢？这应该是在说明红色政府对世界的统治。

这终究意味着到处为自己开辟道路。但事实就是事实。要知道是你们首先进攻的，不是吗？不是苏联先进攻德国，而是德国首先进攻苏联！有人对我说，似乎斯大林说过，如果德国不先进攻我们，那么，我们就先进攻他们。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有！这就是我能讲的。我不知道。

您是否知道，红色政府试图在保加利亚和所有巴尔干国家进行

反对德国的活动?

我只是从报纸上得知，英国进行了反对德国的挑唆活动。而保加利亚……从你们的报纸上我了解到，英国试图进行挑唆活动，并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它挑唆南斯拉夫、希腊反对你们。但是同时也了解到，比如，德国在芬兰更加积极地促使芬兰人去反对俄国，远比俄国挑动保加利亚反对德国要严重得多。关于保加利亚，这一切都是捏造出来的，很难说。

我还想知道一点情况。他身上的衣服相当不错。他这身老百姓的服装是随身带的，还是在什么地方弄到的。他身上的这件上衣质量确实相当好。

军服吗?这一件吗?不，这不是我的，这是你们的服装。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我们被击溃的时候是16日，16日那天我们大家都走散了，我甚至对你们说过，红军战士都离我而去。我不知道，你们对这是不是感兴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以给你们讲得再详细点。16日那天，接近19点时，不，晚了些，我想大约是12点，你们的部队包围了利亚斯诺沃。你们的部队在距利亚斯诺沃不远的地方停下了，我们被包围了，出现了慌乱。当时，炮兵可能进行了回击，然后，他们就消失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我也离开了他们。我在师长的车里，我在等他，他没在。这时，你们的部队开始向我们的第14坦克师的残余部队射击。我决定尽快到师长那里去，以便参加防御。在我的车周围聚集了一群红军战士，后勤兵，后勤部队的一些人。他们请求我:“指挥员同志，请指挥我们，带领我们去战斗吧!”我指挥他们进攻。但是，他们都被吓坏了，我一转身，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再去找自己的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你们的迫击炮猛烈地开火了。我开始等待。等了一会儿，还是我一个人。那些战士本应和我一起进攻，去消灭你们的几个由4～5挺机枪组成的火力点，以便突围。可是他们始终没有出现。战场

上没有一个人。天开始破晓，我等待自己的炮兵，但这已经是徒劳的了。我继续向前走。路上我遇到了一些小股人员，有摩托师的，有后勤部队的，各种各样的人。我只能同他们一起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性。我就这样走了。大家都开始换衣服，我决定不这么做。我还穿着军装，他们要求我走开，因为飞机将向我射击，而这自然也能打到他们。我离开了他们。铁路附近有个村庄，那里的人们也在换衣服，我决定同其中的一群人在一起。在这些人的要求下，我同一个农民换了裤子和上衣。我决定到晚上去找自己人。是的，这些都是德国的东西，是你们的人给我的，靴子，裤子。为了换这些衣服，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去了。我穿着农民的衣服，我想逃到自己人那里去。怎么办呢？我交出了军装，得到了农民的服装。啊！不！我的上帝！我决定同其他人一起突围出去。当我看到，我已经被包围了，已经无路可走了，我就来到了这里，说“我投降”。就这些！

我还想问一件事！他结婚了还是单身汉？

是的，我已经结婚了。

他想不想通知他的妻子，他已经被俘了？

不需要。即使你们能完成我的请求，也不需要。

他有家庭，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

女儿几岁了？

3岁。

为什么他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他被俘了？也许他认为，家里人知道以后会痛苦的？

说实在的，我什么也不想。如果你们愿意，就通知吧，如果不愿意，就别通知。通知了又怎样？请通知吧，我反正都一样。

是因为对士兵来说成为俘虏是一种耻辱？或者是他认为，他的

家庭将因此有不愉快的事情?

不，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我感到耻辱!

是的，要知道战后他将重返家园。那时他将终生感到耻辱。要知道对一个士兵来说，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或者受伤后成为俘虏，或者是做一个勇敢的士兵。

我还活着，因此在父亲面前我将感到耻辱。

但是,要知道,不仅是在父亲面前,而且在妻子面前也是这样!

妻子倒是无所谓的。

妻子在挂念他，难道他不感到不安?也可能，在俄罗斯家庭生活就是这样无所谓的东西，他们甚至体会不到应该通知自己的亲人们，不像德国士兵被俘时所做的那样。

不，对于我来说她并不是无所谓的，我非常尊重她，我非常爱她!

如果他不让她知道自己的情况，那么他的妻子将以为他已经死了。难道这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吗?

请告诉我，为什么你们对此这么感兴趣?

作为军人，这一点使我们感兴趣，当我们的士兵成为俘虏时，通常都希望通知自己的亲人，因为在我们这里婚姻和家庭生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于我们来说这是特别重要的，而红色俄国却相反。

不，我们那里已经知道了，我或者是死了，或者是成了俘虏。准确的情况他们还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我所在的师已经被击溃了，我或者是死了，或者是被俘虏了。

他是否打算给家里写封信?

(长时间的停顿)。

当然，我想写信，我不否认这一点。

如果我们通过无线电报道他已经成了俘虏，并使他的家里人和妻子知道，他还活着，他将不会反对吧?或者他认为，这对他的父

亲来说也是无所谓的？

不，不要通过无线电广播。

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在政府中担任最高职位？或者是，他认为，父亲将折辱他？

我不想隐瞒，这是耻辱，我不想这样。这事错就错在我的朋友们身上，错在那些想出卖我的农民们身上。他们不知道我是谁。这一点我没有对他们讲。他们认为，由于我他们会遭到射击的。

他的同志们是妨碍他干什么了呢，还是参与了使他被俘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罪过的，他们支持农民。农民们说："走开"。我不过是走进了小屋里。他们又喊："马上走开，否则我们就告发你！"他们已经开始威胁我了。他们非常惊慌。我对他们说，他们也应该离开。但是已经晚了，我反正是会被抓住的。出路是没有的。总之，人应该斗争到哪怕还有最后一点可能性的时候，但是在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时候，那……一位农妇干脆就哭开了，她说，他们会杀了她的孩子，烧了她的房子。

他被俘后，我们对他是好呢，还是他想申诉一些什么？或者目前他已经坚信，我们对待所有的俘虏都像对待他一样？

不，对我很好。我没什么要说的。人们喜欢我的靴子，但我不生气。要知道，这最终还是要成为战利品的，我没有什么要申诉的。

但要知道，是他自己脱下了自己的东西？

是的，但靴子是他们从我脚上扒掉的。

可能他们只是想搜查搜查，看看靴子里有没有武器？

不，不是"可能"，而是准确地说，靴子是被他们夺去的。

在穿别人的裤子时，他不是应该自己脱掉靴子吗？

不，当我到这里投降做俘虏时，我穿着农民的衣服和我的靴

子，但第二天早晨，靴子就被没收了。我有点儿不高兴，不过我也没那么生气。既然拿走了，就拿走吧。

现在他穿的是什么？

他们给了我这双靴子，自然，是比较差的，但对于我来说，这已经很好了。因为可以不用光脚。

但他说过，得到了一些好的东西。

很多很多！

他是否知道，红色政府散发了很多传单。他是否认为，这些传单能促使德国士兵转到红色政府一边，转到红军一边？

如果我也向你们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的传单在红军中是否会获得成功呢？（我恳求你们不要给我照相）。

为什么他不愿意照相呢？也可能他认为：相片会被刊登？

照相总是极难看的装腔作势。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照相总是需要摆出漂亮的姿势。我这么说不是因为这个，而是我不喜欢。总之，我不喜欢照相。

红军打了败仗给士兵和军官们留下了什么印象？

自然，这降低了士气，这是不愉快的事。

也可能他知道红军已经损失的飞机的数量？

不知道。

超过了7000架！

那你们损失多少架呢？

我们损失不超过200架。

请原谅，我不相信这一点。

难道他没有看到在机场上被击毁的俄国飞机吗？

边界线上情况怎样我没有看见。我们是在维捷布斯克—里亚斯诺沃战线作战，在这里我没有看见。

他是否非常相信红军空军的残余部队？没有一架飞机飞到这

里。

你们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些剩余部队，但坦白地说，我相信他们。

是的，但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开始的时候让人打个半死，然后又说，我还有力量呢。要知道，这多少有些不寻常。

正确，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总是不能让人相信。

请对他说，他将在隔壁的房间过夜，早晨将继续出发。

好吧，请允许我问一下，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去？

他将被安置到军官战俘营去，因为他是军官。也可能他想给家里人写信问候一下，他的信要比通过日内瓦红十字会更快地到达。或者也可能他认为，他的妻子已经同红色政府一起逃跑了？

有可能，有可能。

他是否认为，他的父亲会把他的妻子带在身边？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他不想给妻子写几行字吗？

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关照，但暂时还没有这个必要。

还有一个问题，少校先生！他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很多他以前在苏联听说的和看到的，实际上完全是另一回事，还有很多——坦白地说——是欺骗。

请允许我晚些时候再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还不想回答。

很困难的问题，不是吗？很多成了俘虏的指挥员，其中还包括高级军官，都说他们仿佛恍然大悟，现在他们才看清楚，整个制度将把他们带到何方。

大尉　列乌施莱

1941 年 7 月 18 日

№07745

米纳西扬少校关于雅·约·朱加施维里的证明材料

（1945年3月12日）

巴黎市第16区阿贝尔将军街4号

证　　明

致苏联人民委员会遣返侨居西欧的苏联公民全权代表处

炮兵大尉雅科夫·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苏联元帅斯大林同志的儿子）是同我一起被关押在南巴伐利亚的小城戈麦尔堡附近的。那是个国际战俘营，分别关押着苏联军官、法国军官、英国军官和比利时军官。这个战俘营里关押了27名苏联将军和一大批工农红军的高级指挥员。

雅科夫·朱加施维里是于1942年4月被关进这个战俘营的，并在这里一直关押到1942年6月，此后被转到什么地方我就不清楚了。苏联军官中很多人都认识雅沙·朱加施维里本人。在戈麦尔堡战俘营的短暂时间里，他表现得非常坚强，他用苏联军官的勇敢和毫不动摇的行动证明了他不愧是他的伟大父亲——元帅斯大林同志的儿子。他同其他的苏联军官一样，每天得到150克水煮的“口粮”，一天一次不加任何调料的大头菜汤。

德国人利用他的特长，让他在战俘营内干活。他做骨雕工作，

用马的骨头雕刻出各种小人、象棋、烟斗等等。

每天都有法西斯报纸的摄影记者和盖世太保来向雅沙施加压力，逼迫雅沙说出他们需要的情报，但每一次都遭到了雅沙坚决的拒绝："我热爱我的祖国，我任何时候都不会说它的坏话!"——这就是雅沙的回答。德国人给雅沙·朱加施维里穿上了"迷彩服"，在他的红军制服上有12个地方用各种颜色写着大写的字母"S.U."①。

苏联第一游击团参谋长 少校

（米纳西扬）

1945年3月12日

确认：国外工作处处长费拉托夫上校

① 英文"苏联"的缩写。

№07748

谢罗夫致克鲁格洛夫[①]

（1946年9月16日）

绝密

办事员不能拆开

致苏联内务部长

上将С. Н. 克鲁格洛夫同志亲收

柏林市

内务部柏林行动处于今年7月10日逮捕了德国中央集团军总部第一处的工作人员帕乌尔·根斯戈尔。

在对他进行审讯时，他供认：1941年他以翻译的身份参加了在鲍里索夫市对炮兵上尉雅可夫·朱加施维里的审讯。审讯是由第一处的上尉军官、帝国保安总局第5处工作人员舒尔茨博士主持的。审讯结束后朱加施维里被送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后来我们又确认，1945年美国人逮捕了至少15个以上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向他们提出请求，将这些被逮捕的德国人转交给我们，以便继续调查，因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我们的占领区内。美国人将这些被逮捕的人转交给我们了，这些人中包括党卫军上校、集中营警备司令卡因特尔和党卫军中校、警备营营长韦格纳。

---

① 此件由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于1946年9月24日呈送斯大林。

为了核查根斯戈尔的供词，审讯了原党卫军“死神”师警备营营长古斯塔夫·韦格纳。古斯塔夫·韦格纳，1905年生，受过高级警官教育，1939年起为法西斯党党员。

在审讯时，古斯塔夫·韦格纳证明，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有一个特别集中营“A”。在这个集中营里关押了一些苏联红军、英国军队和希腊军队的将军和高级军官。

1943年3月的一天，当韦格纳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司令官党卫军上校卡因特尔一起巡视特别集中营“A”时，卡因特尔提醒他注意2号牢房并说，今天将从集中营的监狱押送两名上尉军官到这个牢房，其中一名是斯大林的儿子，一名是莫洛托夫的亲属。

同时，他还命令韦格纳在牢房里用俄文写上战俘的行为规章。

第二天，2号牢房果然押送来了别索诺夫将军，两名中校和上尉雅可夫·朱加施维里和科科林。别索诺夫少将曾是德国人在波兹南市开办的培训少年破坏者的学校的负责人，目前已被逮捕，关押在莫斯科。

接着，韦格纳去了几次2号牢房，并问上尉朱加施维里，他对集中营警备司令部有什么请求。朱加施维里除了要一些他所感兴趣的反映前线形势的报纸以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请求。他从来没有说出自己的姓是朱加施维里。他总是表现得很独立，对集中营管理当局总是带有几分轻蔑的态度。

接着，韦格纳又证明说，1943年底他才知道，朱加施维里是在“企图逃跑的情况下”被值班哨兵开枪打死的。但枪杀的细节韦格纳似乎不知道，因为这件事的调查是根据希姆莱的指示进行的。

根据这些证词，我们审讯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司令官卡因特尔。卡因特尔，党卫军上校，1937年起为法西斯党党员。他证实说，实际上朱加施维里上尉被关在集中营监狱里3个星期，后来，根据希姆莱的命令，把他转到特别集中营“A”中。这个特别集中

营共有3个牢房，被用石墙隔离，在离墙两米的地方还设有三道铁丝网，其中的一道还有高压电流。

正如卡因特尔所说的那样，他每周都要去2号牢房，并对那里关押的人很感兴趣。

根据希姆莱所布置的任务，别索诺夫将军编写了按照德国的原则改组俄罗斯的草案。卡因特尔这才知道，别索诺夫和两名中校军官都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他们在德国人的领导下进行瓦解红军的工作已经有一年多了，但不知犯了什么过失，因此被关进了集中营。

上尉朱加施维里表现得很孤僻，他从不与任何人交谈，其中包括别索诺夫将军。他没有向集中营管理当局提出过任何请求，但是，对前线的形势特别感兴趣。

有一次，根据朱加施维里的请求，卡因特尔除了报纸以外又给了他一张地图，上面标有红军和德军的位置。朱加施维里长久地，并很仔细地看这张地图。

关于朱加施维里被枪杀的情况，卡因特尔证明说，1943年底，上尉军官朱加施维里是在下述情形下被值班哨兵开枪打死的：

2号牢房的犯人在牢房附近放风。晚上7点钟的时候，负责监视犯人的党卫军分子容克林格命令犯人们回牢房去，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朱加施维里没有走，他要求见集中营的警备司令。党卫军分子容克林格重复了自己的命令，但朱加施维里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当时，党卫军分子说，他去给警备司令卡因特尔打电话。在电话交谈时，容克林格对卡因特尔说，他听到了枪声，接着，就挂断了电话。正如卡因特尔证明的那样，这时发生了下列情况：

朱加施维里若有所思地越过了通向铁丝网的中间地带。值班哨兵举起了枪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并喊到："站住"。朱加施维里还继续向前走。值班哨兵又喊到；"我要开枪了"。

在喊声之后，朱加施维里开始骂了起来，并用双手抓住制服，

撕破了衣领，露出了胸膛，向哨兵喊到："开枪吧"。值班哨兵向他的头部开了枪，朱加施维里被打死了。

在审讯时，犯人卡因特尔证明哨兵是向朱加施维里开了枪，并补充说，朱加施维里在哨兵开枪的同时抓住了带有高压电的铁丝网并立即跌倒在前两排带刺的铁丝上。

在接到希姆莱的命令，将尸体取下、运往集中营的火葬场进行检查之前，根据卡因特尔的指示，被击毙了的朱加施维里一直躺在那里长达 24 个小时。然后，帝国安全机构派了两名教授来到火葬场，他们做出了一份书面材料：朱加施维里先是被高压电流击死，此后头部才遭到枪击。与此同时，文件里还写到：根据条例，值班哨兵的行动是正确的。

在教授们做出结论后，朱加施维里的尸体在火葬场被火化了，骨灰安放在骨灰盒里，并与死亡调查文件一起被送到了帝国安全总局。

正如卡因特尔证明的那样，在调查期间，他很担心此事引起希姆莱的不快，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

为了证明卡因特尔的有关枪杀朱加施维里证明材料的准确性，要求他描绘一下朱加施维里的外貌特征。

卡因特尔清楚地记得朱加施维里的外貌并进行了正确的描述。

除此而外，还出示了从德国杂志上剪下的朱加施维里的照片，卡因特尔立即就指出了照片上的朱加施维里。

因此，卡因特尔关于 1943 年朱加施维里被关押在他的集中营里并遭枪杀的证词是可信的。

卡因特尔还补充说，朱加施维里被高压电流击死是他编造出来的说法，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对朱加施维里遭枪击应负的责任。

我向卡因特尔提出这样的问题：战俘朱加施维里的个人档案存放在哪里？对此他回答说，档案曾存放在他的保险柜里，在德国投

降前夕，他命令副官将文件全部销毁了。

在调查过程中确认：集中营司令官、党卫军上校卡因特尔和党卫军警备营营长韦格纳中校，担心要为在集中营中所犯下的罪行负责，没有彻底交待事实。他们曾企图自杀，流露出要扑向哨兵、撞牢房的墙等等想法。

在从美国人那里接收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军的罪犯时，美国人要求让他们出庭，因此，对罪犯卡因特尔和韦格纳采取肉体上的惩处是完全不可能的。采取了一些间谍手段，在牢房内监视罪犯。

鉴于要将德国方面的业务工作转交国家安全部，这个问题的全部资料都将保存在柏林行动处。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伊·谢罗夫

1946年9月14日于柏林市 密件第001034号

【专题说明】

关于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

（1933年9月至1962年3月）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1921～1962）是斯大林与阿利卢耶娃所生的儿子。瓦西里在1938年至1941年间先后在卡恰航空学校和利佩茨克高级航空培训班学习。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歼击机大队长助理、歼击航空团团长、歼击航空师师长，曾击落敌机两架。1947年至1952年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3年4月被捕，被控滥用、侵吞和占有国家财产、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敌意攻击和散布反苏言论，于1955年9月被判8年监禁。1960年1月获提前释放，但同年4月又被关押，继续服刑。1961年刑满释放后被指定永久居住在喀山。1962年3月19日在喀山去世。本专题文件收集了与瓦西里有关的斯大林和其他人的书信、涉及瓦西里在学校、军校和军队中的表现以及他在斯大林逝世后情况的档案材料共35件。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付谦、王红翻译）

№07704

斯大林致叶菲莫夫[1]

（1933年9月12日）

叶菲莫夫同志！

保姆和斯维特兰娜已经返回了莫斯科。斯维特兰娜应尽快送到学校上学，否则，最后她会变得很孤僻的。请你和帕乌凯尔一起给她安置个学校。你们二人同保姆和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2] 商量并确定一下，安置在哪个学校。

保姆回来了，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应该去休假了。请你转告她：她应该去休息了，否则会损害健康的。如果她想来索契度假，请你为她准备一下行程。如果她不太愿意来索契，也可以去祖巴洛沃，并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是值得给予一切关心的。如果她希望带她的姐姐一块儿到祖巴洛沃，我也不反对。

在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休假期间，让保姆留在莫斯科的住宅里。好好看着瓦夏，别让他胡闹。不要放纵瓦夏，对他一定要严格要求。如果瓦夏不听保姆的话，或者惹她生气，你们就给我罚他。

等你的回信。

致敬！

约·斯大林

---

① 叶菲莫夫，祖巴洛沃别墅的警卫队长。

② 斯大林家的管家。

让瓦夏离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远点：她对他的有害的让步会惯坏他的。

约·斯

1933年9月12日

№07706

帕乌凯尔[1] 致斯大林

（1933年9月15日）

斯大林同志！

您的信9月14日收到了。今天，我同叶菲莫夫一起去了寓所。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暂时哪儿也不能去——她正在莫斯科治疗，在莫斯科市医院接受碳酸浴疗和按摩。她打算在疗程结束后，也就是在10月初到祖巴洛沃休息两周。这对她完全合适。保姆在路上又犯了咽喉炎，发高烧。现在已经好了，我想，再过两天就能完全恢复健康了。

我同瓦夏和他的老师（同每个人都是单独地）进行了严肃的谈话，谈话时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也在场。我提醒了瓦夏的一些毛病，并警告了他。他答应我从今天开始要好好表现。我建议老师不要包庇瓦夏的缺点，并劝告瓦夏不要同安娜·谢尔盖耶夫娜和外祖母在一起，一切事情可以对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讲，或者给我打电话。

最好是把瓦夏转到另一所学校去学习。第二十小学里有很多淘气散漫的学生。我的打算是转到比缅斯基巷（在特维尔大街上）的第二十五小学。那里要求非常严格，学科也很多。至于将他安置在哪个年级和班级——四年级还是五年级，要根据测验结果而定。

斯维特兰娜也可以安排在这所学校里，最好给她找一个家庭女

① 帕乌凯尔，K. B.，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的工作人员。

教师。今天我找到了一位，这位老师通晓德文、法文，自1919年起就是党员，单身，41岁，是一位很好的老师。她也能教瓦夏学习语言。

一切问题都请您给予同意。等待您的答复。

帕乌凯尔

莫斯科　1933年9月15日

№07707

帕乌凯尔致弗拉西克

（1933年9月23日）

1933年9月23日发自莫斯科

密码电报

致弗拉西克[①] 同志

马上询问一下对我的有关下列问题的信的答复：第一——关于瓦夏转到另一所学校的事；第二——关于接纳女家庭教师以及斯维特兰娜入学的事。

所有这些问题我已在信中请求给予同意。但是没有回音。时光在流逝。对我的这些建议应以电报或书信的方式给予同意。这些事情我自己不能作主。鉴于一系列情况必须给瓦夏立刻转学。请询问一下，是不是要等到你们回来再作决定。

帕乌凯尔

1933年9月23日

① 弗拉西克，H. C.，斯大林的警卫队长。斯大林在答复帕乌凯尔的电报中同意了他的建议。

№07708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3 年 10 月 1 日）

爸爸，你好！

我生活得还可以并且已经在另一所学校里学习了。这所学校非常好，所以我想我也会成为一个好的红色瓦西卡。

爸爸，给我写信，告诉我你生活得怎样，休息得好吗？斯维特兰娜生活得很好，她也上学了。

代表我们的劳动集体向你致敬。

红色瓦西卡

1933 年 10 月 1 日

№07711

瓦西里·斯大林致帕乌凯尔

（不晚于1934年6月16日）

您好，帕乌凯尔同志！

我生活得很好。我不再同托姆打架了。我吃得很多，食欲很好。如果您不是特别忙，请来我们这里做客吧。

帕乌凯尔同志，我恳求您给我送一瓶自来水笔用的墨水。

敬礼！

瓦　夏

№07712

瓦西里·斯大林致帕乌凯尔

（1934年6月16日）

您好，帕乌凯尔同志！

信和墨水都收到了。非常感谢。帕乌凯尔同志，您写信说我把中心人物惹得流眼泪，可我没有这么做过，我认为，从弗拉西克方面讲，这样指责我是不对的。叶菲莫夫同志已转告您，把猎枪给我捎来，但是我没有收到。可能您忘了这事，请给我捎来。

瓦　夏

№07716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4年9月14日）

你好，爸爸！

我生活得很好。你的信我收到了，谢谢。桃子非常甜，我差不多已经吃完了。在学校里，无论在学习方面，还是在体育方面，我都一切正常。我参加学校的足球和排球两个混合队，一切都正常。

敬礼

红色瓦西卡

1934年9月14日

№07718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4 年 9 月 26 日）

你好，爸爸！

我生活得还可以，去学校上课，总之，生活得很快乐。爸爸，我参加了学校的第一足球队，可每次我去踢球时，就这个问题总是要进行谈话，也就是说没有爸爸的允许任何事情都不准做。

请您给我写信，告诉我，我能否去踢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斯维特兰娜请叶菲莫夫给你捎去一封信，我没来得及，因此托济娜伊达·卡夫利洛夫娜将我的信给你带去。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你再给我寄一些桃子。

红色瓦西卡

1934 年 9 月 26 日

№07722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5年9月2日）

你好，爸爸！

你生活得怎样？我目前日子过得很好。我已经是第三天上学了。从今年开始学校将给我们全体学生记日志，在日志中将就每个问题和在班级的表现给我们打分。

关于新打的分数任何人也没对我们说什么。我和托姆相处很好。开始他很拘束，后来就正常了。再见！

你的瓦夏

1935年9月2日

№07724

叶菲莫夫致弗拉西克

（1935年9月22日）

您好，弗拉西克同志！

现将我们的工作情况向您通报。第一，斯维特兰娜和瓦夏身体都很健康，自我感觉也很好。

斯维特兰娜学习很好。瓦夏学习不好——懒惰，校长已经给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打了三次电话，说瓦夏有一天没上化学课，过了几天又借口说没有准备好功课而拒绝上地理课。笔记本的书面作业是用各种颜色的墨水写的，一会儿是黑色，一会儿是蓝色，一会儿是红色，而学校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在学校里他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忘记带作业本，就是忘记带钢笔，而另外一支钢笔不能用，这样就不做作业了。9月7日他根本就没去上学，说嗓子痛，可又不让医生看他的嗓子，体温也很正常。休息日也不做功课。依我看，他不去上学并不是因为咽喉病，而是因为没有完成作业，嗓子痛是他为了不去上学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瓦夏非常喜欢踢足球，经常是每隔一天放学后在学校踢足球，回到家已经不是下午3点钟，而是晚上6～7点钟，自然很疲倦，做功课就有点困难。况且，根据“斯·同志”的命令，我已经解雇了他的男家庭教师，而瓦夏和女家庭教师只是学习德文，其他学科他从不请教她，说他自己就可以完成。

9月17日又有两门课得分是“差”，而这种“差”的分数已经有5～6次了。

几天以前，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在瓦夏的衣袋里发现了10卢布，卡罗琳娜问他是哪里来的钱，瓦夏回答说，这不关她的事，然后又说，这是他卖集邮册的钱，还说这个集邮册是某个人送给他的礼物。

9月19日，他在一页纸上全部写上自己的名和姓，而在最后写的是："瓦夏·斯…（被写满了）生于1921年3月，死于1935年"。9月20日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将此事告诉了我。字条我没有看到，因为卡罗琳娜已经将字条销毁了。这张字条使我们产生了不好的感觉，是不是他已经打算干什么了？

我同他的关系经常是很好的，但有时他也任性。

在克里姆林宫还有托姆同他住在一起。每个假日孩子们都是在祖巴洛沃度过的。

总之，瓦夏感到自己是个成年人了，总是固执地要求别人按照他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想法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他有分歧。由于我给他讲道理和劝说，这些分歧现在差不多消除了。

向大家致敬

叶菲莫夫

1935年9月22日

№07725

斯大林致马尔特申[①]

（1938 年 6 月 8 日）

致马尔特申老师

您的关于瓦西里·斯大林的不良行为的信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的来信。

由于工作忙，耽误了给您回信，请原谅。

瓦西里，一个被惯坏的且天分一般的少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粗野型的），并不总是诚实的，喜欢恫吓软弱的“师长”，经常是厚颜无耻，意志薄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组织性。

各种各样的“干爹”和“干妈”有时过分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儿子”而把他宠坏了。

我很高兴，在您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有自尊心的老师，对待瓦夏能像对待所有的学生那样，并要求这个厚颜无耻的学生遵守学校的全部规定。瓦西里是被校长们惯坏了，就像您提到的那位。这些弱骨头的人，学校不是他们呆的地方。而如果说瓦夏这厚颜无耻的家伙还没有来得及毁掉自己，那么这是因为在我们国家里还有这样一些老师，他们不放纵这些纨绔子弟。

我的建议是：对瓦夏要更加严格地要求，不要害怕这任性的家伙以“自杀”来进行虚张声势的讹诈性的威胁。在这方面我将支持您。

---

① 马尔特申是瓦西里的老师。

很遗憾，我不可能亲自管教瓦西里。但是，我保证会时常过问他的情况。

敬礼

约·斯大林

1938年6月8日

№07726

马凯耶夫致约·维·斯大林

（1938年6月15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根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命令，免除了我所担任的主管教学的校长助理的职务。其主要原因实际上是关于培养和教育您的儿子瓦夏的问题。马尔特申同志致您的信和您的答复对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副教育人民委员利哈乔夫同志没有听取我的工作总结报告，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做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没有揭示在学校工作中和在培养教育瓦夏的过程中存在不足的真正原因。

在培养从第175中学转来的瓦夏时，存在着很多不正确的地方，比如阿谀奉承，关于这些瓦夏都毫不掩饰地向周围的人讲述过。曾决定要求瓦夏·斯大林、斯捷潘·米高扬、济姆尔·伏龙芝服从学校的规章制度，爱惜和保护他们，而不是迁就他们。最初，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个别的违纪现象很快就被消除了，例如上课的时候我让瓦夏到团支部书记的办公室向他提出意见，瓦夏立即就回到了班级；或者，得知济姆尔·伏龙芝表现不好，我就给伏罗希洛娃[①]同志打电话，以便让她对济姆尔施加影响。

上半学年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下半年开始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学校的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缺乏特种学校所应有的条件，而教育人民委员部对这个问题持

① 伏罗希洛娃，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伏罗希洛夫的妻子。伏龙芝去世后，他的儿子济姆尔的教育问题由伏罗希洛夫夫妇负责。

消极的态度。物质基础极端贫困，教学人员不足并经常流动。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学校同学生家庭的隔绝，这些学生都是一些重要工作人员的孩子，其中包括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孩子。

我特别关注学校同学生家庭缺乏联系的状况，并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瓦夏上课常常迟到，不完成家庭作业。我们就找他谈话，弄清原因。原来，他常常睡过头，很多时间是在运动场上度过的，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也无法对其施加影响，因为学校同他的家庭脱离了联系。与此同时也得到了您的命令：要给瓦夏制定第二本日记，详细记录他的遵守纪律情况和学习成绩，这一点不能让他本人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确认，您检查了日记，并用蓝色和红色铅笔进行了批改。但是，学校与家庭的这种联系方式是不正确的。

学校同济·伏龙芝的家庭联系也没有调整好。无处可以询问学生的情况，而校长又不允许召开家长会。当瓦夏成绩开始下降时，我同他一起在班主任参加的情况下制定了他的补课计划，但是瓦夏却躲避这些计划。没能弄清准确的原因，因为这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被召回，第二本日记也被中断了。

当瓦夏意识到学校对他已无力管束时，就越来越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了。团支部书记和校长都证实，瓦夏要求特殊的待遇，他可以对任何行为都不承担责任。这个学期末，他的行为举止已达到了粗暴的地步，特别是在对待历史老师B. B. 马尔特申的态度方面。关于学季成绩，历史课您已经知道了。有关情况通知了市教育局的学监克留科夫同志。指定由我对瓦夏进行历史课的春季考试，但却被校长取消了。后来，瓦夏又逃避了几次考试。一天下午近2点钟，他被我叫来参加俄语考试，而当他来到时，校长却放走了他。

6月8日或9日，我同团支部书记一起请求副教育人民委员利哈乔夫同志接见我们。利哈乔夫同志指定于6月11日接见我们，但接见却没能如期进行，因为这一天在《教师报》上出现了一则短讯《校长——蒙蔽者》，而对其中的具体情况并没进行详细的分析。

虽然做出了组织结论，但是，主要问题，即培养和教育瓦夏、济姆尔、斯捷潘以及其他学生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还没有建立学校同家庭的真正密切的联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正确引导，并使家庭与学校都能了解情况。

毫无疑问，只有当瓦夏作为优秀学生毕业时（他很有天赋，但是性格不稳定），老师才能感觉到有稳固的立足点，才能够排除遭到人民委员部处罚的可能性，这种处罚将把20年的教学工作变得毫无意义。

向您表示最深切的敬意

H. B. 马凯耶夫

1938年6月15日

№07727

马尔特申致斯大林

（不早于1938年7月5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借此机会向您表达您的回信给我带来的最深切的满足和喜悦的心情。

我不了解您本人，但是，我知道，您一定会给我回信的，并等待着。

您的回信——表达了天才特有的直率和朴实——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我可以说，我了解您本人了。请原谅我的不恰当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也是即兴这样写的。

您的信使我对一向很庸俗的风气和我的同事中一些庸俗的人的憎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中也包括那样一些人：当我多次建议向您报告瓦西里的情况时，他们反复强调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是无益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危险的！"或者"别说话！稳重是青年人的美德"。

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向您汇报瓦西里的历史课学习情况以及在您干预后他的情绪状况。

自今年6月13日起至7月5日，瓦西里是在我的指导下进行补课学习的，并有部分功课通过了我的考查。这对他今后的学习是一种刺激，同时也使我增强了逐步提高他的学习成绩的信心。考查一般持续一个小时或更长些。

结果我可以向您报告，瓦西里原来掌握的知识十分有限，不很

扎实，比较肤浅，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其中很多知识公式化和社会化。但是有一点很令我高兴，即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克服很多不足。应该承认，这一点也使我有理由在一年之内给他一个中等的评价。

请原谅我的啰嗦，但是，有一个现象我不能隐瞒您，这就是瓦西里一直感到痛苦，因为他使您生气了，您是他最真诚地爱着的人，也是最吸引他的人。

有一次在同我谈话时，他谈到了自己的感受。瓦西里对我说，为了恢复您对他的信任，为了能亲近您，他准备做任何事情。

我理解他的愿望。我的意见是：给予瓦西里一定的自由，即把有时是很伤他的自尊心的看管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要保证对他进行系统的、不易察觉的监督，看他是否辜负给予他的信任，这样瓦西里就能成为令人满意的人。

最后，我应该向您报告，我大概不能不辜负您给予我的信任。当写到指导瓦西里的学习和行为的问题时，我只能依靠您的支持，因为第二专业中学 1938～1939 年的教师名单中没有列入我的名字。

一千次的对不起

致敬！

您的 B. 马尔特申

№07728

贝利亚[①] 致斯大林

（1938年12月8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派去的那位同志将信转交给了卡恰航空学校的校长——旅级指挥员伊万诺夫同志。这位同志在当地已经了解到：学校的领导知道瓦夏要来后，为他做了特殊的安排，这种安排违反了学校现有的给学员规定的统一的条件。

瓦夏到达塞瓦斯托波尔的那天，学校政治委员、团级政治委员谢苗诺夫同志和特别处的工作人员都去了车站迎接他。在去学校的路上，瓦夏对谢苗诺夫同志说："今年爸爸要来塞瓦斯托波尔休假，大概顺便要到卡恰看看"。

没有将瓦夏安置在学员的宿舍里，而是安置在为客人准备的单独的小楼里，也就是所谓的学校宾馆。

在最初的日子里，伙食是在指挥员的食堂里专门为他准备的。有一次，瓦夏点的是东方菜，而当地的厨师没有人会做这道菜，于是就专门派人到塞瓦斯托波尔城里去打听怎样做这道菜。

瓦夏曾经有三四次乘坐学校领导提供的汽车到塞瓦斯托波尔和穆赫拉特卡，用高频电话与莫斯科的波斯克列贝舍夫[②] 同志和内

---

① 贝利亚，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1889～1953），时任联共（布）中央委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② 波斯克列贝舍夫，A. H.（1891～1966），1935至1953年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苏共中央主席团秘书。

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处通话。

今年 11 月 24 日，瓦夏和学校参谋长格拉西缅科在校园内骑摩托车。瓦夏跌了一跤，脸和手都擦破了皮。根据瓦夏的请求，格拉西缅科把这件事对学校领导隐瞒了几天。

在编队还没有装备好之前，有教员单独辅导瓦夏飞行方面的理论知识，学习《У－2》型飞机和《М－11》型马达的材料组成部分，以及飞行的规则。

我在给卡恰航空学校的校长伊万诺夫同志和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雅库舍夫同志的信中，已做了如下指示：

1）撤消不适宜的公开的警卫，为了保证瓦夏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应采取隐秘的保护措施。

2）对瓦夏的关心和照顾不应表现在给予他一些违反航空学校规章制度和内务条例的特殊待遇，而是应该帮助他很好地学习和掌握学校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遵守学习和生活纪律。

拉·贝利亚

1938 年 12 月 8 日

№07729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8年12月15日）

你好，亲爱的爸爸！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生活得很好。正在学习很多东西，目前还比较顺利。

我已经给自己找到了朋友——米沙·列宾，这是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小伙子。

我想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还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但是我想，没关系，最终我会被接受的。

总之，我生活得很好，很快乐。又增加了新学员，所有的人都是从莫斯科来的。一共15人。

我们这儿的天气又变坏了。北风刮得很厉害，目前的天气情况还可以飞行，我也在飞。

再见，爸爸！

你的瓦夏·斯大林

1938年12月15日

№07730

学员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的飞行训练鉴定

（1939 年 2 月 17 日）

政治思想状况：忠诚于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事业，忠诚于我们的祖国。非常关心国内外形势，并能很好地理解有关问题。是一名很好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参加支队的社会活动和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勇于进行自我批评，日常生活中与同学的交往稍嫌生硬。总的来说，与同学们能和睦相处，并享有较高的威信。

理论课学习效果良好。可以获得优秀的成绩，但不太重视理论学习，特别是学科系统知识的学习。喜欢“齐射”式的学习——一下子学完，而不是耐心刻苦的学习。对飞行非常感兴趣。热爱飞行。飞行技术掌握优秀，知识巩固，但不够重视驾驶技术中的“细节”，因此，在飞行中出现过几次偏航的现象。经过严厉和坚决的批评后，逐渐改正了缺点，在后来的飞行中没有出现过上述现象。

遵守军人纪律良好。在训练最初阶段有过违纪现象：飞行训练时迟到，未刮胡须就进行飞行，同队长吵嘴，并竭力用客观原因辩解上述错误等等。最近一段时间，纪律性明显提高了，并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缺点，愿意逐渐改正这些缺点。

喜欢特技飞行，自我感觉良好。飞行过程严谨。精力充沛、自如。飞行时主动性强，果断。飞行测验时稍显紧张。

对飞行中的不顺利反应过分敏感，情绪懊丧，特别是在已经较好掌握的飞行项目中若有不顺利时。

我认为，学员斯大林同志已具备独立飞行的能力。

至1939年2月3日为止已有的飞行经历：带飞——54次，19小时7分，测验飞行——12次，4小时20分。

总计——66次，23小时27分钟。

飞行员教官　上尉（卡·马连科夫）

1939年2月4日

同意飞行训练鉴定。学员斯大林同志已经具备独立飞行的能力。在训练期间曾犯过阑尾炎，须要进行适当的观察。

飞行考试中对着陆的掌握困难一些。

第三航空大队队长　少校（塔拉辛科）

确认无误

工农红军空军军事院校部部长　师长（列文）

1939年2月17日

№07733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39年11月13日）

卡恰城

你好，亲爱的父亲！

你身体好吗？

我的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还在学习，飞得也很好。看来我没有理解您的那封信。是斯维特鲁什卡弄错了，她对你说，我想节日前夕回到莫斯科，而你也允许我回去。

爸爸！在没有毕业之前，我不会回去的，尽管我也很想念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决定坚持，因为我认为，我毕业后再回去同你团聚，你才会高兴的，这样我也将会更高兴。我想，你会理解我并同意我的这种想法。这似乎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一切。

我们这里天气还好，不过，已经有点开始变坏了。这样，飞行就不得不减少了，但暂时还行。

这些就是关于我和卡恰的一切。

从克里米亚向你致以深深的敬意！

期望尽快见面。

你的瓦夏

1939年11月13日　卡恰

№07734

瓦·约·斯大林的毕业鉴定

（1940年3月25日）

副本

卡恰亚·费·米亚斯尼科夫红旗军事航空学校学员斯大林，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毕业鉴定

1921年生，格鲁吉亚人，学生。自1939年起为联共（布）预备党员。学历：普通中学。1938年12月加入工农红军。

政治思想状况：忠诚于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事业，忠诚于社会主义祖国。政治思想坚定，道德品质可靠。能够保守军事秘密。能够正确理解并且积极关心国际和国内形势。发展比较全面。在工作和政治方面，在同志中间享有较高的威信，积极参加部队的集体生活。精力充沛，富有创造精神，坚持不懈，对于已作出的决定能贯彻到底。作为分队长，对下属要求严格，关心下属的需求。有时在同上级指挥员谈话时态度有些生硬。本人遵守纪律；能够给其他人作出榜样，愿意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其他同志，理论知识成绩优秀。驾驶技术成绩优秀。更感兴趣的是各个学科的实践课，对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重视不足。密封驾驶室飞行和领航飞行掌握良好，有氧高度飞行优秀，编队飞行优秀。热爱飞行，但对飞行前的准备工作不够细心，必须对飞行前的准备进行监督。身体状况良好。队列训练成绩优秀。

根据本人素质和飞行素质，可作为歼击机飞行员，为歼击机部

队所使用，有资格被授予中尉军衔，因为所有的科目和驾驶技术成绩均为优秀。

飞行教练　大尉（马连科夫）

瓦·斯大林已看过鉴定

1940 年 3 月 21 日

上一级首长的结论：

同意鉴定。

支队长　大尉（斯留萨连科）

1940 年 3 月 22 日

鉴定委员会结论：

鉴于所有的理论和飞行科目的成绩均为优秀，可以毕业。

有资格被授予中尉军衔，并任命为歼击部队 И－15 飞机的飞行员。

第二飞行大队指挥员

少校 科罗勃科

第二飞行大队政委

主任政治指导员　米亚斯尼科夫

1940 年 3 月 23 日

学校首长和军事委员会的结论：

对飞行事业有兴趣。飞行技术成绩优秀，热爱飞行。学习过的理论科目成绩优秀。可以作为初级飞行员在歼击机部队服役，并授予中尉军衔。

临时代理的学校领导　上校　里亚勃钦科

学校军事委员　团级政委　谢苗诺夫

1940年3月25日

正本确认：

红军空军第三管理局第一处处长　上校（签字）

№07735

瓦·约·斯大林的党员鉴定书

（1940年3月29日）

副本

自1939年起为联共（布）预备党员的斯大林·瓦西里·约瑟夫维奇的党员鉴定书

政治思想方面发展良好。对于国际事件和国内生活的一些问题理解正确。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国家考试成绩优秀。意识形态严谨，道德品质可靠。积极参加党的生活。忠诚于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事业，忠诚于社会主义祖国。

曾获哈尔科夫军区军事委员会和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书面嘉奖。

经第二航空大队基层党组织全体大会核准。1940年3月23日第六号记录。

党支部书记——布雷金

正本确认：

红军空军第三管理局第一处处长　上校（萨托夫尼科夫）

1940年3月29日

№07738

瓦西里·斯大林致约·维·斯大林

(1941年3月4日)

你好，亲爱的父亲!

你的身体好吗? 感觉如何?

不久以前（22号，23号，24号的半天)，奉雷恰戈夫[①]的召唤我到了莫斯科，我非常想见到你，但他们对我说，你正忙着不能见我。

雷恰可夫召我来是因为学习的事情。我们这里又不让我飞行了。他们担心出什么事儿。他召我来并狠狠地训斥了我，因为我认为与其学习理论知识，还不如去飞行，并向领导证明必须飞行。他还命令我把这次被召见和谈话之事向你汇报，但是，我没有见到你。

雷恰戈夫到底还是下了命令准许我飞行，别人飞多少次，我就飞多少次。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已经有2个月没有飞行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我就不得不重新学习飞行了。

总之，班里的全体学员都期待着能飞得更多些。

在柳别尔齐[②]和其他一些部队都使用了新型的飞机，如：米格，雅克，拉克，而在我们训练队，航空大队的指挥员们还都在使

① 雷恰戈夫，П.В.，空军中将，红军空军司令员。1941年3月被任命为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同年4月被免去一切职务。

② 苏联莫斯科州的一个城市，铁路枢纽。

用老式的、看了都让人可怕的飞机。绝大部分飞机是伊－15。

真弄不明白，今后我们将去指挥谁。要知道，6月份前绝大部分部队都将装备新的飞机，而我们，航空大队未来的指挥官们，对这些新的飞机一点儿概念都没有，因为我们还在驾驶着老式的飞机。在伊－16型飞机上，我们仍然使用以前的M－63和M－62发动机。我的意见是最好教我们使用105和35型发动机和雅克、米格飞机，因为我们到部队时将不再飞伊－15和伊－16飞机了。而一个指挥员如果不了解新装备，他就无法指挥使用这些装备的飞行员。

学员们都收到了部队同志们的来信，说实在的，大家都很遗憾没有在部队里，现在，学员们并非愿意使用这些旧飞机，而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聚集在这里的人们都飞过1000至2000个小时，差不多都是勋章获得者。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当有了更好的新型飞机时，他们自然不愿再使用这些旧式飞机，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我反正使用什么样的飞机都一样，因为我实践经验还很少。他们当然是想要新型的了。

同时还有这样的情形：这些老式飞机不能保证顺利地完成飞行。比如：大灯脱落，机翼机枪的电刷脱落。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很少能顺利结束。能应付飞行只是因为驾驶这些老式飞机的是一些特别有经验的飞行员。

父亲，关于我和训练队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些。

父亲，如果有时间，请给我回信，那怕一行字也好，这对我来说将是最大的快乐，因为我非常想念你。

你的瓦夏

1941年3月4日

№07740

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秘书处关于瓦西里·斯大林去前线的事宜致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部的报告

（1941年8月26日）

致联共（布）中央干部部部长

西林同志（亲收）

兹报告：在您电话询问关于父亲是否同意瓦·约·伊万诺夫[①]同志出差的事宜后，我给工农红军空军管理总局副参谋长、上校别利亚耶夫同志打了电话，他通报我说，父亲同意，并说关于这一点好像是伊万诺夫同志亲口对他讲的，日加列夫[②]同志也向他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给您的报告。

我同上校别利亚耶夫同志电话交谈时，中尉叶菲缅科同志在场，他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潘诺夫

1941年8月26日

① 即瓦西里·斯大林。

② 日加列夫，巴维尔·费奥多罗维奇（1900～1963），时任苏联红军空军司令员，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

№07742

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
对瓦·约·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所做的鉴定

（1943 年 4 月 4 日）

保密

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局副局长、3 级国家安全委员

H．C．弗拉西克同志

关于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上校健康状况的鉴定书

瓦·约·斯大林同志由于被弹片炸伤，于 43 年 4 月 4 日被送到克里姆林宫的医院里①。

左腮受了伤，里面有小的金属碎片，左脚掌受伤，骨头被损坏并有大块的金属碎片在里面。

43 年 4 月 4 日的 14 点钟，在全麻醉的状态下，A．Д．奥奇金教授给他做了受损的软组织切除和清除金属碎片的手术。

脚掌的伤势很严重。

鉴于伤口已受到感染，注射了抗破伤风血清和抗坏疽的血清。

伤员的基本状况还算可以。

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

布萨洛夫

① 在此前不久由瓦西里组织的一次捕鱼活动中，用来震鱼的一发航空炮弹意外爆炸，一名军事工程师当场死亡，瓦西里和一名飞行员受伤。

№07743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1943年5月26日）

致红军空军司令员

空军元帅诺维科夫[①] 同志

我命令：

1）立即免除上校瓦·约·斯大林的航空兵团团长职务，在没有得到我的命令之前不许给他任何指挥职务。

2）向该团和该团原团长斯大林上校宣布：斯大林上校由于酗酒和放纵自己，以及腐化和败坏该团风气而被免除团长的职务。

3）报告执行情况。

国防人民委员　约·斯大林

1943年5月26日

① 诺维科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1900～1976），1942～1946年任红军空军司令员。

№07746

获苏沃洛夫勋章的第286涅仁斯基红旗歼击航空师师长近卫军上校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截至1945年6月的鉴定书

（1945年7月20日）

1921年生，格鲁吉亚人，1940年起为联共（布）党员。学历：普通教育——10年，军事教育——1940年在卡恰阿·弗·米亚斯尼科夫红旗航空军事学校培训班学习，1941年在空军乌克兰歼击航空学院一年级学习，1943年没有毕业。无政治学历。1938年起参加红军，并在空军服役。在卫国战争前线参战3年零9个月，1938年起成为干部军官。1940年初次获得军衔。健康状况较差：双脚、椎骨都有毛病，特别是在工作量大、过于疲劳时，神经系统就会不适。卫国战争以前在红军空军总局任飞行技术教练员。曾于1942年被授予红旗勋章，1943年被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1944年被授予红旗勋章，1945年被授予二级苏沃洛夫勋章，1942年荣获“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奖章，没有受伤。自1945年2月起担任领导职务。

鉴定书文本

驾驶过的飞机：波－2，教练机－2，伊－15，伊－5，伊－153，利－2，伊－4，米格－3，拉格－3，雅克－1，雅克－5，雅克－7，雅克－9，伊尔－2，波斯顿－3，特斯－3，拉－5，拉－7，飞行总时间——3145小时45分。在卫国战争期间共进行战斗飞行27次，空战中击落2架敌机。

自1941年6月22日赴前线参加卫国战争，任红军空军歼击航空

大队队长助理，后任歼击航空兵团团长。航空兵团在斯大林的指挥下，由于顺利地完成战斗任务，不止一次地受到最高统帅部的嘉奖。

自1944年5月1日起担任红军近卫歼击航空学院飞行技术教练员，此后，担任第三近卫歼击师师长。

该师在斯大林同志的指挥下，参加了解放下列城市的战斗行动：明斯克，维尔诺，利达，格罗德诺，波涅维日，沙乌良义和叶尔加瓦，在这些地区共进行了1781架次的战斗飞行，进行了30次空战，击落敌机16架。

在进行战斗行动的同时，对没有经验的新飞行员进行了战术训练。该师的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好。

1945年2月，斯大林同志被任命为第286歼击航空师师长。在进行柏林战役的准备期间，部队又增加了50架“拉－7”[①]飞机，装备一个团。

在重新学习新技术期间，斯大林同志亲自进行了11次训练练习飞行，顺利地完成了重新学习的任务，并把全团训练好使其能进行“拉－7”飞机的战斗飞行任务。

在柏林战役期间，该师的各部队顺利地进行了961次战斗飞行，进行了15次空战，共击落了15架敌机，其中有11架是战役开始的第一天击毁的，而自己只损失了1个机组。

斯大林同志本人具有很高的组织才能，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他还将自己的战斗经验传授给了下属。

在工作中，他精力充沛，富有创造精神，并要求下属具有这些素养。执行命令准确无误。

空军第16军军长　空军上将　鲁坚科

① 由设计师C. A. 拉沃奇金设计的一种飞机。

确认：

莫斯科军区空军干部处主任　中校（库采罗）

№07751

叶戈洛夫致斯大林

（1950年12月9日）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亲收！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您报告一下瓦西里·约瑟夫维奇的健康状况。

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患有神经衰弱、慢性胃粘膜炎和贫血等疾病。上述疾病是由于长期严重酗酒所造成的。

今年11月16日（大约是夜里1点钟左右，正在家里看电影时）瓦西里·约瑟夫维奇突然癫痫病发作，当时完全失去了知觉，全身痉挛，并咬伤了舌头，满嘴吐白沫。

第二天，瓦西里·约瑟夫维奇被安置在巴尔维哈疗养所，一直到11月26日才稳定了病情。在这一段时间里，瓦西里·约瑟夫维奇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他体重增加，食欲改善，睡眠好了，神经系统的兴奋现象也减少了。

遗憾的是，在最近的7～10天里，瓦西里·约瑟夫维奇又重新开始大量地饮酒，结果是又出现了严重的中毒症状（厌食、消瘦、神经常常出现兴奋现象、睡眠不好）。

医生劝告并要求他戒酒，可是没有任何作用。我恳求您给予协助。

我认为最好是让瓦西里·约瑟夫维奇在巴尔维哈疗养所多住一些时间（不少于2个月）。在疗养所里可以顺利地帮助他恢复健康。可是一出院，由于瓦西里·约瑟夫维奇严重违反了一般的规定，又

重新开始严重酗酒，因此他的身体很快又垮了。

克里姆林宫医疗保健管理局

局长　　П. 叶戈洛夫

1950 年 12 月 9 日

№07755

对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的审讯记录

（1953年5月9日至11日）

瓦·约·斯大林，1921年生于莫斯科市，格鲁吉亚人，苏共党员，原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

问：在以前的几次审讯中您已承认，在担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和司令员期间，曾经非法地使用了公款。

您的证词是否真实呢？

答：是的，是真实的。我是自1947年到1952年期间担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和司令员的，在此期间，我的确挥霍了国家的财产，并且非法地使用了公款，这给苏维埃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

同时，我不否认，我的一些违法的指示和行为可以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问：侦查部门已经获得的资料证明，您滥用职权，并且侵吞了国家的财产和公款。

对此您承认吗？

答：我不能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有罪的，因为我并没有为了中饱私囊而侵吞国家的财产和公款。

我打算如实交待我的全部罪行。1948年我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上任之后，我就着手对空军拨给军区司令部办公用的中央机场大楼进行重新装修，为此花了几百万卢布，确切的数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根据我的指示，这些钱大部分是用于大楼过分

豪华的装修以及在德国订做价格昂贵的办公家具上面。

1951 年 11 月，我计划在中央机场建造一个长度为 50 米的游泳池，并且已经开始施工了。这项工程已经耗费资金 4 百万卢布。

问：建造这座游泳池有什么必要性呢？

答：建造这座游泳池供莫斯科军区空军的军人们使用，毫无疑问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这项工程没有预算拨款，它是在未经军事部[①] 许可的情况下开工的。因为很快就弄清楚了，要完成这项工程还需要 450 万卢布，而莫斯科军区空军是没有这笔钱的。我也知道，军事部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而给我们拨款的。建造游泳池的工程就这样“停止”了，而投入到工程里的巨额资金也呆滞了。

但是，有一点必须说清楚，我之所以要搞这项工程，是因为目前在莫斯科还没有一个可进行奥林匹克比赛的 50 米长的游泳池。

问：明显没有说服力的解释。莫斯科军区空军对这些运动设施持什么样的态度？

答：无可争议，我所做的并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自然，也没有任何人责成我建造游泳池。激励我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和我同居的游泳健将瓦西里耶娃·卡皮托林娜。瓦西里耶娃为了对自己有利，怂恿我去建造这个游泳池，而我也认为我能以此获得声望，就给自己确定了目标，一定实现这个计划。游泳池建在中央机场的一个飞机库旁，没有任何核准的技术方案和预算。只是在工程开工后，即 1951 年末，我才决定向军事部申请游泳池工程项目的拨款。1951 年 11 月，我向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申请建造游泳池的经费，我欺骗他说，是父亲委托我组织空军体育工作的。起先，华西列夫斯基批准拨给这项工程 70 万卢布，而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又

① 1950 年 2 月，原苏联武装力量部分为军事部和海军部；1953 年 3 月，这两个部合并为苏联国防部。

于1952年1月底批准增补150万卢布。正如我上面所交待的那样，这项工程到1952年8月，也就是我被撤职的前夕，还没有完成，游泳池工地的工作仍处于开工阶段。

除了游泳池设施以外，我还搞了一些其他的建设项目。

问：具体有哪些项目呢?

答：1950年，根据我的命令，在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区的文化休息公园里开始修建莫斯科军区空军军官之家的所谓“运动中心”。在得到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对这项工程的许可后，通过前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和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格·米·波波夫，把文化休息公园征用为建筑工地，因此，这个公园被关闭了，停止对劳动者开放。

别洛科斯科夫上将[1] 也支持我建设“运动中心”的倡议，并且建议我使用在德国拆除的飞机库作“运动中心”房屋的构架。飞机库的金属框架从德国运到了莫斯科。这项工作也浪费了许多时间和金钱。终于将德国的飞机库骨架运到了莫斯科之后，我们又为卸车、运送到工地以及现场安装费了很大的劲，因为，无论是在我们空军，还是在军事部，都没有这样大型的起重机，能把飞机库的所有金属构件都吊起来。

1952年，这项工程也“搁浅”了，因为我们没有资金继续施工了。据我所知，这项工程已经耗资500多万卢布了。

在这件事情上我的错误还在于：我占用了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区劳动人民最喜欢的休息场所——文化休息公园，拆除了影剧院，破坏了这里的绿色植被，而“运动中心”又没能建立起来，我这是“占着茅房不拉屎”。

---

① 别洛科斯科夫，瓦西里·叶弗拉姆比耶维奇（1898～1961），苏军上将，时任苏联军事部副部长。

我还将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批准的150万卢布用于在库尔基诺建筑了一座二层楼的检查站，为的是观察参加莫斯科的空军阅兵式的飞机通过情况，而这在当时是没有任何实际需要的。

问：调查资料表明，您不仅仅是在这些“建筑”项目上非法地使用了国家资金。

请交代一下这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已经交代过了，我利用职权，忽视苏联法律，欺骗军事部领导，将国家大量的资金挥霍在那些对于我所负责的军队部门的战斗训练没有任何必要的措施上。

除此而外，我的一系列不体面的行为，如酗酒、同下属乱搞男女关系等传播得很广的丑闻，事实上使我作为军区（空军）司令威信扫地。我将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体育活动上，这使我不能及时解决我所负责的军事部门在提高战斗和政治素质方面存在的迫切问题。我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根据我的命令成立的莫斯科军区空军体育运动队上，而运动队的开销主要是由划拨给莫斯科军区空军的用于部队进行战斗和体质训练的款项来支付的。

1947～1949年期间，莫斯科军区空军成立了几乎囊括所有运动项目的健将队：马术队、冰球队、摩托车队、滑冰队、自行车队、篮球队、体操队、游泳队、水球队。此外，我还接收了从苏联空军转来的足球队。这些运动队共有300人，每年的开支超过500万卢布。

由于组建了马术队和摩托车队，我下令用莫斯科军区空军的资金改建了中央机场的3个飞机库，其中的一个装备成训马场，另外一个作为马厩，而第三个被改建成为摩托车－自行车基地。在这些项目上又非法地挥霍了国家的大笔资金，具体的数字我记不清了。

问：您建立的这些运动队是由莫斯科军区空军的军人组成的吗？

答：不是。在这些运动队里没有军区空军的军人。这些运动队都是由职业运动员和运动健将组成的，他们都是根据我的指示，用各种不合法的手段从其他的运动队吸引过来的。

比如，1951年，根据我的指示，命令塔林市的游泳教练马卡洛娃说服爱沙尼亚的游泳运动员普兰格尔和米亚吉转到莫斯科军区空军游泳队来。

我委托马卡洛娃向普兰格尔和米亚基保证付给他们高工资，并在莫斯科给他们提供住房。马卡洛娃出色地完成了我的命令，并把普兰格尔和米亚吉带到了莫斯科。1952年，普兰格尔和米亚吉代表莫斯科军区空军参加了比赛，而我也兑现了答应过他们的条件。这样，我成功地加强了我的游泳队。

采用这种无疑是腐化运动员的方法，我还从“斯巴达克”自由运动团体中拉拢到了一些运动健将，如：诺维科夫、齐克门特和塔拉索夫等人，使他们加入莫斯科军区空军运动队，并提供给他们住房，授予他们军衔。

通过提供住房这种方法，我甚至成功地将功勋运动健将、自行车运动员、以前曾是“狄纳莫”运动协会的成员塔拉奇科夫拉拢过来，并使其加入莫斯科军区空军运动队。

我还积极参与将 Н. П. 斯塔罗斯金安置在莫斯科军区空军工作。为了拉拢他，我不仅用莫斯科军区空军运动队的钱非法地支付斯塔罗斯金夫妻的工资，而且还采取超越法律的手段为斯塔罗斯金在莫斯科登记户口，尽管我也知道，斯塔罗斯金被指控犯有反对苏联的罪行，他是无权住在莫斯科的。

虽然有我的干涉，民警机关仍然拒绝给斯塔罗斯金登记，于是我建议我的副官波良斯基把斯塔罗斯金从莫斯科送到莫斯科军区空军的狩猎场。

但是，没过多久，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又在莫斯科斯塔罗斯金妻

子的住宅里发现了他。斯塔罗斯金被要求立即离开莫斯科。

当我得知，斯塔罗斯金已经离开莫斯科时，我就让莫斯科军区空军反间谍处原处长戈洛瓦诺夫和我的副官波良斯基乘飞机追赶斯塔罗斯金乘坐的火车，并将他带到我的寓所。他们完成了我交给的任务。

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运动队对于提高空军莫斯科军区官兵们的战斗和体能训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答：没有任何意义。问题主要在于，我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试图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才决定从事“体育活动”的。我将主要精力用于这项“事业”上，没有考虑到国家资金的损失。为了将其他运动团体的最佳运动员吸引到莫斯科军区空军运动队来，根据我的命令，给他们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

根据我的命令，莫斯科军区空军运动队的队员都被列入空军干部编制，授予他们军衔，按提高了的标准发给他们工资。除此之外，还发给运动员奖金和莫斯科军区空军军人的制服，优先向他们提供住房和疗养机会。显然，我的这些做法削弱了首都其他运动团体的力量，因为吸引到莫斯科军区空军运动队中来的都是这些运动团体最好的运动员。同时，给他们提供的优厚物质条件使他们逐渐堕落了。自然，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飞行军官和飞行技术人员的不满，因为给运动员的这些优厚的物质条件都是用他们的费用支付的。

问：是不是只有运动员才能享受如您所说的“特殊的物质条件”？

答：我不能否认，在支付运动队的开销方面我还有其他的滥用国家资金的行为。一些实际上同运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被算作运动队的教练员和训练员，用莫斯科军区空军的经费付给他们工

资，而这些人实际上只为我个人服务。

例如：我的副官达加耶夫中校是作为马术运动队的教练员登记的，我的副官卡别尔金少校和库普佐夫大尉是作为冰球队和体操队一级教练员的身份领取工资的。

1950年，我又将H．B．叶夫谢耶夫编为冰球队的二级教练员，而他实际上只是我的别墅的保安人员。

我孩子的老师K．И．诺维科娃和M．И．阿夫古斯托夫斯卡娅也是用运动队的经费支付的。

从索契请来给我的别墅和住宅进行艺术装修和绘画的画家洛什卡列夫和他的助手——姓名我已经不记得了——的报酬，在几个月时间里都是用冰球队的经费按高级教练员的标准支付的。

属于上述这种情况的还有我的私人司机、按摩师，甚至连我的姘妇瓦西里耶娃·卡皮托利娜也是作为游泳队的教练领取工资的，尽管实际上她在这个运动队里什么事儿也不做。

所有为我个人服务的人，包括瓦西里耶娃，每个月都支付给他们每人2000卢布的工资。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得到了军队的住宅，而且还定期得到高质量的军官制服，这些制服是飞行员、领航员和莫斯科军区空军其他飞行军官专用的。

我还将莫斯科军区空军军官战斗和体能训练的经费用于“狩猎场”的开销。

问：您是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目的建立这个狩猎场的？

答：“狩猎场”是根据我的命令，于1948年在莫斯科军区空军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封闭射击场里建立的。

这个“狩猎场”占地5万5千公顷。根据我的指示在那里建立了三栋芬兰式的小楼，改建和整修了原有的窄轨铁路，并为此专门生产了轨道车。我们还从“新阿斯卡尼亚”自然保护区弄来了价值8万卢布的20只梅花鹿，以及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从什么地方弄来

的海狸和白山鹑。

在“狩猎场”除了专门的职业猎手以外，还有一支由执行紧急任务的军人组成的警卫队。

在莫斯科军区空军，我为“狩猎场”组建了专门的管理机关，任命预备役军需大尉、也被算作足球队一级教练员的格奥尔基·约西法维奇·乌达洛夫为该机关的负责人。还有9个人是按莫斯科军区空军各个运动队的编制被列入这个机关的，其中包括我的别墅警卫的妻子叶夫谢耶娃·米拉·伊万诺夫娜，她也被算作体操队的一级教练员。

实际上这个“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狩猎场的猎手和武装警卫，都是无事可干的人，因为我总共只去了两次这个“狩猎场”，也没有批准任何人再去那里。如果有哪个猎手胆敢私自去这个狩猎场，那么警卫人员就会没收他的武器。

自然，我外出打猎是很不体面的事情。我去打猎乘坐的是“道格拉斯”飞机，陪同我的人员有瓦西里耶娃，司机奇斯佳科夫和我的其他一些同事：我在体能和队列训练方面的助手瓦西里凯维奇，歼击航空兵督察员马卡洛夫上校和军区军校部原部长莫罗佐夫上校。同时还有雅克12型飞机飞往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机场。这架飞机是我专门用于同莫斯科进行联络和往猎场运送食品、白酒和红酒的，因为我们要在狩猎场住上几天。我所布置的这些任务都是由我的副官卡别尔金完成的。

除此而外，根据我的命令，还从莫斯科调遣了几辆汽车到猎场，其中包括配有ЦСР－399型特种无线电装置的“威利斯”牌汽车。我用这台无线电装置与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航空技术学校联系，并可以通过这所学校与莫斯科军区空军进行无线电话联系。在打猎期间，当我需要调遣飞机或者是给空军莫斯科军区的总部发布什么命令时，就利用这台无线电装置通过佩列雅斯拉夫尔－

扎列斯基航空学校进行联系，因为这台设备的功率不够，不能与莫斯科进行直接的联系。

我还从图拉请来了有名的猎狼好手萨福诺夫，连同他的一群猎狗。这样的打猎当然挥霍了国家的一大笔资金，因为这些费用完全是用国家的钱来支付的。

除此而外，我的罪过还有：我利用职权大量挥霍了国家的资金，特别是把国家的钱用于我的别墅设备和服务。例如，利用苏联军事部的资金修建了能供近3万人用水的泵站；还根据我的申请，在我别墅附近的莫斯科河岸上修建了水泥防护堤和从别墅到莫斯科河的水泥台阶，耗资近50万卢布。

这项工程使用了苏联军事部军事建筑管理局一个营的兵力，并持续了一段时间。该营是根据我的请求和捷连钦科的书面申请，由副部长别洛科斯科夫调遣的。这些士兵还修建了从乌斯宾斯基公路到我的别墅的两公里长的沥青公路，用矿渣混凝土砌块盖了一座能容下两匹马、三头牛、六只羊，以及猪和家禽的牲口棚。

我的负责后勤的副手捷连钦科少将和莫斯科军区空军行政事务管理处的处长卡萨彼耶夫用莫斯科军区空军的公款在我的别墅里安装了带有特种压缩机的冰箱，用于长时间保存大量的食品。他，也就是捷连钦科，还利用绿化军区总部的款项在我的别墅修建了桑拿浴室，在别墅的院子里种植了果园：有一百多棵专门从米丘林市运来的苹果树和樱桃树，以及大量的马林浆果、醋栗、野蔷薇和一些观赏植物。

还应该交代的是，我私人的两匹马、三头牛、六只羊，猪和50多只家禽、乌鸡和珠鸡所用的饲料都是根据我的指示由莫斯科军区空军供应的，一直持续到我被捕。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我的副官卡别尔金所提出的申请由捷连钦科免费供应的。我的别墅里的各种食品如牛奶、黄油、鸡蛋、水果和蔬菜，经常被我的姘妇瓦西里

耶娃·卡皮托利娜在其母亲和姐妹的帮助下，拿到市场去出售，他们常住在别墅里，这一点别墅的卫队长叶夫谢耶夫是最清楚的。

通过我的助手瓦西里凯维奇少将，我把莫斯科军区空军的两艘小艇和一艘四人摩托艇占为己用。

此外，在1952年期间，我还占用水运部的汽艇长达一年之久，为此，莫斯科军区空军花费了约7万卢布使用费。我还挪用了莫斯科军区空军的自动电话站，同时，不仅在别墅的各个房间，而且还在走廊、浴室、卫生间、牲口棚，甚至别墅的更衣室安装了电话。

这就是我使用的由国家付费的一切，如果不算被我占为己有的巴卡尔特牌小轿车。

已经被算作我个人财产的巴卡尔特牌小轿车是1952年为莫斯科军区空军汽车摩托车运动队在德国买的，花了几十万马克（准确数字我记不清了）。我非常喜欢这辆车，就决定留给自己用，用我以前在德国买的比较便宜、也不是特别舒适的科尔特牌旧轿车取而代之。

为了购买这辆巴卡尔特牌小轿车，我专门派我的副官达加耶夫去了一次德国，后来，他又按照我的指示将这辆车作为我自己的车办了证件。

达加耶夫和莫斯科军区空军体能训练处主任索科洛夫多次去德国，在那里为莫斯科军区空军购买了大量的专业器件。与此同时，他们还完成了我个人的一些委托。

问：具体是一些什么委托？

答：达加耶夫和索科洛夫在德国用外汇为我购买了大量贵重物品，数十套西装料子，几套价值昂贵的茶具以及其他许多家用物品，这些东西的单据被我弄丢了。我的妻子——瓦西里耶娃和季莫申科可以说清楚这一点，这些贵重物品都是由他们掌管的。例如，瓦西里耶娃在与我吵架后，从我那里拿走了12个皮箱的东西。我

的另一个前妻叶卡捷林娜·季莫申科也不逊色，1953年4月她离开了我，并带走了很多贵重物品和其他一些东西。

问：您是从哪里弄到的外汇，让达加耶夫和索科洛夫为您购买这些东西的？

答：我没有外汇，达加耶夫和索科洛夫为我在德国买的这些东西，花的都是拨给莫斯科军区空军的外汇款项。通常，这些东西都是用莫斯科军区空军的飞机从德国运到距莫斯科30公里的古宾卡军用机场，再从那里送到我的别墅。

问：按照规章飞机应在哪里着陆呢？

答：在莫斯科的中央机场。按照规章，在这里要对到达飞机所载的货物进行海关检查。为了不支付达加耶夫和索科洛夫从德国买来的东西的关税，我下了一道命令，让飞机在古宾卡机场着陆，在那里将东西从飞机上卸下来，由我的副官们装上汽车，送到我的别墅里。

现在，我基本上已经交待了自己非法挥霍、浪费和侵占国家财产的全部罪行。也可能漏掉了个别已经记不清楚的事实，但是我尽量回忆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决不隐瞒。

审讯记录我已经看过了，记录准确无误。

瓦·斯大林

参加审讯的人员有：

苏联内务部重大案件侦查处处长，中将（弗洛德季米尔斯基）

苏联内务部重大案件侦查处副处长，上校（科兹洛夫）

内容准确无误：

签字

№07756

克鲁格洛夫[①] 致马林科夫

(1953 年 8 月 8 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马林科夫同志

1953 年 4 月 28 日逮捕了瓦·约·斯大林，1921 年生，莫斯科市人，苏共党员。

瓦·约·斯大林被指控在 1947～1952 年担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刑事犯罪活动，具体表现为非法使用、挥霍和占有国家财产和资金，同时唆使其下属进行上述犯罪活动。

除此而外，他还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敌意攻击，散布诽谤性的反苏言论，并表示打算同外国记者建立联系，就约·维·斯大林去世后他的处境问题发表答记者问。

在侦查过程中，罪犯瓦·约·斯大林承认自己的下列犯罪事实：在 1947～1952 年期间，也就是担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期间，经常非法使用和挥霍国家的财产和资金，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苏联国防部的专门委员会于 1953 年 5 月检查了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部的财政和经济状况以后，确定了这一点。瓦·约·斯大林以及因此案件而被逮捕的其他人都承认了上述罪行。由于瓦·约·斯大林的反国家的行为，造成非法以及不合理使用资金的金额达两千多万卢布。

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瓦·约·斯大林在莫斯科军区空军建立

① 克鲁格洛夫，C. H.（1907～1977），时任苏联内务部长。

了8个列入编制的运动队，人数达300人，这些运动队每年的开支需要5百万卢布以上。这些运动队都是由从其他的运动团体挖来的职业运动员组成的。

瓦·约·斯大林为莫斯科军区空军的运动员们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优先给他们分配住房，授予军衔，发给他们飞行－技术人员制服，还给予大量的奖金并满足他们的其他嗜好。这种做法损害了莫斯科军区空军官兵的利益。

为了保证运动队的运动场地、设备和器械，瓦·约·斯大林自作主张地把4个飞机库改建和装备成训马场、马厩、运动大厅，为此挥霍了用于战斗训练的120万卢布。

1950年，他自作主张开始建造运动中心——其外貌就像改装的飞机库。这项工程占据了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区文化休息公园的用地。尽管没有必需的技术文件，也没有军事部的拨款，这项工程仍然开工了，并持续到1951年。运动中心这项工程已经耗资600多万卢布。1952年，根据军事部的命令停止了这项工程的施工。

1951年，在不具备技术资料和批准的预算拨款的情况下，瓦·约·斯大林在一个飞机库的场地上开始了游泳池工程的施工，并通过以约·维·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方法获得了给该工程的300多万卢布的拨款。除此而外，瓦·约·斯大林还取得了苏联军事部的许可，在德国为游泳池订购设备，使用的是建设柏林附近第26航空军的飞机场的资金25万多马克。

1952年，瓦·约·斯大林取得了苏联外贸部的许可，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在德国购买总额为25万多马克的运动器械。根据Б.З.科布洛夫的批准，用这笔资金购买了各种德国的运动器械，如小汽艇、自行车、照相机，并运到莫斯科，还为瓦·约·斯大林个人购买了一辆巴卡尔特牌小轿车。

瓦·约·斯大林还利用职权满足个人的私欲，为补充别墅的设备

花费资金 63.5 万卢布，超出了拨给他的 29.6 万卢布的款额。

除上述数额外，为完善别墅的其他设备以及建筑各种家用设施所耗费的资金达 200 万卢布。

例如，用在地下水泵工程上的资金是 50 万卢布，用在建筑浴室、马厩和暖房上的资金是 30 万卢布，这些资金都取自于拨给建设机场技术设施的款项。修筑宅园旁的混凝土小河堤就耗资 50 万卢布，还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安装制冷设备、种植果园、安装自动有线电话站等等。

同时，他还用莫斯科军区空军的资金给自己饲养的牲畜定期购买饲料，在其副官们的协助下，以发布虚假命令奖励莫斯科军区空军工作人员的方式，将国家的 6.9 万卢布的资金据为己有。

经常违反人员编制纪律，用运动队的资金供养为他服务的 5 名副官、别墅的警卫、3 名司机、2 名家庭教师，还为其狩猎场建立了一支警卫队并在几个月的期间里为 9 名根本就不在莫斯科军区空军工作的人支付工资，以上各项耗资超出了 200 万卢布。

在佩列雅斯拉夫尔－扎列斯基射击场里建立了一个狩猎场，其设备和日常开支，以及购买鹿、野鸡、山鹑和海狸所花费 84.2 万卢布都是取自于战斗训练的预算款项。

在建造库尔基诺检查站时过于铺张，耗费资金 122.3 万卢布，仅在检查站的周围修筑石头铁丝网的围墙就花费 25 万卢布。

这样，瓦·约·斯大林用自己非法的反国家的行为和指令给国家造成了金额超过 2000 万卢布的物质损失。

瓦·约·斯大林热衷于体育活动和其他一些不属于他的职权的事情，不处理组织军区空军的战斗和政治训练的问题，几个月不上班，几乎不下部队，不学习军事部长和空军总司令的命令，也不签署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部发布的命令，向军事部隐瞒部队中的一些违纪事实和所发生的非常情况。

这些供词已被瓦·约·斯大林的同谋犯确认，这些罪犯都曾是他的副手：空军少将捷连钦科和瓦西里凯维奇，行政管理处主任卡萨彼耶夫，副官卡别尔金、波良斯基、达加耶夫和斯捷潘扬。苏联国防部专门委员会在检查了部队的战斗和政治训练以及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部的财政经济活动后形成的文件也确认了这些供词。

瓦·约·斯大林还承认：他对约·维·斯大林撤销其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职务的决定非常不满，由于不想到军事学院学习，就开始过起了游手好闲的生活，并且经常酗酒。

在约·维·斯大林去世后，他散布了一系列针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诽谤性谣言，似乎是这些领导人不公正地将他开除出苏联军队，并竭力将他说成是一个酒鬼和腐化堕落的人。

与此同时，瓦·约·斯大林指责苏联政府为保证斯大林去世后不中断国家的领导工作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且流露出不满情绪，认为苏联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永久地纪念约·维·斯大林。

瓦·约·斯大林在道德上已经彻底腐败，在今年的3月底和4月里，他曾向妻子季莫申科、副官波良斯基、斯捷潘扬和卡别尔金、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的学员列别捷夫上校和司机费夫拉列夫流露出这样的情绪：与外国记者会面，并就约·维·斯大林去世后自己的处境问题发表谈话。

除此而外，瓦·约·斯大林还承认：今年的4月底，在与空军司令部的理发师卡巴诺娃在自己的寓所里会面时，瓦·约·斯大林唆使她以一批对他的命运感到担心的飞行员的名义编造一封给苏联政府首脑的匿名信。

瓦·约·斯大林上述这些供词被罪犯卡巴诺娃、司机费夫拉列夫和副官波良斯基、斯捷潘扬和卡别尔金确认。

瓦·约·斯大林承认指控他的全部罪行并承认法庭的所有调查都证据确凿。

对于自己的犯罪活动，瓦·约·斯大林解释说：他能够轻易地实现自己的所有嗜好，而这一点正好使他的一些坏品质得到了发展，比如：自高自大、虚荣心强以及功名欲等等，其结果就是道德生活松懈，最后是政治上的堕落。

最近一个月，瓦·约·斯大林多次请求主管他的案件的侦查人员，尽快让他见到贝利亚，理由是，他很想知道，对于他的案件苏联政府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兹报告如上，请您指示。

C. 克鲁格洛夫

1953年8月8日

№07757

瓦·约·斯大林致莫洛托夫

（1953年12月21日）

尊敬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涉及到我们家庭的一系列问题应该由贝利亚来回答。这一点对于历史是很有必要的。许多事情都会弄清楚的。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您应该做到，因为在提出问题时，需要了解自1930年以来我们家庭的悲剧。比您更了解这一点的只有基洛夫。当时我还太小，很多事情都不知道。父亲也对我讲了很多，有很多事情连他也不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弄清楚。

您的瓦·斯大林

1953年12月21日

№07758

瓦·约·斯大林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

(1955年2月23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声　　明

我是于1953年4月27日被捕的，侦讯是由弗洛德季米尔斯基和科兹洛夫主持的。

对我提出的全部指控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编造诽谤性的谣言以及向约·维·斯大林同志作歪曲性的报告，致使一些忠诚的工作人员被免职以及遭到逮捕（可列出名字的有：斯姆什凯维奇[①]、雷恰可夫、诺维科夫）。

第二，诽谤政府成员。

打算会见外国记者并以背叛祖国为目的。

第三，在莫斯科军区空军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活动。

所有这些对我的指控都是由贝利亚、科布洛夫和弗洛德季米尔斯基于1953年5月所签署的文件提出来的。

现在，1955年，在复审时，所有这些指控仍未取消。审讯仍然按原来的三个方面进行。审讯是由新的侦查员卡利斯托夫上校主

① 斯姆什凯维奇，雅科夫·弗拉基米罗维奇（1902～1941），空军中将，1939～1940年间任空军司令，1940～1941年任总参谋长助理。

持的。在第一次审讯过程中（弗洛德季米尔斯基和科兹洛夫），我曾编造了很多东西。现在，我声明：我的签字将不再有效，因为，尽管我在这些记录上签了字，但我不同意这些记录的内容。现在，在复审时，对于自1955年2月12日起所形成的每一份记录，我都将用生命担保。

第一方面指控的真实情况

关于斯姆什凯维奇、雷恰可夫——1940至1941年期间。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斯姆什凯维奇，也不认识他。只是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关于他的很多好的评价："正直、勇敢，通晓业务"等等。

显然，对斯姆什凯维奇的命运产生影响的是1940年由我转交给父亲的斯贝托夫[①] 的关于M－63型飞机马达问题的信，准确地说，不是信，而是斯贝托夫被政府召见以及他的汇报。什么样的汇报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斯贝托夫多次说，斯姆什凯维奇对他（斯贝托夫）关于M－63型飞机马达存在问题的报告没有反应，他还因此痛骂斯姆什凯维奇，说他欺骗了政府。我只能推测，斯贝托夫是利用被政府召见的机会汇报了自己的这个看法。如果斯贝托夫利用政府的召见来陷害斯姆什凯维奇以及后来的雷恰可夫的话，那么，我确实是有罪的，因为是我帮助斯贝托夫得到了政府的召见。任何人也没有问过我对空军、对斯姆什凯维奇以及雷恰可夫的看法。关于M－63型飞机马达问题我确实是向父亲做过汇报，说它"不适用于歼击机"，因为我本人就驾驶使用这种马达的飞机，比较了解这种马达的缺陷。

关于斯姆什凯维奇、雷恰可夫以及空军，即使我向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也不会相信我的，因为当时我刚开始在空军服役，情况

---

① 斯贝托夫，H.A.，1940年担任航空兵师副师长；1940～1941年担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司令员。

还不太了解，我对空军总司令以及他的所作所为的意见是不会得到重视的。

关于诺维科夫：

我不清楚，在免除诺维科夫空军总司令的职务时对他做了什么样的指控，因为当时我在德国。如果诺维科夫被免职和遭逮捕是我向父亲作的关于我们的带 M－107 型马达的雅克－9 飞机的技术和德国的技术等问题的报告产生的影响的话，那么诺维科夫本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有责任的。所有这些问题他比我知道得还早。要知道，报告这些问题是他作为空军总司令的责任，当时我只是偶尔地谈起了这个话题。要知道，当我向父亲讲述德国的技术问题时，如果父亲说："我们了解这些技术。诺维科夫已经做了汇报"，那么，对于诺维科夫来说才是正常的，也是有好处的。可是，情况恰恰相反。我是第一个汇报德国技术问题的人，而诺维科夫对此却保持沉默，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我有什么错呢？要知道，我只是讲了我知道德国技术这个事实。

中央和政府关于采用喷气技术更新空军的装备和从德国请专家来进行指导的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我们空军里进行这种喷气式革命的首创人不是诺维科夫，而是中央和部长会议，这是诺维科夫本人的过失。在人员编制和熟悉情况方面诺维科夫有责任成为这种变革的发起人和使空军沿这条路线前进的领导人。在这里，我不禁想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德国之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空着手从德国返回。要知道，诺维科夫也去了德国，他比我更了解德国的技术，他不仅能够，而且也有责任向中央和部长会议报告这一切。

有关是个人原因促使我对诺维科夫进行陷害或是诽谤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些原因，同时也不存在诽谤。

第二方面指控的真实情况

诽谤政府的说法是根据什么形成的呢？显然，是根据下列情况：

1）葬礼的第一天组织得很不好。关于这一点完全是一些陌生人往我寓所里打电话时说的。我本人没有接电话，一直在打点滴（马尔特努什金医生可以证明），因为我的心脏不好。在答复副官波良斯基和叶卡捷琳娜·季莫申科时，我发了火，因为他们总是在叨咕电话的事，以及似乎是在向父亲遗体告别时发生的一些不成体统的事，这令人感到很厌烦。是的，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这是什么？是对政府的侮辱吗？不是（如果排除贝利亚）。这是对那些考虑不周的人的不满，他们与其说是犯了什么大错，还不如说是为人们对他们议论纷纷提供了理由。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以及贝利亚也令人气愤。我也生尼·谢·赫鲁晓夫的气（因为他是委员会的主席）。

在这里我必须谈一谈贝利亚。我对贝利亚产生憎恶感还是受母亲的影响。母亲非常憎恨他并直截了当地说："他会给父亲带来很多不幸和灾难的"。至今，在某种程度上，我仍然将母亲的死与贝利亚对父亲施加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后来我证实了对这个人的不好的看法。我常常发现，他是怎样在父亲面前扮演一个"正直的人"的，而不幸的是，父亲被迷惑住了，他相信：贝利亚是一个不怕讲"真话"的人。在这方面是不可能说服父亲改变自己的看法的。同父亲第一次直接说起贝利亚，是我向他讲述发生在从德国到莫斯科的火车上的事情。（父亲睡着了，尽管已经到站了，应该下车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叫醒了父亲，旁边还有贝利亚。父亲在朦胧中不知道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很生气，一个人走了。我很偶然地同贝利亚坐在一辆车里，同车的还有梅尔古洛夫。我向父亲讲述了贝利亚同梅尔古洛夫关于这件事的谈话，谈到贝利亚是怎样不择手段地诋毁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的。）关于贝

利亚的最后一次谈话是在博尔若米[1]。这一次，当父亲亲眼看见格鲁吉亚的某些“习俗”时，没有生气，而是沉思起来，甚至回忆说：“娜嘉是无法容忍他的”。我不得不重复的这些远远不是同父亲谈话的全部，而只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在父亲死后，我会这样尖锐地反对贝利亚。这绝非偶然，而是必然的。我的看法越来越得到证实：他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很幸运的是，我被捕后还没有受到他的提审。有一次，当着他的面父亲让我重复一遍对他的看法。贝利亚把这引向开玩笑。但是，我知道，他不是那种能把这事忘记的人，尽管表面上，特别是在父亲——我的庇护人面前，他伪装得很好。

2）在看到刊有部长会议决议和最高苏维埃命令的报纸时，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他们都等不到葬礼结束”。这句话完全是蠢话，是在很悲痛的时刻说出来的，未必值得立案侦查。

3）3 月 9 日在广场上。

在贝利亚说到“我们的敌人别想指望我们会分裂”时，我说：“做贼心虚”。听到这话的人有我的副官、叶卡捷琳娜·季莫申科和马尔特努什金医生。

我还听说，在讲话时，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脱掉了帽子，而贝利亚却没有。

在将父亲的遗体安放到陵墓时，贝利亚的表现令我感到气愤，因此，当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打断他说“你喊什么”时，我很高兴。

4）回到家里，我说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不是贝利亚发言，而

① 苏联格鲁吉亚城市，矿泉疗养地。

是布尔加宁[1] 发言就好了，因为父亲曾经担任过国防部长，但是，国防部却谁也没有发言。

5）在看到《真理报》刊登的内务部谈被释放的医生的消息时，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应该这样做（刊登这样的声明），这样做除了能给离间者和坏蛋提供一些材料以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6）在看到大赦命令时，我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最悲痛的日子里，在领袖逝世的日子里实行大赦。通常只是在举行加冕仪式、改朝换代或者重大节日时才实行大赦。因此，大赦命令最好能改在5月9日，即胜利日那天宣布"。实际上对于大赦我是持肯定态度的。我只是认为在报刊上宣布大赦的时机选择得不合适。

当我说上述这些话时，在场的有叶卡捷琳娜·季莫申科、副官波良斯基和马尔特努什金医生。

我那时不知道，可能我是不对的。但是，当时我的那种心情肯定会宣泄出来。这种宣泄是激烈的，在表达方式上是没有分寸的，但是不应该将这一点归结为对政府的诽谤，这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些过分的话是和我当时受到极大刺激的状态有关的，是完全可以用当时的情况来解释的，把这描绘成对政府的诽谤是令人不解的。

打算会见外国记者并以背叛祖国为目的。

事情发生时在场的有：波良斯基、叶卡捷琳娜·季莫申科和稍后来到的我在学院的同班同学上校B. C. 列别杰夫同志。这次谈话完全不像在对我的指控材料中所说的那样。我说："假如处在我的位置上的是一个坏蛋和苏联人民的敌人的话，他就会向外国记者发表讲话，这些外国记者就会在报界掀起一场喧嚣，他们会借此大

① 布尔加宁，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95～1975），1947年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

发横财，并且让他也发财，然后，他（这个坏蛋）就会溜到国外去”。我谈话中的所有“假如”和“坏蛋”都被删去了，而我被指控想同外国记者见面并背叛祖国。这纯粹是诽谤。

我是一个笨蛋，我毫不难为情地这么说，因为我不能想象出，是谁能想出这样的主意：不仅这样指控我，而且还考虑了在我的头脑里产生这种想法的能力。

谈话是从家里已经没有钱了这一点开始的，我一直争取能得到马林科夫的接见，但是，不仅没有希望被接见，甚至连最后的联络工具——电话也被切断了。这时，季莫申科在抽屉里翻出了一本带有我的照片的美国杂志。就是它，这张杂志上的照片，成了这场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谈话的开始，但是这次谈话与指控中所说的毫无共同之处。

在后来的审讯中，作为对我的动机的证明，向我提出了去“梅特罗波尔”饭店的事。似乎去“梅特罗波尔”饭店是我同外国记者接近，为以后背叛祖国所迈出的第一步。

这是彻头彻尾的诽谤。

我去“梅特罗波尔”饭店是为了同瓦西里耶娃约会。幸运的是，瓦西里耶娃那里没有电话，我只有通过她那些有电话的邻居和亲戚约她。这些人可以证明，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我有罪的是，我曾谈论过家里缺钱和我的困境，但在布尔加宁面前却没有交待这些。是的，在这一点上我是有罪的。

但是，无论是在精神方面，还是血缘方面，我都不是敌人。我有很多缺点，尽管承认这些不是特别令人愉快，但是，这些缺点确实存在。

在对待荣誉和祖国方面我是纯洁的。对于我来说，祖国是父亲，是母亲。

除了最卑鄙的造谣者以外，没有谁能对我提出这样的指控。能

够提供这样情报的人只有季莫申科。很遗憾，我不是第一个掉进她的陷阱里的人。她把所有的人推进她所制造的困境里，而自己却像没事人一样。

第三方面指控的真实情况

担任空军莫斯科军区司令职务期间所犯的罪行。

我所犯下的不是蓄意预谋的罪行，而是严重破坏条例和法规的行为。国防部的委员会的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

违纪的原因完全在我本人身上——在我所下达的指令中。下属的指挥员们是没有过错的，他们或者是被迫执行我的命令，或者是离开了军区。文件中提到的上级对我在某些情况下偏离规章要求的做法的许可是不值得注意的。如果说我得到了这些许可，那么仅仅是由于我报告了这些做法的必要性。领导相信我并经常是给予同意的。

把我做的一切都说成怀有恶毒的意图，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不。没有任何恶毒的意图。只是想做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而在这个过程中超越了法律。但是在做事情。我个人的行为强化了这些不正确的做法：由于酗酒和经常不能直接领导军区工作，造成了一批追随者，并使他们的工作也处于无人监督的状态。

我接受的在空军中发展体育的任务，自然是很需要的，但是事实上这项任务变成了追求奖励的活动，并给莫斯科军区空军的基本工作带来了损失。这方面罪过都在我身上，我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我的所有这些行为导致了国防部公正的命令：我因“败坏了苏联将军的称号”而被转为预备役军人。

关于我个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父亲也不可能整天管教我，我实际上是成长和生活在成年男人的圈子中（警卫人员），他们的道德品质和自制能力都不是很出众的。这对我后来的全部个人生活和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很早就开始抽烟喝酒。在

中学时，尽管还有点天赋，但学习成绩总是平平，从没超过中等。准备当一名炮兵，因此到莫斯科第一炮兵专业学校学习。但是，父亲决定，他的两个儿子不能都在炮兵部队，因此，我又到了飞行学校。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中尉的军衔。从我毕业那一刻开始，父亲同我之间作为父子所进行的谈话几乎就没有了。每一次见面谈的都是空军的事。

自 1938 年起在部队服役期间，我曾担任了如下职务：飞行员、一级飞行员、分队长、航空大队长、团长、师长、军长、军区空军副司令、军区空军司令。所接受的军事教育：专业学校、3 个月的空军学院的学习、航空大队指挥员利佩斯克学习班，等等。对于最后所担任的职务（军区空军司令）来说，我所受的军事教育是不够的。曾被派往军事学院学习，但是由于身体状况和对学习的一些愚蠢的认识，实际上并没有参加学习，并且还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尽管除了自己以外没有抱怨过任何人。最后落到被转为预备役的地步。

虽然国防部的这个命令是严厉的，但是，是很公平的，因为这个命令的根据是非常充分的。

在我的声明中经常遇到“诽谤”这个词。可能造成这样的印象：我认为自己是完全无罪的，简直就是冤枉的。不是这样的。

是的，诽谤是存在的。可是谁会相信它呢？如果我的行为没有给它（诽谤）提供有利的生长土壤，它又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没有编造谎言的借口、理由和可能性，也就没有了诽谤，更不会有对诽谤的轻信。

在 22 个月的关押期间，我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分析，这使我有可能正确认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情的原因。原因只是在我自己身上。在我身边可能有一些坏人，但是，可以作为榜样的人要更多些。

要知道，布尔加宁曾经警告过我："要明白事理，否则你就毁了自己，必须戒酒，过正常的家庭生活"。难道我听话了吗？没有。我不愿意触及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愿意明白过来。是监狱让我认识了自己的一切罪恶，打掉了我的傲气。我能够很清醒地评价我过去的生活并思考未来。要知道我才35岁，有17年的军龄，16年的党龄，今天却落到这种地步。

罪过全在我自己。不能抱怨任何人。

请相信，没有比自己的良心更严厉的法庭了。

尤其在父亲和党的面前我是有罪的。

请你们给予我工作的机会，让我洗刷对党所犯的全部罪过。

请给予我机会，让我用行动来证明我是忠于祖国和人民的。

瓦·约·斯大林

1955年2月23日

确认：签字

№07759

瓦·约·斯大林致赫鲁晓夫

（1958 年 4 月 10 日）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今天，听了您在体育馆发表的无线电讲话后，又一次给您写信。

我知道，这使人厌烦，但是，我怎么办才好呢，我怎么办才好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心灵的痛苦和空虚已经使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我看到真正的敌人——他们在轻松地忍受着监禁，并以此为骄傲。

他们的动力是“憎恨和未来的复仇”，——这给了他们力量，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忍受监禁。

但是，我能有什么样的憎恨呢？我去憎恨谁呢?！今天，我听了您的讲话，并回忆起您提到的 30 年代。我又想起了妈妈带我去织布厂的情景，带我去听演讲的情景，可能您也听过这样的演讲。我知道，你们是在学习时认识的，因为妈妈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

我还清楚地记得葬礼，因为，这也像母亲的死一样，已经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还记得您在妈妈葬礼上的讲话，您在新圣母公墓讲话的照片我一直保存在家庭相册里（最后一次看见这张照片是在被侦查人员没收的私人物品里）。

今天，当我听到您的如此朴素易懂的讲话时，所有的这些回忆又涌上了我的心头。

经常有这样的时刻，您同发言者溶为一体了。今天，当听到您的讲话时，我又感受到了这一点。对您我将永远是坦率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这样的时候：我在心里骂您。因为，面对这四面墙，面对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等等各方面都毫无希望的处境，是不可能不骂人的。要知道，根据所有的法律，1958 年 2 月 4 日我应该在家里了。但是，听了您的讲话，特别是今天的讲话，我的全部憎恨都消失了，除了尊敬和钦佩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了。您说得正确，做得漂亮！不能不为您、为祖国而感到高兴，不能不让人赞赏！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显然是不了解您，认为您会害怕匈牙利之行……但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谁要是看到您在卡拉奇① 郊区的情景——当时您的汽车坏了，情况并不轻松——就不可能再怀疑您的坚定和勇气！

非常想和您在一起，帮您做事！多么想让您在工作中考验我并信任我呀！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就是您自己，而不是报告中说的第三种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现在我是多么渴望能工作呀！

但是，当我四处张望时，又是这四面墙、监视孔等等。不由得又憎恨起来了，非常憎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憎恨那些以这种方式把我介绍给您的人，而您也同意这种方式，甚至超过期限地把我关在监狱里，因为我是“敌人”！

我怎样才能向您证明我不是这样的人呢？

我将向您证明，我是真正对您忠诚到底的人！因为（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信念）妨碍我们接近和相互理解的不是政治信仰的差别，因为它们是一致的；也不是感到委屈和打算替父亲报仇——我从来也没有过这种想法。妨碍我们接近和相互理解的是您不了解我的立

① 俄罗斯城市，在沃罗涅什州。

场的实质以及对今后生活的想法。

例如：我认为，父亲有一个比我更有力量的律师，这就是党！在这个问题上，您会讲得更清楚（我已经给您写过了），我最好是不要再说什么了。

总之，我认为，一切对党有益的事物都应该作为有益的东西接受。我这里是说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我相信，您同个人崇拜作斗争，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为了党必须这样做。也有别样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人。但他们是无足轻重的。还有一些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基本路线的敌人。最初，很多人不理解您为了党而采取的行动和您的原则性（而不是轻慢的态度）的全部伟大之处。还不能立即意识到，这不是迫不得已，而是为了党必须这样做。

这不是为了什么对谁进行报复，而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必须这样做，而不是由于个人之间的关系！

请您相信，我是懂得这一点的！

但更令人痛苦的是我被您误解了，我不是在您的亲近助手之列，而是在您的“敌人”之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理解我，同意我的请求。我已经无法忍受了，无论是身体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只有进行私人会面，才有可能解开这个“难解之结”。

瓦·斯大林

1958年4月10日

№07760

瓦·约·斯大林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1959年1月1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向苏共中央报告我所了解的有关反党集团成员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的一些情况。

我没有同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一起工作过，而偶尔的一些接触不能成为衡量我对这些人了解程度的标准，谢皮洛夫我根本就不认识。

我完全赞同中央对于这些人所做的结论，因为中央比我更了解他们。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同他们都有工作方面的接触，对他们的行为也做了观察。

布尔加宁。应该承认，在暴露布尔加宁在对我的审判中曾扮演可耻角色之前，我对这个人的评价是最高的。现在，我明白了，布尔加宁也同马林科夫一样，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伪君子，更狡猾，更隐秘。我特别注意到了他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①。使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他感觉自己拥有某种力量（?!）或者是认为党是这样的愚蠢，以至允许他随便地说着双关的俏皮话。名义上的领袖……?!

---

① 指布尔加宁在1958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布尔加宁在发言中承认，1957年自己曾支持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的“反党活动”，“当时，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不仅是他们活动的共同参与者，而且还是他们的名义上的领袖。反党集团在我的办公室里开会，密谋反党派别活动。”《1958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142页。

不，他打算成为不是名义上的领袖，这一点在他的发言中已经表露出来！他成为名义上的领袖（即无关紧要的人）不是他个人的意愿（因为这一点不取决于他），而是党的意愿。他的讲话不是真诚的，掺杂着虚伪和胆怯。

马林科夫。关于这个人值得详细说一说。马林科夫被责成管理空军的事情[①] 以后，我经常同他打交道：1941～1942～1943 年，以及 1945 年，当时他由于欺骗中央而被解除了对空军的领导权和中央书记的职务。[②] 我还知道，在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③] 中，马林科夫看到自己有可能重新夺回中央书记这个职务，为实现这一目的，制造了这个案件，歪曲了事实真相。简单地说，他是踩着列宁格勒人的尸体，并在贝利亚的帮助（非常积极的帮助）下，重新占据了中央书记这个职位的。总之，如果研究一下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升迁过程，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们是怎样相互拉扯相互搭救的。有相当多的事实说明他们在各自向上爬的初期就开始了相互合作，这还是战前的事。这里要谈到 C. Φ. 列坚斯，他是最早的捷

① 根据国防委员会 1942 年 2 月 16 日的决定，马林科夫被责成监督国防委员会关于飞机和马达生产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同时负责组建航空团并将其及时派往前线。

② 1946 年 5 月 4 日的政治局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报告作出如下决定："1. 经查，马林科夫同志作为主管航空工业和飞机接收的首长，作为主管空军的首长，在道德上应对被揭露出来的这些部门工作中不成体统的事情（生产和接收有质量问题的飞机）负责，他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向联共（布）中央报告。2. 认为必须解除马林科夫同志的联共（布）中央书记职务。"

③ 战后苏联最大的政治迫害事件。1949 年初，在斯大林支持下，贝利亚、马林科夫等制造了这一"案件"。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党政领导人，其中包括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成员，被指控阴谋建立一个独立于联共（布）的俄罗斯共产党，与中央分庭抗礼。1950 年 10 月 1 日，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吉奥诺夫等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尔任斯基式的契卡人员之一。我非常了解他，因为他是我母亲的姐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的丈夫。当贝利亚被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时，在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管理局局长职务的列坚斯就成了他的障碍，因为列坚斯了解贝利亚在外高加索工作的情况，并对他持否定的态度，而且列坚斯随时都可以出入斯大林同志的家门。贝利亚决定搬掉列坚斯。当贝利亚同斯大林同志说起必须逮捕列坚斯时（我是偶然听到了这次谈话），斯大林同志坚决反对贝利亚的意见，并表示，这个问题不能再提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并不奇怪的是：贝利亚得到了马林科夫的支持，马林科夫说，他了解列坚斯在莫斯科的工作情况，并支持贝利亚的关于逮捕列坚斯的意见。现在，我已经想不起当时马林科夫是做什么工作的，好像是搞党的干部工作，因为我还清楚记得斯大林同志的话："同中央的同志一起在干部中详细了解一下，——我不相信列坚斯是敌人"。马林科夫是怎样在中央进行"了解"的，我不清楚，但事实是列坚斯被逮捕了。列坚斯被逮捕以后，由于贝利亚的谗言，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被禁止到我们家来。在她的请求下，我请求斯大林同志接见她。为此，我挨了一顿骂并被告知："贝利亚说列坚斯是敌人，我不相信。但是中央的工作人员也这么说。我不会接见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的，因为是列坚斯犯了错误。不要再求了"。

这件事的情况就是这样，我记住了它是因为事情涉及的是我熟悉、尊敬和亲近的人。

况且，我还看见和听到了，斯大林同志是怎样保护列坚斯的，又是怎样为自己的错误（?!）——信任列坚斯——而痛苦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就是这样欺骗斯大林同志并清除忠诚的同志的。可以列出很多这样的事实。我这么详细地叙述这件事不是偶然的。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原则是：不是他们的人就不能出入斯大林同志的门。形成了这样的隔绝状态：

给斯大林同志的任何情报都只能通过他们或受他们监督。

由于人们不愿意破坏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相互关系而保持沉默（那时中央主席团的许多成员当然是能够揭露这两个人的），使得这种欺骗常常得以成功。谁要是试图反对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他就会被清除、名誉被破坏或者遭到逮捕。

下面是他们相互搭救的另一事实。在1945年，空军已经有事实证明，马林科夫撒谎，对他的信任动摇了，他被免除了中央书记的职务。但是，由于贝利亚的袒护，未能对马林科夫进行彻底揭露。我不赞成原谅沙胡林[①] 和诺维科夫的错误，这些人都是马林科夫的走狗，但是，却责成马林科夫逮捕他们。这次逮捕使马林科夫退居次要地位并得以脱身，他把一切罪过都推到这些人的身上，借此使自己摆脱了罪责。1953年，给沙胡林和诺维科夫平反时，马林科夫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他歪曲事情真相，并把所有这些人（其中也包括他本人）都作为无辜的受害者提出来了。这是卑鄙的谎言！马林科夫应该受到惩罚，就这样也是不够的。

奇怪的是，谢罗夫[②] 知道这件事，但在调查时却强加给我一项罪名，说我想要破坏诚实的马林科夫的名誉……?！好一个诚实呀！这个狡猾的计谋在1945年已经被贝利亚和梅尔古洛夫巧妙地玩弄过了，即大吵大嚷地进行逮捕行动，以便抹去马林科夫的主要罪行。这样一来，贝利亚和他的同伙救了马林科夫。马林科夫不得不安静下来了。况且，无论是马林科夫还是贝利亚都没有下决心同日丹诺夫进行斗争。因为日丹诺夫享有绝对的信任并受到无限的尊敬。在日丹诺夫去世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马林科夫又开始积蓄力量，并如我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踩着列宁格勒人的尸体又当上了

① 沙胡林，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1904～1975），时任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
② 谢罗夫，И. А.（1905～1990），曾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中央书记。在莫斯科党的代表会议以后——波波夫[1]在这次会议上的举动很令人气愤（作为会议的代表和莫斯科市委员会的委员，我向斯大林同志汇报了波波夫的很多诡计）——斯大林同志对马林科夫作了严厉的批评："怎么会这样呢，在一个城市里——在你身边，你没有看见……?!"马林科夫对我进行责难，可我有波斯克列贝舍夫的支持，马林科夫只好不作声了。

当时，斯大林同志还说："必须用坚定和忠诚的同志来加强中央"。没过多久，我们（莫斯科人）就看到赫鲁晓夫同志成了莫斯科委员会的书记，而中央得到了一名坚定和忠诚的中央书记。从这一切可以看出，斯大林同志已经停止了对马林科夫的无限信任，但他没有活到完全揭露这个人的时候。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一丘之貉。谈论马林科夫时不能不提到贝利亚。大约是在这个时期（详细情况当时的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清楚），由我转交给了斯大林同志一封有关格鲁吉亚存在的问题（准确地说是不成体统的事）的信。信中明确地指出了贝利亚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事情发展到斯大林决定亲自前往格鲁吉亚了解情况——他去了（当时贝利亚想同斯大林同志一起去，但这一次他遭到了坚决的拒绝），但是这一次是马林科夫挽救了贝利亚。他直接飞到了博尔若米[2]，不是对一切进行详细的研究，而是解除了查尔克维阿尼的职务，以此来掩盖那些可能暴露贝利亚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事实，也是很容易验证的。我参与了格鲁吉亚事件，贝利亚是不会放过我的，而马林科夫是为了空军和国家安全部的一些事情，波波夫则完全同贝利亚结成一伙——由于上述这一切

① 波波夫，Г. М.（1906～1968），1945～1949年间任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联共（布）中央书记。

② 格鲁吉亚城市。

他们是十分憎恨我的，况且，斯大林同志已经开始考察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了。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暂时没有被揭露，但是，他们终究会被揭露的，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对马林科夫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国务活动家的行为所作的某些观察，还远远不是全部。还有他的谎言、欺骗、追求个人名利。谎言——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我还要再一次强调，马林科夫与贝利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管在哪里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关于贝利亚还要说几句。我在斯大林同志面前（而且贝利亚本人也在场）称他是下流的人、说谎者、伪君子等等，也就是要证明：贝利亚是一个道德上不诚实的人，一个向上爬的人。我还没有什么事实来表示政治上的不信任——对此我不作声明和推测。但是，鉴于贝利亚作为人民的敌人已被揭露出来，我觉得应该重新审视那些曾是他朋友的人和他曾信任的人。当然，不是说所有同贝利亚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会失去信任，但对于那些被贝利亚的羽翼保护的有罪过的人，应该进行详细的审查。因为敌人未必会保护他不信任的人并对党掩盖他们大大小小的罪过。众所周知，被招募的正是那些有罪过的人。在空军的日加列夫身上所发生的事就是这样的例子。我不能说，日加列夫是敌人，对这一点我不能确认，但是，他的故事是值得详细写出来的。我被（谢罗夫）强加了一个罪名，说我与日加列夫在1942年被免职的事有关系。这不是事实！当时我根本不在莫斯科，日加列夫被免职的原因我还是从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舍夫那里知道的。他们是这样叙述的：日加列夫完全喝醉了，并在这种情况下奉召到国防委员会见斯大林同志。因为在作战时间酗酒，他被解除了职务。他被从国防委员会直接送到了贝利亚的办公室里。（谢罗夫当时是贝利亚的助手，也是空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他却对我进行了指控，说我是日加列夫被免职的原因，他在总检查长鲁坚科

面前表示："日加列夫是一名非常好的、诚实的同志"。简直令人不能理解）。当时日加列夫面临受严厉处罚的威胁。由于贝利亚的努力，他获得了自由，按"自己的要求"（?!）被派往远东边区。值得注意的是：远东边区当时的主人（?）正是戈格利泽①。贝利亚将日加列夫派到他那里……没有人知道贝利亚和日加列夫说了什么。但是，众所周知，自此以后，日加列夫就得到了贝利亚的无限信赖，并成了戈格利泽的亲密朋友。

日加列夫于1950年被重新任命为空军总司令，这对于我，如同对空军所有的人一样，都是极其意外的事。我被说成是这项任命的倡议者，大概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将此事通报给当时的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同志的。事情是这样的：斯大林同志在索契休假，我当时也在那里，不过是在另一所别墅里。深夜，斯大林同志召见了我并问道："你知道日加列夫在哪里休假吗?"我回答："是的，我知道，在国防部的疗养所里，在法布里齐乌斯。""你去一趟，把他带到这里来!"我去了，并把他带来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我们进去了，斯大林同志问日加列夫："你能胜任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吗?"

"能。"日加列夫回答说。

然后斯大林同志又对我说："你去休息吧。"而日加列夫被留在了那里。回来时，我对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关于维尔希宁②除了好话以外我没什么好说的，从斯大林同志那里听到的关于维尔希宁的话也只是肯定的评价）。我向契卡人员询问：你们是否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我们不知道。那么，在派我去叫日加列夫之前斯大林同志是否同什么人谈过呢？是的，同贝利亚通过高频电话。这些就是我所能了解的全部情况。

---

① 戈格利泽，C. A.，时任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驻远东的全权代表。

② 维尔希宁，康斯坦丁·安德列耶维奇（1900～1973），时任空军总司令。

一清早，我就飞回了莫斯科，并把此事向华西列夫斯基做了汇报。而只过了2天，这个问题就被提到部长会议的日程上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作为第一个送信的人被认为是这项任命的倡议者的原因。只是在斯大林从索契返回莫斯科后，在同他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这项任命是贝利亚建议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贝利亚所建议的这个第二项任命差不多与第一项任命是在同一时间。第一项是：重新任命库兹涅佐夫为海军总司令。他也是从远东边疆区来的，也是戈格利泽的朋友，同样，也犯有不少的错误。从人民的敌人这个新的角度来看贝利亚，这些建议被赋予了新的色彩。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央委员谢罗夫要歪曲1942年日加列夫被解职这个事实，以及日加列夫与贝利亚接近的事实，以更有利于日加列夫——他也是中央委员——的形式来阐述这些事实。事情是怎么样，就应该怎么说，而不能瞎编。马林科夫是非常尊敬这个日加列夫的。事情可能不在日加列夫身上，而是在于马林科夫的爱很令人奇怪，他所爱的人都是贝利亚信任的人。这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马林科夫的体系——依靠贝利亚的人。

尽管在1956、1957、1958年间，我曾数十次向谢罗夫提出请求，请他听取我的意见(同时，在声明中我也直截了当地指出，事情与我个人无关，而涉及马林科夫、贝利亚以及他们的同伙)，可是他们不想听我的意见。现在，距离第21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已经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天了，但仍然不见通知书，我决定直接诉诸中央。因为，我所写的东西中有些可能对彻底揭露马林科夫及其走狗有所帮助。当然，这远远不是我能写的全部，但是，我连用纸也受到限制。

苏共党员（自1938年起）瓦·斯大林 1959年1月19日

又及：请允许我简单地谈一下这个反党集团对于克服对斯大林同志个人崇拜的态度问题。

在同个人崇拜作斗争期间，这个集团的行动是很有特点的。如

果说在最初阶段，即有可能把一切都推到已故的人身上时，他们（表面上装作不满个人崇拜）拥护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以使自己免遭打击。而当已经开展的批评错误（和罪行）涉及到了活着的人时，他们又开始叨叨说这是亵渎神明的行为，并打着保护斯大林的幌子企图中断对错误的批评，因为这已经触及到了他们个人。

虚伪卑鄙的人！他们开始将一切罪责都推到斯大林身上，而后又用对斯大林的热爱（?!）作掩护（这才是真正的亵渎神明的行为），试图阻止对自己的揭发，并不知羞耻地欺骗党和人民。仿佛是为了保护斯大林免遭攻击而开展了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但实际上这种斗争的基本目的是为保护自己不被彻底揭露，而根本不是考虑斯大林；只是把这个受人尊敬的名字当成遮羞布，掩盖自己的极端丑恶的真面目。不幸的是，很多人并不明白这个集团的真正动机，而被其诱饵所迷惑。这是极大的非正义，应该制止它！应该向党和人民揭穿这个两面派的伎俩！应该明确而且坚定地说明，在把整个生命都贡献给了党的事业和祖国进步的人与这群卑鄙的小人之间，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之处的。应该明确而且坚定地说，赫鲁晓夫没有参与任何亵渎神明的行为！正当这个集团亵渎神明并为挽救自己的命运而采取一切行动，甚至否定我们前进运动的真理时，赫鲁晓夫同志正在为祖国的进步而斗争，他是我们的前进运动——斯大林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这个运动——的领袖。

给祖国带来危害，阻止我们的前进运动，欺骗、搞阴谋施诡计和亵渎神明的行为——这些就是这个集团的特征，并贯穿在它的全部行动之中。

请允许我祝苏联共产党第21次代表大会取得全面成功。

苏共党员（自1938年起）　瓦·斯大林

1959年1月19日

№07761

谢列平、鲁坚科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0年1月5日）

绝密

苏共中央

1955年9月2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因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犯有滥用职权和进行反苏宣传的罪行，判处他8年监禁并剥夺自由（俄联邦刑法第1部第193条第17项第2点，第58条第10项）。

瓦·约·斯大林承认自己的罪行：自1948年1月到1952年8月担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期间，玩忽职守，经常酗酒，并滥用职权，挥霍国家的资金和物资。

除此之外，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还指出：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对党和政府改组国家机构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和1953年3月27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大赦的法令表示不满，并表示打算向外国记者发表旨在破坏党和国家领导人名誉的声明。

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已被监禁了6年零8个月。在此期间，执行剥夺其自由的地方当局对他的评定是积极的。

目前，他患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疾病：心脏病，胃病，腿部脉管炎和其他疾病。

考虑上述情况，我们请求苏共中央研究下列建议：

对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实行部分赦免，免除继续服刑，

撤销前科；

责成莫斯科苏维埃在莫斯科市提供给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一户三居室的住宅。

责成苏联国防部按照规定发给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退休金，提供为期3个月的疗养证明，归还逮捕时所没收的属于他个人的财产。

发给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斯大林3万卢布作为一次性补助金。

附上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草案。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亚·谢列平

苏联总检察长　罗·鲁坚科

1960年1月5日

№07762

伏罗希洛夫与瓦·约·斯大林的谈话记录

（1960年4月9日）

克·叶·伏罗希洛夫：好吧，瓦西里，讲一讲，你的情况如何？现在生活得怎样？

瓦·约·斯大林：不好。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我需要工作，恳求您帮助我，否则，没有工作我就全完了。

克·叶·伏罗希洛夫：从你来到这个世界的那天起，我就了解你，经常哄你玩。对你，我只希望你能好。但是，现在我要对你说一些不愉快的、不好的事情。

瓦·约·斯大林：我听您说。

克·叶·伏罗希洛夫：当然，会给你安排工作的，但首先你应该变成另外一个人。你还年轻，可是，看你都秃顶了，你父亲尽管都到74岁了，可也没有像你这样。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过着动荡的生活，你不是像应该的那样去生活。

过去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绝不可以再重复了。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建设共产主义，我们在为每个人而奋斗。你拥有一位伟人的姓氏，你是他的儿子，你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为了纪念他，你应该按另一种方式生活。你没有预料到这次谈话吧？

瓦·约·斯大林：我预料到了，并考虑了这次谈话。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是否记得，当你父亲病危的时候，你却喝醉了，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对你说：戒酒，抛弃一切不好的想法，但过后，你却开始喝得更多了。

看到斯大林同志不只一次的叹息，说你不善于管理自己时，我心里是多么难受啊！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你还不能自己开始新的生活，或者须要给你治疗，或者你鼓起勇气，控制自己，行为举止像正常人那样。

瓦·约·斯大林：我理解您的意思，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您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应该改正，但为此我需要工作。

克·叶·伏罗希洛夫：这不成问题。会给你工作的。但是，你应该明白，在某种程度上你的处境是很特殊的。假如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就更改姓名。

对你直说吧。各种各样的坏蛋会纠缠你的。不久前，你和女儿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你在那里是怎样表现自己的？简直是不成体统。关于这件事，我们是了解全部情况的。我们没有权利不了解这些。

瓦·约·斯大林：我明白。

克·叶·伏罗希洛夫：那些下贱货去找你了。你本来是可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的，那怕是看看书，写点东西也好呀。可是你不好好休假，却与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会面，这些马屁精奉承你。你要注意，这些狐朋狗友会把你推进火炕的。为什么这些人不帮助你走正道呢？

你看，我这里有一封写给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尼·谢·赫鲁晓夫说："瓦西里到你那里去时，给他读一下这封信。"

（克·叶·伏罗希洛夫读预备役上校季莫费耶夫写给尼·谢·赫鲁晓夫的关于瓦·约·斯大林在国防部基斯洛沃茨克疗养院的表现的信。）

在读信时，读到瓦·约·斯大林经常酗酒，并在自己那里举行很

排场的狂饮的时候，瓦·约·斯大林说：季莫费耶夫是个坏蛋，下流坯。这种人能把好的也写成坏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不同意把季莫费耶夫说成是个坏蛋。他从1914年起就是党员了。他是同情你，想帮助你。可以理解，你是不喜欢这样的，但他所说的确实是存在的。你仍然在酗酒。就是现在你的身上还散发着酒味。在生活中我见的酒鬼多了，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屈从于这个恶习，那么，你就失去了客观性。因此，你应该明白，季莫费耶夫是同情你的。

瓦·约·斯大林：他是一个作家，写了很多书。

克·叶·伏罗希洛夫：这就是说，他能比别人更清楚地了解你。

瓦·约·斯大林：他把手稿交给我让我进行评论，我看了后说，这是一堆狗屎。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对他太粗暴了。但事情并不在此，应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矩。

瓦·约·斯大林：我请求您，给我一份工作。

克·叶·伏罗希洛夫：会给你工作的。问题不在这里。你应该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应该控制自己，要坚决把酒戒掉。这一点只有靠你自己了。会给你工作的，但是，你自己应该做好准备，无论给你什么样的工作你都能干。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还会遭到以前那样的命运的。我们这里是国家，而不是小店铺，是绝对不能容忍各种坏蛋围在你身边的。关于这一点，除了季莫费耶夫的信以外，我们还得到了其他一些消息。

瓦·约·斯大林：请读一下。

（克·叶·伏罗希洛夫读了军事医学管理总局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局长莱欧克将军的报告材料。在读材料时瓦·约·斯大林气得直耸肩膀。）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生气也没有用，当你的行为不成体统

时，人们是不会沉默的。他们是对疗养院的秩序负责，是对你的行为负责，如果你愿意，也是对你的生命负责。

瓦·约·斯大林：是的，我是喝酒了，但是，上午也不是不见踪影，我去矿泉城了，是当天半夜回来的。我理解您，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父亲去世后，我一直视您为自己的第二个父亲。

克·叶·伏罗希洛夫：但是你并不听父亲的话。当你还在学校学习时，他就多次向我们抱怨过。

瓦·约·斯大林：写这些东西的人大概是没事可干了。应该让他们写一些事实，而这里写的完全是谎言。

克·叶·伏罗希洛夫：这里什么地方不真实呢？你不要否认了，这里写的都是事实。你不是那么简单就被关进监狱的，是根据事实的。现在被放出来了，你应该珍惜这一点。要好好表现自己。

你看，你的妹妹斯维特兰娜就生活得很好，对她从来没有什么警告。她很爱你。而你的行为举止总是这样不正常。如果你鼓起勇气和力量，你是可以改正的。

瓦·约·斯大林：谢谢您，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看，你是不同意我的话？

瓦·约·斯大林：不是，怎么会呢？只是这样的话自然是不会令人高兴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同你一起在疗养院的女儿，娜佳，是哪个妻子生的？

瓦·约·斯大林：是第一个妻子——卡利娜生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当着16岁女儿的面酗酒，你怎么不害臊呢？你可以不当回事，并且可以发脾气。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信时，我们主席团的全体成员都相信这些信件。

瓦·约·斯大林：这是不好。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从监狱里出来了。现在你自由了，大家在帮助你在我们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你应该对此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再重复一次，你没有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行为。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你应该考虑到，同你接触的人当中可能有挑拨者，可能有我们的敌人指派的人。

你妹妹就表现得很好，行为举止都很正确，没有谁能找她的茬。她认为你是个不坏的人。她直截了当地说，全都是这该死的伏特加的罪过。

我再重复一遍，你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为你感到痛心。你要鼓起勇气，要控制自己。

瓦·约·斯大林：谢谢您，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应该坚决保证，今后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了。你能向我发誓吗？

瓦·约·斯大林：说有什么用。应该去做。我将用行动证明。

克·叶·伏罗希洛夫：工作将取决于你今后的表现。如果你还像以前那样，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瓦·约·斯大林：第一位的、最主要的是应该工作。

克·叶·伏罗希洛夫：在开始工作之前，你要同那些干扰你的生活和工作的人断绝来往。如果你不能向我们保证你将会好好表现自己，我们就不给你工作。

瓦·约·斯大林：我想请您帮助我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见面。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答应帮助你，但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外出了。

瓦·约·斯大林：他去了哪里？

克·叶·伏罗希洛夫：去了南方。

瓦·约·斯大林：我能去他那里吗？

克·叶·伏罗希洛夫：不必要这样做。他过三个星期左右就回来。

瓦·约·斯大林：今天我去了马利诺夫斯基[1]那里，向他申请工作，但他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在，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您能批准我偶尔到您这里来坐坐吗？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不反对，如果你来时是清醒的。

瓦·约·斯大林：如果我是清醒的，您就放我进来；如果是醉了，您就赶走我。我现在很孤独，没有人可以商量。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瓦·约·斯大林：任何工作都可以。没事呆着很难受。不好意思央求给什么样的工作。

克·叶·伏罗希洛夫：如果国防部长都不能解决，那么，就只好再等一等了。我再对你说一次——必须立即戒酒。

瓦·约·斯大林：我还不是这样不可救药的酒鬼。等我开始工作，一切就都正常了。我会改正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应该这样，你有毅力，一定要改正。听你的口气，在没开始工作之前，你还可以喝酒。你要控制住自己。

瓦·约·斯大林：我会做到的，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妹妹生活得怎么样？你同她见面了吗？

瓦·约·斯大林：不知道，我不会去她那里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为什么？她很爱你。

瓦·约·斯大林：（非常生气地）她是一个同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的女儿，她不是我的妹妹。我从来都没有断绝、将来也不会断绝同自己父亲的关系。我同她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

① 马利诺夫斯基，Р. Я.（1898～1967），苏联元帅，时任苏联国防部长。

克·叶·伏罗希洛夫：这是不正确的。她从来都没有否认父亲做的一切好事。但是，最后几年你父亲有很大的怪癖，在他周围的都是一些像贝利亚那样的坏蛋。甚至有这样的事情：他问我，我同英国人的事进展得怎样了。他称我是英国间谍。成千上万无辜的人遭到杀害。

瓦·约·斯大林：多么卑鄙的勾当！

克·叶·伏罗希洛夫：这一切都是贝利亚所干的卑鄙肮脏的事情，而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对他随声附和。我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指约·维·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在前线就了解我。那时，我们都住在察里津：他同你母亲——当时还是新娘，我同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和别佳。在工作方面他了解我。当有人诽谤我时，他都立即阻止了，因为他知道我是不会做那样的事的。但是，他们是能够把我杀掉的，就像对其他人一样。斯大林身边的这些坏蛋做了很多坏事。

没有谁不承认你父亲所做的好事。但是，也有许多不好的事情。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在同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打交道时不止一次地差点打起来。

所以，你说斯维特兰娜背叛了你父亲，是不对的。父亲喜欢她，但不能说你父亲一切都是正确的。我们不谈这个了。斯维特兰娜是个非常好的人。

瓦·约·斯大林：愿上帝保佑她吧，我也希望她一切都好。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们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每一个苏联人都应该珍惜这种威望。你不是一位普通的公民，你是一位昨天的伟人的儿子。是的，是昨天的伟人。你应该积极地工作，在我们的社会里同全国人民一起前进。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理想、为我们的国家而奋斗。谁要是要滑头，谁就不是公民。

瓦·约·斯大林：这“耍滑头”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是没有这样，可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为什么总去找你呢？怎样可以担保，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指派的呢？为什么他们要找你呢？

瓦·约·斯大林：确实有很多人去我那里。您是对的，在表面上你是分不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这些人要同情你，对你唯唯称是？

瓦·约·斯大林：有很多人来，你是无法弄清楚所有人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这些人中有很多坏蛋，饶舌的人，他们可能同外国机构有联系。敌人在国外能够利用你的名字来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

瓦·约·斯大林：我完全明白这些。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是没有什么罪过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要赶走这些搬弄是非的人，投身到苏联人民的共同事业中来。

瓦·约·斯大林：我只是想得到帮助，同大家一起工作。没有其他的想法。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将向中央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汇报我们的谈话情况。

瓦·约·斯大林：这个季莫费耶夫，就是你给我读的那封信的作者，他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阿朱别伊，为此事我也大骂了他，并在他的书稿上——就是他让我写评论的那本书——写道：此书是一本狗屎书，绝不能出版。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同他谈过话吗？

瓦·约·斯大林：谈过5次。他的书是描写强击机飞行员的事。有一次谈话时，他骂阿朱别伊，因为这个《共青团员真理报》的原

主编，后来的《消息报》主编，没有刊登他的两篇特写文章。他说：再多的朋友也不如阿朱别伊一个。看来，季莫费耶夫认为，我对尼基塔应该是不满的，但是，我对他除了感激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去过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那里，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做了很多事，我很感激他。所以，当有人说他什么坏话时，我会立即进行尖锐的反驳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现在所说的这些，正好证实了我的话。同这些人断绝往来吧。你喝醉时，会瞎说一气的，而他们会将这些重新编造、补充、夸大，这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不幸。

瓦·约·斯大林：我完全同意您的话，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我相信，您是爱我的，并且只是希望我好。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是爱你的，并且希望你能过上另一种好的生活。你要同妹妹和好。

瓦·约·斯大林：我比她大，不会先去找她的。如果她到我这里来，我会好好接待她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她了吧？

瓦·约·斯大林：七年里，她一次也没有去看望我，我不能原谅她这一点。

克·叶·伏罗希洛夫：斯维特兰娜对你说过很多次，不让你喝酒。

瓦·约·斯大林：她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这一点。她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性格很忧郁，但是，我却经常鼓励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同样在我身上也发生了，而所有的坎坷我都挺过来了。当我在弗拉基米尔蹲监狱时，她也没有来看我，那怕是15分钟也好呀，孩子们都来了。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看，有很多事情你都不明白。你已经掉进过阴沟了，大家把你拉上了正路，如果你再不能控制住自已的

话，那么你还会从正路上滑下去的。

瓦·约·斯大林：我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而不是用语言。

克·叶·伏罗希洛夫：你要保证，从今天开始再也不喝酒了。

瓦·约·斯大林：我不会撒谎。请您多督促我，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回来时，我们同他谈谈，请他接见你。

瓦·约·斯大林：暂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在，我能不能到别的什么地方休息休息？他给了我 4 个月的休假许可证，而我现在只用了一个月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我没被授权领导你。

瓦·约·斯大林：我非常感谢您，亲爱的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与我进行这次谈话。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尽快地得到一份工作。

谈话记录：拉·舍尔巴科夫，莫·莫罗佐夫

№07763

鲁坚科和谢列平致苏共中央

（1961 年 4 月 7 日）

绝密

苏共中央

1961 年 4 月 28 日瓦·约·斯大林服刑期满，将获释出狱。

在监禁期间，瓦·约·斯大林没有悔过自新，表现恶劣，具有挑衅性质，经常要求提供其父亲在世时他所享有的特权。

对于向他提出的刑满出狱后到永久居住地喀山市或者古比雪夫市定居的建议，瓦·约·斯大林声明，他不会自愿迁出莫斯科到任何地方去。

对于要他改变姓氏的建议，他同样也坚决地拒绝了，并声明：如果不能为他提供有关条件（别墅、住宅、退休金等等），那么"他将不再沉默，而要向所有的人说出：当时对他的判决是毫无根据的，是强加在他身上的恣意妄为的行为。"在与他多次的谈话中，他经常强调：出狱以后，一定要设法见到尼·谢·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并且要给各级机关写信和声明。同时还表示，也可能重新向中国大使馆提出申请，派他到中国去，他将在那里治病和工作。

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信：瓦·约·斯大林在获得自由以后，行为举止还会像从前一样不正确。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最适宜的决议是：

根据现行立法例外的程序，在瓦·约·斯大林刑满释放后，将其流放到喀山市，期限是5年（这个城市是不允许外国人进入的）。如果擅自离开指定的地点，根据法律，他将负刑事责任。在喀山市给他提供一套一居室的住宅。

根据医生的结论，瓦·约·斯大林的健康状况很差，他需要长期治疗和退休养老保障。作为在部队服役超过25年的条件，按最优惠的计算发给瓦·约·斯大林退休金每月300卢布（新币）。但是，考虑到他的行为败坏了苏联将军的崇高称号，建议按照苏联国防部的政策规定，发给他每月150卢布的退休金。

在健康状况好转以后，可以将他安置在喀山市的一个航空工厂里工作。

我们认为发给瓦·约·斯大林采用其他姓名的身份证是适宜的。

在获释之前，由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同志同他进行有关的谈话。

附上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草案。

请审批。

苏联总检察长　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

1961年4月7日

№07764

谢米恰斯内致赫鲁晓夫

（1962 年 3 月 19 日）

绝密

致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1962 年 3 月 19 日 13 点整，瓦西里·约瑟夫维奇·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在喀山市去世。

根据初步情况确定，死亡是因为过量饮酒所造成的。尽管医生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提醒，瓦·约·朱加施维里经常酗酒无度。

我们认为不举行军事葬礼，将瓦·约·朱加施维里安葬在喀山市是适宜的。向他的亲属通告瓦·约·朱加施维里已经逝世。

我们请求给予同意。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弗·叶·谢米恰斯内

1962 年 3 月 19 日

【专题说明】

关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

（1933 年 10 月至 1966 年 11 月）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约瑟夫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娜）生于 1926 年，1948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52 年进入社会科学院做研究生。曾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1962 年接受东正教洗礼。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1964 年她和印度共产党员布拉杰什·辛格同居。1966 年，辛格病故于莫斯科。同年 12 月，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斯维特兰娜护送辛格骨灰回印度。到印度后，斯维特兰娜决定不再返回苏联，并经意大利、瑞士，于 1967 年 4 月到达美国。随后相继出版《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和《仅仅一年》两书。1969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其苏联公民权。本组文件包括斯维特兰娜在 1933 年至 1952 年期间给父亲的信，以及她在父亲去世之后给马林科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的信。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付谦、刘明翻译）

№07709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3年10月1日）

你好，我亲爱的、可爱的爸爸，你生活得怎样？身体好吗？亲爱的爸爸，我已经上学了，学校里有很多同学，我非常喜欢那里。学校里很快就放映电影了。

女家庭教师已经到我这儿了。我现在学习德文，学习弹钢琴。爸爸，尽管你不在，我很想念你，但我还是愿意让你在那里好好休息。热烈地吻你。

全体向你致敬

你的谢丹卡

1933年10月1日

№07713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7月7日）

从高加索向您致敬！

您好，亲爱的爸爸！

您生活得怎样？身体好吗？6号那天我们去骑马了（在那里进行了比赛，看哪一匹马跑得更快）。今天我们又去了蛇山脚下，那里有一个养马场。

养马场里有很多阿拉伯马。有一匹公马已经27岁了，另外一匹种马是23岁，其余的马都是纯种的阿拉伯马。

热烈地吻您！

（谢丹卡）

1934年7月7日

№07714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7月8日）

你好，亲爱的爸爸！

你生活得怎样？身体好吗？

我们已经到达索契了。我们是7月7日从热列兹诺沃茨克出发的，今天（7月8日）到达索契。

热烈地吻你（女主人—谢丹卡）

1934年7月8日于索契

№07715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9月14日）

亲爱的爸爸！

谢谢你的信[①] 和桃子。桃子非常好吃，我每天都吃。爸爸，您问我还需要寄什么，我什么也不需要了，这里什么都有。我学习很好。现在功课比以前多了。目前我在学校的时间很长，因为我们这里每节课要50分钟。昨天，我们全班去了农业基地。给我们上课的是另外一位女老师，农业技术员，她给我们讲解了有关蔬菜的一些知识。我们要把这些蔬菜画下来并交给学校。

休息日我去了祖巴洛沃，在树林里玩了一整天，天气特别好。这里天气总是很好，只是今天有点不好，很冷，还下了雨。

再见，亲爱的爸爸。

热烈地吻你。

你的谢丹卡

1934年9月14日

① 指斯大林在1934年9月8日写给斯维特兰娜的信。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引用了父亲的这封信："谢谢你的信，我的小谢丹卡。送去一些桃子，50个给你，50个给瓦夏。如果还需要桃子和其他水果，给我写信，我给你送去。吻你。"（参阅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07717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 年 9 月 25 日）

你好，爸爸！

你生活得怎样？身体好吗？我生活得很好。最近，我们这里天气不好，但一到假日，天气总是特别好。假日里我总是去祖巴洛沃。

我学习情况很好。不久前，我们这里的十月儿童和少先队员们在《消息报》的编辑部举行了集会。《消息报》是我们的辅导者。

在这次集会上我发了言，呼吁少先队员们要在工作中帮助我们十月儿童。出席这次集会的人很多，还有许多成年人。开始我很害怕，甚至都不想发言了，但后来还是发了言，而且讲得很好，完全没有害怕。

再没什么要写了，亲爱的爸爸。热烈地吻你。

你的谢丹卡

1934 年 9 月 25 日

№07719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年10月2日）

你好，亲爱的爸爸！

今天，米·伊·加里宁给我带来了你的信。非常感谢你的信。也谢谢你捎来的桃子和石榴。这两种水果我都非常喜欢吃。

莫斯科现在正是秋天，再暖和的天气不会有了。

最近的那个假日，天气很不好，我也没有去祖巴洛沃。白天去了大剧院。看了一场芭蕾舞《红罂粟》。我很喜欢这个芭蕾舞剧。

我学习还像从前一样，很好。现在给您写完信，我还要给国外的少先队员们写信。今天，我们这里举行了小星星集会，我们决定给国外的十月儿童和少先队员们写信。

我很想给少先队员们写信。

祝你一切都好。

热烈地吻你。

你的谢丹卡

1934年10月2日

№07720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4 年 10 月 3 日）

你好，亲爱的爸爸！

你生活得怎样？亲爱的爸爸，你现在住在哪里？是在冷河岸边，还是在我们在索契住过的地方？

亲爱的爸爸，不能再多写了，因为已经很晚了，应该睡觉了，而且，昨天我已经给你寄了一封信。

吻你，热烈地，紧紧地！

你的谢丹卡

1934 年 10 月 3 日

№07721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5年6月）

你好，亲爱的爸爸！

你生活得怎样？我顺利到达。我很喜欢梯弗利斯[1]。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两天。我们去了奶奶那里几次。我很喜欢奶奶。我已经爱上她了并且还要去她那里。

暂时一切都很好。急忙写信，因为再过十分钟弗拉西克同志就要走了。

很快会再给你写一封长信。

热烈地吻你。

你的斯维特兰娜

1935年6月

① 即第比利斯。

№07723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35年9月2日）

你好，我亲爱的爸爸！

从莫斯科向你致敬。我一路顺利地到达。从车站直接去了祖巴洛沃。第二天拉雅到我这儿来了。这里的天气非常好，很暖和，阳光充足。这阳光是我从南方带回来的。

一眨眼在祖巴洛沃已经过了3天了。31日傍中午时，我回到了莫斯科。我们9月1日开学。

我们的老师就是教我们一、二年级的课程的女老师。我们又开了新的课程：地理、体育，而学年的第二个学期将开历史课。昨天给我们发了教科书，但没有上课，老师只是和我们大家座谈了一下。而今天已经开始正式上课了，并留了作业。

亲爱的爸爸，今年我还想做第一名，而且只得“优秀”，不过有时也可能会得“良好”，但我这里决不会出现“及格”的，而我从来就没得过“差”，我将努力争取在学习期间不出现“差”。

我同马尔法·彼什科娃[①] 坐同桌。

再见吧，亲爱的爸爸！祝你一切都好，而最主要的是身体健康。

我尽量常给你写信，并尽可能写得长些。　吻你，热烈地！

你的谢丹卡

1935年9月2日

① 阿·马·高尔基的孙女。

№07736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0年8月5日）

亲爱的爸爸，你好！

我终于从遥远的、漫长的旅行中回来了，现在正给你写一份完整的报告。

7月30日，瓦夏到红树林里去打猎了，而我去了密谢拉，去检查检查。密谢拉很好，一切还和去年一样，只是天气不太好，下雨，其他的没什么。从那里我又去了一次（第一次是去年的夏天）里察，（但这一次却没有“男伴”）。8月3日我从密谢拉去了冷河。那里的一切都很好，很凉爽，房子是一层的——整个房顶上面都是阳台。8月4日，我去了红树林，瓦夏那里。上帝呀！就是这条路！记得我大概是1932年来过这里，那时是夏天，小路是这么好，简直就是一条公路。而现在，整条路坑坑洼洼，不像样子，彻底毁掉了。我们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车速前进，有时干脆步行。但路的两旁非常漂亮——树林，岩石，小溪。在红树林，除了不停地下雨和大雾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也就是我）在那里呆了一整天，然后，没有等到瓦夏，我就走了。瓦夏一直都在打猎。这会儿，他大概已从猎场回来了，并且正在骂我没有等等他。天气到处都很坏，总是下雨，没有阳光，海上有风暴。

爸爸，我劝你最好是去冷河，因为，第一，那里的房子要比索契这里的好——这里的房子第一层的房间很黑暗，光线不好。第二，那里白天有许多阴凉的地方，还有凉台，而这里只有两个吊

床——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乘凉。

不过这里有游泳池，热的时候也可以凉快一下，因此，这里似乎舒服一些。你来吧，亲自看一看。

亲爱的爸爸，我等你。

信里我就不给你发布什么命令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再玩这种游戏了。可是，你自己应该知道，亲爱的爸爸，你必须去休假了。即使没有我的命令，这一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好了，暂时再见吧，我亲爱的书记，吻你，热烈地，我可爱的爸爸。祝你健康。

你的谢丹卡

1940 年 8 月 5 日于索契

给你寄去一张照片，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照片。两个长尾猴在吃香蕉——斯维塔和马尔法在柞树上。

我没对马尔法说给你寄这张照片，否则她会发火，不给照片的。

再吻你一次，我亲爱的爸爸。

№07737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0年8月22日）

我的亲爱、可爱的爸爸，你好！

你生活得怎样？身体好吗？没有我和瓦夏在你身边，你是否感到很寂寞？爸爸，我太想念你了，总是盼着你能来，可是你总是没时间、没时间。“我已经生气了”。你又在哄我，说什么没有指令不能来，啊—呀—呀！

这不好，一号书记同志，哄骗自己的女主人！

据说，莫斯科的天气不太好，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经常下雨，而我这里天气很好；我29日动身回莫斯科，31日能到达。

我们是9月2号开始上课，因为1号是星期天，休息日。现在地理课可要有麻烦事儿了：又新增加了5个共和国，面积增大了，居民数量增加了，工业企业的数量也增加了——而教科书却还是1938年的。尤其是，今年我们还有苏联经济地理课——而教科书中很多内容都没有。我已经看过了这本教科书；尽管它有两个指头那么厚，但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多余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即所谓的艺术装帧——各种图片，风景画，例如：索契、马采斯塔以及所有疗养区的风景，总之，都是一些谁也不需要的图片。

对了，空军阅兵式你喜欢吗？是比去年的精彩一些呢，还是和去年的一样？不久前，我去了旧马采斯塔，那里修建了一条非常好的道路，笔直的，很平整，非常漂亮。一条非常出色的公路。总之，索契变得干净和整齐了，甚至漂亮得很显眼。

我已记不得，我是否已写信告诉你，我乘坐旅客滑行艇——特别快船——的事情。据说，报纸上报道它的航速是每小时 90 公里，而实际航速每小时不超过 65 公里。但这已经很好了。糟糕的是，只要有一点小风浪，它就不能开了，否则，海浪会把它折断的，因为它的形状就像是用一根横木连接起来的两只小船，里面只能容纳 50 个人。

爸爸，你一接到我的信，就立即给我回信，否则，你过后又忘了，或者又是很忙，而我自己也快回去了。

好了，吻你，热烈地，热烈地，再热烈地，我亲爱的爸爸。

盼望尽快见面。

你的斯维特兰娜

1940 年 8 月 22 日于索契

向我的全体书记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07741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1年9月19日）

古比雪夫市

我可爱的爸爸，我亲爱的人，你好！

你生活得怎样，我亲爱的书记同志？我这里一切安排得都很好，我已经开学了。所有的同学都是从莫斯科来的，熟人特别多，因此也就不寂寞了。

我亲爱的爸爸，每当我去什么地方时，我总是想念你，但现在不知为什么特别想念你。假如你允许的话，我可以坐飞机马上飞回去，住上2～3天（这里每天都有“道格拉斯”飞往莫斯科）。坐火车实在令人腻烦。而坐飞机，假如你允许的话，我现在就可以飞回去。

不久以前，马林科夫的女儿和布尔加宁的儿子都飞回了莫斯科。既然他们可以坐飞机，我为什么不能坐呢？他们和我年龄相同，而且没有什么地方比我强。

这里的天气原来很好，很暖和，而现在却变得很冷，常常下雨。我不很喜欢这个城市。像所有的港口城市一样，这里很脏，风沙很大。（不知为什么）这里有很多跛腿的、失明的、歪肩的、罗圈腿的、残手的和其他方面的残疾人。在大街上几乎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残疾人。还有很多乞丐和流浪儿。

（战争期间）有很多人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奥德萨和其他城市来到了古比雪夫。当地居民对于外来的人怀有不加掩饰的

敌意。他们认为外来人要对物价上涨、食品短缺、经常要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排队买东西的情况负责。古比雪夫人还说："瞧，各种穿着华丽、打扮漂亮的人陆续来到了这里，这样希特勒就要飞到这里进行轰炸了！"

唉，爸爸，我是多么想飞回莫斯科呀，哪怕在莫斯科呆上一天也好啊！！爸爸，怎么德国人又钻出来了呢?！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地、狠狠地揍他们一顿呢？总之，绝不能让他们把重要的工业区都占领了！

爸爸，我对你还有一个请求。雅沙[①]的女儿加利娅现在在索契。如果需要的话，请将奶奶、爷爷，总之所有的人都从那里转送到其他的什么地方去。我多么想能把加利娅带到我这里啊。要知道她那里现在什么人也没有了。

但这一点只是在所有的人都应该离开索契的情况下才需要。而目前还是让他们呆在那里吧。

亲爱的爸爸，我非常想见到你！你现在大概特别忙，这样你就要好好睡觉，否则我这里就会得到情报，说你睡觉太少。这是不允许的，尊敬的书记同志！

好了，祝一切都好，我亲爱的爸爸。

等待你批准我飞回莫斯科。只要两天的时间！吻你，热烈地，再热烈地！！！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因此没有打电话。如果愿意，请给我打电话，从9点到12点（晚上）。其余的时间我都在学校里。也可以早晨挂电话——从10点到2点。

再无数次地吻你，我的亲人，我亲爱的爸爸。

斯维特兰娜

1943年9月19日于古比雪夫

① 即斯大林的长子雅可夫。

№07744

列奥诺娃致斯大林

（1943年6月15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莫斯科市斯维尔德洛夫区第175中学全体向您祝贺，祝贺您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中学毕业并获得优等生毕业证书。学校坚信：今后，无论何时何地她都能够凭自己的才能和顽强毅力进行工作。

受学校全体委托　校长O.列奥诺娃

1943年6月15日

№07747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5 年 12 月 1 日）

亲爱的爸爸，你好！

我还从来没有像收到你的信和柑橘那天那样开心呢。你是正确的，实际上，我现在已经不是小麻雀了，而简直就是一只“乌鸦”了。因此，收到你的信和包裹要比我还是“小麻雀”时更让我高兴。甚至就连小儿子也品尝了橘汁，但是，目前除了粥以外，他对什么都没有概念。

你身体健康，休息得好，我非常非常高兴。否则，不习惯没有你的莫斯科人又会开始传出流言来，说你病得很严重，某某医生去给你看病了。不管怎样，这都是很让人害怕的，而且担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是真的。要知道，你的那些“忠诚卫士”对我什么也不说，什么都保密……

一句话，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你没有生病，而且休息得很好。亲爱的爸爸，请继续保持这一点，现在你什么也不要做了，好好休息。

最近，莫斯科的天气完全变暖了，零下 1 度到零上 2 度，很潮湿，令人讨厌。人们接连不断地患上流感和伤风。除此之外，最近半个月来，每逢夜晚就有一些匪徒和流氓进行抢劫和杀人活动，莫斯科人感到很害怕。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甚至在市中心地区（例如，高尔基大街）人们都害怕天黑以后上街，特别是进黑暗的小胡同里。

今天，有人对我说，有一种传闻，说“斯大林已经回到了莫斯科并发布了命令，要在新年之前消灭匪徒和小偷”。人们总是这样想，如果什么事情和你连上，那就好了…

爸爸，关于热尼娅，我感到你产生这样的怀疑只是因为她很快又重新嫁人了。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关于这一点她本人对我讲了一些，我没有问她。等你回来时，我一定要对你说说，因为，对一个人有这样的怀疑是令人很不愉快、很可怕的，也有些令人难为情。

而且，事情并不在于热妮娅和她的家庭悲剧，而在于原则性问题：请想一下，他们也着实对你说了很多诽谤我的话！……是谁呢？……算了，让他们见鬼去吧。

亲爱的爸爸，让我热烈地吻你，感谢你的非常好的信，紧紧地拥抱你，吻你。

爸爸，请你给我指明“方向”——在欧洲将会发生什么？——我什么也弄不明白，所有的人都在抱怨我们，都在对我们大吼大叫。

（同时还有这样的新的俏皮话：“戴高乐穷极生智”。）

反正我等待着你回莫斯科。

也可能，爸爸，你将再给我寄一封这么好的信？

吻我的爸爸。

你的谢丹卡

1945年12月1日

№07749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7 年 10 月 12 日）

你好，我亲爱的爸爸！

刚刚收到你的信和桔子。为此，热烈地吻你，多次地，再多次地。

感谢上帝，你的身体健康，并能很好地休息。尽管你的休息时间实际上已经剩下不多了，很快就要过节了。

我生活得很好。经常能见到瓦夏，他现在正忙于准备阅兵式呢。

给你寄去一张我儿子的照片（虽然你没有要求寄照片），你看看他长得像谁。

再一次吻你，爸爸，热烈地，再热烈地，并谢谢你的关心。

你的谢丹卡

1947 年 10 月 12 日

№07750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48年11月2日）

你好，我亲爱的爸爸！

急忙向你通报我这里最有趣的新闻：像所有的五年级的大学生应该做的那样，我也教课了，教的是十年制学校的历史课。令人高兴的是，我是在我曾经学习过的那所学校的十年级上的课——以前教过我的老师都鼓励我，这是非常令人愉快的。

我的课的题目是：1）《专制制度被推翻后俄国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1917年）》以及2）《七月危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对讲的课征求了意见并补充了新的材料。自然，还有很多缺点，但总的来说，对我的课还是评价很好的。

爸爸，瓦夏和我都想像去年那样，到你那里过节。8号我们可以飞到你那里，因为7号瓦夏他们将在红场进行空军阅兵式。恳求你能批准我们，三、四天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就让弗拉西克打电话通知我们。

热烈地吻你，亲爱的爸爸，并期望尽快见到你。

你的斯维特兰娜

1948年11月2日于莫斯科

№07752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52年2月10日）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好！

我非常想见到你，向你讲述我目前的处境。我非常想一个人面对面地向你倾诉一切。我曾经几次想这样做，但是，一想到你目前身体欠佳，工作繁忙，又不忍心去打扰你了。

首先，我对能在社会科学学院学习感到非常高兴，我在这里的一切事情进展得都很不错，大家对我似乎也挺满意，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了。因为，在家庭不和的时候，能做我喜欢的、感兴趣的事情，也就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

至于说到尤里·安德列耶维奇·日丹诺夫，还在新年前夕，我就已经决定同他彻底分手了。这完全是必然的结局，因为我们差不多已有半年时间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不知道谁是谁了。他已经非常清楚地向我证明了——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我对他来说既不珍贵，也不重要。此后，又要求我把女儿留给他。不！对这个无情无义的教授、没有心肝的“学问家”我已经受够了。让他去啃他的书本吧，他完全不需要家庭和妻子，他的众多的亲戚们是完全可以代替他的家庭和妻子的。

总而言之，对于我们的分手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遗憾，可惜的只是在这个无情无义、没有心肝的人身上我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美好的感情。

由这件事情产生了一些纯物质方面的问题，我想同你商量一下

这些问题，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得到帮助（靠尤里·安德列耶维奇的施舍过日子我会很不愉快的），但我毕竟还有两个孩子，小儿子秋天就要上学了，而且我的老保姆也住在我这里（她现在已经退休了）。

钱我现在还有——还是你给的那些——所以问题并不只是在钱上。

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我再告诉你原因吧，但这都是些不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爸爸，我仍然很希望见到你，请你千万别生我的气，说我对你先斩后奏了，以前你不就知道这些事情了吗？

最最热烈地吻你！

让你操心的女儿

1952年2月10日

№07753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斯大林

(1952 年 10 月 28 日)

亲爱的爸爸!

我非常想见到你。我任何“事情”或者说是“问题”都没有,只是想见到你而已。如果你允许的话,如果这不会使你感到不安的话,那么,我请求批准我在你身边度过 11 月的两天节日——11 月 8 日和 9 日。

如果可以,我就带上我的孩子们——儿子和女儿。

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节日。

我这里现在一切都好,在城里已安顿得很舒适了。非常感谢你给予我的帮助。

吻你,爸爸。

急切盼望你的同意。

斯维特兰娜

1952 年 10 月 28 日

№07754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娜）致马林科夫

（1953年3月21日）

斯·约·斯大林娜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格·马·马林科夫

我深深感谢政府和您本人在这悲痛的日子里给予我和我的孩子们的同情和关心。

与此同时，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谢绝提供给我的家庭的那些权利，因为这些权利是没有必要的，我认为我们不能享受这些权利：

（1）谢绝把“沃伦斯科耶”别墅及其服务设施指定归我们家使用。

（2）谢绝每月4000卢布的临时生活补贴。

我请求不要指定“沃伦斯科耶”别墅归我们家使用，但请求您允许我有权在夏季的时候，在卢布列沃－乌斯宾斯基公路边上的茹科夫卡苏联部长会议别墅区里租用2～3个房间，房租另付。

再一次表示谢意！

敬礼！

斯大林娜

1953年3月21日

№07765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柯西金[①]

（1964年11月17日）

尊敬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请允许我向您提出如下问题：

1953年3月，在我的父亲去世后，政府作出了一项决定，给我和我的孩子们提供一系列物质方面的帮助。苏联部长会议1953年3月21日第5423号命令的副本还保存在我这里。

根据此命令，我在11年的时间里一直享用着茹科夫卡别墅村的别墅，以及从苏联部长会议汽车基地叫车的权利。这些都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总务局管辖。

我一直并将继续感谢政府在1953年和以后的年代里对我和我的孩子们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我认为，我们在道义上无权永远享受这种人道主义。现在，我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儿子是第一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女儿也已经读七年级了），而别墅主要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需要。因此，别墅已再无必要了，也不需要使用汽车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些也不是必须有的。我们现在很少去别墅，也很少使用汽车，而所有这一切还仍然算在我的名下。除此而外，根据决议，我们使用别墅和汽车都是免费的，而苏联部长会议机构的工作人员使用别墅和汽车都要相应地付费。因此，应该说，在我们总的来说还很困难、很朴素的生活背景下，拥有汽车

① 柯西金，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1904～1980），1964～198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和别墅，并且由国家付费，这一点使我在朋友面前很难为情，总之，在所有人面前都感到很不自在。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我决定请求您向部长会议办公厅下达相应的命令。我没有直接向总务部门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能违背命令的条款，这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除此而外，我也不想让人把我的行动理解为某种示威。我再一次重申，对以您为首的政府我永远心存感激，感谢政府这么多年来为我和我的孩子们所做的一切，感谢对我们的关心和优待。

恳求您，尊敬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正确地理解我，不要拒绝我的可能有些特别的请求。

敬礼

斯·约·阿利卢耶娃

1964年11月17日

莫斯科市——B－72，谢拉费莫维奇大街，2号，第179室，电话：B 1－92－74

№07766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勃列日涅夫

（1966 年 11 月 3 日）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我的丈夫，印度共产党员布拉特热什·辛格，在长期身患重病后，于 10 月 31 日逝世。请您，恳求您，帮助我完成对他最后的义务——我应该将已故者的骨灰送往印度他的亲人那里。这是他们的民族传统。在此我还想再一次强调，他来到这里完全是为了我，如果在印度的话，他现在大概还能活着。这个事实使我在他的亲人面前负有特别的责任。

我知道，我去国外是不合适的。尽管如此，在这些很特殊的情况下，我仍然向您提出请求，并坚持请您批准。

旅行只需 7～10 天，不会再多。他们随时都可以给我办理护照和签证。我丈夫的侄子，国家外交部长迪涅什·辛格在机场接我，从那里我直接去他们家里。我还须要去恒河的卡拉甘卡尔，我丈夫的弟弟住在那里，我们将在那里将死者的骨灰撒到河里。除了这两个地方以外，我什么地方也不去。除了最亲近的亲属以外，我谁也不见。我向您保证，从政治立场方面绝不会发生任何可受指责的事情。

总书记同志，我请求您理解我并批准我在近期内完成我的义务。

敬礼

斯·约·阿利卢耶娃

1966 年 11 月 3 日

№07767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1966年11月4日）

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娜）同志向阿·尼·柯西金同志请求批准她去印度7天安葬丈夫的遗体。

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佩尔谢、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谢列平等同志通过电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表决。

同意阿利卢耶娃·斯维特兰娜的请求，批准她赴印度逗留7天。

责成谢米恰斯内同志派两名工作人员陪同她前往印度。

责成别涅季克托夫[①] 同志在他们在印度逗留期间给予帮助。

康·契尔年科

1966年11月4日

---

① 别涅季克托夫，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时任苏联驻印度大使。

【专题说明】

斯瓦尼泽关于与斯大林一家相处的日记

（1933年9月至1937年8月）

玛丽娅·阿尼西莫夫娜·斯瓦尼泽（1889～1942）出生于梯弗利斯的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彼得堡高等女子学校和格鲁吉亚音乐学院，1921年与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斯瓦尼泽（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哥哥）结婚。自20年代初亚·谢·斯瓦尼泽到莫斯科工作后，他们一家与斯大林一家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斯瓦尼泽夫妇后来却成为镇压运动的牺牲品。亚历山大·斯瓦尼泽于1937年12月被捕，1941年8月被处决；玛丽娅·斯瓦尼泽于1939年被捕，1942年3月被处决。本专题文件收入了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给玛丽娅·斯瓦尼泽的信（这封信说明了她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玛丽娅·斯瓦尼泽1933年至1937年期间的日记片断。日记记录了作者所目睹的这一时期斯大林在家中与孩子、亲戚和苏联高层领导人相处的情况，以及她对这一时期重大事件的经历和感受。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赵国顺翻译）

№07768

阿利卢耶娃致玛·阿·斯瓦尼泽

（1926年1月11日）

亲爱的玛露霞：

对您的来信以及您的关心，我非常感谢。我为自己无以酬报而感到很难为情，但在我们莫斯科让人喜欢的东西很少。真遗憾，您没有来。下次一定等您。

您在信中说感到很寂寞。您知道，亲爱的，在哪儿都是如此。我在莫斯科根本不同任何人来往。有时都感到奇怪：这么多年竟没有亲近的朋友，但这可能是由性格决定的。而且奇怪的是，我感到同不是党员的人（当然是妇女）比较好相处。这大概是因为这些人头脑比较简单。

非常不幸，我又被新的家庭绳索缠住了①。这在今天是件让人不太好受的事，因为新的偏见实在太多了，既然你不工作，那么你理所当然就是一个“婆娘”，尽管也许你不工作是因为你没有兴趣干非专业性工作。可现在，尤其是在我以后料理家务的时候，我无法考虑专业上的事。亲爱的玛露霞，我真希望您能在国外为回国工作充实点东西。这很重要。您想象不出，只是为了工资而工作并且什么工作都干，是多么难受。一定要有专业，有了它你就不会像做一般“秘书”工作那样被人随意支使，而是能做一切与专业有关的事情。

---

① 此时阿利卢耶娃即将分娩。2月28日，斯维特兰娜出生。

从阿廖沙[1] 那儿听到有关托利亚[2] 的非常令人高兴的消息。真是个好孩子，可说起雅沙我实在讲不出这样的事，我对他将来会变得聪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根本没有任何兴趣和任何目标。真不知是怎么搞的。我替约瑟夫感到非常惋惜，非常难过，这件事有时（在与同志们闲谈时）非常令他伤心。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托利亚在德国仍能把握自己，而在那里是很容易放纵自己的。

我现在感觉很好，尽管很快就要生了。我在急切等待这一时刻，因为行动已经十分困难，而且样子也很难看。等生完后我一定告诉您是男孩还是女孩。希望一切都会顺利。

好啦，亲爱的玛露霞，不要苦闷了，要学习专业知识，下一次一定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很高兴的。约瑟夫要我向您转达问候。他对您很有好感（总称您"能干的'婆娘'"）。请别生气，这是他用来称呼我们的口头语（"婆娘"）。

祝您一切都好。紧紧地吻您，再见。

娜　嘉

1926 年 1 月 11 日

① 斯瓦尼泽，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1884～1942），革命前从事地下工作，党内化名阿廖沙·斯瓦尼泽。1920 年起，先后在外交、财政、对外贸易等人民委员部和苏联驻外机构任职。1935～1937 年任苏联国家银行理事会副主席。

② 玛·阿·斯瓦尼泽的儿子 。

№07769

玛丽娅·阿尼西莫夫娜·斯瓦尼译的日记片段

（1933年9月11日至1937年8月7日）

莫斯科

1933年9月11日

……在富于幻想的少年时代，我曾以为自己有许多方面的天才——我既会画画，又会雕塑，能写作，能唱歌，而这一切无疑都像我曾勤学苦练过的唱歌一样微不足道。我已经忘记了写作，12年了，我一直没有坚持写日记。这首先是因为，自从我明白我甚至不能做到完全坦白地和诚实地面对自己以后，我便不再喜欢写日记这种形式了。而就整个写作而言，我当然不能自欺自慰——我没有天才，并且毫无这方面的修养。在我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动荡之后，记忆力已大大衰退。我不得不停笔，现在也不想写。晚上我们要去别墅（科尔丘加村）。我的孩子们在那里。天气又潮又凉，我的气喘病又在折磨我了。我乐意到城外去。我非常喜欢我们夏天住的地方。来莫斯科的头几年我们曾住在那里，离娜嘉[①] 不远。现在她不在了，但她的家和那所房子对我来说仍很亲切。

我们13日返回。

① 即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

昨天晚上去过列坚斯·纽拉[①] 家，巴夫卢沙和热尼娅[②]、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埃利亚瓦[③] 也在那儿。寂寞，随时随地都感到寂寞。一切都不是那样……没有娜嘉和玛露霞[④] 在身边我感到很孤单。娜嘉死了，而玛露霞走了，我们分别已经4年了，只是偶尔见面在一起呆一两天。新的朋友已经不会再有了，已经过了那个年月。把我同巴维尔和热尼娅维系在一起的只有对娜嘉的回忆，但是谁也替代不了她同我的友谊。她人很聪明，品格高尚，真诚直率，为人公正。她从不诋毁任何人，从不拨弄是非。

可是我们这位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却没完没了地唠叨，对谁都看不惯："瞧那个佐伊卡·罗森戈尔茨，居然也跑到巴黎去了。"

"这个娜塔什卡搞了个叫罗森涅尔的，是个西班牙外交官"，而"叶戈罗娃可是个跟谁都鬼混的人"，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昨天她突然又对我说："我们得想办法不让人家说我和您的坏话（!!!）"。我对她说："不要理睬任何闲话，不管它，谁说闲话谁就比我们坏。还要看说什么。格鲁吉亚女人说我们是出于生气，因为我们嫁给了两位著名的格鲁吉亚族干部，而我们又没惹着谁。"但终究还得让他们说，说我是个凶恶的女人，说我影响丈夫，说我使他离开了故乡（格鲁吉亚），等等。甚至有人说我比政治局还厉害，因为我能取消它的决定。（曾决定派阿廖沙去格鲁吉亚担任外

① 安娜·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列坚斯，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的姐姐，其丈夫列坚斯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

② 斯大林妻子的哥哥巴维尔及其妻子叶夫盖尼娅。巴维尔·阿利卢耶夫当时在装甲坦克总局工作。

③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埃利亚瓦，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沙尔瓦·祖拉博维奇·埃利亚瓦的妻子。

④ 这里大概是指她自己的兄弟鲍里斯的妻子。

高加索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后来任命又被撤消。[①]）这有什么，非常好。至于说我的“化妆品”和口红，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周围的妇女现在穿戴得比我好得多，而且尤爱涂脂抹粉。阿廖沙的确时常同我吵嘴，但这其实不那么可怕，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而我本来就是一个德行好得令人厌恶的女人。

1934年7月30日

阿廖沙11点15分走了[②]。我将一个人孤思独想60天。离开车站后我们（有琼尼、博里亚、托利亚）就回家了。找了一阵护照，没有找到。然后又去别墅。我和米高扬夫妇打了一会儿网球。下了一阵暴雨。琼尼去散步，浑身都湿透了。接着我们看电影。别尔斯基夫妇和“美男子”沃龙佐夫也来了。大家又去打排球，而我看维诺格拉多夫写的古代史，又给阿廖沙写了封信。10点半到米高扬夫妇那去了。现在2点，我身穿睡衣，坐着写这几行字。今天米高扬被任命为食品工业人民委员。

我的情绪是宁静的，有一点忧郁。很想沉思内省，以便有所领悟，有所决定。约·[③] 是28日动身去索契的。动身前我没有见到他，都怪阿廖沙。我当时心情不好。最近两个月阿廖沙总不让我同他周围那些人来往，而我很想接触他们。

我外出的事还一点没有想好。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不会去皮亚季戈尔斯克。可能9月份我还是去索契洗马采斯塔温泉浴。我要去睡觉了。我现在胖得不得了——84.5公斤。

---

① 1932年10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斯瓦尼泽为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但斯瓦尼泽因不愿同被任命为党的外高加索边疆区第一书记的贝利亚共事而拒绝接受这一职务。为此，中央政治局撤消了这项任命。

② 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斯瓦尼泽率代表团去中国新疆。

③ 指约·维·斯大林。

1934 年 7 月 31 日

9 点半起床，当时正下雨。11 点半一个人出去散步。走了 8 公里。1 点半回来又躺下睡觉。2 点半和琼尼一起吃午饭。

然后同阿什亨[①] 和阿努什打了两个半小时网球。洗完澡、换好衣服后，又同布留玛·萨夫维奇娜和阿什亨去散步，正赶上下雨，浑身上下都湿透了。

我们在阿什亨家吃完晚饭又坐到 1 点半。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和一位阿塞拜疆的同志一起回来了。他们说必须安排好向北方供应蔬菜、水果、罐头食品的工作，搭建温室，把钱用在扩建水果罐头厂和水果晾制上。在连科兰已经种植茶叶和柠檬（暂时是桶种），还想栽橙子树（波斯的）。我讲了欧洲如何利用空中运输工具来运送蔬菜、水果、鲜花，还讲了包装情况。南方生长的所有东西那里一年四季都有。我国国土辽阔，有着各种土壤和气候条件，我们国内又没有边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大规模将南方的果实调往北方呢？没有车厢，运输工具不足，在丰收年里南方的果实都烂掉了，而北方却缺乏维生素，孩子们在生长过程中吃不到经过光合作用产生的食物。

1934 年 8 月 1 日

……7 点钟卡佳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要来接热尼娅。不出我所料，她没有来。既然约·去了那里，那么她显然愿意和他见上一面。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我和卡佳、托利亚已回到别墅。琼尼到公路边接我。

9 点进家门。现在是 11 点，我看了一会儿古代史。脑子不好

① 米高扬的妻子。

使了，记忆很差，看过的东西一会儿就忘。非得像小学生一样坐在那儿死记硬背，才能记住点儿东西……

1934年11月4日

昨天，在时隔3个月后，又见到了约·。他是29日从索契回来的。看上去气色不错，晒黑了，但瘦了许多。他在那儿患过流感。

大约7点，我们（我，纽拉、热尼娅）到他那里去。他不在家，也不知道（总是这样）他是否回家吃饭、会不会直接去别墅。我们和孩子们呆了一会儿。大家坐在瓦夏的屋里，忽然他沿着走廊走过来。尽管天气又凉又潮湿，可他却穿着一件薄外套（他总不爱按季节更换衣服，很长时间都穿夏装，大概是穿惯了，春天也一样，总是穿西装，把这些衣服穿破后就该穿新的了）。他腋下夹着一个材料夹（他不喜欢皮包，也从来不用。材料总是放在夹子里或者干脆用报纸包着）。跟随他身后的是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和雅科夫列夫[①]。他们大概是开完重要会议后来吃饭的。孩子们都跑去追着爸爸。整个房子里的人都忙碌起来，走来走去，大家开始迅速地准备饭菜。我让纽拉到餐厅去问一下，我们留下是否方便。

约·请我们入座。他对我很热情，跟我握了手，又打听阿廖沙的情况。我当然要借这个机会埋怨他们几句：把我丈夫发走了3个月。卡冈诺维奇连忙去给斯托莫尼亚科夫[②]打电话，但是人没在。我说，有一封电报写的是1日动身返回。大家都安慰我，说7日以前阿廖沙就会到家。

约·和热尼娅开玩笑，说她又胖了，而且对她非常温柔。这时

---

① 雅科夫列夫，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1896～1938），原姓爱泼斯坦，1929年起任苏联农业人民委员，1934年起任党中央农业部部长。

② 斯托莫尼亚科夫，Б.С.，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我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我一直观察他俩。香槟酒打开了，我们干了几杯，是约·提议逐个为大家干杯的。我举起酒杯，说我们都为他的到来感到幸福。斯维特兰娜一直偎依在父亲身边。他抚摩她，吻她，用爱抚的眼神看着她，不时关爱地从自己盘中挑几块好吃的给她吃。她给他写了第4号命令，要他允许她在“利普基”过节（6、7、8三日），那里有他的一处别墅，地方是娜久莎选的，她死后才建好。约·不太喜欢这个地方，所以很少去那里。他最近半年常去“伊万诺夫卡”，而他最常去也喜欢去的是“祖巴洛沃”。从1921年起，他革命后的全部生活都同“祖巴洛沃”联系在一起。我还记得我们相识的整个过程以及我同娜嘉的全部友谊。

饭后约·的情绪非常好。他走到长途电话机前呼叫基洛夫，以诙谐的口吻谈论起取消票证和提高粮食价格的事。他让基洛夫立即来莫斯科，以防止列宁格勒州因粮价提得比其他州高而利益受损。大概是基洛夫在推辞，约·后来又把听筒递给卡冈诺维奇，后者劝基洛夫到这里来待上一天。约·喜欢基洛夫，看来他从索契回来后很想同基洛夫见一面，洗洗俄罗斯蒸汽浴，顺便开开玩笑，而提高粮价的事只是个借口。

大约10点［约·］打算带孩子们到郊外去。他招呼着男人们。他们看来不太想去，但又不好直截了当地坚决回绝。约·抱怨没睡够，显然是想到别墅后躺下好好睡一觉，可他又叫男人们去打台球。也许这多半是出于好客。

我们留下来和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这位女管家在他们家已经生活了8年）一起喝茶。我们谈起孩子们，特别是谈瓦夏。他学习不好，凭借自己的名字和父亲的地位，对所有长辈、老师和照管他多年的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说话粗暴无礼。

要是约·知道所有详细情况是会受刺激的，他很累，希望家中安逸，孩子们不闹事，他一听到孩子们争吵就感到厌烦。必须设法

从侧面劝导孩子们，特别是瓦复，让他们从对父亲的爱出发——他们无疑是爱他的——来改正错误，不要使他生气和伤心。

为他们学习、发展和进步所创造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可怕的是，孩子们已感到自己的特权地位，这会害他们一辈子。伟大的父母永远不会有出色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所处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他们从童年起就注定是无所作为的。娜嘉曾想方设法培养孩子们过清心寡欲的生活，然而她死后一切都付诸东流了。所有为约·这样一位时代伟人的孩子服务的人毕竟也能得到好处，因为这些孩子生活在特殊条件下，他们可利用孩子们的这种特殊条件获得实惠。

我们向约·道别，不知何时还相见。我告诉他，30日给他的卫队长打过电话，说我们想就约·的归来向他表示问候，但卫队长（鲁勉采夫）说约·正在休息。约·说没有人向他报告过这件事，并对此表示不满。我感到欣慰的是，他身边的人对他照顾得如此精心，一般人是很难接近他的。为这件事他直接往自己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为的是让所有有事同他商量或要同他交谈的人能够把电话打到他那里。他个人善良，真诚。

1934年11月14日

12日（休息日）我和热尼娅在斯维特兰娜那儿。我们是4点到的，与女孩子们和保姆一起喝茶。家里正为约·的到来作准备。

他与斯维特兰娜通过电话，女儿请他和基洛夫来祖巴洛沃。

6点左右，约·、瓦夏和基洛夫到了。他们先到楼上去喝茶。我们相互打过招呼，但由于我们也在喝茶，便没有随他们上去。女孩子们作了木偶表演，约·也过来看。他被简单的表演逗得直笑，看完一幕后他说："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看的表演"，嘴里还叼着烟斗。然后男人们去打台球。一小时后又是一阵忙碌，来了一辆汽车，这才明白他们要去近郊别墅（"伊万诺夫卡"）吃饭。约·

看上去气色不太好，咳嗽了几声。他的心情不愉快。

他同斯维特兰娜见面时的亲吻令人感动，他对她是多么温柔、爱怜。他和基洛夫穿好衣服后，他们一同去孩子们的房间告别。约·问我阿廖沙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我忍不住一口气说出了我所担心的一切，说出了我的看法：有人故意让他滞留在那里（据说他滞留在那里对某些人有好处）；埃利亚瓦总是对他冷嘲热讽，说他是个怪人，总是表情冷漠，等等。由此看来，有人想败坏阿廖沙作为工作人员的名声。

约·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他极为了解阿廖沙（也就是知道他的价值），但我还是说，阿廖沙工作比谁都出色，大家不应该任意地攻击他。最后，我终于感到心中有愧，不该任性地乱说一气。可是约·非常善良。他马上便询问阿廖沙的情况，并吩咐发一封电报。第二天瓦夏打电话告诉我，“爸爸发了电报，让您不要着急”。我说，如果知道是 4 个月，我就和阿廖沙一起去了。约·说：“要是去前线呢?”我说，那也去。“是的，我们了解您，谢尔戈就带季娜去过，到了前线她就在他耳边不住地唠叨，他很不高兴，您也是那样的人。”

他身穿一件紧绷绷的、没有任何饰物的军大衣，戴着保护色的呢制帽。

他邀请我们到别墅去，但由于他先前已说过是去工作，我和热尼娅便没有回答他的邀请。他有时邀请别人是出于礼貌。

他同我们告别后便和基洛夫、瓦夏走到门外，两辆汽车一转眼就不见了。他喜欢坐快速车。

我们吃过晚饭，回自己的住处拿上东西，然后就带着斯维特兰娜回城了。

昨天收到的电报说，阿廖沙在阿拉木图，还要等 6～7 天他才能回到莫斯科。

昨天我因病躺了一整天。今天的天气非常糟糕。本来打算和热尼娅出门，但是“将军”（我这样称呼巴夫卢沙·阿利卢耶夫，而且已成习惯）也许今天来。巴维尔没有来，那我就和热尼娅去看戏或者去列坚斯家。

9月26日[①]

阿廖沙是20日回来的。目前一切还好，但随时都可能出轨。他带回来一大堆中国礼品。房间立刻就被那些漂亮的、令人赏心悦目的东西装饰得五彩缤纷。图案鲜明的花布、丝绸，色彩、线条和响声构成一种和谐的组合，使人感到愉快和惬意。

看来追求美与雅是人性的本能需要，而且只有不完善的社会生活条件才会使人失去一切美好的东西。

22日我建议阿廖沙去看约·，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在阿廖沙回来后不马上去拜访约·，他会怪我们眼里没他。

给孩子们带去了一些礼物。我到得稍晚一些，大家都已经在餐厅里了：约·、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阿廖沙，还有孩子们。我进来后约·问我：“喂！邮包收到了吧？”我一下子没听明白，他用烟斗指了指阿廖沙。“是的，是的，总算收到了”，我回答道。午饭吃得很热闹。斯维特兰娜写了一纸命令：“我命令允许我和你一起去看戏或看电影”，然后签上名——“女主人谢丹卡”。收件人是——“我的第一书记斯大林同志”。她把纸递给约瑟夫，他说：“好吧，我服从”。这样的游戏他们已经玩了一年。

斯维特兰娜是女主人，她有几个书记。第一书记是爸爸，然后依次是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以及其他几个人。她与基洛夫很要好（因为斯大林与他关系非常好，非常亲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34年11月26日

密)。斯维特兰娜每写一份命令,约·都要签上名,然后用图钉把它们钉在餐厅电话机旁的墙板上。所用的语言总是和上面提到的差不多。我还没有见到过爸爸拒绝女儿的情况。他对她的爱温暖而又富有柔情,她也是如此。瓦夏最近半年也一直同父亲在一起。但从内心来讲他不指望讨父亲喜欢,因为他学习不好,而且在学校的表现总是“中等”。周围的人都对父亲隐瞒瓦夏的所作所为。在父亲面前他是个不声不响而又听话的孩子。我们和孩子们一起都去小剧院看戏(……《代人受过》)。起初约·闷闷不乐(第二幕有一个瘦弱的女房东,可惜不是雷若娃扮演的)。可是后来他对演出满意了,并多次露出笑容。幕间休息时大家热烈地讨论表演、演员特征、化装。我不时地和斯维特兰娜走进里间,男人们在里面喝茶、吃水果。瓦夏给我们包厢送来了橘子。包厢里还有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伏罗希洛娃和侄女特鲁达以及塔尼娅·伏龙芝。演出结束后莫洛托夫把我们送到克里姆林宫,还未进家门约·就请我们去城外(近郊别墅)。在那里他向阿廖沙询问旅途情况,对气候和道路很感兴趣。我问他以前是否去过东方国家。“没有,我连里海东部和土耳其斯坦边疆区都从未去过。”晚饭时他对招待得不好有些生气,他问胡瓜鱼是谁送来的。一个姑娘去厨房问清后报告说,胡瓜鱼和鲑鱼是基洛夫送来的。晚饭比以往简单些,不是特别好。他不知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他半开玩笑地抱怨我,说我因阿廖沙不在对他喊过:“你当然对我喊过,而且第二天还通过别人道歉呢”(我是曾请瓦夏原谅,说不该过于冲动)。总之,我当时既懊悔又高兴,因为我们的关系是纯洁的、友好的。晚饭后(2点)他问我们是住在他这儿还是回去,我们表示愿意回去,于是他便吩咐备车。我们2点30分离去,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所大房子里。一想到他孤单一人的情景,心里老是感到不安。

阿廖沙给他带回来一张虎皮。他对此没有兴趣。“我给过你一

张熊皮，另一张给了瓦夏，因为我不喜欢房间里有兽皮，它们毕竟有味。你把虎皮也拿回去吧。”阿廖沙执意不肯，还问他是将虎皮制成地毯还是标本。“得啦，标本是孩子玩具，最好还是做成地毯铺在地板上。你是在哪儿弄到它的，是买的吗?”是的，虎皮是阿廖沙买的，满以为会让约·高兴一番。阿廖沙还询问可否把新疆政府盛[①] 等人的礼品送来。第二天卫队长把它们取来了。我在那里待了几天，但没有去过摆放礼品的餐厅和办公室。也许他会把这些礼品送到斯维特兰娜的房间去。他的房间里陈设非常简单。有一些书和几张画，家具很普通，都是生活必需的。惟一的奢侈只是沙发，约·住的每个房间里一般都有几个沙发，它们样式各异，往往颜色也不同。

今天是12月2日，上次没有写完，因为当时阿廖沙回来了，我赶紧把本子藏了起来。

28日夜里我做了个噩梦。我们正在什么地方做客。这是一个大房间，宽大的桌子上铺着白色的桌布，桌上零乱地摆着酒瓶和酒杯。房间很大，人却不多，我不记得都有谁。忽然，约·走进来。我感到很惊讶，我想，他怎么不顾身份随随便便就来到这个他从未来过的地方。他神情忧郁，不知为什么把坚硬的黑胡子给剃了，他走到一个身材比他矮的人跟前，抱住那人并把头放在他肩上，脸色很难看。我边看边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令人震惊的事，约·的心中忍受着某种巨大的悲痛，所以他才来这里，所以他才抱住同志。我心里难过起来，而且难过了3天。我总是说“做了个噩梦，心里不好受”，昨天还对斯维特兰娜的保姆说，不知怎么两次梦见了“主人”，并且心里难过，而她说：“他可别生病”。

昨天9点从别墅回来，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它使我们

① 盛世才（1896～1970)，时任新疆省督办，一度采取联苏联共政策。

感到悲痛，使所有人感到巨大的悲痛，而对约·来说，悲痛尤甚。谢·米·基洛夫被坏人杀害了。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谁都喜欢他，而且他同约·的关系很好，深得约·的喜爱。这一打击使我震惊。这是一次前所未闻的暴行。这对党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对我们所有非常熟悉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约·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以英雄的气概经受住了失去娜久莎的一切痛苦和悲伤，然而时隔不久他又经受了如此巨大的考验。

而从事情的另一方面看，恐怖活动作为目前遍及欧洲的一种现象，其本身是可怕的。这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它的可怕之处在于盲目发泄仇恨，遭受无情打击的可能是最优秀的人，就像这次一样。

11月12日我最后一次握过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手，当时我们在主人家看木偶剧。当我为阿廖沙而着急并与约·交谈时，他穿戴着大衣和制帽站在一旁，习惯地努起嘴唇，用他那蒙古人特有的深凹的眼睛机敏而又认真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们走后，我感到很不安，他会怎么看待我和我的不理智行为呢？

今天报上登的都是悼念和回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文章。我一篇也没看。我的心中充满悲伤。我真想马上到约瑟夫那里，倾吐或聆听关于这位早逝的杰出人物和工作者、组织者、演说家的一切肺腑之言。他的朴实、直率和无可怀疑的过人才智令我折服。季娜已去列宁格勒做基洛夫妻子的工作，使她能够承受住这次打击，由于她正在住院，所以这一切发生时她未在场。谢尔戈一听到噩耗就失音了——他与米罗诺维奇一起工作了许多年（在高加索）。

12月2日晚9点。唉，失去与之有着看不见却可以感受到的联系的人真是太痛苦、太悲伤了。

1934年12月13日

有必要记述一下葬礼，确切地说是同谢·米·基洛夫的最后一次告别，我和阿廖沙都去了。

12月5日我们有进入圆柱大厅的特别证件，那里安放着基洛夫的遗体，供大家瞻仰。5日晚上10点关闭入口，只有经治丧委员会允许（有卫队长保克尔的签字）才可通行。从特维尔大街拐角处起就设置了警戒线，横放着一辆辆卡车，站立着一组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确切些说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校的学员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我们穿过警戒线时遇到了阻碍。虽然有证件，可有人说证件10点以前有效，是一位指挥员下令放我们过去的。起初我们从一个窄小的特别入口进去，但那里不准我们往上走，而让走正门。在正门处，最后一批瞻仰者和代表团正排成两行向上走，像一条活动的带子沿着阶梯默默向上伸展，绕过灵柩后从另一个出口出去，门外就是德米特洛夫卡。我们走进了一间平常演出时供演员用的房间。这里有列队等待的守灵队伍，还有挤做一团的持有证件的人，他们可以在10点以后留下来参加火化前的最后告别。妻子、姐妹和亲密同志——主要是女同志围坐在灵柩旁。列坚斯吩咐把我们（阿利卢耶夫一家，我和阿廖沙）领到亲友前，于是我们进了大厅。那里还有最后几个瞻仰者在慢慢走着，然后相继离去。每3分钟更换一次守灵队伍，因为在11点之间还有许多人想尽最后的义务。大厅里灯火闪耀，四处悬挂着厚实的红黑相间的（大厅为两色的）长毛绒旗子，高达天花板。在大厅中间，从主席台看是在左边通道和包厢一侧，放着灵柩，一个饰有波纹摺边的普通红色灵柩，下面铺着红色长毛绒垫。基洛夫的脸色青里透黄，鼻子尖尖的，双唇紧闭，额头和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嘴角明显下沉，显得很痛苦。左边鬓角和颧骨上有磕碰的青斑。灵柩四周有许多花圈，

交叉着的红色条带上有各个组织、各位同志的签名。灵柩右侧的椅子上坐着基洛夫不幸的妻子，她的两个姐妹以及基洛夫的两个姐妹。姐妹俩没有见到兄弟，从 1921 年起就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他和她们都姓科斯特里科夫，由于她们一直与兄弟分开生活（当时有一个老太太抚养他），后来又从家乡迁到原彼尔姆省的腹地（她们是乡村教师）并一直住在偏僻的地方，所以她们不知道她们的兄弟是一个大人物。从报上看到兄弟的照片后，她们才与他联系上。而见到他时他已经死了，因为此前没有机会来看他。玛丽娅·李沃夫娜·基洛娃近来一直重病缠身（她得过脑溢血，半失语），而现在这种巨大的悲痛又突然袭来，所以她现在完全成了一个废人，说话语无伦次，很少哭。

在那儿坐着的还有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伊里奇娜、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伏罗希洛娃、纽拉·列坚斯、季娜·奥尔忠尼启则、列宁的弟弟、玛丽娅·普拉东诺夫娜·奥拉赫拉什维利，另外还有我们。

四周都是摄影聚光灯。一大群手拿“莱卡”相机的摄影师和卫队围在旁边，主席台上大剧院的乐队在施泰因贝格的指挥下不停地演奏着。地板已被踏脏，灰蒙蒙的，到处都是尘土，空气中散发着混合着鲜花、土和常青植物的气味，令人感到难受。虽然灯全都打开了，可透过泪水仍觉着周围昏暗、阴沉，极不舒服（在梦中我就是在一个大房间里，房里很乱，我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是谁……）。从 11 点起大家的精神都紧张起来，不时朝雄鹰——我们的领袖们——应该出现的方向张望。

公众从 10 点起停止入内。大厅里的人已不多了。所有人都穿上大衣（我们也赶快去穿上了），焦急地等待着。音乐出现了几次长时间的间歇，这时只听得到卫队沙沙的走动声和守灵队伍轮换时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我们大家都很紧张，不时小心地看看四

周——是否都是自己人，是否都经过检查。但愿一切顺利。终于听到了领袖们坚定有力的脚步声。从静卧着的基洛夫的头所朝的方向（所有人都是从相反方向进来的）走出了约·，周围是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米高扬、波斯特舍夫①、彼得罗夫斯基② 等人。科尔克③、叶戈罗夫④ 已经站在另一侧，还有几位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两人一组参加最后的守灵。约瑟夫站在基洛夫头旁，而其他人的位置我不记得了。乐队奏的是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周围反光镜吱吱作响，照相机发出咔嚓咔嚓声，摄影机不停地转动。这一切持续了几分钟，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漫长过程。

聚光灯一个个熄灭，乐曲渐渐停止，卫队已备好了红色绳索和封灵柩盖的螺丝并准备抬起花圈，很快就要结束最后的仪式。

约瑟夫走上灵柩的台阶，神情悲伤，他俯身吻着死去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的前额。这情景令人撕心裂肺，谁都知道他们曾经亲密无间，大厅内一片哭泣声，我透过自己的啜泣听到男人们的呜咽。谢尔戈向死者告别时也哭得很悲痛——他是基洛夫的亲密战友。接着走上来的是脸色异常苍白的莫洛托夫和身材肥胖、行走笨拙的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俯下身但没有吻死者，阿·伊·米高扬在另一侧叉开双手撑在灵柩上俯下身子。告别结束了。出现了短暂的停顿，因为人们不知道女亲友们走不走，不过玛丽娅·李沃夫娜不好办，医生们围着她，给她输液，都在为她忙着。领袖们先走了。大家忙

① 波斯特舍夫，巴维尔·彼得罗维奇（1887～1939），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② 彼得罗夫斯基，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1879～1958），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

③ 科尔克，阿弗古斯特·伊凡诺维奇（1887～1937），时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

④ 叶戈罗夫，亚历山大·伊里奇（1883～1939），时任工农红军参谋长。

着拧紧灵柩盖上的螺丝，拿开花圈，准备抬灵柩。

我和已经怀孕的纽拉慢慢向外走，并在门口停了几分钟等候抬着灵柩的送葬队伍。灵柩被抬上一辆装饰着红花绿叶的卡车，花圈也放在上面，然后卡车在几辆小车的护送下沿奥霍特内街和莫霍瓦亚街向火葬场疾驶而去。仪式结束，哨兵撤走，人们各自离开。到了早晨，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已成为一捧灰，而全体人民心中仍保留着对他、他的事业的清晰的记忆，还有向敌人复仇的怒火。

我们没有去火葬场，而是到克里姆林宫去找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伏罗希洛娃。谁也不想一个人呆着，心里非常难过，也很不安。我们谈论谢·米·基洛夫，观赏新疆礼品——花瓶和刺绣，这是阿廖沙带给伏罗希洛夫夫妇的，大家认为我们的产品要好一些。晚饭后1点多离开伏罗希洛夫家。恰好这时从莫洛托夫家出来一群人，周围是忙成一团的卫队，还有汽车，这些人都朝“主人”家的方向走去。

列坚斯的“林肯”车在奥尔忠尼启则家附近等我们，于是我和纽拉坐上车回家了。车把我们送到家。热尼娅和帕夫卢沙同克列斯京斯基[1]去了火葬场，当我们回来时，他们已经在家里。那里没有举行仪式。棺木马上被放入地下室。

第二天上午，由于没有入红场的票，我们11点便动身去城外，然后在那里通过收音机从头至尾听了安葬仪式。6日安葬完毕，7日罗森霍尔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就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别墅举行晚会，我们的达官显贵们跳舞一直跳到第2天早上。晚会是为来访的莫尔尚多（法国贸易部长）举行的，他此次访苏恰逢这悲痛的日子，因而收获不大。我们那些阿谀奉承者不会表现自我，不会展示

① 克列斯京斯基，尼古拉耶维奇（1883～1938），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真正苏联人的坚强不屈的精神特征并适当地表示哀悼，而是起劲地跳舞。难道此事得到了政治局和中央的同意和鼓励？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难道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国家不幸失去自己的英雄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当着法国客人的面哀悼他吗？遗憾的是，在我们9日去约瑟夫那里时，由于不便我没有向他提起此事。

8日我们参加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为法国客人举行的茶话会。我当时穿着一身绿色套装。大约有200人出席，所以我们可以悄悄地避开外宾，同自己人（苏联人）坐在一起交谈。与我们坐在一桌的是谢·米·布琼尼[①]、格克尔、马里亚欣[②]、德洛亚茨基、巴雷什尼夫。我们同列娃·马里亚欣一起谈论基洛夫，谈得很多，很亲切，也很真诚。我们很有味道地喝了茶，吃了三明治和饼干。到7点钟大家就散了。

当天法国大使馆举行晚宴，但没有舞会。他们比我们的部长们更有分寸。

晚上9点，我们——我、阿廖沙、热尼娅·阿利卢耶娃——去了克里姆林宫。为了安慰悲痛中的斯维特兰娜——她也喜欢基洛夫（他被列入了她的书记名单。现在阿廖沙也在这个名单里）——我们给她带去了玩具。

在中央委员会附近遇见了几位领袖——莫洛托夫、谢尔戈、卡冈诺维奇、日丹诺夫。他们刚刚开完会，全都停下来与我们握手寒暄。然后又遇见弗拉西克（约瑟夫的私人卫队长），这下我们放心了：约·在家。正巧赶上他刚刚坐下吃简单的午饭。孩子们都在走廊里，急着去父亲那儿。我们脱下外衣。斯维特兰娜急得连玩具都没好好看一眼。

---

① 布琼尼，谢苗·米哈伊洛维奇（1883～1973），时任工农红军骑兵总监。

② 马里亚欣，Л. Е.，时任苏联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

纽拉已经在那里。我们一起走进餐厅。

约·仍像以往那样客气。他瘦了，脸色苍白，从他的眼神中看得出深藏内心的痛苦。他时而面带微笑，时而笑出声来，时而又说上几句俏皮话，然而看着他我的心里仍然一阵阵发紧。他非常痛苦。基洛夫死后的最初几天，巴夫卢沙·阿利卢耶夫一直陪伴他住在郊外——他和约瑟夫两人坐在餐厅里，约瑟夫用一只手托着头（我从未见过他摆出这种姿势）说：“我完全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巴夫卢沙说，此情此景和他俯身吻基洛夫的情景一样感人。

亲眼看到这样一位大人物——真正的不可战胜的雄鹰的短暂的脆弱实在令人震颤。约瑟夫对巴夫卢沙说，基洛夫关心他就像关心小孩子一样。当然，娜嘉不幸去世后，基洛夫就是最亲近的人了，他善于以诚挚、质朴的态度去接近约·，使其感受到难得的温暖和舒心。我们大家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好意思随随便便去找他，看看他，与他聊聊。我个人并不感觉不好意思，我非常喜欢约瑟夫并且很愿意接近他，尤其是在娜嘉去世后，我感到他很孤单。我很想经常去找他。可是阿廖沙不知为什么对此疑心重重，似乎产生了某种妒忌，或者说是担心纠缠不清。他说，约·不喜欢女人常来找他。可我并不是他必须在其面前保持上流社会礼节的那种女人，我是他已故妻子的好朋友，我是他们家的朋友，我像这个家的亲人一样真心爱他的孩子，而且我很愿意接近他，更不用说对他这个大人物的敬仰、尊重之情了，我为与他相知相识感到幸福。我想，阿廖沙就会吓唬我，他自己徒然地站在远处，等待着正式的邀请……还是多一些质朴吧，约瑟夫那里正式的东西已经不少了。

当时布杜·姆季瓦尼[①] 也在那儿。他有时开几句玩笑，有时笑一笑，但仍显得比平时话少。

① 姆季瓦尼，П·Г·（布杜），时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我们围坐在桌旁，每人都拣自己爱吃的吃了一点儿。约瑟夫觉得吃的东西少，于是他叫来卡罗琳娜·瓦西里耶夫娜说："能不能再弄点儿什么，客人们抱怨没什么可吃的。"大家都笑了，因为桌上还有吃的。15分钟后又送来了煎牛排。只有约瑟夫吃了一块。我们大家都已经在吃水果。他像以往一样用克里米亚香槟酒招待我们。吃饭时打坏了两只高脚酒杯。10点左右离席。孩子们、布杜和阿廖沙随约瑟夫到近郊别墅去了，他们都在那里过夜，而我们（三位女士）去了奥尔忠尼启则家。谢尔戈家正在开厂长会。季娜忙着送茶。玛丽娅·李沃夫娜没有从她房间里出来。她的姐妹也在房里。玛丽娅·普拉东诺夫娜·奥拉赫什维利、基洛夫的姐妹和他的养母前一天已经走了。这些天来他们都住在季娜家。大家想让玛丽娅·李沃夫娜搬到莫斯科来。她完全成了废人。她的姐妹住在莫斯科。

1934年12月23日

21日为主人过生日。9点前人们便聚集在他的"近郊别墅"。来的都是同他关系密切的人，也就是说，他不仅同这些人一起工作，而且与他们在一起很随便（有莫洛托夫夫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安德列耶夫[①] 夫妇、丘巴尔[②] 夫妇、马努伊尔斯基[③]、叶努基泽、米高扬、贝利亚、拉科巴[④]、波斯克列贝舍夫、加里宁，亲戚有斯瓦尼泽一家三人、列坚斯夫妇、阿利卢耶夫夫

---

① 安德列耶夫，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1895～1971），时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

② 丘巴尔，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1891～1939），时任苏联人民委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③ 马努伊尔斯基，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1883～1959），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④ 拉科巴，涅斯托尔·阿波洛诺维奇（1893～1936），时任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妇)。斯维特兰娜、瓦夏和阿尔乔姆的儿子托米克呆到10点半，然后他们就走了。

大家到齐后便坐到桌旁，主人忽然觉得坐位挤，大家又站起来重新摆桌子，还搬来另一张桌子接在一边，然后重新摆放餐具，并且又拿来几套。

拉科巴、贝利亚、萨希科来得晚一些，后来又应纽拉的请求叫来了埃利亚瓦夫妇。约·显然不乐意这样做。他们来时晚宴已进行一半。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被推为宴席主持人，另一位主持人是谢尔戈。

祝酒词全都是千篇一律的。我以诗的形式写了篇祝词，但同阿廖沙商量后，他虽称赞这首诗，却不让我在宴席上念。我为听从了他的话而抱憾终生。本该用打字机把诗打出来交给主持人，由他找个人念一下。这首诗一定能受到好评并使大家高兴。阿廖沙总是把我塞在黑暗的角落里，就怕我随随便便地冒出来。

晚宴一直持续到夜里1点，然后是聊天，主人拿出了唱机和唱片，亲自把它打开并放上自己爱听的唱片（他总是这样）。我们跳舞，他一个劲儿地让男人找女伴跳。接着，高加索人齐声唱起忧郁的歌，主人则高声领唱。

我以后再接着写——现在该去上声乐课了。

28日（1934年12月），接着上面的写。

那天晚上（21日）的许多细小情节我都想记下来。约·的情绪很安定，但不如我在小圈子中——只有我们、阿利卢耶夫夫妇和纽拉时——见到的那么愉快。谢尔戈在致祝酒词时起身举杯，提议为基洛夫干一杯，“那个恶棍杀害了他，使我们失去了……”所有人都流下了眼泪，一时间寂然无声。马上便有人说，“主持人怎么不说话”，于是又继续致祝酒词。过了一会儿，有人提议为安德列耶娃干杯，她曾与娜嘉一起在工业学院学习。约瑟夫站起来说道：

“既然提到了工业学院，那就请为娜嘉干一杯。”写到这里，我的眼里充满泪水，就像当时一样。大家都站起身，端着酒杯默默地走到约·跟前。纽拉和我走上前去吻了约·的面颊。他满脸都是痛苦的表情。这一刻令人感到沉重。大家再次驱走了不快的情绪，气氛又变得热烈起来。

当轮到萨希科（阿廖沙的妹妹）致祝酒词时，他起身走到她跟前说：“你们都不认识她，我和她很熟。在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看在妹妹的份上我同一个格鲁吉亚女人第一次结婚，就是她的姐姐，她帮助过我们。虽然她性情执拗，可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后来她整个晚上都跟着他，当我们集体合影时，他同她坐在一起，搂着她的肩膀。当晚她留下来过夜，其实她在他的别墅里已经住了10来天。他曾几次开玩笑说：“她总是唠叨以前曾经给我吃的、喝的，那么现在就让她在我这里吃个够吧。”

经历了两次丧失亲友的痛苦之后，约·变了许多。变得比较温和，比较慈善，比较有人情味。在娜嘉去世前他是一个让人无法靠近的冷漠无情的英雄，而现在他的行为却令人吃惊，我可以说，甚至完全是平常的、人性的。

哼，干吗在这个市侩女人面前心软？她依恋他并想方设法进入他的家，然后靠着由此得到的好处在梯弗利斯享清福——对约·的这种虚情假意支配着她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大人物，她就不会去找他了，而且在他革命前被流放时，她并没有怎么关心他。难道他没有看穿这一点？还有她的妹妹，曾经辱骂他和去世的娜久莎，现在也一个劲儿地往他家跑。这与他去年的情绪大不一样，当时他曾巧妙而又恰当地嘲笑玛里科、萨希科、甚至他的大儿子的贪心。一年前我曾对他说，应该让雅沙脱离他所接触的那些人，伸出手来帮助他，他是他周围那些人（他的姨妈等人）的牺牲品，而约·很严厉地指责我说：“对不起，您说的都

是没用的话，什么也救不了他，他要找我是因为有利可图。”他甚至还拿奥拉赫拉什维利家来打趣，因为他们一个劲儿地为雅沙张罗，要让他与凯图夏结婚。凯图夏等雅沙求婚等得不耐烦了，娜嘉死后父亲不准他去找她，于是她嫁给了歌剧指挥米克拉泽。约·是这样说的：“您算了吧，要是让雅沙住在我这里，不光凯图夏会跟丈夫离婚，连她的妈妈（玛丽娅·普拉东诺夫娜·奥拉赫拉什维利）也得离婚。”我们笑了很长时间，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一切都留待时间去证明。现在刚过了两年多一点儿，在萨希科的要求下他便让雅沙、玛里科和列佐（萨希科的儿子）住在了他这里（在祖巴洛沃）。

我们也应邀参加过这种亲属聚会，但我却鬼使神差地逃避了这次“12 月 23 日的联欢”。当然，我逐渐理解了约·的这些情绪，它们根源于痛苦的经历和沉重的感受——失去了娜嘉、基洛夫、自感日渐衰老，而且到了这把年纪已不可能结交新朋友。

遗憾的是，55 岁生日庆典因斯维特兰娜生病而被冲淡了气氛。22 日夜里她觉得嗓子剧痛，25 日确诊为猩红热。在她高烧不退的那几天里我们一直忐忑不安。昨天体温开始下降。令人难过和心疼的是，我们得和这孩子分开 6 周，但由于担心传染给自己的孩子，我们都理智地克制住了。

迎接新年的活动怎么搞还不清楚。与其和亲戚们一起过年，还不如去纽拉家。萨希科赖着不走，一心想参加高层人物的迎新年活动。要是她一个人去还行，就算和雅沙同去也行，但是如果她的妹妹也去，那我就在家装病。

我曾问阿廖沙 23 日那天约瑟夫在他不喜欢的那些亲戚中表现如何。他说，约·像以往一样热情好客，不过没坐多久就和阿廖沙到别的别墅休息去了。

1935年4月15日

看着我这些偶尔写写而且杂乱无章的记述，根本无法了解我的生活和心情。我差不多有4个月没动笔了。生活、时间在流逝，像往常一样，在这4个月里既生过病、着过急，也有过一些小小的慰藉以及难得的真正令人愉快的时刻。回顾一下这几个月，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斯维特兰娜病了，而我6个星期没去她那儿。这段时间萨希科老是呆在那里，一直影响我的情绪。她向约·编造种种谎话诬蔑我和阿廖沙。她到我家来过两次，我还在约·那里见过她一次。约·待我仍像以往那样热情、殷勤，我由此断定，我的那位亲戚的诬蔑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3月21日她在我的帮助下走了。我还曾张罗着给她买票，大家都笑我，而我说：“如果为她的离去须要铺设一条铁路的话，我会很乐意这么做的，等她走后再把铁路拆掉，免得她回来。”我实在厌恶她那“市井小商贩”的做派。

糟糕的是，她打算5月份再回来。但愿这一走能再也见不到她。有一件事让人高兴，阿廖沙也已开始对她持冷静态度并摘下了血缘关系的有色眼镜。他说，现在他认为她和玛里科是一路货色。我忍受她们13年的折磨，听他没完没了地为她们对我所采取的种种卑鄙做法辩解，想必最终就是为了让他现在对她们作出真实的评价。这就是我们家的一些大事……

……现在说说阿利卢耶夫和列坚斯夫妇。这4个人中只有与热尼娅谈话能够令人愉快。她很聪明，精力充沛，对什么都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巴维尔的智力正逐渐衰退——同他在一起绝对无话可谈。他什么书也不读，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且我觉得他的头脑中没有思想，有的只是由五种感觉（触觉、嗅觉、视觉等）直接造成的一堆杂烩。纽拉非常善良却又智力平庸（人一善良往往就招人喜

欢，但是也很危险）。她的丈夫傲慢而蠢笨，自以为了不起，陷入天真无知者的圈子无法自拔。

与米高扬夫妇的关系一直不错。他们都是好人。她对阿纳斯塔斯的爱的确非常专一，但对他的每句话和每个动作过于敏感，所以往往因一些琐事造成家庭不愉快，而当时只要开句玩笑或佯装看不见也就没事了。为了避免这些不愉快，他总是使劲地克制自己，有时还会言不由衷。这种情况往往是因夫妻一方过于敏感而造成的。他这个人乐观愉快、粗犷豪放，讲起话来像“亚美尼亚笑话”那样风趣。他是一个好同志，一个非常正直而又守旧的人，所以他同阿廖沙关系很密切。他们关系好不是因为非好不可，而是因为不可能不好。凭直觉就知道他们是正直的、光明正大的。

去郊外总是感到很愉快。换个地方可以松弛一下紧张了6天的神经。见到琼尼令人高兴。

阿廖沙的职务又提升了——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银行理事会副主席。任命当然晚了些，但晚任命总比不任命好。如果是在一年以前国家银行理事会大调整的时候任命，就不会有那么多令人委屈和失望的事了，要知道当时国家银行的所有人中确实只有阿廖沙一人有资格被直接提升为理事会主席。现在阿尔库斯[①] 由于以前参加反对派所犯的错误已被解职。卡冈诺维奇去交通人民委员部后，Л. Е.（马里亚欣）多少有点儿感到失去了依靠，所以开始讨好阿廖沙。但愿阿廖沙立场坚定，别让人家利用他——不要让出自己的阵地。可别忘了这些小人（阿尔库斯和马里亚欣）一年以前对待阿廖沙多么放肆无礼。不管怎样阿廖沙已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满足……

① 阿尔库斯当时担任国家银行理事会副主席。

1935年4月29日

昨天阿廖沙启程赴日内瓦，当然是如愿以偿地一个人走的。对此我感到伤心、委屈，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也改变不了阿廖沙的性格，弄得我心情很坏。我极度焦躁不安，不仅如此，我的身体完全垮了。

同领袖们乘地铁出行的情况值得一记。

22日晚上我们一行人到克里姆林宫去看孩子们。那一天是斯维特兰娜的保姆的生日，我给她买了一顶帽子和一双毛袜子，我们去给她祝贺生日。约·和孩子们，卡冈诺维奇和奥尔忠尼启则都到了。用了午饭。我们会合在一起。大家谈笑风生。约·当时情绪很好，喂斯维特兰娜吃东西。跟着开了一瓶"阿布劳酒"，大家开始干杯。说起了地铁。斯维特兰娜表示想坐地铁兜兜风，我们马上定了下来——我，热尼娅，她，还有保姆一起去。拉·莫·（卡冈诺维奇）给我们订了10张票，而且为了更保险，派他手下的一名官员陪同我们。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去换衣服。忽然忙乱起来——约·突然决定也去。叫来了莫洛托夫同志——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钻进了汽车。大家都非常不安，小声议论着这次未经准备的出行的危险性。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比谁都着急，脸色煞白，小声跟我们说，他要是知道这样，就不会高兴地给我们组织这次活动了。

卡冈诺维奇提议12点出发，因为到那时将停止向公众开放，但约·非要马上出发。我的心里很踏实，我说一切都将很好，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分乘三辆汽车，向克里米亚广场驶去。到那儿后下到月台，开始等火车。还未干透的站房散发出一阵阵生石灰味，站里干净、明亮，一些人在排队等待上车。开始同邻近车站打电话联系，我们站了有20分钟。这时候跑过来一位警卫人员。群众发现了领袖们，开始高声问候。约·开始显出不耐烦。原来，想在上

一站腾出列车，因此出现了混乱，耽误了时间。但满载乘客的列车终于开了过来。车厢里的群众马上被疏散出去。在月台上的人们高喊乌拉的欢呼声中，我们走进了车厢。在车厢里我们又站了10来分钟，等对面的车开过让出道来。我们的车终于开动了。我们在奥霍特内站下了车，参观车站和自动扶梯。出现了极度混乱的场面，群众拥过来欢迎领袖，高喊乌拉，跟着跑。我们所有人都被冲散，在一根圆柱旁我被挤得差点儿喘不过气来。欣喜若狂的情绪和欢呼声使任何人力措施都无济于事。好在这时民警和警卫围拢过来。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想着能快点儿回家。瓦夏比谁都紧张。约·很高兴，向不知从哪儿跑来的地铁建设负责同志问这问那，他还不时地就地铁推迟启运时间和未完全掌握运行技术开上几句玩笑。

下一站有一个最高的自动扶梯。约·和大家都又下了车，但我、热尼娅和斯维特兰娜留在了车厢里，我们被惊喜若狂的人群吓坏了。在一个车站上，狂喜的人群在离领袖不远的地方撞倒了一根生铁灯柱，灯罩也给弄碎了。我们到了索柯里尼基站，又从那里回到斯摩棱斯克站，尽管车队等在索柯里尼基站，可约·非要回到斯摩棱斯克站。我们来到斯摩棱斯克站，车站上一辆汽车也没有（汽车来不及从索柯里尼基站返回）。下起了蒙蒙细雨，街上湿漉漉的，一行人沿阿尔巴特街步行穿过广场。大家又不安起来，心急火燎的。终于，在外宾商店附近看到了第一辆特别车库的车。在街中间截住了这辆车，当时它正向斯摩棱斯克站飞驰。约·不想坐，打发孩子和妇女上了车。我们回到克里姆林宫，5分钟之后巴维尔也到了，而后是阿廖沙。约·直接回别墅去了。斯维特兰娜累了——直接睡觉去了。瓦夏百感交集，情绪激动，一头扑到床上，神经质地大哭起来。我们喝了许多缬草酊，过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从电话中得知所有人都返回了住所，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畅谈观感。地铁——确切些说是车站，装修得富丽堂皇，奇美无比，让人不由得对创造

这一切的青年的能力和热情，对能够激发起群众这种热情的领导，顿生敬佩之情。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建成的。这么金碧辉煌，这么美妙绝伦。

5月15日将开始正常运行。在地下天堂欢迎领袖的人们的热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苏维埃政权下已经做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而且还有许多事情将要完成。只要不发生战争，生活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是幸福的。

自从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伙人的阴谋被粉碎、阿维尔遭到应得的惩罚[①]之后，我坚信，我们正走向伟大的幸福的未来——这些人的种种离经叛道、违法乱纪和合法的丑行曾使我忧心忡忡。现在变得好多了，一切污泥浊水都将被一扫而光，人们意气风发，一切都蒸蒸日上。关于阿维尔这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物，这个过了17年苏维埃革命生活的人物，以后我还会提到。现在不说了。

今天我有音乐会。我的嗓子疼痛，身体不舒服，但这是正常的。只要我有演出，我就会生病。

5月5日我的合同到期，我将结束我的演唱事业。以后我将自唱自娱，并将到别的领域去找工作。该结束徒劳的奋斗了。

我忘了写上，在奥霍特内车站返回车厢时，兴高采烈的人群通过机械扶梯后返回车厢时拥向我们的车厢，结果群众一直陪着我们走，人群中有孩子，也有大人。整个场面非常感人。约·始终带着温柔的微笑，他的目光是善良的，善良而温柔的。我想，尽管他是个冷峻的人，但人民对自己领袖的热爱和关心还是打动了他的心。

① 在联共（布）中央1935年6月全会上审议并处理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办事机构和阿维尔·叶努基泽的问题。全会决议“赞同监察机关在检查和改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办事机构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鉴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前秘书阿·叶努基泽同志政治和生活上的腐化行为，将其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并清除出联共（布）的队伍。”

这里没经过任何准备和官方安排。他曾经谈过为他安排的欢迎仪式——人民需要沙皇，就是说，需要一个他们能够顶礼膜拜并为之生活和工作的人。

还有，昨天萨希科来了。阿廖沙看来很高兴同她分开这段时间。但她当然急于见到他，因为她有许多事情和请求要找他。有意思的是，她会不会再次闯到约·那里去。非常遗憾，票证的事情没有处理完……

1935 年 5 月 9 日

今天在约·那里休息。巴夫卢沙 3 点钟左右给弗拉西克打电话，8 点钟左右又给瓦夏打电话。10 点半派来接我们的车才到。原来，弗拉西克和瓦夏什么都没有转告，只是到了 10 点钟，弗拉西克得知巴维尔又打了一次电话，才转告了约·。于是约·吩咐派车接我们。当时萨希科正在我的别墅里，我不得不带上她一起去。给人的印象是，约·对她的到来不太满意。他见到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她是从哪儿来的？……"而且说话时一点也不客气。这样见面之后我们全都感到不太舒服。他请我们吃饭、喝茶，我们谢绝了。于是他、卡冈诺维奇和巴维尔就去打台球，而我们三位妇女则留在屋里。干什么呢？听留声机、跳舞、吃杏仁，最后决定到台球室去。我们受到了冷遇。约·和卡冈诺维奇肯定是心情不好。看来，他们在谈重要的公事。约·打得不顺手，老是输。夜里 1 点半说了句"不玩了"，很快穿上衣服走出了台球室。萨希科紧追了过去，但没追上他。我们回到房里。我们看相册，而约·和卡冈诺维奇接着谈他们的公事。话题是工作人员（大干部）。约·批评了沙托夫[①] 和另外一个什么人，提议任命、提拔青年中有所表现的人。

① 沙托夫，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1887～1943），时任副交通人民委员。

我坐的位置离他们很近，因此听到了一些东西，谈的是在土耳其斯坦建设新的铁路支线问题。我站起身走到了餐厅的另一角，以免成为他们谈话的被动的见证人。

约·有些急躁，给女仆提意见，说晚饭半天也不端上来。大家都入了座——一边坐着男人们，另一边坐着妇人们。大家都紧张地一言不发，找不到共同的话题，吃着饭，感觉自己成了与世隔绝的人。

首先使约·有了笑容的是一个小小的对话。端上一盘用小绵羊肉烤的有葱和石榴的羊肉串。我吃了起来并表示赞赏。热尼娅尝了尝，她不喜欢吃。她说："你是格鲁吉亚人，所以你爱吃。"萨希科插了一句："她根本不是格鲁吉亚人。"我也插话说"甚至连我的妈妈都出生在格鲁吉亚，但却没有给我格鲁吉亚公民权"。约·笑了起来并调皮地看了看我。卡冈诺维奇原以为我是格鲁吉亚人，当听我说我是犹太人时，他大吃一惊。从这时起大家开始聊天，开始干杯，回忆起了4月22日一起乘坐地铁出行的情景，后来又谈起孩子们，谈起他们在那个晚上的感受（瓦夏的眼泪），谈起斯维特兰娜说的一句话（我们把这句话转告了约·）——"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恨我也不怕，只要爸爸爱我就行。如果爸爸叫我爬到月亮上去，我一定爬上去"。我们谈起了雅沙，这时约·又提起他对我们的娜久莎的恶劣态度，提起他的婚姻，他的所有错误，他的轻生，谈到这里时约·说："娜嘉怎么能一方面严厉批评雅沙的这种行为，一方面又自己开枪自杀。她的做法非常糟糕，她伤害了我"。萨希科插了一句："她怎么能抛下两个孩子！""说到孩子，他们几天后就把她忘记了，可她对于我的伤害却是一辈子。为娜嘉干杯！"约瑟夫说道。于是我们为如此无情地离我们而去的亲爱的娜嘉干杯。热尼娅说："娜嘉患有忧郁症，娜嘉有病（这是听卡涅利说的，我把这些话告诉了纽拉和热尼娅）。""这个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经常服

用咖啡因来提神。”（卡涅利在娜嘉死后告诉我，在做 X 光透视时发现，她长有一块自杀骨。我不知道是否如此，但至少她的更年期来得早，她来潮时常常头痛）。

当我们议论乘地铁出行和群众的喜悦和热情时，约·又提出了人民的偶像崇拜心理即希望有一个沙皇的心理。我说，如果这是所有民族的心理特征，那么我国则另当别论——每一个人都认为他传达了自己的渴望、自己的幻想、自己的意志——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和来自人民，即使有时某些做法是强加于人，最终也会弄清楚，这只是一时冲动，而其余的一切都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而做的。置身于像我国地铁这样罕见的建设工程之中，置身于作为我们集体意志的体现者的领袖之中——这难道不能激发热情？当然能！

约·的心情不好，确切些说，他有什么烦心事，有什么事深深困扰着他，而他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他看起来瘦了很多。整个样子让人感到心疼和可怜。真想跟他说几句亲切温暖的话。

6 日各报刊载了他在军校毕业典礼上对飞行员的讲话①。这篇讲话被全世界的报刊广为引证和详细报道。这篇讲话不同于德摩斯梯尼② 的讲话，德摩斯梯尼想用自己的声音盖住海浪的喧嚣声，用一大堆华丽的词藻和短语刺伤听众的眼睛，就像闪电一样。而约·的讲话朴实、紧凑、人人都能懂。讲话极富人情味，这也是讲话的力量所在。约·在谈到自己的这篇讲话时说，他当时忘了补充说明，“我们的领袖在执掌政权时是一贫如洗的人，而且永远都将是这样的人，支配他们行动的只是思想，而不是发财欲望”，在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怎能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掌了权就意味着发财。这些话

① 这里是指 1935 年 5 月 4 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斯大林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著名口号。

②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 384～前 322 年的雅典雄辩家。

我记得不十分准确，但他讲的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当然，纯洁思想性的魅力使我们的领袖成了深受广大群众爱戴和尊敬的人，还有，原先曾有过的那种阶级隔绝状态的不复存在，使他们成了同人民“骨肉相连的”自己人……

［不晚于1935年6月28日］

……17日阿廖沙到约·那里做客，带去了一些小东西——外国水果、给孩子们的礼物。23日晚上，我们通常的那一班人马都聚集到了他在祖巴洛沃的住地，斯维特兰娜也在。瓦夏因链球菌感染患了咽颊炎，躺在莫斯科治病。男人们打台球，阿·伊·米高扬来了。晚饭吃得很愉快，我的心情很好，讲了几个笑话，约·非常高兴。大家频频举杯。夜里2点约·差点儿把“女主人”叫醒——我们把他拦住了。萨希科的话相当少。斯维特兰娜想24日去利普基度周末，因为那里有池塘，可以划船。约·表示同意——用他的话来说，他自己也有一年没去了。晚饭后，我、阿廖沙和米高扬回自己的住处休息。列坚斯夫妇也回去了，他们出了车祸，纽拉有轻微挫伤，汽车受损。热尼娅、巴维尔和萨希科留在约·的住地休息。第二天下午2点钟我们再次在约·的别墅会合，列坚斯夫妇没来，他们还没有从夜间的事故中恢复过来。遗憾的是下起了雨，但出行并没有取消，于是我们分坐几辆汽车向利普基驰去。需要行驶大约60公里。带上了琼尼和萨沙。路上我们坐的汽车有个轮胎爆了，结果我们迟到了半个小时。约·非常着急，因为和我们坐一辆车的有斯维特兰娜。

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来到了这个令人惊叹的庄园。房子漂亮和舒适极了。有英国式的花园，房子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池塘，水上有一座小桥，还有瀑布。有两个很大的游泳池。池塘内到处是鱼和虾。孩子们始终呆在水里，用鱼网捕鱼捉虾。尽管下着雨，可约·、

阿廖沙、巴夫卢沙和孩子们却划起了船，我和热尼娅站在岸上直着急。玩完后衣服都湿透了，又没有衣服换，只能把孩子们的短裤脱下来熨干。好在雨水并不凉。房子是按娜久莎的设想和爱好建造和装修的，因此约·呆在房子里心情沉重。我们大家和孩子们共进午餐。吃饭时米高扬来了。约·对他非常热情。晚上喝茶时斯维特兰娜请求爸爸准许她留下来同客人们在一起休息，爸爸批准了。

晚上，男人们同约·都走了，我、热尼娅、萨希科、女教师、保姆和斯维特兰娜留了下来。

我们安排孩子们睡下后聊起天来。由于我们突然决定留宿，所以没有带睡衣。我们开始在柜子里，在根据种种迹象判断是约·的房间里搜寻，终于在一个立柜里找到了几件丝绸睡衣（用东方手工业丝绸缝制的），每人拿了一件，穿着它睡了。早晨又划了船，天气出奇的好。吃过早饭，全体人员乘车去参观祖巴洛沃的房屋。孩子们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尽管路途不近。可我却累坏了，一连几天都没恢复过来。极其害怕一种组合——孩子和水。真让人心惊肉跳。

25 日晚 8 点，我和热尼娅去看望瓦夏。他当时已穿戴整齐，正同父亲和巴维尔在餐厅吃饭。我们犹豫了半天，不知该不该进去，但因为我告诉过热尼娅，萨希科曾向约·告巴维尔的状，说巴维尔因为她对票证漫不经心而批评了她，最后我们（约·一班人和所有参加 1934 年 12 月 21 日生日晚会的妇女）决定启用我这张对付萨希科的王牌。结果谈话很不愉快。约·先开始说——“怎么，增加了票证？是吧”，随后责问他的卫队长把票证弄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照管好，等等。这时，萨希科一口咬定，是约·亲自把这些票证给她的。他突然说道：“我没有给她，不对，我在晚会上答应过她，就像我答应所有的人一样，后来我和伏罗希洛夫决定这些票证不印了，并从她那里收回了样票，而后来是弗拉西克的错。”

我说城里有票证并点名道姓地指出在谁那里有。约·很生气，最后把萨希科打发走了。

“我知道，她给了我和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不少帮助，尽管有时会因为小事数落我们，但她毕竟是个善良的妇人，我也决意给她以回报，但她动不动就埋怨我，找各种理由写信，总之是要求我照顾她。我没时间照顾自己，我也从来没有照顾过妻子。她老是感到委屈，除非我开始照顾她等等。”总之，我们三个人离开时都感到，我们履行了我们的义务，以后的事情走着瞧吧。我认为，他对她的态度肯定会发生变化的，但我担心把我们也间接地搭上。今天我没有看到他。孩子们动身前我们去了一趟，但一次也没有见到他。据瓦夏讲，有两种票证停止使用，而且当弗拉西克把这件事报告给约·时，他似乎非常生气。很想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对我们是怎么想的和怎么对待我们。最后我们做了一切准备，以免受到这样的责备：“你们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说呢？……”

结果是，萨希科带孩子们去了梯弗利斯，好像她跟孩子们是去热列兹诺沃茨克，而我们甚至没有勇气在她启程那天往别墅打电话或到她那里去，或者到车站去。

往后你会明白的，约·对于人们——包括亲戚——的要求是什么。但我还是针对萨希科的所作所为对他说：“不能把您的家变成小卖部，把您的恩泽一点点卖出去”……。

[1935年] 6月28日

我应当把我6月10日同玛丽娅·玛尔科夫娜·卡冈诺维奇的有趣的谈话记下来。现在是12点多，我有些疲倦，可还得详细记述一下23日和24日我们最近一次拜访约·的情况。进行了很多有趣的交谈。23日晚11点半，我们通常的那一班人前往近郊别墅。阿廖沙事先打了电话联系。约·去看目前在这里有盛誉的列宁格勒芭

蕾舞团的演出（演出剧目是《巴黎圣母院》——我忘了芭蕾舞剧的名称）。他请我们演出一结束就来。我们没有计算好，我们到达时已将近 12 点，而芭蕾舞是在 10 点半结束的。约·不喜欢等候，再说他当时是一个人，很无聊，在和卫队等我们时打起了台球，晚饭也推迟了，因此他见到我们时有点儿冷淡。我没来得及和他打招呼，急着去整理由于乘坐敞篷汽车而弄得不雅的衣装，而他已经同阿廖沙和巴维尔去打台球了。我和热尼娅吃了甜樱桃，参观了各个房间，因为我们发现了变化——餐厅和办公室对换了位置。如今办公室特别漂亮特别大，旁边就是卧室，还有通往带顶的凉台的出口，而餐厅可惨了——不但变小了，而且不那么舒适了。但正因为如此，现在办公室和卧室完全成了独立的房间，甚至都不好意思进去了，可从前所有人都进过他的办公室，而办公室里有文件（因此发生了票证失踪的事情，显然是被亲爱的女性亲戚从写字台上拿走的）。

然后我同热尼娅一起散步，我们走进了台球室。约·甚至没有向我们这边抬一抬头。我大声说："您好，约·""怎么，我们还没见过面吗?"有点儿让人不快的冷淡。我和热尼娅便坐在一旁。1 点半时他看了看表，收了杆，吃饭去了。我和热尼娅开始打台球，直到晚饭准备好。玩得正高兴时，巴维尔来叫我们。来到餐厅后，约·说："你们不在我们把东西都吃了"。他看起来似乎高兴了一些。我们就了座。晚饭不知为什么比平常简单，真像没有等我们似的。我们谈起了斯维特兰诺奇卡，约·的脸上现出喜悦的神情。开始谈论她说的话、她的举止、她的情绪，饭桌上的气氛因此而变得亲热起来。约·打开了一瓶我们喜欢的"阿布劳久尔索酒"，大家的话匣子也打开了。又是萨希科，又是一通总结——"她是个善良的、与世无争的小市民，很能干，别的女人处在她的地位什么事情也干不了，等等"。阿廖沙高兴起来，连连称是。而我却认为，约·讲这些

话正是要阿廖沙听的——他自己清楚她的真正价值，除了上面列举的优点也知道她的所有缺点。然后他笑着问我，阿维尔受到处分我是否满意。他知道，我是从骨子里瞧不起阿维尔的，这既是由于他本身的腐化，也是由于他老想腐蚀他周围的所有人。

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我说，原先我不相信我们的国家是法制国家，不相信我们国家有公道，不相信可以在什么地方看到公正的评判（当然中央委员会除外，在那里总是能对一切事情作出正确的评价），而现在我感到幸福的是，这个道德、风气和生活上腐化的根子已被铲除。阿维尔担任这么高的职务，在革命后的17年间肯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他本人道德败坏、贪恋女色，恶化了周围的环境，别人就投其所好为他拉皮条，挑拨家庭关系，勾引年轻姑娘。他手中掌握着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的一切生活资料，尤其是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他利用这一切来达到自己肮脏的目的，收买妇女和姑娘。说出来和写出来都令人厌恶的是，他作为一个性欲不正常、明显地不是百分之百男子汉的人，追逐的女性一年比一年年轻，最后甚至盯上了9～11岁的女孩子，引诱她们，不是在肉体上奸污她们，就是在精神上腐蚀她们。这是在他周围发生的一切丑恶现象的基础。妇女们有合适的女儿就能拥有一切，姑娘们因为不再需要而被胡乱塞给其他精神更不坚定的男人。机关人员完全是根据阿维尔所喜欢的性别特征组成的。为了替自己的腐化行为辩护，他竭力美化这种行为——他到处迎合抛弃家庭和孩子的男人，或者干脆把为人夫者与他不再需要的芭蕾舞女演员、女打字员等撮合在一起。为了不过分引起党的注意，他在自己周围安排的都是非党员（机关工作人员、女秘书、戏剧界的朋友和熟人）。他以“善人”自居，但他只对那些直接或间接给他带来性快感的人行善。在他的部门发展起来的反革命，是他所有行为的直接后果——只要向他提供有姿色的姑娘或妇女，就可以在他鼻子底下为所欲

为。时间不早了，下一次再写……

1935 年 11 月 17 日

……11 月 8 日，按照近几年来每逢娜嘉忌日的习惯，我们去了约·那里。我和阿廖沙 8 点半从祖巴洛沃出发，其余的亲戚从城里来。约·经过索契疗养恢复了健康，可人们说他瘦了，在那里也不得安宁（得过流行感冒，手受了伤——弗拉西克关车门时夹了他的手指，他自己用最野蛮的方式作了处理，幸好没有感染），最后，在 10 月 15～17 日去梯弗利斯看望母亲之后生了胃病。他的情绪很好。斯维特兰娜和她的女友（拉娅·古列维奇）从祖巴洛沃顺路去城里。他见到她非常高兴，亲吻她，抚摸她，但还是按时赶走了她。

她上路之后男人们都去打台球。我们三个人（纽拉和热尼娅）聊了一会儿天，散了一会儿步，然后也去了台球室。看得出来，约·很疲劳，前一天检阅完毕后，同志们在他这里一直呆到夜里 3 点。我们去的那天晚上，阿利卢耶夫夫妇到了以后，莫洛托夫打来电话，叫约瑟夫去看电影，显然是想让他在这个痛苦的夜晚出去散散心。但他说他的“近亲”阿利卢耶夫夫妇、列坚斯夫妇在这里，马上还有人来（这是指我们）。他拒绝了。这天晚上外宾商店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关于这个问题谈了许多，说光是关闭这些商店是不够的，应当采取措施取缔在与我们接壤的国家里特别是波兰倒卖我国钞票的卑鄙行为，波兰按 20 戈比的价格出售偷运出来的我国 10 卢布面额钞票，所有的使馆都按低价购买这些 10 卢布面额钞票并通过外交信使带进苏联。我们必须开始实行有利的（确切些说是优惠的）外汇兑换方法，以便外汇在我们国内兑换，必须关闭外宾商店这个曾起过一定作用的机构，允许进行汇兑，按优惠价格付给卢布，用这些卢布可以到任何地方购物。

我参加了这次谈话。(当然，这个现在由鲁祖塔克的委员会处理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我和阿廖沙把这一点当面讲给约·听，并谈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至少约·吩咐按照阿廖沙的意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阿廖沙很着急。

晚饭时谈起了瓦夏。他的学习成绩很糟糕。约·限他两个月之内改正，否则就把他赶出家门并领养三个有天分的小伙子来代替他。纽拉哭得挺伤心，巴维尔的眼睛里也含着泪水。他们不大相信瓦夏能在两个月之内改过来，于是认为这个警告已经成了现实。相反，父亲认为瓦夏有天分，认为有可能改过来。当然，瓦夏是应当调教调教。他因自己是伟大人物的儿子而目空一切，吃父亲的老本，与周围人的关系搞得很不愉快。父亲认为斯维特兰娜的天分差一些，但是有责任感。他认为两个人都是冷淡无情的人，对谁都不留恋，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很快把母亲给忘记了。对他们周围的人非常不平等。他对他们了如指掌。他是对的，就像他始终在各方面都是对的那样。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分析的人，一个非常出色的心理学家。尽管公务繁忙，但他对周围所有的人都了如指掌。

雅沙第二次结婚，娶的是尤利娅·伊萨科夫娜·别萨拉布。她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女人，30～32岁，娇媚动人，净说蠢话，爱看小说，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抛弃丈夫和“往上爬”，果然如愿以偿。我不知约·对此怎么看。东西还在丈夫那里，人就住到了雅沙这里。我担心她别打错了算盘。雅沙是她的第三个或第四个丈夫。她年纪比他大。这个女人夏天的时候还说什么不描口红的感觉比赤条条来到人群中间还要糟糕，而现在却指甲边不修了，口红不描了，头发也不做了。伟大人物的儿媳妇。当然，她是一个好主妇，这个女人把雅沙弄到手并迫使他振作起来和表演一番，但如果他真的靠父亲振作起来，那么她的投机勾当将遭到破产——而她正是指望这种勾

当能够成功。我们走着瞧吧。

这就是近几天的事情。

14日是阿廖沙的生日。晚上我搞了一个小型的聚会。

来宾有：姆格洛布利什维利——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坎杰拉基——驻德国商务代表，埃利亚瓦夫妇，列坚斯夫妇，阿利卢耶夫夫妇，鲍里亚和玛露霞、舍夫克特·马梅多娃和她的丈夫。气氛相当亲切和活跃。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影响了大家的情绪，由于她的原因舍夫克特不想唱歌，我也没有唱。阿什亨·拉扎列夫娜也来了。大家坐到夜里两点……

1935年12月4日

……（11）30日，除我之外，大家都去了约·那里。他已经得知雅沙结婚的事，他对此持一种得体的讽刺态度。当然，未必值得关心雅沙的风流韵事，说到底，雅沙已经27或28岁，他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管他娶谁为妻，他的妻子都不会成为跟我亲近的人，因此雅沙娶谁为妻对我来说绝对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当然，我不希望因为这个陌生的、而且是我所不喜欢的女人而失去我们交往的宁静。

我认为约·不会特别亲近这一对夫妇。

瓦夏已得到父亲谅解并住在父亲那里。显然，他提高了分数。我非常高兴。瓦夏是一个极有发展前途和有心计的小伙子——他甚至能够装出一副老实和真诚的样子哄骗他的父亲，而实际上他并不是这样的孩子。

萨希科又住进了医院，医生怀疑她新的部位出现了瘀滞。出于人道我非常可怜她，不管她对我的态度如何，当然，我衷心愿她安然无恙——只是她不要干扰我的生活和妨碍我的生存。阿廖沙现在到了边境附近。明天他将抵达柏林。

30日约·患了流行性感冒，但1日还是在联合收割机手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今天电台广播了这篇讲话……

1935年12月26日

……21日给约·寄去一封短信（祝亲爱的约瑟夫生日快乐。千言万语表达不尽我们对他的美好祝愿。敬礼。玛露霞和阿廖沙·斯瓦尼泽。附言：热尼娅、巴维尔、纽拉和斯达赫委托我们转达问候和祝贺），阿廖沙还给他带来了菠萝和名贵白兰地。

11点收到前往近郊别墅的邀请，派来接我们的汽车也到了。由于热尼娅的原因我们迟到了整整1个小时。我们到达时所有的人都已就座（伏罗希洛夫夫妇、卡冈诺维奇、柯秀尔①、波斯特舍夫、贝利亚、米高扬、莫洛托夫、谢尔戈）。当我们来到时，约·的心情非常好，大家在桌前谈谈笑风生、喜气洋洋（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除外，他们第二天要在中央全会上作报告。两个人面色苍白、表情深沉，大家都在跟他们开玩笑）。我们进屋后，约·转过身对阿廖沙说："要不是你，所有这一切（指着长长的丰盛的餐桌和众多的来宾）都不会有。我把这一天完全给忘了。"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反驳说："不对，不对，我们反正是要来的（和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开完全会我想起来了，看了看日历我们就上你这来了。"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穿了一身崭新的元帅服，他的两鬓已完全变白，但人看起来威武、年轻。叶卡捷琳娜·达维多夫娜则显得疲倦和苍老。他们添了个小孙子（彼佳的孩子），取名为克利姆。我挨着她坐了下来；她以妇人的目光打量我们，显然，对我穿的柏林连衣裙很感兴趣。晚饭时唱起

① 柯秀尔，斯坦尼斯拉夫·维根切维奇（1889～1939），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

了歌。日丹诺夫手风琴拉得棒极了，但他的手风琴坏了好几次。大家唱了祝贺生日的阿布哈兹、乌克兰歌曲、旧日的大学生歌曲和纯粹的娱乐歌曲。波斯特舍夫神采飞扬，和莫洛托夫诙谐地跳起了俄罗斯舞蹈，两人说起了哈萨克话，这一对宝贝把约·和所有客人逗得笑个不停。晚饭后来到了办公室（一个大房间）。约·打开了留声机（无线电收音机），于是大家跳起了俄罗斯舞蹈。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的列兹金卡舞跳得很怪，没有合着通常的节拍。我们跳的是狐步舞。大家请约·跳舞，但他说，自娜嘉死后他就不跳舞了。约·给跳狐步舞的人放的始终是一张唱片，即去年他放的那张——他喜欢这张唱片，他已经不认其他唱片了（他的脾气有点儿认死理）。吃晚饭时他说，“女主人要一架钢琴”，我们表示赞同。当然，日丹诺夫也会弹钢琴。约·喜爱音乐，他要是有架钢琴那就太好了。大家的情绪自始至终都很好。最先走的是两位报告人和谢尔戈，而后是伏罗希洛夫夫妇。我们一直呆到4点钟。我们想与约·一道迎接新年，可我又觉得这样不妥，也许迎新将在更小的圈子内进行。不知为什么卡冈诺维奇那天晚上对我们几个人（纽拉、我、热尼娅）特别不客气。也许是听到了什么流言蜚语，也许是对我们组织家庭晚会并妨碍他准备报告不满意。怎么回事呢？……

1936年12月7日[①]

我们在约·那里迎接新年。来了许多客人，几乎所有的人民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亲戚都来了。欢声笑语，热闹无比，但就是不像小范围聚会那样亲切。

---

① 原文如此。日期有误。这里所说的迎接新年显然是指迎接1936年。

1936年11月20日以前

……阿尔库斯、施莱费尔[①]、拉狄克[②] 等人我们都认识，同他们说过话，从来都不相信他们，用不着隐瞒这一点，但所发生的事情都超出了我对人的丑行的想像。所有的丑行——包括恐怖手段、武装干涉、秘密警察、盗窃国家钱财、破坏活动和腐化周围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政治纲领，而只是为了升官，为了贪欲，为了活着，为了供养情妇，为了出国旅行，为了过上阔绰的生活，为了通过宫廷政变夺取政权这样的渺茫前途。想摧毁革命思想创造的成果是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当人民为了创造幸福的生活、为了建成无阶级社会、为了巩固国防、为了苏联的工业化、为了巩固集体农庄而作出巨大的牺牲的时候，有人却在搞破坏活动，制定卑鄙的计划，出卖祖国。

起码的爱国主义感情到哪儿去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故乡的依恋之情到哪儿去了？这些缺少德行的人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有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觉得我简直糊涂了，这一切是那样的不可理解和没有理性。

可怜的基洛夫是打开这个在我们“警惕的目光下”隐藏了许多年的贼窝大门的钥匙。我们怎么可以糊里糊涂地让这一切发生呢？我们怎么可以如此盲目地相信这一帮恶棍呢？不可理解。他们在最重要的机关中扎下了根，他们在最高岗位上有保护伞。皮达可夫[③]

① 施莱费尔，И.О.，时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运输机械制造总局局长。

② 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1885～1939），曾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最后是在《消息报》任国际部主任。

③ 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1890～1937），曾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最后的职务是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回忆着所有的会面、所有的话语、所有我遇到的偶然情况，进行比较、勾画和找出线索，并分析一批又一批还享有自由的人，但这些人无疑已经卷了进去并将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一切怎么能够存在，而且散发臭气毒化空气长达10多年之久呢？不可理解。

我看到到处都有破坏活动，真想大声疾呼。轻工业，它在我国的发展是多么可怜，就是说，它的发展道路是错误的。报纸刊登的那些令人寒心的文章使我们的敌人兴高采烈——我们在全世界面前用我们的自我批评自己打击自己，这种自我批评变成了在全世界面前揭我们的家丑，而对此本应悄悄地进行批判和加以消灭，而不应使它们成为所有敌视我们的报刊嘲笑我们的材料。甚至发生了在10月5日室外温度为零上1度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大楼停暖气的事，而当时全城都有暖气。我认为破坏活动还包括，把苏维埃宫建在不恰当的地方，以致要拆除也许是100栋精心建成、几乎还是新的房屋，我认为这也是破坏活动。这是在我国闹房荒的情况下拆除非常好的房屋，而且有数万人不知往哪儿迁移。本来可以为建造苏维埃宫在莫斯科旧城以外选一块两公顷的地皮，哪怕在沃罗比约夫山上也好，在那里建一个新区从而不破坏城市，将其保留10～20年，就像原教堂地区那样。为什么要闹得一大批人民群众不得安宁呢？为什么要在拆房上浪费不必要的钱呢？拆除旧房屋我理解，但拆除4层的好楼房我就不明白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已经通过的改建莫斯科即改建老城区的计划。多么美丽的树木被砍掉，所有的街边儿童小公园都被拆除，用沥青铺成了一些丑陋的、无人照料的、谁也不需要的广场，人们在这些广场上无序地穿行。唉，真是写不胜写。而一看到那些衣衫破旧的人们，就不禁会问——轻工业

干什么去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到哪儿去了？维诺格拉多娃姐妹[①]到哪儿去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凭什么发给勋章？物价为什么上涨100%？为什么在商店里什么也买不到？为什么超额完成计划并授以勋章却见到不到棉花、亚麻和羊毛？轻工业工作人员在想什么？即使他们不是破坏分子，人们也未必还能长久地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都未能使人民穿上体面的衣服，弄得全世界都说我们贫穷，而我们并不贫穷——我们有丰富的原料，有充足的资金，有众多的人才。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产品哪儿去了，超额完成计划到哪儿去了？到处建设豪宅和别墅，大把大把的钱用于维护豪华的休养所和疗养院，浪费国家资财而于任何人都无益。说什么好呢？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希望祖国幸福、美丽、光明、文明和幸福，这在我们的制度下应当能够做到，但老是有干扰，在建设新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干扰。应当同这种干扰进行无情的斗争，应当把眼睛睁得再大些，把耳朵竖起来，应当学会思考，而不要人云亦云，应当冷静地批评和理性地改正错误。我还要就这些问题写文章和呼喊，我痛恨那些只求自己拥有而谁都不顾的人，遗憾的是，我们有不少人的言行就像路易四世那样："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我不能这样——我从内心里反对这样做，我多么想在某个方面成为真正有用的人，唤醒人们，使他们振作起来，成就一番真正的伟大事业。我没有党证，但我自己认为比许多什么都无所谓的党员要高明得多，对党和人民要忠诚得多。我想奔走呼号，唤醒所有的人，推动并告诉他们一切——一切都那么简单，只是须要进行批判的思考，而不要用现成的公式去思考，不要被自己的专家、同志、报纸上的文章和报告人弄昏了头。应当自己思考、

① 叶夫多基娅·维克多罗夫娜·维诺格拉多娃和玛丽娅·伊凡诺夫娜·维诺格拉多娃是纺织工业中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倡议者，1936年创造了看管264台机器的记录。

掂量任何问题、任何决定和观点，那样才能真正成就一番事业。

夜里 1 点

1936 年 11 月 26 日　　　　　　　　　　　　莫斯科

……昨天，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开幕。我没有去，一是因为很晚才张罗弄票，二是因为医生不允许出门，还要养几天。我从无线电收音机听了斯大林的讲话。真奇怪，我没有听出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讲话音质有变化，而主要的是重音比平时生活中重一倍。他的俄语说得非常纯正，他用的词语都是标准的大众俄语，他通过麦克风讲得非常准确，就像沙尔瓦·埃利亚瓦在日常生活中的讲话。他讲了两个半小时，讲得很慢，时不时咳嗽几声，但讲得很风趣，很机智，常常引用文学作品（谢德林、果戈理），作一些恰到好处的类比，但大家注意到，复制工作做得非常糟糕。通过好的收音机还可以听，但由于他似乎是在一个非常喧闹的地方讲话，通过转播网甚至难以听清。我当然认为，这是邮电工作人员在进行破坏活动，或是有什么人在干扰广播。主要的是，当别人讲话时，听得非常清楚，而当斯大林讲话时，就非常不清楚。阿廖沙从代表大会回来后，我们议论了他的讲话和我国宪法，我们有两点不太清楚：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与民主——工人和农民，那其余的是什么，既然没有对立的利益，既然所有人都是劳动者，既然所有人按宪法规定都是平等的，那我们的社会有没有可能出现阶级。

既然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即全体劳动者，而按照宪法我国没有不劳动者（没有劳动能力者除外），因而也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没有资本家，也就没有无产阶级，而只有劳动者；没有任何阶级，有的是各种劳动——农民的、工人的、脑力的，而随着技术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将越来越接近工厂工人的劳动，将分为体力和脑力

劳动，而以后在出现更高技术的情况下这些界限在许多领域将开始消失，劳动将分为创造和执行。

女打字员或计算器操作员——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执行。关于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和写下去。暂时写到这儿。12点30分。阿廖沙的火车已经开了1个小时。愿他平安地去，平安地回。他的座位号是13（?）

1936年12月7日

自上一次记日记已经过去了11天。阿廖沙直到6日才去日内瓦。他一直呆在巴黎，受到了政府的接见，报上发了简讯。我在这段时间内两次进城去列坚斯家中（有Л.А.巴利茨卡娅和她的丈夫）……29日去了米高扬家，我、热尼娅和阿什亨姐妹俩聊的始终是妻子、丈夫等等话题，一直坐到夜里3点。我和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谈了阿廖沙的情绪。

1日去看斯维特兰娜。她出了水痘，面色苍白。她很可爱，很好客。我听到远处约瑟夫的咳嗽声，他休息一会儿就走了，没有来看斯维将兰娜。

我开始跟M.K.学习英文，以赶上班上的进度。5日参加了代表大会闭幕式，散会后我们——我、热尼娅和纽拉——去约·那里，同高层人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谢尔戈、米高扬、莫洛托夫）一起吃了饭。晚上到大剧院听招待代表的音乐会（有许多民间作品，不知为什么演奏了整部第九交响曲，而且豪克的指挥很糟糕）。我穿的是家常便服，很恼火，穿着绿色套服感觉很热……

1937年3月5日

差不多有3个月没动笔了。有许多感受和想法。流过眼泪，也愤怒过。

应当作一个简单的回顾。发生的大事有：12月21日庆祝约·

的生日。来宾很多，身着盛装，热烈、活跃，伴着收音机跳了舞，早晨7点大家才散去。31日在约·那里迎接新年——有政治局委员们及他们的夫人和我们（亲戚）。没劲，无味。我穿得过于华丽（黑色长连衣裙——大摆的），自我感觉不十分好，因为几乎所有人的穿着都比21日简单（而我的估计正好相反）。

其次有一件大事——托洛茨基分子诉讼案①。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处死他们也难解我心头之恨。按他们犯下的罪恶勾当，真该拷打、车裂、烧死他们。他们是出卖祖国的罪人，是钻进党内的败类。他们为数还不少。他们阴谋使我们的制度遭到灭顶之灾，他们想要消灭革命的一切成果，他们企图杀害我们的丈夫和儿子。他们杀害了基洛夫，他们也杀害了谢尔戈。谢尔戈于2月18日死去，他是被罪恶的皮达可夫及其走狗杀害的。谢尔戈的离去使我们心情沉重，泪水长流。圆柱大厅，花圈，音乐，花香，泪水，仪仗队，成千上万的人从灵柩旁走过……所有这一切就在眼前和耳旁，可谢尔戈没有了。他是一个出色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同志，他是纯洁的，他没有料到有人会暗中谋害他，他是善良的，所有的人——坏人和好人——都常常利用他的天性。许多年来有许多恶棍在利用他的纯洁和善良。在个人生活中他是一个俭朴和仔细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同志们中少得可怜。

我看望了季娜。她勇敢地面对丈夫的去世。显然，艰苦革命生活的锻炼对她来说不无益处。她亲自主持了葬礼，一刻不离灵柩左右。平静而理性地阅读雪片般飞来的唁函和唁电。照常上班并平静地与人讨论自己今后的生活。她开始时曾说，既然谢尔戈没了她还

① 1937年1月23日到30日，法庭审理了所谓的“托派反苏中心案”，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里尼科夫、谢列希里亚科夫等17人被控“叛国”、“进行间谍活动”、“搞恐怖和暗杀勾当”等。结果，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另几人被判有期徒刑。

有什么必要活下去，她不想像玛·索·基洛娃那样活着。但她平静下来以后说，她将像谢尔戈所希望的那样活下去——继续工作，关心孩子们（他主管昆采沃儿童技术综合学校）。

现在说说自己。

这几个月我一直感觉非常不好。最后医生坚持要我卧床休息14天……举行了普希金周年纪念活动。教育人民委员部在大剧院举办了一台非常枯燥的晚会，整个气氛就像是灾难临头（2月10日），2月18日灾难果真发生。谢尔戈离开了我们……28日，为给斯维托奇卡过生日（11岁），“姑妈们”都去了克里姆林宫。雅沙带妻子第一次露面。约·没来，依我看是有意的。他把与儿媳妇见面这件事置之不理。也确实没什么高兴的。她长得很漂亮，比雅沙岁数大（他是她的第五位丈夫，不算其他几位。）她是一位离婚名人，人不聪明，文化不高，抓住雅沙肯定费尽心机。总之，如果没有这件事就好了。可怜我们这个并不出色的圈子又增加了一个伙伴。可怜的约·。想想吧，愚蠢的奥·叶、白痴费多尔，弱智的巴维尔和纽拉，不大聪明的斯达赫，懒惰的瓦夏，性格软弱的雅沙。正常的人有阿廖沙、热尼娅、我，还有使约·得到所有补偿的斯维托奇卡。是的，老爷子也不错，虽然脾气古怪，但是一个好老头——这就是约·的亲人们①。这其中还有尤利娅——一个女冒险主义者。如果雅沙从自己的革命家庭中娶一位谦逊、可爱的姑娘为妻，那该有多好，我们也会喜欢她、宠着她。而这一位带来的是流言蜚语、刻薄和闲话。

1937年8月7日　　　　　　　　　　　　　哥尔克二号②

拿起笔来却不知从那里开始。很难回忆起近几个月以来的所有

① 奥·叶·和老爷子指的是斯大林的岳母奥尔加·叶夫盖尼耶夫娜·阿利卢耶娃和岳父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费多尔、巴维尔、纽拉（安娜）是他们的儿女，斯达赫·列坚斯是纽拉的丈夫。

② 莫斯科近郊的别墅。

事情。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多，只有天天记才能把它们都记录下来。不断有人被清除，许多年以来这些人同我国最优秀的人物一样名声显赫，做着重要工作，受到信任，多次受到嘉奖，结果发现是我们制度的敌人，人民的叛徒，被我们的敌人所收买。我不想写什么讽刺文字。我只是想表达一下我的愤怒和困惑。

我们怎么会对一切都熟视无睹，怎么会发生敌对分子猖獗活动的事情？——这种议论的原因和内容是什么呢？我走在大街上常常观察人们的体形和面孔，我想，几百万就社会地位、受到的教育以及心理状况来说不能接受苏维埃制度、不能与工人和贫苦农民步调一致地奔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要上哪里去，他们又是如何伪装的呢？

现在，这些变色龙在革命的第 20 个年头被剥去一切伪装，露出了原形，在他们身上既没有起码的诚实，也没有爱国主义精神，甚至连对自己国家的纯本能的依恋都没有。破坏、出卖、诅咒、仇恨、叛变，无所不用其极，惟恐我们的公正的制度兴旺起来。有多少异己分子和心怀叵测之徒在革命时期钻进了党内，像壁虱一样吮吸汁液。他们所有人都爬到了关键岗位——一开始还披着伪装，扮成一副虔诚的样子，后来则臭味相投，结党营私，无耻到了极点，最后终于暴露出来，当然已为时太晚，因为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并给国家带来不少危害。心情变得很沉重。不信任和怀疑，这又有什么奇怪的。昔日的熟人今天变成了敌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说假话和披着伪装。当然，大多数叛徒和破坏分子一直就是腐败分子，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我自己不感到大失所望，因为我对暴露出来的罪犯从来没有温情，但是我为自己与他们见过面、说过话、甚至在自己家中接待过他们中的一些人而感到恶心。伴随着这些事件，今年在一天天过去……

勘 误 表

误	正	页 码
绝裂	决裂	第 13 页
冷谈	冷淡	第 27 页
那怕	哪怕	第139,266, 592,599 页
土气	士气	第 300 页
的的	的	第 317 页
坐谈会	座谈会	第 336 页